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女将军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中国女将军

崔向华 等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中国女将军

从童养媳到女将军

崔向华

1955年秋。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主席亲自为47岁的李贞授予少将军衔。从此，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位女将军。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是新中国，使世代代压在生活底层的劳动妇女翻身得解放；是中国革命，把一个封建桎梏下的童养媳，培养成叱咤风云的巾帼将领。

共和国45华诞的日子里，我沿着李贞将军的足迹，走访了女将军的老上级、老战友、老部属以及她的亲人和曾在她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一个伟大女性的形象凸现在眼前，我抑制不住情感的涌潮，记下她奇特而壮伟的一生……

六个姐妹·六个童养媳·父亲吐血身亡·砍不尽的柴·挨不完的骂·打死也要走

旧社会是一张万恶的网，穷苦的妇女在网中苦熬、挣扎。谁也不会想到，后来叱咤沙场的李贞将军，当年却是封建罗网中的一个小童养媳。

1908年2月10日，农历腊月二十三。一个女婴诞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小板桥乡。父亲李光田给这个在早上出生的二女儿取名“旦娃子”。弯弯曲曲的浏阳河水从村旁流过，两间半茅草屋孕育了一个顽强的生命。旦娃子长得俊俏端庄，人见人夸。可她的“命”不好，她从生下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要吃苦受穷。

没有田没有地。一贫如洗的父亲李光田租种了人家的两亩半田；母亲贝兴生一年到头喂猪打柴，家里还是穷得吃了上顿愁下顿。农闲时，勤劳忠厚的父亲常和别人合伙或借人家的小船到浏阳河里捕鱼捞虾，拿到七八里外的永和镇上去卖。多一个儿子多一个帮手，父亲就是想要个儿子，但老天爷不遂人愿，李家接二连三地一共生了六个女娃。这六个女娃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满六周岁时，就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

天下没有不怜子女的父母。谁不知道当童养媳苦？如果不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当爸爸妈妈的怎么舍得将六个女儿全送给别人当童养媳？

旦娃了也没有逃脱这个命运。六岁不到，她就被送到一个古姓的医生家里当了童养媳。

旦娃子刚刚十岁那年，父亲实在苦撑不下去，累得吐血身亡。

日用如梭。冬天的寒风掠过贫瘠的山地。两个衣衫褴褛的女娃子正在山上砍柴。

“莲娃子，你在树下拾柴，我上树去砍。”个子稍高些的女娃边说边像个男孩子般攀上丈把高的树。

“旦娃子，当心些哟。”莲娃子咂着舌看着上树的姐姐，揉揉冻得红肿的双手。

“晓得罗。”旦娃了攀上树刷刷砍着干枝条。眼看天色将晚，再不赶快挑柴回去，又该挨婆婆的骂了。她攀着树条从这棵树荡悠到另一棵树，动作麻利地劳作着。

起风了。滚滚沙尘蒙住了旦娃子的眼睛。“哎呀——”，随着一声惊叫，旦娃子摔下树，当即昏了过去。

“旦娃子，旦娃子，”莲娃子大哭着扑向仅比她大三岁的二姐。散落的干柴在风沙中飘舞远去，莲娃子已顾不上去捡柴了。

“二姐死了？”莲娃子见旦娃子毫无反应，苍白的脸上双目紧闭，她吓呆了。

从进婆家门第一天起，旦娃子就起五更睡半夜，洗衣烧饭，提水砍柴，稍有不随婆婆和比她大四岁的小丈夫的意，就是一顿打骂。有时她实在忍受不了虐待欺凌，就跑回娘家哭诉。可是家境贫寒，母亲茹苦含辛，她又何尝不想让女儿过好日子？实在是穷得无奈啊。“再苦也要忍着，要熬下去！”母亲的忍痛叮嘱常常萦绕在旦娃子的脑海。满腹苦水向谁倾诉？她只有和近处的几个童养媳在一起打柴打草时，说上一场，哭上一阵。哭诉完了，懂事的旦娃子照样砍上两担柴，一担给婆婆，一担给娘家。

“娘……我想回家。”旦娃子呻吟着缓缓醒来，看见哭倒在身上的妹妹：“哭什么，我又没死。”她强撑着从地上爬起，掸掸身上的泥土，活动一下扭伤脚。

“旦娃姐，你命好大哟，可吓死我了。”莲娃子忙欢喜地去捡柴打捆。

山风呼啸着，肆意摧残着这两姐妹，她们相互搀扶着踏着夜色挑担下了山。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旦娃子在苦难中顽强地长大，残酷的生活磨砺了她不甘屈辱，敢作敢为的性格，“我要走出这个不属于我的家！”一个顽强的信念，在旦娃子幼小的心灵中深深扎了根。长到十五六岁，旦娃子胆子大了，想偷偷离开家，到城里去做女工。她和几个要好的童养媳计议时，姐姐劝道：“抓回来会把你打死的！”

旦娃子倔强地回答。“打死就打死。”

姐姐又说：“如果到外面找不到事，再到哪里去呢？外面骗子多得很。”

旦娃子无语，但这条心是不死的。

不久，事情暴露了，婆家人骂她：“好哇！你跑吧！上了天也要把你抓回来，入了地也要把你挖出来。”

那一天，旦娃子上山砍柴，碰上了倾盆大雨。她把柴担回家来，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婆家因为没有干衣服换，就骂她没有把衣服洗出来。旦娃子气急地说：“我到山上砍柴了，哪里有工夫洗呢？”婆家人见她顶嘴，抓起东西就是一顿痛打。天地虽大，没有自己的一线生路。这种逃不掉，走不脱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性子刚烈的旦娃子一身湿衣服，披头散发地跑了出去，想扑到门前的水塘里求得一死。左邻右舍把她追了回来，邻居婆婆含泪劝她道：“旦娃子，女人就是女人啊，你看我六十多岁了，还要上山砍柴，还要挨骂，女人有受不尽的苦啊！”

“为什么？这个世道不公平！”旦娃子冲着黑暗呐喊。旧社会不把女人当人，旦娃子却要做一个真正的人，走一条真正的路。

这一天她终于盼到了！

妇女委员·油灯下入党宣誓·永
不叛党·革命的母亲·第一次战斗·
不让敌人抓活的

战争能锤炼人，战场能培养人。李贞肩上的将星是在战火中冶炼的。

1926年的春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风暴震撼着旦娃子的家乡。姐姐跑来告诉旦娃子：他们那儿建立了妇女组织，是“干革命”的。

仿佛一缕阳光洒进旦娃子的心里，她毅然剪掉辫子，参加了妇女协会，第一次正式使用自己的名字——李贞。由那时起的十多年时间里，她都一直梳着短发，短得乍看像个男孩子似的。以后她在游击队里当侦察员，有时装男，有时扮女，都很方便。可婆家却气坏了，威胁说要砸断她的腿，叫她“出得门去，进不得门来”。可是，有了革命理想的李贞已经无所畏惧了，她就像飞出笼子的小鸟，热衷于革命活动。她的手里常常提着一个装文件的草篮子，随着共产党员们到处去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儿童团。不久，她担任了区妇女协会委员，当年十月把会员发展到五百多人。

共产党给李贞带来了光明和新生。1927年3月，经张启龙等同志介绍，李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是李贞终生难忘的一个夜晚，在永和区石江一个教员家里，李贞在党旗面前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共产党，服从组织，严守秘密，牺牲个人，永不叛党，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奋斗终身。”

一盏明灯照亮了李贞终生的道路。从此她懂得了为了让千千万万受苦人都过上好日子，就是牺牲个人也是应当的道理。

考验接踵而来。李贞入党才一个多月，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大屠杀。接着，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许克祥的队伍从浏阳县城到永和区捕杀共产党人。反动派叫嚣着“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个”。白色恐怖中，区委办公的地方已经被“剿”，李贞也受到通缉。镇上、村上，到处都是搜索队，大路上还守着地主的镖客，要捉拿共产党员去给被杀的土豪劣绅祭灵。

看到同志们被杀的被杀，逃到外地的逃到外地，还有一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消极了，叛变了。李贞态度十分明朗：“不管怎么样，我永远也不叛党”。她在深山里藏了几天之后，决定回家筹措路费，到城里去暂时隐蔽一下。

母亲一见李贞回来，大哭了一场，她还以为女儿早已被杀了呢，母女相见分外亲。这时，得到消息的一对自首夫妇和家族头人赶快跑到李贞家劝她自首。李贞一听就不客气地回答：“你们管什么闲事。我是不是共产党与你们没有关系。我想，真正的共产党才不会向你们国民党自首哩！”

“你是一个女子，天天东躲西藏多么危险、多么丢脸，只要你去自首了，保险国民党不会捉你了。”他们继续劝说：“在家里多好呀，也免得你母亲和我们族里人担心。因为你是没有父亲的女儿，应该听家族人善良的劝告，我们可是来救你的呀！”

李贞气得冒火：“一年前，我做小媳妇那般苦，你们为什么不来救我呀？今天，我是为着要活，而不是为着要死。我不愿意听你们这些话。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的头可以断，血可以流，就是不向国民党自首。”

他们被李贞骂走了，母亲把她拉到一边问：“娃子，娘只能生你的身，不能生你的心。假若你是共产党，好汉做事好汉当，绝不要去自首！共产党现在是倒霉的时候，可是石头也有翻转时！”

李贞感动得扑到母亲怀里。母亲并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却深明大义，给了李贞莫大的鼓舞。那天晚上，母亲匆匆卖了粮食，请人驾了一只小船送李贞到城里。

风声一过，李贞重返家乡，恢复了党组织，由四名党员组成永和区的第一个地下党支部。李贞任支部书记后，李贞的家就成了地下党经常开会议事的地方，李贞的妈妈开了个卖油盐、火柴等日常生活用品的小店，作为秘密联络站的掩护，她老人家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她还将李贞的两个妹妹送去当了红军。特委书记张启龙和王首道经常出入李贞家，称赞李贞妈妈是“革命的妈妈”。自从长征开始，李贞就再也没有见过母亲的面，直到解放后，她才得知，母亲在遭到日本兵痛打以后，去世了。

1927年9月，毛委员领导的秋收暴动的工农队伍从萍乡打进了醴陵，接着又攻克了浏阳，李贞带领当地党支部的同志立即投入战斗，策应主力部队打击敌人。眼见游击队的实力不如敌人，机灵精干的李贞心生一计，她找来一个煤油桶，将鞭炮装在桶里点燃。那噼啪作响的声音迷惑了敌人，吓得他们四处逃窜。李贞趁势指挥游击队冲进团防局，把缴获的粮食钱物分发给穷苦百姓。

1928年初秋，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锻炼成长的李贞，被任命为区委委员兼平浏游击队党支部副书记和士兵委员长。由于区里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疯狂集兵围剿，妄图血洗双洞根据地。

那时，李贞已经怀了四个多月的身孕。头天晚上，她给游击队员洗衣服没有休息好，第二天一早就发现了敌情。这场战斗一直打了一天，最后，他们被迫退到深山里去。山里没有人家，他们只好采些牛心桃、映山红充饥。这样的苦日子坚持了一个星期，敌人又继续压了过来。情况万分危急，眼看着战友们在敌人罪恶的枪口下纷纷倒下，李贞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敌人大叫：“抓活的！”生死攸关，没有退路，李贞和四名游击队员退守在祖师岩的悬崖上。面对几丈深的绝壁悬崖，李贞视死如归，下达了死命令：“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下跳！”说完，李贞头一个纵身跳下悬崖，游击队员纷纷相随。热血染红了山间那一片映山红。

大难不死。李贞苏醒后才发现自己被卡在崖边的树丛中，血水如注。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流产了。在幸存战友的帮助下，她草草掩埋了未能出世的胎儿，坚强地走出崖底，死里逃生冲出了敌人包围圈。

李贞带领战友一瘸一拐地朝前走，碰上一家老百姓，给他们些番薯吃，给李贞一块破布当月经带。他们接着又上了路，去追赶部队。裤腿上的血凝结成血痂，将李贞的两条腿磨破了，她还是顽强地走着，走着……

从此，李贞的左腿上就留下了当年跳崖的伤疤；从此，年仅二十岁的李贞失去了生育的能力。她为了革命事业付出了血的代价。

游击队英勇劫“匪”·战友情意 重·刀下留人·闯狼窝的新娘子

战争年代，枪就是战士的生命。浏东游击队初创时期，李贞和几个共产党员从一个反动民团团丁那里夺得了一支枪。1928年春，彭德怀派人又送给他们十二支枪。背枪的都是共产党员。有了枪就好像有了护身符，就有了革命的本钱。但是，枪怎么放，仗又怎么打，却没有一个人懂得。大股敌人来了，大伙就分散隐蔽在大山上。敌人走了，为了挣饭吃，男的去给人家打短工，李贞就给人家渍麻。一旦获得了有利情报，就向敌人进攻。第一次打张家坊，九个人三支枪，外加一个装爆竹的煤油桶。李贞一只手拿着枪，一只

手提着煤油桶。一进门，就放枪，放爆竹，敌人全被吓跑了，没有打倒一个。尽管缺乏战斗经验，一支拥有三十支枪的浏东游击队却顽强地发展起来。

为筹措枪支，张启龙在路上不幸被捕。消息传来，李贞心急如焚，马上去营救。她知道，张启龙是湖南省城挂了号的浏阳十大“匪首”之一，这次敌人抓到他，一定凶多吉少。她主动向王首道请战，侦察敌情。王首道同意了，他亲自带队埋伏在大路两旁，准备在敌人押解张启龙到县城的途中营救。

4月25日晚，李贞带着一个游击队员赶到关押张启龙的观音塘。在当地群众协助下，终于查明了情况。敌人白天不敢押送，怕游击队中途拦截，准备等夜深人静时押往县城邀功请赏。李贞不顾生命危险有意挤近关押张启龙的地方，暗示他同志们要来营救。

他们的视线交织在一起，一切尽在无言中。张启龙危难关头见李贞，内心涌上一股暖流。

李贞留下游击队员观察动静，自己飞奔报告王首道消息。

救兵踏着夜色而来。不料敌人有所防备，又狡猾地将张启龙转移了关押地点。李贞义愤填膺，把刀架在敌兵头上喝问：“快老实交代，张启龙在哪里？”

“在、在林家祠堂。”王首道和李贞带领游击队又旋风般奔去，包围了林家祠堂。

“张启龙，你在哪里？”李贞焦急的呼唤声使受尽折磨的张启龙精神大振，大叫道：“我在这里！”

李贞急切奔去，一刀砍断张启龙身上的绳索，深情地说：“我们终于找到了你！”

张启龙的眼睛湿润了。他紧紧握住王首道和李贞的手说：“谢谢同志们的救命之恩。”

春雨中，他们凯旋而归。

王首道、张启龙创建的浏东游击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实战中摸索出一套游击战术，既会打仗，又会做群众工作。身为士兵委员长的李贞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随着浏东游击队的声势越来越大，上级决定正式成立浏阳县委，张启龙任县委书记，王首道任县委组织部长。会上明确分工，张启龙抓武装负责游击队的工作，王首道负责县委机关的日常工作。

一切工作走上正轨后，游击队却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裁缝出身的杨梅生丢了枪！按士兵委员会的规定，谁丢了枪就要枪毙，这是全体战士都举手通过的一条纪律。李贞不会忘记当初十几个人拉起游击队，没有一支长枪，只有马刀和梭镖，整整几个月不敢和敌人打仗的情景。如今游击队好不容易才扩大到这一步，却偏偏出了这档子事，自己是士兵委员长，理当带头执行纪律呀！

夜晚，李贞翻来覆去睡不着：如果是对付敌人，不用说，她马上举枪射击；眼下可是动手处死自己的同志啊！怎么下得了手？

李贞整整想了一夜，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在战斗中让杨梅生夺支枪回来，免他一死，将功折罪。她的想法得到队长的同意，但也有少数队员认为要按军法处置，嫌李贞“婆婆妈妈的办不了事”。李贞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当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杨梅生时，他感动得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我一定从敌人手里把枪夺回来！”

没过几天，游击队决定袭击敌人。李贞扮着回娘家的新娘子，坐在一顶漂亮的花轿里。由于计划周密，敌人措手不及，游击队来了一个中心开花，四面围攻，一下子把敌团防队干掉了，缴获了十几支枪。当游击队凯旋归来的时候，笑嘻嘻地杨梅生肩上背着刚刚缴获来的三支步枪，手里还提着一把大刀。杨梅生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高级将领，直到晚年，他都没有忘记李贞当年“刀下留人”的战友之情。

战火中的妇女团·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被迫离婚·战火考验的真情

1932年，在湘赣边区活跃着一支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妇女团。团政委就是李贞。平时，她带领女兵们操练武艺；战时，她率领女兵打仗歼敌。妇女团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锻炼成长。

这一年，李贞和张启龙结为夫妻。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他们同生死，共患难，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李贞十分敬重和爱戴张启龙，他不仅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更是她的革命引路人。他们由相识、相知到相爱，终于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张启龙和李贞同是浏阳人。张启龙1900年4月8日诞生在浏阳河畔永和镇澄潭村一户普通农家。父亲望子成龙，故为其取名启龙。他比李贞革命时间早，1925年入团，1926年转党，师范学校毕业，有文化，聪明好学，为人正派，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非凡的领导才能。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张启龙家先后有六位亲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父亲张德钊，是个纯朴憨厚的农民，支持儿子闹革命。1928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捉拿张启龙不着，就抓他父亲顶替，酷刑拷打，暴尸荒野。张启龙的结发妻子黄光菊，是父母包办的“童子婚”，婚后生有一女。1930年母女二人双双被国民党威逼折磨致死。

国恨家仇，深深地埋在张启龙的心底，更激发了他走革命道路的坚定意志。他和李贞共同的苦难遭遇和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活，使他们日久生情，相互关心，彼此照顾，共同进步。张启龙写得一手好字，他常常帮助李贞学文化。李贞为他补军装，照料他的生活。知道张启龙没事爱喝几口，常常规劝他少喝酒，少抽烟，有空就帮他洗刷那只心爱的大烟斗。

妇女团驻扎在永新县城河畔的东关村。闲暇时，身穿灰布军装的李贞大步流星般地走到女兵们中间，她性格耿直快人快语，深受女兵们的敬重和爱戴。她就像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燃起一片战斗豪情。

婚后的生活是甜蜜的，但非常短暂。就在李贞庆幸自己终于走出童养媳的阴影，找到革命伴侣的新婚快乐的时候，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张启龙被后来叛变投敌的刘士杰等人诬陷迫害，撤职关押，开除党籍。要不是后来任弼时和王震多次力保，他险些被杀头。王首道和后来成为李贞丈夫的甘泗淇也受到左倾路线的冲击迫害。

在那乌云翻滚的日子里，李贞对张启龙，对他们的夫妻关系毫不动摇。她相信张启龙是对的。从1931年7月到1933年春，一直在湘赣苏区担任湘赣省委常委、省苏维埃副主席兼省苏党团书记、军区总指挥的张启龙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何罪之有？

张启龙被关押后，也相信李贞是理解他的。他给李贞写信，请她放心，

自己能想得开，绝不会自杀。他被关押一年零两个月，身受不公正待遇却心怀坦荡，无私无畏。张启龙是个乐天派，他在关押他的地方与同样受到迫害关押的战友们讨论形势，谈论工作，谈笑风生，每到心情激动时，买酒与大家同饮，战友们都喜欢他。

但是，刘士杰这些人，却不放过一切迫害张启龙的机会。他们编造谎言，把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说得一无是处，把省委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他们一方面给李贞施加压力，要她与张启龙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在生活上也不能含糊。暗示她与张离婚。李贞把问题挑明后，表示坚决不同意离婚。另一方面，他们又逼迫张启龙，说他不配作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丈夫，要他离婚。张启龙对这些话都不介意，唯独他们讲到，你这个反革命丈夫，会连累李贞的清白这类话，却刺痛了张启龙的心。他经过反复思考，唯恐刘士杰这些人借此加害于李贞，他含悲忍痛，最后下定决心，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离婚书上签了字。

他们离婚了，但是，他们在艰难岁月中形成的革命友谊，永远留存在他们的心里。若干年后，李贞与张启龙分别建立各自家庭以后，两家一直保持着朋友般的往来。每当张启龙带着他 1938 年在延安娶的夫人傅平中到李贞和甘泗淇的家中作客时，李贞高兴地叫：“张胡子来了，快烧狗肉，拿酒喝！”1987 年 6 月 3 日，张启龙逝世时，李贞佩戴黑纱，参加了隆重的追悼会，向这位令人敬仰、坎坷一生的老战友表示衷心的哀悼。

经过战火考验的感情是最纯洁、最真挚的，他们的友情万古长青！

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突围西征
·我不能离开红军队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坐脸盆下山

1934 年 7 月，蒋介石以三十一个师的重兵，从六个方向，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行“围剿”。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湘赣苏区的红军也屡战不利。时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的李贞奉命率队回师井冈山，增援红四十九团。

红军学校五百多名学员，在副校长谭家述和李贞的率领下日夜兼程向井冈山进发。途中，到处受到敌军阻截，派出的侦察员报告说，敌人正规部队增援井冈山，占领了黄洋界、桐木岭、茨坪等险要地方，先头进军井冈山的红四十九团不知去向。

这时，部队由于沿途百姓“跑反”，已经断粮了。紧急情况下，他们决定兵分两路，由谭家述和李贞各率一路改从山间小路迂回开进。李贞的主要任务是沿途收容分散的红军战士和伤病员，然后绕道遂川回永新。

瓢泼大雨中，李贞头戴斗笠，脚穿草鞋，率队沿着崎岖的泥泞小路艰难行军。为了避开敌人，他们一路披荆斩棘，走了几天才到达遂川的荆竹山。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残酷烧杀，但见断垣残壁，遍地瓦砾，不见一间完整的房子。部队忍着饥饿，好不容易在山洞里找到一个老汉，经他指引带路，终于在一个深山坳里找到一批红军伤病员。

他们都是红四十九团的，打井冈山时负了伤，不能行动，暂时留在这里养伤。李贞和同志们见到这七八十个红军伤病员挤在几间破竹棚子里，衣衫破烂，满是血污，粮食已尽，全靠吃野菜草根活命，地上只铺了薄薄一层稻

草，根本没有一点医疗条件，都难过得掉下眼泪。伤病员们十分刚强，纷纷要求归队。

为了抢救战友的生命，李贞果断地对学员进行分工，有的去寻找老乡，想方设法筹集粮食；有的跟她上山采野菜、挖草药。李贞考虑到敌人围攻，环境恶劣，无法带走重伤员，她请几名老乡帮助照护他们，留下一些钱物、粮食，鼓励伤病员坚持就地养伤。一切安顿妥当，然后她带领学员们搀扶着几十个轻伤病员朝湘赣边界的永新方向转移。一路上敌军碉堡林立，封锁严密，李贞一行只好转向遂川方向行动。昼伏夜行，忍饥行军，有时整天只能嚼些草根充饥。后来实在饿得不行了，李贞便下令把红军学校唯一的战马杀了。行军途中，他们还常常碰到敌人，他们就利用山高林密、杂草丛生的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且战且走。经过十二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经五斗江到达永新的牛田，和大部队会合。

不久，李贞率领红军学校全体学员随红六军团突围西征。

那是8月里的一天，部队从赣转移的头一天，李贞刚从省委开会回来。紧急会议上宣布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向湖南中部挺进，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向北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取得联系的决定。李贞匆匆赶回去准备传达会议精神，尽快做好部队转移的工作。

这时，谭家述紧走一步，对李贞说：“李贞，女同志打仗很辛苦哟。”

“我随军作战这么多年，你今天才知道我是女同志？”李贞随口说道。她见谭家述笑而无语，连忙追问，才知道组织上打算将李贞留下照顾快要临产的三妹李新兰，当年的莲妹子那时已经是王震的夫人了。

李贞一听高低不肯，一回住地就去找中央代表、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同志。

“弼时同志你说说，当前是打仗重要，还是照顾妹妹重要。”李贞心直口快，进门就发出一串“连珠炮”。“我是来参加革命的。妹妹生孩子不能影响我的工作，她可以请当地老百姓照顾。我不能留下。我不能离开红军队伍！”

任弼时笑了：“好！你要不愿意留下，我看可以一起走。但李新兰生孩子也是个大事，要妥善安排好。”

李贞顿时高兴起来，她知道，只要任弼时一说话，自己准保能走成。

果然，李贞如愿地踏上征途，参加了红六军团西征的行列。恰在这时，部队有个领导很关切地对李贞说：“李贞，部队要大转移了，你把那个四妹也一起带走吧！”

李贞当然了解这话的意思，四妹子李静在被服厂工作。大部队走了，四妹子随被服厂留下来，当然十分危险。但又一想，上级没有确定被服厂走，我是党的干部，怎么能私自把妹妹带走呢？于是她说：“那不行，我不能私自把她带走哇！”

四妹李静也听到部队要转移的消息，找到姐姐要求带自己走。李贞恳切地说：“你们厂不走，我不能抽你走，你回到厂里，在那里的党组织领导下，坚持斗争。”

红军走了，四妹留下了。果然不出所料，她很快就落入虎口，受尽磨难，九死一生。全国解放后，四妹见到李贞，还有些抱怨。李贞诚恳地说：“我现在仍然觉得，当时我那样做是对的。当然，我那时可以扩兵，带十个八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带你就不行。因为，你是有组织、有单位的红军战

士，组织上没有决定你们走，我怎么能单独把你抽走呢？”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李贞毕生的座右铭。她是党的人，她从不循私情。至于王震的夫人、三妹李新兰更悲惨。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大部队走了，她留在老百姓家生下了儿子。战火纷飞中，她历经九死一生，儿子也丢了，从此和王震失去了联系。人们传言她已经死了。这位老人仍健在人间，现已84岁高龄，思维清晰，念念不忘丢失的儿子。王震直到解放后，他们已各自重建家庭后，才知道李新兰还活着，王震和后来的夫人经常来看望她。战争造成了多少妻离子散的悲剧。连任弼时也在这次西征前劝妻子陈琮英将三个月大的儿子托付在老乡家，结果至今音讯全无，多次查寻不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军人会遭遇如此的悲剧，会有这么多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

1934年8月7日晚上，李贞告别亲人，告别苏区，义无反顾地随队离开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蒋介石从湖北、贵州、江西、云南调动大批人马，对我军团围追堵截，还派飞机轰炸，企图将六军团一口吃掉。六军团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消灭了大批敌军和出没于山林的土匪。部队刚到甘溪，就与敌军大部队遭遇上了。因敌我兵力太悬殊，我军战斗失利，部队被截为数段。当时，李贞肩负着寻找前卫部队传达肖克军团长和王震政委指示的任务。她攀上大山，且战且走。山高路陡，暴雨如注，树林里草深路滑，后有追兵。李贞心急火燎，猛然看见前面走着一位首长的警卫员。她追上去一看他的挑子里有一个洗脸盆，灵机一动，坐上脸盆就朝陡坡下滑去。滑到半山腰，她跌了个筋斗，脸盆也被甩在一边，衣服也划破了！她顾不上疼痛，爬起来向山下跑，及时完成了任务。这段坐脸盆的故事后来被传为佳话。

翻过一座座山，越过一条条河。部队几乎日日夜夜在行军、打仗。尽管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李贞的心情却坦然、安宁、振奋，部队就是她的家呀！这次西征历时八十多天，跨越敌境二千五百多公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贵州和广西、湖南敌军的围追堵截，终于与贺龙的红三军胜利会师，由此红三军改成红二军团。因为离开根据地的时间比中央红军早两个多月，后来人称红六军团的西征拉开了长征帷幕，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

同结伉俪·同走长征路·把马给 伤病员用·过雪山草地·爱情价更高

战争年代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没有卿卿我我的缠绵。

1935年元旦，锣鼓喧天，爆竹声脆。湘西永顺县塔卧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

“今天，是我们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和组织部长李贞结为伉俪的喜庆日子，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

任弼时高亢的语音在一间充满喜庆气氛的大房间里轰鸣。掌声中，贺龙、关向应、王震、肖克等首长和同志们纷纷向新婚夫妇贺喜。这一对革命伴侣自西征以来历经风雨，经组织上牵线搭桥，结为夫妇。

甘泗淇原名姜凤威，又名姜炳坤。1903年11月21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贫农家庭。他自幼聪慧，记忆力和理解力很强，家族的人集资供他读书。他就学于长群中学、湖南法专（即后来的湖南大学）。他青年时代，在宁乡参加过驱逐北洋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在长沙参加过“五卅”运

动、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25年入团，1926年入党，1927年被党派往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长和军区政治委员。1932年，他曾遭受王明路线的迫害，被撤职。之后，他就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李贞在湘赣根据地就一直在甘泗淇的领导下工作，对他很了解，很敬佩。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思想理论水平高，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胸怀开阔，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一向热情、开朗、泼辣、充满追求精神的李贞，把自己的终生托付给这样一个善解人意的男人，还有什么不令人庆幸的呢！

屋外繁星满天，屋内喜气洋洋。李贞热情感谢首长和同志们来参加他们的婚礼。她终于又有了自己的家。戎马生涯，南征北战，战火凝结了永生的感情。从此，李贞与甘泗淇互敬互爱，一同走上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一同奋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疆场上，共谱人生壮丽的篇章。

1935年11月19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由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告别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地区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看着生活近一年的熟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李贞感慨万端。自六军团和贺龙部队会合后，转战到了湘西广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取得了十万坪大捷等一个又一个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十万坪大捷，为在湘西创建根据地及向东发展战略攻势，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六军团转战在湘西一带，与这里的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鱼水深情。为了配合红军战斗，这里的各村各乡都组织了自己的武装，从25岁到45岁的青壮年组成了赤卫队。当地群众主动为红军挑米劈柴，抬担架护送伤员，甚至冒着危险当向导。记得有一次，李贞带队越过敌人的重围，深更半夜迷了路，只好敲开一个老乡家的门，可这家只有一个孤苦伶仃的瘸子。他听说红军迷了路，坚决要给他们带路，说：“我反正是个半条命的人了，能帮你们做点事，我心里痛快。”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他跌跌撞撞摸路领红军走。大家见状于心不忍，就背着他走。他伏在红军背上指点路，一直把他们送到目的地。

李贞更难忘怀的是，在蒋介石实行经济封锁，红军极度困难的时刻，是湘西群众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支援部队。粮食缺乏，吃盐困难，当地群众宁肯自己吃野菜，也要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食盐送到部队。“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我今天的李贞。”若干年后，女将军感情非常激动地说。

怀着依依惜别情，李贞和甘泗淇步入长征路。一路上，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雪山草地人迹罕至。严酷战争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考验着每一个同志。特别是女同志吃的苦比男同志更多。日夜兼程，行军打仗，女同志头发里部长满虱子，一梳就呼呼往下掉；还有一些女同志身怀有孕，挺着大肚子行军打仗；有些临产的女同志，小孩还未生下，就长眠在路上。但红军女战士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咬紧牙忍耐着，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行军打仗，抢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翻过大雪山……

长征路上，李贞既要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又要做党团工作、干部工作和收容伤病员工作，每天都要统计部队伤亡数字。尽管环境艰苦，工作劳累，但她想到这是为了消灭敌人，拯救劳苦大众，就越干越有劲，越干信心越坚定。有一天，军团长肖克风趣地说：“李贞同志，能走得动吗？”李贞爽朗

地回答：“和大家一样走，保证掉不了队。”

不久，红军缴获了敌人一些骡马。肖克对勤务兵说：“李贞同志一路行军很辛苦，脚也磨破了，快把缴获的那匹枣红马送给她骑吧。”

有了马，李贞的勤务兵小赵笑得合不拢嘴，嘴里不再嘀咕了。可李贞却不肯骑，看到谁负伤了、生病了、走不动了，就把马给谁骑。每当晚上宿营时，李贞还要在油灯下帮战士们缝补破衣服，然后才烧点水挑脚上的血泡，不让别人知道。

小赵见李贞拄着棍子忍痛行军，就又嘀咕上了：“部长有马不骑，都让别人骑，我这个马夫也白当了。”

李贞的意志非常顽强。那时的官兵关系亲如兄弟姐妹，情同手足，谁也不愿意让一个同志掉队落伍。

过雪山时，风雪扑面，寒风刺骨。面对险恶的雪山冰峰，李贞艰难行走，手冻僵了，脚麻木了，冷上加饿，浑身没有一点劲。师政委廖汉生见李贞冻成这样，便把自己围在腰间的一块羊皮送给她：“捆上吧，御御寒！”李贞感动地接过羊皮，又将它撕成两片，自己身上绑上一片，把另一片送给另一个体弱的同志。

在艰苦卓绝的草地行军中，没有粮食吃，对于红军是最大的威胁。当时红军的口号是：“团结一致，走出草地就是胜利！”为了战胜饥饿，闯过难关，李贞带领战士们去寻找食物。野菜采光了，就挖草根。一天傍晚，草原上狂风呼啸，大雨倾盆，李贞见一些小战士饿得头晕，走路东倒西歪，心里难受，总不能让这些可爱的战士活活饿死呀。她忽然想到了围在腰间的牛皮带，便生火烧煮，让大家分吃了一顿“牛肉”。

每到一处宿营地，甘泗淇便带着红二方面军直属政治处的几个同志四处寻找野菜，采集食物。那时，沿途辨明可以吃的野菜大都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为了发现新的可以吃的野菜，甘泗淇总是冒着中毒的危险，抢先试着吃。当证实某种野菜无毒能够充饥时，他欣喜若狂，立即挥笔疾书拟写电稿，迫不及待地电告各部队。并鼓励指战员们为了革命，征服一切困难，不断前进，争取长征的最后胜利。

这一天，烈日烘烤着草地，指导员曾长久得了伤寒病，正发着高烧。为把战友活着带出草地，连日里，甘泗淇和李贞忍着饥饿，把自己那份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口粮拿出来，分给曾长久和其他伤病员。一次有人送来一块马肉，李贞像父母照料婴儿般，把马肉一口一口地嚼烂喂小曾。晚上甘泗淇还把小曾和其他伤病员安排在自己的帐篷里睡觉。过了几天，在李贞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小曾的病竟然好了起来，终于顺利走出草地。

“李贞同志，这个小同志交给你了，你一定把她带出草地。”这天傍晚，任弼时把一个红四方面军掉队的女战士杨国秀交给李贞。

“行，保证完成任务。”李贞痛快的回答。

茫茫草地上，李贞搀扶着13岁的杨国秀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行军。草地的气候恶劣，一日数变，一会儿天晴，一会儿乌云满天，一会儿刮大风，一会儿下大雨，一会儿下冰雹。有的冰雹像大碗那样大，有的战士被砸死了，有的骡马被砸死了。十天露营，就有九天下雨。地面积水成流，全身湿透，夜不成眠，只好坐起来，大家围在一起抵挡风雨。过水草地时更加艰苦，水草有毒，要打好绑带，穿好布袜，否则，走水草地要烂脚。水草地上面有一层稀泥壳，下面是不知多深的稀泥坑。一次有个干部不慎掉进了稀泥坑，越

陷越深，多亏李贞及时伸出竹竿抢救，才把他拉上来。在这种恶劣环境中，杨国秀支撑不住，病倒了。

李贞日夜看护在杨国秀身旁，鼓励她坚持住。过草地前贺龙曾送给李贞三副中药，其中两副在一个干部病倒时李贞给他吃了，挽救了他的生命。还剩下最后一副，李贞亲手把它熬好，一勺一勺喂给杨国秀吃。

“你不要管我了，李大姐。”杨国秀感动得直流泪，恳求道。“不，就是拉也要把你拉出草地。你还年轻，前边的路很长，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李贞充满自信地鼓励小杨。

当杨国秀烧退了，快走出草地时，李贞却得了伤寒病，昏迷不醒，同志们把她绑在马背上过了渭河。当时，李贞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要战胜困难，坚持下去。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终于闯过一道又一道难关，胜利到达陕北。“曾经沧海难为水”，李贞和甘泗淇历经万里长征的磨难，感情更加珍贵。在以后的人生旅程中，他们无论碰到何种困境，都能坦然面对，无所畏惧。在长征途中，甘泗淇一直和任弼时、贺龙走在一起，任弼时同志曾经说过：“甘主任是个忠诚的同志”。在甘泗淇的脸上，总是闪耀着两只含笑的眼睛，给人以永远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这一年，李贞刚满28岁，她充满青春活力，满怀信心迎接新生活的考验。

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困难不属于 革命者·大生产·开荒种地·淡泊一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上调正在延安抗大学习的李贞到八路军妇女学校任校长。从前方到后方，李贞开始不大习惯。她怕自己文化低，管不好这支来自四面八方的娘子军。对部队学校，她并不陌生。1933年仲夏，她由湘赣军区医务学校政委调任安福县委副书记兼军事部长时，被组织上派到瑞金中央党校学习。在那硝烟弥漫的岁月里能有机会上学，对从小就盼望上学读书却因家穷而当童养媳的李贞来说，心情是多么振奋哪！三个月的学习生活，使她有机会聆听毛泽东和张闻天、董必武、徐特立、邓颖超等同志的授课，学到了不少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尽管那时学习条件艰苦，但她孜孜不倦的学习着，并取得了优异成绩。而今她从冀中前线到抗大学习时间不长，却又调去当管理学校的校长，李贞感到责任重大。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找她谈话说：“学校的学员，有参加过长征的娘子军，有来自东北的青年学生，为了加强对学校的领导，组织决定让你这个带兵的人来办学校。希望你依靠群众，尽快把学校办好。”

事在人为。李贞毫不含糊，第二天卷起铺盖来到妇女学校。一看学校住的窑洞连门窗都没有，窑洞里非常潮湿，炕也没修好，学员们抱怨吃的小米饭尽是沙子硌牙。

万事开头难。李贞的办事风格就是亲自动手，丰衣足食。她连夜召集学校领导及有关人员开会，分工落实。她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的力量，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这天清晨，李贞亲自下厨，帮炊事员烧饭做菜，调剂口味。她边教边干，很快就让学员吃上香喷喷的小米饭。

为让学员们住的舒服，她领着学员们修好窑洞，安好门窗，整好土炕，

备齐过冬烧炕的柴禾，并和学员们一起上山挖煤，把炕烧干。然后，又领着管理人员逐个检查窑洞火炕的通风情况。

为丰富学员的文化活动，她亲自化装深入敌占区，买来了学员们盼望已久的篮球、足球、排球和乒乓球。课余时间，校园里充满了她和学员们打球的欢声笑语。

“李校长一来，学校变了样！”学员们学习劲头大增，人心安定，学校越办越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大批妇女干部。

李贞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领导水平。工作实践使她认识到，一个人只有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之中，紧紧地和群众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去克服一切困难。

“困难不属于革命者，它只能征服意志薄弱的人”。李贞在若干年后回顾起这段经历时如是说。

“解放区呀么呼嘿，大生产呀么呼嘿，军队和人民……齐动员呀么呼嘿！……”

1941年春，延河两岸刚刚解冻不久，八路军120师359旅奉命开赴南泥湾。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战胜经济困难，他们自己动手，开荒种地。身为120师直属政治处主任的李贞带领指战员们投入大生产运动。

开刚蒙蒙亮，李贞扛着锄头上了山。她边干边向大家介绍着自己家乡的风俗和耕作方法。沸腾的山川，到处激荡着欢声和笑声。平整土地，开垦良田，播下玉米、谷子、南瓜、大豆……李贞从小劳动惯了，在随部队转战南北时不管走到哪里，经常是一宿营，放下背包，就去帮房东担水、扫地、劈柴、做饭，还帮队伍里的小同志缝缝补补、洗衣服。

部队进入陕北后，李贞和战士们一样，铁锹一扛，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挖窑洞，开荒种地，背煤取暖，纺线织布，只要有块巴掌大的地方，都要种上棵南瓜。

春种秋收。这一年的秋天，他们大丰收了，上百个大南瓜抱了回来，蔬菜也自给了。贺老总看到高兴地说：“好样的！”李贞也风趣地回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在以后转战大西北，抗美援朝的战斗中，劳动仍是李贞的习惯。指挥部不管搬到哪里，她都要抽空整地种菜。她说：“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嘛，它可以解决机关吃菜，二可以锻炼身体。”

在李贞年事已高时，她仍保持着这个老习惯。她的房前有一块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平地，每年春天都要和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种上莴笋、豆角、丝瓜、南瓜。她还自己动手做一些泡菜。她说：“人老了，手脚不大听使唤，更要多动一动，劳动也是很好的运动嘛！”每到春秋的饭桌上，都是李贞自己亲手种的菜，她饭量小，主要以青菜为主。她说：“我一辈子清淡惯了，多吃蔬菜，对身体也有好处。”

只要还活着就要工作·一息尚存，
决不放松·香山脚下的平房·不要护
士和秘书·这个情我不能说

李贞一生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毕生奉献。她从一个童养媳成长为一名战功显赫的巾帼将领，从不居功自傲，有权不谋私，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

本色，处处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解放战争时期，李贞担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在彭德怀的领导下，为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作出了重要贡献。抗美援朝期间，她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53年回国后，李贞担任军委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长，她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为加强防空军干部队伍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7年她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当时，军事检察院组建不久，许多事情没有经验。李贞到职后，协助检察长开展各项检察业务工作，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为军事检察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尽管在文革中她被迫害，关押四年，但她身处逆境，红心向党。即使在她年事已高，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期间，她仍说：“只要我活着，我还要工作。唯一希望是下一代能接好老一辈革命者的班。”她还先后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全国妇联等担任过领导职务，始终如一、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她常说：“一个革命战士，一个共产党员，只要听党的话，把自己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之中，紧紧地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就能发挥个人的智慧，做一个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人。”

在北京香山脚下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里，曾住着年逾古稀、头发斑白，却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敏捷的李贞。她坐在吱吱作响的旧藤椅上会见来客。1976年她平反之后回到北京，没有住回原来的房子，而是住到香山这处平房院里。院里几家人合住，房子又老又旧，冬天暖气也不热。工作人员过意不去，想给组织上反映一下。她知道后立即制止，住房一直没有修。她在破旧的平房院里一住就是七八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后来，组织上考虑到她生活不方便，要她搬出平房，住到楼房里，她还一再说，有这样的房子住就可以了，迟迟不愿意搬进新居。组织上做了许多工作，她才勉强搬进楼房，但在有些同志的眼里，认为将军这样的老革命住“集体宿舍”，与其身分不相称。然而，李贞不这么看，她说：“战争年代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谁去计较个人住房。现在，固然条件好了，但不能过多地追求物质享受。我们的目标是共产主义，在住房等待遇方面老干部要自觉。”她还风趣地说道：“住在这里置于群众之中，就永远不会脱离群众嘛！”凡是左邻右舍有事相求，她都热心相助。一次邻居大妈的小孩发烧不省人事，李贞马上叫司机开车把孩子送到医院，经抢救脱离了危险。孩子的妈妈千恩万谢：“李奶奶，是您救了我们的孩子一条命啊！”

李贞一贯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她晚年身上穿的仍是五六十年代的旧军装，补了又补。工作人员几次劝她做两件像样的衣服，她都说：“我这套衣服还可以穿，只要穿得干净、整齐、暖和就可以了。”直到她参加党的十三大会议前，身上仍然穿着那件补了又补的衣服，脚上常穿着那双部队发的大头鞋。她说过：“战争年代条件很艰苦，我们吃的、住的、穿的都靠老百姓。现在条件好了，党的干部不能忘了老百姓，不能贪图享受，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能丢。”

她年事已高，却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凡是自己能动手干的事情，她都不要工作人员代劳，就连洗小件衣服，都是自己动手。平时吃穿，都很简朴，不讲究。她经常告诫工作人员不要向组织提什么要求，尽量少给组织上添麻烦。领导同志看到她生活节俭，家里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提出

要给她添置一点。她再三谢绝，说：“这比过去强多了。”她身体不好，做过胆切除大手术，有心脏病、神经衰弱症等病痛，领导上怕她走路摔跤，要在她的会客室里铺上地毯，她坚持不要。后来，工作人员趁她不在家的时候，把地毯铺上了。她回来见到后很有意见。组织上多方照顾老同志，要给她配汽车、配护士、配秘书。她只接受配一辆小汽车，护士和秘书都谢绝了。她说：“党和人民对我们照顾得够可以了，不能什么都要！”就是用车，她也尽量为国家节省汽油，能不用的就不用。她还明确规定，亲属来北京，一律不能用她的汽车去接，也不能用车去外面游玩。一次，李贞的四妹带着儿子从兰州来京看望她，想到八达岭玩一玩。工作人员说：“四姨妈年老体弱，天气比较冷，是不是让司机送一下。”李贞却严肃地说：“这个车不能出，我们家谁也不许开这个先例。”她让司机帮四妹买了两张去八达岭的火车票。她经常对司机说：“解放战争时期部队才有汽车，那时惜油如金啊！现在虽然条件好了，仍然要注意节约汽油。”

李贞自己生活很节俭，但一次又一次为教育、科研事业捐款，前后上万元。

1985年，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李贞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主动向中央军委和总政党委写报告，请求辞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军队的领导职务，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老红军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她从领导岗位上主动退下来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坚持学习。每天上午看文件和报纸，下午处理群众来信。中顾委组织的学习和各种活动，她都积极参加。为了便于开展活动，中顾委把退下来的老同志组成一个党支部，大家推选李贞为副书记。她常说：“要搞好社会风气，最根本的是要把党风搞好。首先要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好样子。”学习讨论时，李贞积极发言，主持支部会议非常负责。

李贞常说：“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冲锋在前，不怕流血牺牲，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危险，就出现在哪里。现在，我们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建设四个现代化，党的干部不能贪图享受，更不能搞特殊化，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一次国庆节，接上级规定，管理部门给机关干部补助了一些食油和过节费。开始，李贞不肯收，她说：“无数英雄好汉，为了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为人民做的贡献还不够，党和人民给了这么高的待遇，我可不能特殊啊！”后经再三说明，机关干部每人一份，没有任何特殊，李贞才同意收下。

李贞一向反对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她平时不送礼，不受礼，不要额外照顾，不多买定量以外的东西。别人送来或寄来东西，她分文不少地将钱寄去。她是个老同志，在军队里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又长时间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妇联执委、常委等职，常常有人来托她办事。她或是劝说，或是教育，决不办个人关系的事。她对自己的亲属要求也十分严格。她明确规定，亲属都不能借她和甘泗淇同志的名义要求组织解决个人问题。她对总政组织部也一再交代，这类事一律不能办。

李贞有个侄子在一个山沟里的部队医院工作，精简整编中，医院要移交给地方。侄儿侄媳想让伯母给组织上说说话，把他们调到北京继续留在部队工作，好照料伯母的生活。李贞耐心地对他们说：“这个情我不能说。现在军队进行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作为一个党员干部要讲党性、顾大局、守纪律。你们想继续留在部队工作的愿望是好的，但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

不能打着我的名义去说话，我的生活有组织上管。记得甘泗淇同志在世时，让你们好好读书，长大了靠自己的真本领为人民服务，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亲人的期望。”经过李贞的耐心教育，第二天，这对夫妻愉快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李贞对自己的亲属子女既疼爱，又严格要求。一次，在北京地方医院工作的养女，也是四妹的女儿小力找到总政有关同志，反映自己的工作单位离家太远，孩子上小学无人照料，自己又患关节炎、浮肿病，身体有些吃不消了，想通过部队组织开个介绍信，调到李贞附近的单位工作。李贞得知后说：“这个信不能开。这个孩子在地方医院工作，有困难应该向本单位组织反映。”李贞把养女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党和政府在困难时期送你上大学，培养你成为一名医生是多么不易啊！现在医院需要你，你怎么能调离呢？困难人人都有，但是同那些最困难的同志相比，你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她嘱咐养女，一定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一举一动要对得起牺牲了的革命前辈。从此，这个养女再也没提调动工作的事。

李贞在战争年代身先士卒，出生入死，本该在老年时安享晚年。但她却一直在考虑晚年如何减轻点国家负担，曾多次向组织提出搬出北京到老区去住，但组织上没有批准。她说：“我亲耳听周总理生前说过，北京增加一个人（指老干部）就要增加八个服务人员。北京是祖国的首都，负担不能过重，我们这些老同志要为中央分忧。”

伟大的母亲·为祖国抚养革命的后代·为人民服务要有真本领·自己的路要自己闯

人生风雨如磐，岁月同舟相伴。从艰苦的战争年代到十年动乱，李贞将军可说是饱经风霜，历尽艰辛。

战争剥夺了李贞的生育能力。李贞与甘泗淇同志一生没有亲生子女。几十年来，他们先后抚养了二十几个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女，对他们降亲生子女一样，供他们生活、上学读书。李贞说：“我们革命者，要的是革命的后代，你看他们不都像我自己的亲人一样吗？”是的，李贞像疼爱亲生子女一样，把真挚的爱无私地奉献给孩子们。她认为，每个孩子都是祖国和人民的后代，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们成长。

抗日战争时期的120师后勤部长、解放后任国务院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的陈希云，于1957年身患癌症、生命垂危时，对几个年幼的子女放心不下。李贞就把陈希云的大女儿陈小妹接到家里抚养。从上小学一直到参加工作，陈小妹在李贞慈母般的关怀下幸福地成长。陈小妹从小体弱多病，后来又得了心膜炎，李贞想尽办法，给小妹买药、治病；特意为她订了一份牛奶。陈小妹十分感激李贞妈妈的抚育之恩，她在国家困难时期考上了解放军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福建一个山沟里工作，经常写信向李贞妈妈汇报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李贞勉励她在边防前线要勇于吃苦，不断进取。陈小妹安心本职工作。很快成为部队的技术骨干，光荣地加入共产党。

1955年，苗族老红军朱早观病逝后，李贞和甘泗淇把他的女儿朱一普接到家里抚养。一天李贞外出归来，看到一普脸色惨白，胃痛得在床上打滚。她连忙把孩子送到医院，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工作多忙，李贞和甘泗淇总

要带上好吃的东西去医院看望她。朱一普病愈后，还为她订了牛奶，对她进行一些特殊照顾，鼓励她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1951年李贞和甘泗淇从朝鲜战场归来。得知老战友王政柱夫妇要同去朝鲜参战，三个孩子无人照顾。李贞夫妇把他们接到家中抚养。一次，年仅两岁的小弟跟着李贞妈妈到了会场，李贞在会上作了两个小时报告，懂事的小弟在李贞的背后抓着她的衣襟站了两个小时。小弟的哥哥王延，更是李贞夫妇喜爱的孩子。闲暇时他陪甘泗淇下棋，经常陪着李贞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即使王政柱夫妇回国后，王延还在周末从学校回到李贞家居住；如果王延假期回到自己家中，李贞夫妇还在星期天赶去看他，要求他一半假期要在李家度过。彼此的感情浓如亲生子女一般。

每当周末和星期天，李贞的家中就热闹非凡，一群天真可爱的少男少女簇拥在李贞夫妇的周围。吃饭时要摆上两、三张桌子。李贞夫妇的薪金都花在这群孩子们的身上了。李贞工作很忙，晚上回来得再晚也不忘到孩子们的房里去看一看，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每逢节假日，他们夫妇两人带着孩子们去看电影或到公园散步。他们夫妇二人边走边唱的歌声常常回响在孩子们耳旁：“我是一个兵”，“洪湖水，浪打浪”，“王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李贞和甘泗淇手拉手唱，孩子们欢声应和，真是一个动人的革命大家庭。

李贞经常对孩子们说：“为人民服务要有真本领，不要因为自己是烈士后代，干部子女，就产生优越感。”她特别注意防止孩子们养成好逸恶劳的坏习惯。孩子们上学路远，她鼓励孩子们乘公共汽车去上学，哪怕是刮风下雨也要求他们这样做。她说：“工人农民的孩子能做到的，你们这些烈士后代、干部子女都要做到，要从小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长大了才能好好为人民服务。”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有李贞夫妇的言传身教，孩子们都非常努力，勤奋学习，互相帮助，先后有近20人考入大专院校，成为国家的专业技术人才，在医疗、文教、科技、国防等战线上发挥着他们的作用。

每年暑假，学校组织孩子们下乡劳动，李贞热情支持他们去劳动锻炼。在李贞家中，孩子们从小养成了艰苦朴素的好作风，在生活上不讲究，一个个穿戴干净整齐，不追求时髦。家里虽然有保姆，孩子们却都会自己洗衣服。每当一个个孩子考上大学或走上工作岗位时，李贞都亲手做个针线包送给他们。

养女小力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支边时，除了铺盖，李贞送给她一副银针和一个拔火罐，叮嘱她用这两样为同志们治病，和工农打成一片。

侄女毅南和她一起生活了十多年，感情笃深。毅南去农村下乡时，她一直送到车站。她送给侄女的礼物、是一双胶鞋、一只手电筒和一个针线包。她对侄女说：“自己的路要自己闯。”

侄女义霞从小在李贞身边长大，胜似亲生女儿。但李贞留给她终生纪念的只有一件礼物，那是1953年11月李贞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的副团长，应邀参加苏联十月革命36周年庆祝典礼时发的一块画有世界民族大团结图案的丝绸围巾，义霞舍不得用，一直留在身边。义霞忘不了这样两件事：一次年纪很大的李贞对义霞说，自己睡的席子好像有虫子，老咬她。义霞知道这席子用的时间太长了，用毛了，曾几次劝李贞买张新的，都遭到责怪。这次听李贞妈妈如此说，她灵机一动就悄悄买了条新席子换上，谎说把席子上的虫子捉干净了。可见孝心一片。还有一次，组织部的同志对义霞说，李贞穿

的衣服太旧了，应该做一件像样的棉大衣，出入各种场合不致于过于寒酸。义霞知道李贞不会同意，就自己掏钱给李贞做了件大衣，哄骗她说这是组织上发的，专门让她出入公开场合用的，李贞妈妈这才欣然留下。

青年一代是新中国美好未来的希望。李贞不仅抚养了众多的孩子，而且还一直关心少年宫孩子们和工读学校孩子们的成长。她曾多次到少年宫和工读学校去给他们讲传统。一次活动，李贞行前感到身体不适，工作人员劝她不要参加了，李贞却严肃地说：“这怎么行呢，孩子们是最讲信用的，答应了就一定要参加。我身体不要紧，可以带点药，孩子们的活动最重要。”她坚持去了，带病和首都两千多名少先队员一起庆祝“八一”建军节。在赠送给工读学校一批科学文化书籍后，李贞来到孩子们的中间，夸他们的文艺节目演出的成功，鼓励他们说：“你们都是孩子，犯过一些错误，但不要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相信你们在老师的培养教育下，听党的话，努力学习，将来会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的。”孩子们感动得哭了，决心重新作人，努力改造，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材。李贞还特别关心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曾多次到北京一些大专院校作报告，讲知识分子肩负的历史使命，勉励他们勤奋学习，努力实践，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更好地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对培养孩子的教师，她也十分关心。她常说，“教师工作很辛苦，应该受到人民的尊重和支持。”她还亲自给辽宁省一位山村小学教师回信，鼓励这位山乡教师克服困难、当好人民教师，为祖国四化建设多培养人才。她多年的积蓄除了用来认购国库券外，全部捐献给全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全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以及地方科学技术协会，支持地方发展教育事业。她崇高的品德和情操，无私奉献的精神及对革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为了革命，李贞将军最终没有一个亲生的子女；为了革命，李贞将军抚育和培养了千千万万的接班人。革命的老妈妈，儿女遍天下。

一生革命·忠贞如一·四把用了
十五年的旧藤椅·雪花牌单门冰箱·
党的胜利就是我的归宿

苍松翠柏掩映着一颗不屈的忠魂，鲜红党旗覆盖着一位伟大的女性。1990年3月11日，为党和人民戎马倥偬、艰苦奋斗64个春秋的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我们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革命家李贞，走完了她光辉的一生，与世长辞了。

在她的家里，人们含泪为她整理遗物。这位经过长征、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女将军，除了记载她赫赫战功的4枚勋章依然闪耀着夺目的光彩外，其它遗物是那么简单：4把家乡旧藤椅用了15年舍不得丢；和甘泗淇赴朝作战用过的行军箱裂开了，用了40年不肯换新的；用了14年的“雪花”牌单门电冰箱。留下仅仅11000多元人民币和2500元国库券和两条过去年代留干的小金条。她在遗嘱里作了这样的安排：金条一块给李贞的家乡浏阳县人民，一条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用于发展教育事业。留下不多的一点存款，捐送给北京市少年宫，其余的交给组织上，作为自己的党费。

按照李贞的遗嘱，将她的骨灰和早已在1964年去世的甘泗淇的骨灰合葬在一起。李贞，她不仅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对爱情也是忠贞不渝。

李贞，是队一个连自己姓名都不会写的童养媳，成长为我军一名高级将领。即使在她被关押期间，对党的事业仍坚贞不屈，始终如一。

1967年，李贞因过去是陈老总和贺老总的部下而受到株连，被林彪、“四人帮”迫害，四年失去自由，六年没有工作。在一间不到九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被关四年。阴冷、潮湿、从不见阳光的小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手脚麻木了，起来走动走动，伸伸腰腿，也要遭到训斥。但她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她说过：“我从战争年代走过来，了解一点历史。林彪那一套是骗不了我的。”她靠着顽强的意志，不屈不挠地和林彪、“四人帮”一伙斗争，她保持体力，把活动时间放在晚上，灯一关，她就在黑暗中伸展腰腿，下蹲几十下、几百下，最后每次做到一千五百下。然后上床做局部按摩操和防感冒操，这是她从实践中自己摸索出来的。1972年，李贞被迫离休去湖南。她爬山越岭，上井冈山，进老革命根据地，去看望老红军、老战友，鼓励他们爱护身体，为党工作。休息时间她种地，存时还到池塘边钓鱼。她说：“一个人要想健康，必须从多方面努力，精神和思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思想开阔，精神乐观，可以使你身心健康。相反精神苦闷，忧虑重重，计较个人得失，就会有碍健康。”

在逆境中，李贞感到情绪压抑，但她坚信真理一定会战胜谬论，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1960年甘泗淇遭受林彪的打击时，李贞就领教了这一切，那种欺骗、蒙蔽和愚昧，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1967年李贞被打成彭德怀、贺龙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被免职，被关押。林彪、“四人帮”为她成立了专案组，指派几个人专门审讯她，搞轮番轰炸。一次，专案组的人凶神恶煞地命令不吭一声的李贞喊“打倒贺龙”，她就是不喊。专案组要她交代所谓“罪行”，她一字一顿地回答：“你们不要无中生有！我李贞光明磊落，从来不在背后说别人的是非。”“告诉你们，李贞不是反革命！”

四年关审，林彪反革命集团一无所获，最后于1971年3月27日把她“发配”到湖南。直到后来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这桩冤案才得以纠正。

李贞历尽浩劫更信党。她说：“林彪、四人帮只不过是一小撮坏人，他们根本不能代表党。当我们党把他们清除出去以后，党就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李贞胸襟宽阔，她对那些当年整过她而前来认错的同志宽厚地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让我们共同为党工作。”

“路是人走出来的，革命者是锻炼出来的，人就是在经历磨难中逐渐成熟起来的”。若干年后，李贞感慨地说：“我从一个连自己姓名都不会写的童养媳，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全靠党的培养教育，靠同志们的帮助，靠个人的磨练。回首往事，我深深感到，我们今天的胜利是无数革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对我这个幸存者来说，党的事业的胜利就是我的归宿。”

这就是风雨一生，坎坷一生的女将军真挚的心声！

走好，李贞将军……

成如容易却艰辛

马京生

一见到聂力，你就会想起聂荣臻元帅，这不仅仅是因为女儿长得像父亲。当你熟悉、了解聂力后，你会发现聂力那不为世俗所左右的独立思考，那对事业的执著，那股工作中的拼命精神，那对同志的真诚厚道，对党的热爱，直到女儿踏着父亲的足迹走在国防科技道路上。你就会觉得父女俩有那么多的相似点，甚至是惊人的相像！

然而当你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这要感谢聂荣臻元帅，他让不爱宣传自己的女儿开了口，我们大家才能有机会了解女中将聂力。

1992年4月，老帅自感病情沉重，将不久于人世。4月12日留下临别遗言。“五一”过后的一天晚上，聂力在父亲的病床旁守护。老帅深情地看着女儿，声音嘶哑，非常吃力地说：“你的童年受了很多磨难，你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党对你的教育和培养，你的成长历史应该写下来，很有意义。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你的母亲，没有你母亲，就没有我们全家今天的团圆。你要好好照顾母亲啊！”

聂力眼里含满了泪水，她知道父亲对母亲有着同志情、战友情和相濡以沫64年的夫妻情。而母亲在敌人的牢狱里冒着杀头的危险，保护了党的事业，也保护了幼小的女儿。

艰难的童年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磨难是一种不幸。但是，对于有悟性的人来说，磨难是痛苦也是财富。

著名作家海明威认为：“不愉快的童年是宝贵的。”但是不管痛苦的童年经历有多么重要，谁不希望自己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呢？

对这位女将军来说，传奇般的童年，痛苦的生活经历造就了她不甘示弱，不怕困难，顽强不屈的性格。

1930年9月，在上海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一个女婴响亮的呱呱哭声在白色恐怖中显得有点毫无顾忌。她就是聂力。那时候，父亲聂荣臻做党的地下工作，被大家称为李先生。这位哭声嘹亮，脸蛋红彤彤的漂亮的小女孩，出生在一家美国人办的慈善医院里。父母高兴地给她取名叫李丽。

似乎命中注定，她来到世上就开始了人生的历险和磨难。

丽丽的出生，给已过而立之年的聂荣臻和初次当上母亲的张瑞华带来了欢乐，然而也带来了困难。当时张瑞华在上海做地下党的交通员，在那种紧张的生活环境里，张瑞华一滴奶也没有，小丽丽不吃牛奶，老是哭，哭久了房东太太就喊：“你们的孩子是不是有病啊？你要去看一看呐！”聂荣臻白天在外面奔忙一天，夜间常抱着女儿，在前楼走来走去地拍着，一直到小丽丽睡着他才躺下休息。张瑞华知道聂荣臻喜欢孩子，可是又担心他太劳累，好不容易才使小丽丽养成吃牛奶的习惯。

1931年4月，由于叛徒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提供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址，丽丽的父亲聂荣臻在上海日以继夜协助周恩来紧急搬迁了中

央机关，使党避免了遭受大破坏的危险。

就在一岁多的小丽丽哭喊着“找爸爸！爸爸！”的时候聂荣臻已到了苏区，张瑞华因丽丽太小，不能一道走，留下来继续做地下党的工作。丽丽睁着大眼睛环顾四周寻找着爸爸，她不明白爸爸为什么突然不见了。过去每当聂荣臻从外面回来，小丽丽听到楼梯上是爸爸的脚步声，就赶紧迎过去，一手接过爸爸的帽子，一手拉着爸爸的手。聂荣臻就高兴地把她抱起来，亲亲，或逗她玩玩。然而，现在，小丽丽再站在楼梯口等爸爸时，却总也见不到爸爸的踪影，小丽丽抹着眼泪，使劲尖着嗓门喊“爸爸”，张瑞华只好把哭闹着的小丽丽领到外面去转一转。一次张瑞华领着丽丽到公园，看到一个照相的，便给丽丽照了一张两寸全身照片。就是这张女儿的娃娃照，伴随着聂荣臻度过了硝烟弥漫的岁月。父女整整分别15年，父亲思念女儿时，就拿出照片来看看，一直把女儿的照片带在身边。

1934年春，张瑞华只身一人带着小丽丽住在上海英租界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里。由于叛徒的出卖，这个联络点被敌人侦察到了。一天，张瑞华和丽丽正在吃晚饭，突然接到情报，说敌人要来搜捕。张瑞华马上和黄文雍一起边清理边烧文件。待他们烧完文件，敌人冲了进来。敌人把张瑞华、杨庆桂、黄文雍和两个孩子都押进会客室，然后开始搜查，结果是一无所获。但是敌人还不死心，看住张瑞华他们，守候在那里，看还有没有人来。

直到第二天傍晚，敌人把张瑞华、杨庆桂连同两个孩子一起押到了西摩路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房。两天后，又被押解到英租界提篮桥女监。

不管敌人怎么审问，张瑞华始终说：“我姓王，从小没有名字，也不识字。丈夫李先生出门做生意，一去不归，自己带一个孩子，生活无依无靠。听说丈夫在上海，就到上海来找，临时借住了那间亭子间，时间不长，就被你们抓来了。”

审问、拷打、饥饿、寒冷……没有摧垮她们。

在那黑暗，冷酷的监狱中，小丽丽总是睁着惶惑的双眼，用那黑黑的纯真的眼睛观察着周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紧闭着小嘴很少说话，那菲人的监狱生活使她第一次发现了人世间还有凶恶的敌人，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不久，几个冒充共产党的女特务又住进了她们的监室。她们千方百计哄骗小丽丽，想要她说些什么。可是小丽而就是不跟她们说话。

她总是默默地坐在床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那小小的窗户，一缕阳光从窗口射进来，照在她瘦小的身躯上。她恨，恨凶恶的敌人残忍地折磨她和妈妈；她恨，恨黑暗的牢房把她和妈妈关在这里；她恨，恨窗房上的铁栏杆隔断了她和外面的世界……

她不哭不闹，也不和那些不认识的人讲话。饿极了就喝两口大人都咽不下去的野菜粥。困了，就倒在床上睡。

为了获取情报，凶恶的敌人要把小丽丽送到孤儿院去。母亲紧紧地抱着她不肯松手，怒视着敌人，“你们快放手！孩子有什么罪，我们要死就死在一起。”

从此，敌人提审张瑞华，她总是要带上小丽丽，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受苦受刑什么都不怕，她就是不能让敌人残害了唯一的女儿。

小丽丽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燃烧起复仇的人焰。她敬佩自己的母亲，勇敢、顽强、无所畏惧。她学着母亲的样子，总是紧紧地咬

着牙，闭着嘴。心里默默念着，不说，什么也不说，看坏蛋怎么办。

敌人无计可施，没有从她们的身上搜出任何证据，也没审出什么名堂，便以“查无实据，释放回原住地”为借口释放了她们母女和杨庆桂母子。然而这并不是放过她们，白天黑夜都有人在她们的房前屋后监视，妄想放长线钓大鱼。

那是一个漆黑的雨夜，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从天而落，马路上的路灯也因风雨而停电熄灭，周围黑洞洞的，只有风声雨声雷鸣声。借着闪电，张瑞华看到两个监视她的敌人，全蜷缩在对面屋檐下避雨。真是天赐良机。

张瑞华对杨庆桂说：“现在是逃离虎口的好时机，我出去联络，你先把两个孩子都管起来，别让他们哭，再收拾必须带的东西，准备行动。”张瑞华冒险找到了原来的联络点——一家汽车行。联络员给她30元钱，让她和杨庆桂各自带上孩子连夜转移。

为了安全，她冒着大雨在街上绕了几圈，回住处抱起还在熟睡的女儿，和杨庆桂分别逃离了虎口，消失在茫茫的大雨中。

一路上，张瑞华紧紧抱着小丽丽，安慰着说：“孩子，别哭，别怕，妈妈抱你去个安全的地方。”小丽丽也真乖，不哭不闹。终于安全到达法租界联络员指定的那家旅馆。

两天后，张瑞华得知杨庆桂也安全转移，而西摩路巡捕房附近贴出了英国人的布告通缉张瑞华和杨庆桂。几天后，张瑞华又带着小丽丽搬到一个亭子间居住，但处境仍然很危险。

1935年秋，组织上安排张瑞华去天津转苏区与聂荣臻同志会合。为了行动方便，也为了孩子的安全，小丽丽被寄养在上海郊区嘉定县毛齐华同志的亲属家中。

这户人家生活非常困难，儿子出去闹革命了，年老体弱的老奶奶带着聂力省吃俭用苦度日月。就要过年了，家里穷得没饭吃，老奶奶怕外面的狗咬伤小丽丽，自己拄着拐棍出去要饭。有时运气好，要到一点年糕，给小聂力吃上一口就算过年了。老奶奶非常疼爱小丽丽，常把丽丽搂在怀中说：“孩子，不管生活多难，我一定要把你养大，我要对你父母有个交待啊，也要对得起我儿子！”

丽丽稍大一点后，虽然自己还是一个孩子，为了生活，出去当雇工，带孩子，洗衣、做饭、锄草、放牛、喂猪、种地、割麦、插秧、纺棉线，什么活都干过。她未成年的瘦小身躯肩负着人生的艰难，在这里没有父爱、没有母爱，有时，她站在家门口，看到别人父母带着孩子去走亲戚，心里难过极了，小手紧紧地抓着门框，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她多想放声大喊：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呢？你们快来接我吧！

周围一些穷苦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看到她总是说：“这孩子多可怜！她家大人呢？”可是谁也说不清楚这小姑娘从哪里来，今年几岁了。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年龄，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更不曾想到，她的名字在数十年后，会被许许多多的人记住。

她不爱多说话，两只小手却总是不停地干着活。她给别人当长工，一个月挣一斗半米，衣服是自己织的土布，自己缝的。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指着她说：“你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她紧紧地咬着牙，攥着拳头、怒视着那些人。

“爸爸、妈妈！”她在心里无数次地喊着，可是嘴里什么也不说，总是把这委屈埋在心底。如果有人抚慰她，她比别的孩子更易感动。她会想办法加倍去报答别人。白天，她拼命地干活；夜晚，她躺在破棉絮里想自己的爸爸妈妈，纵有千种思念万种恩怨，她只能埋在心里忍受孤单，而这一切对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精神和思想的压力是不胜负担的。

她没有地方去倾诉自己的苦难和悲伤。小小年纪，她从生活中悟到，要靠自己的顽强和双手来养活自己。她患了疟疾，没有药，只好蹲在屋檐下晒太阳，企盼着阳光的温暖来治好她的病，有一次，她在地里摘棉花，腿被棉杆划破了，血流不止，她从地里抓起一把土迅速堵住伤口，鲜血染红了泥土，顺着腿往下流。没有药，又没钱医治，以至伤口化脓溃烂了好几年，骨头都露了出来，就这样她忍着钻心的疼痛还要下地干活。周围那些贫苦的大伯大娘们都同情地说，“这孩子小小年纪受了这么多的苦，她的父母在哪啊？”

那时的丽丽弱小的身躯里有一种内在的刚强。她必须坚强，才能挺过她那痛苦的童年。在艰难中，她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应付和处理各种情况。

1938年，周恩来派地下党的龚饮冰同志去寻找小丽丽，想把她接到父母身边。两位陌生的叔叔来到小丽丽住的破房子里对她说：“我们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小丽丽从没有见过他们，她自有主见，她躲在炉灶背后说：“你们骗我，你们想把我卖到上海，放到大烟囱里烧大烟。爸爸妈妈找我，叫他们自己来接，别人不行，别人接我，我不跟他去。”那两位叔叔怕生拉硬扯暴露了双方的身份，只好悄悄离开了。

为了生活，她又考进嘉丰纱厂当童工。瘦小的她负荷着超强度的劳动，她亲眼目睹了日寇的残暴和旧社会的黑暗。她挨过资本家、工头的皮鞭，她和穷人的子女一道受苦饮恨。在拥挤的像集中营一样的工厂宿舍里，她和住上下铺的小姐妹们相依为命。

1945年抗战胜利后，聂荣臻和张瑞华想念女儿，不知孩子在哪？得设法找到。后来组织上派在上海工作的地下党员毛齐花回家乡，终于找到了丽丽。为了不暴露目标，在上海“交通”的掩护下，丽丽坐上小木船，她只知道此行是去找她那在远方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她在记忆的海洋中搜寻着。她在小船上头晕呕吐却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终于小船到达江苏淮阴。在新四军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热情地接待了她，向她介绍了她父亲聂荣臻的情况。

党组织又派人把丽丽送到北平军调处。在那里叶剑英拿着一张照片开玩笑地对丽丽说：“这就是你爸爸，你拿着这个，到张家口去，你看谁像他，你就叫他爸爸。”

1946年4月，冀晋总队司令员兼政委赵尔陆带着丽丽来到张家口。她把照片拿出来给父亲看，“这是叶伯伯给我找爸爸的证件。”聂荣臻和女儿开玩笑说：“你对对，像不像啊？”当时丽丽满口上海话，听不懂父亲四川口音的普通话。父亲也听不懂女儿的上海话，急得丽丽连说带比划，好在有母亲在旁边给父女俩当翻译，父女俩才听明白对方的意思，笑成了一团。站在旁边的耿飏和唐延杰说：“老聂这下可找到女儿了，真该庆贺庆贺。”

聂力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父女分别15年后的第一次相见，长得多么像的父女俩，就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一点没有陌生感。父亲高兴得合不上嘴，走到哪都带上聂力，还常忙里偷闲，亲自教女儿学文化。耐心地给女儿讲道理，

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是共产党把你从火坑里救出来的。直到这时，聂力终于明白了父母亲之所以丢下她，正是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

那年，聂力正好 16 岁。1946 年，解放战争开始，部队从张家口转移到老根据地河北阜平县。郝治平和徐佩如阿姨都曾热心地帮助她补习语文、数学。

1947 年，聂力进入荣臻小学学习。在第一班，共有 7 个学生，她是年纪最大的一个。

幼年时，她没有父母亲保护，没有可依靠的长辈在身边，没有体尝到躺在父母的怀抱里是多么温暖、安全，而瘦小的她要靠自己的双手做工养活自己。其中的艰辛，决非常人所能想象，所能做到的。现在她要靠自己的努力在学习上赶上别人。她从不甘示弱，也不灰心丧气。学校对学生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她的苦难生活使学生们痛哭流涕。她也总忘不了告诉同学们，如果不是共产党把她救出来，她也许早在坟墓里了。即使活着，也早成了别人的童养媳。

聂力将军永远忘不了她的童年，她 1 岁零 4 个月时，父亲离开她，到了苏区又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她 3 岁多就随母亲蹲过英国人的监狱。5 岁时又离开了母亲，孤零零地在嘉定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从艰难困苦中挣扎大。她的家庭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命运息息相关。至今她都认为，父母生下她，是党培养了她，她的童年历经艰难困苦，但是这段生活使她懂得了人生，磨练了她的坚强意志，体会到了群众的疾苦，她对养大她的老奶奶有着深厚的感情，这对她以后的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8 年，她进了华北育才中学学习。1949 年 2 月，北平解放。这所中学又同北平师大女附中合并。

解放初期的师大女附中，许多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知名民主人士的女儿都在这所中学读书。校园里是姑娘们的天地，女孩子们在一起，总免不了谈论谁的衣服漂亮谁的鞋式样新。许多家境优越的女学生，其服装也领先着时代新潮流。

在同学们的眼中，聂力像个“灰”姑娘。寒冷的冬天，她一身灰色的布棉袄，布棉裤，布棉鞋，棉袄外面还系一根皮带，很像电影里的小八路装束。如果不是她面容酷似聂荣臻元帅，凭这身打扮，谁也不会想到她是帅府千金。

然而她的老师和同学至今提起她来，都赞不绝口地说：“在同学中她学习刻苦、努力。”她留给师生们最深的印象就是待人诚恳和那朴实的微笑。几十年过去了，她的老师提起她，还赞不绝口：“聂力是个好姑娘，是一个被大家公认的刻苦学习的好学生。”

曾在聂荣臻元帅身边工作的秘书范济生回忆起中学时代的聂力，说：“聂力每个星期天回家，再忙都要给警卫班上文化课，还是那帮战士的小老师呢。”

“1950 年 3 月，还是中学生的聂力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到现在谈及此事，聂力中将还会饱含深情地说，“是党的培养，才有我的今天。所以我加入党组织的时候，已立志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了。”

1953 年聂力高中毕业，第二年又考上留学苏联的预备班。那时聂力已经 24 岁了。“我这么大了，还去苏联念大学吗？”她请教彭真叔叔。彭真鼓励她，“我 18 岁才上高小，你们现在条件比我们好多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人啊！”

聂力点了点头，她牢牢地记住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教导，肩负着老一辈的希望和父母对她的期待，她迈进了苏联列宁格勒精密机械与光学仪器学院的大门。

她把生命中最绚丽的青春年华交给了寒冷的列宁格勒校园。她在知识的海洋里吮吸着营养。勤奋使她的知识日积月累，迅速聚增。这一切都为聂力日后从事国防科技工作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踏着父亲的足迹

家庭固然对每个人都有深远的影响，可是，谁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然而，每个人从家庭中走出，都将踏上自己的奋斗之路。

聂力常说：“老一辈在枪林弹雨里浴血奋战打天下，建立了新中国。我们不能坐享父辈打下的天下，而要真正把自己当成新中国的建设者。”

就这样，这位在磨难中长大的革命军人的女儿，带着生命青春的活力走进了军营，踏着父辈走过的足迹，把国家的强盛，民族的荣耀，同她个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1960年她从苏联回国，聂荣臻元帅对女儿说：“现在中苏关系紧张，你们学不到尖端的东西就不要再去了。”

聂帅介绍当时的形势：新生的国防尖端事业面临着重重困难，苏联赫鲁晓夫集团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给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当时国际上有人幸灾乐祸，认为这是对中国“毁灭性的打击”，“再过两年，你们就要卖废铜烂铁了”，预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弹。”

一时间有人犹豫，有人徘徊。

领导国防科技事业的聂荣臻元帅坚持认为，为了摆脱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局面，我们必须搞出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我国遭受敌人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手段。

聂荣臻元帅对女儿说：“苏联专家撤走了，祖国急需科技人才。”邓小平也对聂力说：“现在祖国急需你们，我给你一个大勋章，你还回去干嘛？”小平同志幽默热情地鼓励聂力留下来投身于国防科技事业。

就这样，聂力和一批留学生被分配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这是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她穿上绿军装，从实习员、技术员当起，走上了国防科研道路。她参加了导弹控制系统自动驾驶仪研制，作为下厂工作组成员参加了生产自动驾驶仪等具体技术工作。

人是要有信念的，在古今中外人类发展史上，信念始终是动力。中国靠自己的力量一定能把导弹、原子弹等国防尖端武器搞上去。有了信念，她不管干什么，都要干出个样子来。

聂力耳闻目睹的是父亲为了祖国建立强大的国防，不顾自己年迈多病的身体，总要亲临发射试验现场。

那是1966年10月，我国决定在本土进行“两弹”结合试验。这是我国第一次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

这一天，兰新铁路停运，西北航空线关闭，新疆、兰州军区数十万官兵进入紧急戒备状态，发射场附近数以万计的居民疏散隐蔽。而此时，聂帅却

在发射现场观察着导弹核武器吊装、对接、瞄准、校零和发射前的各项测试检查。他信心十足地和7名“敢死队”成员一一握手，那当年曾指挥千军万马的大手，使年轻的操作员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10月25日发射那天，戈壁滩风很大，黄沙飞舞像鞭子一样抽打在人们的身上。聂帅在发射架和控制室里详细听了专家们的汇报，当即拍板决定，试验仍按程序进行。

聂帅坐在一把椅子上，亲自监督着导弹与原子弹的电气设备对接，老师镇静地坐在旁边，充满信心的目光注视着操作手田宪坤。站在旁边的警卫参谋和秘书可真替老师的安全紧张得手里攥出了汗！

这就是共和国坚强自信的元帅，他与他亲自领导的国防科技事业、与祖国的发射场共存亡。

导弹按预定轨道飞向落点。

聂帅不畏艰险，以夺取尖端科技制高点的勇气，指挥着国防科技大军决胜太空。

聂帅从戈壁滩向周总理电话报告：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准确命中目标区，核弹头在罗布泊上空爆炸，“两弹结合”试验一举成功！

父亲的勇气和魄力，父亲深入第一线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扎根在女儿的心中。

十年史无前例的动乱，不管七机部的派性斗争如何激烈，聂力领导的仪器室依然如故地正常运转着。她在政治龙卷风中立场坚定，决不随波逐流。

1971年，聂力从七机部调到海军装技部科研处工作。1974年，聂力调到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后任副主任，1976年底，该办公室由海军移设国防科委。1977年她又调到国防科委科学技术部海军局任副局长。

当时，为了完成洲际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和发展航天技术，海上活动跟踪测量船队必须保质保量完成这一战略任务。

聂力在工作中，总是像父亲一样深入到科研第一线，认真倾听研制单位的意见。了解设备研制情况，然后向有关省市领导汇报，征得他们的支持。在确定远洋测量船卫星导航方案时，聂力主张既要依靠自己的科研力量，又要努力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她和工作组实地考察，听取专家们的论证，选择了“子午仪”方案。实践证明这个方案是正确的。同时也说明，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才能研制出一流水平的科研设备。

远洋测量船在上海建造，说起来，也是历经坎坷。1970年12月，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决定把这项工程作为国家重点任务。1972年4月，叶剑英受周恩来委托，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听取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张春桥在会上提出上海地区承担大部分船舶的建造任务有困难。叶剑英非常气愤，用手拨过地球仪，指着上海说：“下马不行，要硬着头皮搞，测量船一定要搞，而且要在上海搞。”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研制工作碰到了许多困难。

聂力参加工作组常住上海，她跟大家一样工作不分白天黑夜。为了赶进度，经常要加班熬夜，当时三角钱的夜餐补助还没有落实下来。聂力总是请和她一起加夜班的同志到驻地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去吃馄饨，同志们都说她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大姐。

可是对工作，她要求极为严格，认真细致，质量第一。她在相当于 11

层楼高的测量船上爬上爬下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给有关业务部门指出，一些主管这项工程的参谋说：“我们工作要特别细，考虑要非常周到，因为聂力总是要想到我们的前面去。”

正当大家为远洋测量船起什么名字，费尽脑汁，苦思冥想时，聂力看到了叶剑英元帅视察大连时写的一首诗，突发灵感，和业务部门的同志商量：

“咱们给测量船起个名字叫远望号怎么样？航天测量看得远，又有长远的发展，‘远望’二字可谓意义深远啊！”聂力用询问的目光瞧着周围的同志。

李奇局长立即表示支持这一建议，并向国防科工委党委写了报告，得到了陈彬主任和李耀文政委的批准。

远洋测量船正式被命名为“远望”号。船体上的“远望”二字选用的是毛泽东同志过去的手写体。

1979年，测量船的总体建造已基本完成，很快就要安装设备。江南造船厂盖起了一座楼，准备作为招待所接待前来安装设备的五百多名技术人员。然而楼早已盖好，楼内的设施却迟迟无法解决。设备要安装，人员要进住，厂里几经努力，还是迟迟得不到解决。聂力正在现场参加协调组工作，她和同志们一起向上海市领导求援，和他们研究解决办法，没出一个月，新楼里桌椅、被褥等所需的物品统统安置妥当，技术人员顺利住进招待所。同志们说：“聂力有办法，有能力，在工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穿针引线的作用。”聂力却笑笑说：“工作是大家做的，因为我们的国防科研需要大力协同，更需要发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整体效益。”大家点头称是，因为这是聂帅的一贯思想，“两弹一星”的成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经党中央批准，洲际运载火箭于1980年5月至6月份之间由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向南太平洋发射，进行全程飞行试验。

那一天，以“远望”号航天测量船为首的12艘远洋船队，冲开了蔚蓝的海面，扬起长长的白色浪花，向太平洋进发。它令人吃惊的不仅仅是她的高大和壮美，更重要的是船上装备着祖国最新的科技成果，计算机控制着上千台遥测、通讯、雷达、导航、遥控、高空气象等仪器设备。船上的人们所观察的是日月星辰，400多名科技人员紧张地工作着，倾听着祖国从万里以外传来的指令声，船顶上，做然昂首的超远程雷达像只巨大的喇叭向太空宣布：这就是海上科学城——“远望”号。

1980年5月18日，这是举世瞩目的一天。我国亿万人民翘首远望，期待那惊天动地的时刻。

“三十分钟准备。”

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里，彩色大屏幕前，人们的心随着报告声、指令声、调度声，紧张地跳动着。一排排荧光屏上，一组组数据、图表交替显示，屏幕上描绘出火箭已飞行的轨迹。

“一级关机”、“二级关机”。“三级关机”火箭已飞出桔黄色的国土，向着蓝色太平洋上空飞来。

秒表在嘀嗒嘀嗒地响着，聂力和战友们的心在经受着时间的煎熬，因为军委首长张爱萍同志指示，测量船要测量到全部数据并要安全开回来。

“180 雷达发现目标！”

“遥测发现目标！”

随着一声又一声的“跟踪正常！”一个又一个的准确数据送到了指挥所

里。

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枚洲际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

东方雄狮怒吼了！

整个世界震惊了！

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之后，成为第四个具有海上跟踪测量能力的国家。

此时此刻，邓小平、聂荣臻、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观看发射实况，聂力在首长们旁边，含着热泪介绍着每一个应答口令的含义。

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时，聂帅高兴而又激动地说：一弹震全球，感谢同志们！随后又信手命笔，题写了贺词，“热烈祝贺参与发射运载火箭的全体同志取得圆满成功。这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大力协同的伟大胜利！”

聂力同战友们终于旗开得胜圆满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在这辉煌的一瞬间，她想到的是这项工程的胜利，是全国35个部委，24个省市，以及总参、总政、海军等领导机关，共1180个单位几十万人，大力协同，密切合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这是整体效应。

1993年笔者有幸随聂力出差到上海，聂力又一次跨入了江南造船厂的大门，门口拥挤着一群工程师和工人来看她。男男女女好不热闹，谈起聂力当年跟他们端着饭盒在一起吃饭，穿着工作服在一起上班的事，就像谈论他们中间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大姐那么熟悉和亲切。

正巧“远望”号测量船在厂里维修。热情的老船员们又围上了聂力。大家都知道，为了“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当时聂力和协调组的同志们从北到南跑遍了国内各有关厂、所。

留在他们记忆里的是，“远望”号测量船到海上试航，聂力也参加了，那可是个同甘共苦的差事。她要亲身体验晕船的滋味，同时同基地领导一起协调解决试航中设备出现的问题。

“她就是这样的人！”当年走南闯北和她一起出差的老参谋说：“跟她出差最好。如遇厨房大师傅热情款待，多端出什么好菜来，总是大家共享口福，临走聂力会代表大家向大师傅致谢，并且总要自己掏腰包，付上多吃的菜钱。”

聂力自有她的理论：“和群众同甘共苦是革命的传家宝。”这话似乎太普通了。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靠的这个传家宝带领着千百万人民群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19世纪挪威著名的社会问题戏剧代表作家、那个曾经塑造了新女性娜拉的易卜生，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过世人，“社会犹如一条船，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人生就是一条船。你要是不甘于在属于你那段历史之河中沉沦，你就应该不仅仅是舵手，而且是桨手。

当许许多多的人认为充分享受现实的人生就是幸福的时候，聂力却走着一一条拼搏的路。1982年8月，聂力正在大连工作组协调水下发射任务时，国防科工委刘有光政委把她叫回北京，和她谈话，告诉她军委已经任命她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她深感党对她的信任，这意味着她要为国防科技事业肩负起更大的责任。

然而，她的责任重了，更加注意深入基层，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她平

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微笑给科技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聂力到西南一个研究所去检查工作。按照惯例，聂力到哪儿都不喜欢兴师动众，不愿意给基层增添麻烦，更不在基层大吃大喝。所以研究所照常工作，依然如故，当聂力在走廊里一边走，一边和所长谈工作时，旁边一间屋子正在检修机器，机床上的润滑油顺门缝悄悄地往外流着，谁也没有注意到走廊上的润滑油正在蔓延。突然“叭”地一声，聂力滑倒在机油上，大家都惊呆了，秘书和随行的参谋脸“刷”地变白了，大家七手八脚赶紧扶她起来，她的裤子上沾满了机油，顺着裤褪直往下流。所长的脸红一阵儿，紫一阵儿，紧张地张着嘴，支支吾吾地不知该说什么好。秘书赶紧拿纸给聂力擦沾满了机油的裤子。聂力却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摔得不疼。”她一边走，一边继续和所长谈着工作。所长提到嗓子眼上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那条满是油渍的裤子丝毫没有影响聂力的情绪，她在各个研究室听汇报，谈工作，一切都按预定方案进行。晚上返回住地时，聂力裤子上的机油已经渗透了一大片，随行人员只好拿了一摞报纸垫在汽车座上，请她坐在报纸上，以免把车座弄脏。然而她留给研究所同志的却是朴实真诚的微笑，丝毫没有责怪。

碰巧，聂力坐的小车又被堵在公路上，前边的大卡车车厢里装着一车大耳朵猪。聂力拿着铅笔在白纸上随意画着逗人爱的小猪脸，一个个怪好玩的，把车上的人都给逗笑了。直到今天那位随行的参谋还留着那张有趣的小猪头铅笔画。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1987年6月30日。

其实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和群众的感情非常融洽，同甘共苦是她的一贯作风，而且无论是业务工作还是劳动，她都要身先士卒。有一年国防科工委组织机关干部到农场割麦子，使大家吃惊的是聂力割麦子也是一把好手，她遥遥领先，比她年轻的机关于部们汗流浹背也赶不上她。她还要帮旁边的人割一把，让他们赶上来。大家都非常奇怪她这个高干子女为什么那么能干？

“聂副主任，休息一会儿，别累坏了。”大家围上她，让她喝点水。

她笑着抹了一把汗，“小时候劳动惯了，没关系。看来我这身体还结实。”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聂力成为国防科技界第一个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女军人。

科技界的将军不同于叱咤阵前、军令如山、带兵打仗的指挥官。她面对的是在高度科学化程序中严谨运作的科研人员。这些科技专家在国防科研的各个领域都有重大影响。而国防科研不是哪个人、哪个部门的事。科学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需要跨学科的协作来完成。聂力作为参与组织领导者，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她用贯彻方针政策和科学的协调来驾驭飞速发展而又益艰很难的科研攻关。

生活，就是挑战！事业，就是挑战！历史把聂力推上了不能后退的舞台。

有人说，女性心理最突出的弱势，就是深层心理存在的依赖感。女性容易依赖别人，尤其是依赖男人，把男人视为“主心骨”、“顶梁柱”。特别面临危险、困境时，她们似乎更离不开男人。心理学家把女性的这种心理称为“寻求保护的本能”。由于依赖过多，结果造成自身的蜕化。

如果研究聂力走过的路程，你就会发现，从她记事起，她就要靠自己的双手去自食其力。

生活的磨难使她懂得，要靠自己的创造和劳动果实证实自己的价值。她既不想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也不下想靠在丈夫的背上享清福。有一次她和香

港一些知名女性聚会，按照当地的风俗别人都“张太太”、“李太太”地叫着，她开玩笑地对大家说，“我可不想让你们称呼我丁太太。”那些穿着华贵的太太们目光都注视着她，她们从心底里敬佩聂力，在她们心目中也认为是不该用夫姓加太太二字去称呼令人敬佩的女将军。

聂力担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后，一直分工负责军用电子技术等方面的工作。她参与领导了银河亿次机和其它军用电子计算机系统、通信、雷达以及电子元器件等方面的研制工作，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尤为令人瞩目的是在国家重点国防科技工程项目——银河—巨型机的研制中，聂力作为主要的组织领导者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技领导不能当门外汉，这对于领导军用电子和海军武器装备研究工作的聂力来说确非易事。

然而，她像父亲一样，总是深入到科研第一线去认真调查研究，她尊重老科学家的意见，调动年轻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认真听取业务部门的考察研究报告，综合方方面面的意见，在许多重大项目上都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如新一代驱逐舰方案的确定等。

1985年，我国第一台全数字仿真计算机由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就在这一年，聂力开始担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在她面前，科技攻关的道路继续向前延伸。

女人自有女人的追求，女人自有女人的刚强，女人自有女人的奋斗。

有目共睹，20世纪最辉煌的科技成果之一就是电子计算机，其发展之快，使人始料不及。当我国第一台10亿次通用并行巨型机“银河—”的研制拉开序幕时，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分工聂力主管这项工作，她又担起了组织领导科研攻关的重担。

用聂力的话说，“电脑只是执行命令，而人是发布命令的，世间一切事物，人是最可宝贵的。”

聂力非常重视人的因素。

为了保证这项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聂力带领工作组到国防科技大学宣讲建立“两条指挥线”（技术指挥线和行政指挥线）的重要性。亲自考核、挑选担任技术总指挥的总设计师和行政总指挥。她发现计算机系的周教授专业技术精通，对工作认真负责。她认真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准备选周教授担任总设计师。聂力找周教授谈话，鼓励他要团结科技人员，一道搞好科研攻关。同时聂力还注意给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做好思想工作。经过她和业务部门一起认真考核，大胆选用了周教授担任“银河—”的总设计师。

对于一个组织领导者来说，选用于部是完成任务的关键，尤其是高技术项目。有人说：聂力继承了聂帅的优良传统，特别爱才。这话一点不假。对此周教授体会最深。聂力支持和帮助他积极开展工作，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可是对于他的缺点毛病，聂力的批评也是警钟长鸣，没少敲打。真没少挨“训”呀，可回过头来一想，这“训”里又包含了多少深情厚谊啊！

在研制工作的紧张阶段，周总设计师独居上海的70多岁的老母亲患了瘤症，岳母双腿瘫痪。可是周总心系着祖国的巨型计算机，他没有回去尽孝心，家里的难题，交给了妻子李遐。李遐为此从国防科技大学转业回到上海。一个女人面对着重病的老人，住房及生活遇到了很多困难。聂力亲自写信给上海有关部门，请他们帮助我们的科研人员解决后顾之忧：并鼓励李遐支持周总的工作。而周总设计师也没有辜负聂力和同志们的希望，他无暇顾及家里

的重重困难，而是一心扑在“银河— ”的研制上，他推翻了易做的原方案，决定把双处理机双向量阵列变成四处理机系统，这样该机从总体设计到逻辑设计，从工程设计到工艺组装技术，每一项技术都跨上了新台阶，极大地提高了巨型机的综合处理能力。“银河— ”巨型机研制成功后，周教授也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这里，对科技干部的关心和爱护，转换的不仅仅是建功立业的雄心和坚韧，而且焕发出每一个科技人员的创造热情，驱动着他们铸就惊人的奇迹和效益。

在科研攻关中，这些科技专家们为了国防现代化，他们勇于放弃个人利益，奉献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切，青春、健康，甚至生命。而我们的女将军聂力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他们。每逢佳节，会有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从北京飞到他们手上。从外单位借调来搞“银河— ”攻关的技术骨干谈正信，自己都没有在意连续好几年的国防科大帮助工作，职称等问题会受到影响，聂力替他想到了，亲自出面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协商解决办法。

负责研制“银河— ”图形软件的乔国良教授，不幸患了肝癌。聂力亲自打电话给国防科工委五一四医院领导，请他们马上安排病人住院，尽一切努力抢救病人。

乔教授从长沙的工作岗位上，被送进北京雪白的病房里。聂力来到病床前，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安心养病吧，不要牵挂工作，你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谈。”国防科大计算机系的领导还把乔教授的夫人也接到北京照顾他。

当乔教授的生命临近终点时，他从剧烈的疼痛中清醒过来，看到聂力就站在病床旁，泪珠顺着他苍白消瘦的脸滚落下来，他挣扎着坐起来，使尽全力给女将军敬了一个军礼。

这个坚强的男子汉，忍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病痛坚持工作，不曾掉过一滴眼泪。在他就要告别人世时，他多么想向女将军说几句发自内心的话啊！可当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时，他的嘴颤抖着，一切感激的话都不足以表达他内心的感情，只有用军礼来表达他最崇高的敬意。

乔教授是清醒地离开人世的，他告诉家属和前来看望他的同志，他感谢聂力将军和组织上给他的关心和温暖，他心里只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是没能亲眼看到“银河— ”研制成功。

乔教授的战友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北京八宝山松柏长青的烈士陵园，聂力等五位将军前来参加这个普通教员的追悼会。

“每逢佳节倍思亲”，而聂力思念的是科技人员。中秋节到了，她把从南方出差带回北京的风味月饼送到在国家气象中心调试计算机的国防科大的技术人员手里，“银河— ”巨型机的总指挥、科大计算机系主任陈福接到北京调试银河机，累病住进科工委医院。让这位“拼命三郎”万万想不到的是，中秋节那天，聂力让秘书给他送来了一盒精美香甜的月饼和一袋水果。他不知道自己住院，怎么会惊动了百忙中的女将军。他更想不到，他在医院里得到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也是由于聂力将军的“特殊关照”。又过了几天，聂力到病床前来看他，他含着热泪久久握着聂力的手。是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一定要把“银河— ”尽快研制出来。

出色的指挥员，总是善于把握时机，率领部下将战斗推向纵深，以夺取胜利。

人们常用“军心”、“士气”的概念来描述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孙子说：

“上下同欲者胜”。这是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一大特点，从一开始便抓住上下级关系这个核心来论证军队的凝聚力。

我们这位女将军深受父亲对知识分子关心爱护的影响，她懂得在科研攻关中，凝聚力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靠凝聚力，父辈们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洋枪大炮武装起来的敌人。今天她同样靠的是这支坚强的科技队伍的凝聚力去攻克高科技的难关。她常说：“国防科技要靠群体攻关，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号称祖国“三大火炉”的长沙，人们最难熬的季节就是酷暑了。而研制银河机的科技人员和工人们仍坚持战斗在第一线。

就在银河机调机最关键的时刻，聂力来到国防科技大学。

秘书知道，几十年来，她从未正式休过假，何况她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血压又偏高，很为她的身体担心。

可是，她却说：“研制银河机的同志不是也没休息吗？越是最艰苦的时候，我们越是应该去。”

她忘不了，1967年6月，中国将要进行第一颗氢弹试验，当时父亲感冒发高烧病情很重，周总理得知后亲自打电话劝聂帅这次试验任务就不要亲临现场了。但是聂帅依然像每一次执行发射试验任务一样，亲临现场，在罗布泊那片死亡地带，成功地指挥了氢弹试验。父亲给女儿做出榜样，女儿永远把父亲作为学习的楷模。

火球似的太阳把树叶晒卷了，把小草烤焦了，可是女将军聂力那精干麻利的身影，却出现在银河机研制的一个又一个关键岗位上。她和技术人员一起讨论攻关方案，一起分析技术难点。那副满弓满弦意气昂扬的劲头，让年轻人也自叹不如。

一些科技人员戏称聂力是“雷达表永不磨损，永不停步。”

晚上，她脑子里装满了“情况”，军装上浸满了汗水，那沉重的双腿回到招待所，上楼梯都很困难了，然而，吃过晚饭，如果不是那些找她汇报工作的科技人员把她堵在招待所的房间里，她肯定又要主动“出击”。

如果说，腿勤，为聂力赢得了业务工作的发言权；那么脑勤，时时处处为科技干部着想，使大家的心凝结在科研上，则为她赢得了主动权。

“银河人”都是优秀的科技人才，都具有比计算机还灵的大脑。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他们都是抢手的目标。然而那些中外合资企业的大款经理们却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钱对这些人不起作用，是银河人在“冒傻气”，还是自己无能耐？

且不说那个有名气的学术带头人杨教授，一个月的工资才是自己女儿的三分之一，他对事业执著追求的“傻劲儿”根深蒂固。就是那些年轻的硕士、博士们也铁了心来搞科研。

这些给计算机下指令的“银河人”，高薪聘不走，出国也吸引不去。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的知识可以致富，却甘于贫穷；明明知道军人的天职就是奉献，却无怨无悔。而他们刚开始加一个夜班，连1分钱补助都没有。

为此，聂力要亲自把科研人员的加班补助落到实处，她更关心的是科技人员的疾苦。

加班费终于落实了，虽然加一个夜班每人只能领到1元2角3分钱的补助，但大家感受到了组织上的温暖。

奔忙劳碌了一天，她从喧闹的世界中，又回到招待所安静的房间里。连

日来的劳累，因为休息不好，眼睛浮肿了，腿也浮肿了，她疲倦地靠在沙发上，别人送给她一点荔枝，她一颗也没吃，全部转送给科研人员。此刻，她想放松一下，微合着双目，思绪像一条深情的小河，又思念起父亲来。

父亲是她的榜样，父亲遇到这些事会怎么做呢？她常常会这样想。

她忘不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戈壁滩奋斗的基地官兵用沙枣、甘草叶、骆驼刺掺着玉米面、青梨面制成的代食品充饥。长期营养不良，许多人身体浮肿，得了夜盲症。聂帅得知后，亲自与各大军区协商，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调来一大批大米、面粉、黄豆和肉食。基地的科技干部至今忘不了，聂帅特批给他们每人每天二两黄豆，连基地的司令员，政委都没有享用过。用聂帅的话说：“我要从导弹、原子弹一直抓到山药蛋。因为人是铁，饭是钢。”

这就是我们共和国的元帅！他用对科研人员赤诚的爱，在神州大地上筑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

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父亲尊重知识，爱护人才的光荣传统传给了女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女儿更懂得，从事高科技事业离不开一支无私奉献、能打硬仗的队伍。只有为事业勇于牺牲一切的英雄群体，才能研制出高水平的巨型机。

“只有愚者才等待机会，而智者则造就机会。”（培根）。聂力生命的歌，总是马不停蹄地在弹奏着一支节奏明快的进行曲：

“银河— ”还在研制中，聂力就已经在为这台“巨型机”找“婆家”了。石油部、气象局……她亲自出马为“银河— ”巨型机寻找着用户，终于使这台“银河— ”巨型机在国家气象中心安家落户。每天从卫星、海洋、全球各地定时接收大量数据，定时做出预报。

当“银河— ”巨型机研制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之题词，国务院、中央军委致电祝贺，国内 200 多家新闻单位及海内外近百家报刊作了大量报道，并在 1992 年度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和十大电子成果评比中双登榜首，这支科研队伍还被中央军委授予“科技攻关先锋”的荣誉称号的时候，她默默地退到了后面。

然而，在国防科技大学为“银河— ”巨型机鉴定成功而召开庆功大会，聂力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校师生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一画面，深深的留在了每一个与会者的心里。

正如“银河— ”任务总指挥陈教授在给聂力的一封信中所说：“全所（计算机所）上下，一提到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就和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大家都知道您是真心关心我们研究所的，处处为研究所的发展着想。无论是落实任务、解决经费、外汇额度；还是计划调度、誓师动员，或是节日的慰问，经常关心、鼓励、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银河— ’、‘仿真— ’，的研制任务没有您的努力，怎能落实！这十几年研究所的成绩与发展是与您紧密相关的，有了您，我们才有了主心骨。”

当无声的激战，无声的攻坚，无声的攀登终于过去，一道道天堑被跨越，一个个堡垒被攻克，一座座高峰被征服之后，我们这些劳苦功高的科研勇士们该喘一口气了。而聂力将军又忙着操劳他们的休假疗养。总算都有着落了，聂力才露出了舒心地微笑。

可是，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步伐，一天也没停过，依然匆匆奔忙于紧张的工作中。

聂力的耳边又响起父亲的教导：“我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

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国争光，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

从男人世界到女人世界

政治、军事、社会学、历史学等各路专家学者们，在非常认真地研究了几千年人类历史之后，得出了极其高明却又极其深奥的一条结论：战争伴随着人类。因此，就有了“战争让女人走开”，也就有了军营雄风浩荡，男人施展能力和才华的地方。然而，我们的女中将聂力偏偏就在男人的世界里“打天下”。

不过，她头顶上还有女人的一片天，她连续当选为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妇联副主席，还身兼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妇女儿童专门小组组长。她非常热爱妇女儿童事业，注意倾听广大妇女的呼声，为她们谋福利，深受广大妇女的爱戴和拥护。

在当今众多的追星族，狂热地追着歌星、电影明星的时候，也有众多女青年开始追寻军中之星。为庆祝“八一”建军节，《世界妇女博览》杂志刊登了聂力的照片，连主编都没想到，这期杂志在读者中非常受欢迎，编辑部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许多女青年把聂力的照片镶在镜框里，女将军在她们的眼中具有独特的魅力。

对于中国妇女，聂力有她独到的见解，她认为，中国科学技术队伍的建设离不开占总人口半数的广大妇女的参加。中国妇女只有在参与科技进步的事业中，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学会将技术更有效地转变成商品，以繁荣经济，增强国家安全和对祖国的未来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才能实现自身应有的价值。

她在百忙中撰写了《科技进步与中国妇女》一文，以大量翔实的例子和数据说明：“中国妇女已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人建设，加快我国科技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可以确信，一旦科技与中国妇女实现更深刻地结合，就会变成一种强大的动力，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更快地向前发展。”因此，她号召：“中国妇女继续坚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只要社会继续为妇女从事科技进步事业提供物质支持，中国妇女就敢于面向信念的挑战、科学技术发展的挑战、国家经济综合国力增强的挑战和人才竞争的挑战，以拼搏精神积极进取，争做科技战线上的强者。”

这篇文章在同一天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科技日报》和《中国妇女报》刊登，之后又被转载于各报刊，用英文翻译到国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是在妇女界引起了震动。

1992年，在北京举行的“妇女与科学技术中日研讨论”上，聂力代表中国作了《中国妇女与科学技术》的主题报告，使会场上的日本科技界妇女深受震动。日本是个发达国家，然而，她们却非常羡慕中国科技界的妇女，已经赶上了世界妇女的先进行列。聂力以强有力的事实和数据说明这一点，“80年代中期，我国女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技工作的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为33%，远高于美国的12.2%（1982年），日本的12.5%（1982年）。而且在大学工科毕业生中，我国妇女所占的比例也高于发达国家，如：英国占10%，美国占15%，中国占27%。在专业工程师人数中，英国女性占5%，美国占6—7%，而我国妇女占19%。建国以来，我国女科技人员不仅从事一般性的科学技术工作，而且跨进了高能物理、遗传工程、微电子技术、宇宙观测、

卫星发射、极地考察等领域，成为我国科研战线上的重要力量。女正副教授占正副教授总人数的比例英国 3%，德国 5%，法国 9%，美国 10%，我国也已达 10%……”身为高级工程师的聂力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拨动着会场上中外科技界妇女的心弦。

当聂力走下讲台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这时会场上有人窃窃私语。

“还是聂力讲得对，自强不息，奋力拼搏，才是咱们女性取得成功的根本。”

“看聂力显得多年轻！”

“咱们总说女性的魅力，今天才体会到女人的自信就是一种魅力，就是一种美，一种永葆青春的美。”

的确，一个缺乏自信的女人永远也不会有吸引人的美，然而，当年过六十的聂力，站在科学会堂的讲台前，站在众多的科技界妇女面前，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女知识分子们也许谁也不曾有她那样悲惨的童年，谁也不会 16 岁才迈进学校的大门。尽管她们几时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是聂力努力奋斗了！今天在这里聂力和在坐的所有女性一样，都是事业的成功者，都具有高级技术职称。聂力的纯朴无饰与真挚坦诚，赢得了在坐的知识女性的信任，她们被她人格的魅力所吸引。

对于女性教育，聂力有切身体会，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她认为，当今世界在高新技术的推动下，对劳动者的科技素质要求很高，只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女性才能在竞争中获得成功，中国 1.8 亿文盲中，妇女占了 70%，只有 1% 的识字女性达到了大学文化程度，60% 的女性只受过初中教育。中国的女性教育亟待加强。

她忘不了她的童年。

忘不了，那时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背着书包进学堂。

她渴望着上学胜似一切。

几十年过去了，她那种爱学习的劲头直到今天还是有增无减。

有一年，她代表全国妇联到女英雄潘星兰和杨大兰的家乡去慰问。当时老区人民听说聂荣臻元帅的女儿，女将军聂力来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站在泥泞的土路边迎接她。她和蔼可亲地抱起路边脸蛋冻得通红的小姑娘，问她上学没有？当她得知老区的人民生活还很困难，就对身边省市妇联的同志说：“帮助女童入学，是我们妇联的责任。”

当她听说中华女子学院在北京奠基修建，她马上拿出自己一千元稿费，捐赠给正在开工动土的中华女子学院。

有人说，人的成绩 = 人的能力 + 人的工作积极性。且不管这句话是谁说的。从聂力身上你可以感觉到，她的工作积极性，使她的工作能力不断提高，于是她获得了成功。

1993 年应摩洛哥王国全国妇女联盟和保卫儿童联盟的邀请，聂力率中国妇女代表团赴摩洛哥进行友好访问。

在摩洛哥，聂力和中国妇女代表团受到了摩洛哥妇联主席莱拉公主和保卫儿童联盟主席阿米娜公主的热情接待，她们都没有来过中国，但是她们从聂力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身上，感受到了中国妇女的真诚、热情和友谊。

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部，既有平原，高原，又有沙漠地带。出去参观访问，有时一坐车就是四个多小时、聂力总是兴致勃勃地和摩洛哥的陪同人员

聊天，一点没有疲劳的样子。有一次，车在路上跑了整整一天，暮色降临了，对方说的“农村”还是没有到。代表团的同志征询聂力的意见，聂力毫不犹豫地说：“她们安排了咱们就去。”从车窗向外看。天已经全黑了。车又在黑暗中跑了一个多小时。忽然，大家的眼前一亮，路旁，威武的摩洛哥古装士兵骑着高头大马和跳着美丽的阿拉伯民族舞的少女们组成的迎宾队伍，把中国妇女代表团迎进了帐篷。主人盛情地端上了牛肉面。中国妇女代表团的成员们这才知道，这是摩洛哥闻名遐迩的马拉喀什旅游饭店。主人为了欢迎中国妇女的到来，端上的洗手水里也撒满了美丽的花瓣。代表团在夜色中犹如走入了仙境。然而载歌载舞的人们，哪里注意到连星星都在夜空中冻得直抖，聂力已经在夜色中冷得打哆嗦了。翻译担心她冻病，劝她早点走。聂力小声说：“不行，看完。”一直到午夜，聂力有说有笑，没有流露出一丝倦意。

在出访期间，她总是对见到的每一个人都那么亲切热情，问他们，“你们知道中国吗？欢迎你们到中国来。”那些孤儿院和农村的孩子们也喜欢这位和气的中国阿姨，聂力也总是抱起来亲一亲一个个可爱的小家伙。每到一地方她都要把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留下来。

莱拉公主和阿米娜公主向聂力表示，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她们也想到中国来看看，并且希望加强两国妇女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公主非常喜欢中国的绢花，对聂力说：“要是我们摩洛哥家家户户都有绢花该多好啊！”

聂力把这事记在了心上。回国后，亲自到绢花厂去了解情况，考察能否和摩洛哥交流合作，还买了两束漂亮的绢花，托我国驻摩洛哥大使安国政和夫人王平茵带给莱拉和阿米娜公主。

一年后，摩洛哥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聂力知道他们信奉伊斯兰教，特意安排他们品尝一顿中国特色的火锅涮羊肉。席间摩洛哥妇女赞不绝口，第一次发现她们吃了一辈子的羊肉还没尝过这种做法，她们开心地说：“中国的涮羊肉这么好吃，我们要把这种吃法带回国去。”

他们就要启程回国了，聂力专程去宾馆送行，摩洛哥妇女拥抱着女将军，流下了依依不舍的眼泪。

聂力主管一些大型的国防科技项目，经常要外出开会，深入科研第一线去考察工作。但是不管到哪儿去，工作再忙，她总要挤出时间去当地的妇联看一看。

上海市妇联、青岛市妇联、厦门市妇联、天津市妇联、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妇联、凉山彝族自治州妇联……都留下了她的足迹，留下了她深厚的情谊。用她的话说，这叫回娘家。在百忙中，她像过去攻克科学险阻一样，认真研究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有关法律，为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她周围工作的同志说：“聂力像一盆火，燃烧着自己，温暖着别人。”

那是两年前的“三八”妇女节，正是聂力工作最紧张、最较劲的时候，且不说那上午、下午排得密密麻麻的会，就是那办公桌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文件、材料就够人批阅的。

不管工作有多忙，聂力将军心里总惦着要去空军总医院航空病研究中心看望患结肠癌的特级女飞行员张文秀——她是我国第三批女飞行员，在祖国的蓝天上已经飞行了4000多个小时，还为我国的核试验做过贡献，直到病发

前还战斗在飞行第一线，受到全军的表彰。当聂力听说此事后，就开始收集报刊上有关医治癌症的信息资料。

就在“三八”节前的一天上午，她从人民大会堂开会回来，中午顾不上休息，自己亲手扎好一束鲜花，带上镶嵌着我国发射“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图片的镜框，还有那些医治癌症的资料，前往医院看望张文秀。

张文秀和她的丈夫，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她这样一个普通的女飞行员，从不曾和心目中尊敬的女将军有过什么交道。然而聂力将军却突然在她病重的时候，来到她的病床旁。张文秀眼里转动着泪花，久久地注视着女将军……

女将军的手和女飞行员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一股暖流涌进了张文秀的心里，将军的手是多么有力，生活是多么美好……

当笔者给张文秀寄去她和聂力的合影照片时，我听到电话那边，这个飞过了千难万险的女飞行员非常动情他说：“感谢聂力将军，我会微笑地面对最后的人生……”

聂力将军从不摆名人的架子。她和许多女科技工作者都结下深厚的友谊。女科技工作者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都愿意找她谈，她也总是热心地帮助她们解决困难。张海迪也和聂力结下了忘年交。当聂力得知海迪获得硕士学位时，立即写信向海迪表示祝贺。海迪也给聂力写信寄照片，向敬爱的大姐倾诉着心里话。

当然，聂力的女朋友很多很多，女部长、女市长、女教授、女军人、女企业家、女工人、女农民……不管是知名的，还是不知名的，大家总是亲切地称她聂力大姐。姐妹们携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大业中奋力拼搏着……

诚然，45年前，当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起，中国妇女便同男子一起翻身做了主人。共和国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同男子享有同等权力，同工同酬，男女平等。中国妇女感到何等的幸运和喜悦。然而，她们又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体验到男女平等远非法律所能决定的深刻的内容。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和习俗在人们的意识里是那么根深蒂固，女人是很难同男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

聂力和其它女性领导人一样，深深体会到做女人难，做女领导更难。但是，她们在一起惟也没有时间去叹息这个“难”字。

她们顽强地奋斗着，在艰难的妇女工作中开创辉煌的业绩。她们要让中国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光彩的新女性形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革命家庭 清正的家风

对于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家是避风的港湾，在此加足了油再扬帆航行。而每个家庭又都是社会的细胞，折射着社会五光十色的影子。

谈起自己的家，她会告诉你，她最思念的是父亲，她最遗憾的是，1992年5月14日她没能一直陪伴在父亲的身边……

这一天是聂荣臻元帅93年辉煌生命旅程的最后一天。

老师和往常一样，很早就醒来。他用慈祥的眼睛和医护人员交流，他用低微清晰的语音同人们谈话。聂荣臻元帅心里非常清楚，他的病情已经很重了，两天以前，他已经把跟随他几十年的周均伦和陈克勤两位秘书叫到身边

留下了《临别遗言》。老师很想让女儿聂力多陪陪自己，可是为国防科技事业，他又总是鼓励女儿要发奋工作，不要为他分心。

所以这一天，聂力像往常一样看到父亲醒来，精神尚好，就放心的去上班了。

下午，聂荣臻元帅的家乡四川省江津县的领导在北京开会，他们请在京的江津籍同志对家乡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跟上全国发展的大好形势，提出意见和建议。聂力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去参加家乡发展研讨论。

晚上，聂力急匆匆地赶回家，来到父亲床边。聂力知道，父亲和许多老人一样，对养育他的故乡有一种深厚的眷恋之情，他希望家乡繁荣富强。

聂力告诉父亲，“会开完了，大家提了不少好的建议，江津的同志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正在设法缩小这些差距。”聂帅说：“是要改革，要开放，要不江津就不能发展。”聂力点点头，“他们已注意到了这一点。”

聂帅又说：“怎么没有和大家一同吃饭？”聂力说：“我赶回来看你啊！”

聂帅用慈祥的目光深情地看着女儿，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接着聂帅又和秘书谈起军事文选的编辑出版工作。

晚上近 10 点钟，老师看看台钟对大家说：“你们去休息吧。”10 点整老师平稳入睡了。谁也没有想到，共和国的最后一个元帅再也没有醒来，就这样安详地离去了。

聂力扑在父亲身上失声痛哭。

她想起父亲一生历尽艰难，始终没有动摇过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父亲从年轻时，就在寻找一条科技救国的道路。不管道路多么艰险，父亲一生都是勇往直前。

1966 年，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的动乱开始了，发展之猛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她的一家也受到了大批判的包围。父母亲 and 许多老革命家一样，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和摧残。然而，父亲始终站在国防科研的第一线，指挥着科技大军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那时候，家里多难啊！一家四口都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只因江青在一次煽动群众的讲话中提到张瑞华是叛徒，聂力长期有病的母亲就被送到中苏边境一个叫双岗的偏僻地方去劳动，同傅涯同志一块养鸡。丈夫丁衡高也被扣上“516 分子”和“苏修特务”的黑帽子，调到陕西秦岭山区的陀螺仪厂去工作。全家人对革命事业始终无限忠诚，对国防科技事业任劳任怨地浇洒着汗水，丝毫没有一丝犹豫和徘徊。

受到政治风波冲击的聂力，这时既是妈妈的女儿，又是女儿的妈妈。在险恶的政治生活环境里，她又一次受到无尽的压力和磨难。然而，是父亲给了她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她既要出色地完成科研任务，还要支撑起这个家。

聂荣臻元帅和张瑞华妈妈到了晚年，最为欣慰的就是女儿和女婿继承了他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国防科技事业。

老师从聂力、丁衡高对科研、对工作，一干起来就不分昼夜，经常忘了吃饭和睡觉的那股拼搏劲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

聂力也总是把国防科研取得的重大成果，向父亲叙说。这时候，她就会看到平常不大多说话的父亲，露出满意的微笑。当然，聂帅还要提醒女儿、女婿在取得胜利时，还要注意做好哪些工作。

母亲也会笑着对聂力说：“家里的事不用你们操心，把工作搞好，就是

咱们家最大的幸福。”

母亲张瑞华是中国革命的第一代女兵，是黄埔军校的第五期学员。她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黄埔同学会理事。对于这位有7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人们亲切地称她“张妈妈”或“张奶奶”。对于女儿、女婿的工作，母亲给予他们极大的支持，尽管自己身体不好，却不让女儿、女婿为她分心。

聂力多年未休假。有时，她不无遗憾地说：“我也没能陪父母好好度一次假，尽尽做女儿的义务。”

周围的同志也经常劝她，她应该休息一下了，也该治治病了。可是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她总也抽不出空来。所以，她到哪出差，从不游山玩水。稍有空闲，首先想到的就是老母亲。有一次，聂力到香港出差，会晤、洽谈、考察……从清晨一睁开眼睛，一直到午夜，每小时都作了安排，边吃饭还要边谈工作。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特意为她准备了一艘游艇，让她游览一下香港、澳门的市容，放松一下神经，可她就是安排不出时间来。但是她一定要挤出一点自己的休息时间，为老母亲购买一点表心意的纪念品，她对一同出差的同志说：“这是我做女儿的一点心意，走到哪我都会想起我的妈妈。”

不过，有时聂力的那股执著劲上来，老母亲也无可奈何。有一次，聂力感冒发烧还要去上班。秘书告诉张妈妈，聂力有病应该休息，别人都劝不住，只有请老人家亲自出马。因为大家知道，聂力是孝女。可是，张妈妈还没开口，聂力就猜出了老母亲要说什么。聂力微笑地扶住母亲的手，说：“妈妈，我知道你和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工作的。”于是，老母亲又一次给女儿开了“绿灯”。

女人总是面对一道难解的方程式：人生=事业+家庭，要么事业，要么家庭；要么站在成功的男人背后当一名贤惠的妻子；要么以牺牲家庭幸福为代价，当一名事业成功的女强人。女人的一生必然面对两难选择，聂力在两难选择中，凭着她的聪明才智，寻找到和谐美满的最佳答案。作为一个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女人，她也是时常感到来自工作和家庭两种力量的拉扯，然而，她认为一个女人的协调能力最重要，她就具备了这种能力，在父母、丈夫、女儿的眼里，她是好女儿、好妻子、好妈妈，在工作之外，她有一个和睦温馨的好家庭。时下被人不断引用的一句名言，“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是站着一位默默奉献的好妻子。”用在聂力和丁衡高身上，不如说一个成功的男人相伴的是一个为共同事业奋斗的 successful 的女人。

1961年，丁衡高获得前苏联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回到祖国。

1962年春节，聂力和丁衡高在广州留园喜结良缘。那是人一生中最隆重的一天，两位新人却穿着日常的装束走向招待所食堂。他们没有大摆宴席，只有清茶喜糖。然而那个场面却让人们非常羡慕，因为有共和国的四位元帅、多位将军、省委领导以及许多革命前辈老妈妈们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有一次聂力出差到广州，路过留园，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她们的婚礼，脸上流露出无限的温馨和怀恋之情。“那时我和衡高可以说是革命队伍里最高规格的婚礼了。真可惜没有留下一张结婚纪念照。”聂力惋惜地说。

至今，聂力的同学们还在说，当时他们都以为聂力这个元帅的女儿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夫君。然而，朴实的聂力却把绣球抛给显赫门庭圈外的丁衡高。丁衡高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他们的结合是事业型的结合。从此他们携手

踏上了国防科技的道路。

有人说：女人的婚姻可以给她这一辈子定调子。当然，这是把女人当做月亮，要靠折射太阳的光芒来表现自己。然而，可以从一个女人择偶的标准这一侧面看出她对生活和事业的追求。

毫无疑问，聂力是有眼力的。她和丁衡高相识在列宁格勒的同一所大学里，聂力念大学，丁衡高读研究生，毕业以后又都从事国防科研事业。

60年代初期，丁衡高回国后，一心扑在国防科研上，他长期参加并负责导弹的自动驾驶仪、陀螺仪、加速度计、惯性平台的研制工作。十年动乱开始后，他从不参加派性斗争，不管别人怎么“文攻武卫”，他却总是拿着拖鞋到研究室、车间去搞科研生产。1978年，他主持研制成功的“静压空气轴承”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79年，他主持完成的“静压气浮技术及其在惯性器件中的应用”获国防科技重大成果一等奖，同年他领导研制成功的气浮陀螺加速度计和三自由度气浮陀螺，均获得国防科技重大成果二等奖。他主持研制成功国内首创的液浮惯导平台系统，并成功地运用于我国战略导弹潜艇水下发射。1985年，丁衡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被国外舆论称为“国防事业专家”、他还首批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85年起，丁衡高任国防科工委主任。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

而聂力正是与丁衡高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比翼齐飞。

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将，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将，两个人有温馨的家庭生活吗？

答案是不容置疑的。爱情对两位将军来说都是事业的促进剂。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的：“爱情的意义就在于帮助对方提高，同时也提高自己。唯有那因为爱而变得思想明彻，双手矫健的人才算爱着。”谁能说，这典型的将军家庭不幸福呢？

笔者有幸参加了1993年聂力将军为庆祝“三八”妇女节而举办的家宴。

说起来，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十年前的1983年3月8号，聂帅在家里用家乡特产米花糖和天府花生招待了连获五连冠的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老师和姑娘们共庆“三八”妇女节，还亲笔题写了“我最爱中国女排”几个大字，女排队员们在一只排球上签满了名字，由袁伟民代表女排把这只有纪念意义的排球送给聂帅。聂帅把这只排球作为珍贵的礼品，一直挂在办公室里。他老人家十分赞赏女排的拼搏精神！

十年后的三八妇女节，老老少少的女性围坐一桌，有张奶奶、聂力将军，还有女秘书、女护士、女公务员，家里的阿姨，还有一个带红领巾中的小女孩，唯一坐在桌旁的男性公民就是丁衡高将军了。

丁将军看上去精干、沉稳，对人却非常和气，他首先举杯祝贺全体女士们节日快乐！

然后，就是我们这些小字辈们祝贺84岁高龄的张奶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大家高兴地吃着饺子，说笑着像亲朋好友聚会一样，虽然彼此年龄、职务差距颇大，却没有上下等级、高低贵贱之分。

张奶奶微笑地让大家多吃饺子和菜，还连连称赞丁主任“我这个女婿可好了，可知道心疼人了。”

老奶奶边说，边用颤抖的手去夹饺子，然后把饺子放在身旁女战士小苏

的盘子里，亲切他说：“平时小苏照顾我，今天我也要照顾照顾她。”小苏嘴里塞得满满他说：“这饺子我吃了一生难忘。”

那可爱的小姑娘，是张奶奶的秘书李亚玲的女儿，她就像在家一样自由自在，一会儿爬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吃饺子，一会儿又在餐厅里转着圈地跑，大家都叫她“小三八”。“小三八”开心极了，拍着吃得圆圆的小肚子向大家宣布：“我吃饱了！”然后跑到老奶奶身边，踮起脚尖在老奶奶饱经风霜的脸上来了一个响亮的吻。

顿时，饭桌上扬起了一片笑声。

在这里使人感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温暖，而且使人感到将军夫妻的理解。几十年来，他们共同浇灌着爱情之花，亲切是他们爱的灵魂，自主是他们爱的支柱，他们互相鼓励着，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当然，聂力心里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我们这对老夫妻结婚几十年了，从来没有俩人一块出差，没有一起到过哪个旅游胜地去疗养，好好度一次假，放松放松”。然而，她仅仅是说说而已，却从来没计划去安排这美好的假期。青春年华也就在这一次又一次个人与事业需要的两难选择中转眼而逝了。每当有人提起她心里这小小的遗憾，聂力总是笑着说：“看来只有等到我们都退休以后了。”

对于聂力唯一的女儿聂菲，全家都非常喜欢，却没有人溺爱她。用聂力的话说，“我们家是两代单传。”聂力继承了父母生活俭朴的优良传统，同时她也这样要求女儿。聂菲小时放学后到街上买零食，挑来挑去，最后只买了一根果丹皮回来，聂帅看了笑着说，我就知道你最多也就是花9分钱买个果丹皮解解馋。

从聂菲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一直到她去美国留学，聂帅总是要在聂菲寒、暑假开学前和她认真谈一次话，对她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提出严格的要求。教育聂菲不仅要学习好，还要多关心国家大事，尊重老师，团结同学。聂菲也总是认真地把爷爷的话录音和记在笔记本上。当别人夸奖聂菲学习好时，聂帅就会高兴他说：“小菲就是爱学习，她的椅垫都磨出了大洞。”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帅府大院已成为革命的传家宝，一代一代传下来。1991年，南方遭到特大洪涝灾害，聂帅知道后，立即让夫人筹办捐款捐物救济灾民，老两口除了捐出2000元外，又挑了几十件衣被，而且大都是新的捐给灾区，把旧的留给自己用。聂力和丁衡高也在单位里积极带头给灾区捐款捐物。

一到过节，聂力就想到家里的工作人员，那些年轻的警卫战士，护士、公务员姑娘们，他们一定会想家的，也许那些年龄小的还会掉眼泪呢。于是她去买一些小礼品，晚上组织家里的工作人员欢聚，让他们感到家庭的温暖，过一个愉快的节日。用她的话说：“我们年轻时在苏联留学，一到过节特别想家。现在小男兵，小女兵都离家那么远，我要让他们像在家一样开心高兴。”

元帅和士兵、将军和士兵都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战士们退伍回家时，总要和将军照一张合影留念。当这些年轻的男兵女兵走出帅府大院后，只要有他们总要回来看看，1991年初，一位从江苏来的叫皇甫启军的年轻人，来到办公室。告诉秘书，“这次到北京来，我一定要见见聂将军。”原来3年前，他曾给聂力开过车，后来转业回到江苏老家，这次到北京出差，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见聂力一面。当时，聂力正在开会，休息时，她听说皇甫启军

远道而来，赶忙回到办公室，热情地握住皇甫的手，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不住问寒问暖。临别，聂将军送给他一本挂历，还塞给他 100 元钱，皇甫不要，聂力说：“我没时间上街去买东西，快过春节了，你就代我给孩子买点东西吧。”

一席话，说得皇甫启军心里热乎乎的。这不仅仅是皇甫启军一个人，曾在那个大院里工作过的人都会告诉你，那是一个团结和睦的革命大家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

然而，这个革命大家庭具有相当严格的廉政家风。有一年的“八一”建军节，管理处给家里送来一点副食品。聂力对秘书说：“父亲在世时，就没有要过别人的东西，共产党人就是应该清正廉洁，两袖清风。过去是这样，现在仍不能要，以后也不能让他们往家里送东西。现在这些吃的东西送来了，一定要按规定付钱。”

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宾馆同志给她家里送来了两条鲟鱼，当她知道后，立即让秘书按价格去付钱，她说，“一分钱也不能少给，看他们以后还来不来送东西了，”

还有一次，她从南京出差回来，研究所的同事给她一袋香蕉和一只烧鸡路上吃，她将食物送给工作人员吃，又马上让秘书寄回 100 元钱。

时下有些人认为，只要给领导送点礼，事情就好办，而在聂力这只有四个字“此路不通。”哈尔滨有个人多次来信想和她拉近乎，还给她寄来 1000 元钱，想调到北京来。聂力看到汇款单对秘书说：“你就有权处理这件事。”秘书心领神会，按原地址将汇款单退回去了。

聂力的勤俭节约，也是国防科工委办公大楼里众口皆碑的。冬天天亮得晚，她上班时发现公务员忘关走廊里的灯，她总是一个一个去关上，这也影响到秘书，每天上班、下班都忘不了随手关灯。连大门的哨兵，一看到聂力，就想起赶快关上门厅里的大灯。

平时，聂力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吃过午饭，看一会儿报纸，然后身上盖件军大衣，往办公室沙发上一躺，迷糊十几分钟，也就算是午休了。然而她那个沙发可是年代久远了，管理处多次要给她换新的，她就是不同意，总是说：“能修修，就凑合着用吧。”有一次，她的老同学，广州《家庭》杂志的主编柳明来看她，往沙发上一坐，立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女中将的办公室，这么俭仆！难得啊！”

可是聂力对她这个没有任何多余摆设的办公室却非常满意，她喜欢整洁干净，一切部井然有序，那一行行、一摞摞的书，就是她心爱的家当。

自从她 1982 年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开始，生活便跌进了一个喧闹的世界。1988 年，她又被授予解放军少将，成为一名引人注目的女将军。不管是在办公室里，还是在家里，本可以属于她自己的安静被切割得七零八碎，各种各样的人不是登门，就是电话，到她这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她自己却来不及享受消逝得太快的时光，甚至难于找到一点清静。她发现一件颇有意味的事，这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她肩上的担子越重，人们对她工作的期望值越高，她越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她不知不觉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尽管她的外貌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尽管她的心态没有衰老，尽管她像年轻人一样拉满了弓弦，出差回来也舍不得休息一天，又投入紧张的工作。但是她的身体开始让她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晚上熬夜，早上起来眼睛就会酸疼。她仍然像年轻时一样，经常深入基

层考察工作，走的时间长了膝盖就会有阵阵发疼的感觉。然而，她却从来不为此感到失落。青春的源泉依然在她的心里涌动，她的才能，她的创造力，她对事业的奉献精神，使她战胜了衰老。她是一个成功的女人，永葆着女性美好的魅力。

如果面对流逝的岁月，生活还给她留下一点小小的缺憾，就是她这大半辈子人生是在奋斗中度过的，似乎缺少了现代人生活的浪漫色彩。但是，不懂得享受绝不是缺点，如同我们都迈入小康而不能舍弃艰苦奋斗一样！

聂力有她自己的生活轨迹。对生活她有独到的理解，有时她也非常幽默有趣。

那是一天下午的5点多钟，秘书送文件回来，看到聂力正在秘书的办公桌上接电话，她面带笑容，口气和蔼地说：“对，聂力同志不在，她去开会了……”放下电话她对秘书说：“我刚才当了一会儿秘书，那个电视台的记者就交给你了，对他一定要热情。不过你是知道的，我一贯不愿意宣传自己，希望你能配合。”说完，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拿上公文包到大楼那边去了。

自从聂力走上领导岗位，许多记者纷纷上门采访，都被她谢绝了。她经常说：“历史把我放在这个岗位上，我们应该多干少说。”

1992年4月，秘书收到来自大洋彼岸的一封信：

亲爱的聂女士：

欧洲出版集团《国际名人录》、《欧洲世界年鉴》及《国际事务名人录》出版社希望将您列入定于1992年中出版发行的第一版《国际妇女名人录》条目中……《国际妇女名人录》将登载世界范围那些在政治与外交，电影与戏剧，艺术、学术、体育、法律与商业的广阔领域中杰出妇女们的简历条目……

看了这封语气诚挚恳切的信，秘书对聂将军说：“把你的有关情况提供给他们吧。”

聂力摇摇头，就这样，轻而易举可以在世界扬名的事，被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这之后，秘书又陆续收到《中国妇女500杰》、《中国当代名人录》等丛书编委会的来函征稿，当秘书向聂力报告此事时，聂力总是说，“我不是什么名人，咱们不要花时间参与这些事。”

多少年来，遇有记者采访，聂力总是不谈自己，而是诚恳地要记者们多写写那些长期为国防科技事业无私奉献、默默奋斗的无名英雄们。

这就是聂力将军！

1993年7月24日，聂力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中将军。聂力感到她身上的责任更重了。

1995年2月23日，聂力的母亲张瑞华与世长辞了。这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了近70年，为革命无私奉献，不谋个人私利。出乎女儿意料之外，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5000多各界人士来向这位中国革命的第一代女兵告别。鲜花丛中，莫文骅同志题写的“女中英杰”格外醒目。拥军模范庄印芳3月2日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到北京看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上的这条消息，哭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来到聂力家里，扑到聂力身上失声痛哭。然而，聂力忍痛节哀，抹干眼泪，又投入到人大会议上。她知道自己肩负着父母的期望，站在父母的遗像前，她感到父亲，母亲深情地目光久久地注视着她，告诫她永远不能松懈，激励她更加努力地工作。

在本文将要结束的时候，却不能给聂力划上一个句号。她这人特具有持

续性和长久性，她连续被选为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在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她连任第一、二届全国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连任第一、二届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此外，她还承担着第四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务委员，中国女科技工作者联谊会副会长，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等众多的社会工作。

她的人生之船，在事业的海洋中永远搏击向前。

撑超这片蓝天

丁继东 施晓亚

在北京西郊五棵松，有一片白色的高楼群。环绕高达十四层的医疗大楼。有西院康复楼，东院内外科大楼，北边的门诊楼，东南面的科学文化中心、办公大楼，还有专家教授楼、护士楼、科技开发中心，总占地面积三十五万平方米。

这里，党和国家领导人常有往来，功名显赫的高级将领时有进出，海内外知名人士专程登门，异国他乡的急难者远涉重洋慕名求助。这些高知名度人物的到来，给这片楼群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当今社会，引人注目的身分往往伴随着某种神秘。这种神秘从这片楼群里似是而非地透一点风，海外传媒煞有其事就点一把火。于是，这片白色楼群在人们的眼中是那样的备受关注。

这里，每天每时吞吐不尽的人流，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为数众多的是普通士兵、当地市民、长途跋涉者、都市打工人，流量之大，密度之高，来源之广，每每使人想到“南下热”、“民工潮”，常常令人有处于“王府井”、“大栅栏”之感。于是，这片白色楼群在人们的眼中又是那样的平平常常。

这里，偌大的挂号厅，聚集着五湖四海殷殷期待的目光；日以继夜的门诊部，守候着四面八方的焦急的心情；一千四百多张床位，护理着男女老少热爱生命的虔诚。寻医、问药、住院、探视、诊治、护理，不同来者，不同病情，不同诊断，不同岗位的医务工作者提供的不同服务，人们的活动集中在一个主题——救死扶伤！于是，这片白色楼群在人们眼中是那样的充满希望。

这里，曾为投医无门的老区农民开方便之门；曾不惜化费数万元治疗身患绝症的士兵；曾使久诊不得其解的疑难杂症疑团顿开；曾帮久病不愈濒临绝望的内科患者获得新生，曾帮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外科病人夺回了生命……来自各行各业赠送的锦旗，出自各种笔体的表扬信、感谢信，操着各方言的感激之情，如同拥向这里的人流，一年四季只有潮起，没有潮落。于是，这片白色楼群在人们眼中又是那样的神圣辉煌。

蓝天下，高高矗立的医疗大楼上竖立着六个醒目的大字——解放军总医院！

“没什么可夸耀的。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一个普通的女军人，一个普通的女医生，一个从事普通职业的人。”

春风，无遮无拦地吹拂京都大地。京都，无拘无束地享有春的惬意。

北京的春天，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敞开放眼世界的胸怀，笑迎四海亲朋，喜待五洲宾客。

阳光下，乳白色建筑物上金光灿灿的“科学文化中心”几个大字熠熠生辉，恬静而气派。解放军总医院外宾接待室就设在这幢白色建筑的三层。此时一位将军和一群军官们走出楼门，走下台阶，迎接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的

来访。

此刻，载着客人们的轿车已缓缓停在了楼前。俄罗斯军事代表团尼·瓦契科夫将军一行走了下来。迎候的将军走上前去，与远方的客人一一握手，宾客一一介绍了各自的身分。

代表团一行七人是来考察医院营房建筑的。在主人的精心安排和引导下，他们参观了医院的主楼，查看了附属建筑，观看了整体布局，谈论着前景规划，随后客人们观看了医院建设的录相片，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交谈中，中俄双方代表的目光都交织在两位宾主将军之间。

女主人看上去五十开外，有着这个年龄的职业女性匀称而高挑的身材，乌亮卷曲的齐耳短发，经过修饰，一丝不苟。大而炯炯有神的眼睛，可以看出年轻时的俏丽。她的一举一动中透着沉稳和不容置疑的权威。一身笔挺合身的将军服，黄灿灿的肩章，不染一尘的皮鞋，使她更加威风凛凛、英姿飒爽。看得出这是一位严谨的修养极高的知识女性。

会见结束后，对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礼物——一块硕大的“将军”表，送给主人表示谢意。此刻，尼·瓦契科夫将军脸上的表情呈现出了异样：送给女主人的礼物有些不合时宜。

将军毫不介意地笑了，拿出事先准备的礼物，回赠给俄罗斯代表团一行。

“哦，真没想到将军的翩翩夫人风采，内刚外柔，谈吐不凡，举止不凡，用你们中国话说，儒将风范。看来，我送给您的，该是一块女式手表，这才适合你的身分与涵养。为此，谨向您和您的助手表示歉意。”

报以这位异国将军的是主人满面春风的微笑和一番普普通通的话：“谢谢您的好意。没什么可夸耀的，我不过是普通的中国妇女，一个普通的女军人，一个普通的女医生，一个从事普通职业的人……”

尼·瓦契科夫将军惊诧不已的表情告诉了在场的人们，适才女将军的普普通通的话语，也是他所没有想到的。然而他没有想到的又何止如此呢？

俄罗斯客人一行结束了短暂的中国之行，但他们对中国军队的医疗现状和中国女将军的惊诧，恐怕会在一个阶段留在脑海里。他们可能会把在中国见到的事情，告诉给那些同样是高鼻子蓝眼睛的人听，让那些本来就对神秘东方富于想象的人更多了一份想象的空间。

朋友，尽情想象去吧！新中国的妇女，新中国的女军人，新中国的女将军，自尊、自爱、自强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艰辛和搏击以及只有她们自己才有深切体会的自豪与骄傲，是迄今为止丰富的想象力所能以想象的。

廖文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少将院长。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十四届代表大会代表。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翻开她的简历，像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平淡而无奇。

1934年5月6日出生于上海。

1950年12月在成都华英中学参军。

1951年3月被部队送入沈阳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就读1956年12月毕业任第七军医大学内科军医

1964年8月调解放军总医院任主治军医、科室副主任、南楼临床部副主任

1983年任副军职副院长

1988年9月授少将军衔

1989年12月任院长

回首青少年时代，像许多人走过的路程，她历经艰辛。

长江，中华民族亘古贯通的血脉，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象征。

廖文海，在长江岸边降生，在江风中咿呀学语，喝长江水长大。江堤弯弯，流下她儿时的行行脚印：江风阵阵，飘过她儿时的串串歌谣；江水滔滔，流过她儿时的五彩憧憬。

“文海”这个名字，寄托着父亲、母亲对儿女赖以生存的长江能变得像海水一样的文静、像海天一样清澈透明的美好希望。而今，当年小文海的发辮已见银丝缕缕，谈起长江，她打开的话匣，如同川流的江水，依旧滔滔，一往情深。

她出生在上海一个店员家庭。父亲是四川人，在上海的一家商行供职，母亲是从中原嫁过来的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文海还有一个妹妹，全家人靠着父亲微薄但还算稳定的工资收入，靠着母亲的精打细算，生活还算过得去。

然而好景不长，文海五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家庭支住的倒塌，失去慈父的抚爱，欢乐之家的沉没，在幼年文海的心灵上烙下了永久的悲伤。

最痛苦的是母亲。那年母亲二十九岁，没有了丈夫，没有了经济来源，没有了精神依靠，养家糊口和抚养儿女的重担，骤然落在了她柔弱的女性肩上。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无依无靠的母女靠什么生活？母亲凭着坚强的毅力，凭着勤劳的双手，起早贪黑，替人家洗衣、做饭、打杂工，硬是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女儿，维持这个清贫的家，勉强供女儿上学。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的早逝，母亲的含辛茹苦，使年少的文海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也日渐成熟地担当起长女的责任。她处处为母亲分忧，时时替妹妹着想。虽是文静的女儿家，却起着丈夫、儿子、兄长维系家庭生计、欢乐和排忧解难的主心骨作用。

多灾多难的祖国，飘泊动荡的年代，浑如浦江的上海，生活无法再维持下去了。

那时，文海正在中学读书，眼看因交不起学费而难以为继，她也有心省去这笔费用来减轻母亲的负担，但又舍不得离开校门、离开课堂、离开赋予她知识和智慧的老师。母亲看出了文海的心事，她更懂得昔日“孟母三迁”盼子成才的真谛。“万贯家产不是本，知书达理才是真，千难万难，妈也要咬紧牙关帮你们度过读书这一关”于是，母亲带着两个女儿东奔西走，投亲靠友，辗转回到丈夫的家乡四川成都。

尘世依旧迷离，家境依旧贫寒，母亲依旧劳作，生活依旧艰难。然而，读书，读书，读书！上学，上学，上学！母亲的决心一天都没有变。女儿的苦读一天都没有停。“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文海似乎懂得了这句话所包含的挑战，所寓意的深刻内涵。

在母亲的苦苦支撑和亲友们多方接济下，文海在华英中学一直读到高中，并以勤奋求学的精神、备科优异的成绩，年年获得学校的奖学金。

母亲唯一欣慰的是，女儿们虽没有富家小姐那般锦衣在身、无忧无虑，但个个知书达理，懂得体贴母亲的心，尤其是文海，门门功课是优秀，事事为母亲分忧。让母亲负重的心充满自豪，疲劳的脸上挂满了骄傲。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海从刚强的母亲身上学到了堂堂正正作人，认认真真做事，清清贫贫生活的美德。

母亲是她的第一个老师，是她一生中最敬佩的人。她为儿女们奔波了一

生，劳碌了一生，即使文海后来成了家，立了业，有了自己的女儿，但母亲仍然是她的倚靠，仍然是她的帮手。帮她操持家务，助她教育子女，为她排忧解难。尽管在外廖文海是偌大一个医院的当家人。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回到家里依然是母亲的女儿，仍然得到母亲慈爱的呵护。“文海，累了吧，快歇歇！”“文海，该吃饭了。”……

在母亲眼里，女儿永远是长不大的；在女儿眼里，母亲永远是保护神，她们相依为命，很少分离。1992年，母亲告别了往日的艰辛，留下了不朽的母爱，猝然长辞。坚强的文海哭了，哭得很伤心。她，离不开母亲，离不开母爱，离不开悠悠慈母情。

……

滔滔长江，母亲河养育了她。

人民军队，钢铁营盘锤炼了她，

1950年，美国政府悍然发动侵朝战争，朝鲜半岛战火弥漫，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侵略者的严重威胁。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奔赴朝鲜战场，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这勇往直前的歌声，犹如祖国的召唤，母亲的催促！十六岁的廖文海坐不住了。

她没有来得及同母亲商量，在学校自告奋勇就报了名。仅仅在几天前，她还思量着组织学生会的同学排练节目，为毕业联欢晚会作准备。这一刻全让萦绕心头的那支歌冲淡了。“去当兵，去扛枪，到军营闯一闯，到战场闯一闯，当一回今日花木兰！”

回到家里，她滔滔不绝地跟母亲和妹妹说着人们争相抗美援朝的情形，说着同学们群情激昂的情景，说着男儿女儿争先恐后报名上前线的情景。

母亲听着听着，脸上流露出了既兴奋又担忧的神情。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女儿是有主见的，一旦决定了的事情，她总是义无反顾，一作到底！女儿是对的。

果不出母亲的意料，那一年，华英中学参军的三个女生，有一个就是她心爱的十六岁的女儿廖文海。

廖文海就要走了，她的班主任老师特意赶来送她，这是她最得意的一个学生。文海的文学素养和她的好学风，还有她的求学精神，都为她敞开了未来大学的门，弃学从军，实在可惜。面对老师表现出的刻意劝阻之意，廖文海没有说一句话。

告别母亲，告别学校，告别老师和同学，廖文海的心里沉淀着说不出的滋味。然而，穿军装，到军营，上战场，服从祖国母亲的挑选和召唤，更使她百感交集，激动不已。

就这样，带着十六岁的多梦时节，带着对军营的神秘向往，带着母亲、老师和同学依依不舍的目光，她走出了中国女兵的第一步，走向人生的重大转折，走进转战南北的戎马生涯。这一走，就是四十五年，近半个世纪呵！

随后，组织上送廖文海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完成了六年医大的勤耕苦读。在那里她学到了支撑事业的知识，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为承担一个革命军人和医务工作者的义务奠定了基础。

在那里，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深深地懂得，是党和人民军队给予了她不曾有过的一切。在那里，她决心成为无愧新中国、无愧人民军队

的合格女军人。她将用自己的青春和奉献，走上人生之路的新起点。

“ 在我的一生中，最神圣的时刻，是为病人解除痛苦。最幸福的时刻，是为病人解除了痛苦。为造福人民而投身医学科学事业，是我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

1956年，廖文海度过了在沈阳医科大学的最后一个冬天，怀着毕业后对未来无限美好的憧憬和献身国防医学事业的坚定信念，走上了军医的工作岗位。

作为新中国早期培养的医科大学生，她极珍视能在晴朗的天空下自由呼吸的日子。当她接收的第一个病人向她投来求助的目光时，尽管她知道六年的医科大学生活已经给了她为病人服务的知识，但是，当真正面对病人，她还是感到了自己内心的紧张。

“ 这是一个生命的相托啊！如果由于自己对他们病情了解得不够，不能制止忽然发生的紧急情况，那我就愧对这鲜活的生命了…… ”

这不是童年时，母亲牵着她的手初尝人生，也不是在学校和同学嘻闹着欢度时光，也不是在老师的指点下一点点吸收医学知识。而是面对灾难或死神的挑战。世界像一扇敞开的门，把一道道尖锐的医学难题，一古脑地推在了她的面前。

身边没有亲人，但她的精神深处并不觉得孤独，她的脑海里，整天都被病人、病情、病案塞得满满的。有时，她真的觉得自己孱弱的肩膀承担不了使命给她的这付沉重的担子。可是，给伤病员忙这忙那之后，她并不觉得自己累得慌，倒是一想到伤病员出院时欢欣的脸，一想到康复后的伤病员重返部队，她觉得自己比那些伤病人员还高兴。

当某一天，她忽然意识到喜爱的文学书籍在箱底蒙尘，医学书籍被翻得卷了角，闭上眼睛，一个个康复的病人竟像是老朋友一般地从她眼前走过，她心里竟生出些许甜甜的滋味，悄然间，病人就这么走进了她的事业。

在重庆第七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第二年，廖文海被信任地提升为助教。打那以后，她就负有了双重的责任：作为医生，她要医治伤病员；作为教员，她要教书育人。属于个人的时间更少了，给予事业的时间更多了，对于自己更苛刻了，对别人更舍得了。由此，她感到了一种幸福和满足。

临床实践中，她要求学员更要求自己不只满足于加深对书本上关于种种疾病的概念认识，而是透过来自病人切肤的病痛，真正地关心病人的健康和健康带给一个病人今后的幸福生活。

从那时起，廖文海便学会了透过一名医务工作者职业劳累的表象去认识生命的激情，而不只是认识医务工作在众多职业中的优劣。我相信，正是缘于对责任有了这样一种执著的理解，在廖文海近四十年的医学生涯中，她把自己的学识、才华、爱心，全部奉献给了一个又一个患者。部队的官兵称赞她是位好医生，农村的大妈拉着她的手涕泣连连：“好闺女，我这把老骨头是你救下的。”物换星移，几度春秋，廖文海始终孜孜以求，并乐此不倦。

1964年8月，廖文海告别了那些已经熟悉的病人，调入到解放军总医院。对病人的爱和对事业的投入，即使成了家、做了母亲也没有丝毫改变。

她和丈夫都有自己的事业，家务全部甩给了母亲。垂青事业的人同样得到事业的青睐，二十八岁她就挑起了主治军医的担子，三十六岁成为科室副主任，是总医院里她那一拨崭露头角的医生之一。

1970年，她从普通病房调入保健病房工作，先后担任科室副主任、南楼临床部副主任。岗位的重要标志着责任的重大。她所在的科有三个病房，以呼吸疾病为主，重病人多，肺心病多，晚期癌症病人多，许多病人是从全国各地来到三一医院的危重患者，医疗任务十分繁重。

每天清晨，她脚步匆匆第一个赶到病房，走过每一位患者的病床，看看病情有什么变化，然后和上班的同志一起参加早交班，开始一天的工作。夜晚，当她确信病人可能不会再有什么问题，才放心地离去。遇上三个病房轮番抢救，尽管家在十米开外，也是近在咫尺不回家。

有那么一次，病房里一下子有七个病人作了气管切开，九台呼吸机同时运转，她把自己一天24小时都拴在病房里，一刻也不敢离开。吃饭就在病房，困了就在办公室里打个盹。连续不断的紧张工作，终于支持不住，得了呼吸道感染，高烧、咳嗽。就这样她也丢不下病人，一边打针吃药，一边主持抢救。极其疼爱她的母亲也劝她注意点自己的身体，她答应着母亲，可遇到这样的情况，还是一切照旧。

她对病人的感情是深厚的，不论是高官要员，还是平民百姓，她都看成是自己的病人，都竭尽全力去救治。病人康复出院，她发自内心地替他们高兴，如果病人救不过来，她会痛惜地暗自垂泪……

谁都不会否认，付出是为了新的拥有。每个人对此都会有自己的理解。了解廖文海的人都知道，为了病人，她也像每一个认真负责的医护人员一样，几乎付出了一切，这在一个以帮助病人为最终目的的职业里，确实是一种事实。就我所知道的，有人虽然付出了代价，甚至是拖垮了身体的代价，但吃亏的情绪也随着付出的多少而滋长，也有的人为了平衡曾经有过的付出，权以付出时的同样心情向社会、向病人，事实上是向自己的职业索求，这样的事并不鲜见。

廖文海认为，承担责任，不仅仅是承受与责任相伴的权力和义务，这里面包含着人生各种各样的难题甚至是痛苦和各种尴尬，更是突破个人局限的付出。对她的这种观点，了解她的人都抱着深深的敬意。

一次会诊会上，专家们对一个七十八岁的肺心病人的治疗，意见很不一致。

有的很担心：“这么大的年龄，这么长的病史，恐怕愈后很差。”

有的囿于设备不够：“没有呼吸机，光用药很难解决问题。”有的干脆说：“我们已经尽了所能，怕是没有回天之力了。”

主持会议的廖文海没有失去信心，她鼓励大家：“呼吸机不够，我们想办法去借。病人不管有多大年龄，只要有一线治愈的希望，我们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病人是一位离休老干部，患病多年，老伴已去世，子女一个都不在身边，形单影只。在他住院期间，廖文海与病房的医护人员对老人给予了格外的关照。

这天深夜，病人都已沉沉入睡，墙上的挂钟指向十二点。炊事员送来了夜班饭，还没离开病房的廖文海和值班的医护人员正准备用餐。突然，从老人的病房中传出“啊——”的一声大叫，伴着死亡的恐惧。医生护士急跑去

一看，病人呼吸心跳骤停。一位护士赶紧给病人做心内注射，另一位用力地捏“皮球”，往气管里送氧，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气囊有问题？”及时赶到的廖文海提醒大家。

一查看，果然是呼吸机气囊脱落了。迅速调整后，病人暗淡的脸色逐渐有了生机。

当老人在外地工作的子女赶到医院时，看到孤伶伶的老父亲在这里得到精心的救治，感动地对医护人员说：“太谢谢你们了，我父亲能有今天，全靠你们的悉心关照。”

医者与患者之间总是矛盾的，在这对矛盾中，医者总是要充当自我调节的角色，从而达到沟通与理解。在这一点上，廖文海总是处理得得心应手，恰到好处。众多的病人总是在住院或出院的时候很动感情地谈到她。

在她的身上，他们看到了一个医务工作者的可贵之处，那就是理解、真诚、无私和奉献。

廖文海升任副院长后，依然常年巡视在病房，仔细了解每个患者的情况。有一位被诊断为肺癌的海军干部被送进医院抢救，她通过对病人病情的细致观察，对原有的诊断有些疑虑。强烈的责任心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促使她对患者半尺厚的病案进行了详细的查看，最后推翻了肺癌的诊断，确诊为肺炎。

医疗小组重新制定治疗方案后，经过一个月的医治，病人就康复出院了。

对于一个医生来说，看病治病，救死扶伤，要靠诊断的正确，要靠治疗的及时，要靠医术的高明，更要靠对人的尊重，靠职业道德所包含的高度责任感。人命关天哪！对医生职业负责，对病人负责，就是对病人生命负责，我们只能也必须作出这样的回答和选择。这是廖文海的内心独白，也是她作为一名医生的道德准则。

“从医院管理者的一个配角，到
医院管理者的一个主角，我抱定两条：
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舍
此别无捷径。”

人逢喜事精神爽。

1990年的春节前夕，沉浸在辞旧迎新、欢乐祥和气氛中的总医院欣逢她有史以来产生的又一个第一。人们忘记了严冬的寒冷，显得格外喜气洋洋。能容纳数百人的小礼堂里谈笑风生，热气腾腾。院领导、专家教授、科主任、机关干部聚集一堂，等候总部首长的到来，等候首长们宣布中央军委签署的总医院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命令。

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始终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而由谁担当一届班子的核心人物就犹如人们关注一台好戏由谁唱主角，成为上上下下关心的焦点。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这是医疗活动中的经验之谈，“三分医院七分管理”则是现代医学管理的题中要意。看病难、吃药难、住院难，人们对此有太多的感叹和怨气。然而，治医难、治院难、高效益的管理医院更难，得心应手地管理总医院难乎其难，这一点，恐怕没有太多的人亲知、深知。

地面高楼林立，地下管道纵横，院门四通八达，人车川流不息，医院的

大门必须保证二十四小时敞开。有人作过统计，三〇一总医院每天平均进出机动车辆数千台次，各种人力车逾千辆，流动人员上万人次，更何况兼有众所周知的重大使命和责任。毫无疑问，稍有疏忽，意味着漏洞难以预料；偶有不慎，意味着影响无可挽回；出了差错，意味着后果不堪设想。

唯其如此，总医院领导班子的更替，尤其带动这个班子运转轴心的确定，就不仅关系到总医院现在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建设，更关系到统率机关、驻京部队，乃至全军官兵的就医质量的保证。

总医院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证明，必须要有一个好班子，强班子；总医院班子建设的记载表明，必须要有一个好轴心，好领班。人们期待着新的一届领导班子带出总医院前进的新步伐，发展的新形象，建设的新成就。

总部首长庄重宣布：中央军委任命总医院副院长廖文海为总医院院长。

祝贺的掌声热烈而真诚。为总医院的未来，也为廖文海院长的现在。

此时，端坐在主席台上的廖文海，已没有了初任副院长时的惴惴不安，而是显示出老练、沉稳和自信的神态，六年领导岗位的锻炼，她增添了几分冷静和持重。掌声中分明包含着一种期望，一种份量，一种责任。她感到肩上的担子加重了。

“我高兴地接受这项任命，不仅是作为一个党员，党叫干啥就干啥；也不仅是作为一名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还因为我对总医院很热爱。在总医院工作几十年，和同志们朝夕相处，对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一切，我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珍惜能为她多做工作的机会，我愿意为总医院的建设辛劳和奔波，愿意为她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我的心来为她作奉献。”话音刚落，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是大家对新院长的信任。

从这一天起，总医院产生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女院长。她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非凡的经历，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跋涉，只有兢兢业业干出的实绩。

从这一天起，当总医院的医务人员与家人和亲友的交谈中，或是出差旅行的路上，谈起自己工作的医院，谈起自己的院长，话语里自觉不自觉地都透着一种自豪。

从这一天起，“总医院的院长是个女的”、“总医院的院长是个女将军”在军内、在军外、在京城、在京外，被人们热烈的谈论着，议论着。或许是对将军院长的赞叹，或许是对巾帼将军的羡慕，或许是对医院未来的热望。

在管理活动中，她是全身心投入的领导者。在医疗活动中，她又是一个尽可能的参与者。

总医院的运转如同一台结构严谨的医疗器械，必须依靠科学管理这把钥匙的启动，才能运转自如，才能显示它的功能，这是她上任伊始首先想到的。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她和院领导一班人摸索采用了全方位、全时间、全过程、全员额的责任制。为达到逐级监督、层层把关、人人到位、事事做实的初衷，几年来，除了例行公务活动，她没有漏过一次早班会，没有休过一天正常假，没有度过一次轻松节，以至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一天不去病房转一转，心里就很不踏实。”这既是身为总医院院长的特有感慨，也是她就任院长以来的真实写照。

上下一致，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加快发展，建设一流医院，培养一流人才，提供一流服务。这是她上任伊始所精心谋求的。为此，她问计专家、教授和普通官兵，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制定医院发展的长远规划，以宏伟的目标激励总医院人以院为家；她倡导大兴科研之风，多方开发科研项目，

专项资助成果转化，以发展的后劲促进总医院人快出成果，出好成果；她动员老一代医学权威为青年的成长，扶持新一代有心人出国深造，以合理的政策调动总医院人竞相成才。她舍得投资改善现有医疗设施设备，舍得投资改善居住条件，以硬件建设年年有改观的新气象，激发总医院人自力更生。

医院建设的大事，医务管理的大块，医疗活动的大头，是她上任伊始十分投入、抓住不放的。为了敏感医区的绝对安全，她常常食不甘味，夜不成眠，有时连续几天在病房昼夜坚守。门诊楼里有她不停的脚步；住院区有她不息的身影；家属院里有她不眠的牵挂。除了开会、会客和规定的学习时间“办公室里找院长，十次敲门九次空”。总医院的管理者，既是运筹帷幄的指挥员，又是身在一线的“管理员”。

“铃——铃——”紧急电话打到院长值班室。“XX 首长胸疼、低烧，没查出原因，请速派专家会诊。”

“请放心，我马上带专家赶到。”

放下电话，她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和人员做好一切接诊准备，拿起白大褂，迅速走出办公室。

这是廖文海上任不久，遇到的一次事关重大的医疗抢救。

半个小时后，这位特殊病人被径直接进了医院放射科。X 片显示，食道内异物嵌顿，位置很深。

会诊中，专家们各抒己见。

“手术安全些，但是会给病人造成伤害。”有人这么说。

“用内窥镜取，顺利则罢，弄不好会划伤血管，引起大出血。”

……沉默中，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院长。在这平时，下决心并不难，可今天不同。国家刚刚度过了一个非常时期，好不容易有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此时此刻，万一医疗上出了问题……廖文海掂得出这一板的份量，她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作为院长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纤维内窥镜下取，操作要轻、准、稳，一定要保证成功。”充分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后，她果断地拍板。

医院最好的内窥镜专家张子其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各个部门做好了一切应急准备。首长们、院领导、各路专家都等在治疗现场，目不转睛地盯住电视显示器的屏幕。只见张子其屏住气，沉着镇静地将导管轻轻顺进病人的食道。好，准确无误地钳住了异物。这是一根横在那里的坚硬骨刺，强行取出会造成划伤，很危险。张子其娴熟地旋转角度，使异物形成纵向，几分钟后，顺利地取了出来，人们收紧的心终于放下了。一直陪伴在侧的一位高级领导人眼里涌出了泪花，激动地对在场的院领导和医务人员说，“太感谢你们了，感谢解放军总医院。”

首长的身体很快得到康复。这次成功的医疗抢救使医院经受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考验，也充分显示了这位女院长组织指挥重大医疗抢救的魄力。

三 一的威信大增，在患者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了。有位首长无论在哪生了病，一定要回北京，到三 一医治。他说：“到了三 一，我就放心了。”

老将军、政协副主席洪学智手术出院后，给院长、政委写来了感谢信。信中说：“在我住院期间，总医院的领导有关专家及医护人员认真负责，密切配合，精心操作，细心护理，使我很快恢复了健康，非常感谢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

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在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中，这样表达他对医务人员的真诚谢意：“尊敬的服务员、护士、医生、主任、教授同志，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请接受我——一个多次来医院经常得到您护理、治疗的老兵的衷心感谢！您热情的服务，周到的关照，良好的医德，忘我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和我的亲属。我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崇敬之意。经过三思，还是送上一点苹果、山里红和柑桔。香甜的苹果，标志着故乡的深情；红红的山楂，标志着沂蒙山人对我军的鱼水情深；黄橙橙的柑桔，祝您家庭生活过得甜甜蜜蜜。谢谢同志们！”

在这里，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洋溢着一种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这种友谊是跨越国界的。越南老一辈革命家黄文欢初来中国就医的时候，曾在廖文海的具体指导下治病，十三年时间里，中国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照料。黄文欢的亲属遵照黄文欢的遗嘱，用金纸绣了四个闪闪的大字：“恩深情长”。

作为院长，廖文海关注的不仅有高官显贵，那些普普通通的患者也同样挂在她的心上。

车祸造成严重脱套伤的年轻姑娘崔文莉；胆管癌术后合并多种疾病的上校团长；因难产休克的产妇；……

这些危重病人的情况她每天都要过问，指示医护人员尽一切努力积极设法救治。

“从病人的需要出发”这是流传在医务界一句很普通的话，然而，要真正做到，并不容易。

从全国各地而来，集中在总医院这个红十字下的人们，各有着不同程度的救人的绝技和出色的服务本领。他们敢袒诚地向廖文海说出自己的观点，在任何时间内跟她谈论病人的话题，非正式的场合与廖文海相遇时，也愿意献上一句朋友间的真诚祝福。

总医院人理解她，是因为他们相信她是真的在为这个大集体着想，真的用心在为这个集体服务。不错，国家给了她一个承担责任的重要岗位，她对这份责任的理解，是一往情深的付出，不要拥有，不要权利带给她足以影响党在群众中威信的那些东西。

除去繁忙的医疗组织工作，她心中还时刻装着医院的建设规划，宏伟蓝图。看准了的，从不瞻前顾后，说干就干。

至今，总医院的主要医疗用房还是五六十年代修建的，低矮陈旧的老式建筑，早已不能适应医院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盖一座现代化医疗大楼的动议几年前就在医院领导层中间酝酿，规划方案也几经论证。廖文海走马上任时，拿出可行性方案已迫在眉睫。但是出于不同的考虑，决策层中间意见始终有分歧。有的主张，“拆老门诊楼，在原址起楼，好盖。”有的主张，“工程分两期，先拆一部分盖一部分。”

院长、政委考虑得更多。老门诊楼内有不少医技科室和实验室，全部拆掉会影响医疗工作，科研攻关也会严重受挫。工程分期拖得太长，资金和时间都承受不起。两位领导统一意见后，办公会上，廖文海首先表态：“我们医院的工作一天也不能停，医疗、保健、教学，科研工作一天也不能耽误。医疗大楼要上马，工作还要保证照常运转。如果因为盖大楼而停止了工作，这个楼盖起来也不合算。我看拆掉办公楼，利用办公楼原址和老门诊楼后面的空地盖医疗大楼，这个方案可行。”

一些同志表示不同意见。“北京这么多家医院盖医疗楼，那家不影响工

作，何况咱们又不是平地起楼。再说机关办公怎么办？”

“机关可以分散办公，院办到南楼，医务部到仪器中心，政治部到礼堂，院务部分散到各处。虽然机关艰苦点，但主要工作不会受影响。”医疗大楼关系到医院未来的发展，受到医院上下的普遍关注，建筑方案应该尽可能让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最终接受了拆办公楼的方案。如今，这座壮观的、高六十米、地面十四层、建筑面积五万多平米、通体乳白色的现代化医疗大楼已经拔地而起，昭示着总医院的未来。望着建筑工地上日新月异的变化。廖文海怎能不心潮起伏……

作为女院长，她不缺少魄力和勇气。她的快节奏的工作方法，常常使部下叫“苦”。谁要是跟不上她的节奏准得挨克：“你们都喊累，这种工作态度行吗？”可部下生病住院，她总要亲自去床旁看望，不失女院长的细心和体贴。

“人才，谱写了总医院昨天的历史，人才，维系着总医院今天的建设，人才，关系到总医院未来的发展。在向高科技进军激烈竞争的当今世界，得人才者得天下。”

设擂求贤，公平竞争。总医院推动年轻优秀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一大创举。

科学文化中心二层，容纳三百人的学术厅内座无虚席，气氛紧张而热烈。总医院破格晋升高级技术职务“擂台赛”，人们叫做第一回合，在这里摆开了战场，拉开了帷幕。

台上，年轻的学子精神抖擞，轮番“亮相”。

台下，以姜泗长教授为代表的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们，用中英文交替着不时地向台上的年轻人一次又一次地发问，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被考者胸有成竹，主考者成竹在胸。或对答如流，或频频点头，或若有所失，或淡淡一笑。不论是百问不倒，还是受阻考场，人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报以鼓励和期待，带头鼓掌的就是廖文海将军。她和几位院领导、业务部门的主管、人事部门的负责人，端坐在台下另一侧，专注的神情，期盼的目光，不是考官胜似考官，不是评委胜似评委。这场景，谁能说不是群英会、点将台呢？

“人才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才开发是最终的开发，人才富有是最大的富有，人才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这是廖院长的口头禅。走上院长的领导岗位以来，爱才、惜才、育才、用才，她是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的话题。人才队伍的建设，始终挂在她的心上。

1986年她担任医院职称改革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后，在党委的大力支持下，倡导各级评委在职称评审中打破论资排辈的弊端，形成人才竞争的局面。担任院长职务后，更是大力支持开明专家在人才问题上，要求公开竞争公平竞争的建议。1991年，总医院率先推出了在高级职务和破格晋升中实行公开答辩的形式，设擂求贤。

有人说：“廖院长格外偏爱科技人才。科室里的技术骨干她知道的一清二楚，机关干部她可就认不全了。”

廖院长说：“说这话的同志虽然只对了一半，但是我要给他打满分，因为我一向十分关注科技干部的队伍建设，这是实情。机关有的年轻干部年轻的面孔，我可能不大熟悉也是实情。”她爱才，爱所有的青年人才。看到年轻人渴望成才，孜孜以求，她的脸上堆满欣慰；看到急起直追、后来居上者，她比谁都高兴；看到求师学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她总是第一个带头鼓掌。

“稳稳神，别紧张，要落落大方，沉着应答……”每次公开答辩前，她总要给参加擂台的年轻人打气、鼓劲、加油。每当她看到年轻人轻松自如地走上讲台，她仿佛觉得那就是自己走向年轻人的讲台。每当擂台上的年轻人表现出些微的紧张，她的心里也骤然紧张起来。

她总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参加擂台赛的活动，与年轻人保持学术上的平等，总是给年轻人从精神上助一臂之力，给予长者的关怀和爱护。将军和学者之间、领导和部属之间、长者和少者之间，一条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纽带把他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肾科主任陈香美，一位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1987年回国，来到总医院工作的莘莘学子。她有着深厚的肾科学术功底，有着强烈的报国热情，有着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廖院长和院领导理解她的心情，赞扬她的精神，支持她的工作，想方设法为她创造提高肾科学术水平的条件。有人以为，她那股废寝忘食的工作热情，锲而不舍的钻研劲头，是为了对得起东洋留学，对得起异国导师。但她的回答朴实而真诚：“没有廖院长和院领导铺路搭桥，就没有总医院肾科医学的长足发展，为了信任，为了事业，我们一定要使肾科医学水平走出总医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在她的领衔下，总医院肾科学术水平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那一年，她的科室有八篇论文被国际肾病学术会议选中，四名年轻医生同时被邀请参加在以色列召开的肾病学会。为了保证这支年轻的肾病劲旅按时出席会议，对方邀请全员参加会议并寄来了往返机票。于是，这个科室经院领导的特许，在她的科主任、主治医师、教授陈香美的率领下，全员参加了这次耶路撒冷学术会议。对此，廖文海院长、梁国章政委欣喜异常，把这看成是医院的一大荣誉，他们热情鼓励陈香美：“你们大胆地干，往前拼，希望在你们身上，希望在人才身上。”

“拼命三郎！”总医院人这样称呼放射科张金山博士。是他，率先采用介入放射高新技术 TIPSS 治疗肝癌，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为了实现这一夙愿，他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常常是喝一口开水、啃一口面包，通宵达旦地求证论述。查找的资料，论证的反复，牺牲的时间，是无法用数据统计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前不久，他带着院领导的关怀，带着总医院的荣誉，带着中国军医的自豪，应邀飞抵大洋彼岸，赴美国介入放射中心为其讲学，进行学术交流。

李求博士，总医院免疫实验室年轻的研究员。在从走上医学研究之路的这一天起，他认定科研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容不得半点的虚伪和不实。他的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科研作风，如同他的名字实事“求是”。在这种求是精神的作用下，免疫调节剂“本草九代”的研究已经初露端倪。正是为了激励这种科学研究的求是精神，廖文海院长欣然决定，从院长基金中拨款十万元鼎力支持这项进行中的实验。

杨庭树，一位业务拔尖颇有潜力的年轻医生，高评委们一致通过他晋升高级技术职务。但是名单报到上级主管部门，因为他的短学制学历而未获批

准。院长廖文海、政委梁国章对这件事及时给予关注，一面责成有关部门向上级请示，一面亲自找总部机关为他争取名额。为此，杨庭树表示：“院领导对我的关心尽了最大的努力，即便晋升高级技术职务暂时通不过，我也感到与通过这次评定具有相同的意义。”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体谅组织、正确对待个人名利的豁达心胸。

盖鲁粤，心内科博士研究生。他曾是一个“新闻人物”在全院上下引起过轰动，因为院党委破例将他由主治医师晋升为主任医师。他的突出成就属于单项冒尖，在冠状动脉溶栓治疗方面成绩显著，前后五年，他主持的心肌梗塞抢救小组群策群力，千方百计，搜集各种新信息，应用各种新技术，采用各种新手段，成功地抢救了四百多例濒临死亡的患者，被众多的患者誉为“妙手回春”。靠技术“争”职级，凭实绩“抢”晋升，上下服气，无可非议，大多缘此而来。

凡此种种，在总医院公平竞争、脱颖而出的舞台上，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一批批年轻学子的成长，一茬茬青年人才的倍出，无不展现出廖文海和院领导匠心独运，无不渗透着老一辈专家教授的心血，无不伴随着总医院发展前进的步伐。

对科技人才，廖文海他们备加爱护；对青年人的成长，他们也给予同样的希望。共青团的活动她不请自到；青年人的联欢，她逢请必到；团委会的工作，她定期听取汇报；配备团委班子，她配合过问入选。在院长、政委的关怀和支持下，总医院的青年工作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热情和勃勃生机。

在团委组织的座谈会上，她和政委与青年们对面而坐，侃侃而谈，倾听大家的呼声。凡是建设性意见和颇有道理的建议，往往能得到及时的反馈或满意的解决，集体宿舍的种种不便早已引得姑娘小伙儿怨声载道，有人站起来直言。言者有意，闻者有心。不出半个月，人们发现集体宿舍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安装了公用电话，配发了清洁工具，统一安了窗帘，女宿舍里还布置了一间会客室，俱乐部开放了电视房，大院修建了自行车棚……

青年们欣喜地议论：“院领导对咱们的呼声，听得真心实意，做得实实在在。”

总医院这两年竣工了两栋小单元楼，几百对年轻人欢天喜地地搬进了新居。这是为解决已婚青年们的住房困难，优先为他们修建的。

假若把解放军总医院比作一个充满智慧、站在医学峰巅的人，那么廖文海的胆魄和才识，是早已溶进这个人血液中使这个人朝气蓬勃的氧分子，氧分子是靠燃烧自己化出热量的。

一个平常的秋日午后，消化科的医护人员正在开座谈会，会议开始前，大家都在朗朗议论着一些热门话题。门开了，廖文海走了进来并很自然地在其中的一个座位坐下。她的到来，使整个学习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几个坐在她旁边的人还悄悄地向外搬了搬椅子，往日科室医护人员学习时特有的朗朗亲昵，被一阵疑惑替代了：“是不是科里出了什么问题，怎么院长到我们科里来了？”

廖文海显然感受到了这个氛围，她笑了：“机关把我和政委派到两个大科，他去了外科，我到了这里。应该说我很高兴，能和消化科的同志坐在一起学习，这个机会太难得了。”那几个想远远避开院长的人又悄悄地把椅子搬回到原处。我相信这悄然地一挪，已经代表人们说明了什么。显然，外部

职位的不断升华没有改变廖文海内心的东西。

奉献者是要有情怀的，恐怕要扔掉好多东西才能窥视这两个普通的字眼。她的生命艳丽的颜色不在于她的拥有权势，在于她把自己看得很平凡，她为一个患者的康复高兴，为哪位不幸的病者感伤，为总医院人才的交流想得睡不着觉，正是她眼中那些平平凡凡的小事，构成了她的蓬勃的生命世界。由此，人们更感觉到生命的美丽。奉献者的美丽。

和青年人交朋友，即使参加一次活动，参与一次座谈，结识一个新的青年朋友，都是寓重大主题于平凡之中。了解青年，引导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人成长立业导向指路。

几年中，总医院涌现出功底深厚，颇具成就，在国内外小有名气的一批优秀青年医生。其中通过公开答辩获得破格晋升的不乏其人，此一举，在军内外医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把医院未来发展的重担压在青年人身上，总医院的这一着棋，不仅走活了现在，也必将要走活将来。廖院长和一班人为此谋划：“拓宽渠道，引进人才；科研招标，发现人才；尊师敬贤，培养人才；重点倾斜，扶持人才。完善政策，留任人才”。专家教授为此欣慰，“照着爱才、惜才、育才、用才这条路子走下去，总医院大有希望。”年轻人为之欣喜：“在总医院这个环境里，成才有希望，有才有用场，发才有前景，干他一辈子也心甘情愿。”

这一切，预示着总医院这块医学人才园地永远是春天。标志着总医院的人才培养工程必将人才倍出，昭示着总医院的建设必将一步一个新台阶。人们翘首以待那个不远的将来。

“来总医院看病投医的人，总是
满怀最大期望而来，因为这是总医院。
在总医院工作的人，应该做出不负众
望的最大努力，因为你是总医院人。”

一诊一治总关病，一言一行都关“总”。

打算到总医院看病的人，大多抱着这样的心情：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有最高明的治病医生，有最佳疗效的治病药物，有最优良的服务质量。他们都冲着“总”字。

在总医院工作的人，大多有这样一种感受：总是处于最严格的制度约束之中，总是处于最繁忙的紧张状态，总是处于最严谨的逐级管理，总是受到最广泛的“评头品足”。他们都受着一个“总”字的压力。

廖文海院长说，“作为总医院人，思想上要有一个总字的概念，建设上要有总字的标准，服务上要有总字的作风，治疗上要有总字的质量。照总字去作，就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有最高标准和要求；为总字争光，就不仅是为总医院争光，也是为医学界，为全军争光；对总字负责，就是对全军负责，对全国人民负责。”

按照这样的客观要求和良好愿望，总医院人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为之忙碌，为之建设，为之奋斗。

为争取建设医疗大楼和落实医疗大楼的资金，她多次找总后领导甚至军委首长“游说”；为了使军医进修学院列入全军院校编制序列，她找了军委张震副主席；为手下人的出国深造、晋升；为医院的建设、发展……该找的，

她都去找。而这些多次开口得来的利益，没有一项是专门为了她个人私利的。当有一天，她从院长位置上退下来，来这里看病的人会记住总医院，会为总医院能为每一位病人提供如此良好的治病环境而宽慰。

这正是让廖文海高兴的。

廖文海曾如此坦诚地说自己：“我是个很普通的人，我相信生活中有阴影的存在，但是我不喜欢只站在阴影中去责备别人的人。既然是坦诚地活在世间，就应该站在光明中，用行为努力驱散生活中的阴影。”这让我又想起“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老话，由此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当组织上把职称评定的工作交给她时，她首先给党委打了一个前提是不给自己调级的报告；理解了她在为什么在领导岗位这么多年的时间里，竟苛刻地不给自己安排一次外出疗养的机会。

主动给自己提出来不晋级，谁也没有把这看成是她故意做出的一种姿态，故意做出姿态的人是要回报的，她没有。她的宁让不争的境界，让所有的在职称评定中争的人面红不语。

放弃外出疗养的机会并不是她不想去，很多人也劝她：“趁着你现在在位，赶紧出去玩一玩，下了台，就什么都不方便了。”她没有去，她不想拿医院的利益来补偿给她个人。

她很赞同孟子的那句话“吾日三省吾身”，事实上她就是这么做的。她并不愿意自己比同年资的同学低一级，也不愿意家人总是埋怨她为了工作不给家人多少时间，但是党和国家把一个这么重的担子压在她的身上，她觉得只有把自己最坦荡的人生回报给国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得起作为一个人的一生。

她对部下是严厉的，工作没做好，该批评就批评，不讲情面。她的严厉也是相当出名的。她自称自己“厌恶对工作不尽责任的人。”无心真正承担责任的人，在她面前是要折腰的。但是对她个人有什么恩怨，她从不计较。一位与她同年资的科主任，出于妒忌，常在言谈话语中抵毁她，对此她确实很生气。但是，在讨论这位科主任调级、出国等问题上，她都出以公心，从不掺进个人感情。在其他同志提出不同意见时，她还主动为这位科主任说话，表现了宽广大度的胸怀。院领导一班人，有比她资历者的，有比她年龄大的，还有比她年轻的，她都以诚相待互相尊重。她和政委两个军政一把手，带出了一个上下公认的“团结的干事业的好班子”。

了解她的人都说：“她对部下要求严，对自己更严。”这还不表现在她对自己的任何工作都处在不满足的状态中，也不表现在她给自己技术职称评定设障碍上。

她的女婿是个硕士研究生，毕业那年，看中了总医院生化研究室的工作条件，很想留下来。可是研究室准备要一名博士研究生，两人只能取一。节骨眼上，廖文海说话了，“以工作需要为重，不要考虑谁的关系。”就这样，女婿分配去了其它单位。

她是三个女儿的母亲，丈夫的妻子，母亲的孝女，她爱家里的每一个成员。但是权力在她手中，没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任何额外的东西。孩子们全靠自己的努力读完了大学，走上了工作岗位，很正当地生活。

公家配备给她使用的汽车，除她外出办公外，常常被派作公用，家里人很少搭乘，偶尔因特殊情况用了一下，也照章交费。逢年过节，后勤部门考虑到院领导工作很辛苦，出于关心，主动上门送去一些鲜鱼活鸡，她和其他

院领导不是婉言谢绝，就是通过院办秘书按价付款。她多次在干部会上讲：“我这不是批评谁，该收的钱一定要收。不收，再批评大家，脸上都难看。”

康复的病人送来感谢信，她收下，送来礼物她不收，病人再送，她还是不收，送多少次，她就给你退多少次。

我以为，这些看起来似乎不尽人情的行为，透着一种很真实的东西，至少它说明廖文海不会掩饰她自己，或者说她不愿意掩饰她内心最真实的活动。确实有人很用情地劝过她：“廖院长，现在人都为自己考虑得比较多，你也有下来的一天，某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

对这样的相劝，廖文海将军确实听不进去：“不行。身在其位，必谋其政，既然让我管，我偏要两眼都睁着。”

君不见有多少事实，证明不少的人打着承担责任的幌子，滋润着个人利益的影子。当某些人的行为危害了病人的利益或医院的利益，廖文海身上带有的足以让这些损公肥私者难堪的锋芒，令损公肥私者如坐针毡。

她是位喜欢用行动表达自己意志的人，也希望更多的人把建设国家的话落实到行动上。有些出了国的人，回国后除了宣扬国外如何好如何好，就只有一句话：“咳，中国就是不行……”对这样的人，廖文海是瞧不起的。

出国是为了学习，找出自己与他人的差距，不是让你自己瞧不起自己的。她反复强调一个观点：“领导就是服务。”她认为，在服务工作中，纵然你有十条理论，但十条理论不能有一件是办给群众的，那么十条理论等于零；如果只有一条理论，但依据这一条理论给群众办了十件事，这条理论就是过硬的。

权力在她眼里变成了为他人服务的载体，她用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壮丽的年华去写了一个为他人服务的故事。她信奉“心底无私天地宽”，正是这份认真与负责造就了廖文海的生命景观。

“廖院长，大智若愚。”她的老领导，如今的战友、搭档梁政委这样评价她。

几位院领导坐在一起谈论一个问题，唯独院长廖文海一言不发。政委开玩笑他说：“院长，你这么严肃，我们可不敢说话了。”廖文海一愣：“哦，我在考虑目标管理和效益挂钩的问题。”

一天晚上，廖文海和政委一同来到总后首长家，热情邀请首长出席第二天医院建院四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一进客厅，正赶上电视里播放天气预报，她全然不顾首长迎上前来伸出的手，目不转睛地盯住荧光屏。政委在一旁直纳闷，捅捅她：“哎，你干吗呢？”原来，她注意第二天是不是会下雨，如果下雨，大会该怎么开。

是啊，身为一院之长，需要她考虑的事情是太多太多了。自担任副院长、院长以来的十个寒暑，她不曾休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星期天，更别说休假了。忙累了一整天，晚上本可以放松一下，可她不是到病房看望病人，就是打电话找处长，主任们了解一天来的医疗抢救和行政安全方面的情况。她一再对部下说：“有什么事情，无论白天、晚上一定要及时向我报告，不要怕影响我休息。”

忙！忙！忙！

多少个日日夜夜，这个字眼就是她工作的最直接的写照。

回顾过去，廖文海知道唯有用实干不断改变总医院的面貌，才是她“为官一任对四方的造福”。

四十年前，红军直属医院最早的医务工作者在一片乱坟堆上树起一个鲜亮的红十字。从那以后，一任一任的总医院院长都曾努力地带着众多的医务工作者为这个医院的不断完善而付出心血。接力棒传到廖文海的手中，她觉得自己只有用实干使这个医院向着更高迈进一层。把全身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中，她还觉得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她希望有二个、三个或者更多的她为这个医院工作。

有人说她是自我苦吃，是自己给自己定的标准太高。但是，如果你的心里也装着总也放不下心的事情，你就知道你总想为这件事多做些什么，使它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从病人的角度出发，一点小小的疏忽，都是不可以被自己原谅的。由此，尽管回过头来觉得自己确实有些和自己过不去的味道，但是也无法更改了。除去工作，她每天还要挤出时间学习，光剪贴的资料就有厚厚的一摞。她说，“不学习就会被时代淘汰啊。”正是她身上存在的不断奋斗的精神让许多年轻人感到自己的苍老。

说起来，她不把自己安排得这么紧张也说得过去，可是她偏偏时常给自己加码，这一切缘于她对总医院的热爱，缘于她对自己总是不满足。

常年的辛劳使这位曾被称作“壮丁”的女院长犯了旧疾，这两年一到冬天就咳嗽气喘。可即使有病住院她也很少能好好休息，稍一见好就出院工作。一次，她的脚趾发炎肿得老高，在同志们的劝说下做了手术，第二天裹着纱布，一瘸一拐地照样来到办公室。

这样工作，岂不是太劳累了？但廖文海觉得值得。她深情他说：“我追求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怎样才能使工作好上加好。快到退休年纪了，我个人无所求，一心只想在有限的时间内为总医院多做一点工作，虽然为她付出了辛劳也心甘情愿。我这样工作换来的是心里的但然是心情的愉快，这足以抵消身体的疲劳。我想一个人是不会为他在事业上的付出而叫苦的。”

清晨，当东方的朝阳冉冉升起，匆匆的上班族汇成一条人海洪流时，廖文海早已抖去了身上的疲倦，精神饱满地坐在椭圆形的会议桌前，等待早交班会的开始，迎接着院长岗位上的新的一天……

“总医院的一切成就，是几代人的艰苦奋斗；这几年取得的成绩，是全院人付出的心血；我在总医院三十二年，只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总医院却给了我许许多多。”

廖文海已经走过的五十多年的人生，有四十五年在军队度过。在这四十五年的戎马生涯中，有三十二年是在总医院。

三十二年，在生命记载的刻度中，是一个惊人的数。

三十二年，在人生的短暂旅途中，是一段漫长的路。

三十二年，在轮回的曲曲折折中，是一首多彩的诗。

三十二年，在知遇的时间空间中，是一条深情的河。

总医院倾注给她深厚的情，她报答给总医院深深的爱。

当年，老一辈总医院人心贴心教她学会这种爱，手把手传授给她这种爱。当她对疑难病例流露出畏难情绪时，一位双鬓银白的老医生不无感慨地对她说：“世间的一切，都是可探可知可操可握的，在浩如烟海的医学科学面前，

每一位医生都可能遇到同一道难题，只是所作的解答不同而已。在这里，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廖文海照着他们的话去做了。啃了一本又一本医学著作，剖析了一个又一个特殊病例，闯过了一道又一道治疗难关。越读越感到自己知道得太少，越钻越觉得医学科学的伟大，越干越体会到医护职业的崇高。

而今，身退二线心还在一线的老专家、老教授们不时提醒他们的女院长，珍惜这种爱，光大这种爱。不时辅助她让年轻人懂得“名利淡如水，事业重于山”。她照着他们的话去做了。召集研究生、博士生座谈，和年轻的护士们交朋友，应邀给团员青年作报告，都离不开公式性的话题：爱青春就是爱事业，爱事业就是爱祖国，只有热爱事业的人，才是有所作为的人。

当年，在她走上科室领导岗位的时候，老主任、老一代科室的学术带头人送给她一句话：热爱科室就是热爱总医院，建设好科室就是建设总医院。她照着他们的话去做了，她与科室骨干一起，分析科里的优势，挖掘业务潜力，探讨上水平的路子，建设有主干课题，有“拳头”项目，有自身特色的科室，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为科室的集体荣誉争光，为科室的建设着想，为科室快出成果想方设法、献计献策的行动上。谁出的主意最好，她就给谁戴红花。谁做的贡献最大，她就让谁上光荣榜。

而今，建设好科室这个基础工程，充分调动科室人员的积极性，使之成为医院建设和发展的关键环节，这是廖院长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靠什么调动积极性？她要求从科室领导到每一个医护人员要爱科室，建科室，要把建科室的业务规划建立在爱科室的思想基础上，要把爱科室的思想基础体现到建科室的具体行动中，建出特色，建出水平，建出效益。现在总医院百十个科室，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类人才来自科室，各项成果出自科室，好主意好课题源于科室，在总医院的学科建设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年，在班子换届新老过渡的那些日子里，老班子的成员最欣慰的是，新院长廖文海差不多是总医院土生土长的，她了解总医院的一点一滴，她熟悉总医院的一楼一房，她热爱总医院的一草一木，她对总医院和总医院人有着深厚的感情。再也没有比这一条更让人感到踏实和放心的了。也正如她“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我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命，是因为我爱总医院……”

而今，她就任这一天已经过去六年，她对总医院的这种爱又经过了六年的深化，经过了六年的巩固，经过了六年的升华，经过了六年的考验。

上级对总医院领导班子的考核证明，她认真地履行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配合党委书记开展工作时，模范带头，严于律己；执行常委会的决定决议时，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克尽职守，一丝不苟；听取他人的意见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个班子里，她保持了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

六年来就任院长的实践证明，在她的带领下，总医院的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科研成果层出不穷，在军内名列前茅，有的在国内市场打响，又走向国际市场；人才队伍与日兴旺，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的脱颖而出，已经在医院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硬件建设年年改观，进口高精尖设备，购买新技术器械，开源创收效益递增，高层楼房拔地而起，院容院貌全面改观，使老一代总医院人的夙愿已经或正在得到实现。

廖文海对总医院深沉的爱，还可以说出许许多多。她对总医院深厚的情还可以说出许许多多……

这种爱，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加深；这份情，随着岁月的脚步还在沿续。

她实现了就任院长时的承诺，她获得了老一代总医院人的赞赏，她取得了同辈人的认同，她赢得全院青年人的爱戴，她更受到广大投医治病者的信任和钦佩。

她的一个成功的信条：“像爱自家一样地爱医院这个大家，像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待病人。”

遥远的泅渡

张悦

1988年9月16日，对洛阳外语学院的副院长胡斐佩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北京，京西宾馆。

当胡斐佩从总参谋长迟浩田上将手中接过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授予的少将军衔证书时，她那双秀丽的充满睿智的眼睛湿润了，双手沉甸甸的。她捧着这张写着她的充满女性化名字的少将证书，像捧着自已五十八个春夏秋冬。

时光快速倒流，那早已逝去的一幕幕竟清晰异常。那个从美国归来的四岁小姑娘娇艳的脸颊似乎伸手可及……

历难更觉痴心贵

1934年秋，上海，虹桥机场。

一对年轻的留洋学子带着4岁的女儿，告别大洋彼岸的美国，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4岁的胡斐佩走下客机的舷梯，展现在她眼前的是东方古老国度陌生的容颜。

她睁大眼睛，惊奇地看着这里的一切。不同的建筑，不同的服饰，还有最使她难以接受而又现实的问题是——不同的语言。

胡斐佩从小学得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却不会说一句国语！回国后，语言的障碍使她一时很难与同龄的小伙伴在一起玩耍，更难以沟通。

语言作为人类相互交际的一种手段，是如此的重要。胡斐佩幼小的心灵中激起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我要学会说国语！

在大学做心理学教授的父亲胡寄南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与妻子俞竹贞一起开始把中文带进女儿的生活，每天教她识十几个字，学说两三句话。

两种语言的交汇，激起了胡斐佩极大的兴趣，一家人常在一起做两种语言互译的有趣游戏。天姿聪颖的胡斐佩很快学会了大量词语。

抗日战争的炮火，打破了她一家回国后在南京国民党军政大学里的宁静生活。

胡斐佩7岁时，南京沦陷了，她的一家加入了逃难的人群，辗转于湖南、四川、湖北、重庆等地。

父亲这位教授“越教越瘦”，家庭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母亲这位留过洋的“太太”，也只能拿起针线，为家人缝衣做鞋，一双弹钢琴的手只能在针线间笨拙的穿梭。

少女时代的花季，胡斐佩是穿着“草鞋”度过的。

八年的基础教育，胡斐佩没有上过一所固定的学校，七年中竟换了八所学校，还有一年是颠簸在逃难的路途上。在寄宿学校里，她穿破了无数双草鞋，头发里经常爬满了虱子。那时生活困难，她学会了与男孩子一起抢饭吃，没有男生有劲，她就想小点子，每次盛饭，第一碗先盛半碗，以最快的速度吃完，赶紧盛第二碗，盛得满满的，再慢慢地吃，生活虽苦一些，但她没有

荒废学业，学习反而更加刻苦用功，老师每讲一门课，她都非常感兴趣，仔细听讲。回到家，便绘声绘色地讲给父母听，书中的故事，她讲得头头是道，一点不差，常常得到家人的夸奖。母亲鼓励她说：“能够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写作的马克思，到 50 岁还坚持学俄文，尽管俄文同他所掌握的几种语言并没有密切的语源关系，学起来很费力，但他征服了困难，半年之后就能阅读俄文文学作品。可见，只要下功夫，世上没有学不会的东西。”胡斐佩对母亲讲的这段话牢记在心，学习从不自满自足，相反，总觉得自己还不如别人，看到有的同学有什么长处她就虚心请教，下功大学习。每当老师讲完课，小伙伴们读一会儿，便一个个丢开书本，溜到教室外面玩耍去了，唯有胡斐佩独自在学，一遍又一遍的高声诵读，直到背得滚瓜烂熟才肯罢休。她孜孜不倦地埋头学习读书，常常忘记饥饿和疲倦。母亲叫她吃饭，常常是饭菜凉了，她还顾不上吃。

山区的小木屋，摇曳的小油灯伴随她读完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她长大了，也慢慢懂事了。有一些事她想不明白，这块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为什么这么落后？她问母亲。母亲告诉她只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就可以过好日子了。为什么要逃难呢？母亲告诉她，因为日本人攻占了中国。为什么我们就打不过人家呢？母亲说，因为人家武器装备比我们先进。为什么天上飞的飞机、海上开的军舰都是外国人的，我们为什么自己不制造呢？母亲说，我们还不会。那为什么不学呢？

一系列的为什么常萦绕在她的脑际，为什么像“洋火”“洋钉”这样的小玩艺我们都不会，又为什么不向国外的先进技术学呢？

抗战胜利后，胡斐佩随父母又回到了上海。心中的许多为什么，在身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小姨那里找到了答案。在外婆家，小姨成了她的“知心朋友”。教她弹钢琴，学唱抗联歌曲，还给她讲了中国近代革命史和许多革命道理。

胡斐佩高中毕业后，在选择上专业的专业时，她想学医。生活的严峻，已经打破了她儿时玫瑰色的梦境。在旧社会，女人的事业几乎是没有什么出路的。她的母亲就是最好的例证。一个出国留学的女性，学成归国后，竟根本不被社会所接受，母亲找不到工作，只能呆在家里当家庭妇女。她发现，在一天天的操劳结束之后，坐在灯下的母亲有种说不出的苦闷和空虚。每当父亲与客人高谈阔论时，母亲总是悄悄地躲在一边，那种寂寞和孤独，在胡斐佩的心灵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有一次，她听到父亲在家中与朋友谈心理和教育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就问母亲：“妈妈，您是教育学专家，您为什么不去工作？”正与姨妈聊天的母亲一时无语，苦笑着看她一眼，把脸扭向一边。姨妈无奈地告诉她，在这个社会里，女人是没有一席之地的。她的家境好一点，请了保姆，但她同样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理想。

不能走她们的老路，胡斐佩想学医。她以为这样将来就可以自食其力，同时也可以为多病的母亲治病。

然而，命运却把她推到了复旦大学英语系。

她的父亲曾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读书时家中经济状况不好，全凭自己的刻苦奋斗。在胡斐佩的家中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要奋斗，就要有真本事。她的外祖父是位基督教徒，在江南小镇上，他第一个剪了长辫子，老人家非常爱国，在学堂、在家里，对民国的现状常有激愤之词。他养育的几个女儿，全同儿子一样对待：不缠足！给予最好的教育，而且要上大学。他要求子女

们刻苦学习，努力奋斗。在美国专攻儿童教育的母亲，也用新观念来教育自己的子女，胡斐佩就是他们现代教育的受益者。

在书声琅琅的校园，她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新知识、新思想的甘露琼浆。多少个霞光初泛的黎明，起床铃还没响，她就到宿舍外吟咏苦读；多少个星光迷朦的夜晚，别人进入了梦乡，她还在灯下做习题。夏季午睡时间长，她干脆掐头去尾挤出时间阅读课文；逢年过节，她更忙得不亦乐乎，阅读、练习、整理学习笔记。为了获得丰富的知识，她经常泡在校园里的图书馆。只要一走进去，她就着了迷，一读就是几小时。她对各种知识都有浓厚的兴趣，不仅学好了各门功课，还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和政治理论书籍，她尤其喜欢读鲁迅的书籍。

置身于知识的海洋，胡斐佩开始慢慢意识到，国家富强了，才不会受人欺压。甲午战争，牺牲了那么多勇敢的爱国将士，还是失败了。那是因为我们的海军舰船落后，又没有及时学习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闭关锁国，不参与国际交流，就不能学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要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就要借助语言这一工具。由此可见，语言不仅是沟通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桥梁，而且是沟通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联络的桥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生存，要发展，首先必须沟通联络，参加国际间的合作交流。

惊人的勤奋和坚韧的毅力，使她的学业节节上进，期中和期末考试年年都得最高分。在复旦学习期间，追求上进的胡斐佩还和校园里的地下党员们走到了一起。18岁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刻起，她的生命开始了新的里程。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胡斐佩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她渴望建立新中国，为新中国的富强奉献自己的力量。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她积极投身革命运动，瞒着父母在统占区搞宣传，运用读书会、文艺演出等形式，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罪行，歌颂解放区，唤醒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积极投入到上海解放运动之中。

新中国刚成立时，各条战线都急需一批外语人才。外交部来到复旦大学外语系招生，胡斐佩入选了，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幅似锦的前程：做翻译，可以经常随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五大洲！当外交官，周游世界，岂不更潇洒！然而，此时部队也来复旦大学招生，百里挑一，她又被首先选中了。

能为建设强大的国防贡献自己的青春，胡斐佩非常兴奋。她告别了父母和弟妹，踏上了奔向北京的列车，开始了向往已久的军旅生涯。

走进沸腾的军营，摆在她面前有两种职业选择：到机关工作或去军事院校执教。组织上征求她的意见，希望她到师资力量薄弱的外语院校去，胡斐佩愉快地服从了。

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外文训练班，她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胡斐佩感到受益一生。

抗美援朝开始后，她与同学们纷纷写申请，表决心，要求上前线，他们提前毕业了。一部分人奔赴朝鲜战场，组织上决定胡斐佩继续留校。

在军委技术部干部学校，她先当干事，辅导新生改造思想，树立基本的革命人生观。这一批学员中后来有七八个都当了将军。1952年胡斐佩开始当助教，教英语。她先后到北京大学西语系、复旦大学外语系进修，回去后继续任教。

1957年她所在的学校更名为解放军外国语文科学校。

1960年学校扩编后，更名为技术工程学校，从北京搬迁到张家口。年仅三十岁的胡斐佩被破格提升为英语二系第四教研室主任，是罗瑞卿总参谋长亲自任命的，也是年龄最小的“主任”。

当时，在她主管的教研室里有二十几名教员，有的比她年长，有的曾是她的老师，还有的是从地方特招来的讲师，她既要组织各项教学活动，还要忙于大量行政事务，她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

初到塞外，首先碰到的是不适应恶劣的环境，白天黑夜，狂风怒吼，飞沙走石，遮天盖地。学院刚刚搬迁，限于条件，冬天无暖气，白天上课晚上休息冻得手脚生疼。当时恰逢六十年代初，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从早到晚，连肚子也填不饱。由于粮食定量少，不够吃。她只好辞退保姆。可是幼儿园只收三岁的孩子，她只好把两岁半的儿子独自放在家中。每天六点试早读时，她和爱人分头到教室，回来后，又忙着做早饭，给儿子穿衣起床。上、下午就让儿子在院里自己玩，每到课间休息时，她便急匆匆跑回家，给孩子喂点水。秋冬季节，下午五点钟天就黑了，儿子靠在紧锁的门边，哭着叫：“妈妈快回来，妈妈快回来。”

每次下班回来，看到儿子这个样子，她忍不住两眼泪汪汪，把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什么话也说不出。

平时，孩子没有饼干吃，她就自己动手做，没有白糖就把甜菜捣碎代替，与仅有的主食莜面、玉米面、高粱面搅和在一起，烤成小饼，看孩子吃得很香，她高兴地哭了。直到现在，胡斐佩也还记得，当时凭票买的一点猪小肠煮的汤，儿子端起小碗，一下子便咕咚咕咚喝了个精光。

国家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而帝国主义仗着强大的国防和雄厚的国力，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为了强我中华，固我长城，她决心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为国防现代化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外语人才的事业中去，立志做一名架设沟通人类语言交流桥梁的工程师！

安得桃李满六州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严家无悍虏，慈母有败子。”

“虽有良剑，不锻砺则不；虽有良弓，不排檠则不正。”

几千年前，中国教育开山大师们这些充满哲理的闪光之语，胡斐佩总是深信不疑。

几十年来，她一直自觉地把这些箴言作为自己治学的座右铭。熟悉她的人都说，胡斐佩从当教员、教研室主任到训练部副部长、学院副院长，只要今天有她的课，你去瞧吧，准没错，每次课前十分钟，她必定准时来到教室，摆好教案，与学生们进行一番轻松的交谈。

上课号一响，她立即到位，开始讲课，从没误过正课时间的分分秒秒，四十年如一日，天天如此。

她就是这么一个十分认真的人，处处以“严师”的标准要求自己。过去，在院校教员中，曾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写本教案熬两年，熬完两年用十年。可是，胡斐佩每年用的教案、讲稿都“面目一新”，从不给学员吃“陈粮旧

米”。

翻开她执教几十年的教案册，一本与一本不一样，年年都有新内容。

她这样解释道：有人把教学比做耕耘，而农民种粮食都十分讲究更换新品种，否则，怎会有来年的大丰收。教书也是这个理，在信息瞬息万变的今天，如果年年套用老教材，怎么能培养出具有现代化意识的跨世纪人才呢？

每年，为了充实新教案内容，她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节假日搜集查阅材料，潜心总结经验，不厌其烦地对教案进行反复修改、充实，直到满意为止。四十几年来，她写的教案、讲稿，堆起来比她的个头还要高！

作为将军教授，胡斐佩将全部心思用在思考如何培养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外语人才上。

她认为，教学中的各个环节，环环相扣，如若稍微忽略了某个关节，必然影响整个教学质量。

平时，她不仅狠抓课堂教学质量，对批改学生作业这一关也把得很“严”。在她担任课程期间，每天都要批阅几十本学员作业，几乎天天熬到深夜。

她批改作业，非常仔细较真，细心到每一道题，每一个答案。对回答不正确的，不是简单地打上“×”号了事，而是写出一长串评语，指出这道题错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区；有的中译英习题，从语法上讲没错，但却不符合英语的习惯用法，不是地道的英语，她会在作业旁注明，并建议这类问题可以参考的书目及章节。

为了便于掌握学员的学习情况，她将作业按A、B、C分类，对学习较差的，常常开小灶，三、五人一组，进行业余补习。晚上，她经常泡在教室，与同学们共度时光。

七十年代，工农兵大学生入学时水平参差不齐，为了使外语人才不断代，当时她采取“保姆式”的教学方式。

在74届的工农兵大学生中，有一位从江西入伍的女生张秋平，是下乡知青入伍来上学的，只有初小水平，方言又特别浓，中文的基本知识也不行。胡斐佩在对这位女生进行个别辅导时，从“A、B、C”学起，早、中、晚都搭上，还为她请了一个语文教师补习中文。小张口音很重，发音非常困难，胡斐佩每天把她叫到办公室补习一小时。张秋平自己也学得很苦，思想压力很大。胡斐佩看出了她的情绪变化，星期天就把她叫到自己家中，一边做思想工作，一边耐心进行辅导。“飞瀑之下，必有深潭。”在她的关怀指导下，张秋平以顽强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勤奋攀登，终于完成了学业，合格毕业。

胡斐佩常说，教与学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教首先必须“严”。自从她担任教学组长和教研室主任以来，就立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无论新老教员开课之前，都要集体进行试教，合格了上课。不合格的，跟班去听合格教员讲课，回来后继续准备，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直至合格。

试教气氛既是生动活泼的，又是严肃认真的。

一次，一位新教员在试教时，眼睛总是盯着天花板，而不是注视学员。胡斐佩立即喊“停”！当场指出这样不行。她请这位教员坐在学生的位置上，自己快步走上讲台，示范正确的讲课姿势和神态，然后又将这位新教员刚才的呆板样进行了演示，使这位教员感触颇深，很快改变了“教相”。

有一位从外单位调来的教员，讲课有个口头语，每句话的末尾总要带个“啊”。试教中，胡斐佩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个不好的习惯，一定要纠

正！”那个教员闹了个大红脸，但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的那个口头语了。

胡斐佩在担任副院长时，分管教学工作，她对教学一线的情况非常熟悉。她一头扎进去，抓教学秩序，抓教学的基本建设，抓师资的培养提高，抓学术研究。她的工作效率很高，抓什么，什么出成绩。

每周她都抽出一、两个半天同年轻教员们一起备课，讨论问题，帮助他们修改教案。她还经常去听课，也指导研究生的论文写作。

在学院办英语助教学习班期间，有位任课教员突然生病住院要动手术，临时换人备课来不及，胡斐佩主动承担了这位教员的课程，她凭着几十年在教学一线工作的经验，两个月的授课任务，她高质量地完成了。

在洛阳外语学院，同学们说：“听胡教员讲课，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她，一口柔美的南方普通话，标准的美音，一脸亲切的微笑，常常令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不易分辨的发音和抑扬顿挫的语调。”

这种独具匠心的授课艺术，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倾注了胡斐佩大量心血。

正如一位权威人士评价所言：“如果说那一个个光华琳琅、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引人入胜的艺术品的成功造就，靠的是艺术家平时练就了一手精雕细刻的本领的话，那么，胡斐佩的教学之所以受到学员们欢迎，正是因为她着眼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坚持从教学思想、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上进行了一系列突破性改革。”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胡斐佩发现，语言不单纯是一种工具，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要传授与这个语言相关的背景文化，才能使学生学的语言比较地道，能够在恰当的情景下使用，否则，就是一对一的呆板直译。

过去编的教材，为了练口语，通常讲“你叫什么名字”，“忧是哪里人”，“你多大了”等一系列对话，胡斐佩发现，这种对话本身就有毛病，有的学生见了外国人便生搬硬套，外国人听了非常不高兴。比如有人一见人家面就问“你挣多少钱？”等，“老外”听后直摇头，在国外，这些属于个人隐私。由此可见，中外语言存在着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上的差距。学语言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加语法的问题。把词汇、语法、语音放到语言表层范围里去处理，根本行不通。如果从语言的表层加上中文思路学出来的外语、绝对不会地道，还可能闹出很多样相，同时，也不能被别人理解。

基于这一认识，在教学中，她注意引导学员把学外语与学该语言文化背景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学课文的同时也增长了很多知识。

过去教学的中心是：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室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这种“三中心”的教学模式延续了几千年，实际上还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被动状态之下。

胡斐佩觉得，从现代教学思想来讲，学习本身是一个学生做为学习者自觉参与的过程。从“矛盾论”的内、外因素关系上讲，内因是最重要的，内因的问题没解决好，教师再发挥积极性，也无济于事。所以，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

过去的学生中有认为学外语不实用，兴趣不高的倾向。现在的高中生一入学就具有相当的英语基础，学习动力也很强。改革开放的社会大环境使他们觉得学外语有很强的实用性。但是，他们却习惯于初、高中时让老师“喂着吃”的灌输式教学，缺乏学习的主动性。

在胡斐佩主编的教材中，无论哪种教材都有很大的启发性。新教材有个

预习提纲，其中许多提问要求学生自己回答，生词也不给注解，让学生自己查字典。上课时，老师还要与学生对话，其中，要问到的问题，如果学生不按照预习提纲练习，在课堂上就跟不上老师的对话。

这样以来，课堂气氛一下子变得生动活泼起来，有些提问问哪页哪行哪句是什么意思，所以学生读书就不能泛泛而读，而要结合上下文来思考，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答案。

凡是按照新教材这样做的学生，越学越好，越学越有兴致。

在这个基础上，胡斐佩还积极主张把录音、录像、幻灯带进课堂，运用多媒体让学生接触语言，实践语言，这样，大家对语言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指导思想也更加明确了。

现在，许多院校的教师虽然有更新教材的愿望，但真正动手的不多。一些教师不愿意编新教材，是因为编教材没报酬。有人说，一个歌星在台上唱首歌就挣几千元，而编写教材要牺牲很多业余时间，与社会上的高收入相比，心里不平衡。因而很少有人愿意花费精力去编点像样的新教材，用的还是 50 年代的老教材，不少内容很陈旧。

胡斐佩对英语基础训练贡献的可贵之处是，积极行动起来，带领教员亲自动手，编写科学、实用的教材，为教学第一线提供权威的教科书。

她主编的《英语泛读教程》在洛阳外院试用了几年后，又精选汇编成 4 册，于 1990 年出版，被列入全国高等英语基础教材。之后，她还主编了《英语精读教程》、《英语考试指南》等 10 套英语教学书，很受英语教学第一线同行们的欢迎。

在洛阳外院教职员工中，还流传着一则“教材署名”的佳话。一次胡斐佩和三名教员合编了一本英语教材，在全国正式发行后上报评奖时，按规定只能署三个人的名字，作为主笔的胡斐佩毫不犹豫地划掉自己的名字，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胡斐佩淡淡一笑，真诚他说：“我的名气已经够响的了，应该让别的同志去多出出名，这样才更有价值！”

敢使“摇篮”沐春风

女人，历来被看作是柔弱的代名词。古往今来，人们总是把她们与弱者联姻。

女性，由于生理特点和婚姻带来的生儿育女、家庭劳务等原因，使她们的事业要经受比男子更多的考验。女性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有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和独立、勤奋、勇敢、坚毅的品格；在困难、偏见、失败、挫折以及失恋或失去丈夫的巨大创痛面前，做到坚韧不拔、楔而不舍。唯有如此，方能攀上事业的高峰，到达光辉的顶点。这一切，胡斐佩作到了。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胡斐佩走上领导岗位，是赶上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大潮。八十年代初，洛阳外语学院提出了“以发展求生存”代替以往的“以生存求发展”的办学方针，这是开创学院建设新局面的战略决策。一批从事教学工作多年的知识分子先后被提拔到院、部的领导岗位。

要好的朋友提醒她去走上层路线，当了 23 年的教研室主任该动一动了，对此她无动于衷。直到有人神秘地告诉她：“可靠消息！您真的要升官了！”她仍然不以为然。当院长把她叫到办公室，郑重其事地与她谈话后，

才引起了她的重视。

走出院长办公室，她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她认为，这是历史选择了她这一代知识分子。作为女人，在人生道路上，自我选择的机会确实不多。她不会忘记，解放后，母亲终于参加了工作，当上幼儿园的园长，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专长，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整天容光焕发。母亲在新旧社会中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对她的触动很深，能把自己的才能奉献给社会，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从 1984 年开始，胡斐佩为官七载，开放性的思维和“敢”字当头的魄力，为她的工作开拓了局面。年过半百的她，有着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为架设沟通人类语言交流的桥梁，是她毕生的宿愿。

胡斐佩极力主张外院要开拓渠道，增加对外开放。

她说：外语教学不开放交流是没有生命力的。搞外语，最重要的是语言环境。

七十年代全国都封闭那没办法，现在全国的外语学院都开放了，如果军队的外语学院再闭门闭户，非落伍不可。

对外开放主要是派出去，请进来。请进来的渠道，一个是从国外直接请外国专家，另一个就是拐弯从国内别的外院请人家从国外请来的外籍教员。

派出去，主要是按照公派的名额数出去。

六十年代，洛阳外语学院派出不少年轻教员到英国留学，现在他们都成了教学骨干。

到了八十年代，国门打开后，大家都争着出去，外院反倒只开了一条小缝，名额极少，年轻教员很难争取到出国进修的名额。而他们正是外院的新生力量，外院的未来要靠他们来发展。

胡斐佩积极向党委建议，多增加派出渠道，既然公派留学的主要问题是经费，那么就先从这儿重点突破。她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让申请出国进修的教员，自己去申请人家的奖学金，再以公派的名义派出去。学院可以解决来回往返的路费，其它一切学习、生活费由留学生自理。

她认为这样做，出国交流的口子就打开了。新时期军事领域也急需一大批外语人才，去搭设语言交流之桥，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军事科技知识。

她热心扶持这项工作，大胆呼吁，积极奔走，虽然她与那些年轻教员非亲非故，却为他们签字借钱。帮助他们同上级有关部门联系，终于为年轻教员促成了这件事。不少同志都非常感激地说：“如果不是胡副院长的奔走呼吁，我们梦寐以求的出国求学理想只能化为泡影。”

但是，对这件事，一些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担心如果有人出去不回来怎么办？

对于这个问题，胡斐佩早就想透了。她认为，从根本上讲，出去的这些同志不可能不回来。她说她到美国探亲时接触过很多 40 年代去的人，他们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现在都还想回来。虽然美国的生活水平比国内高，但在人家屋檐下，谁愿意一辈子做个受歧视的受气包呢？！

思想保守的人，总怕出事。背地里指责胡斐佩说：你说得怪轻巧，出了事谁担当？“乌纱帽”还要不要了。

人间直路穷。胡斐佩不怕出这个事。

她认为如果为这件事而丢了官没什么了不起，自费出国人员出点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有人暂时不回来，也不会做出什么叛国的事情。有交流

的机会，年轻人就看到了希望，否则他们干吗非呆在洛阳外院。出去的这些同志都是学院比较拔尖的人才，别的学院都想把他们挖走，允诺只要肯调到他们学院就可以安排出国深造。为什么唯独在洛阳外院不能出国？对外开放全国是一致的，何况上级并未规定洛阳外院绝对不能出去，只是缺乏公派名额而已。可以这样说，出去的人与同行比，不仅一点不差，而且还要强一些，外国人也十分欣赏他们的才干。应该看到，出国进修人员延期不归只是个别现象。毕竟他们还是军人，要受纪律约束。除此之外，她觉得更重要的是应采取各种方式，多做工作，打动他们的心，比如关心他们的家庭，提高他们的待遇。在住房问题上也尽量予以照顾。她向院党委建议，对学成归国后在事业上有建树的同志一律提职晋衔，特别优秀的，破格提升使用。

可是，不尽人意的事还是发生了。

真的有极个别人出去后寻找各种理由延期未归，还有一个青年女教员到日本进修时，未经组织批准，私自同一名日籍男士结婚，不回来了。

于是风波又起。各种闲言碎语像雨点般甩打到胡斐佩的头上。有人说，你看，当初怎么怎么，她手伸得太长了，太没有原则了。还有一些更离谱的猜测：她海外关系那么多，谁知道她在搞什么名堂……要达到什么目的……

对于这些风言风语，胡斐佩全然不予理睬，她早想清楚了。

后来上面也追问下来，学院挨了批。

有人说，这下有胡斐佩好看的了。也有些“好心人”劝慰她，赶快“悬崖勒马”吧，主动承认错误，何苦给自己无端找麻烦呢？“文革”时的苦难道你还没尝够？

一提起“文革”两字，胡斐佩的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似的，既苦涩又辛辣。十年内乱胡斐佩与丈夫梅考达双双被扣上了资产阶级“黑干将”帽子，当时他俩都是教研室主任，说他俩走的是“白专”道路，她与丈夫在院里分别没有挂名大字报专栏，接受群众的批判。

那时，她冷静地思索人生真谛，探求真理轨迹，她以极强的忍耐力面对现实。早读，她参加政治学习；晚上，她又来到学生教室，辅导学生学习。

1969年进行“斗、批、改”运动时，她一家四口下放到湖北钟祥县“五·七”干校。在那里接受劳动改造时，胡斐佩学习做一名农民，她下过大田，割过麦子、稻子，摘过棉花，赶过牛车，挑过担子。体力劳动把她的身体锻炼结实了，五十斤一袋的粮食，一米六四的她一手一袋提起来就走，她甚至还学会了举刀杀猪，令驻地老百姓刮目相看。

人生本来就包含着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体验一下，人生才更觉充实。

在“五·七”干校，她当过幼儿保育员，中、小学生外语教员，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她坚信，任何时候，国家建设都需要有知识的人才，为强我中华培养高品质的外语人才，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错！

1971年底，在“五·七”干校呆了两年的胡斐佩回到洛阳外语学院。当时正赶上校园里刮起“英语速成风”。胡斐佩不为其所动，她同几位教员一起提出了“立即抓好外语基本功”的紧急倡议，带头编写基本功练习册，将满腔热情倾注在英语基础教学上。

当时部队英语教学的摊子比较杂，各大单位纷纷办训练队，用的教材都是洛阳外语学院的，但师资力量跟不上，教学质量没保证。这种状况引起了胡斐佩和外院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这件事，觉得不能这样搞教学，否则会影响一大批年轻人的成长。1978年，胡斐佩同学院十八

名同志一起，用饱蘸激情的墨笔，联名给叶帅、徐帅、聂帅等老一辈革命家写信，反映这种教学的紊乱状况，希望全军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好一所高等外语学院。这一倡议受到了上级的重视和好评。

她就是这样一位全身心扑在教学事业上的人，为了培养与现代化大环境接轨的外语人才，她敢于负责，敢于拍板。后来的事实证明，胡斐佩当初的主张没有错。随着国门开放，改革深入，上级分配给外院的出国名额也逐渐增多，这是大势所趋。

胡斐佩具有敏锐的头脑，开放的思维。她认准的事，“敢”说“敢”干，从来不怕别人的闲言碎语。

八十年代初，交际舞开始流行，年轻人跃跃欲试，有的教员到校外去学，有的学生在宿舍内悄悄地跳。

胡斐佩发现了这一现象，积极地公开倡导。

早在四十年代末，她在复旦大学时就开始跳舞了，旋转的舞步曾把她带入音乐的神圣殿堂。

在洛阳外院，她带头走进校园舞场，翩翩的舞姿，迷住了许多人。当时，学院里有的人对跳舞有顾虑，持观望态度，更多的人不会跳，也不好意思学。看到胡斐佩如此优美动人的舞姿，不少人受到感染，也悄然走进舞池。大家推举胡斐佩当学院“舞协”主席，她欣然从命。

五彩的现实生活，有欢笑，也有悲伤。

1984年春节，在千家万户喜庆新春佳节的时候，胡斐佩却从医生那里得知：可怕的癌细胞已经吞噬了丈夫梅孝达高大、强壮的躯体。

死神正一步步逼向她相亲相爱的人。

她伤心极了，止不住的泪水顿时遮住了双眼视线，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她一时竟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

经过痛苦的情感挣扎，性格刚强的胡斐佩抹去泪水，默默地对自己说：生死绕不过去，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决不能向困难低头，要和它斗争到底；尽量缩小影响面。不许子女来北京！向年迈的父亲、婆婆隐瞒真情。

从春天到夏天，一百多个日日夜夜，胡斐佩一直守在相濡以沫的丈夫身边。

望着一天天消瘦的丈夫，胡斐佩用理智紧紧抓住感情的缰绳，她以坚强的意志极力稳定住激荡起伏的情绪，始终以微笑面对丈夫。

夫妻俩心照不宣，谁都不去谈死的事，依然在一起谈笑风生，追忆往日的欢娱。

直到最后时刻，胡斐佩才取出她酝酿许久的遗嘱，递给临终前的丈夫，逐字逐句读给他听。

丈夫满意地点点头，用颤抖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份融理性与奉献于一体的遗嘱是这样写的：

我已经快走完人生的道路了。回顾我56年来的一生，我感到在党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很幸福的。我除了觉得正当壮年不能继续为党、为我国的四化建设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之外，可以说是死而无憾。

在这弥留之际，我有以下几点请求：

第一，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的病如果从科学的角度已无治愈的希望，则请各方面的同志一定不要在我身上作无谓的努力了，以便把各种昂贵的药品和医护人员的主要精力用在更需要的同志身上。这样既有利于国家，又可

以减少我不必要的痛苦。

第二，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但可通知有关亲友。

第三，遗体的任何部分，只要 301 医院需要都可以捐献，如果 301 医院认为需要尸检，我也完全同意。

第四，北京以外的亲属，一律不要为办理我的后事进京。

第五，亲属子女一律不得向组织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

梅孝达的丧事十分简朴。301 医院从医学角度做了尸检。骨灰放进了北京的公墓。

1989 年冬天胡斐佩的父亲、著名的心理学教授胡寄南先生去世，也同样做了尸检，心脏捐献给了上海华东医院，骨灰也放入了公墓。

人们对此表示诧异，她却说：“这没什么，这是一个观念问题。我的父母亲毕生相守，母亲去世，父亲就是这样处理的。爱，不表现在供放的骨灰上。”

一个女性的臂膀，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担，无形中她的形象在升华。坚强的音符伴着胡斐佩，人们把她当成情感避难的港湾。

1989 年夏，江教员不幸得了胃癌，组织上决定立即让他去北京住院检查。当时正是他女儿参加高考的前一天，妻子精神高度紧张，一心惦念着女儿。江教员向妻子开不了口，就转向胡副院长求援了。

当天晚上，胡斐佩把江教员夫妻俩请到家中，以一个女人的心去抚慰另一个女人的心。

第二天，江教员放心地去了北京，他女儿也上了考场。

一年多的时间，胡斐佩一直关心着这个家庭，直到江教员临终前不久，她才向其家人披露了病情真相。

胡斐佩送去一束美丽的绢花，江教员人虽不在了，绢花摆在他的家里，春夏秋冬都弥漫着浓浓的温馨之情。

淡泊名志留美名

四十多年来，胡斐佩在教书育人这块田野上躬身耕耘，从助教到教授，从教研室主任到训练部副部长、学院副院长，胡斐佩的地位在不断的提升，而她在外院众多的教职员眼里。依然是位普通的“园丁”。

她当上了女将军，仍住在师职楼。家中摆设十分简朴，没有地毯，没有组合柜，没有席梦思，没有高级沙发，冰箱是七十年代单开门的，电视机是 14 英寸的。一些学生来到她家串门，感到不可思议。

一个军职干部，又有海外关系和两个留洋的儿女，家中应该是现代化的。他们是不知道，胡斐佩与爱人原来都是教授，工作了几十年，1988 年她的全部存款加起来只有 7000 元。

当儿子带着一起留洋美国的爱人回来结婚时，她只给他们 2000 元，其它什么也没有给他们买，连“鸳鸯床”也是用学校配发的两张小床钉拼在一起的。

儿子结婚那天，她仍照常上班，直到下午六点，听到下班号音，她才放下手头的工作，急匆匆骑车回到家。这时，儿子和新媳妇已经做好了饭菜。她望着桌上美味佳肴夸奖道：“这么好的手艺，比妈妈我强多了！”接着她揭开锅盖，看着新蒸出的米饭，高兴地说：“蒸得真好啊！”她又拿起勺子，舀了半勺三鲜汤，放到鼻尖闻了闻，连连夸口：“挺有味道！”她笑着伸出三个指头赞扬面前的这对新人：“菜、饭、汤三好！”说完，她拿起啤酒，

亲手为儿子、儿媳倒满，母子三人有说有笑地碰杯，共进这温馨的“新婚宴”。

女儿结婚时她也只给了2000元。

女将军对待子女教育，也像她的父辈一样，采用民主、开明的态度。对待两个孩子的学习她一直很关心，但她从不做具体的辅导，让孩子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完成。

两个孩子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的。儿子曾下乡三年，又在海军部队服役四年，年龄偏大了，有人劝胡斐佩把儿子调到身边来上学，只要她点个头，不用她亲自出马。但她就是没有点这个头，硬是让儿子退伍后，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地方大学，毕业后又自己考上了研究生。

女将军的儿女谁也没有去借“将军的光”。

他们靠艰苦奋斗为妈妈的脸上添了色。八十年代中期，两个孩子先后出国留学了。在异国他乡，母亲带给他们最大的财富是曾赋予他们的独立生活的能力。

胡斐佩认为，家长只要给孩子一个健康的身体，培养孩子良好的思想品德，让孩子学到一手谋生的本领就尽职了。

胡斐佩在生活待遇上从不苛求，不该有的，她不去想；该有的没有，她也不计较。

几十年来，胡斐佩甘于清贫，淡泊明志，当了将军，仍然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星期天，脱下将军服的胡斐佩俨然是一个家庭主妇，她骑自行车，到菜市场采购一周用的蔬菜。每天下班后，她围裙一扎，亲手烹饪可口的饭菜，她感到乐在其中。

扛上上将星的胡斐佩，很留恋她当教员时与大家在一起无拘无束的生活。

那时她在教研室与大家经常谈笑风生，亲如兄弟姐妹。

当了副院长后，她发现学员和一些年轻教员见了她非常拘束，往日常来串门的也少多了。

胡斐佩从来就没有摆过架子，当了官也摆不起架子。但地位的悬殊造成了人为的隔膜。胡斐佩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她想教学同样需要交流和沟通，师生之间一旦出现隔膜，必然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两者之间只有平等相处，才能充分发挥教学相长的优势。于是，她主动“出击”，消除隔膜：你不来找我，我去找你；你不来我家，我到你家去。这样同志式的往来，加上友情的流动，渐渐地，她与同志们之间又恢复了说说笑笑、玩玩闹闹亲密无间的师生友情。许多教员和学员仍像原来那样叫她“胡教员”、“老胡同志”，个别俏皮的干脆直呼她“胡老太太”。

新生入学后的一天，她端着盆子到大澡堂去洗澡，听到身后女生叽叽喳喳的声音。她停下来，回头与她们打招呼。

一位女生壮着胆子问：“副院长好，您也是来洗澡的吗？”

胡斐佩和蔼一笑，点头道：“我一直在这里洗澡。”

女生哗然，想不到堂堂的女将军也会同她们一道走进大澡堂。她们边聊天边洗澡，使学生们感到很亲切，谈笑中，她们之间的距离在缩小。

节假日，胡斐佩一人居住的小家，经常是高朋满座。其中青年学生很多，胡斐佩愿意与他们交朋友，她觉得新时期的师生关系，应该是同志关系，战友关系。

身为女将军的胡斐佩，外出坐小卧车是理所当然的。可她考虑到学校车

少、油缺，能节省就节省。有一次，她要到郑州去开会，学校为她派了专车。但是她一算，洛阳到郑州 180 多公里，往返要耗费不少油，为节省开支，她推掉了专车，乘火车走了。

在这些问题上，她有自己的见解：“当个将军，是时代把自己推上去的。我不追求在待遇上得到多少。一个人现在是官，总有一天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今天追求的越多，明天失去的也就越多。无所得也就无所失。我想这样好，一旦有一天下去了，我不会痛苦，不会不习惯，不会有‘失落感’。”

胡斐佩是个热心肠的人。在外院期间，哪个教员的孩子上学遇到了麻烦，她总想办法帮助解决；哪个职工的母亲生病要住院，她尽力设法帮忙，她爱帮人，求她的人也多，每天晚上，上她家去的总有三、四拨。能够办的事她从来不推托。

当了将军，胡斐佩名声在外。慕名给她写信的人多了，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的高中生怀着虔诚的愿望，想报考她所在的洛阳外语学院，请她指导复习外语；有的女青年恋爱受到挫折，向她询求幸福婚姻的真谛；有人给她寄东西，求她帮忙办事情，还有边远地区的青年恳求来她家当保姆，等等。她有信必复！帮不上忙的，她总要解释清楚。

对待亲友求她帮忙的事，她也严格按章行事。有一年学院办英语培训班，她妹妹的一个孩子要求来听课。作为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她只要说一声就行了。可是她“不”，按规定，替外甥先交了培训费，才让他去听课。

采访中，胡斐佩谈道：“大凡遇到别人求情叫苦的，我总不好意思给人打回去。所以，有的事不该我管的管了，有的不该办的也办了。这样，难免有人觉得我的手伸得太长了些，原则性不够强。这点我也似乎觉察了出来。这大概是我的优点缺点共存吧。”

挂上将军的头衔，胡斐佩一夜之间成了名人，各种报道接踵而来。

她面对名誉的态度，我们可以从她给《解放军报》社一位记者的信中略知一、二。

“来信及大作均已收到，文章写得很好，我特别喜欢它的质朴，没有矫揉造作之感。

我曾多次向您说过，我不希望报刊上登载有关我的事，因为我的情况太平淡了，不值一提，我又极不喜欢出风头。但这一次我还是答应您的要求，同意发表。这是因为我最近接触到一些人，他们对我们共产党和我们解放军的‘官’有一种误解，以为我们这种‘官’跟旧社会国民党的官没有什么两样。而就我所知，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我党我军当‘官’的同志中间，多数是按照党的一贯教导去做的，是律己很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学院的其他领导同志以及我认识的很多院校的的领导同志（均系将军）都是这样的，我只是他们中的一个分子，也并无特别突出之处，这些情况很多同志看到了不足为奇，也就没有放在心上。但我党我军确有极少数以权谋私的人，他们败坏了党的声誉，有些群众（尤其是青年人）不了解真相，以为所有当官的都是这样，这么一来，也加深了对领导的一些不满……基于以上看法，我想您发表这篇文章或许可以使人看到，广大的党员是好的，像我这样的人很多，从而让人们对我们的党看到希望，并增强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我们祖国的信心。同时，我也希望在报纸上能经常地更多地报道我们广大共产党员的情况，以振奋党心、民心。”

再谱人生新篇章

古今中外，大凡从“官”位上退下来的人，心里总免不了滋生出一种“失落”感。

在我国，由于长期受“能上不能下”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干部队伍中相当一部分同志，一旦面对组织确定让其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有的想不通；有的感到“不习惯”，觉得放不下架子，丢不起面子；还有的甚至怨天咒地，情绪一落千丈。

胡斐佩少将是怎么对待“退位”的呢？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到1990年底，副院长胡斐佩已经年届六旬，到了军官任职最高年限。

面对“退位”，她想得很多：对做“官”，她一向看得很“淡”。她说：我从小志向和爱好是教书，这项工作太有意思了。平时，我最喜欢听的一句话就是学生称谓自己“胡老师”。从这一点上来说，她盼着从领导岗位早些退下来，这样更有利于集中全部精力教书育人。

然而，自从当上了副院长，她又对当“官”看得很重。她说，并非“将军”头衔多么荣耀，副院长名声多么好听，从教研室主任、训练部副部长到学院副院长，“官”越做越大，担子越挑越重，压力也越来越大，它紧逼着你为人民为社会干更多的事，做更多的奉献，为国防现代化培养更多的外语人才。从这点上来说，马上退下来，她又有些遗憾，觉得时光过得太快了，该干的许多事还没有干完，自然法则真是太不留情了。毕竟长江后浪赶着前浪跑，为了党的事业能够继往开来，她从心理上做好了退的一切准备。

临近退位前，她更加勤奋，一如既往，脚踏实地，抓教学，抓科研，为学院建设积极出谋划策，用辛勤的汗水灌满每一个“今天”的分分秒秒。

上级党委了解她，信任她，关心她，退位命令未下达前，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徐信乘直升飞机专程来到学院，同她进行了一次长谈。胡斐佩对不当“官”反映特别平静，她认真地对首长说：“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是时代的要求，小平同志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做出了表率。作为一个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老战士，我一定会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绝不拖拉半步。”字字句句掷地有声。

叱咤风云的老将军，一生中同不少领导谈过这方面的话题，对这次谈话他感慨颇深。

她，无愧女中豪杰。

从副院长位置退下来的胡斐佩，仍在原办公室办公，只是摘掉了副院长的门牌。这时的她，孤身一人在洛阳外院，丈夫已故去了两年，儿女也正留洋美国。她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胡斐佩向党委要求主编洛阳外语学院学报。

她积极组织青年教师撰写稿件，在学报上为他们开辟阵地。大力扶持新人茁壮成长。

胡斐佩把培养年轻教师队伍当做义不容辞的责任，她认为这些年轻教员是学院的未来，经过三年、五年，他们就成熟起来了，如果再过10年，他们一定会成为栋梁之才，一个学院需要一支实力雄厚的有名望的师资队伍。

她主编的学报，全国发行，有的文章还被社会科学院、人民大学转载，影响面很大。虽然是双月刊，但每期有15万字。只有胡斐佩与赵德远、梁利

三个人来编。而每期的 15 万字，胡斐佩都要一一校对，特别是最后的总校对，她干脆去印刷厂逐页校对，校好一页上机印刷一页，差错率极低。

她说，无论干什么，要干就要干出名堂。过去，她从没做过主编，一切须从头学起，她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要有甘为别人作嫁衣的精神。她的敬业精神，也感染着另外两位同志。

俗话说，无官一身轻。胡斐佩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却并不轻松，除了主编校刊、上课，还带领教员编写新教材，致力于英语基础教学研究。

1993 年 3 月 29 日，三总部印发的奖励证书上写着：胡斐佩同志完成“英语基础训练的新突破”，荣获 1993 年军队院校优秀教学成果军队级一等奖，特发此证。

胡斐佩双手捧着红红的获奖证书，光荣地离休了。她在外院的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告别昨日的辉煌，1993 年 5 月，胡斐佩搬到了北京，住进总参干休所的军职楼内，过起了休养的生活。

她再一次来到香山碧云寺。

四十四年前，青春年少的她入伍后的第一站就是这里。与故去的丈夫梅孝达的恋情也是在这里萌生的。

走在这曲径通幽的林荫小道上，多少情思禁不住涌上心头。当初，她参军走进军营后，很快结识了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梅孝达。

当时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委会主席的梅孝达，经常在全校的集会上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讲。

英俊潇洒的梅孝达，性格开朗，才华出众，深深地吸引了胡斐佩。

上天有意，他与她分在一个班里，他是班长，她是党小组长。情窦初开的胡斐佩，当着梅孝达的面发言，总是拘谨、脸红。理论水平较高的梅孝达经常开导她，在密林深处，他们谈思想、谈学习，也谈恋爱，那里的一切给她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按当时规定，结婚必须具备的条件是：25 岁，8 年军龄，团级干部。他与她都不具备条件，只好相互理解，相互约束，严格遵守这一规定，不敢越“雷池”一步。

1956 年，他们幸福地结合了。

他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丈夫，为人坦率、广交朋友，却性格刚直，脾气急躁，与人争论问题寸步不让，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但他能知错而且能当面向别人认错。胡斐佩是个温情的女人，在家里，常常“以柔克刚”。

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他们最大的乐趣是对外语教学事业的共同追求。

他与她是夫妻，又是无话不谈的“知己”。

二十几年的共同生活，他们的身心交流达到了高度的默契。一位老教授曾感慨地说，他们这一对情侣，是他认识的上千对夫妻中最美满、最和谐的一对。

丈夫去世后的 9 年中，不乏求婚者，但胡斐佩总有托词。她是在民主、开明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她并不封建。生活的磨练，使胡斐佩的独立生活能力很强，她一人在学院时，觉得自己一个人活得挺潇洒，不需要别人的照顾，她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工作，工作充实了她的“单身”生活。1993 年年底，胡斐佩结束了“单身贵族”的生活，二度喜结良缘。

现在的丈夫鲍世禄，比她年长 5 岁，离休前是上海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的处长。

说来真巧，1992年，胡斐佩回上海娘家探亲，在一次老同学聚会中，两人见了面。

胡斐佩这位女将军，成了大家关注的目标。面对羡慕的目光，她说：“我还是过去的那个我。”她兴奋地与大家谈天说地，共叙友情。

一位老同学见到鲍世禄，一开口就没遮没掩地问：“嗨，你怎么还活着？”

一句诙谐的玩笑，吸引了胡斐佩对老战友的注目。四十几年前，她在复旦大学，他在圣约翰大学，他们在大上海的校园里分别开展学生地下党工作。

1949年夏天，他俩同坐一列火车，分别担任中队长，一起参军到了北京。

更巧的是，胡斐佩和鲍世禄与梅孝达同在一个小组。1952年鲍世禄由于身体健康欠佳离开了部队，回到了老家上海。此后，俩人天各一方，分别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再次重逢，两人都不幸地失去了配偶。

老鲍约胡斐佩第二天一起去吃饭、聚谈。在餐桌上，老鲍结结巴巴地问：“老同学，你这后半生将怎样安排？”

胡斐佩听出了他的潜台词，避过他直视的目光，用异常平静的语调说：“是的，我决定一个人过。”

稍事停顿，她接着说：“不少人为我撮合，都被我谢绝了。他们以为我过于挑剔，其实我有我的想法。”

老鲍一阵微惊，一股惆怅涌上心头，他不自觉地放下筷子。

胡斐佩仍缓缓地说：“老年人是怕孤独的。然而，重新结婚并非是排遣寂寥的唯一办法，甚至未必是最佳选择。找个老伴，如果仅仅是为了得到生活起居方面的照料，无异于请了一个高级保姆，那有什么意思。如果想要找一位各方面，尤其是精神生活方面的良伴，那又谈何容易！一对失偶男女，即使是熟悉的，由于各自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心态，一旦凑在一起，往往很难协调。都是垂暮之年，不可能像青年恋人那样地浪漫谛克。而且第二次婚姻又不可避免地带来子女、财产等关系的矛盾，势必出现种种意想不到的困扰。我总觉得老人重新结婚很难酿就葡萄美酒，不如单身，更自在，更轻松。”

她放低语调，细声呢喃：“再说，我也不想再度服侍病人，为又一个亲人送终，让心灵再次经受那种难忍的辛酸。”

接着，她侃侃地谈论她那解决孤独的一些方法。她说，她把一位大学教授对于老年人生活所概括的两句话，当做座右铭：适当的运动、劳动、社会活动；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她补充说：“一个老年人能做到这‘三动’和‘三乐’，就达到身心两方面的平衡，就能够面对一个开阔的世界，也就不会感到生活的空虚和寂寞。有友谊，有音乐，有艺术，也就有欢乐，生活是会十分充实的，对吗？”

老鲍默默地点点头。

离开餐馆时，他俩握手话别。胡斐佩深情地说：“让我们保持和发展友谊，做知心朋友，相互关心，经常联系吧。”

夜幕中，老鲍望着胡斐佩远去的身影，一股热浪涌上心头，有感慨，也有喜悦。

分手后，两人的书信往来频率很高，一年中，他们竟互通了三百多封信。真是到了无话不说的程度。胡斐佩虽然自己不愿再找老伴，但却极力主

张老鲍再婚。她认为他需要在生活上得到更多的照顾。别人给鲍世禄介绍的每一个对象，他都及时向胡斐佩写信“汇报”，征求意见，先后有七八个都没成功。

其实，老鲍心目中的偶像就是胡斐佩，他认定，茫茫人海中，非她莫属！

1993年秋，鲍世禄来到北京探望胡斐佩，他们一起出游，一起练功，一起跳舞，是那樣的和谐自然，宛如一对“银婚”的伴侣。

老战友们纷纷劝胡斐佩该考虑办喜事了。胡斐佩也觉得已水到渠成。1993年底，胡斐佩向远在上海的他抛出了“红绣球”，他们在北京幸福地结合了。

1994年春，老两口带着新婚的喜悦，携手游览了三峡、庐山、大连等地，对新生活充满了热情。

他们经历了很完美的二度婚姻，彼此感到胜过自己的亲姐妹，亲兄弟。俩人编了四句共勉的话：人格求完美，心灵保青春，身体唯健康，潇洒迎晚霞。

笔者面前63岁的胡斐佩，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要年轻十岁。采访中，她兴奋地谈到，这个夏季，她在长江游泳，一口气就是一千米。看到笔者诧异的神情，女将军说，有人曾给她起了个“雅号”叫“不沉的航母”。一米六四的她，体重65公斤，但一点也不显得臃肿，她胖得很结实。

生活中的胡斐佩，精力充沛，是位细心人，也是位热心人。

她住在六层楼，每天上下乘坐电梯。一天，她突然发现开电梯的小姑娘是个文盲。她非常痛心，一个17岁的女孩，睁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就是大字不识一个，望着偌大个“钟”，却不知道几点钟了。一天，胡斐佩把这位文盲姑娘叫到家中，要教她认钟识字！

姑娘叫任春丽，来自安徽乡下，年幼时母亲去世，她在家带着两个弟妹，操持家务，弟妹都上学读书了，现在反过来讥笑她愚昧无知。听说女将军要亲自教自己学习，小任高兴得痛哭流涕。她从来没有机会与这么大的“官”接触，现在要做将军的学生，简直像是在做梦一样。一开始她每天都来，后来她发现胡将军很忙，于是改为每周二次，成了女将军家中一名特殊学生。

对教书特别感兴趣的胡斐佩，发现干休所院里一些家长辅导孩子学英语有困难，便义务办起了“英语学习班”，只要愿意的，无论年龄大小，谁都可以参加，她每周给大家讲授两次课。

站在讲台上的她，这时又找回了自我。

她说，“如果再让我作一次职业选择，我还是选择教书。”

传授知识与接受知识都是不分年龄、地点、条件的，办学是胡斐佩一生最大的追求。

离开军校，胡斐佩意识到，当今时代，不仅部队需要外语人才。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环境下，国门打开，各条战线都急需一大批外语人才，为开展国际间经济技术合作搭桥销路。

于是，她联络一些有志教育事业的同仁着手办一所大学——华夏中外文化交流学院。

这所学院旨在与国外名牌大学联网，聘请一流教授授课，颁发国内与国外联网大学的双重文凭。

为了尽快实现这一构想，她充分利用海内外关系，多方联络。一部电话不够用，又自费安装了一部国际长途电话。她手握电话机，通过越洋电波，编织自己晚年的“梦想”。

她的倡议，立即得到一些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和支持。目前，由华夏文化促进会出面筹备，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他们将成立董事会，征地盖楼。不久，人们就会看到一个崭新的综合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开始挂牌授课了。

朋友，在即将开办的华夏中外文化交流学院，您可一睹女将军今日的风采！

巾帼领兵人

赵江

她的头衔很多。

如果撇开那些笼罩在她身上的一层层耀眼光环，让我们来称呼她吴晓恒医生或吴晓恒教授，她会很高兴；称呼她吴主任或吴副校长，她也会很高兴；称呼她老吴或吴老，她同样会很高兴，她就是这样一个很普通、很随和、很真诚以及善待他人的人。你不用打量她那陪伴了其一生的戎装，也不用观察她那十分典型的女性容貌，你只消迎视一下她那双精明睿智、坚毅执著的眼睛，并透过这双眼睛窥视其无私的心底、宽广的胸怀以及过人的胆魄，在惊叹之余就会发现，她是一位骁勇的巾帼领兵人，一位真正的女将军。

第一章 打铁自身硬 领兵人自己是个好兵

“人活着就要立大志”

45年前，人民共和国尚未满周岁，中华大地到处响起抗美援朝的嘹亮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

一位小姑娘为这歌声所吸引，追着几位解放军官兵大声询问：解放军同志！你们是怎样当上解放军的呢？我能不能当上解放军呢？

解放军官兵为这胆大而又活泼的姑娘稚气未脱的发问停住了脚步，反问她：满18岁没有？

满啦！她回答得真是骄傲，同时藏着一份庆幸，幸亏刚满，她的第18个年华简直就是为了当上解放军才到来的。

她被告知可以报名，还得知这些解放军官兵正是来招收女学员的，准备培养一批女军医，为抗美援朝服务。她迫不及待地率先报了名。

本来是不大可能录取她的。障碍很多，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她的出身是地主；另一个是母亲不会同意这个最小的女儿离开自己。

在进行现场测验的时候，吴晓恒的态度始终是殷切而又坚决的，她认为，国家有难，巾帼有责，人人都有权力报效祖国。招生组的同志为她小小年纪就表现出的拳拳报国之心所打动，加上从她的学籍表以及老师同学介绍中了解到，她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决定录取她。母亲那一关呢？吴晓恒来了个先斩后奏。对应征入伍一事全过程实行高度保密，直到穿上军装，要从中原大城市武汉奔赴北国哈尔滨了，才干匆忙之间向母亲禀告了此事。

面对女儿的突然“袭击”，母亲手足无措，只剩下摇头叹息的份儿。唉，这个倔强的女儿！自打她幼年时父亲去世，她受到了母亲、全家及亲朋的宠爱。但她不满意全家异口同声的唤她“小毛”，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小了。于是，在读初中时，她擅自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晓恒”。她常在母亲面前说，人活着就要立大志。为了这个“大志”她的求知欲那么强烈，学习那么刻苦，盼自己快点长大的心情那么焦急，跳出家庭暖巢、奔向从未去过的远方又是那么义无反顾。对这样一个调皮、聪慧且心气儿挺高、独立性挺强的女儿，母亲又如何忍心拦住她那刚刚长硬一点就想飞翔、就能够飞翔的翅膀呢？

据考，湖北省红安县是个“盛产”将军的地方。可是，由那一片奇土孕

育长大的高中三年级的学生、18岁的女新兵吴晓恒，断没想到在数十年之后她自己会成为一名将军。

离开了故乡，才发现故乡是离不开的。

90年代初，头顶华发的吴晓恒在广州市越秀区征兵动员会上，深情地讲了这样一段话：青年朋友们，在你们面临人生道路的第一次重大选择时，我想简略回顾一下个人的成长道路，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古今中外，军队历来是铁血男儿的天下：战争，历来叫女人走开。可是我觉得，人活着就要立大志。我没有铁马金戈的传奇，也没有像我军第一位女将军、老红军、1955年第一批授衔的女将军李贞大姐那样的无数战功。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心血管科的医生和教授，是改革开放大潮把我推到了第一军医大学副校长的领导岗位。1988年，我军恢复了中断23年的军衔制，我有幸在第二批授军衔时成为全军5位女将军中的一员。当我接过授予我的军衔命令时，我的心情异常激动，感到神圣和庄严。

“个人努力要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吴晓恒和众多身着草绿色军装的莘莘学子们一样，未能实现直接到朝鲜战场救死扶伤的愿望，而是在战火隐约可闻的大背景下，如饥似渴地进入了医学知识的宝库。

一天，风和日丽，吴晓恒和她的同学们来到兆麟公园，围绕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畅谈读后感，畅谈人生和理想。轮到吴晓恒发言时，她的话很简短：祖国和人民在当前面临许多困难的情况下，不惜代价地创造条件让我们来学习，我们要把个人的努力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第一学年结束了，吴晓恒的6门功课有4门得了5分，2门得了4分，成绩优秀。后来，她当上了班主席、区队长，领导着男男女女60多名学员。入学第三年，经团支部推荐，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所在区队的第一名党员。

1956年8月，吴晓恒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毕业前她曾经被评为三好学生、好党员。她被分配到齐齐哈尔，在当时的东北军区第十一军医学校（后改为齐齐哈尔医学院、军医学院、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工作。在奔赴工作岗位的兴奋中，她一想到离开家将越来越远，离妈妈将越来越远，心里就不免夹杂着一丝隐隐的惆怅。但她又想，既然在毕业前的三个志愿上填的都是“服从分配”，那么，就应该四海为家。正当她这个南国女儿怀着对故乡的深切留恋，决心在北国扎下根来，以所学知识回报祖国人民，为党的事业贡献青春时，意外打击却降临了。

1957年“八一”建军节，吴晓恒和她的一位同学结了婚，夫妻俩乘上南下的火车，欢欢喜喜回武汉度蜜月。这是她自1950年入伍离家后第二次回到母亲的身边。一路上她心中充满了憧憬，这次回家，母亲该有多高兴啊，因为女儿成家啦！她侧脸儿瞥了瞥丈夫，这个一米七七的北方汉子，不但外貌英俊潇洒，而且才华出众，为人耿直，母亲见了，说不定会夸她自己好福气呢。

可是一回到家，气氛就不对。吴晓恒兴奋地迎上前紧紧搂着母亲，母亲却仿佛不认识她这个闺女似的，慌慌张张地往后退，说话极不自然。在那一瞬间，吴晓恒头脑中闪出一连串问号：难道母亲反对我的婚事？难道母亲生

病了瞒着我？难道……最后还是弟弟露了真情：母亲被划为“右派”了。

吴晓恒的大脑一时反应不过来，呆呆立着。母亲，她降临人世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给她以博大母爱的人，在她20多年的人生道路上一贯最为敬重最为至爱的亲人，一个受到普遍尊重的老中医，其一生的愿望和行动是治病救人。父亲早逝后，母亲一肩挑起两副重担，呕心沥血把她们姐弟5个抚养成成人，又一个一个地送进革命队伍，他们也都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样的母亲怎么会反党？怎么会是右派？

吴晓恒百思不得其解，但她把痛苦压在心底。她默默地照顾着母亲，整天忙个不停，似乎要在短短的假期内，把数年来女儿总想帮母亲做却又无法做的活儿统统做完，以减轻母亲的负担。

“蜜月”不“蜜”，可谓人生一大憾事。但此时的吴晓恒，想得最多的是母亲，是母亲的欢乐和痛苦。母女之间无言相对，隐藏着彼此均已沉痛的心情。吴晓恒始终面带微笑，她要感染母亲，使母亲坚强；她还要安慰母亲，使母亲觉得女儿是快乐的，以期减轻母亲的心理负担。

50年代的政治气候，决定了吴晓恒必须和母亲“划清界限”。吴晓恒在新婚假期未届满时，就和丈夫提前返回单位，投入紧张的工作。医院里的工作琐碎繁重，她总是哪里最脏，哪里活最重，就出现在哪里。多少个星期天节假日，她都把它变成了工作日。尽管在人生的道路上，她头一回感受到豪情满怀突然间变奏为灰暗低沉。然而，她初衷不改，以做好平凡的本职工作为己任。

几年后，组织上为吴晓恒的母亲平了反，吴晓恒这才知道，母亲这个“右派”的来源，仅仅是因为单位群众向领导提意见时，是母亲做的记录。

吴晓恒为母亲、也为自己感到内心无愧。每当有人发出“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之类的话问时，她总是很坦然地回答：个人命运要和祖国命运休戚与共；爱从来都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

“人生最大的不幸，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吴晓恒的大儿子考大学，连续5年没有考上，要求父母帮助找工作。吴晓恒两口子为儿子的事倒是想了办法，但都碰了壁，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大儿子认为当妈妈的身为第一军医大学副校长，大权在手，却只管别人，不管自己；对别人的事认真，对自己的事敷衍，一气之下，半年多不和妈妈讲话。

就是在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吴晓恒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人生最大的不幸，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你只能靠自己努力，才能有好的机遇。”

熟悉吴晓恒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时间再退到1957年，正当“右派母亲”的政治包袱沉重地压在吴晓恒身上，使她倍受冷遇的时候，时隔半年，丈夫又因在“大鸣大放”中“放了几炮”，被划为“中右分子”，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转业下放到一个边远的小镇。消息传开来，吴晓恒如雷轰顶，只觉得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她步履蹒跚地跑回宿舍，把门一关，差点儿栽倒在地。她扶住门框，依壁而立，面对着天花板，眼泪滚滚落下来。

在大红的“喜”字尚未褪色，爱情的小舟刚刚起锚，虽然简陋却充满了温情暖意的宿舍里，吴晓恒含泪为丈夫收拾东西，送他远行。她一件又一件、

一包又一包地打理，生怕有什么遗漏而给丈夫的生活带来不便。她要用妻子的柔情去温暖丈夫那颗受伤的心，至于她自己那颗受到重创的心灵，此刻她是顾不上了。在亲人面前，她总是设法把自己的痛苦压在心底，使亲人的痛苦得以缓释。坐在一旁的丈夫终于忍不住提醒她说，我这一走，可不是出差！

我知道。不就是天各一方么？吴晓恒平静地说。

我看，咱们离婚吧！我做的事我自己承担，不应该拖你的后腿。丈夫又说，这句话他说得很艰难，但似乎又觉得不说不行。话是说了，但他心里充满矛盾，充满对妻子的愧疚。吴晓恒感应着丈夫的复杂心情，一阵心酸。“不许你提离婚的事！”她声色俱厉地说道。说完，两行热泪汹涌而出。刚结婚就要离婚，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她喃喃地、反复地对丈夫说，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群众，努力为党工作。我相信你，等着你，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等着你……

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十多年都这样过去了。这期间，吴晓恒承受着无比沉重的内心沉苛，以她女性的柔弱肩膀，挑起了工作和家庭双重担子。“请把我的党小组长职务撤掉吧，我不配。”吴晓恒找到党支部书记，诚恳地说。她打定主意，要更加拼命地工作，更加严肃认真地提高医疗水平为病人服务，更加彻底地断绝各种依赖思想……

她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直到临产前还在参加抢救病人；过度的劳累，使她在产床上整整煎熬了三天三夜，没有一个亲人守在身边。大儿子出生不久，先后得了新生儿肺炎和中毒性消化不良，脱水，酸中毒。为了保庄那先天不足、此刻游离在死神魔爪之下的弱小生命，吴晓恒以一个母亲的慈爱和坚韧，整夜整夜的守护着孩子。孩子一吃牛奶就吐，她便把牛奶反复熬，熬得看不见一星油脂，再滴进枸橼酸，自制成脱脂酸奶。终于，灾难被抗过去了。

人们看到吴晓恒的脸庞一天天憔悴，可翻开她的考勤册，竟是超负荷全勤。由于她的工作特别出色，她很早就被提拔为主治医生。多次受奖，还荣立了三等功。

只是，丈夫这一走，使吴晓恒独身的日子一过就是十来年，并且拖着孩子。个中艰辛，谁人为知！奇怪的是多年来的、重负之下踽踽独行，并没有令吴晓恒产生过多的委屈和抱怨，更多的时候，她心里充满阳光。

原来，她认为靠自己才是最靠得住的，正如《国际歌》中所唱的那样。她说，生活不总是风雨雷电，同时也是绚丽多姿的。任它天大困难，八面来风，只要坚定自己的人生理想，坚信自己投身的事业有着光明前途，就不会垮掉。

“我不能无故被别人斗”

这是一个平常日子，吴晓恒像往常一样挤在人群中看大字报，她沿着礼堂的四周一张一张地看着，思考着。经过一段时间对“最高指示”的认真学习，以及“早请示，晚汇报”，她又糊涂又似乎明白一场叫做“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开始了。她作为“革命群众”的一员，理应响应号召，关心国家大事。

蓦地，一张大字报的黑色大标题映入她的眼帘：《吴晓恒是修正主义黑标兵》。

她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人们在头天开会时还在表扬她，要评她为先进工作者。她使劲揉了揉双眼，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没错！竟然一点儿没

错！

“吴晓恒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

“剥掉吴晓恒假先进的画皮”

“打倒特务吴晓恒”

吴晓恒双耳嗡嗡作响，这些空穴来风，吹出来一顶顶帽子压得她双脚走路像踩在棉花堆里一样，她感觉透不过气来。按她当时的理解，“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和自己怎么能挂上钩呢？

说来并不复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逻辑在那个年代盛行，于是有人抓住吴晓恒家庭出身是地主这一条，大作文章，“孝子贤孙”的帽子就这样炮制出来了，要争着“剥画皮”。还有人绘声绘色编一个“05特务案”，吴晓恒由于与此案中的“骨干分子”有工作上的交往，就自然而然成了“特务”。

吴晓恒恍如正在做一场恶梦。她意识到，自己这个昨天的标兵、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好党员，将要成为斗争的对象。一连几天，她失眠了，心中满是困惑。她不明白，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字报针对着她这个普通人而来？那些大字报的落款都是她所熟悉的战友和同事，平日里大家在一起工作并无多大芥蒂，何以一夜之间反目为仇？就是一些没有贴她大字报的昔日的伙伴们，也一个个像防传染病一样防着她。在她最需要温暖和慰藉的时候，没有一个微笑，没有一声问候，甚至没有一瞥同情的目光，她感到透彻心肺的寒冷。

然而，此刻的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镇定自若，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决不是革命的对象，相反，是革命的同志。

凭着这份坚定的自信，她对“斗争”一词作出了具有个人特点的理解。她说：“斗争就是斗和争，我不斗别人，但别人斗我，我就要争，我不能无故地被别人斗。”

这样，吴晓恒每天的工作非常繁重，她既要完成分配给自己的那份护士工作，又要打扫厕所，还要纠正年轻护士开错的医嘱，做好本身承担的医疗工作，积极参加会诊堵塞可能造成的误诊、漏诊。不过，这样努力地干并不能减轻所谓的“罪行”，斗争还在继续，还在升级。半夜提审抄家搜身，生活虐待，屈辱折磨，等等，数不胜数。

一天晚上，两个小护士对她大声质问：“吴晓恒，你知罪吗？”

“我不知道有什么罪。”

“你不要耍滑头，避重就轻，跟我们走一趟！”

“不去！”吴晓恒双手搂着两个孩子，断然拒绝。

只听“啪”的一声，吴晓恒被人打了耳光，打得她眼冒金星，脸颊上留下了五个紫色手印，孩子也吓哭了。

“打入是犯法的，你们有什么权力打我？！”

挨打不是一次两次了，吴晓恒并不示弱，并不苟全。但没有法子，她终于被关进牛棚。星期六到了，正被隔离审查的吴晓恒为到幼儿园看望两岁多的小儿子，向看守员请假，遭到冷漠拒绝。于是，她拍桌子，摔板凳，连哭带喊，以示抗争。终于，她的抗争战术取得了小小“胜利”，从此她在周末能够见到无辜受累的心爱的小儿子了。

第二章 汗洒沱沱河

44岁“吴老太”进军青藏高原

“我从来不以生为女性而自卑”

3月正是乍暖还寒时节。

广州市“羊城巾帼献才建功报告会”盛邀吴晓恒将军作报告。在这个隆重的报告会上，吴晓恒面对着来自各条战线的姐妹们，发出肺腑之言：“我有幸被评为‘广州市三八红旗手标兵’，并获广州市羊城巾帼献才建功竞赛活动‘红棉杯’奖，心里非常激动，这是组织上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没有有什么突出贡献，但我从来不以生为女性而自卑……”

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批准了格尔木——拉萨输油管线工程。为了做好工程保障工作，上级决定由第一军医大学派遣一支医疗队到青藏高原。一声令下，第一军医大学召开了动员大会。吴晓恒听完动员，立即报了名。

领导上考虑到吴晓恒年龄大（当时要求女同志在40岁以下，而她已经44岁），分别已久的丈夫才调回来不久，身边的孩子无人照顾等，没有批准她的要求。吴晓恒不灰心，第二次去找领导，恳切陈词，表示所有困难她都可以想办法克服，希望给她一个到高原锻炼的机会。然而，领导还是拒绝了。

照理说，既然一次再次地不被批准，吴晓恒大可就此罢手了，有这份积极争取到艰苦地方执行艰巨任务的心意也就够了。但是，她并不想表现自己，她诚心要去。她向往到那早在19世纪便被探险家划为“生命禁区”，空气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气候环境对人体健康具有严重危害的不毛之地，去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尤其在当时有些同志不敢去的情况下，在一些人认为男同志去了都受不了，女同志更不能去的情况下，吴晓恒不信这个邪，她决意要去。她想了很多办法，找领导反复要求。

领导既感动又纳闷：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怪！有的年轻人本来可以去，名单宣布后却借故推辞；吴晓恒本来可以不去，她却把自己当作年轻人，偏要去！

在家里，吴晓恒得到丈夫的支持。

吴晓恒终于被批准参加赴青藏高原医疗队，成为医疗队中年龄较大的队员，由此获得“吴老太”的绰号。同时，她担任组长。

1976年1月，在人们忙着准备过年的时候，吴晓恒和医疗队员们登上了开往大西北的列车。经过15个日夜的颠簸，来到格尔木，她所在的小组被分到长江源头——奔腾不息的沱沱河畔。

“说什么也得坚持”

西北高原的气候真是一天三变。早晨，刚刚呼出的水蒸气，到了嘴边就结成霜；中午的气温却接近40摄氏度，灼人的紫外线照得全身火辣辣的；晚上，一外出就冻得手脚发僵。另外还有诸如氧气不足、水比油贵等困难。为保障工作的开展，医疗队的同志每晚要轮流吸一次氧，吴晓恒作为组长，总是叫大家先吸，她自己最后一个吸并且吸得最短。

尽管头天晚上吸了氧，第二天工作还是不适应，于是，吴晓恒作了一个决定：每周一、三、五早晨，医疗队员和驻地战士一起出操20分钟。所谓出操，只有跑步。内地人来到高原，走快一点都喘气，更别说跑步。结果一个、

两个、三个人都掉队了，蹲在地上大口喘气，吴晓恒却始终跟在战士队列后面。一位年轻军官见她脸色铁青，急忙喊道：“吴医生，您不能再跑了！”吴晓恒摆摆手，“别管我……我能……跑！”

一位护士蹲在地上发牢骚：“跟吴老太在一起真倒霉！也不知她哪来那么大劲几，让人跟着活受罪。”牢骚发完了，她又站起来呼哧呼哧往前跑。因为她想到，自己的年龄不及“吴老太”一半，“吴老太”能跑，自己不能跑，这也太没面子了。

强制性的锻炼，使医疗队员身体素质有了提高，初步适应了高原的恶劣环境。此后，医疗队在4000里青藏线上忙开了，“吴老太”更是大显身手。从格尔木到唐古拉，人们都知道医疗队有个“吴老太”，慕名来找她的病号越来越多。她和医疗队的同志白天外出巡诊，晚上在“干打垒”小屋里接受急诊，遇有危重病人，则不论白天晚上都紧急出诊。不知有多少患有急性肺水肿、急腹症、胃出血、阑尾炎、麻疹、合并肺炎等疾病的干部战士和藏族同胞，是在医疗队的帐篷里，在煤油灯下，在木板搭起来的手术台上，经诊断治疗而恢复健康的，更有一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病人经过医疗队同志妙手拯救，化险为夷。“吴老太”和她的战友们拖着超负荷的、疲惫的身体，活跃在海拔5100米、代号为“103”的工作点上。病人的痊愈，是他们生活中最大的愉快。

不到青藏高原，不算见识过“白毛风”。

这一天，“吴老太”和战友们巡诊归来，突然间，狂风怒吼，大大小小的碎石从天而降；紧接着，黄色的尘沙和漫天雪花汇融在一起，天地混沌，一片苍茫；一霎时，山被吞没了，河被吞没了，东西南北的概念消失了。

队员们双手抱头，匍匐在地，一个个被淹没在旷野上。风刮多久，就只有老老实实被淹没多久，如果硬站起来就有可能被狂风卷到空中。为了防止失散，她们凭对方的嘶喊来判断方位，然后靠爬行集结到一起，留下的是胳膊肘和膝盖上的斑斑血痕。狂风过后，“吴老太”等人站起来，眉眼不分，活像几尊西部的雕塑。

另一次，“吴老太”和一位小护士被风雪所困，小护士带着哭腔问：“吴老太，咱们是不是迷路了？”

“不会的，这条路我走过好几次了。”

“我实在走不动了，咱们歇会儿吧！”小护士说罢，一屁股坐在地上。

“不行！说什么也得坚持。”“吴老太”想去拉小护士，不料一个趔趄，她自己也栽在雪窝里。

她实在没有力气爬起来了，胸口堵堵的，像塞着一团棉花，呼吸越来越急促，手脚已冻僵了。但她知道，许多人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将生命埋在雪山怀抱里的。一定要爬起来！她给自己下着命令。她先用手撑起上身，然后，深深地运一口气，凭着意志，终于摇摇晃晃地站立起来。她走向小护士，两行蹒跚而顽强的脚印不断向前延伸。

在1977年第五期《人民中国》杂志上，刊登了一篇记录“吴老太”及她的战友们在青藏高原一年间，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及种种动人事迹的文章，还配发了照片，使海内外的朋友们看到了“吴老太”的飒爽英姿。

“原谅我16年来没有回去看望您”

高原的夜晚，寒冷，单调，只有无穷无尽的风裹着永远飘洒不完的雪，带着沉闷的低吼，不时从远处空旷的山谷中传来。

前不久，吴晓恒接到丈夫的来信，从信中得知她走后不久，丈夫也参加了单位组织的抗洪抢险医疗队，大儿子插队去了乡下，小儿子临时寄养在同事家，一家四口人，分别在四个地方。

这封信牵动了吴晓恒思念的翅膀。她一个一个地想着亲人，想着假如此刻她在家，她会为丈夫和孩子们考虑些什么，叮嘱些什么，做些什么……

当然，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她苦笑了一下，摇摇头，把这些事情都丢在了脑后。

可是这天，她接到了弟弟的来信，信上说：妈妈在三个月前患了感冒，后来引起肺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老人家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吴晓恒顿时泪眼模糊，不能再往下看了，把那被泪水浸湿的信紧紧地捂在胸口。这一夜，她思绪翻飞，不曾合眼。

她遥想着，母亲生前，为了支撑这个过早失却圆满的家，是那样含辛茹苦。儿女们一个个长大飞了出去，她老人家默默地只身住在武汉，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从不轻易向儿女们开口。16年了！她这个女儿整整16年没有回去看望过母亲。老人理解儿女们的苦衷，从未在信中说过半个字。母亲是以何等博大的胸怀，才忍受住了这漫漫长夜的困苦孤寂啊！

她遥想着，自己在“蜜月”期间携夫婿探望母亲，那是一次多么痛苦而又珍贵的会面！离别时，母亲以她那显得呆滞的目光，久久凝视着女儿，闭合了许久的双唇微微蠕动着，好不容易才张开，似乎要对女儿说些什么。可是，母亲很快又把双唇重新闭紧了，再也不张开了。吴晓恒始终不知道母亲咽下去的究竟是一句什么样的话，尽管她坚信那一定是母亲最想说的一句心里话。如今，这已经成为终身的遗憾。

高原医疗队的“吴老太”真想大哭一场。

清晨，吴晓恒悄悄来到一个背人的山坡，采撷了一堆野花，编成一个小小的花环，祭奠母亲，请求母亲原谅：

原谅女儿的不孝；原谅女儿16年来没有回去看望过您；原谅女儿在您生前没有精力照顾多灾多难的您，在您身后不能回去见您最后一面；原谅女儿尽管掌握了精湛的医疗技术，曾经救活过多少比您的病危重得多的病人，却无力挽回您那远不该结束的生命……

可以告慰母亲的是：发奋工作，是女儿追求的精神的高原。

第三章 花开第一枝 托起医疗科技上的奇迹

“救人比什么都重要”

1970年6月，广东新会县发生一起大面积有机磷中毒，有关部门紧急要求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选派业务精、政治条件好的医护人员组成医疗队，前往抢救。

此时的吴晓恒刚刚结束长达半年多的莫须有的罪行审查，重新获得工作的权力。她万分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工作权力，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把损失的工作时间补回来。

正在这时，教导员郭希章就吴晓恒参加医疗队与否征求她本人的意见，吴晓恒说：“组织上相信我，我就去，坚决完成任务。”

很快就要出发了，吴晓恒的丈夫却恰好从东北赶来广州探亲。教导员于是改变主意，关切地对吴晓恒说：“你们夫妻 10 多年都没有团聚了，这次医疗队你就别参加了吧！”

“定下来的事不要再改变，老杨来探亲，就先委屈一下吧，救人比什么都重要！”吴晓恒告别千里迢迢来广州，刚刚踏进家门的丈夫，坐上卡车就出发了。

有个名叫郭春妹的患者，经过两天两夜的抢救还是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吴晓恒在当时条件下没有资料可查，很难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最后，她综合多种考虑，决定采取大剂量阿托品注射的方案。几个小时之后，病人针尖般的瞳孔开始散大，昏睡了 50 多个小时的身躯开始扭动。

吴晓恒从这微妙的变化中看到了转机，已经忙碌了一天一夜没有合眼的她，用凉水洗了洗脸，继续进行下一步的抢救。后来病人又出现了心律失常——室性心动过速，吴晓恒不顾疲劳，连续作战，终于使郭春妹醒过来了。当她知道是解放军医疗队中的吴晓恒大夫等把她从死亡线上拽回来的时候，眼中泪光滢滢，充满了感激之情。

一个星期之后，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班师回营。当地群众男女老少自发排成队，敲锣打鼓欢送医疗队，郭春妹拉着吴晓恒的手，泣不成声。

这时，吴晓恒的一位好友对她说：“真替你捏一把汗！幸亏你这次成功了，假如出纰漏，你又罪加一条——阶级报复。”吴晓恒一笑：“当时我哪里想那么多啊！”

事后，围绕着是否给吴晓恒立功的问题，在医院党委的会议室里发生争执，赞成者认为吴晓恒在这次突发事件中表现突出，按惯例应该立功；反对者认为吴晓恒是一个“有问题”的、没有彻底“解放”的人，这样的人怎么能立功？争来争去，终于确定了一个折中方案：给予吴晓恒嘉奖。

最为荒唐的是，在对医疗队的工作进行全面总结的时候，吴晓恒的名字连提也没提。或许，工作好做，名字不好提吧？又或许，既然斗过她，又要表扬她，情理不大通吧？

吴晓恒自己可并不在意，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有人说她傻，她仅仅报以微笑了事。她习惯了在逆境中搏击，习惯了以职业道德操守为价值取向。

“我这个人讲起责任是从不含糊的”

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吴晓恒得到彻底解放，她担任了南方医院内科科主任。

这是 1982 年 12 月的一天，出差刚回来的吴晓恒正在家里忙着洗却征尘，电话铃骤响。

“什么？！抢救病号？好！我马上来！”吴晓恒像似听到了战斗口令，丢下手头的一切，大步流星向病房奔去。

病人叫玛莎，美国公民，65 岁，随某旅行团来广州旅游，晨起刷牙，突然跌倒，心脏停止跳动。随团医生发现后，紧急进行体外心脏按摩及口对口呼吸，延续了 12 分钟后心跳才复苏。

12 分钟！吴晓恒一怔。心跳停止 6 分钟，生命之火将无可逆转地熄灭，

即使救活，也将是一个脑死亡的植物人，这是医生们都熟知的一般性传统理论。美国旅游团的医生也毫不例外地持有这种见解，在该旅游团乘当日早班飞机回国前，他取下了玛莎的假牙，准备回国后交给玛莎的亲属，请他们来广州办丧事。

玛莎奄奄一息，罩在她脸上的人工呼吸器有节奏地发出咕哒咕哒的声响，似乎在帮助她拖延时间。

为挽救玛莎的生命，南方医院组成了最强大的医疗阵容，第一线由副院长陆振刚教授和心内科科主任吴晓恒、副主任刘伊丽、许坤范组成抢救小组。

吴晓恒面色严峻。病人的情况很严重，血压一直不稳，意识不清，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室性期前收缩，心房纤颤发生次数频繁，肺部有感染。她把目光移向心电监视仪，只见那毫无规律的心电轨迹正在杂乱跳跃，真是风云莫测。

吴晓恒深感责任重大。她与同事们制定了一个又一个详细的抢救方案，指挥抢救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她自己则坚守在一线岗位，以病房为战场，与病魔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1小时、2小时……10小时过去了，情况仍令人颇为失望，心电示波器上显示下壁心肌梗塞、心源性休克，此外没有一线希望的信息。吴晓恒数小时没有合眼，密切观察，几乎片刻不离，她不住地用风油精往自己“太阳穴”上擦，生怕一合眼放过了那些虽然微小却有价值的瞬间变化而下错了指令。

24小时过去了。突然，吴晓恒发现示波器上的波纹陡地突起三个整齐锐利的峰，她的心一下子缩紧。这是阵发性室性早搏的信号，室颤的前兆，许多生命的小船，就是在这里沉没的。病房的空气紧张的像要凝固，吴晓恒警醒自己要保持镇定清晰的头脑，然后，她紧急指挥进行抗心律失常药物的调整及采取其它措施……过了一会儿，心电波终于慢慢地恢复了正常。

72小时后，玛莎苏醒了！死神拒绝了她，她回来了！

在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帮助下，玛莎的女儿黛安为料理母亲的后事，几天后匆匆赶到广州。当她走进中国军队的南方医院，看到母亲还活着，并且安详的脸上漾着一抹微笑，她简直不能相信！要知道，她本人也是心脏科的护士。只见她握着母亲假牙的手激动得有些发抖，眼睛涌满了惊喜的泪花。她双手合十，喃喃自语：奇迹！东方的奇迹！猝死12分钟的心脏病患者在中国南方医院起死回生！电视、广播、报纸等各种新闻媒介争相报道，消息迅速传遍大洋两岸。一年以后，玛莎在女儿陪同下又专程从美国来到南方医院。或许，她觉得自己无论带来什么礼物——此次带来的是几本大部头医学文献——一部不够分量，她流着泪一个一个地拥抱给了她第二次生命的中国医生们。

吴晓恒不习惯这样被人感激，尽管她一辈子都在被她的病人感激着。为了淡化对方的感激心情，她总是那一句话：“这是我们的责任。”

第四章 将军摆战场 她的信念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真是难为我了”

1983年夏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宣布了一项上级领导签署的

命令：任命吴晓恒为第一军医大学副校长。

这是一个副军职工作岗位，在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历来有许多巾帼女将，然而，能够进入军以上领导岗位者，尚属凤毛麟角。

对吴晓恒来说，从正团职科主任到副军职副校长，连晋三级，这种跨越本身分量是不轻的，意义是深远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并不是仅仅关乎她个人职务的升迁，更主要是关乎到党和国家、军队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培养和选拔干部方面的大政方针。

历史选择了她。

她的回敬是对历史负责。

有人问：历史为什么选中了她呢？按说，原因恐怕很多很多。但认真追溯起来，吴晓恒在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特别是在每遇风吹浪打的严峻转折时刻，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十分难能可贵的品质，或许不能不算是主要原因之一。这就是，意志坚强，荣辱不惊。

新任副校长吴晓恒感受更多的是压力。

第一军医大学是国家和军队的高等学府，是在一所与共和国大体同龄的军医学校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是祖国人民自解放的那天起便投入力量精心养育的。她经历了由北到南三次大的搬迁，于 1970 年来到华南大都市广州。如今，她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老校长赵云宏同志创立、经过历届党委努力完善的“一体两环”办校模式的指导下，在学校各级党委、机关和全体干部战士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其地位显著提高。无论是她那美丽的校园，还是她那享誉海内外的附属南方医院、珠江医院等，在人们心目中，都已经成为促进人类健康的圣地。

作为领导这块圣地全面建设的班子成员之一，吴晓恒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在第一军医大学新老班子交心通气会上，新任副校长吴晓恒推心置腹地讲：“我在心脏、血管这个专业工作 30 年，感到丰富多采，爱上了自然科学王国。现在，却要进入社会科学王国与管理科学打交道，真是难为我了。不过，既然历史选择了我，我就要对历史负责。尽管我对放弃心爱的专业实在难免有几分踌躇，几分惋惜。我要从头学起，从头干起，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不拿科研一等奖死不瞑目”

按照校党委分工，吴晓恒分管科研和医疗工作。一次在北京开会，吴晓恒因内疚、惭愧而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坐不住。原来，一位领导同志说：论科研，一医大不行，比别人差远了。

吴晓恒得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一医大由于数次搬迁，几度易名，人才匮乏，经费不足，设备落后，基础薄弱等原因，在医学科研方面起步较晚，水平明显滞后，科研成果寥寥无几。一等奖为空白，二等奖仅有 4 项，不但落在兄弟单位后面，而且制约了学校自身的整体发展。

会议一结束，吴晓恒立即飞返广州。在向赵云宏校长汇报了会议情况之后，毅然决然地立下军令状：“在我任职期间，学校科研拿不到一等奖，二等奖不翻番，我死不瞑目。”

她组织了一支由备学科专家参加的精兵良将般的队伍，亲自带队，奔赴各地，到军队和地方的 20 多个单位 60 多个科、室、所，学习考察取经，参照和研究了大量资料，掌握了一些极有价值的信息。她要求大家：对人家的

经验要吃透，对自己的问题要认清，对国内外先进水平要追踪瞄准，对科研课题的攻关路子要清晰明确。

她召开一系列由学校各类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发动大家出谋献策。她还迈开双脚，到临床科室及各教研室调查研究，听取意见。

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她主持制定了学校科研改革规划蓝图。其总体思路是：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相结合，学科互渗；一般课题与重点课题相结合，低高互促；校内研究与社会协作相结合，内外互利；近期目标与远期规划相结合，长短互顾；理论研究与产品开发相结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

吴晓恒扑下身子，从课题抓起。

经统计，全校原有科研课题实在少得可怜，三分之二的科室没有课题，三分之一的科室有课题，但水平很低。吴晓恒组织教授、副教授、讲师等三级人员分批开会，大力号召层层动员，鼓励大家开科研风气之先，激发对科研的兴趣，勇于承担科研课题，为提高全校科研水平作出贡献。

按国家规定，可以从课题经费中抽出一定比例的管理费。比如，某项课题经费为20万，其中的1万5千元便可以作为管理费。但是，吴晓恒为了调动全校专家教授从事科研的积极性，为了保障全校重点科研课题能够以世界科技前沿、科技尖端为目标，高起点、高水平地实施，在管理方面的经费是能省则省。在她主持学校科研工作的8年间，没有收过一分钱管理费，全部科研经费都不折不扣地用在科研中。

至今，这件事在第一军医大学有口皆碑。

她体谅科研工作的难处。比如，所付出的心血精力比别人的工作大得多，所耗费的时间又长，而取得的科研成果却并非总是与付出的劳动成正比，数年心血推倒重来的情况是常有的。于是，在她的建议下，第一军医大学设立了“校长科研基金”，三年共500万元，除部分作为培养人才、著书立说的经费外，大部分扶植分子生物学高科技课题、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课题、博士、硕士的医学课题及其它有希望的课题。在各课题尚未取得专项科研经费的情况下，先拨几千元，促其启动起来。根据学校当时的科研情况，她还建议并经校党委讨论决定：凡取得二等奖以上科研成果者，记三等功一次。人们说，她把温馨的人情味引进了严肃冷峻的科研领域。

科研积极性火山爆发一般调动起来了，全校各科室总共报了100多个科研课题。为提高课题命中率，吴晓恒组织对课题内容的严格的评审，逐一按有关条文规定去做，并把相同、相似的课题归纳、合并，提高课题层次；把分散的课题集中，变成一个高水平的大课题，提高一举命中的把握性。她要求凡上报的课题一定要打印清晰，在课题形式方面不得出现任何纰漏，她经常亲自逐句、逐行地把关。

申报一等奖，按要求评审时需要放录像8分钟，放幻灯（边放边讲解）15分钟，回答问题5分钟，总共半个小时。许多专家教授对这三堂会审式申报形式不大适应，往往临场慌神。吴晓恒便事先组织模拟答辩，从哪些适合放录像，哪些适应放幻灯，到讲解的脚本撰写，以及通盘考虑，可能会提出哪些问题等，精心设计，精心演示。

国家有一个科研课题命中率和科研经费排名统计表。以往，第一军医大学根本上不了名次。经过吴晓恒及第一军医大学广大科技干部几年来的不懈努力和各方协作，这一局面彻底改变了。1992年，第一军医大学科研课题申请的命中率排列进入前十三名。由于课题命中率高，近年来，全校争取到科

研经费一千多万元。

1985年以来，第一军医大学获国家科技进步二、三等奖7项，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合作1项），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1项，银奖2项，七五期间，学校承担了自然科学基金“八六三”高科技项目、国家“七·五”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军队“七·五”攻关项目和广东省攻关项目等102项科技项目的研究。在“八·五”期间第一年，更获得广东省以上科研项目103项，获取的科研资金超过了“七·五”总和。

第一军医大学的科研工作进入鼎盛时期，成为全国高校有名的科技开发“大户”，他们创制的多项高科技产品，成为市场上的畅销品，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令海内外科技界、知识界、教育界刮目。与此同时，吴晓恒也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在本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东南部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成为改革开放窗口，经济高速发展，物阜民丰。然而，中国的科技重心历来不在珠江三角洲。就在这样一片科技相对匮乏的沃土上，第一军医大学这支生龙活虎的科技生力军，意气风发、后劲十足地在珠江三角洲跃起，并开始走向全国。

“这个东风非借不可”

第3次中美烧伤会议就要在中国召开了。按两国协议，该会为两年一届，轮流在两个国家开。那么，本次会议能否争取到第一军医大学来开呢？吴晓恒脑子里自从冒出这个想法来，就开始坐卧不安，以至这个意愿越来越强烈。

当时的情况是烧伤科的研究室刚刚上马，缺钱缺物缺人。要接待一个国际性专业会议，谈何容易。

吴晓恒考虑了很久。“烧伤”在第一军医大是个弱项，反之，二、三、四军医大在“烧伤”方面都搞得很不错。吴晓恒心想，平时、战时都需要烧伤、创伤，一所高等军事院校，烧伤、创伤都上不去，怎么算军事院校呢？这不是她吴晓恒的责任是什么呢？

她定下决心：要尽最大努力，千方百计争取会议在学校召开；借会议东风，把学校烧伤研究中心建立起来，病房要完善起来，促进烧伤的医疗、科研上台阶。

有人怀疑：凭学校的条件，竟想接待国际烧伤会议，不是开玩笑吧？

吴晓恒斩钉截铁地说：“困难是有，但这个东风非借不可！”

经过前后一年多时间的争取和筹备，第3次中美烧伤会议如期在第一军医大学举行，获得圆满成功。之后，学校的烧伤研究中心得以高起点建立和迅速完善起来，并以设备精良，技术不断提高而获得了立足之地。

吴晓恒在工作中处处表现出来的思维的敏锐，让人不能不眼。

那是1988年，她到国防科技大学参观。当她看到电子计算机显示一个苹果的三维图像时，突然停下脚步，久久不肯离开。她默默思忖着：目前的医学图像都是平面的，看来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医学图像处理势在必行。

回来后，吴晓恒在一次校长办公会上提出建立医学图像研究室的设想。赵云宏校长觉得这个设想非常新颖，很有前途，于是当即拍板，由吴晓恒全权负责组建。吴晓恒受命后迅即带领有关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再度到国防科技大学参观学习，并就微循环计算机分析，与国防科技大学的李树祥教授签订了协议书。

不久，李教授来广州履行协议，吴晓恒把他请到办公室，两人围绕着运用电子计算机研究医学用的图像的重要性、可行性及前景等，作了恳切长谈。在充满信任、友谊、和谐与默契的气氛中，彼此都感到谈得非常投机，在许多方面颇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意味。

李教授突然问：“我到你们这里来行吗？”

“嗨！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吴晓恒立即站起来，热烈地向李教授伸出欢迎之手。两人随即“哈哈”开怀大笑起来。

由李教授主持的医学图像研究室很快在第一军医大学建立起来。在随后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医学图像研究室和微循环研究室合作，设计完成了YK——MICAS微循环计算机分析系统。有关专家认为，这个系统的建立及其先进性在国内应属首创。

吴晓恒为了十六层科技大楼的建设，可谓呕心沥血。大到科技大楼的总体规划布局，小到科技大楼的每件器具的型号、规格、材料、颜色等，她都一一过问。她甚至搞过一次“偷梁换柱”的事，更不能算胆子不大。这件事被人们当作一个“问题”议论不休的时候，她果然正与有关人员躲在办公室里，研究、匡算一笔200万元的款子如何开销。

原来，学校常委决定，拿出200万元装修科技大楼会议厅，由吴晓恒具体负责。吴晓恒的想法是要么不装修，要装修就要装修得像样一点，因此，200万元显然不够。怎么办？吴晓恒苦苦思索，办法还真给逼出来了。她提出“大学的事大家办”，把6个会议室的装修任务分别交给训练部、中医系、医工系、南方医院、珠江医院、南方药厂这六个单位，并规定谁装修谁命名共同使用。结果这六个单位积极性都很高，把六个会议厅装修得既实用又气派，达到国际会议厅标准。

赵云宏校长问吴晓恒，装修会议厅学校一共花了多少钱？吴晓恒说：“一分钱也没花。由各直属单位自己出钱自行装修，分管共用。那200万元我用来建立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了。常委同意建这个中心，可您不要忘了，您可没给我钱。”

校长点点头，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嗣后，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在两年内拿回了6个课题，在教学和科研中日益发挥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吴晓恒就是这样，以战略家的超前眼光和战斗员的务实精神，一手拿着实验室建设的图纸，一手握着人才清单，脑子里盘算着如何弄到所需经费，眼睛中盯着分秒必争的时间表，先后组织筹建了休克微循环实验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骨髓移植实验室、临床生物力学实验室、医学图像研究室、实验动物中心……等等。

如今，人们面对着这些历尽千辛万苦而建立起来的科研教学医疗场所，面对看由这些场所聚拢和培养出的大批优秀人才，分享着第一军医大学赖此取得的丰硕成果，不能不领略到，吴晓恒将军是怎样的不辱使命。

“同意。吴晓恒”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的年代。部队恢复了职称评定。一天，一位内科医生敲响吴晓恒家的门。

吴晓恒急忙从厨房里迎出来，解下围裙，让坐倒水，礼仪有加。

“吴晓恒，你现在是科主任了，不简单呀！不过，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对待我们这些老同志。”这位医生落坐后，不紧不慢地说。

听口气，她的来意不大善，但也并不在吴晓恒意料之外。她知道，在这次职称评定中，该医生的初级晋升中级职称未上报，可能引起了一些误解。既然她登上门来，正好可以认真谈谈。

吴晓恒娓娓耐心地说：“你是由护士改为医生的，没有经过专门训练，按上级晋升要求，这次你不能晋升。老实说，与你同等资历的医生，其它科室虽然大都将其中级职称上报了，但实际上是得不到批准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如果我们都把矛盾上交，对你，对领导都是不负责任的。我们的任务是培养、选拔和使用人才，我这个科主任对科室每个同志都是有一定设想和安排的，我想我们之间是可以互相理解的。根据你的情况，应该创造条件加以培养。我的工作一向得到全科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希望继续得到支持和帮助。”

听了吴晓恒的一席话，这位医生觉得倒也有些道理，可是，是真是假呢？这个吴晓恒正是自己在“文革”中过火地对待过的人，她会不会在这次评职称时利用科主任的权力搞打击报复？她想不明白吴晓恒为什么又这样像老朋友似的坐在一起坦诚交谈？

这时，吴晓恒又说：“我准备建一个肾病实验室，先送你去进修，这样，你的实际业务水平提高了，职称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

这位医生是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情，离开吴晓恒家的。只是在事后不久，她果然被通知去南京进修学习的时候，心里才涌出一股复杂的感激之情。她很珍惜这个提高的机会，学习刻苦，写出了有一定水平的论文。

吴晓恒为这位医生的进步感到由衷高兴，在第三年晋升的时候，她拿起笔，在这位医生的职称晋升申报表上，负责任地签上了“同意。吴晓恒”几个大字，然后向上级作了晋升的推荐。

这位医生的中级职称命令很快就下达并公布了。而这时与她情况相似的一些老同志，虽然其中级职称已两三次地上报，却还是没有批。

吴晓恒的心，在面对着“人才”问题的时候，就是这样玉洁冰清，没有丝毫的虚伪成份。不单这位医生，内科的同志们大都有这种感受。人们的各种方式表达对这种感受的认同和尊崇。在一次提前晋级的评议会上，吴晓恒不在场，这位医生作为老同志，摆出实实在在的5条理由，推举吴晓恒提前晋升。此意见博得大多数与会者赞成。

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随着吴晓恒自己工作范围的扩大和责任的加重，作为副校长的她意识到，近年虽然建立了一些实验室和临床医学专科中心，但其宗旨都是为了出人才，出成果，只有以人为本，这些中心才能活起来。第一军医大学本身是一个巨大的人才资源宝库，如何运用这个宝库，是最需要花大力气来做的。

博士甲按所学专业本应分到药理教研室，但征求本人意见时，他几次提出想去医院小儿科骨髓移植实验室。出于爱才之心，学校同意了。不久，一位研究胎肝移植的博士乙来到学校，由于博士甲已经把骨髓移植实验室的位子占了，只好把博士乙分到细胞生物学实验室。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过了一段时间，细心的吴晓恒发现，两位博士的用武之地都没有选准，妨碍了他们专业才华的施展。于是，她决定让他们各归其位。她先分别找两位博士谈，谈通之后，又找医院领导和训练部领导谈，煞费苦心。别看都是实验室，由于

它们不属同一个“庙”，要达成“三国四方”协议并不容易。正当眉目清晰准备调动时，突然又节外生了枝，一位很有名望的老教授执意要把博士乙调到自己主持的微循环实验室，博士乙抹不开面子，答应了，吴晓恒只好又做老教授的工作。

终于打通了最后的关节，将两位博士安置妥当之后，有人问：作为学校领导，为这样具体的事耗这么多精力是何苦？

吴晓恒笑着回答：这是具体事，但又是大事，抓大事就应该有条理，不马虎。一个人才被放错位置，对领导来说也许只是小小疏忽，而对这个人来说却可能会误其一生。这样岂不是对学校、对个人都造成损失。

一位陌生人敲开吴晓恒家的门，毛遂自荐：“我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毕业的，听说贵校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来试试。”吴晓恒闻之，即和她进行了一番详谈，审查了她的全部材料后，又带她去找干部部门。经过干部部门权衡比较，学校在众多的应试者中择优录用了她这个“人才”。人们围住这位幸运的女大学生问道：你和吴副校长有什么关系？你给她送了什么礼？……

那女孩噗哧一笑说：我压根儿不认识她，哪里送什么礼呀！

相比之下，吴晓恒的儿媳妇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的大儿媳妇是天津职工大学营养专业毕业的，当时第一军医大学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吴晓恒只要开一下口，调进学校是不成问题的，但吴晓恒就是不开这个口。儿媳理解婆婆，几经联系调到离家很远的暨南大学。“靠妈妈什么也靠不上”，这是吴晓恒两个儿子及两个儿媳妇的“共识”。

出书难，是压在广大知识分子心头的一块沉重的石头。吴晓恒考虑到这一难处，特别是了解到一些学术书稿虽然专业性强，读者面容，但价值存在，便从“校长科研基金”中拨出20万元，先后为六、七位教授出了书。对那些以一辈子心血完成一部专著的教授来说，不啻为莫大的关怀爱护。南方医院血液透析中心的教授侯凡凡，逢人便说起当年她考上博士生的事。是啊，类似这样的事很多，吴晓恒自己都不记得了。可是侯凡凡哪里知道，吴晓恒为此做了多少艰巨的工作，想了多少办法！考上一个博士生，3年的学习费用是3万，单位拿不出这笔钱。吴晓恒便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与之商量，由学校出一半，单位出一半；或由学校出三分之一，单位出三分之一，教研室出三分之一。总之，吴晓恒并不因为学校有一千多位科技干部而嫌“人才”多，相反，她永远是那样求贤若渴，扶持“人才”总是那样不遗余力。

第一军医大学自1979年起开始培养第一名硕士研究生，现在已有31个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在校研究生已达150多名。这一巨大变化和进步，是吴晓恒最感欣慰的。

“将军要有将军的样子”

1992年，吴晓恒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在全校团以上干部大会上，吴晓恒身着笔挺的军装，佩带着闪亮的将星，深情而又不无感慨他说：

我在第一军医大学工作了36年，对学校是有感情的；我在这里成长，留下了青春的足迹；又在这里走上领导工作岗位，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回顾我走过的道路，我深深感到，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学校历届党委、

领导及老同志的关怀和培养，没有机关及各直属单位党委、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没有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信赖，就没有我吴晓恒的今天。在此，我谨向大家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哗——会场上顿时掌声雷动。

人们目睹女将军的风采，回顾她在 10 年副军职领导岗位上创下的业绩，感到她是那样可亲可敬。为了学校的建设，她洒下多少辛勤的汗水，惠侨楼作证！科技大楼作证！许许多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医疗、科研和教学成果作证！

吴晓恒，这位新中国第二代女将军，无愧于党和军队对她的培养。她的出现不仅是第一军医大学的光荣和骄傲，而且是中国妇女、中国军队的光荣和骄傲。

女将军的足迹

裘山山

—

我来到重庆采访。

七月的重庆，真可谓烈日炎炎，热浪滚滚。早上一下火车，我就躲进了三医大招待所开着冷气的房间里。想到下午要出去采访，心里先怕了一半。这时门被敲响了，我打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位五六十岁的妇女，中等偏高的个子，整齐的短发，穿一身合体的素花套裙。她一面摇着扇子，一面满面笑容地对我说，你就是那位女作家吗？我疑惑地点点头，正不知如何询问，她身后钻出一位小战士给我介绍说：这就是你要采访的李希楷副校长。

我一下子感到非常不安：我要采访的女将军竟先来看我了。这么炎热的天气，这么高的楼，这么大的年纪，应该是我去她家的，而她竟先来看我了。不要说是个女将军，就是个普通采访对象，也应该是我去将就她的。当我一再表示出这种不安时，李希楷将军却非常随和地笑道，你远道而来，天又这么热，我来看你也是应该的，不用那么多的客套。再说我也想抓紧时间和你谈，因为很有可能我明后天就会有别的事情，到时候把你耽误在这儿多不好。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汗水从她的额头上一丝丝地渗出来，亮晶晶的，一直渗进我的记忆里，令我对这位女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这是一位完全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的女将军，其次这是一位不做表面文章、讲求时效的女将军。以后在我的采访中，这两点又被不断地证实了。

要说将军，我也见过不少，毕竟在军区机关里工作了这么久。可要说女将军，李希楷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军营是男性的世界，女兵本已少见，就更不要说女将军了。在没见到她之前，我和所有的人一样，先对她作了一番想象，想象她一定是威武的，严肃的，不苟言笑的，甚至有了满头白发。直至见到了，才发现她和我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至少是有很大出入的。她没有什么威武雄壮的气概，倒是有许多书卷气。对人非常和蔼，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精神很饱满，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小十岁。也许是因为她已经脱下了笔挺的戎装，所以一见之下觉得她不像个女将军，更像个知识女性（实际上，她确实是一位医学教授）。后来我从她口中得知，1988年与她一起授衔的五个女将军，全是高级知识分子。这也许就是和平年代军队的特点吧。只有当她谈起工作时，你才能感觉到她不是个普通的知识女性。长期的领导工作，已使她身上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干练和大气。

在来重庆之前，我已就采访事宜与校办公室电话联系过。故李希楷将军已经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她没有和我作多余的寒暄客套，很快就进入了谈话正题。她认为既是决定了要做的事，就应该尽快把它做完，没必要耽误在虚假的客套中。这种实实在在的作风很和我的心意，于是两个采访与被采访者，一拍即和。

她说，我先把我的经历大致给你讲一下吧。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00_0185_1.bmp}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00_0186_1.bmp}

我说，太好了。我正想有个完整的了解。

于是就开始。

我们的谈话是从她的名字开始的。我说从您的名字看，您大概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吧？

她笑着点头说：“是的。我的祖父早年曾留学日本和德国，回国后被任命为水利总裁。后因看不惯官场的污浊，弃官回老家当了一名律师；我的父亲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来做了一名铁路工程师，再以后一直在铁道设计院工作；我的母亲也是出身在爷香门第之家，祖上曾是清朝的官员。因是个女孩儿，外公没有让母亲进学堂，而是请了一位私塾老师在家教她。所以母亲虽未念过大学，却是知书达礼，端庄贤惠。我的名字即是母亲所取。‘希’是我们这一辈的字，‘楷’即端正之意。母亲希望我能做一个端端正正、清清白白的人。”

李希楷平和地将她的家庭一一介绍给我，声音柔和，不急不缓，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我说您是南方人吧？她说是的，我是江西人。

“1932年4月，我出生在江西南昌市，在我出生之前，父母已有了两个女儿，我是第三个。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冷落我，照样给予我应有的爱抚。那时父亲虽在铁路上做工程师，收入并不高。母亲又没有工作。在我之后，母亲又生了两个弟弟。家里的生活是

比较清贫的。但父母仍将我们三个女儿都送进了学校。特别是母亲，为了让我们五个孩子都能读书，她勤俭持家，精打细算，吃了许多苦。抗日战争爆发，我们一家离开南昌，和难民们一起颠沛流离，在赣南山区流落……以后物价飞涨，母亲为了给我们几个孩子交纳学费，又将她的陪嫁一一变卖……但无论是怎样的困境，母亲都没有剥夺我们上学的权力。也许她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悟出了这个道理吧，即女孩子只有读书掌握了真本事才能立足于社会，靠父母的陪嫁是得不到真正的幸福的。她对我说，我把你们供到大学毕业，就是给了你们最好的陪嫁。母亲是一位很开明的女性。”

“后来我们五个孩子真的都念完了大学。除了小弟弟不幸早逝外，其余四个如今都当上了教授，成为了国家的有用之材。回顾我自己走过的路，我真是非常感谢我的母亲。她的确是给了我最好的‘陪嫁’”。

我们像拉家常似的，渐渐进入了正题。

二

1950年，李希楷从南昌第一联合中学高中毕业了。当时她的两个姐姐都已经进了大学，一个学化学，一个学工程。李希楷也想学工程，她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工程师，好直接报效祖国。在母亲的影响下，她从年少时就在脑海里扎下了一个牢固的观念，即女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依靠家庭，不能依靠将来嫁一个好丈夫，而是应当靠自己，自强自立。“自强自立”这个提法在今天已是非常的普通，甚至显得有些陈旧，但在当时却很难得。所以李希楷从读书之日起就非常的刻苦用功，加上天资聪颖，她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数理化，从未下过95分。她打算报考清华大学。按她的成绩，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母亲得知后跟她商量说，你能不能就在南昌读书？这样离家近点儿，好省些钱。李希楷想到母亲为了他们几个孩子读书，已吃了不少苦，终日都在辛劳，就听从了母亲的建议。当时南昌有一所工业大学，还有一所医学院。李希楷想报考工业大学，但父亲又提出建议说，让她报考刚刚改为第六军医大学的华中医学院，一来是想到那是解放军的学校，二来是想到家里尽是搞工程的，没有一个学医的（李希楷的两个弟弟，后来也先后考上了清华大学）。

犹豫不决中，李希楷便参加了两所大学的考试。没想到由于学业出色，她竟两边都考上了。军医大学对女生的选择是很严格的，按百分之十的比例录取。直到现在仍是如此。这就要求女生的成绩必须高于男生。在那一年招收的60名学生中，只有5名女生，这说明李希楷被录取是非常不易的。再次选择时，李希楷终于还是听从了父母的建议，选择了医学院。这并不是因为她觉得自己考上不易，而是想到父母供她们读书太不易了，不忍违背他们的愿望。就这样，李希楷在1950年的秋天，终于穿上军装，走进了第六军医大学。

那一年，她18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华。

由于从小养成的吃苦耐劳的好习惯，进入大学后，李希楷很快就适应了学校里完全军事化的生活。军医大不同于其他大学，学员都是军人。每天除了繁重的功课外，还需出操训练，假期也不例外。在李希楷读书的五年中，竟只放过一次暑假。但她仍觉得生活里充满了欢乐。她的学业出色，一直是班上的佼佼者，令男同学们都刮目相看。而且她还是个多才多艺的姑娘，能歌善舞，是个挺不错的女中音，还会拉二胡，吹箫。这二胡和箫并没有人教她，也谈不上遗传。不过是因为有兴趣，她就花了几块钱买回来学，无师自通，很快就学会了，好像什么事情在这位聪颖的姑娘面前都没有阻碍似的。

但她最喜欢的，还是读书。为了能多读书，能尽快进入医学这个深奥的领域，她利用了所有的星期天和晚上，见缝插针，如饥似渴。这种读书的好习惯一直延续到她当了医生之后。50年代医院里曾流行跳交际舞，那么喜欢跳舞的她，竟从未参加过一次，甚至连看都没去看过。不为别的，只为舍不得时间。李希楷牢记着父母的期望，端端正正的做人。她确实像一棵优质的树苗，端端正正，挺拔向上。尽管学医不是她自己的选择，但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她就把它当成自己热爱的事业来对待，孜孜以求，精益求精。

紧张充实而又快乐的大学生活很快就过去了。1955年秋天，李希楷以优异的成绩从军医大学毕业了，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医务工作者。她一毕业，就赶上了我军第一次授衔，她被授予中尉。从这点看，李希楷似乎与军衔特别有缘。一年后，由于她表现出色，不仅很快入了党，还被破格晋升为上尉。当时得到这样晋升奖励的，全班只有她和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汪坤

李希楷终于成为了一名父母所期盼的救人于苦难的白衣天使。她从住院医生、主治医生、科主任一直干到院长、副校长；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似乎一路顺风，走得很平稳。但仔细翻看她的履历，却能感觉到她那寻常中的不寻常，顺利中的不容易。

三

尽管学医不是李希楷自己的选择，但在以后的行医生涯里，她却由衷地爱上了这一行。也许是医生这个行业，和她那聪慧善良的天性十分吻合吧。当我在采访中问她，你这一辈子觉得最愉快最幸福的事是什么时，她不假思索地说，就是当医生，亲手解除了病人痛苦的时候。那时候心里的愉快和幸福真是无法形容的。

这个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却令我高兴。我以为她会说，是被授予将军军衔的时候。

在后来的采访中我明白了，她说的都是真心话。她确实是一位好医生。如果不是后来的变化，她会当一辈子好医生的。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医生是一个最不能吃老本的行当。且不说医学本

身的无止境，单是从它的发展，无论是治疗技术还是药物，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有位老医生曾形容说，一天不看书自己知道，两天不看书同行知道，三天不看书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很生动地说明了作为一个医生，是必须不断学习的。

李希楷在这一点上，恰是继承了父亲的敬业精神。她一直把钻研业务精通医术，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对待。在当医生的那些年里，她严格地给自己立了一条规定，每天无论工作多忙，也要挤出五个小时来读书。结婚时，他们的小家建在了丈夫所在的西南医院，而她还在新桥医院上班。蜜月一过，她就跟丈夫汪坤商量说，每天来回坐班车太耽误时间了，我想平时就住在医院，星期六再回来好不好？这样我晚上就可以多读读书了。汪坤也是个对事业精益求精的人，面对妻子好学上进的请求，他非常理解地答应了。

在李希楷的辛勤努力之下，她的业务水平提高很快。从医三年，就被提升为主治医生，并很快被提升为讲师。医大附属医院的医生，都负有教学任务。所以他们既有医疗任务，也有教学任务。李希楷是他们那一批毕业生中最早被提为讲师的。以后她又到中国医科大学心血管研究所进修，师从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心血管专家潘绍周教授，在专业上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回到医院后，她边实践边继续学习，在医、教、研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发表了数十篇有着极高理论价值和独到见解的学术论文，逐渐成为一名医术精湛的心血管病专家。38岁时，她即被提升为新桥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

作为一名好医生，除了要有精湛的医术之外，还应当有好的医德。在这一点上，李希楷又恰好继承了母亲的天性：善良、厚道、仁慈。她有一颗博大的爱心，总是替病人所急，为病人所想。无论是普通的战士、工人、农民，还是有名声有地位的人，在她那里都只是病人，她都一视同仁地对待。而且她帮助最多的，还是那些没有权势的小人物。她不仅给他们治病，还帮他们解决别的生活难题。

重庆112厂一位电焊女工，19岁就不幸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李希楷不仅尽力为她医治，使她脱离了生命危险，还特意找到他们厂职工医院的领导，恳切建议为她调换一个合适的工作。她的诚意和爱心感动了厂里，这位女工后来被安排到了厂图书馆工作。

一位军队院校的学员突然脑出血，被送到了新桥医院抢救。在他昏迷不醒的日子里，李希楷发现这位学员的女友有些动摇了。她马上找到她，一面告诉她她男友的病因，一面诚恳地对她说，你男友的病是完全可以治好的，不会有后遗症。这种时候，你千万不能甩下他，而要给他更多的安慰，帮他度过难关。姑娘听了豁然开朗，打消了顾虑。从此一心一意地守在男友的身边，直到他痊愈。当两人终于喜结良缘时，他们带着喜糖，叩响了这位好心肠的医生的家门。

凡是经李希楷看过治疗过的病人，都不会忘记她那张和蔼的笑脸，那双充满关切的眼睛。即使病人已治好出院，她也常常利用开会或出差的机会去上门为病人复查，怕病人还有什么遗漏或困难。为此她总是带着听诊器出差。从医多少年，她从没让自己的心在病人面前麻木过、冷漠过，总是像春风春雨一般，走到哪里，就滋润到哪里。一位单身的老病号想吃泡菜，李希楷就不定期地到家里给他送；到了节假日，她还亲自给他包饺子，炖肉汤……

她常常不由自主地让自己那博大的爱，延伸到医生的职责以外。即使在十年动乱中，她也没有疏忽自己的职责，努力为病人保留一片宁静的天空。

重庆“武斗”最激烈的那两年，市区秩序非常混乱，汽车停开，商店关门。李希楷的家与上班的地方相距十几里地。以往医院都有班车接送，后来一切都乱了，她们科室坚持上班的人，加上临时工只剩下13个，班车自然也就停开了。但李希楷仍是每天去上班，一早起来，步行近一个小时去医院，晚上再步行一个小时回来，路上常常是枪炮声不绝于耳。但整整两年时间里，她竟未耽误过一次。

打个不太好听的比方，李希楷像个“工作狂”。在她眼里，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工作压倒一切，不可动摇的。当她做了母亲，有了女儿之后，仍未让自己的私事给工作带来一丝影响。她当然知道女儿需要母亲，但她更知道病人需要医生。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她选择了工作。她把几个月的女儿送到了父母那里，依旧像过去那样一心扑在工作上。后来有了小女儿，她还是埋头工作，丝毫不让家事分心，以至闹出一个笑话。她的一位女同事见她从没像别的女同志那样，因为婆婆妈妈的事情请假或者耽误，就产生了误会，以为她结婚多年没有孩子，是不能生育。有一次医院拣到一个弃婴，女同事便好心劝她将这弃婴领养了。她听了以后很诧异他说，我都有两个女儿了。弄得女同事大为惊讶，也颇不好意思。

庆幸的是，李希楷的两个女儿在她们懂事之后都理解了母亲，没有因此在心里种下怨恨。不过她们却不愿再像父亲母亲那样选择学医了。因为她们从小到大在父母身上得出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当医生太辛苦了！她们甚至认为世界上最辛苦的职业就是医生。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李希楷作为医生，是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和代价。

这也许就是李希楷那寻常中的不寻常吧。几十年来，她一心一意、任劳任怨地当着她的医生。没人能怀疑她将当一辈子最好的、也是最辛苦的医生。

四

李希楷曾在她讲述的一开始就时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能走上领导岗位，完全是机遇。当时我们的军队建设正在强调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我正好赶上了。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我会当官。

的确，在李希楷的脑海里，任何头衔都没有医生这个名称更值得自豪。她对自己的一生想得非常简单明了：当一辈子尽职尽责的医生。当她被提升为主治医生时，她仍像当住院医生那样住在医院里，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当她被任命为内科主任时，她还是想，不过是给自己多加了一份职责而已。她仍像当医生时那样，每日在病房里查看忙碌。她始终把自己当成个医生来对待，始终把病房作为自己的阵地。在做医生的二十多年里，她三次荣立三等功；1962年，她被几千人的学校树为医疗标兵；八十年代，她还两次被选为省党代会的代表。这些荣誉多多少少说明了一点：她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医生。

她怎么也没想到，命运会把她推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

是有机遇的存在。但机遇总是垂青那些值得垂青的人。

1983年，我们的国家从动乱中走出来，正处于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关键年头。而那一年的李希楷，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对李希楷来说，她的天命就是为所有的人解除病痛，带来幸福。她从没想过别的。再说，一个女人到了50岁，似乎就该考虑抱抱孙子颐养天年的事了。但她出色的医疗技术，难能可贵的敬业精神，还有博大无私的爱，早已像一棵出类拔革的大树引起了人们的注目。这又应了那句老话：是金子总要闪光。

盛夏 8 月，李希楷从心血管内科主任的位置上，被破格提拔到三医大附属二院——新桥医院院长的位置上。于是，在她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有了最艰辛也是最辉煌的十年。

命令下达时，李希楷正在遥远的上海参加四个军医大的统考改卷工作。她接到电报飞回重庆，心情很是复杂。一方面她感谢领导和群众的信任，另一方面却为自己能否担当起这一重任感到心里没底。她怕自己辜负了大家的重望。而当时医院的情况却很不乐观，过去正常的运行机制都已被十年动乱的洪水冲得荡然无存，一切都得从头来。真可谓百废待兴。

这时，70 多岁的老母亲听说女儿身居高位，语重心长地送给了她两句中国古话，叫做“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两句话给当时的李希楷心里垫了底，正如那句著名台词所说：“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也在她的为官生涯中，抹上了一笔重彩。

李希楷想，自己虽然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当院长，但却是一直在医院工作的。过去当医生时希望院长怎么做的，现在自己就怎么做好了。于是她一走进院长办公室，就用钢笔书写了一张小纸条压在了办公桌的玻璃板下。纸条上写着 16 个字：深入群众，实事求是，廉洁奉公，鞠躬尽瘁。这 16 个字一直伴随着她走过了十年的领导生涯。

刚刚上任，医院就接到了上级通知：四所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及各军区总医院开始全面整顿，接受总部 11 月份的考察验收。这是十年动乱后，全军大医院所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检查。这一通知就好像是要给她一个下马威似的，李希楷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她倒不是怕自己点不燃这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而是考虑着怎样才能借整顿验收这一东风，将医院的一切规章制度重新建立起来。

李希楷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制度化、规范化、常规化。从院长到临时工，人人有制度可依，有规章可循。她首先就给自己立了 13 条，公布出来让大家监督。这 13 条都非常具体，比如第一条就是开短会说短话。这样的制度不要说实行起来人人拍手称快，就是听起来也让人高兴。大家早已被十多年的浮夸会风弄怕了，早就盼着领导能改变作风。李希楷规定上午一律不开会，自己和机关于部都深入到基层去办公：每周一次夜查房；在工作上要求自己身体力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还有，每天到一个病房参加交接班，并将地点写在院务部的黑板上。这样大家随时可以知道院长在哪里，有了问题马上就能找到她。至今还有一些医护人员感叹说，李希楷当院长时，我们天天都可以见到院长。

一个医院最要紧的就是医风医德。而抓医风医德，就得从制度抓起，从点滴小事抓起。李希楷本来就是讲求实效的人，从不干那些表面光的事。比如抓制度的建立，就从衣服抓起。过去医生和护士的白大褂是有区别的，现在却没有区别。为改变这一混乱情况，她和机关的同志经过反复调查，和科室主任们多次协商，从衣服入手，对每间病房及病房办公室、治疗室东西的摆放，常备仪器和药品的设置，病历、化验单的放置，都按照有利于治疗、防止差错事故的原则作出了科学的规定。甚至连护士办公室的挂历、闹钟以及花瓶的摆放，桌椅板凳的配置，都作了统一要求。这些看起来琐琐碎碎的事，却关系到医院的整洁，良好风气的建立。

那些日子里，李希楷就像一颗沉沉的石子，一直沉到医院的最底下。她吃住在医院里，一日三餐就靠着个煤油炉，也不知吃了多少顿水煮面条。日

日都要忙到夜里 12 点才能休息，光是手电筒，就用坏了好几把。她和机关的同志一项一项地制定新制度，又一项项地检查落实情况。在检查中她总是非常仔细，像急诊室救急用的起搏器、呼吸器、洗胃机等。都要亲自动手开过才算。除此外，她仍按自己制定的院长制度，每天跟着科主任查房，跟着外科医生上手术台，还利用晚上时间去学生宿舍查看，抓学习风气。

院长的一举一动，给大家发出一个“动真格”的信号，令全院上下的人都振作起来。在院里一班人的共同努力下，全院上下的医护人员都焕发出极大的热情，齐心协力、任劳任怨，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就将医院的面貌焕然一新。在总部的验收检查中，新桥医院夺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尤为自豪的是，李希楷是那十几所医院中唯一的女院长。

李希楷丝毫不敢懈怠，她顾不上休整一下三个多月连轴转的辛劳，又一股作气地在原来的基础上，狠抓医疗质量的提高。她知道要彻底改变医院的状况，仅靠医风医德还是不够的，还得抓医疗质量，抓技术。

“以医疗为中心。”李希楷为自己的院长工作提出了重点。每周除了星期六上午开半天周会外，其他时间她都泡在了病房里。哪个科有哪些重点病人，病情到了什么程度，她心里都很清楚。一些需要动大手术的病人，她常常是亲自检查，并亲自参加医生们对手术方案的商讨。每周四她还坚持抽出半天时间参加门诊。不是怕自己业务荒疏，而是想通过门诊这个窗口，更深入地掌握医院的医疗现状。

新桥医院的泌尿科是医院的重点科。早在 1978 年，他们就率先在国内展开了肾脏移植手术。但过去几年里出于谨慎，这种手术做得很少。一年只做几次，一次只做一例。李希楷任院长后，常往科里跑，仔细全面地了解情况。经过反复考虑，她大胆提出了一次手术多作几例的建议。起初医护人员们感到心里没底，这毕竟是一种难度很大的手术。但当李希楷将自己的分析和设想一一告诉大家、并具体提出了手术配合方案时，大家心里的疑云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激情和信心。

手术那天，李希楷亲临现场，作医护人员的后勤保障。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奇迹出现了！泌尿科一次手术连续为四个病人作了肾脏移植，并全部获得了成功。从此以后，泌尿科的全体同志解放了思想，大胆开拓，在肾移植手术中一次做到了 5 例、8 例、10 例，甚至有一次因肾源充足，一天就连续做了 20 例。这不仅在全国遥遥领先，而且在国际上也极为罕见。参加手术的一位老教授感慨他说，懂业务的院长，确实大不一样。

除了抓医疗质量的提高，李希楷没有忘了继续抓各项制度的落实。她要求每一位员工都将自己的职责背下来，烂熟于胸。有人认为这是形式主义，说她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在上级面前争表现。李希楷不管这些议论。她知道要在长期混乱中恢复制度本来就是件不易的事。而医生出身的她，深知一个医务工作者履行职责的重要。所以不管大家理解还是不理解，为了医院建设，她都得坚持抓到底。

李希楷的心血没有白费，她的原则也没有白坚持。一年多下来，医院的整个医疗质量提高很大，医风医德进一步好转。在第二年的全军医院检查中，新桥医院再次夺得了第一名。

说起来真令人不可思议，一个从未当过领导，甚至从未想过要当领导的女医生，一旦走到了这个位置上，竟把个领导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出类拔革。个中原因我想除了才干之外，就是那 16 个字所起的作用了：深入群众，实事

求是，廉洁奉公，鞠躬尽瘁。当初李希楷把它们压在玻璃板下，是绝对不是做样子的。

五

在交谈中我发现，李希楷将军的性格和为人，常有着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她的性格很好强，遇到困难从不认输，非做好不可，就像她带领全院员工迎接两次检查那样；另一方面她又显得非常随和，一点儿不摆官架子，也没有官脾气。

一方面她耿直正派，从不会为自己或家里的事托关系走路子；另一方面为了医院建设，她又很能发挥社交能力，打开工作局面。

一方面她从不徇私情，坚持原则不动摇；另一方面她又非常乐于助人，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不管是熟人还是素不相识的人，只要找到她，能帮上忙的，她都会尽力去帮。

这些看上去相互矛盾的特点，在李希楷身上都和谐地并存着。

可以举几个例子。

那年上级领导根据需要，将她从院长改任为政委。她从没当过政工干部，本来她可以照样像当院长那样抓工作，但她觉得政委应当有政委的职责。于是她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恢复讲党课。由于过去留下的不好影响，许多人对听党课产生了逆反心理。李希楷就下决心要讲一次大家都喜欢听的党课。

要说讲课李希楷并不陌生。她曾带过不少学生，讲过不少专业课。她讲的专业课非常生动，效果很好，至今她的许多学生见到她，还能背出许多当年她为了学生记忆而自编的顺口溜。学生们凡是听过她课的，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讲党课她心里就没底了。但她那个不服输的劲头又上来了，拿出当年读大学的劲头，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作了最详尽的准备，还准备了挂图等教具。她讲的题目是：怎样做一个好党员。到了讲课那天，党员和非党员都来了，整个礼堂坐无虚席。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党课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大家听得聚精会神，最后是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的。许多年轻人竟从此崇拜上了这位医生出身的女政委。

这样好强取胜的事，在李希楷的一生真是举不胜举。

新桥医院在两次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后，身为院长的李希楷一点儿也没想到可以松口气了，而是马上想到了医院的将来。她觉得要把医院办成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医院，必须改变过去的老模式，应该朝着“预防——治疗——康复”的全新模式转变。她在院领导班子里作了一番鼓动，最后党委一致通过决议，建一座康复大楼。

建大楼需要一大笔资金。如果打报告等上级拨款，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李希楷主张去借，到医院所在地的各地方单位厂矿去借。她带头坐着车，每天到那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单位去一一“游说”，有关系的没关系的都找上门去谈。后来凭着医院的信誉和解放军的身分，凭着她和各位院领导的耐心解释，诚恳说服，医院真的筹集到了120万元。李希楷这才发觉自己并不是没有交际能力，只是平时不愿随便乱用罢了。

医院用这笔款，建起了一座高六层，有300个床位，面积达7000平米的康复大楼。不仅缓解了医院压床现象，完善了医院的康复环节，而且很快就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就还清了债款。

深入扎实、廉洁自律是李希楷一贯的工作作风。在新桥医院当院长时，

她和院领导一班人为全院医护人员谋福利，建起了预制板厂、砖瓦厂和鱼塘，使新桥医院的福利成为几个附属医院中最好的一家。可她自己却丝毫没有享受到一点儿特殊待遇。她的家依然是当医生时的那个旧家，在远离医院的高滩岩。她从没想到过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丈夫调到新桥医院来，给自己弄套房子建一个舒适的家。

权力，在李希楷那里只有一个意义，就是责任。在她成为将军之后依然如此。任何一件小事，她都要看看是否符合原则才做。时间长了，大家都了解她了，拥护的打心眼里拥护；不拥护的也就知趣，不再到她那儿去碰壁。那年李希楷的二姐到三医大看病，住在她的家里。一个多月的时间，二姐没有遇见过一次给她送礼的。走的时候二姐感叹说，希楷，你还是老样子，没有变。

然而，自己坚持原则容易，让别人坚持就难了。

她当院长时，有一位上级领导的女儿在三医大毕业后，点着名要分配到新桥医院的B超室。因为那是个既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又没有上夜班之苦的地方。李希楷知道后马上表示反对。她说，没有作过临床医生就直接到B超室工作，这会影响医疗质量和病人的利益。这个要求不合理，我不能同意。许多人都来帮着说话，让她给领导一个面子。可平时宽厚随和的李希楷到了这种时候显得特别的固执，就是不松口。为了彻底堵住这个后门，她还专门跑到校领导那里，请求校领导的支持。在一个如此坚持原则的部下面前，校领导能不支持吗？最后，这位领导子女终于分到了临床科。

当然她也就尝到了得罪人的滋味儿。以后遇到那位领导，李希楷的热情常常被冷漠的目光碰回来。

好在她心里有母亲送的两句话：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她依然微笑着。

当了副校长之后，李希楷仍没少干“得罪人”的事。她接手计划生育工作时，三医大的计划生育工作处于落后状态。晚婚率、晚育率、节育率和独生子女率全部没达到总部的要求。从来就不甘落后的李希楷自然不会安于这种局面。她仍是用坚持原则这一法宝开路，一上来，就坚持给一位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领导干部子女以严厉处分，并给这位领导本人以通报批评。这位领导和李希楷很熟，平时他们常在一起开会，共事几年关系一直很融洽。当时三医大还从未通报批评过师一级领导，所以有不少人来说情。但李希楷坚持不松口，她知道群众都睁大了眼睛在看，纪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这位领导对李希楷的做法表示了理解和接受。处分落实后，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三医大的计划生育从此上了台阶。1990年，三医大终于以“四率”百分之百的好成绩，走进了总后计划生育先进单位的行列。以后，又捧回一张全军计划生育先进单位的奖状。

为了了解下情，做到亲知、真知、深知，李希楷不管白天工作有多忙，夜里常常一个人深入到几个附属医院去，直接走到急诊室和病房，去察看那里的工作情况。她想通过这样的突然检查，来增强医护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因为夜深人静时，值班人员往往容易马虎。李希楷突然而至，遇到不坚守岗位或违反规章制度的，就不留情面地严厉批评，哪怕对方难堪地掉了眼泪也不轻易原谅。她常说，医护人员小小的失误，带给病人的就是大大的痛苦。

同样是这位副校长，头一天晚上严厉地批评了某些医护人员的违反原则行为，第二天在食堂吃饭时，仍会和蔼地和她们一起排队打饭，一起坐在饭厅里边吃边聊，细心体察她们的困难。比如在食堂吃饭时，她发现很多单身

护士买菜时感到为难：买一荤一素吧，吃不完太浪费；只买一样吧，又觉得营养不够。她就利用领导的权威给食堂提出一个建议，卖半份菜，好让大家两全。她还建议食堂把馒头做小，一两一个，免得一些年轻护士吃不完一个大的扔了浪费。

当她做这些婆婆妈妈的小事时，与那位严厉的校长好像判若两人。你平时和她相处，很难相信这位慈眉善目的女性会有那么强的原则性，会那么“厉害”。我给她打过两次电话，每当我称她为李校长时，她总是说，我是李希楷。我相信这并非她故作姿态，她的确只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人来对待。她说我已经退下来了，除了医生，别的什么我也不是了。她的名片上，的确只印着技术职称，工作之外，她总像一位随和的大妈，和大家说说笑笑。部下有生病的，生孩子的，她都会抽出时间去看望；年轻人结婚，她也会买上礼物去祝贺。

有两次我们在招待所谈晚了，她就和我一起到招待所的餐厅吃饭。我发现她能叫出许多服务员的名字，像个慈祥的大妈一样和她们打招呼聊天。每次吃完饭，总忘不了谢谢她们。校办公室的一位战士驾驶员在退伍安排工作时遇到困难，她知道了，就主动打电话托人给他帮忙。甚至一些素不相识她的人慕名写信给她，请求各种各样的帮助，只要能办到，她也都会想方设法去办，哪怕是“走后门”。

有一年征兵工作开始时，上面给了三医大一个女兵的名额。按征兵条件筛选到最后，剩下了两位教授的女儿，可这两位教授都非常渴望让自己的女儿去当兵，为此他们分别找了负责这项工作的李希楷，各自述说了自己的难处。李希楷听了他们说的情况，一下觉得很为难。两位教授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忽略了女儿的学业，两位教授的忙都该帮。怎么办？从不拉关系走后门的李希楷，为这件事亲自去找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凭着人们对她的信任和她的真诚，她竟又争取到了一个女兵的名额，终于将这一难题顺利解决了。

她的小女儿见此情景开玩笑说，妈，我还以为你谁的忙都不会帮呢。小女儿的话是有所指的。她的姐姐大学毕业，有一年被学校选定公费出国进修，但因母亲是高干被卡了下来。姐姐请她到学校去帮着说说情，李希楷觉得不符合原则，没有去。小女儿自己从技校毕业后，分到了离家较远的铁路部门工作，可当将军的妈妈从没想过要为她调换一下工作。只要她开口托人，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她从不为自己的事开口。好在女儿了解母亲，也从不提这个要求为难母亲。

不过女儿毕竟是将军的女儿。大女儿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还是走出国门，去德国的法兰克福攻读博士学位了；小女儿也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努力，争取到了进修学习的机会。

李希楷就是这样，让那些看似矛盾、不相容的性格，和谐地存在在身上。我想这是因为在这些性格的中心，始终树着那根端端正正、廉洁自律的尺子吧。

六

1986年秋天，有着“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口碑的李希楷，被提拔到了校领导的岗位上，成为三医大校史上第一位女副校长。这一次提拔仍出乎她的意料。在此之前她一直想，等院长干到55岁时就退下来，回到病房继续做医生。她还是觉得当医生更愉快，除了能直接为病人解除痛苦外，更主要的是不用纠缠于复杂的人事关系中。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人事关系谈不上有多复杂，只要你稍微学会一些迎合变通，关系就容易理顺多了。比如领导让办的事你不要反对，有背景的人你不要得罪，同事违反原则你假装看不见……等等。但李希楷偏偏学不会这些，她像医生消毒那样，容不得一点细菌在健康的肌体上存在。这怎么可能不令她苦恼呢？李希楷对这一点也不掩饰，当我问她“你最苦恼的事情是什么”时，她苦笑一下，直率他说，最苦恼的就是不会处理人际关系。

“原来我总以为只要以工作为重，从集体利益出发，一切都是可以得到理解的。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在当领导的这十年里，真是得罪了不少人。我感觉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远不如当初我在科室当医生时那么单纯。我很难适应，也许是我太死板了，不会变通吧。”

我想这不仅是李希楷的苦恼，而是所有正直的、原则性强的人的苦恼。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几家电视台都在播放电视剧《包青天》。我不由得生发出感慨：连包青天这样铁面无私的祖先，在坚持原则上都得借助额头上那个有着魔力的肉芽，还有招之即来的各位怪力乱神，可见坚持原则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特别是如今的人比过去更精明了，也更有“人情味儿”了。李希楷却像与世隔绝似的，依然在照章办事，怎么可能不得罪人呢？怎么可能不苦恼呢？

但命运偏偏要把她留在她不想留的地方。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越是想当官的人反而越难如愿，越是不当回事的，却越是容易得到机会。这大约就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当上副校长，李希楷被分配负责三个附属医院的医疗、教学、科研以及计划生育工作。工作量非常之大，也非常之具体。对李希楷来说，这又是一次考验。她的心里有些没底。好在她时刻都记着老母亲送给她的两句老话：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两句话几乎是她为“官”的精神支柱，也是她一生的座右铭。

的确，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李希楷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只要自己坦坦荡荡，一切以事业为重，就不怕来自内心和外界的压力。

她又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工作。

李希楷虽未指挥过战役，却懂得要打赢仗必须先做到心中有数。所以上任，她就带领学校三大部的机关干部到附属医院检查工作，每个医院半个月。她给随行的十多位干部约法三章：1.每人重点蹲一个科室，了解一个片区；2.每天早上8点，像医生一样戴白帽穿白大褂参加科室交接班；3.中午必须在医院就餐，而且自带碗筷在食堂排队打饭。广大医护人员看到学校机关工作组在女将军的带领下一起排队打饭，心中油然升起喜悦和敬佩的感情。

为期一个半月的调查结束后，李希楷对接下来的“仗”该怎么打，心里已基本有了数。她知道仗要一个一个地打，堡垒要一个一个地攻。

根据过去当院长的经验，她第一“战役”打的是抓病历书写规范。她认为一个医生病历书写的好坏，不仅可以体现医疗技术，体现责任心，体现对病人的态度；还可以保留下来，作为以后的科研资料。她把那些写得好的病历和写得不好的病历都一一展示出来，让大家学习比较，对照检查。这项看起来简单的工作，做起来阻力却很大。许多医生几十年已养成了老习惯，要一下改变很困难。但她坚持一抓到底，每年都在三个医院轮流搞病历展览，给病历打分。坚持几年，效果就出来了。

第二“战役”则是抓查房制度，住院医生要求一日查三次，主治医生要求早晚两次，对护士长，则要求夜里查房。李希楷知道人是有惰性的，必须用制度来约束。制度建立后，还有个坚持问题。为了抓落实，她每天晚上都去三个医院抽查，急诊室，病房，一次次地走进去，一次次地发现问题。以至到后来，医护人员值班时常会互相提醒说，别马虎哟，说不定什么时候李副校长就会来检查呢。

第三“战役”是抓“四室一库”，即急诊室，手术室，供应室，制剂室和血库。这些都是医院的最基层，也是最重要的部门。医生出身的她，深知这些部门对于一所医院正常运行的重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就走遍了全校一百多个科室和所有的病房，将这些部门的情况全部装进了自己的心里。

也许是有了几年当院长的经历，李希楷在医院这个疆场上驰骋飞越，几个战役都打得很漂亮。但她从没想过停下来庆祝一下胜利，而是像个沙场老将那样，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继续攻克一个又一个的堡垒。

“医院感染”是许多医院都共同存在的一个“堡垒”。所谓医院感染，即病人在住院期间由于医院没有实行严格的无菌操作而感染上了别的疾病。这个问题在国内一直被人们忽视。过去被忽视，不能永远被忽视。视医疗质量为生命的李希楷，一上任就瞄准了这个死角，积极倡导奔走，成立了一个医院感染委员会，并主办了《医院感染》这一学术刊物，由此探讨问题，交流经验。

她还和委员会的教授们一起，制定了许多具体规则，强化督促医护人员的无菌操作观念。规则部非常具体，比如清扫病人的床铺，为使病菌不随着灰尘扬起弥漫，要求护理人员用消毒湿巾来抹。很快就抓出了成果。

为了调动护士们的积极性，李希楷又想出个一举两得的办法：将医院感染作为科研题目，并拨出2万块经费，让护士们搞科研，搞出成果后写论文。此举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一下子有上百篇论文从护士们的手上产生了。李希楷亲自主持召开了护士论文报告会，并亲自作总结。由此，医院的护理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

1989年，全国数百家医院的代表来到三医大，召开了首届全国医院感染学术会议。三医大的做法，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第二个“堡垒”，是设立“医疗成果奖”，调动临床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一段时间，李希楷在深入病区时发现，许多医生一到下午就不见了。查问之下，才知是回去写论文或者攻外语去了。这本不是什么坏事，但李希楷却从中发现了问题，即临床医生们的不安心。医生说，这些年一评职称，上面就强调“论文、外文、科研成果”。像我们这样在临床上拼命干的，到时候拿不出“两文一果”，照样评不上。

当过多年医生的李希楷，非常理解医生们所说的苦衷。在她看来，一个医生能挽救病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不应当仅以文章的多少、外文水平的高低来判断一个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而且临床医护人员一直是最辛苦的。在一次讨论医疗工作的校党委会上，李希楷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建议：“为鼓励医生护士安心临床工作，应该设立一项‘医疗成果奖’，专门嘉奖那些在临床上解决了重要问题的医护人员。比如有效地进行了一次高难度的抢救，成功地进行了一次重大手术。这种奖励，应该和科研成果一样看待，

记入档案，作为提职晋级的依据。”这一合理的建议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拥护，很快就通过了。1988年，三医大正式下文，在全校设立了“医疗成果奖”，分一、二、三、四等，每年评选一次。这一决定在医护人员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那些日子，医院里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高兴的议论，大家觉得临床工作也有于头了。

四年后，三医大先后四次评选出医疗成果奖，上千名医护人员捧回了获奖证书，其中许多人由此晋升了中高级职称。广大临床医护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除了攻克堡垒，李希楷也主动出击，去占领那些还没有人占领的阵地。

1989年，李希楷打出一张深思熟虑的牌：在各个附属医院开展医学继续教育。这可不是一般的业余培训，而是制定人人必须参加考试的制度。学完一科考一科，考试成绩作为今后晋升职称的依据。

这一举措最初的目的，是想把许多年轻人的精力从当时盛行的麻将赌博风中转移过来，但一经开展，却取得双重的效果。不仅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提高了业务水平，而且还在医院的“医学继续教育”上走在了其他各大医院的前面。1991年秋天，在全军医院的检查评比中规定，凡是开展了“医学继续教育”的单位，一律增加50分。独有此举的三医大三家附属医院都抱到了金娃娃。

大家回头看李希楷当初的决定，都打心眼里佩服这位女将军的英明。

在所有的“堡垒”中，让李希楷感到最棘手最难攻克的，就是评定医疗事故。

过去医院出了医疗事故，总喜欢包着藏着，害怕影响医院的声誉。李希楷却认为要提高医院的医疗质量，就不能怕家丑外扬。好像治疗感染了伤口一样，不把脓引出来，是无法让伤口痊愈的。凭着医护人员的高度责任感，李希楷决定要冲破阻力来抓这件事。她对当时的校长程天民说，我可要捅马蜂窝、摸老虎屁股了。程校长非常支持，说你大胆抓吧，校党委支持你，有什么麻烦，校党委给你撑着。

在李希楷的提议下，学校和医院成立了两级事故鉴定委员会，聘请专家担任评委，对近几年来发生的医疗问题进行清理，做出评定。三家医院共提出10起事故。其中包括李希楷任新桥医院院长时，新桥医院所出的两起事故。为这事，她得罪了出事故的一位老教授。

作为评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李希楷，坚持将那位老教授的医疗事故评为较高等级的事故。而这位老教授不仅是她大学同学，甚至还是她中学同学，几十年来两家私交甚笃。李希楷对此不是没有过犹豫。但一想到由于老教授的失误而落下终生残疾的那位病人，她就觉得自己不能宽容，必须严格按原则办事。老同学无法接受，很长时间里对她耿耿于怀，两家的关系也因此疏远了。她为此感到心里难过，毕竟是几十年的老同学了。

那段时间她的日子很不好过，说什么的都有。不仅得罪了当事人的医生，还得罪了一些领导。有人甚至认为她这样做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告到了上级主管部门。可李希楷想来想去，都觉得自己没错。自己坚持这样做，绝不是为了给脸上贴什么“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提高医院的医疗质量，最大程度地减少事故的发生。说来说去，就是对病人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如果大家因此而误解她，她不在乎。她从没有用权力为自己谋过一点私利，她的心地是坦然的。

驱除了内心的苦恼后，李希楷变得更豁达了，她诙谐地说，如果说我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那么，我的乌纱帽就放在办公桌上，随时可以拿走。

这样，李希楷顶着压力，和鉴定委员会的委员们一起反复讨论验证，尽量让当事人心服口服。最后，大部分人都表示了理解和接受。10起事故一定下来，全校震惊，起到了非常好的警戒效果。在以后的几年里，三医大的医疗事故明显下降。其中1988年到1990年的三年中，竟达到了零。

顽固的“堡垒”终于攻克了。李希楷感到欣慰，也算是没有白得罪人吧。

就这样，李希楷如同那些真正的身经百战的将军一样，马不停蹄地鏖战在医疗事业这个战场上，打了一个又一个的硬仗，攻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堡垒，战场上的将军靠的是从严治军，李希楷靠的则是从严治校、从严治院。母亲给她的那两句话“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是她坚实的盾牌。她凭借着这块盾牌，到退休也没有在那些看不见的刀光剑影中软过腿。

写到这儿我很想斗胆说一句：为官当如李希楷。她有能力和魄力，有原则性亦有知人冷暖的大善良；唯独缺的是权欲和官气，缺的是阿谀逢迎和以权谋私。可是这样的“好官”，却丝毫不留恋官位。1992年春天，尚未满60岁的李希楷，就在校党委的交心会上主动提出，自己该退下来了。这看似普通平常的一句话，身居高官的人恐怕会知道，它却是不普通不平常的。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李希楷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这几十年，我没偷过懒。

七

我和李希楷将军总共就交谈了两个半天。因为退下来的她依旧很忙。作为中华医学会四川分会的副会长，她要参加医疗成果鉴定会；作为医院的老领导老教授，她要接待许多过去的部下和学生；作为一名社会知名人士，她要应付各种采访以及回复大量的信件；作为妻子，她则想弥补几十年来未尽的职责，学烧几个好菜给老伴儿吃；作为母亲，她更想抓紧时间，给回来休假的女儿多一些温暖和关心；还有作为外婆，她非常想多抱一抱两岁的小外孙……

所以她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谈自己，只是简洁地将她的一生拉了一条线给我。她一再跟我说，我这人真是不值得写，一生简简单单，平平淡淡。可我不甘心，又通过旁人和原来采访过她的同志，补充了一些具体事例。

关于她授衔的情景和当时的心情，却只能够问她，旁人无法了解。我一直认为这是个很值得写的话题，就抓住一起吃饭的机会问她。不料她仍是回答得非常简单，只三两句话。就这三两句话，还是我问一句她答一句的。我说你当时很激动吧？她说是挺激动。我说就你一个女的吧？她说是，那一个会场上就她一个女的。我说你当时想些什么？她说没想什么，只想以后要好好干，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当然，我也想到了母亲，我想她老人家一定会很高兴的……

1988年9月，在成都军区庄严肃穆的大礼堂内，李希楷激动而又庄重地从原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上将的手上，接过了一份精美的少将军衔委任状，从而成为我军当时仅有的六名女将军之一。

当时李希楷的父亲刚去世不久，83岁的老母亲看到身着将军服的女儿，又是激动又是幸福地说，真没想到我的毛子（李希楷的乳名）还会当将军……要是你爸爸看见了，该多高兴呵！

但对李希楷来说，戴上将军衔，除了给自己的工作增加了新的压力外，并没有带来别的什么变化。她还是住在旧的团职楼里，还是天天往基层跑，

信奉着“天天在上头，早晚摔跟头”的信条，还是像个上紧了发条的钟，不停地在人生路上走着走着……

唯一的不同是，李希楷将孤身一人的母亲从老家接到学校来住了。她想母亲辛苦了一辈子，从没享过自己的福，现在条件好一些了，也该孝敬一下她老人家了。她打算抽个空，好好陪母亲去逛逛街，看看山城的夜景，尽尽女儿的孝心。

可她实在是太忙了，这个愿望就一拖再拖。

1989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李希楷又同往日一样出门了，她是去下面的几个附属医院检查科研课题的落实情况。她一个医院一个医院地查着，一个科室一个科室地查着，根本没感觉到时间的流失。对李希楷来说，这样的日子很平常，她常常一出门一整天，中午随便在哪个医院的食堂里吃一顿工作午餐便罢。

但李希楷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天将令她终生难忘。下午5点多，她母亲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尽管李希楷的丈夫汪坤教授在家里，采取了急救措施，但已来不及了，老母亲很快就过世了。校办的同志四处打电话找她，却怎么也找不到。而当时的李希楷并没有感觉，正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和一位老教授谈科研课题。也许是母亲不忍打搅女儿的工作吧，她没让自己的痛苦传一丁点儿信息给女儿。

晚上7点多，李希楷才带着一身的疲倦回到家。她一下车，就感觉到不对劲，家里的灯怎么那么亮，而且人那么多？校办的一位同志站在路口，一眼看见她，就赶紧迎上来说，李副校长，你的母亲……

李希楷简直不能相信，早上走的时候母亲还好好的，怎么会一下就离开了她？最使她感到万分难过的是，母亲去世时她竟不在身边，等她回来时，母亲已去世两个小时了。

本来对一个八十高龄的老人来说，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是很正常的。但李希楷却觉得无论有怎样的理由，自己都对不起母亲，对不起给了她养育之恩的母亲，对不起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想到自己平日向母亲许的愿都没有实现，母亲来了这么久，竟没陪她上过一次街，泪水更是无法控制。她在母亲的身边失声痛哭着，泪水却无法冲走心中的悲痛……

第二天，按原来的工作计划，李希楷应该去另一家医院检查，并且头一天已经通知下去了。李希楷想到母亲，不忍心再走。和她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丈夫非常理解她，他走到李希楷身边轻声对她说，你去吧，家里有我。他这样做，不止是想到妻子丢不下工作，而且还想到妻子只有继续工作，才能减轻一些痛苦。李希楷感激地望着丈夫，心里默默对母亲说，妈，我相信你会原谅女儿的，女儿虽然没能见你老人家最后一眼，但毕竟一直是按您老人家的要求去做的。今后女儿仍会照您老人家的要求去做，端端正正，清清白白。

李希楷又走出了家门。临出门之前，她没有忘记取下臂上的黑纱。她知道下面的同志看到她戴黑纱，一定会纷纷前来看望的。她不想让自己的事影响工作。这是她一贯的原则，她相信母亲会支持她这样做的。

尽管事情已过去五年了，李希楷给我讲起这段往事时，泪水仍滚滚而落，无法控制。她低声呜咽着说，我一想起母亲心里就难过，我实在是对不起母亲。那几天母亲有点儿拉肚子，可能是由于拉肚子导致了失钾，我该给她及时补钾的。可我一直没顾上。母亲让我学医，成为了一名医生，可到最后我

却没能挽留住母亲的生命……我真是后悔啊！

我被这一幕深深地感动着。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作为女儿的女将军。也许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女将军形象。为了弥补对母亲的歉疚，料理完后事之后，从来都非常简朴的李希楷，特意给母亲选了一个价值一千多元的最高级最精致的骨灰盒。她想让一生操劳的母亲，有一个温馨的安息地。

在采访的最后，我也像“追星族”那样，问了李希楷将军的血型、星座、座右铭以及最喜欢的是什么，最苦恼的是什么，最遗憾的是什么，最幸福的是什么，还有今后最想做的是什么，等等。我不妨在这里一一告诉大家吧。

首先李希楷将军是 A 型血的人。我不知道一个人的血型对他的命运究竟会有多大影响，但我想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吧。比如 A 型血的人的确在事业上比较勤奋、执著、好胜，也的确比较有理性，做事有计划。那么除此以外呢？血型当然不能决定命运，因为并不是所有 A 型血的人都获得了成功。剩下的，也是更为重要的，恐怕就是个人在后天所受的教育以及所付出的努力了。

其次她是金牛座。不过我看到的一本书上说，金牛座的人为人顺从，喜欢把自己的信条藏在心里，不露锋芒。这显然和李希楷将军的性格大相径庭。可见这种玩意儿是不能信的。

她的座右铭前面已经提到，即母亲送给她的两句话：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她最苦恼的是处理不好人际关系；最幸福的是亲手解除了病人的痛苦；最遗憾的比较多，一是没能很好地孝敬母亲；二是对两个女儿关心帮助不够，三是始终没能掌握好英语的听说能力。

最喜欢的是观赏和种植水仙花；今后想做的事也比较多：一是学会烹饪，给老伴儿烧几只好菜吃；二是学习书法和绘画，再把二胡和箫拣起来练。

李希楷开心地跟我说，自打 1992 年春天退下来后，她一直过得非常愉快。家庭和睦，老伴儿过去一直非常支持她，现在彼此之间更是融洽。几十年来为了工作，她连离重庆很近的大足石刻也没去看过，休息后她便和老伴儿一起去补了课。两个女儿的事业家庭也都逐渐顺心了，小外孙十分可爱。她自己则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朋友来访不断，社会活动也多，还要回大量的信件。空余时间，她则为医学事业继续尽心尽力，写了不少医院管理方面的论文和心血管专业的学术论文，光是 1993 年就发表了 3 篇。其中一篇发表在《中华医院管理》杂志上的关于医院管理的论文，引起了同行们的普遍重视和好评。

她开心地对我说，我有三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寻欢乐。

难怪她显得那么年轻。

但仔细想想，我觉得她的真正欢乐源泉还不在于“知足常乐”或“助人为乐”，而在于她一辈子活得端端正正，坦坦荡荡。有一个无悔无愧的人生的人，才会在晚年感到无比的充实和快乐。我把这个看法告诉她，她想了想说，对，我一直觉得心里很踏实很坦然。尽管也留下了不少遗憾，但我觉得自己这辈子问心无愧。

当我离开重庆时，她也冒着酷暑踏上旅程，去参加全国卫生管理研讨会。她是因为那篇论文，被作为特邀代表而去的。李希楷，这位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女将军，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没有辜负世代的女人们的期望，没有辜负将军衔上那颗闪闪的金星。她是我们所有女性的骄傲和光荣。

重温军歌

张慧敏

最先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她的声音。

从别人的介绍中，我知道她走过的是一条不同于常人的坎坷之路。十六岁参军至今，军装多次穿而脱，脱而又穿，直到如今。这其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自不必说。

感觉中她的声音应该是苍老的、坚强的，当然还应该有几许严厉。

在八月的酷暑中接受了采访任务的我拨通了国际关系学院赵织雯副院长办公室的电话。

话筒的那一端传来的是一个圆润而甜美的声音。微微的带点上海味，几分轻捷，几分干练。

我断定，这是个年轻女公务员的声音。

那甜美的声音说，请问，您找谁？

请找一下赵织雯副院长。我说。

我就是。话筒的那一端依旧是那个圆润而甜美的声音，微微带了些上海味。

手持话筒的我顿生出几分惊讶。

一个经历不少人生坎坷的人，怎么样才能保持着这样一副甜润的嗓音？

在采访赵织雯将军的过程中，那一连串的惊讶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踵而至的。

在这一连串的惊讶之中，想象之中的那个满身充满威仪与严厉的女将军形象渐渐地隐去了，而生活中那个正直善良对事业孜孜不倦对生活充满热爱的女性形象萌生了。

她是位将军，但更是位普通的女性。

—

真正认识赵织雯副院长是在秋日里的北京。

那天的北京异常明丽。

约好了早八点在她住所的门口见面。远远地，看见那儿站着一位中年女性。她清丽的身影正背对着我。她在看墙壁上的那些已开始变红了的爬山虎叶子。她的手里正捏着几片她精心挑选出的爬山虎叶子。

看见我来了，她笑着说，留着做书签用，顶顶好用的。给我的第一印象，她是位端庄而富有魅力的女性。我能想象出她年轻时的美丽。后来，我看她以前的照片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那天她没有穿将军服，是一副知识女性的打扮。这使她看上去富于修养而具有风度。

在将军和教授之间，我觉得她更像是一位纯粹的学者。十月底的北京，花坛里依然开着一些色彩艳丽的小花。对着一片不知名的指甲般大小的淡蓝色的花朵，赵副院长由衷地笑着对我说，这是顶顶好看的。

五十九岁的她目光里流露出的是一种孩子般的热烈。

我觉得我有些了解她了。随便说一句，五十九岁在我心目中是一个苍老的数字。但是，在她身上我绝对看不到这一点。

上海人喜欢说顶顶这个词。

赵织雯出生在上海。

织雯这个名字是父亲赵廷芳为她取的。出生的那一天恰是农历的七月初七，民间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织”字来源于“天孙巧织云锦裳”这句古诗。而“雯”字则是形成文采之云的意思。

那是1935年。

在赵雯两岁的时候，有过一次令全家人震惊的举动。赵织雯病了。两岁的她浑身烧得灼人。那时，还没有很好的西药，家人找了个老中医为她开了中药。让两岁的孩子喝下那苦苦的药汤无疑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为了让织雯喝下那治病的药汤，只好全家人上阵。女佣抓住她的两只腿按住，母亲则握紧她的小手。捏住她的鼻子向嘴里灌药则是奶奶。

一碗汤药喝下，小织雯哭得如同泪人儿一般，出了一身的汗。对一个两岁的孩子，让她喝药，除了这种强制性的硬灌，家里人似乎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一些的方法。

又该喝药了。正要动手给她灌药的当口，她突然挣脱了已被抓紧的手脚，气冲冲地说：让宝宝自己喝。

让宝宝自己喝！

这句话出自一个两岁女婴的口中，令在场的全家人感到十分震惊。

人们开始仔细打量起这个两岁多一点的小女孩。

在赵织雯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一种对语言非凡的运用本领。在她刚学着说话的时候，就能把一些词语用得恰到好处。有一次，母亲带她到一座寺庙里去游玩，一下子看到那么多的菩萨，她禁不住感叹地说：这么多菩萨宝宝从来没有看见过！

对于一个两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句子呀！

一天，父亲在上班的时候顺便把小织雯送去幼儿园。银行的营业时间是严格规定的，眼看快到上班的时间了，他禁不住加快了脚步。

可是，就在走近幼儿园门口的时候，小织雯却怎么也不进去了。焦急的父亲问她为什么不进去？只见小织雯指着上衣前襟上的一个浅浅的水印说，你看多脏啊，老师不愿意的。

看着那个很小的不起眼的浅黄色水印，父亲又好气又好笑。父亲说不要紧的，这点小水印一会儿就会干的。可是，无论父亲怎么劝说，小织雯还是不去。最后，小织雯急得哭了。父亲只好带她回家又换了件衣服。

赵织雯的父亲对这件事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0年，年近八十岁高龄的赵廷芳老先生在赵织雯被授予少将军衔之后，思绪万千。一天他突然萌发出了写一写自己女儿的念头。于是，就提笔记述女儿从出生到参军在父母身边十六年里的一些小故事。以上的这些文字，便是取材于赵老先生的文稿之中。

赵老先生的文稿的题目叫《女儿在我们身边的十六年》，而这个关于小水印的故事的小标题则叫做“从衣襟上的小水印看师道尊严”。

那种细腻真实充满父爱情感的生活记录，不是世上每个父亲都能够做到的。

很快，小织雯又有了四个弟弟妹妹。在这个小康之家充满了天伦之乐。

这是个令人羡慕的家庭。

二

1950年，十五岁的赵织雯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上海市市西中学。市西中学是所公立学校，教学设备和师资情况都比较好。那一年的报考学生多达三

千余人，只录取二百名，录取比例是 15：1。与赵织雯一同考取该校的还有她的大弟赵本镛。赵织雯在高一，而弟弟则在初一。

赵织雯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除了在学习上名列前茅之外，她还积极的参加各项课外活动。

十五岁的赵织雯已经出落成了一位十分美丽的少女，校园里到处晃动着她活泼的身影。她似乎有着使不完的精力。身兼数职的她实在是太忙了，班主席、学生会委员、舞蹈队长等。她常常是家里最后一个吃饭的人。吃着那些剩菜剩饭，听着母亲爱惜的唠唠叨叨，她笑得甜蜜而又开心。

十五岁的赵织雯对生活充满了乐观。

学校搞演出，第一个上台用响亮的歌喉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的是她。

课外活动中，腰鼓队伍中那个最卖力最活跃腰鼓打得最响亮脸上笑得最甜美的姑娘是她。

电台播出市西中学演出的话剧《渔光曲》，给上海市民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个有着一副深情嗓音完全进入角色的女演员就是她。

赵织雯成了上海市市西中学的一位明星式学生。

报名参军的念头几乎是在一刹那间决定了的。

1951年7月，抗美援朝的伟大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那之前，赵织雯曾参加过学校里组织的宣传抗美援朝的话剧演出。为了支援前线募集资金，她和小伙伴们一起到大街上去销售义演戏票。

那些日子，赵织雯一直被报纸上那些来自于前线故事激动着。对于军人，她第一次萌生出了一种深深的敬意。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遇见一个军人，她总要多看上几眼。总觉得在那军装的背后，隐藏着的是种极为神圣的东西。

使自己成为一名军人，是赵织雯所没有料想到的。她崇拜军人，渴望成为一名军人。但同时她又觉得对她来说那不过是个理想。

高中才上了一年，怎么能有当兵的机会呢？

那是1951年夏天一个普通的日子。政务院向青年学生发出参加军事干校号召的消息一下子在学校里传开了。刚满十六岁的赵织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毫不犹豫地就报了名。

那天晚上回到家中，赵织雯把报名参加军事干校的事情告诉了父母。父亲和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许久没有说话。赵织雯从父母的眼中看出了他们的担忧与顾虑。顿时，在她心中升起了一种对这个温暖的家庭的深深依恋之情。那天，她的四个弟弟妹妹乖乖地在一旁打量着这个要去参军的姐姐。在姐妹兄弟中，赵织雯是只领头雁，一想到就要离开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心中一阵伤感。

父母经过反复考虑，终于同意并且支持她报名参军。

那时，赵织雯觉得她的父母是天下最好的父母了。他们是那么的开明，又是那么的理解她。

那个晚上，赵织雯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感中进入梦乡的。

一连几天，赵织雯心中又是激动又是不安。前面正有一个崭新的天地在等待着她，怎能让她不激动。不安的是她生怕组织上不批准她参加军事干校。按照规定，参加军事干校必须满17周岁才能报名，而她却只有十六岁。

为了证明自己参加军事干校的决心，赵织雯向学校递交了一份决心书，题目是《让我们的青春更美丽吧》。后来，学校又把这份决心书推荐给《文

汇报》。决心书发表出来以后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应学校的邀请，赵织雯的父亲到学校的家长会上做了一次发言，题为《对孩子坚决报名参予，我是怎样消除思想顾虑的》。这个发言稿，也被当时的《新民晚报》刊登出来。

被批准参加军事干校的通知终于发下来了。看着那份写着自己名字的通知书赵织雯激动万分。

正是从那时开始，赵织雯一生的命运便与人民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4年的秋天，在赵织雯参军整整四十三年后的一个明丽的午后，我问她怎样看待这几十年来个人命运。她说，我无怨无悔。她又说，我的命运是与共和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

一切都是神秘而又神圣的。

十六岁的赵织雯受以一颗少女的心在感受着这一切。

那身神秘而又神圣的军装是在一所叫格致的学校里换上的。换上军装之后，没有让这些“新兵们”回家而是去了火车站。那时，连同那火车也是神秘的了。“新兵们”不知道他们将被送到哪里去。这是军事秘密。

隔着车窗，赵织雯看到了她的父母。猛然间，在这个活泼开朗从来不知忧愁的姑娘心中，涌上了一种强烈的别离的痛楚。

那条美丽的彩带一头握在她的手中，另一头牵在父母亲的手上。那是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无论是走到天涯海角。赵织雯的眼睛里一下子溢满了泪水，但她仍然微笑着，对着她至爱的双亲，对着这座她生活了十六年的城市。

站台上，响起了嘹亮的军歌。

年轮终于在巨大的轰鸣之中启动了。赵织雯手中的彩带松开了。她带着一颗年轻向往的心，带着亲人的祝福，带着这座城市对她的殷切期望驶向远方。在谈及这段往事的时候，赵织雯副院长禁不住又有些激动。她拿出一本紫红色的硬皮本给我看。翻开第一页，是两张淡绿色的入场券。仔细看时，见那入场券上印着光荣家长座谈会等字样。又翻过一页，又翻过一页，那便是发表在报纸上的那些文章。我的目光停在最后面的一页上，那是用彩带纸拼贴的四个大字“光荣告别”。在那四个大字的四周，又加了些细致而精美的装饰。

赵副院长说那是她父亲搜集整理的。在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脸上流露出的是一种异常的温馨与甜蜜。

我又一次感到那的确是一位不平凡的父亲。有这样一位父亲，我想不论走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在她内心的深处都将保留着一份温馨，一份甜蜜。

三

1956年7月。

北京。太平路13号院内。军委外校。

火热的阳光下，29张年轻的面孔在对着照相机的镜头微笑。笑笑，再笑笑。摄影师对着29张年轻的面孔说。

大家笑得更开心了。于是，那一瞬间便成为永恒。在29个年轻人中间，有个留着短辫子的姑娘。她的笑格外的甜蜜与舒心。那是位洒脱美丽而又文静的姑娘。

那是二十一岁的赵织雯。

怎么能不舒心的微笑呢？经过五年的外语学习，在四百多名学员中，赵

织雯成为第一批毕业获得本科文凭的优秀学员之一。那是在共和国成立不久的岁月里。五年里，光是学校大的搬迁就有三次，先是山城重庆，后来又是塞外的张家口，最后是北京。五年里，他们付出了多少的艰辛与努力呀，而那知识的宝塔已在心中一点点垒起来。祖国正处在百业待兴蒸蒸日上的日子里。他们多么渴望投入到那火热的生活中去，为祖国的昌盛添一块砖加一块瓦。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赵织雯作为特别优秀学员被留校任教。

从此，在太平路13号军委外校的大院里，又多了一位年轻的助教，她勤勉的生活作风火热的工作热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赵织雯是解放后我军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军事外交人才。在当时急需外语人才的情况下，应该说是有着极好的发展条件的。而她却在教师这个位置上干就是许多年。

在那许多年的平淡岁月中，她难道就没有一丁点的抱怨与懊悔吗？

带着一种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在一个午后，我向赵织雯副院长提出了这个问题。

她沉思了一下，继之一笑。她说没有。她告诉我说教学是她们家庭的共同爱好。她的父亲1953年从上海调北京，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校和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教；她贤慧的母亲早年也曾做过幼儿教育工作者。而她的四个弟弟妹妹则都是教育工作者。

她说，站在讲台上，她会有一种特殊的充实与欣慰。

她讲到一件事。她说那件事是她人生旅途中的一件不可忽略的大事。

1957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总部机关在北京饭店举办了一个庆祝性的活动。赵织雯和学校里的四个年轻人被邀去参加。

晚饭后，赵织雯和女伴们一起踏入了舞厅。

一曲终了，就在赵织雯要回到座位上去的时候，她看见了一个人。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站在离她不远处的那个人竟是她最最崇敬的周恩来总理。她的内心非常激动，这是她第一次这么近的站在总理面前。又一支曲子奏起来了，赵织雯微笑着向总理走了过去。“周总理，请您跳舞。”赵织雯说。

她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晚上的情景，当总理问她是干什么工作的时候，她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给总理之后，总理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总理说你们是人梯，是军事外交的奠基石，好好干。赵织雯说她牢牢地把总理的那句话记在了心里，她决不会辜负总理对她的期望。

1964年，军委外校迁址南京，正式挂牌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赵织雯随校南下继续任教。

她确实是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殷切期望。在那些年里，她以极高的热情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到教学事业中去，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毕业学员，为我国的军事外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三十岁那年，赵织雯担任了教研室副主任。

那正是一个大干事业的年龄，她对前景充满了信心。

四

一切都是来得那么突然，又是那么的势不可挡。

作为业务尖子的赵织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当然不可能幸免。

整日奔波忙碌的她，一下子清闲了下来，除了开会，她几乎再也无事可做，学校里的课不上了，所有学术上的研究不让搞了。面对这种形势，赵织雯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惘然。她感到十分的不理解。一个国家怎么能如此的对待教育？

赵织雯隐隐的感到了一种忧虑。

然而，赵织雯的天性又是开朗而又热情的。她总是对生活充满了热爱。无论什么时候，她总是保持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心绪。这是她从小就养成的性格，这是那个温馨而开朗的家庭所赋予她的特殊秉性。

在那些灰色的日子里，赵织雯并没有停止对事业的追求。她每天都坚持在家里学习看书。那些英文原版小说给了她一个充实的小天地。在那个小天地里，她领略到的是另一种风景。

在她的耳边，那些红卫兵们的口号声越来越远了。

在那段岁月里，她的两个娃娃相继诞生了。作为一个普通的女性，她体会到了人生的另一大乐趣，那就是母爱的伟大。她用自己的一颗善良正直而火热的心去感染着那两个幼小的生命。她要在他们幼小的心田里播种上一粒健康的种子。让他们用一颗健康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还有这个世界上的人。她要把那种从父母那里接过来的家风传给他们，那便是乐观、正直、向上。

形势越来越出乎赵织雯的意料，南京开始武斗。

赵织雯亲眼目睹了在这座有着悠久文明史的古都所发生的一幕幕惨象。善良的她被震惊了。

与此同时，学校里的情况也越来越糟。大批教学第一线上的骨干力量被处理——解放前的大学毕业生一个不要，统统复员处理。

赵织雯又一次忧虑起来。那是一种民族性的深层次意义上的忧虑。那是一种站在国家之上的忧虑。这个曾经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刚刚在世界的东方站立起来的大国就这么在一片混乱声中垮掉了吗？

赵织雯感到了一种惧怕。那种惧怕是完全超出个人利益之上的。

1969年。当赵织雯接到复员通知的时候，她并没有表现出多么的吃惊。这是她意料之中的事情。她早就想通了，既然是呆在学校里教不了学也带不了学生，还不如让她去干点实实在在的工作。和赵织雯一起复员的还有她的丈夫熊建衡。

这是一对相亲相爱又相互理解的夫妻。他们曾经一起走过那么多人生的旅途。他们是同一批兵，是被同一列火车拉出上海的，他们又是同一批毕业的学生，他们在同年同月的同一天入党。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默契，一切尽在不言中。

那是个无声的夜晚。就连那两个才只有几岁的娃娃也意识到了某种异样，乖乖地躲在一边，默默地打量着自己的爸爸妈妈。那是离开南京的前一个晚上。赵织雯夫妇在屋子里整理那些被他们视为命根子的书籍与英语卡片。多少年了，那些没有生命的书籍和卡片早已被他们视为生命的一部分了。他们朝夕相处，他们密不可分。

那些书籍和卡片是他们事业的阶梯，那些书籍和卡片曾经托起过他们的理想。

一张照片从书里无声地滑落下来。

赵织雯轻轻地捡起来。那是他们的毕业照，她又一次看到了照片上那个

留着短辫子的自己，还有照片上那个后来成为她爱人的熊建衡。

她看到了照片上的微笑，还有那上面的阳光。

一切都是真实的，仿佛触手可及。

悠悠岁月，难道那最初的开始也是错误的吗？

赵织雯不相信。

拥有知识永远都不会是个错误。

赵织雯轻轻地又把那张照片夹进书里。她轻轻地非常仔细地整理着那些书籍，那些英语卡片。她仿佛赋予了它们以生命。她发誓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丢掉它们。

总有一天，会有它们的用武之地的。

五

上海。红峰仪器文具厂。

那是一间很大的工作间，到处显露着灰黑色，光线暗淡。女工们围坐在一张张工作台上，进行着一种简单而枯燥的工序：拧螺丝。把一个个螺丝拧在一块木板上。那木板是一种老式照像机的底架。

女工们有说有笑。她们谈论孩子、丈夫，还有街上流行的样板戏。她们似乎有着说不尽的话题。

女工们的谈笑声告诉人们，这里的生活并不寂寞。复员回到上海之后，赵织雯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群体之中。在这实实在在的工作之中，赵织雯获得了一种充实。她和女工们一起劳碌，也一起说笑。女工们从不把她当外人看。起初，赵织雯不会拧螺丝，于起活来一副笨拙的样子，速度也很慢。女工们便对她发出善意的取笑，有的甚至模仿她拧螺丝时的样子。在女工们善意的笑声中，赵织雯感受到了一种轻松，一种理解。

赵织雯也笑了。她笑出了眼泪。那是人世间一种真挚的友情。生活是艰辛而劳碌的。每天下班之后，赵织雯便忙着到托儿所把两个孩子接回家。儿子五岁，而女儿却只有三岁。回到家中，又是一连串的家务事，做饭、洗衣、带孩子，直到夜深人静。这时，赵织雯才能捶一下酸疼的背，在那张有着昏黄灯光的小写字桌前坐下来，去做她自己喜欢做的事。

每每此时，和她相濡以沫的丈夫，总是用充满怜惜的眼神望她一眼，劝她注意身体。

那时，熊建衡被安排在上海市第十六纸箱厂工作。和他每天打交道的是那些各式各样的纸箱包装盒。

一个个的夜晚就这么过去了。在那些数不清的深夜里，赵织雯始终拥有着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在那些数不清的英文原版书里，她感受到的是另一个天地。她案头上的那些精美的英语卡片一天天多起来。

六

那是一段被疾病笼罩着的日子。赵织雯副院长告诉我说。

她还告诉我说，正是有了那段日子，她才有了一种对生命意义的深刻认识。

生命是宝贵的。那是一个女人躺在病床上的生命体验。那时，她觉得自己要死去了，甚至留了遗嘱。

那曾经是一段很狼狈的日子。一向热情开朗对生活充满信心的她对我说。

最初困扰着赵织雯的是一种过敏性哮喘。

哮喘总是在深夜里突然发作。那时，孩子和丈夫都睡熟了。夜，很静。赵织雯突然感到一阵气闷，心慌，她一下子就醒来了。她试着在黑暗中多呼吸一些空气，她不想惊动孩子和丈夫，他辛苦了一天了，纸箱厂的工作并不轻松，她不想打扰他。

赵织雯在黑暗中忍耐着。

但是，症状似乎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难以忍受。赵织雯感到的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窒息。她在黑暗中喘息着，很剧烈。丈夫熊建衡被这剧烈的喘息声惊醒了。他打开灯，他看见了病得很重的妻子。于是，他赶紧穿衣下床，用自行车把妻子驮到医院。

医院里，又是一阵紧张的忙碌，吸氧、输液、服药。

症状终于消失了。当那一瓶无色的药液一滴一滴输进赵织雯体内的时候，天就要亮了。

在黎明前寂静的街道上，熊建衡用自行车把妻子带回家。等待着他们的是新的一天的忙碌，做饭，送孩子入托，然后是上班。

在黎明前的街道上，赵织雯想得最多的是她的两个孩子。整整一个夜晚，他们在家里怎么样了？他们醒来之后会哭吗？他们毕竟是太小了呀！

那时，赵织雯就想起了下放在河南的父母。如果他们和她生活在一个城市里该有多好呀！她感到了一种铭心的孤独。

这样的夜晚在那段日子里很多。后来，丈夫就给她买了氧气袋。哮喘病一犯的时候，就在家吸上几口。无疑，那时常鼓起来又陷下去的氧气袋给他们本来就很紧张的经济增加了新的负荷。那时，他们夫妻两个都是三级工，月薪加在一起也就是一百多元钱。

在那段日子里，两个孩子也时常生病。扁桃体发炎，高烧不退。似乎是商量好了似的，两个孩子要生病就一起生。如果是丈夫不在家，赵织雯就只好用自行车推着两个孩子一同去医院，前边一个，后边一个。

一个人守着两个病孩子，虚弱的赵织雯感到疲惫至极。一向乐观的她竟然累得想哭。

在一个晚上，女儿熊英的腿被开水烫了。坚强的女儿哭了几声就过去了，赵织雯也以为烫得不算重，也就没太当回事儿。可是，当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女儿熊英的腿上却布满了一片又大又亮的水泡。

那又是一段难以忘却的日子，女儿住进了医院，赵织雯整天奔波于工厂和医院之间。

尽管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治理，但女儿的腿上还是留下了一片明显的烫伤疤痕。而留在赵织雯心中的却是一个母亲的歉疚。

那是一场突如其来大病。在那之前赵织雯没有一点预感。

最先的症状是表现在例假上，出奇的多。赵织雯尽管不懂医，但她意识到这是不正常的。她体内的血是经不起这种流法的。于是，她去了医院。

门诊的女医生给她做了检查，女医生说是子宫肌瘤。女医生安慰她说子宫肌瘤只不过是一种良性肿瘤，切除了就没事了。手术在住院后的几天以后如期进行。那是1971年的上海。值得一提的是赵织雯同意医生的提议在针刺麻醉下接受手术。那一年，有关针刺麻醉的热潮正在全国各大城市蓬勃兴起。由于是针刺麻醉下接受手术的病人，赵织雯就成了一个特殊的病人。

手术之前，一位外语很好的老医学专家来给赵织雯会诊。老医学专家在查看了一番病情之后，对周围的几个医生用英语窃窃私语。老医学专家当然

料想不到这个病案上登记着工厂里三级女工的病人是个英语通。

尽管老医学专家的声音很小，但赵织雯还是听到了那个可怕的字眼。

“撒柯玛(Sarcoma)”，即“肉瘤”，是一种恶性的肿瘤。“撒柯玛”这个透着死亡气息的英语单词不时的出现在老医学专家的窃窃私语中。

躺在病床上的赵织雯心里一下子空茫茫的，她觉得四周的一切都离她远去了。老医学专家的“撒柯玛”，雪白的墙壁，还有那窗外的阳光。

她仿佛置身于一种异常的宁静之中。她的脸上是安详。她又仿佛是置身于一种异常的喧闹之中。她的脸上是冷漠。她没有把老医学专家关于“撒柯玛”的预言告诉给任何人，包括她深爱着的丈夫和两个孩子。

手术如期进行。

那一天，当赵织雯躺在手术车上就要进入手术室的时候，她很轻松地甚至是用了几分幽默的口气对她深爱着的丈夫说：如果我死了，把我的那些书和英文卡片与我一起烧掉。她用轻松的口气说出了自己最后的愿望。

那是多么沉重的轻松呀！

她的丈夫当然能够理解。有他眼中闪烁的泪花为证。这个善良而正直的男人眼中充满了泪水。事隔多年，作为采访者的我尽管在当时并不认识他们，但我想象得出当时是怎样的一副情景，完全能够。

当然，赵织雯并没有在那场大病中倒下。在那次手术的第二天，躺在病床上的赵织雯听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据进一步化验检查，那个被切除掉的肿瘤不是“撒柯玛”，也就是说不是恶性的，是良性的。

赵织雯重新感受着周围的一切。那是一种对于生命的真实体验。她感受到了亲人的微笑，还有窗外的阳光。

在一个有阳光的日子里，她又看起了英文小说，在病床上。

七

赵织雯一手领着七岁的儿子熊宁辉一手领着五岁的女儿熊英从银行里走出来。

在她的衣袋里装着三十元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钱。四口人每月一百多元钱的工资总是花不到头。每到月底，赵织雯都要到银行取一点钱接济一下。

银行里那笔数目不算太大的存款是她与丈夫几年前的复员费。眼看着那笔存款在一天天减少，赵织雯心里暗暗的有些犯难。但是，在两个孩子面前，她从不表露出这种心情。妈妈，我们家好阔气哟，我们总是到银行里去取钱。这是七岁的儿子熊宁辉说的。

妈妈，我们家在银行里有很多钱是吗？这是五岁的女儿熊英说的。

赵织雯笑着点点头说，是的是的。

两个孩子就显得很高兴，走在街上，一副很自豪很富有的样子。

你们都想要些什么呢？告诉我吧，咱们去买，赵织雯对两个孩子说。

儿子熊宁辉说，我要一本集邮册。

女儿熊英也考虑了一下说，那我就要一合水彩颜料吧。

孩子们得到了他们心爱的东西，都满足地笑了。他们觉得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在两个孩子幼小的心灵里，他们觉得自己的妈妈是很了不起的，是个乐观而又富有的妈妈。他们非常自豪，也非常开心。

这正是赵织雯所希望的。她不想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一丝阴影。

为了活跃家庭气氛，也是为了养成孩子的某种素质，赵织雯同丈夫商量

了一下，决定让兄妹俩学一种乐器的演奏。哥哥选择了小提琴，而妹妹则选择了手风琴。赵织雯定期带着两个孩子去少年宫学习。晚上，则由孩子的父亲充当老师，手把手的教他们。

那是个充满欢乐与笑声的家庭。

日子虽然是清贫的，但也充满了情趣。为了节约开支，赵织雯学会了织毛衣，做衣服。在这些琐碎的家务事中，她得到的是一个普通女性的温馨与满足。

赵织雯夫妇俩与孩子们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们不端长辈的架子。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做游戏。如果是孩子们做错了事情，他们就给孩子讲道理，摆事实。

他们也从不强迫孩子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女儿上小学时，要取一个名字。他们就拟设了许多名字，并把每个名字的意思讲给女儿听，让女儿去挑选。最后，女儿自己挑选了熊英这个名字作为自己的学名。

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着，简朴、充实而富有情趣，自由、民主而相互敬重。

八

1974年，赵织雯夫妇一同被调入上海华东师大任教。

从此，当了五年工人的夫妇俩重新又回到了教师的岗位上。

华东师大，是个教学气氛很浓的师范大学，即使是在七十年代中期那种政治气氛中，它仍然努力保留着一套自己传统的教学方式。

来到师大之后，赵织雯被分到英语教研室，而丈夫熊建衡则去了广播英语教研室。

师大为了配合英语教学，经常组织师生到国际饭店等涉外场所去开门办学。在与外国人的直接接触交谈中，使学生的口语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十分有趣的是，在国际饭店开门办学的日子里，赵织雯耳闻目染，跟厨房里的大师傅学成了一副好手艺，赵织雯回到家里时不时的露一手。吃着那些美味的食品，孩子们都十分高兴。

开门办学当然有时也去近郊的农村劳动。这是任何一所学校在那个年代里少不了的一项活动。

师大距开门办学的那个劳动点很远，一连许多天师生们要住在那里。赵织雯十分矛盾，她很想去郊区参加劳动，不想拖教研室的后腿。可是，如果她去了以后，家里的两个孩子谁来照管呢？那时，丈夫正在奉贤五七干校执行教学任务，不可能回来。

最后，赵织雯还是选择了去。但是，她向领导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劳动照常参加，但要求每天回家。那是怎样的忙碌呀，从家里赶到劳动点一个单程就要两个多小时，要换三次车。一大早，赵织雯就要起床为孩子们做好早饭和中饭，然后就直奔公共汽车站。当她换过三次车赶到劳动点时还不到早晨八点钟。晚上。就更是忙碌了，等待着她的，是一摊子干不完的家务事。

最快乐的日子要算是星期天了。那一天，赵织雯带上她的两个孩子一起到近郊去，两个孩子和她一起劳动。在田野中，两个孩子很兴奋，他们不时的为自己的新奇发现而欢笑不已。在星期天的傍晚，赵织雯收工后不必忙着急匆匆的往家赶。他们可以从从容容的坐车回去。一路上饶有兴致的对道路两旁的景色加以评价。

赵织雯的英语课在华东师大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了。粉碎“四人帮”以后，

随着外国访问学者和旅游者的频频来访，在赵织雯的课堂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外国访问者。那些访问者感到十分震惊，他们不明白讲台上这个地道的中国女性的英语发音为什么会如此的准确，特别是对一些俚语的领会理解程度更是让他们吃惊。

一开始，每次外国访问者来听课之前，校外事办秘书接到通知后都要提前一天告诉赵织雯。意思是好让她有个思想准备，好好备一下课。随着访问者的频频来访，赵织雯告诉校外事办秘书以后如果有外宾来听课就不用另外通知她了。只要是她有课，他们什么时候来听都可以。

赵织雯对自己的课充满了自信。

赵织雯告诉校外事办秘书最好把访问者的听课时间安排在大休息之前的一节课。那样听完课之后，就可以让学生们直接和外宾交谈。而赵织雯从来都是认为对一种语言的掌握，最最重要的是一种交流的自如。

在英语教学实践中，赵织雯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自己的观点。她是个实践型的人，她认为英语教学应该突出一个“练”字，要追求的是一种“熟练”，各种不同语言环境下的一种快速反应能力。是一种不假思索的脱口而出，而不是用数字统计出来的掌握单词的多少，背诵语法条款的多少。赵织雯认为学习掌握语法规则的最终目的是忘掉这些语法规则。就像你的呼吸一样，没有呼吸是不行的，但你又是常常的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外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技能的培养，而不是一门古板的知识。她还认为，课堂教学的特点是师生不停的交流，外语教学的特点，不是鹦鹉学舌，而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的语言交流。

当然，在这些教学观点之前，赵织雯特别强调身教重于言教。一个教师，只有让学生首先佩服你的人格，才能佩服你的学问。

赵织雯和学生们的关系总是处得十分融洽。她从来都是把学生当朋友看待，而学生们在她面前既敬重她又不感到拘束。

赵织雯在教学上所付出的努力与所获得的成绩是成正比的。她的学生一批一批的走出校门。那些来自国内各地和世界各地的报喜的书信，不停地印证着她为人师表的辉煌。

学生们用怀念的口气说，还想吃一吃她做的那些精美的点心。

那是一种胜过母子的师生之情。

九

在中美两国文化交流正式开始之初，1980年8月，赵织雯取得了华东师大第一批交换访问学者的资格赴美国旧金山大学访问学习。这对于搞了多年英语教学的赵织雯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在旧金山大学不到一年的访问学习时间里，赵织雯以她独特的个性和优异的成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是在加州海湾地区举行的一次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TESL）的研讨会上，赵织雯的精彩发言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加州 TESL 周刊》的编辑特邀赵织雯的导师多萝西·密西希密特博士写了一篇关于赵织雯的人物专访，发表在《加州 TESL 周刊》上。

密西希密特博士十分幽默地在那篇人物专访里写道：赵说要学会吃奶酪比学英语还要难。

这是密西希密特博士那篇人物专访的第一句话。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恰好代表了赵织雯的某种个性。

赵织雯的观点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她始终以一个中国人的形象出现在美国朋友面前。时常挂在她口头上的一句话是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当然说这话的时候，她是绝对的自信，也是绝对的彬彬有礼，面带微笑。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密西希密特博士才特别器重自己的这个中国学生。

在密西希密特博士的提议下，赵织雯在完成本来规定的访学任务外，又开始攻读教育硕士学位。

那确是一段异常忙碌的日子。

赵织雯在美国访问学习前后时间加起来一共不到十个月，而她却要修完十门硕士学位课目，也就是说平均不到一个月一门课。

为了解决攻读硕士的学费，赵织雯在晚上要去给旧金山大学职业教育专业的学生们教授《写作》课。

那些日子，除了吃饭睡觉，赵织雯几乎是挤不出来一点时间。

生活是紧张的。然而，成绩却是令人惊喜的。在十门研究生课程考试中，除英语获得免试外，其余九门课考试成绩均为 A。

这几乎是个奇迹。

在短短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赵织雯却取得了这样好的成绩。正是因为她的这些成绩才使中国人的聪明与高效得到了又一次的印证。

赵，你真了不起。她的美国朋友们这样说。

1981年3月，赵织雯被邀请参加了在底特律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 TESL 年会。会上，赵织雯因为她的发言又一次成了所有与会者关注的目标。

人们惊异于这个普通的中国女性，在英语教学上怎么会有这么多新颖而不同凡响的见地。

赵织雯把当年积累的资料和在美国从事语言交际实践中的心得集中研究分类整理，编写了一册《意念/功能练习》，作为她攻读硕士学位的论文。后来这本书由她和密西希密特共同署名于 1982 年在美国正式出版。

1981年6月2日，美国旧金山大学礼堂。毕业典礼正在隆重地进行着。

当主持人喊到赵织雯的名字时，坐在前排头戴硕士方帽的赵织雯激动地走上讲台，从旧金山大学校长手中捧回了那象征着知识与艰辛的学位证书。

台下，无数双钦佩的目光在注视着这位平凡而又了不起的中国女性。

1981年6月4日，毕业典礼后两天，赵织雯登上了飞往祖国的班机，从旧金山直飞上海，如期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教学工作岗位和丈夫儿女的身边。

1982年，赵织雯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副主任，同年被定为副教授职称。丈夫熊建衡任广播英语教研室主任，由他主编出版的广播英语教材第一册在社会上的销量多达百万余册。

1985年，由赵织雯夫妇俩撰写的《实用英语交际语法》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几年内，先后重印了六次。

至此，赵织雯夫妇俩在上海华东师大的教学生涯达到了一个鼎盛期。

十

如果是没有那一次的偶然，生活对于赵织雯来说，完全是另一番样子。她将继续留在上海华东师大那所美丽的校园里任教，继续的享受生活的那一

份恬淡还有作为一名教师桃李满天下的欣慰。

如果是那样，生活就绝不是现在的这种样子。

这是在 1986 年春天的那个星期天之前赵织雯所没有料想到的。

那是个星期六的下午，赵织雯在教研室备课。桌子上的电话响了。是校长办公室打来的，校长让她立刻到校长办公室去一趟。

赵织雯来到校长办公室。她看见办公室除了校长之外还坐着一位老军人。

校长向赵织雯作了介绍，原来这位老军人是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顾展宏院长。顾院长说他这次到华东师大是来取经的。顾院长说国际关系学院将要办英语专业研究生硕士点，而在这之前学院里还不曾招收过硕士研究生。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也就是赵织雯的母校，是她工作过十几年留下青春足迹的地方。

听完顾院长的一席话，赵织雯心头为之一动。这个十六岁就参军，曾经有着十八年军龄的副教授对人民军队原本有着深厚的感情。她完全明白英语教学在军事外交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如今，母校需要她的帮助，她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自豪。

那天下午，被召到校长办公室的还有赵织雯的丈夫熊建衡。他俩一致表示会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给母校以教学上的帮助，必要情况下，他们可以亲自到母校去做短暂的现场指导。

听着赵织雯夫妇俩的热情表态，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顾展宏院长十分高兴。

其实，在那个时候，顾院长心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打算。那是赵织雯夫妇所没有想到的。

次日，星期天。

上海延安饭店。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顾展宏院长宴请赵织雯夫妇。

席间，在一种轻松的气氛中，顾院长介绍着国际关系学院这些年来的变化。赵织雯夫妇认真地听着。他们为母校这些年来的变化而由衷的高兴，同时也表示为振兴母校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你们的热心，干杯！顾院长说。

干杯！为了母校的振兴。赵织雯夫妇说。

顾院长这时说。如果可能的话，我非常希望两位能重新回到国际关系学院去工作。顾院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十分谨慎，他知道他的这句话将对一个人的一生起着怎样的作用。他也很难把握眼前这两个人的心理，不知道听了这话之后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是一阵极静的沉默。

赵织雯夫妇一时间无言以对。这一切似乎是来得太突然了。他们很难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作出决定，毕竟他们已经在这座城市的这所学校里生活了许多年了，在潜意识里他们已做好了永远在这里生活下去的打算。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也都在这个城里的两所大学里念书。让他们一下子离开这一切去再度参军，那将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呀！参军，这是个与年轻人联系在一起的词汇，就像他们的当年。而如今，他们却都是五十岁出头的人了。许久，赵织雯说，还是让我们考虑考虑吧。

顾院长非常理解地说，我回去等着你们最后的决定。

对于赵织雯夫妇来说，那将是一个怎样的充满矛盾与选择的决定呀！

那一年，赵织雯五十一岁。

延安饭店宴请之后，顾院长回南京后经常与赵织雯夫妇取得联系，询问他们的考虑情况。

1986年9月10号，赵织雯夫妇明确表态同意重新入伍去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担任研究生导师。至此，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正式与华东师大党委协商开始办理赵织雯夫妇的特召入伍手续。

1987年6月的一天，赵织雯夫妇终于登上了上海开往南京的列车。那正是三十六年前他们第一次参军时所经过的铁路沿线。望着窗外那既熟悉又陌生的风景，这对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老夫妻感慨万千。那许多逝去的岁月重新在他们眼前闪现。

列车抵达南京，正是一个黎明，赵织雯没有给学院挂电话，她与丈夫一起背着简单的行囊乘坐上那辆开向市郊的公共汽车向那所他们熟悉的院校驶去。

赵织雯刚一踏入校门的时候，校园里正响起起床的军号声。在那久违的号声中，赵织雯一下子寻找到了另一种感觉。尽管她已是满身的疲惫，尽管她那时还没有身穿军服，尽管在她的两鬓已经有了一些零星的白发。但是，她突然感到了自己的年轻，还有那周身沸腾的热血。她觉得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军人。

是军人，就应该付出。

操场上跑过一队队的学员，他们是那么的年轻，就像三十多年前的自己。赵织雯用充满爱怜的目光望着他们。

学员们大声的喊着口号：一二三四！

赵织雯也在心里默默地喊着：一二三四！

一切都是多么的熟悉而又亲切呀！

在赵织雯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支她所熟悉的军歌。她觉得，她有义务为这支军歌再添一个美丽的音符。

一大早，顾院长家里的电话响了，是车队战士打来的。那个战士做错了事似的报告说他在南京站没有接到要接的那两个人。

难道他们没来？顾院长放下电话。

电话又响了，是赵织雯的声音，赵织雯说顾院长我们到了。

到底是军人出身，顾院长笑着放下电话，到办公室去迎接这两位不同寻常的“新兵”。

事后，那个那天去南京站接站的战士见到赵织雯后告诉她说，其实那天在站台上他看见赵织雯夫妇了，只是没有想到他们俩就是他要去接的专家教授。小战士说他觉得赵织雯夫妇像是两个简朴的中学教师。

赵织雯笑了。她告诉那个小战士说你的感觉很对，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就这样，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赵织雯又开始了她的任教生涯。她既担任研究生导师，又给本科班带课。她总是那么的忙碌，她以她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品更以她的热情开朗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十一

1989年5月，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两年的赵织雯义不容辞地被推上了教学副院长的位置。同年的12月被授以大校军衔，1990年八一前夕被晋升为少将。

那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北京京西宾馆，总参系统的将官授衔仪式正在进行着。

军歌奏响了，那熟悉的旋律在大厅里回旋。手捧江泽民主席签署的少将军衔证书，赵织雯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记者不失时机地采访这次授衔中唯一的女将官。记者问她此刻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那熟悉的旋律仍然在大厅里回荡，赵织雯不假思索地回答，激动兴奋更多的还有压力。

在军歌那昂扬的旋律中，赵织雯设想着她该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学副院长的位置上。

那是一付沉甸甸的担子，她该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担负起来呢？

赵织雯充满了信心……

京西宾馆昂扬的军歌还在回荡着，而赵织雯副院长的心却早已飞回了古都南京那个牵扯着她全部心思的美丽校园。

十二

赵织雯副院长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强教员队伍建设。她说在这项工作中，她投入的精力最多，是她工作中的一个兴奋点。

赵织雯认为，理想的教员队伍应该是有优秀学识和相对稳定的，年龄梯次合理的，既充满友谊又充满竞争。

然而，现实距理想却相差甚远。

在国际关系学院，英语是主要外语专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无疑英语已成为一个热门专业。随便翻一下报缝里的招聘广告，对懂英语的人来说都是一次次极大的诱惑。随便挑一家外企，月薪也不会少于一、两千元。离开国际关系学院，就意味着发财，这是青年教员总结出来的。

外面的拉力实在是太大了。拉力大，是全军院校师资队伍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点，而在国际关系学院，这一点就表现得尤为突出。

学院偏僻的地理位置，也增加了师资的不稳定性，交通不便，家属工作不好安排。最让人感到心寒的就是子女上学问题。学院距市区远，只好把孩子送到乡镇学校读书。由于教学质量上不去，学院里一连几年没有一个子女考上大学。这怎么能不让这些本身都是博士生硕士生的父母们感到心寒呢？

赵织雯记起了刚到学院时的一件事。有一个青年教员，听说赵织雯在来国际关系学院之前在上海华东师大任教，而且是外语系的副主任。青年教员对赵织雯说，你们怎么这么傻呀，我们走还走不了呢！

抱有这种态度的在教员队伍中当然不止一个。对于这一点赵织雯很明白，也能理解。人非圣人，谁不想生活得更好一点呢？

怎么办呢？赵织雯向自己提出了这个严峻的课题。她觉得这实在是比站在讲台上上课难多了。

赵织雯副院长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是努力培养和破格提拔中青年。给他们委以重任，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是与学院紧紧连结在一起的。

1993年，28岁的青年女教员李战子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这件事在国际关系学院甚至是在总参系统引起了强烈反响。

李战子是学院里的优秀本科留校生，留校后又在学院里读了三年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到英语教研室任教。李战子到英语教研室后先后发表过许多学术论文。但是，李战子最突出的还是她的课讲得好。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

李战子报晋副高的消息在学院里传开之后，马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

年轻人当然是拍手叫好，认为以才量职是最公平不过的了。一些老同志特别是一些还没有定上副高职称的老同志就有一些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自己熬了大半辈子还没熬上个副教授，而一个这样年轻的女孩子刚毕业没几年就这么容易地当上了副教授。在心理上他们感到不能平衡。

李战子报晋副高的材料连同这种种的不同观点被一同报到了院职称评定委员会上。

评委会上，赵织雯副院长站了出来。她没有说任何话，她把一盘带子放进放像机。图像出来了，那是李战子上课时的录像。立时，全场一片肃静。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李战子的课折服了。李战子的课，的确是上得太漂亮了。

这时，赵织雯副院长开口了，她是那么的慷慨激动，又是那么的语重心长。

她说：的确，我们有许多老同志熬白了头才熬上个副教授，那是我们赶的时代不好。难道就因为我们熬白了头也要让这一代年轻人和我们一样吗？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把优秀的年轻人推上去，这不是一个李战子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风尚的挽救与培养。

李战子的副高职称终于通过了。二十八岁的女副高，这在国际关系学院，甚至是在总参系统还是第一个。

一时间，二十八岁的李战子成了国际关系学院师生们的谈论中心。

无疑，这件事给青年教员队伍注入了一支兴奋剂。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好好干，在“国关”也不是没有用武之地。

在李战子这件事情上，赵织雯副院长也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但她认为这是难免的，必须拚上命杀开这条路，否则，教员队伍就永远不会有生机。

从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赵织雯深入全院各教研室一个一个摸底，建议党委提拔一大批中青年干部担任教研室主任。至今，在全院教研室主任中，超过五十岁的只有两名。

赵织雯副院长一生崇敬周总理。她常说，周总理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不是也很年轻吗？她主张对年轻人既要“护”又要“严”，每个人都有个成长过程，要允许人犯错误。她主张教育者要有风格，不占位子不摆架子，要做年轻人的人梯。

英语教研室副教授杨晓荣的故事是赵织雯副院长抓师资队伍建设的又一个感人事例。

杨晓荣，原在上海海运学院英语系任教。杨晓荣从小生长在部队干部家庭，对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由于感情上的一些原因，她很想特召入伍到部队这个大家庭来。杨晓荣选择了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赵织雯知道这件事后，对杨晓荣进行了考察。她认为杨晓荣英语水平很高，事业心强，学院正缺她这年龄段的英语教师，是英语教研室的合适人选。

赵织雯以教学副院长的身分向党委推荐并建议待召杨晓荣到国际关系学院任教。

就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赵副院长接到了上海杨晓荣打来的电话，海运学院不放人，而且态度坚决。

怎么办？就这样不了了之吗？想想学院英语专业师资短缺的现状，不行！赵织雯毅然拿起了电话，拨通上海海运学院沈校长家的电话，尽管那时她还从没见过这个沈校长。

长达半个多小时的电话长谈，终于使这个态度坚决的沈校长放松了口

气。最后，沈校长说明天研究，尊重她个人的意见吧！

放下沈校长的电话，赵织雯又开始用电话找杨晓荣。明天研究，她必须在那个晚上找到杨晓荣，让杨晓荣在那个晚上到沈校长家表个态。

半小时后，上海海运学院沈校长的门外，响起了杨晓荣的敲门声。而远在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坐在电话机前的赵织雯副院长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那时，已经很晚了。

杨晓荣终于如期来到了国际关系学院。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按照规定，单身干部的住房面积最多不能超过二十五平方米。杨晓荣是单身，而同时四十岁的杨晓荣又有副高职称，按照规定，副高应该享受团级待遇。赵织雯知道这件事后亲自跑到营房办公室去给杨晓荣要房子。

人家从大上海奔到我们这里来，总不能让人家的生活水平下降吧，否则怎么能一心扑到教学上呢？

赵织雯的苦口婆心终于感动了营房办公室。

杨晓荣拿到了一套团职房的钥匙。

为了表示欢迎，政治部主任以组织的名义宴请杨晓荣。宴席上，杨晓荣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杨晓荣含着泪说，“我终于找着自己的家了。”

有杨晓荣这句话，我想她会全身心的去教好她的学生的。

为了建设一支稳定而有战斗力的教师队伍，赵织雯副院长所付出的心血是难以计数的。这一点只有生活在“国关”的教师们最清楚。

青年教员杨寿青永远不会忘记赵副院长在为他爱人随军找工作到处奔波的情形。而日语教员吴丛，英语教员金光辉、何树则会永远铭记赵织雯副院长为结束他们牛郎织女生活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为了让学院里的孩子们能够到条件好一点的梅山学校去读书，赵织雯副院长不知跑了多少趟梅山（注：梅山是靠近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座上海大型企业，内设中小学，教学条件相当好），她还担任了梅山中学少年军校的名誉校长。

学院里搞文艺演出，赵织雯总是积极参加，她上台指挥的《歌唱祖国》、《我是一个兵》的消息被刊登在《扬子晚报》上。

这便是赵织雯，忙忙碌碌的赵织雯，一心扑在教学事业上的赵织雯，善良正直充满快乐天性的赵织雯。

十三

1993年7月2日，《解放军报》在醒目位置上报道：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荣获全国英语八级水平测试最好成绩。

在强手如林的全国外语类院校中能获此殊荣，“国关”人异常振奋。

取得如此殊荣，怎么能不令人激动呢？但是，在这振奋与激动之余，赋予“国关”人的却是一种求真务实的品格。

“求真务实”，这是“国关”人对赵织雯副院长性格的新发现。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一提到比武，总会让人联想到以下场面，突击性的准备。加班加点，临时性的调整，把最好看的“花”摆在面上。然后是一张张紧张而又疲惫的面孔，再然后是群众的抱怨，假的假的全是假的！

还是在刚接到测试通知的时候，赵织雯副院长就作了指示。她主张一切测试都要在正常教学的情况下进行，决不加班加点，更不临时调整教师队伍。在保证正常教学进程的条件下，搞几次模拟考试是允许的。

一切都处在一种正常的教学运行之中。宁静的校园里看不出一点比武前的慌乱与忙碌。

测试开始了，测试又结束了。一切都在一种宁静中过去了。

人们似乎对测试成绩并不是十分的关注。在这整个的过程中，人们对自身的价值又有了重新的认识，重新找回的是一种自信，更是一份自尊。

“国关”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取得全国英语八级水平测试成绩第一名的，怎不令人感到振奋。

几年来，赵织雯在担任教学副院长期间，她从没间断过给学生们上课。她要掌握教学上的第一手资料。师资班的学员到外地院校去实习，她不辞辛苦，亲临实习点。

为了建设好军事外交这个专业，赵织雯申请资金在学院建起了模拟中心，为学员得到实践机会创造环境。

1989年，赵织雯提议学院成立教书育人研究会，由她亲自任会长，评出了教书育人十佳，还出了一本文集。这项活动在师生中产生了极好的影响。

在这些忙碌的事务性工作之中，赵织雯也从没间断过学术研究。1994年5月，在全军院校大学英语教学研讨班上，她以《适应形势需要，努力发展我军外语教育》一文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文中以海湾战争为例，充分精辟地阐述了现代高技术战争中加强外语教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而她发表在总参出版的《宣传教育》杂志上的《努力从战略的高度抓好院校的教育训练工作》一文，则从院校管理这个角度论述了院校管理在整个教学工作中的重要性。

十四

采访就要结束了，在一个晚上，我来到赵织雯副院长家告别。

一打开门就见赵织雯副院长正在和她的爱人熊建衡老师埋在一大堆书稿中。

赵副院长告诉我说那是他们夫妇俩将要出版的又一本书《现代英语交际指南》，全书达一百多万字，光是校对就用去了半年多时间。

望着两位埋在书海中而乐此不疲的老人，我感慨万端。

这时，我又觉得，站在我眼前的这位少将副院长，还是更像一位虔诚的学者。

窗台上摆放着的是熊建衡老师精心侍弄的几盆盆景。那盆景的手艺还是他在上海纸箱厂上班时跟一位工人师傅学来的。

望着那几盆盆栽，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宁静，一种恬淡，一种对生活永不厌倦的执著的爱。这时，我想起了一句话：有一种丰硕叫恬淡。

风雨丽人

辛茹

她发现自己正置身在一片深邃的天空之中。

这里的天，是这样的低，这样的蓝，这样的纯粹。举目望去，天空一碧如洗，纤尘不染，满天的星星晶莹璀璨，彼此照耀，一颗颗仿佛就闪烁在眼前，伸手可触。

这里是西藏，是世界屋脊，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她开始凭着职业的习惯，寻找着围绕在自己身边的那些熟悉的星座。她数得出他们的名字，辨得出他们独特的光芒；甚至有一颗新星，就在这片陌生而神奇的土地上，刚刚被她托举上天空。她知道人们暂时还叫不出他的姓名，但他总有一天会成熟，会光芒四射。她坚信这一点。

她已经 51 岁。她是个毕生都在风雨里和星光中奔走的女人。

也许因为自己也曾是一颗明星，当她仰望着这片纯净的星空时，蓦然有一种梦回心惊的感觉。她固执地认为脚下踩着的是一座巨大的、举世无双的舞台，穿过几十年的匆匆岁月，自己终于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而那些闪烁的星星，则好像剧场的灯光熄灭之后，从观众席上缓缓仰起的那一双双眼睛。

她忽然想像当年那样，放声歌唱——

小白菜，泪汪汪，苦水比那溪水长，
跟着飘向战地的旗帜，15 岁的中学生突然从齐齐哈尔失踪了。

春天来到齐齐哈尔。

虽说这里仍是冰的世界，雪的世界，城市鳞次栉比的屋顶上和错杂拥挤的街道上，到处都一片白皑皑的。但一阵阵暖烘烘的春风已徐徐吹来，屋檐下开始滴滴嗒嗒地跌落着融化的雪水，从封冻的河面上，正隐隐传来一阵阵裂冰的声音。

应和着频频传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光复东北大地的捷报，人世间春的讯息显得更为浓烈。在这座沉闷得令人窒息的城市里，几乎一夜之间，所有封闭的门扉都打开了；所有尝够了亡国奴滋味的中国人，那曾被阴云笼罩的脸，都迎着徐徐到来的春风，绽开舒心的笑容。街道上日日夜夜奔走着载歌载舞的人群；街两边贴满红红绿绿的标语，每一张都像凝固的春雷倾吐着人们欢天喜地的心声。

这时候当然谁也不会注意，有一个扎着两根小辫的 15 岁的女中学生，成天都在跟着人群疯跑，她衣着朴素，皮肤洁净，性格沉稳、倔犟，长着一双大而忧伤的眼睛。每当街头上有锣鼓声响起，她又准会钻过人群，痴痴地站在最前排的位置上。

后来她便在街头上听到了那支熟悉而凄婉的歌。曾用她的泪水浸泡过的歌，听着，听着，她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

半夜里来秋风凉，
望着月亮哭断肠。
小白菜，泪汪汪，
苦水比那溪水长。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00_0255_1.bmp}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00_0256_1.bmp}

.....

唱着，唱着，那夜色果然就铺下来了；唱着，唱着，那萧杀的秋风果然就刮过来了；还有那汪汪的清泪；也果然在一串串地往外涌。

她觉得这支歌既不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也不是妈妈教会她的，而是从她的血脉里流出来的。

15 岁的女中学生，1932 年出生在齐齐哈尔。父亲在她 5 岁时便撒手人间，把母亲和她凄苦地留在人间。她至今对父亲的籍贯仍然印象模糊，只知道他是逃荒逃到此地，然后在一个作坊里当了一名石印工人。恪守“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旧式女子信条的母亲，为把她抚育成人，又匆匆改嫁给一个从河北逃荒到齐齐哈尔的农民。继父依靠长年给地主种菜，维持着全家惨淡的日子。

母亲改嫁之后，她随奶奶一起寄居在姑姑家中。

父亲的去世和母亲的改嫁，给初谙世事的她带来寄人篱下的磨难，使她开始以幼小的心灵独对人生的艰难和辛酸。

9 岁时，母亲执意将她接到自己身旁，然后又把她送回到自己的父母家中。

来到外祖父身旁的她对一切都感到新奇和陌生，外祖父在一家工厂做绘图工作，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尽管家中非常清贫，仍执意要让外孙女接受教育。由于外祖父的坚持，到 1947 年，她已经是齐齐哈尔市女中的一名学生了。

虽然有外祖父的关爱，有许多同龄人梦寐以求的书读，但离开母亲离开家的她，心里仍堆积着太多的寂寞，太多的冷淡和太多的向往。

街头上一曲《小白菜》，让这个以小小年纪饱尝了生活艰辛的 15 岁的女中学生，勾起了记忆的悲凉，也勾起了现实生活中的孤苦。

一曲《小白菜》唱完，她已泣不成声，泪流满面，街中心的演员和观众都惊愕地看着她。女中学生突然意识到什么，急忙擦去泪水，然后用倔犟的目光看了一眼街中心的演员，在心里说，看什么看，总有一天我也会像你们一样去唱，像你们那样去跳。

此时，郊区的大道上更为热闹，每时每刻都有翻身的农民推动着载满军鞋和烙饼的独轮小车，吱吱呀呀地从雪地里辗过。

15 岁的女中学生常常会独自跑出城区，站在郊区的大路边，怔怔地数着从身边推过的小车，同时心里想象着远处正发生的事情。

几天后，15 岁的女中学生瞒着家人悄悄在新组建的黑龙江省战地慰问团的招生表格中，郑重地填上了自己的名字：乔佩娟。

黑龙江战地慰问团就这样多了一个名叫乔佩娟的少女，而那个在大街上常跟着人流疯跑的 15 岁的女中学生突然从齐齐哈尔消失了。当母亲满世界地喊着她的名字，在齐齐哈尔的大街小巷寻找着她的女儿的时候，乔佩娟正坐在一辆南下四平的马车上。

此时解放大军正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烈的四平争夺战。从前线源源不断地转运下大批伤员，急需治疗和护理。

在这里，不需要你去冲锋陷阵，也不需要你摇旗呐喊，只需要你换洗绷带，喂饭喂药；或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挑一盏马灯，去为伤残战士倒屎倒

尿，就像照顾自己患病在床的父亲和兄弟一样。

虽然天气渐渐转暖，但东北大地依然是冰雪封冻。战地慰问团每到一地，便在寒风中东奔西忙，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部队打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刚刚走出校门的乔佩娟，已经懂得人民解放军是中国的希望，是人民的子弟兵。为伤员出力，其实也就是为解放全中国出力。她认真地学习护理知识，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只要能减少伤员的痛苦，什么都愿干。

一路上，乔佩娟第一次感受到战争气氛，在深更半夜里看到国民党逃兵，第一次经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第一次目睹战士们的忠诚、顽强和他们为人民解放流出的鲜血，也第一次领悟到救国救民的道理。

随慰问团返回齐齐哈尔后，惊恐未定的母亲发疯般地把乔佩娟搂在了怀里。自女儿失踪后，她每日茶饭不思，如同掉了魂似的。因为丈夫早死，她生怕逐渐长大的女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有个三长两短，只想把她留在身边，图个虽然清贫，但全家团圆的日子。

想不到经过战争风雨吹打，乔佩娟第一眼见到母亲，就对她说：“妈，我不想在家里呆下去了，我要参加革命。”

母亲大吃一惊，吓得半天才说出话来：“佩娟，难道你疯了？你这次跑出去，已经把外公和妈吓坏了，以后别再做这种傻事了。”

“我没疯，也不傻。”乔佩娟主意已定，对母亲说：“我长大了，我要自己选择生活。”

“但你小小年纪怎么革命呢？”女儿从小就生活的不易，母亲并不反对她去找个其它什么工作。她说：“革命，那是男人的事，你一个小丫头，怎么能这样去闯荡？”

“为什么不能？”乔佩娟理直气壮地说：“虽然我不能扛枪，但我可以去为战士们唱歌、跳舞，去护理伤员。”

母亲说不过女儿，最后反而被女儿说服了。她突然觉得女儿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有些认不出来了。

母亲的善良使她答应了女儿的愿望。但继父脾气暴躁，凡事都认死理，倔犟的乔佩娟干脆就不跟他说。

乔佩娟成了齐齐哈尔市文工团的一员，并且随团投身于战火纷飞的东北解放战场。从此，她唱歌、扭秧歌、护理伤员，生活在崭新的希望中。

当时的齐齐哈尔市文工团，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文艺团体。在仅有的二十四名团员中，就有后来任中央歌舞团团长的李尼、中国电影乐团团长的徐徐、新闻电影制片厂著名作曲家丁炬、鞍山和本溪文化局局长沈乃然及曾饰演《白毛女》中“喜儿”的解冰以及著名电影演员葛存壮等。置身在这样阵容的团体中，乔佩娟感到自己仿佛从地狱升入了天堂。

1948年，乔佩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年仅十六岁的年轻的共产党员。

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从炮火
和硝烟中走来的姑娘，唱着歌步人辉
煌。

1953年1月。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剧场。

帷幕徐徐拉开了，天棚顶端灯光怒放，如同缀满星星的穹隆。天幕上青山叠翠，溪水潺潺，阳光像金箔一样洒在荡漾的水中。有缕缕清风如歌如梦，拂动着万千柳丝。几声清脆的鸟鸣，让人蓦然想起从绿叶上滚落的露珠。

在帷幕徐徐拉开的同时，琴声响了。那琴声舒缓悠扬，清脆悦耳，如同天幕上那股清水在流淌。

仿佛一片绿叶突然被流水带走了。此时此刻，乔佩娟不由自主地亮开了歌喉：

清粼粼的本来蓝格莹莹的天
小芹我洗衣衫来到河边
二黑哥县里去开英雄会
他说是今天回家转
我前晌也等后晌也盼
站也站不定，坐也坐不安
背着俺的爹娘来洗衣衫

……

从舞台边走出来的是一个头戴彩巾、手挽竹篮，身穿碎花衬衫的名叫“小芹”的姑娘。她对着清粼粼的水，对着蓝莹莹的天，一咏三叹，热情而奔放地倾吐着对青年农民“小二黑”的思念和爱慕之情。

演员俏丽的身影、美丽的歌喉，如行云流水，令人耳目一新。

台下鸦雀无声，所有观众的心都被小芹姑娘的命运紧紧抓住了；所有观众的眼睛，都为小芹姑娘炽热的爱情和纯真的渴望，激动得热泪盈眶。

根据著名作家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改编的同名歌剧，叙述着一个解放区翻身农民崭新的爱情故事：正值豆年华的小芹和小二黑，为争取婚姻自主，在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冲破满脑子封建思想的父母的阻挠，战胜混入基层政权的坏人的迫害，终于比翼齐飞，结成了一对模范夫妻。

这是歌剧《小二黑结婚》的首演式，不仅戏剧界的前辈都赶来了，而且来了许许多多的作家和诗人，许许多多的歌唱家和舞蹈家。他们谁都有入木三分的眼光，谁都有明察秋毫的听觉；谁都期待着被征服，但谁又都不容易被征服。

站在舞台上的乔佩娟，早已忘记自己是在演戏。她只顾把小芹那火辣辣的爱和坦荡荡的情，漫天向她的二黑哥泼去，向台下那成百上千双凝神注目的眼睛泼去。她感到剧中小芹的命运，和自己息息相关；透过眩目的灯光，她看见在眼前那青山绿水间走着的，分明就是那个当年跟着黑龙江省慰问团南下四平护理伤员的女中学生。演着，演着，她竟然分不清是自己在演小芹，还是小芹正在演自己。

五十年代是个忘我的年代，热血沸腾的年代，又是个满目春色应接不暇的年代。来自于火热生活的艺术和经历着火热生活的人们，常常互相撞击，相互渗透，彼此融汇贯通，舞台上蹦出任何一朵火花，都可能放射出如日中天的光芒。

歌剧《小二黑结婚》就是在这样的年代应运而生。

当帷幕徐徐落下之后，观众如梦初醒，随后中央戏剧学院那座简陋剧场被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长久缭绕。

久久站立在观众席上准备谢幕的那些戏剧界前辈，那些作家、诗人们，那些歌唱家、舞蹈家们，忽然意识到新中国又有了一部出色的新歌剧；而那

位即将从中戏歌剧系毕业的、扮演小芹的学生，也必将会成为歌坛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也许乔佩娟该感谢那个时代。

因为是那个时代为她铺下了走向辉煌的路。

随着共和国的诞生，一种崭新的秩序欣然降临，文艺工作更是受到新秩序的鼓舞，如鱼得水。

这年乔佩娟所在的文工团刚刚并入长春电影制片厂，恰逢东北鲁艺的著名戏剧家张庚前往北京参加筹办中央戏剧学院。于是组织上决定让她随同张庚等人到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

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当时的演员阵容十分可观。著名歌唱家王昆、郭兰英都在这个团，乔佩娟来到这里，便有更多的机会向她们学习演唱技巧。

中央戏剧学院成立后，设立了本科歌剧系、话剧系及舞台美术系。这三个系除舞台美术系外，学员均为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同志。学员中年龄最大的30岁左右，年龄最小的，便是考取了歌剧系的乔佩娟。

这个学院汇聚了当时艺坛最具实力的文艺志士。院长是欧阳予倩，副院长是曹禺和张庚。教育长是张光年，话剧系主任舒强，歌剧系主任马可，舞台美术系主任刘露。

在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所学的课目全面系统：舒强的表演课、张庚的新歌剧运动讲座、欧阳院长的中国话剧运动史、曹禺的戏剧创作、艾青的诗歌、陈企霞的文艺理论、王朝闻的美学以及丁玲等知名作家的文学创作课——这些新中国第一流的艺术家和作家所讲的第一流的课程，为乔佩娟今后的艺术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学院还外请了许多著名表演艺术家为他们上课：中国戏曲课由昆剧著名演员白云生等担任；地方戏曲由河北梆子著名演员李桂云、评剧表演艺术家小白玉霜担任。

许多年之后，中央戏剧学院的本科第一届学员都相继展露出才华，纷纷走上文艺团体的创作、表演、领导岗位，成为独当一面的行家里手，为繁荣文艺作出了突出贡献。

命运对勤勉进取的乔佩娟格外关照，早早地赐予了她艺术实践的机会，并让她在刚要跨出戏剧学院的大门的时候，便脱颖而出。

毕业前夕，学院决定让这第一批学员排演两个剧目，一个是话剧系的《战斗里成长》，一个是歌剧系的《小二黑结婚》。乔佩娟被确定饰演女主角小芹。

乔佩娟似乎早就在等待这一天。

早在齐齐哈尔市文工团时，乔佩娟就跟着团里请的白俄教师马露西哑学习过声乐。同时还学唱演出了东北民歌《月牙五更》、《瞧情郎》，以及东北民间戏剧《蓝桥会》、《断桥》以及秧歌剧等。这一系列的艺术积累，加之在学院的优异成绩，为她扮演农村姑娘小芹准备了丰厚的条件。

排练期间，她每天把自己关在排演厅，反复琢磨剧情，诠释歌词。每一段唱词都一句一句、一声一声地练。演出时，她的唱词珠圆玉润、声情并茂，舞台形象朴实细腻，让一位不畏恶势力、冲破阻挠，争取婚姻自主的艺术形象活生生地戳在了舞台上。

小芹的成功，使她在新歌剧舞台上展露出了独特的艺术功力。

《小二黑结婚》自此成为新歌剧运动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创作剧目；歌曲《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几十年来成为舞台上的保留曲目。直至今日，

仍然经久不衰，百唱不厌，并且还有歌手选择这支歌曲录制音乐电视。

值得一提的是，一出《小二黑结婚》，也把乔佩娟与这个剧目的编剧田川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她几十年相濡以沫的爱人，剧作家田川，曾担任过总政文工团创作室主任、总政歌剧团团长。在进入中央戏剧学院与乔佩娟成为同学之前，他是四野某军文工团团团长。《小二黑结婚》的剧本，是他和同学杨兰春的毕业作品，同时也成了他的“红娘”。毕业前夕，他和乔佩娟结为伉俪，从此一同步入风风雨雨的人生。

毕业分配时，在去留问题上他们很快达成一致。乔佩娟服从艺术留在北京，田川服从组织需要分到广州军区创作室，两人共同放弃了朝夕相处的生活，选择了各自的事业。

留在北京的乔佩娟随张庚、马可调入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参与戏剧改革的实践中，她痴痴地研究如何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上发展中国民族新歌剧。这期间，她又再次师从评剧表演艺术家小白玉霜学习评剧、现代剧《杜十娘》、《珍珠衫》等，并与小白玉霜同台演出过《罗汉钱》、《秦香莲》。

1954年，她调入总政歌剧团，同年，她的爱人田川也调入该团，创作了歌剧《志愿军的未婚妻》。随后，乔佩娟也随中国人民慰问团赴朝鲜，在《志愿军的未婚妻》中成功地饰演了主角赵淑华，受到中朝两国指战员的好评。回国后又在《李月娥还乡》、《满院生辉》、《不做最后一个文盲》等歌剧中扮演主角，塑造了许多性格各异的舞台形象。

不久，上海声乐研究所招生，她又过关斩将，取得了继续学习三年声乐的机会。

担任乔佩娟老师的林俊卿既是一位医学博士，又是著名的声乐教授。他致力于打破声乐教学神秘化的研究，让演员首先从人体的生理构造、发音机能状态来掌握歌唱发音的正确方法。这种方法被称为“咽音”学派，是国内外声乐教学史上很有价值的一种尝试。

羽翼正丰的乔佩娟数载匍匐于林俊卿门下，刻苦学习，精心钻研，从理论到实践掌握了一整套“咽音”训练方法。

从上海学成归来，乔佩娟感到天高地广，前面的路也正长。回北京的途中，她也许正怀着这样的心境，想象着将要锦上添花的事业，如同一切刚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一样，怀着许多莫名的兴奋跃跃欲试。

然而，正所谓十年磨剑，卧薪尝胆。32岁的乔佩娟正值艺术上的飞扬时刻，天空中却突兀落下一个炸雷，烧焦了她翅膀上的一大片羽毛……

疯狂的年代，荒诞的遭遇。一个
正在田间劳作的歌唱家，从心里呼喊：
我30多岁了，能经得起这样的折磨吗？

1965年春天，乔佩娟收到了她的老师马可先生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此时马可先生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国音乐学院的院长，特邀乔佩娟去当老师。

乔佩娟犹豫着，她舍不得脱下那身军装，更舍不得过早地结束自己的演员生涯。但马可信中为她描述了发展民族歌剧事业的美好前景，更强烈地吸引着她。她终于毅然走上了教学的岗位。

但在中国音乐学院当了十个月讲师的乔佩娟，更没有料到的是，一场史

无前例的政治风暴突然砸在了我们的国土上，也砸在了乔佩娟这个普通女教师那脆弱的肩膀上。

这是 1966 年开始的“文革”。

灾难似乎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一次，两队学生就那幅浸泡着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双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因为谁都不能说服谁，偏激而疯狂的情绪一时间摧毁了理智的堤坝，大院里随即陷入一片混乱中。

不迟不早，这时候乔佩娟正好赶上。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极为惊悚的场面：混乱中，一名女生突然被人撕破了上衣，裸露出后背。出于对学生的爱护，她愤然挤进人群，紧紧地把那个女孩拥进自己怀里。她眼里充满了同情和愤怒。

当狂热的人群盯住眼前这个愤怒的闯入者时，他们猛然意识到一个新的攻击目标撞上了枪口。

无数只拳脚朝乔佩娟争先恐后地砸来，她像一片猝然飘落的树叶，转眼被卷入了疯狂的漩涡中。

狂潮过去之后，乔佩娟被一些师生解救出来，但一家医务室的医生因为怕担“救治黑帮”的罪名，婉言拒绝给她检查治疗。这时她哭了，一种不被人信任、理解的痛苦咬噬着她的心。

最后是一位善良的盲人按摩医师给她治疗了伤势。

此时此刻，乔佩娟的心在滴血，凭着几十年的人生阅历，她可以原谅些年幼的学生。那么大的一场运动，年轻的学生不可能不被偏激和盲目所控制。但是，她却不能原谅那些曾是她的朋友的人。当过去的那些朋友突然向她投来冰凉而冷酷的目光时，她几乎就要在这一束束目光中冻僵了。

不久，她的家被一次又一次查抄。然而，在一片嘈杂刺耳的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声中，她没有因着现时的标准而违背自己的意愿。当许多人在污浊与清白之间做着非此即彼的选择时，她始终坚持不屈己、不违心，她认为这是在任何情形中都必须保留的气节。

当然，她也想到过另外一种选择。那是严峻的生与死的选择——在她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党的时候，她不止一次地想到过死那是一种痛彻肺腑的心灵搏斗。可她最终没有迁就自己的软弱，她咬紧牙关，发誓要等待灿烂的阳光撕开阴霾的那一天。

她愿意为这一天的到来忍受一切屈辱和苦难。

1969 年，周恩来总理冲破重重阻挠，亲自过问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两所院校的情况，并迅速将受到迫害的教职员工下放到天津的一个部队农场，使他们避开政治斗争的中心，免受更大的摧残。

在农场，在艰苦的环境中，乔佩娟以自己的方式证明着她的清白。

刚下放到农场，她正怀着四个月的身孕。

乔佩娟和爱人本不想再要这第二个孩子，但他们在运动中看到自身环境的险恶，朋友们都惶恐避开了，只有血缘亲情能给疲惫屈辱的心灵少许安慰。他们害怕熬不出这场运动，让唯一的孩子孤苦伶仃地留在这个世上。因此决定再生一个孩子，以便让他们在不可预测的岁月中彼此照应。

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母亲怀着这样的心情来迎接新生命？也不知道这里面浸泡着多少无奈和辛酸！

从怀孕至八个月时，正赶上下水田插秧，这时乔佩娟的身体十分不方便，

已经蹲不下去了。但她没有说过一句求人体谅的话，每天默默地跪在水田里干活。几个月下来，她的脚、手、腿部都肿了起来，腿部胀痛。可她倔强地坚持下去，没有推卸过一次体力活。

在艰苦的环境中，乔佩娟没有因为辛劳流过一滴眼泪，但有一件事，却使她心头一颤，泪水倏地爬满了脸庞。

一天，有位同事悄悄告诉乔佩娟，说指导员找她，让她去一趟连部。她心中十分不安，不知道又出了什么问题。

到了连部，指导员没有抬头看她，而是指着桌上的东西说：“你把这些吃掉，伙食太差，又从来不见你买水果，身体恐怕顶不住。”

指导员说完便走出了房间，把门关好。

乔佩娟看着桌上的几个西红柿和两个小西瓜，眼泪就劈劈啪啪地掉了下来。这是她自运动以来体味到的唯一的温暖和真情。

在那个疯狂的岁月中，最令乔佩娟焦虑的，还是自己的艺术生命。一天劳动下来，躯体中除去日渐在肚子里骚动的孩子外，所有关节就像锈死了，显得麻木不仁。但思维却格外地敏锐。

天呵，我都30多岁了！每当拖着沉重的身子，带着满身泥泞从田间归来时，她都在心里痛苦地喊道：这时候我本该在艺术的高峰上攀登，现在却在泥里和水里爬行。一个好不容易从战火和硝烟里走来，又经过无数前辈打磨的歌唱家，艺术生命能经得住这样的折磨吗？

平平淡淡总是真，坦坦荡荡见风骨。
默默地从前台消失的歌手，悄悄地从后台崛起。

天无绝人之路。

艰难地挪进了七十年代，命运回黄转绿：在绝望中挣扎的乔佩娟突然接到重返北京的调令，而且是重返已离开了的总政文工团！

“漫卷诗书喜若狂”，当时乔佩娟还以为是在做梦。此时此刻，许许多多的艺术家仍然被远远地赶开，丝毫没有改变处境的迹象。后来她才知道，当时总政文工团有些领导，出于对她的深切的了解、同情和工作的需要，在地方有关同志的热心支持下，把她调回了部队，暂时安排在排演场当干事，但一干就是五年。

这五年时间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业务活动，但对于自信而又不泯艺术之心的乔佩娟来说，已甚感欣慰。她以她自己的方式逼近人生的真实，做着更完整意义上的艺术追求。

总政文工团排演厅是个只有几个人的小集体，同事们是一群真正的普通人。他们没有矫情，没有伪饰。受到许多伤害的乔佩娟格外爱惜眼前的这一切。

也许这些普通人易于被一些自以为高贵的人们所鄙视，但正是他们，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宠辱不惊，勤勤恳恳。在乔佩娟眼里，他们才是这个城市的具体的人。他们脚踏实地，与现实生活无争无计，从琐碎的柴米油盐、吃穿用度中显露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有着寻常人生的高贵与庄严。

乔佩娟至今都欣赏这些朴素的人的朴素的生活态度，欣赏那里面透出来的对平凡生活的认真与执著。正是这样一群真心实意地待人，勤勤恳恳地工

作的人，使乔佩娟看到了自己所恋恋不舍的安稳的人生。

这种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又让乔佩娟倍感亲切。在运动中，她发现自己像影子一样沉没在一片嘈杂中，又像被世界抛弃在荒凉的海滩，现在的这些真实、具体，忽然让她回归大地，真真切切地听见一种人生的回响。

工作中，她与职工们一样，擦玻璃、扫厕所、倒痰盂，什么脏活累活她都干。

尽管她那一时期从事的工作平平常常，尽管她服务的对象有些还是她的学生，尽管这一切使她感到自身的失落，但也就是这一切使她学会了正视人生，正视在风中雨中自己所经受的一切坎坷与磨砺。

她把自己融入这些普通人之中，成为他们知心的朋友，尽她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分忧。

排演场有个同志叫雷志川，是个多年的模范人物。他的妻子在安徽，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家里又有三个很小的孩子，生活的拮据可以想见。

乔佩娟知道后，一次又一次地为雷志川奔波。几经周折，终于将他爱人调来北京，以后又安排在团里当炊事员，并且也成了个模范人物。她说如果不尽心工作，就对不住为他们操心奔波的乔佩娟。

在雷志川一家眼里，乔佩娟就是一位大姐、一个朋友，一个有苦衷可以倾诉，有眼泪可以向她流淌的好人。甚至夫妻之间有了什么矛盾，雷志川的爱人都能在半夜三更敲开乔佩娟的家门。

雷志川还有一个姐姐是个哑巴，他父母怕把女儿嫁出去受委屈，所以一直留在身边。雷志川和爱人对这位有残疾的姐姐十分关照。但是哑巴姐姐还是免不了寂寞与孤独。

这件事又被乔佩娟装进了心里。她四处托人为雷志川的这个姐姐物色对象，终于在北京顺义县找到了一位农民。接着乔佩娟亲自去为雷志川的哑巴姐姐相亲，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姐妹一样负责。

到了送亲的那一天，她又带着排演场的同志，热热闹闹地一直将新娘送入洞房。至此，才算了却了她的一桩心事。

雷志川的姐姐勤劳善良，在农村政策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夫妻俩同心协力，勤劳致富，现在的日子过得富裕红火。他的丈夫对村里人说：“我我的这个老婆，虽然不会说话，但比会说话的还强。”

雷志川的儿子参加工作后，第一次领到工资，就买了水果去看望乔佩娟。一直到现在，每逢春节，他都要带上爱人来看看他们的“乔阿姨”。

乔佩娟在把自己投身于平凡生活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她几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精神上的象牙之塔。

我们除了那个流连于日常工作，对生活中的一切充满热情和喜悦的乔佩娟之外，又经常看见一个满怀惆怅，或是坐在小室里孤灯独对、黯然神伤的乔佩娟。甚至在她不易察觉的片刻的失神中，也能体会到一种难以排遣的寂寞。这或许就是因被迫与艺术疏离而造成的。

这份寂寞使乔佩娟常常扪心自问：我的事业难道就在这里？难道我许多年的艺术积累就这样一天天被耗尽？她心有不甘。

这一时期她得到了爱人田川的许多理解和支持，他从来没有让她拉下过一场观摩演出，还时刻鼓励她坚持业务基本训练。

1974年，总政文工团组建《万水千山》剧组。团领导考虑到二百多名剧组成员中女同志多的特点，决定选一名懂专业的妇女干部进入剧组领导小

组。团里召开多次座谈会，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最后确定乔佩娟为剧组领导小组成员、总支部副书记。

这时乔佩娟当然不可能想到，从此命运把她的整个人生刀切般地划开了两个阶段：作为歌剧表演艺术家的生涯就此终结；做为艺坛领导者直至将军的生活就此开始。尽管此刻她只是个剧组的领导小组成员。

人一辈子的遭遇就这样不可捉摸，诚如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所说：你本想进入这个房间，结果却撞进了那个房间。

《万水千山》剧组在政治上经历了周总理逝世、“反击右倾翻案风”和粉碎“四人帮”的风风雨雨。这个剧组的领导小组成员在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只剩下乔佩娟一人，她紧紧依靠由老同志组成的党总支委员会，保证了这个剧组人员政治头脑清醒，团结一致。

《万水千山》剧组，还是唯一去天安门给周总理送花圈的总政干部集体。

在后来的清查中，剧组演员、曾扮演过影片《宋庆龄》中的宋庆龄的朱可欣同志，因曾议论江青、张春桥而被监管。乔佩娟带领着剧组的同志们，在政治上保护了朱可欣。后来朱可欣结婚时，她的母亲拉着乔佩娟的手说：“您可是我们可欣的恩人啊。”《万水千山》剧组解散后，乔佩娟回到总政话剧团。这时候她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回到业务队去，不再担任领导干部。她和演员们一起排练、一起观摩，又走上了舞台的她热切期待着在渐渐复苏的舞台上重振雄风。

但命运对乔佩娟以后的安排，使观众再也没有机会在舞台上看到当年那个扮演“小芹”的丽人乔佩娟。

她默默地从前台消失了，却悄悄地从后台东山再起……

格桑花，格桑花，红似火，美如霞。
51岁的政委带领演出队，沿边防
洒下了一路歌声，一路花雨，一路深情。

回首平生，乔佩娟有过许多的辛酸，许多的感慨，但也有过许多的欣慰，许多的荣幸。

比如，当她走上领导岗位不久，就出任了总政歌舞团副政委。不久又升任政委。

总政歌舞团是一个享誉国内外的艺术团体。在这里聚集着国内和军内第一流的歌唱家、舞蹈家和词曲作家。扳扳指头，谁数不出像李双江、克里木、郁钧剑、阎维文、程志、刘敏、士心……这样一大批的被称做“星”、“腕”的人物？因此，说这片天空星光灿烂，一点儿不夸大。

在这样的团体中担任政委，面对着由“星”、“腕”和“新秀”们组成的各种流派、各个层次的编、导、演以及舞美、灯光、服装等等环节的人员，不是内行，没有威望，就很难领导麾下的众多文艺将士。

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弃艺从政对乔佩娟本人的演艺生涯，也许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可对整个艺术团体却是一件幸事。因为她不但是一个好的行政领导，更是一位有丰富艺术积累、艺术修养和艺术鉴赏力的优秀艺术家。

任职期间，乔佩娟把“为兵服务”放在很重的位置上。她常说：“我总想把我们的演员带到部队去经受锻炼，使他们的精神素质得到提高，感情得

到升华，成为真正德才兼备的优秀艺术家；并通过下部队，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把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广大指战员，使那些战斗在最边远最基层的官兵得到愉快、鼓舞和安慰。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她曾带队到过西藏、广西、广东、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甘肃、东北、宁夏、新疆……上过西南边陲的前沿阵地和猫儿洞，与部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几年过去了，西藏部队的许多官兵，至今仍清清楚楚地记得总政歌舞团给他们留下的一路歌声、一路花雨、一路深情。

九、十月间的西藏，已是寒意料峭。总政歌舞团赴藏演出队几十号人，竟然脚踏白雪，面迎朔风，在雪线上下的军营和哨所演出 50 多场，足迹几乎踏遍藏南藏北！

带领这个演出队在风雪里穿行的乔佩娟，此时已经 51 岁。临行前，团里考虑她是女同志，年龄也大，进藏又有许多危险，对她一再劝阻。乔佩娟说：“正因为进藏有许多意料不到的危险和困难，我更应该和演员们在一起共担风险，出了什么问题，有领导和演员们在一起，也好向组织交待、向演员们的亲人们交待。”

西藏，部队指战员这样赞扬乔佩娟带领的这支演出队：走一路，红一线；驻一地，红一片；不但节目好，作风更过硬。

一天清晨，天空迷迷茫茫的。乔佩娟带着演出队赶赴地处羊卓雍湖畔的浪卡子兵站。

“浪卡子”在藏语中，意为“风口”。浪卡子兵站海拔高达 5100 米。补兵时节，许多新兵刚送到半途，就因缺氧休克而被送下山去。

演出队乘坐着一辆破旧的轿车，每开一段，司机都要下到小沟里拎一桶雪水浇在发动机上。

一路颠簸，演出队的许多同志都出现高原反应，头胀得像要炸开似的。到中午，乔佩娟叫大家下车，找到一处避风的山凹，让大家拿出自带的馒头、榨菜，匆匆地对付午饭。

刚开始吃东西，一阵猛烈的狂风席卷着雪片迎面刮来，顿时天昏地暗，乔佩娟虽然自己也冷得直打哆嗦，但这时她二话不说，立即解开自己的皮大衣，把舞蹈队的几个小演员紧紧地揽在自己怀里。那情景，就像一位慈爱的母亲呵护着她的孩子们。

吃过午饭，他们继续赶路。由于天寒地冻，加上车况太差，他们一直颠簸到夜间十一点才到达浪卡子兵站。

下车后，只见兵站十多个指战员搬着小凳子正在等待看演出。他们早已望眼欲穿。虽然已极度劳累，饥肠辘辘，高山反应又强烈，可一听说指战员们已提着小凳子等了几个小时，大家马上被感动得忘记了一切。

乔佩娟被兵站部队的人接进会议室，水都没有顾上喝一口，就有人一路小跑地闯进来向她请示说：“报告，浪卡子兵站全体人员及过路人员全部到齐，演出是否可以开始？”

乔佩娟看到兵站的许多战士因长年紫外线的照射而被晒得黑黑的，又因缺氧造成指甲凹陷以及那一张张因演出队到来而兴奋不已的脸，不忍让他们再等下去，便转过身来对演出队的成员们说：“同志们，我们进藏，也就是一个多月，四十几天，可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高原缺氧的恶劣环境中，要为祖国默默工作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想我们累点、饿点、身体困难点，

也应该先把演出搞好，以慰战士们等待了许久的热望，以传达军委、总部首长对他们的问候。”

语言虽朴素、简单，却实实在在，直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演员们见比他们大几十岁的女政委这样说，这样做，这样坚持，大家也都毫无怨言地卸车装台。

演出中，演员们克服了极大的困难。唢呐演奏员刘占宽，曾多次出国演出，技艺精湛，因高原缺氧，他吹一支曲子，就头胀，心慌。但是，他每次都坚持吹完二至三首曲子。他说：“战士们常年战斗在艰苦的地方，为他们服务，我责无旁贷。”

维吾尔族歌唱家克里木以载歌载舞享誉艺坛，但在海拔 5100 米演唱，一首歌唱下来，人就像喝醉了似的，脚下发飘。身体直晃，像随时都会倒下。

相声是最受部队官兵欢迎的节目。相声演员刘志和刘炽炎表演完后，刘炽炎又主动要求为战士们再献上一段。等他说完，嘴唇已黑紫，嗓子干得发不出音来。

这天演出结束时，已是午夜一点多钟。按惯例，这时该吃晚餐。可连晚饭都未吃的乔佩娟和演员们只好两顿做一顿吃。

乃堆拉，则里拉山口，海拔都在 4200 米以上，终年雾气笼罩、积雪不化。满是石头的山上高低不平，很难找到一块干爽的平地。就在这凹凸不平的山上，演出队为边防指战员拿出了最好的节目。

舞蹈《春曲》的两位女演员董珍珠、夏春菊，冷得浑身发抖，仍然穿着单薄的演出服坚持跳完；有的演员下场就呕吐，当再次轮到出场时，又精神抖擞地继续演出。准备好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敦煌彩塑》、《母亲的心》、《爱情之歌》等舞蹈节目一个也没拉下。

当节目演到一半时，下起雨来。演员们冒雨坚持演出。

乔佩娟流着泪，向战斗在边防一线的指战员转达军委、总部领导同志的问候。这时战士们也流泪，演员们也流泪，场面十分感人。乔佩娟说：“边防战士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我们这次演出的精神支柱。”

在则里拉兵站，演出队吃完晚饭，本来没有安排演出，但是大家感到，兵站环境这么艰苦，战士们很少看上节目，应当为他们多演一些节目。于是一演就是两个多小时。

乔佩娟要求演出队每一个演员把“多为一个战士演出，多让一个战士看戏”，当做自己为部队建设多尽一份力量的具体行动。演出队每到一地，都收集部队艰苦奋斗的事迹。在白那拉山麓，他们来到中央军委 1981 年授予“护村灭火英雄班”的十二位烈士墓前，听部队的同志介绍了烈士们的事迹，立刻编排了新节目，为部队演出。

离开乃堆拉哨卡的路上，天上正飘着雪花，坐在车上的演员们无意中看到远处悬崖峭壁上，绽放出一片片火红色的植物，非常美丽。陪团的西藏军区战友，告诉他们那是格桑花，它们根扎在崖壁汲取冰凉的雪水，顽强地吐露芬芳。演员们听完都非常激动。相声演员刘炽炎即兴写下一首歌词：

格桑花，格桑花
红似火、美如霞
深深扎根在石缝中
朵朵开在雪山崖
伴随着战士守哨卡

啊，格桑花、格桑花
边疆战士就像那格桑花
默默地为祖国贡献着青春和年华

……

刘炽炎的相声搭档刘志马上为这首歌词谱了曲。乔佩娟听后十分欣赏，当即决定归入演出队正式节目，让女高音演员苏萍演唱。

刚刚诞生的《格桑花》，带着一股明丽的、洁净的雪野气息。一经演唱，很快在边防指战员中引起极大反响。《西藏日报》及时发表了这首歌曲，演出队把它带回北京，又在电视专栏节目《人民子弟兵》中获奖。

为把最美好的精神食粮送到边防官兵心中，乔佩娟默默地付出了多少辛劳，那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这支队伍大多是年轻人，精力充沛，体质也好。但连他们演出后，都往往难以入眠，头痛欲裂，就更别提 50 多岁的乔佩娟了。

乔佩娟有胃病，在高原发作的很厉害。可那儿缺医少药，她又怕队员们牵挂，便一声不吭地忍受下来。再说，部队驻地均属高原地区，除气候恶劣外，还严重缺氧。演出队每到一地，战士们见她年纪大，都抢着把氧气袋往她怀里塞。她转身就把氧气袋送到了演员手中。

每天演员们躺下了，她却要忙里忙外地安排第二天的行程和节目，有时还需要做个别演员的思想工作。一闲下来，她便陪着连队基层干部聊聊天，了解他们的苦衷和希望，同时给他们讲一些首都的变化和趣闻。纤纤的话语，温暖着指战员的心。

演出队回到北京后，《解放军报》头版头条作了题为《风雪走千里，歌舞送边防》的报道，称赞他们不避艰险，不避辛苦，坚持面向基层，为兵服务的宗旨。把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高质量的精神食粮送给指战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发扬了我军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传统。

边防部队对赴藏演出队还有一个评价：住的城市大，单位牌子大，但是架子不大；演出队队伍小，节目小，但是教育意义不小。

正在医院里治疗高山反应症的乔佩娟，听到这一评价后，欣慰地笑了。

掌声响起来，谁心更明白？甘为
人梯的女政委，往辉煌的星空里，曾
亲手托举阎维文、彭丽媛……

这已是艺坛上的一段佳话，一段美谈，追星族们至今仍津津乐道。

但人们牢牢记住了阎维文这个歌坛上光芒四射的名字，却常常想不起那个曾经光芒四射的、可以后默默无闻的人。

1983 年，西藏。

这天，赴藏演出队来到一个被白雪覆盖的兵站演出。两个小时过去了，报幕员微笑着走出舞台，准备宣布演出到此结束。可她刚一开口，声音便被沸腾的掌声淹没了。来观看演出的官兵已被精彩的节目深深吸引，最怕让“演出到此结束”这几个枯燥无味的字煞了眼前的风景。

掌声很快由沸腾状转入波浪状，一阵阵有规律地席卷开来，就像疯狂的风暴滚过大海，就像密集的冰雹敲打屋顶。

报幕员茫然站在台上，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只得别过头去，向站在侧幕

的乔佩娟投去求助的目光。

听到那一阵阵掌声，乔佩娟热泪盈眶。她知道长年驻守在雪山哨所的这些官兵，平时的生活实在太单调和寂寞了。有时在节假日里，他们因无法打发时光，竟然一整天都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当大雪封山以后，连蚂蚁搬家都看不到了，他们就坐在高处，痴痴地看着满世界的雪。现在演出队不远万里来到边防，怎么能让他们失望呢？不就是忍住身体的缺氧，多唱几首歌，多跳几段舞吗？

想到这里，她掉过头去冲着阎维文大声喊“小阎，你上，给战士们唱它几首。”

阎维文当时仍是合唱队队员，从未在报幕员的口中报过姓名，从未在大型场合单独唱过。忽然听到乔佩娟喊自己上台，他还是有些紧张。动了动嘴唇想说什么。

“你行！”乔佩娟看在眼里，不由分说，推着阎维文向舞台走去。

阎维文就这样登台亮相，又果然声惊四座，把边防官兵们唱得喜笑颜开。

乔佩娟结识阎维文时，他确实只是总政歌舞团合唱队的一名“无名小卒”。她凭借自己的眼力，认准他是一个极有潜力的好演员。阎维文做人忠厚老实，这更让她称道。赴西藏慰问演出前，她曾特地带上阎维文等一批青年演员到“八一”体工队、地铁、模范人物家中去义务演出，为的就是让他积累更多的舞台经验，在演出实践中学习、提高。同对待其它有名望的演员一样，每次演出结束后。她都要和他们交谈，指出他的问题和改进的办法。

阎维文渐渐上路之后，乔佩娟付出了更多的心血。她总是尽力地关心、帮助他，对他的演唱风格和动作做了恰当的点拨。在阎维文较为成熟之后，乔佩娟又十分公正地向文艺界、新闻界介绍了他的实力。

在实践中，阎维文逐渐唱红了军内外。经他首唱的歌曲《小白杨》、《没有强大的祖国哪有家》、《说句心里话》、《一二三四歌》等等，在部队官兵中广为流传。

就连阎维文的妻子商调北京以及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琐碎的小事，乔佩娟也都非常记挂，总是想方设法为他解决困难。因为她不想让演员背包袱，尽心尽力排除一切不利于他们发展的因素。

同样，阎维文工作中出现问题时，乔佩娟也会毫不留情地批评他。她希望他成为一个完美的艺术家，而不仅仅是一个掌握一门技艺的人。

阎维文现在完全实现了乔佩娟的期待。1993年，他被选为总政直属单位优秀共产党员；1994年，他又以自己录制和购买8100盒磁带赠送部队的义举，赢得全军官兵的盛赞。

谁都不能否认，如今阎维文成名成家了。但每当有人问起他成长的过程，他都会动情地提到西藏，提到在西藏亲手把他托举上星空的乔佩娟。

阎维文说：

“我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我的演唱‘起点’最高，是乔政委在世界屋脊上为我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北京八宝山。哀乐响起，乔佩娟的泪又流出来了。

这回乔佩娟做不到不哭，她这时的泪，不仅是从眼里流出来的，而且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躺在花丛中的，是一个年仅38岁的年轻人。他在61岁的乔佩娟的眼里，还只是一个孩子！

年轻人面对着苍天，面对着站在他身边泪水涟涟的漂亮妻子，面对着白发苍苍的父母，面对着那些既是他的同事又是他的朋友的歌星舞星们，永永远远地闭上了那双聪明而睿智的眼睛。

但此时此刻，由他创作的歌曲《小白杨》、《说句心里话》、《我就是黄河，我就是泰山》的旋律……却正在祖国的天南地北回荡。

这个英年早逝的年轻作曲家，名叫刘志；他的笔名，就是我们常在屏幕上看到已经被打上了黑框的“士心”。

刘志生命中走过的路，身边不时出现乔佩娟的身影。

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乔佩娟既是体贴入微的政委，又是慧眼识珠的伯乐，而且还像一个温存的慈母。

1979年，乔佩娟在带领总政歌舞团演出队亲临广西前线慰问演出之前，了解到前线官兵非常欢迎相声节目，而总政歌舞团恰恰没有相声演员。燃眉之际，她想起自己有一次在某军下部队时发现两名年轻人相声说得非常精彩，便从某军借调了这两名年轻人到总政歌舞团。

他们一个是刘志，一个是刘炽炎。

两名年轻人来到北京后，由于是借调工作，各种关系都留在原部队，有时津贴没有及时寄到，用刘炽炎的话说就是“揭不开锅了”。这时候又总是乔佩娟伸出热情的手。十几元钱、几十斤粮票，对两个滞留北京的年轻人无疑是雪中送炭。

感动之余，他们更加勤奋，在各自的爱好中辛勤耕耘。很快，这两个年轻人就展示出各自的才华：刘志成为军内外著名作曲家。他作曲的歌曲《说句心里话》、《我们是黄河，我们是泰山》经阎维文、彭丽媛演唱，成为现今舞台上的保留曲目；刘炽炎成为词作家，并担任了总政歌舞团业务办公室主任。他的歌词、曲艺作品曾多次获奖。他说：“乔政委教会我很多很多事情，那些事情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工作时碰到困难，我都会很自然地想到她的作风、她的胸襟，这也许是我在工作中能将心比心，身体力行的原因之一。”

看到两个日益成熟的年轻人，乔佩娟十分欣慰。但天道不公，刘志身患绝症，离世时只有38岁。

听到刘志的病情，乔佩娟痛心至极。而在刘志的心目中，乔佩娟的位置也非常重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已经不认识除亲人之外的任何人。但当他妻子告诉他乔佩娟来看他时，他却出人意外地清醒，眼睛突然一亮，泪珠爬满了脸庞。

这时的刘志已不能说话。乔佩娟知道这是刘志在与她永诀。

乔佩娟心碎了。

刘志的追悼会上，来的人大多是自愿与他告别的。气氛真挚、悲切。对乔佩娟来说，这是心灵最难忍受的痛苦。面对再也不能说话的刘志的遗体，这种折磨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白发人送黑发人，更增添了她的万般凄楚。

对于乔佩娟，刘志不仅仅是一个由她选拔扶持起来的著名作曲家，还是一个真诚进取的人，一个值得信赖的小朋友。这也是乔佩娟与许多知名艺术家感情交融的一个特点。

全国与彭丽媛齐名的“腕”大概寥若晨星。这一点大家都明白。但是，她的成长也浸泡着乔佩娟的心血。

彭丽媛从山东艺术学校声乐专业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吸收入伍，成为一名独唱演员。

在一次人民大会堂的演出活动中，乔佩娟结识并盯上了彭丽媛，她漂亮的声音和良好的舞台形象勾起了乔佩娟的回忆。她自己也正是这样的年龄站在舞台上赢得了荣誉。匆匆地几十年过去，她从彭丽媛的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

掌声打断了她的回忆。在后台，她找到了彭丽媛的伴奏老师。他们之间早已相识相熟，乔佩娟把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于老师也同意她的看法，认为彭丽媛潜力很大，到北京更利于一个演员的发展。但他同时也断言这件事恐怕很难办，像这样的好演员，任何一个艺术团体都不肯轻易放掉。

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1984年，总政歌舞团演出队到济南军区为轮战部队送行。组队时特意邀请彭丽媛参加。一来彭丽媛是济南军区的演员，为自己的部队所熟悉；二来想通过这次演出寻找调动的可能性。

当时彭丽媛的弟弟、家中唯一的一个儿子正在济南军区服役，即将出征。彭丽媛来到部队，身分就不仅仅是一个演员。每一个出征的战士都像她的弟弟一样把她视为亲姐姐，视为代表父老乡亲们来为自己送行的亲人。她每唱完一首歌，战士们都不愿让她下台，一遍一遍地喊着她的名字。

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的领导也很感动，为了使彭丽媛在业务上更有发展，他们终于决定忍痛割爱，同意彭丽媛调到总政歌舞团。

从此，彭丽媛开始在总政歌舞团向全军、全国的同行们挑战。

彭丽媛一直与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乔佩娟友情甚笃。无论是生活上还是事业上遇到困难、挫折、苦恼，她都希望能得到乔佩娟的帮助和支持。

彭丽媛的结婚庆典规模很小，乔佩娟是她首先想到的嘉宾。

乔佩娟调离总政歌舞团后，依然很关心彭丽媛。每看一次她的演出，都由衷地为她高兴，有时看到问题，她一样由衷地担心。若不是不在现场，她会打电话给彭丽媛指出，或打电话给她的老师金铁林。纤纤爱心，流露出一个小艺术家的真诚与坦荡。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总政歌舞团与阎维文齐名的另一名歌手郁钧剑，出身于书香门第，写一手漂亮的小字。也许正是墨香熏陶的缘故，他的声音更纤细一些。针对他的情况，乔佩娟给予许多关心指点。

郁钧剑说：“她十分理解我，支持我在演唱风格上走一条自己的路。如果我当初只是学程志、李双江、克里木他们。那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这样，她与演员之间很自然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为她在工作中严格要求他们建立了感情基础。

乔佩娟认为，她与这些人的交往没有任何功利的因素，她看重的是彼此间的真诚。这种真诚不会随种种变故而发生变化，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更加美好。

乔佩娟任职期间，总政歌舞团可说是群星灿烂。这里面浸透了乔佩娟对人生、对艺术孜孜不停的探索 and 追求。

离开总政歌舞团后，“者太太特别爱才”，几乎是众口一词。

现在，乔佩娟仍然和大家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感情。逢年过节，只要在北京，他们都要挤时间去看望她。而看着这样一些有才气而充满活力的小朋友，乔佩娟又感到自己对艺术的亲近和延续。

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她曾多次穿过越军炮火直瞄区，把温暖送上前沿。她说这是一种感情上的需要，信念上的寄托。

1986年10月12日。云南前线。

这是一个早已疏散了学生的小学操场。

远处天边残阳如血，深秋的风吹在“特攻五连”的战旗上，使战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旗帜上“攻无不克”四个红色的大字鲜艳夺目。

旗下站立着威武的“特攻五连”将士。他们身穿迷彩服，头戴钢盔，肩挎冲锋枪。绣着“特攻五连”字样的臂章别在100多名将士们的衣袖上。每个人都是那么年轻，每个人都被一种光荣笼罩。

突然，一个声音在整个操场上空萦绕，温暖而亲切：“特攻五连的战友们，我们总政歌舞团的全体同志坚信你们能打出国威、打出军威。我们衷心地祝愿你们，我们等待着你们，热切地期待着你们，胜利的、健康的、安全的回来。

能在这里参加你们的出征誓师大会，并为你们壮行，我们非常振奋。十亿人民感谢你们，总政首长感谢你们，我们歌舞团的全体同志感谢你们……”

这是乔佩娟！特攻五连全体勇士认识她。她去年就在天寒地冻的大西北为他们轮战壮行。现在她又来到前沿阵地，看望这些认识不久的战友们。

这是特攻五连的出征誓师大会。

根据云南前指命令，步兵第×××师×××团特攻五连，于1986年10月14日出击盘踞在某高地的敌军据点。这个高地位于老山主峰向东南延伸的山头上，工事密集坚固，障碍设施和火力配备完善。频繁对我老山侦察、观察和偷袭，是我军防御方向的一颗钉子。

为了拔除敌人这个据点，歼灭他们的有生力量，保持对敌人强大的军事压力，振我国威军威和锻炼部队，前指决心以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出击。

特攻五连领受任务后，进行了两个月的战前练兵，一切作战准备全部就绪。

誓师大会上，军长钱树根亲自带领勇士们宣誓：

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在即将出击作战的时刻，我自觉向祖国、向人民、向军旗庄严宣誓：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不怕牺牲，奋勇杀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严守纪律，永葆革命精神，誓死不作俘虏，坚决完成任务，打出国威、军威……

宣誓人：×××。

为正义而战光荣，为祖国而战光荣，为人民而战光荣。少先队员将红领巾献给突击队员，用她们稚嫩的双手为勇士们扎好。这是人民的信任，祖国的重托。

这一天，乔佩娟带着演出队随集团军首长一同来到誓师会场。她和军首长为勇士们送上一杯一杯的壮行酒。一遍一遍地对勇士们说：干杯吧，你们是人民的勇士，祖国的健儿；是每一个母亲的骄傲，祝你们英勇战斗，平安回来；干杯吧，孩子们，一定要平安回来啊！

演出队拿出了最精彩的节目。在前线的这些日子里，几乎天天连轴转，从一个前沿奔赴另一个前沿。演员们已十分疲惫，但他们的演出态度十分认

真。郁钧剑、克里木、苏萍、马赛，都拿出了自己的保留节目。

明天就要出征，明天就有可能战死沙场，每个人都尽情地领受眼前的一切。

演出还没有结束，天已黑了下來，战士们就临时找来几个汽灯，用竹竿挑起来挂在操场上。台上台下情感融洽，气氛十分感人。

战士们亲切地喊着演员们的名字：“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演出结束后，部队首长特意为特攻五连准备了一顿丰盛的饭菜。进餐时，演员们分别到每张桌上与战友们交谈。

乔佩娟的左边坐着演出队最小的演员马赛，右边坐着特攻五连最小的战士唐拥军。他们都才只有17岁，都亲切地称乔佩娟“乔妈妈”。

吃饭时，乔佩娟疼爱的目光一直绕着小战士唐拥军，一边给他夹菜，一边问道：“出击拔点你怕不怕？”他说：“不怕，您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打完仗，我还要考军校呐！如果能考到北京，我一定去看您。”

乔佩娟给他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地址，一再叮嘱他：“你作战回来一定要给我写封信啊，要让我知道你的情况，一定要记得啊！”那份疼爱与牵挂，就像对自己亲生的儿子。

离开时，乔佩娟和演员们纷纷与勇士们合影留念。她要留下他们的英姿，她将与勇士们的业绩同在。

一位演员在日记中写道：

10月12日是我终身难忘的。这一天，乔政委带着我们来到英雄的特功五连，为即将出征的勇士们进行演出，献上心中的赞歌，献上衷心的祝愿。祝战友们攻无不破，祝战友们凯旋归来……特攻五连的一位陕西籍战士在家信中这样写道：

“演出结束时，女演员为我们这次拔点的战友敬酒，男演员为我们点烟。乔政委也给我敬了一杯酒；望着她慈祥的面容、我多想喊她一声妈妈，我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爸爸、妈妈，你们看到这样的场面也一定会流泪的。……敬爱的爸爸妈妈，你们为我骄傲吧，为我保重吧，因为你们的儿子就要挺身登上阵地，步入那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的战场，为你们，为祖国赢得尊严……”

刚到前线时，军首长安排演出队住在离前沿较远的文山城，怕她们遇到危险。战场上，谁也不能保证会发生什么意外。乔佩娟坚持不住在后方。她找到军首长，对他们说：“我们就是来看望战友们的，如果让我们住在后方，我们会吃不香、睡不好的，请求军领导让我们上去，哪怕只是看战士们一眼。”

朴素的语言和真挚的感情打动了军首长的心，他们终于同意演出队住进前沿指挥所落水洞。

在前线的日子里，为了让战友们感到宽慰、感到愉快、感到总部首长的亲切关怀，演员们每天清晨便出，深夜才归。每天要演出四五场。歌唱演员由于过度疲劳嗓子红肿、声带充血，可她们照样坚持演出。

演出场地的观众有时多达几千人，有时只有一二个人，可她们一样认真演好每一个节目。在不能到达的前沿、猫耳洞，她们就在电话里为战友们唱上几支歌，献上最美好的祝愿。

在老山，伪装网前的一块阵地就是她们的舞台。乔佩娟说：“那儿没有正式的剧场，更谈不上丝绒的大幕、多彩的灯光，广场、山坡、病房、猫耳洞，哪里有战士哪里就是我们的舞台。”她们就是这样以对战斗在老山前线的英雄指战员的无限崇敬和一颗赤诚的心尽情地讴歌伟大的战士。

演出队和战友们到老山共唱一首《血染的风采》，共跳一曲“老山迪斯科”。深情的旋律在硝烟还没有散尽的阵地上回荡。阵阵作响的炮声更增添了演出的热烈。

为了把总部首长的关怀送到前线，乔佩娟带领演出队六次穿越敌军火炮直瞄的封锁线，到老山、八里河东山、那拉山口、“八十年代上甘岭”等一线前沿阵地，看望守卫在那里的官兵，为他们献上精彩的节目。

乔佩娟还亲自带领演出小分队登上最前沿的一个高地，这个高地与敌军阵地咫尺相隔，大声咳嗽都可以传到对方。但这并没有吓住他们，他们不但上了这个高地，还在山凹的一个隐蔽处为战友们作了精彩演出。

在前线的一幕幕都令乔佩娟激动和感怀。

即将离开前线返回北京的一次演出中，空气中流动着真挚而热烈的告别情绪。演出开始前，团首长大步走上舞台，从一名士兵手中接过一面旗帜，那旗帜上赫然写着“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这时听到钱军长雄厚的声音响在整个会场：“这面旗帜是我们集团军的光荣和骄傲，它上面别着我们集团军的战斗英雄、一等功臣张军旺烈士的勋章。现在请我们战士的好妈妈、乔佩娟同志代表演出队全体接受这面旗帜。”

乔佩娟听完，心里的激动无法平静：“战士的好妈妈”我是吗？她问自己。

热烈的、潮水般的掌声回答了她。她是的，她就是那个以自己的努力和付出，赢得这份荣誉的乔佩娟。还有什么比这更令她激动的呢？

回到北京后，便传来了特攻五连胜利的捷报。

乔佩娟和演出队的人同样为特攻五连胜利的捷报高兴，但高兴之余她还放心不下，牵挂着特攻五连的每一位勇士，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全部平安回来？前线。

钱军长在凯旋的勇士们的队列里，再也没有看到唐拥军的身影。他默默地回到指挥部。他曾答应乔佩娟要告诉出征战士的情况，此时他已不能实现这个约定。他对曾陪同过乔佩娟的一位处长说：“给北京打个电话，告诉乔大姐，唐拥军光荣牺牲了；告诉她，他战斗得很勇敢……”

乔佩娟接到电话后，眼泪便流了下来。

她嚼泣着低低地对那位处长说：“请转告我对全体勇士的敬意

说起唐拥军，乔佩娟感慨不迭：“他还那么年轻，那么天真活泼，他出击前还对我说想考大学。可现在，他却过早地离去了，让自己的青春年华化作了祖国边疆的一片红土。想想他们，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应该学会珍惜生活，珍惜今天。”

乔佩娟总觉得还需要对前线将士表示点心意，便与大家商量，用党费为他们买了手绢、鞋垫、香烟、茅台酒等，派两名同志送到老山。

不相识的北京烟酒公司的同志感动了，一次就批给他们100条大中华！而春节供应全团的指标只有一条半。

民航局的同志感动了：“送上飞机吧，我们免费了。”

相撞的都是爱心。乔佩娟每谈起与演出队在前线的日日夜夜，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们决不想在任何地方、用任何方式表白自己，那样会玷污了我们心中神圣和纯洁的感情。我们只想使前方的战士得到温暖、激励和鼓舞，让他们体会到有许多人在爱着他们、关怀着他们。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岗位永远在战士们中间！我们所做的一切，已经不是在履行义务，而是一

种感情上的需要，信念上的寄托。”

沥沥壮士血，悠悠慈母心。为负
伤致残的官兵重返人生舞台，她四处
奔走呼吁，遍洒骨血亲情，蓦然被人
称为“奶奶”……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
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不再起来，
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
共和国的旗帜上
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1987年的春节文艺晚会，渐渐进入高潮。当青年女歌手王虹把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已被截去一条腿的军人缓缓推进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进而又通过现场直播推进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时，倾听着这首《血染的风采》那沉雄而激越的旋律，正沉浸在合家团圆的欢乐中的人们。脸上的笑容蓦然凝固了，顿时所有人的思绪都飞向了升腾着战火和硝烟的南方边地。也就在这时，人们像铭记住了这个时代那样铭记住了这个节目，也铭记住了用一条腿走进这个节目的那位战斗英雄：徐良。

许多年过去了，谁知道徐良在被青年女歌手王虹推向中央电视台的银屏之前，首先还被乔佩娟“推”了一程呢？

乔佩娟就是这样的人，她自己虽然悄悄离开了舞台，而心里却依然魂牵梦绕着它。只不过随着职务的升迁和视野的开阔，她心中的舞台也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并且越来越神圣。她不仅殚精竭虑往这座舞台推出一颗颗艺术明星，而且还以一片真情，四处奔走呼号，往这个舞台上托举起一个个闪光的生命。

只因为此刻在她心目中的这座舞台，已是一座人生的舞台，时代的舞台。她渴望着登上这座舞台的人，个个都是强者。

作为前线官兵的一个代表，徐良就这样引起了乔佩娟的注意。

听说1987年春节文艺晚会正进入紧张有序的筹办阶段，乔佩娟风风火火地找到这台晚会的女导演邓在君。

当时我军部队官兵正在前线浴血奋战，他们喊出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口号：“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乔佩娟感慨地说：“我们的士兵、特别是驻守在边防和前沿阵地的士兵，若没有一点奉献精神，没有一点‘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崇高品质，是很难在那种恶劣危险的环境中坚守下去的。”

乔佩娟刚从炮火连天的前沿阵地回到北京，她的心，已被前线将士一次又一次地打动。在春节将临，十亿人民逐渐沉浸于节日的欢乐之中时，她想到那些始终坚守在猫耳洞里的士兵。洞外炮火纷飞，伤员被抬下火线。对这样的士兵，这样的军队，总该在亿万人民欢度良宵的晚会上为他们写下有分量的一笔。

邓在君导演请全体主创人员观看乔佩娟从前线带回来的录像和其它资

料。

那些浴血奋战、负伤不下火线的士兵的身影，随着录像画面频频撞击每个人的心灵。录像刚放一半，在场的每个人都哭了。他们一致同意把“亏了我一个”介绍给全国人民。

经过筛选，战斗英雄徐良的镜头先被定格了。

徐良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而且曾在大学艺术系学习声乐，有较好的演唱基础，他正是乔佩娟极力要向春节文艺晚会推荐的人。

乔佩娟带领总政演出队亲临前线慰问伤员时，徐良曾与总政歌舞团的青年演员苏萍一起演唱过《血染的风采》。由于他亲身经历了战争，对歌词的诠释真挚准确。如果让他带着伤残之躯走上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演唱这首反映前线将士慷慨出征、视死如归的歌曲，肯定比任何专业演员更具震撼力。

此时徐良正在昆明军区总医院疗伤。

邓在君导演决定派人去昆明了解徐良的演唱情况，随后决定把徐良接到北京，让他上春节文艺晚会。

后来发生的事情已是路人皆知。坐在轮椅上的徐良和女歌星王虹同唱一曲《血染的风采》，不仅把这年的春节文艺晚会推上了万众沸腾的高潮，而且让失去一条腿的英雄在一夜之间走遍了祖国的万水千山，叩开了每个人的心扉。

当“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的歌声在祖国大地沉沉回荡的时候，身在首都的乔佩娟又默默地奔走在总政歌舞团与解放军301总医院的路上。

她的心，正被另外一名士兵紧紧牵引着。那战士名叫王琦，因被弹片炸伤了眼睛，他年轻的生命将永远沉入黑暗。

与此同时，301总医院声誉甚高的眼科主任正心情沉重地走进王琦的病房，准备在即将进行的手术中为王琦作最后一次努力。虽然这个手术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王琦躺在推车上，被缓缓地推往手术室。虽然对重新看见这世界不敢抱任何幻想，但让这位年轻战士感到莫大欣慰的是，送他进手术室的人中，除了自己满面倦容、强做轻松的父母外，还有总政歌舞团的乔政委。

乔佩娟的泪珠，就在这一刹那夺眶而出。

在那一刹那，躺在推车上的王琦紧紧地攥住了乔佩娟的手，哽咽着说：“乔奶奶，让我再最后看您一眼，也许手术后就永远也看不见您了。”

这句平静、懂事的话语，让乔佩娟感到撕心裂肺的痛惜，她抽泣着搂抱住王琦，断断续续地说：“会好的，会好的。”

王琦是年仅16岁的一等功臣。

赴老山前线慰问作战部队前夕，乔佩娟去解放军301医院探视自己的儿子，同一病房住着一位老山下来的伤员。那伤员左眼已经失明，右眼眼内尚有一块弹片没有取出，感染非常严重。

这位伤员就是王琦。他是某师炮团的战士，部队上去不久就负伤了。

王琦被直升机转送到昆明军区总医院时，因伤势非常严重，许多医护人员都流泪了。16岁，是人生最浪漫和华彩的季节，而这么年轻若失去双眼，这对王琦是一个何等残酷的打击！

医护人员抱着一丝希望和侥幸，迅速将王琦转送到医疗条件好、技术过硬的北京解放军301总医院。

住院后，王琦的左眼眼球很快被摘除，右眼视网膜根部仍嵌有一块弹片。若要摘除弹片，就会致使视网膜脱落而失明。

就在这个时候，乔佩娟结识了王琦。她特地询问了护理王琦的医护人员，得知王琦受伤后表现十分出色，不发牢骚，没有怨言，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为之付出了双眼的信念。

亲临前线慰问王琦所在部队之前，她对王琦说：“你有什么要求就对我讲，到了前线，我一定代你转达给部队。”

王琦说：“我只有两个要求，一是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是我被抬下前线时；个人装备都留在了阵地，请部队把军装给我带来。”

为了祖国、他已经献出了双眼。当向他问及要求时，他仍然愿意做一名士兵，仍然只有对信仰的追求。乔佩娟被王琦深深地感动了。

来到前线后，乔佩娟找到了王琦所在团队的领导，对他们谈了王琦在医院的表现和要求。部队十分关心，将入党申请书交由乔佩娟带给王琦；部队还将前线收到的慰问品、慰问信及时地转一部分给王琦，让他和战友们一起分享祖国人民的敬意，并很快给王琦寄去了军装。

回到北京，乔佩娟常常去看望王琦，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照顾王琦，为了使王琦精神上愉悦些，她又带着歌舞团的一些知名演员，如彭丽媛、克里木，熊卿才、刘炽炎等人去为王琦表演一些小节目。

这时王琦忘记了伤病和苦恼，欢快得像一个孩童。他一声声亲切地喊着“乔奶奶”，尽情地享受着来自乔佩娟的关爱。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我虽然失去了双眼，却得到了这么多爱心。”

王琦终于要做最后一次手术了。为保证感染不向颅腔扩散，必须面对双目失明的事实。

然而，一切努力和善良的愿望，在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最后一次手术，并没有给王琦带来光明。

王琦就这样失明了。

王琦失明后，乔佩娟在伤痛和惋惜的同时，认真地为王琦考虑着前途：王琦虽然是一等功臣，虽然可以让国家养一辈子，可面对灿烂的青春年华，总不能任它白白流逝。应该帮助他再次树立生活的信心，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乔佩娟在盲人所能从事的职业中仔细地搜寻和筛选。后来，她想起自己在“文革”中被打伤后，就是一位盲人按摩师为她治疗的。想到这，她决定劝告王琦学习盲文，学习按摩。

打定主意后，她征得王琦及其父母的同意，很快为王琦做好了学习盲文的一切准备工作。

王琦没有辜负乔佩娟。他出院的时候、已初步掌握了盲文。

王琦出院后，在乔佩娟的关心和北京“残疾人协会”的帮助下，进入了海淀区盲人按摩班学习按摩技术。

学习期间，王琦的大部分节、假日都是在乔佩娟家中度过的。有时候她亲自去接，有时工作太忙，就由家人或刘炽炎去接。下班后回到家里，她顾不上爱人和孩子，一边给王琦做可口的饭菜，一边详细地询问他学习、生活的情况。

大年三十，家家包着饺子准备年夜的时候，乔佩娟亲自把王琦接回家。当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时，谁也看不出围坐在饭桌边的人中，有着

一位与这个家庭毫无血缘亲情的士兵。

王琦毕业后，回到他所在的团卫生队继续服役。现在的王琦已掌握了按摩技能，并摸索出一手绝活，对疑难病症“颈动脉综合症”有特殊的治疗效果。这种临床上中西医都很棘手的疾患，经过王琦的按摩治疗，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或治愈。

乔佩娟每次提起王琦，面庞就会被一种深深的慈爱和自豪笼罩。她看到自己曾经关心和照料的人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在困境中艰难地摸索着自己的位置，并实现自身的价值，一股由衷的欣慰充满她的胸襟。

最后的荣誉与最后的任免。宣布
离休命令这天，她突然躺倒了，她反
复说：“哦，真不像话，这一次竟然
病得这么重……”

北京。魏公村。1994年9月。

这是个秋色怡人的日子，金菊吐艳的日子，乔佩娟却突然病倒了。

多少年，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次风风雨雨，都马不停蹄地挺过来了，为什么偏偏会在这个时候躺倒呢？乔佩娟只觉得心里堵得慌，并暗暗地埋怨着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了。

是啊，早病几天，或晚病几天，无论病得多重，她都会比现在好受些。而唯独今天是不能病的，因为这太不该是她乔佩娟生病的日子！

就在几个小时前，她还精神抖擞地坐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政委办公室里，有条不紊地处理着一件件繁杂的公务；再往后的日程表，也排得满满的，她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

自1988年6月调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之后，乔佩娟记得自己每回生病都能挺得过去。从1984年到1994年的十年间，她竟没有去过一次医院看病。从歌舞团政委到艺术学院副院长，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肩头的担子比任何时候都重了：总政歌舞团才几百号人，是演出团体，而解放军艺术学院却是我军唯一的一所艺术院校，教职员工和学生近千人。拥有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文工等七个系。从全军荟萃而来的几百名文学艺术人才，个个等待着发掘、雕琢和推举。她又是分管教学，可以想象一下子有多少事情等待着她去承担。

偏偏乔佩娟是个最愿意承担重担的人。更何况解放军艺术学院又是个往全军培养和输送艺术尖子的地方。因此在这里无论有多忙，多累，她都无怨无悔，从心里感到欣慰。

号称全军文学艺术界的摇篮解放军艺术学院，采取课堂辅导与直接参与创作并举的教学方法。要让原来就有相当基础的学生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获得业务上的飞跃，并迅速杀向京华文学艺术的舞台，作为一个主管教学的副院长，乔佩娟几乎每天都在绞尽脑汁。尤其对音乐、舞蹈和戏剧系，从剧本创作到排练，再到各种演出，她不仅要亲自过问，而且还要对作品演出提出自己的意见。节目成熟了，她又亲自带领剧组下部队。

遇上评职称、调级的当口，她又会使出浑身解数，苦口婆心地解决和平息各种矛盾。因为这时她已升任学院政委，而学院的讲师大多已到中年，许多同志很有成就。可每当评定高级职称，名额总是有限，这时她会三番五次

地向专业部门提出申请，寸土不让地去争取每一个名额。

对于教师们的级别、待遇、住房、福利等问题，她总是想尽办法为他们分忧解难。她常说：“没有第一流的教师，就不可能教出第一流的学生。如果该得到的没有得到，即使有了第一流的教师，也不可能把他们留住。而留不住人才的地方，又怎么能谈得上培养和输送人才呢？”

由于爱惜和尊重人才，这些年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教师兢兢业业，人心所向，充分展露出了自己的才华，使得教学和创作硕果累累。全国和全军许多很有名气的作家和艺术家，都以能到学院讲课或当一名普通教师为荣。

几年来，已当了奶奶的乔佩娟，似乎早已忘记了自己已是一个年过六十的女人。由于天天都早出晚归，忙忙碌碌的，在家里她就像个匆匆的过客。小孙女都快十岁了，她这个做奶奶的，竟然没有任何闲暇陪着这个天真可爱的孩子，享享天伦之乐。

几年来，解放军艺术学院满园芬芳，桃李满天下。知情的人都知道，在这里盛开的每一朵花，绽开的每一片绿叶，大都倾注着乔佩娟的热汗和心血。

在全国和全军话剧界，谁不知道由解放军艺术学院师生创作和首演的话剧《天边有一簇圣火》、《带着一身黄土来当兵》呢？那便是乔佩娟在职期间亲手推出的。

在电视屏幕上，谁没有看过舞蹈《春满人间》、《苦菜花》、《荷花赋》、《小溪·江河·大海》及《沂蒙儿女》呢？那翩翩舞姿和悠悠旋律之后，都闪动着乔佩娟的身影。

如今提到董文华，郑莉、陈桂兰、王静、赵欣、秦鲁风……这一个个歌唱家，再提到莫言、庞泽云、张廷竹、阎连科、陈怀国……这一个个青年作家，以及小品演员魏积安的名字，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感到陌生。但人们是否都知道，在几年前，他们都还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生？

当学院人才辈出，掌声鹊起的时候，乔佩娟又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又一个辉煌：她被簇拥进屈指可数的女将军行列——肩膀上从此扛上了一颗耀眼的金星！

那一刻，她简直有些晕眩。几十年前，当她站在齐齐哈尔的街道上痴痴地听着“小白菜，泪汪汪”的时候，或者当她站在中戏的舞台上挽着竹篮，放歌“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的时候，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能汇人而今令人满目生辉的女将军星座。

几年过去了。

时间对于一个被政坛举上高处的人，忽然变得有些残酷。正当肩扛着金星的乔佩娟废寝忘食，发疯地工作时，她六十二岁的年龄悄悄地向她的艺术和政治生涯，发出了令她不太喜欢的声音。

就这样，1994年8月向她走来了。

这个月，她几乎猝不及防，忽然听到了上级决定让她离休的消息。虽然知道这一天迟早要到来，但命令一公开，她还是躺倒了。

还在命令公开之前，乔佩娟的朋友就这样劝告她：“你这一辈子已经够风光了，听到离休命令，你可千万要挺住。”她笑笑，她想，不会发生任何意料之外的事情。

可这时候乔佩娟偏偏挺不住了。看见熟人就在自己身边，焦急地看着高烧中的她，看着高高的输液瓶正静静地滴入她的渐渐有些浮突的血管时，她只反复说着一句话：

“咳，真不像话，这一次竟然会病得这么重，这么不是时候……”

钢是这样炼成的

项小米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以引用语录作为一篇文章的开头，在今天已经不算是时髦了，但在我连续采访了一个星期，在我的最后一位佩带着大校军衔的采访对象极其郑重地把一张写满了潇洒钢笔行书的字条递到我手里，并说了如下的话之后，我想，除了用这段语录作为文章的开头，我还能有什么更合适的开头吗？他说：“从昨天接到采访通知，我想了一夜，我想，用这段毛主席语录来形容她，是最准确不过的了。如果说今天在我认得的人中还有谁当得起这段话的话，那就是她。所以，我把它抄了下来，给你。”

这段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话，今天读来似乎已经有一种陌生感了。陌生的原因显然不仅仅是因为许久没有去读它。在许多人特别是一些现代人看来，语录里讲到的这样的共产党员，已经不存在了。但事实上他们存在，比如彭钢。

彭钢的确切职务是：解放军总政治部纪检部部长；中纪委常委；军纪委副书记。军衔少将。

对彭钢的印象有一个“S”形的过程。早就听说总政纪检部有位女部长。想想看，纪检，本身就是个硬度极强的工作，毫无疑问它与党性、原则、铁面无私、大义灭亲这些没有温度的字眼儿连在一块，这工作理所当然应该是男性的。女部长？不好想象。在敲响彭钢家的门铃之前，我已经做好了进行一次谨慎谈话的准备。及至面对面交谈开来，立刻发现她与我接触过的许许多多这个年龄的女同志没什么两样。热情、随和、直爽、反应灵敏并且记忆力极强。因为是在家，她穿了一件中长丝质大襟，款式和花色与她的肤色年龄十分相配，这更增添了一份融洽自然，使人乐于和她接近。这是一个和一般女人没什么两样的女人。我想，在历来是男性独霸天下的政治部，纪检部长为什么独独选中了她呢？

一个一个部门地走过去，在与所有和她共过事的人们逐一地谈过之后，我发觉我又一次错了。一个真实的、真正的彭钢逐渐出现在我面前。她身上有着许多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出许多词来形容她，但所有的词都不如这一个词准确。

这个词就是——钢。

往事：关于钢

彭钢这个名字是她自己为自己取的。

彭钢原本不叫彭钢。从她出生到20岁之前她使用的是一个典型女性化的名字，玉兰。玉兰作为一个农村女孩子的称谓是十分合理的。可玉兰十二岁上到了北京，在北京，玉兰这个名字就不那么适宜了。

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和那个年代的所有年

轻人一样，玉兰为建设祖国的革命浪潮所鼓舞，把一个20岁姑娘的全部热情都投入到大炼钢铁的熔炉中去。她忘了吃，忘了睡，头发乱蓬蓬的，每天战斗在炼钢工地上。小炼钢炉是泥铺的底，为了把它踩平，人们使用最原始的办法，脱了鞋赤着脚踩。结果，玉兰的脚感染了。有一次为了炼钢她几天几夜没睡觉，直到伯伯的公务员小何叔叔跑来把她找回家。那一觉香啊，居然足足睡了24个小时！

玉兰至今还记得她当时写的一篇作文，描写自己在去炼钢的路上的细腻感受，“风呼呼地刮着，柳条贴在大地上，像是在和大地接吻一样”。这篇作文，老师把它当成范文张贴出来，并作了讲评，认为它的手法是拟人化的。

玉兰喜欢作文，喜欢文学，她喜欢她那个时代所能读到的一切文学作品：《青年近卫军》、《牛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当然，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如果不是有更诱人的理想，玉兰也许会成为一名作家。

这个更诱人的理想，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共同编织的：炼钢。科技救国。工业兴国。国家需要钢，需要科学，需要工业。比起这些，作文和文学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1959年，玉兰报考了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自动控制系，报考大学时，她为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彭钢。

大伯问她：“你为什么要改名啊？”

彭钢说：“我就是要改。玉兰这个名字不好。”

大伯想了想说：“也是。你这个性格不合适叫玉兰。”

就这样，玉兰成了彭钢。

改名的初衷，是由于国家需要钢？是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一样坚强的意志和性格的启示？也许我们还应注意另一个事实，斯大林的名字？但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在她今后人生的三十年里，她的顽强坚韧、刚直不阿……所有这些秉性无不与钢紧紧联系在一起。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研究姓名学的人认为，一个人的名字可以预示他的一生。不知这说法是否有科学根据，但在彭钢身上却确实印证了这一点。

从最近距离看一下女部长……

1995年4月7日，彭钢带领总政纪检部和有关业务部门一行六人，前往南方我军某大单位。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落实纪检会议精神，检查军队高级干部超标准用车问题。

从去年到今年，中央和军委有关高干用车的规定陆续出台。中央规定：四种进口豪华车高级干部不能坐，分别是奔驰、林肯、凯迪拉克和公爵王。三总部进而规定：正军职干部乘坐的轿排气量要求在3.0以下，副军职乘坐的轿车排气量要求在2.5以下。于是人们注意到了，目前飞驰在大街上的高级干部的坐骑基本上换成了国产奥迪。

这两项规定在军内究竟落实得怎样？

各大单位的统计表迅速报上来了。总参装备部、总政纪检部各一份。彭钢与总参装备部经过协商，达成了共识：报表是否真实？统计的数字是否可靠？必须经过检查。据有人反映，某集团军军长坐的还是公爵王，某位大区领导还未换车（顺便说一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为了尊重当事人，这里不得不将他们的真实姓名隐去而代之以符号。文中将多次出现某某单位某

某人以及 A 老头 B 老太之类的用法，请读者原谅）。主管业务部门必须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向军委打报告才会是真实可靠，实实在在的。他们决定到下面去实地看一看。他们分析，某大单位进口车辆最多，如果这个单位落实了，估计其他军区出入就不会太大。

先解剖这只麻雀。

经查，这个单位确实清理出了 110 台超标车辆，封存 25 台。这些清理出的车辆有的做接待用车，有的交企业使用，还有些给退下来的老干部替换旧车。但也还有例外。

某单位两位领导仍在用公爵王。他们坐的车虽然排气量 3.0，并未超标。彭钢耐心向他们解释：排气量虽没有超标，但公爵王却是中央明令禁止乘坐的四种车中的一种，作为领导干部，应当不打折扣地执行中央规定。并提出如本部解决车辆有困难，可向上级提出调换。在彭钢的反复阐释和耐心说服下，工作组临离开前，公爵王终于换了下来。

回到北京没有几天，彭钢又带工作组上了西北。这次是奔兰州军区后勤部去的。

兰州军区后勤机关自 1986 年以来，先后有 9 名二级部正副部长，19 名团以下干部因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等违法乱纪行为受到党纪国法惩处，其中一名被判处死刑。这些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在军内外造成极大影响，严重败坏了领导机关形象，损害了军队声誉，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兰州军区油料案”已于 1993 年结案，当事人也已分别受到党纪国法惩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

老班子不存在了，新班子投入运转。所有问题真的随老班子的解体烟消云散了吗？部门还是这些部门，工作还是这些工作，干部手中的权力如此之大，动不动就可以批几十万上百万，如果不从根本上铲除产生腐败现象的土壤，不重视新班子的自身建设，谁能保证不出新的“油料案”？要知道，老班子里也曾经净是部队里优中选优拔出来的精英啊。

彭钢借前去庆祝中纪委监察部为兰州军区纪检部记二等功的机会，帮助兰州军区后勤部党委总结“油料案”事件的教训，以期防微杜渐，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开始，有些干部对这个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他们说：“过去的事都过去了，1993 年以后的班子就很好了。”彭钢说：“我这次来不是追究某个单位或某个人的责任的，而是来总结教训的。从 1986 年以来，一年出一个部长的问題，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仅仅是这些干部个人的问题吗？比如某某，拿公家钱做交易，在珠海盖房子搞女人，群众明明有反映，为什么无人过问？如果不系统地总结组织建设上的教训，谁能保证不再出问题？”“总结教训，得自己总结，如果由我来总结，等于我吃饱了，你们照样肚子饿。总结教训，不能出一次问题总结一次，要从根本上找原因。好比一个人得了胃病，要搞清楚究竟是胃炎还是瘤子。要是胃炎，吃点药就行了，可要是瘤子，那就得开刀。找不准病根，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最后非出大事不可。”彭钢形象而生动的讲话，具有极强说服力。

在短短十天里，彭钢和纪检部的同志们一道，分别找后勤在位的 5 位党委 13 位二级部长及处长一一谈话，召开两次常委会，并在后五天时间里帮助后勤整出了一份题为《变教训为财富，变压力为动力，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的材料。材料总结了四条教训：必须把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

教育放在重要位置，防止思想上滑坡与蜕变；必须加强党组织对领导干部的管理，防止行为上失控越轨；必须认真坚持对领导干部选拔使用的标准和原则，防止用人上的失误和不公；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变质……

同去的一位副局长感慨地说：“在兰州军区，我们每天都工作到深夜，累归累，但有一条，跟彭部长一起整材料，好干。她的思路非常清楚，大观点要说明什么，下面谈几个什么什么小问题，一清二楚，我们不过整理一下。”听这话的时候，我想起了彭钢小时候那篇被老师当作范文的大炼钢铁的作文。

兰州军区后勤部的这份文件，得到总政领导好评，成为今年五月份“全军政治思想工作会议”的会议参阅件。

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彭钢两率工作组，先后跑了武汉、广州、南宁、湛江、海口、三亚、惠州、兰州……。仅仅四、五两个月里，彭钢下部队出差就达三十多天。而像这样地跑，在彭钢是家常便饭。好几个干部对我说：“跟彭部长出差，回来后感觉累极了。”从这里，大致可以看出彭钢的工作节奏。

我们的最初印象：女部长是相当称职的。

往事：一块肉

玉兰在还不懂事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那是1940年。

听母亲无数次他讲过，阴历九月初三的一个黎明，天蒙蒙亮的时候，共产党员彭荣华的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当时在家的有彭荣华、彭荣华的妻子和他们的六个儿女。一阵猛烈的枪击之后，彭荣华被当场打死。

彭荣华的二哥、玉兰的二伯父、同是共产党员的彭金华随即被捕。在敌人手中，彭金华受尽非人折磨，宁折不弯，最后英勇就义。一起被枪杀的有一批共产党员。彭金华死在阴历九月，湘江大地的褥热还未退去，十天之后，当他的妻子前去认尸时，尸体已经腐烂得辨认不清了。彭妻强抑悲痛，凭着一条被血泡透的裤带，认出了自己的丈夫。

彭家两兄弟被合葬在一起。乌石乡浸满血泪的土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便接连收回了她的两个儿子。

没有了男人的家，立时垮了下来。母亲一个人拉扯六个孩子，日子的艰难可以想见。为了活下去，还是孩子的大姐14岁就嫁了人。大姐在婆家经常挨打，有时被打得不成样子，常常偷跑回娘家来哭。大哥起超12岁便离家出外做了学徒。不久，不到10岁的二哥康治也外出去做了学徒，因为受不了虐待又逃回来。玉兰记得二哥跑回来的那天晚上，吓得面无人色，说是后面有鬼。

那是个极其恐怖的年代。

母亲预感国民党不会轻易放过彭家的后代，父亲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不敢让孩子们在家睡觉，每晚都打发孩子们到外面找地方过夜。玉兰有时在一位姓胡的婆婆家过夜。母亲生怕女儿年幼不懂事，拉着她的手再三叮嘱：“记住，一旦有人抓住你，你就说姓胡。千万不能说姓彭，说出姓彭是要被杀头的！”玉兰为了不给胡家添麻烦，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和二姐一齐跑到山上坟堆边过夜。山风呼呼，野狼嚎叫，玉兰和姐姐紧搂在一起，蜷缩着

动也不敢动，睁大眼睛一直到天明。

母亲本是个坚强的人，生活的巨大变故更使她变得近乎冷漠。她很少流露自己的感情，甚至不轻易流露对孩子的爱。不是她没有舐犊之情。感情对于这样的家庭无疑是奢侈品。母亲十分清楚，对于她来说第一重要的不是使孩子们感受到疼爱，而是他们怎么活。她对孩子们要求极其严格，小小年纪就让他们出去砍柴、割草、扯野菜。

有一天，五岁的玉兰和二伯母一道去扯野菜，被一条恶狗咬在腿上，险些咬到骨头，血流不止。回到家，母亲见状镇静地去找来邻居，让些许懂得点土单验方的邻居去扯来一些草药，嚼烂了敷在伤腿上。母亲没有掉一滴眼泪。母亲知道，哭没有用。

可是有一次，母亲哭了。这是玉兰童年里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

彭家附近有一座石灰窑，窑里有几个做工的穷哥们儿，由于同情彭家的遭遇，常常接济一下他们孤儿寡母。一年夏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彭家已经过了许久煮苋菜当饭吃的日子了，正巧这天是端午，穷哥们儿们杀了一头猪，割了一块肉送给彭家。这对彭家，真是做梦也梦不到的事，小兄妹们喜得围着肉团团转。消息不知怎么走得那么快，肉还没有动，父亲一个远房亲戚找上门来，说母亲欠了他的钱，要以肉抵债。母亲当时坐在水缸边，玉兰和哥哥坐在门坎上，队不落泪的母亲，一时伤心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是掉泪。看到母亲伤心成这个样子，玉兰和哥哥大声说：“妈，让他拿走！我们不吃！”

这就是钢。童年的玉兰这时当然完全没有意识到，钢的秉性——在烈火里烧，在冷水里淬，铮铮做骨，宁折不弯——已经通过这个刚强家族的遗传基因，不可更改地深植在她的生命中了。这种秉性将伴她一生。

肉就这样被拿走了。那天的情景像火烫一样，烙在玉兰的记忆深处。母亲的眼泪。那水缸。那门坎。

还是往事：从永福堂到吴家花园

1950年，玉兰作为烈士遗孤，被组织接到北京，进华北小学上学。

那时的玉兰，已经分别在家乡和武汉上了一年小学。这点说起来仍要感激父母亲。

父亲是个宽厚善良的人，在他生前常对母亲讲：“女孩子出嫁以后是要吃苦的，所以在娘家时要好好地待她们。”尽管家穷，但在家的女孩子从未感到过委屈，有时二姐和大哥吵嘴呕气了，父亲总是向着二姐。玉兰稍大一点，母亲就送玉兰和三哥一起去上学，而二哥康治却终因家穷不得不去做工，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这在重男轻女、封建意识极其浓厚的中国农村，实在是很难得的。

也许是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因而格外懂得珍惜，也许是天生聪慧，玉兰书读得特别好。从1950年进京到1953年，只用了三年时间，玉兰就连跳几级读完了小学，考入当时北京牌子最硬的中学——师大女附中。这时，她和从朝鲜战场回国的大伯彭德怀夫妇住到了一起——中南海永福堂。

彭总对于自己最小弟弟的这个最小的女儿，的确有着一种非同一般的偏爱。

早在家乡的时候，彭总就格外疼爱他的小弟弟。彭荣华两三岁上母亲就

去世了，等于是彭总带大的。夜里哥俩同睡一床，常常彭荣华尿湿了床，就说：“哥，我这个地方不行了，换一下吧？”

彭总曾对彭钢说，你爸爸对自己的生日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在生日那天可以吃到一个鸡蛋，所以每到他的生日我就得想方设法弄一个蛋，要不那几天就一定会被他缠得过不去。

彭总自己没有子女，对同胞手足的遗孤怎能不格外垂怜？由于永福堂面积不大，除去彭总夫妇、玉兰的卧房和会客室之外，其他房间不是警卫员秘书们使用，就是作为彭总的会议室。因此玉兰的哥哥姐姐们都没能和彭总生活在一起，唯有玉兰。从那时起，玉兰与彭总朝夕为伴，除去玉兰上大学，彭总下三线，玉兰成为彭总终生未离其左右的唯一亲人，直到彭总离开这个世界。

玉兰平时的功课从不必要彭总过问，但她的作文彭总是每篇必看的，看完还要给她分析讲解。彭总讲起古文来记忆极好，玉兰总是暗自惊诧伯父怎么会记得那么多那么准，并且抱怨自己背外语单词老记不住。彭总告诉她：“你不能这么背”，你要背一会儿就去干点别的事，过一会儿想想都记住了哪些，把记住的淘汰掉，再背那些没记住的，背背停停，停停背背，很快就都背下来了。”这实际上是在教给她一种学习方法。彭总还回忆了自己在湖南讲武堂学习的日子，说同学中数黄公略聪明，平时他总是玩，临到考试突击复习，两三天不睡觉，考得还特别好。

六年中学生活转瞬即逝，1959年，玉兰考上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这时她已改名彭钢。

她是以优异成绩被西军电录取的，而且考上的是第一志愿，又是当兵，当女兵。20岁的彭钢回到湖南老家去看望母亲，母亲也像她一样地高兴。考上大学，在旧社会那就是中了举了，孩子的前途、事业、幸福就全有了，母亲吃苦受累负重忍辱，不就是为孩子有这一天吗？彭钢说，那会儿村里人觉得她快活得简直像疯了一样，一会儿跑到田里去车水，一会儿又跳到池塘里游泳，想到伯父爱吃家乡的南瓜，临走，还从家里抱回一个金红色的大南瓜。

这时，伯父正远在江西，参加后来在我党历史上留下惨痛记忆的庐山会议，此刻，他正蒙受着一生中最大的冤屈和羞辱。这一切，彭钢当然不会知道。

彭总从庐山返京，去西苑机场接彭总夫妇的彭钢，在机场就敏感地察觉到彭总神态不对，回家的路上，车内的空气也很沉闷。彭总只是淡淡地问了几句，考上了没有？考上了。见到妈妈了？见到了。妈妈怎么样？挺好。就再没话了。这不是平日的大伯，不是。彭钢明白，出事了。

回到家，伯母哭了。伯母告诉彭钢：“你伯伯犯错误了。”

彭钢呆住了。

伯父吼道：“你跟孩子讲干嘛？孩子懂什么？让孩子跟着受罪！”

就像一只在江流里游得正畅的小船突然遇到狂风巨浪，彭钢一时确实受不了。倔强的她哭了，哭了好久好久。她为伯父感到不公。她太了解她的伯父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浴血抗日，从保卫延安到进军西北，更不要提硝烟尚未散尽的抗美援朝和西藏平叛了，伯父一生经历过多少恶战，谁能够数清？在军队和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总是伯父挺身而出。她决不相信为人民立下赫赫战功、一生无私磊落的伯父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不要说相信，就连想象都无法想象。

毕竟，她还太年轻。

伯母来告诉她，不要再上军校了，免得遭人歧视。彭钢真去找了招生委员会。要求改校，又不能说明改校的理由。招生委的人说，学校既然已经定了，没有充足的理由就不能改了。这种毫不通融的作风委实救了彭钢，她到底还是穿上了军装。

1959年8月24日，是彭钢离家去西安之前在北京的最后一天。

彭钢正在收拾东西，彭总轻轻进来，关切地问她是否收拾好了。彭总拿来一个小皮箱，对彭钢说：“这是我出国时用的，以后我也用不着了，你的东西不多，就拿它去装些衣服吧。”皮箱是黄色的，很漂亮。彭钢接过小皮箱。要是在平时，能得到这样贵重的一件礼物，彭钢不知会多高兴呢！可此时此刻，加上彭总这番话，彭钢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即使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彭钢回忆起这段往事，我仍能感受到在她心中深埋的某种东西，这使得她说话的声音部有些异样。这只小皮箱，她珍藏至今。

那天晚饭吃的是南瓜饭，用彭钢从湖南抱回的大南瓜做的，南瓜饭香喷喷的，可是吃在嘴里，却再没有了往日南瓜饭的香甜。

五年的大学生活，彭钢是在沉默中度过的。1959年9月底，彭德怀被撤消国防部长的消息一公布，在教师同学中很快传开了。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教师和学生为了表明自己立场的坚定，对彭钢表现出壁垒分明的界限；也有好心的同学，内心虽同情彭钢，却不敢表现出任何热情。自尊心极强的彭钢，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是沉默。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主动提出搬出中南海，住到了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每年的寒暑假，彭钢都要从西安回北京吴家花园看望大伯。

吴家花园里异常冷清。国防部长以往的朋友不来往了，昔日的同志今天反目为仇。这样的例子“文革”中我们见到的太多太多。不要说同志和朋友，就是妻子、丈夫、亲生儿女在一夜之间划清界限的又何其多也。按说，彭钢非彭总亲生，作为侄女，在这种时候离他而去并非说不过去，于自己、自己的将来和自己的亲属都有好处。可这不是彭钢。彭钢从和大伯住在一起的那天开始，就将自己的一生与这位可亲可敬的大伯紧紧连在一起了，无论是他显赫还是落魄，直到“文革”被斗，直到大伯被迫害致死在301医院，他身边的亲人，始终都站着彭钢。

每次放假回家见到大伯，她都像过去一样，向大伯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讲讲学校里和社会上有些什么新鲜“愉快”的事，但对自己在学校受到的冷遇和歧视却只字不提。她怕大伯伤心。

这一天还是来了。

大学毕业的同时，彭钢被迫脱下军装。脱下军装的那一刻，彭钢简直万念俱灰。她的父亲、二伯为了人民的事业流尽鲜血，她的大伯为革命戎马战斗一生，而她，彭钢，性格像钢与火一样坚硬和热烈的女孩子，她的职业只能是军人，最适合她的服装，只能是军装。可是……

伯父黯然神伤，对她说，算了，人家不信任，还是回家吧。

命运就是这样在短短几年里和她开了如此大一个玩笑。她学的是国内当时最尖端的计算机，现在只能满身汗渍地和工人一起修理解放牌卡车；她曾是那样地渴望军装并且已经穿上了它，现在却又被迫把它换成挂满油花的工装，一起一伏，全在转瞬之间。当然，命运会继续按照它的路线走，再过十年，它会让她重新穿上军装，再过一个十年，它会缀着金星肩章的将军服

交到她手上，就在她每天往来于吴家花园和右安门那条路往北一点的黄寺礼堂里。这些，1965年的彭钢当然想象不到。

要强的彭钢，当时唯一的念头是：不论做什么，我都该成为最好的。

吴家花园距离彭钢上班的右安门，几乎横贯北京北郊，乘公共汽车上班，在路上几乎要花去两个小时时间。即便这样，彭钢仍要求自己每天比别人早到，打水扫地擦桌子，等到别人八点来到办公室，这些活早被她干完了。干部工人们在心中暗暗赞叹：这个新来的转业干部、大学生愣没一点臭架子，好！人们哪里知道，为了做到这一点，彭钢每天必须在凌晨五点多钟就起床。

在这段时间里，伯父给予了彭钢无微不至的关怀。那一段正是彭钢刚刚走上社会的人生之初，工作最紧张的时期，同时也是彭总在吴家花园“闲居”的时期，彭总便自觉地做起了侄女的后勤。每天清晨，彭钢起得早，彭总比彭钢起得更早，替彭钢弄好早点，通常是打蛋花冲奶粉，再用肉肠或是果酱夹上两片面包，待侄女狼吞虎咽吃完，便陪送彭钢去公共汽车站赶车，自己权当散步。晚上下班时，伯父常常已经站在车站等着接彭钢了。夏天，彭钢喜欢游泳，在外面游完泳回到家要冲一下澡，而吴家花园没有热水，为了节省能源，彭总总是在太阳最毒的中午和下午，接上几脸盆水放到烈日底下曝晒，等彭钢回来，正好能冲个不热不凉的澡。即使是亲生父母对子女，也不可能比这更周到了。

彭总不仅对自己的侄女如此，连对侄女的朋友也充满了长辈的慈爱。有时彭钢把朋友带回家来，临走彭总会送给人家一些自己生产的蔬菜。彭总自己开了好大一块菜地，种了冬瓜、南瓜、茄子、西红柿、辣椒……他把平时的粪尿积攒下来，沤成肥浇在菜地里。由于精心侍弄，他的菜长得特别好。

庐山会议被批判之后，彭总曾向毛泽东做了三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像他磊落坦诚的一生一样，既这样说了，就一定这样去做，他曾对身边的人说：“既然自己不能再为党和人民做工作，就不要再给人民增添负担了。”这片菜地，就是彭总尽最大可能对自己诺言的一个实现。

吴家花园的日子是单调的、压抑的，同时又是充实的、盛满温馨的。这是彭钢与伯父相濡以沫共同生活的最后一段日子，也是留在她生命中一段最难忘的岁月。伯父高尚的品格，不可战胜的钢铁意志，对革命的赤诚和对人民火一样的爱，点点滴滴为彭钢所见，这一切，成为一股巨大的人格与道德的精神养份，注入彭钢心田。

1965年6月，彭钢与袁士杰——北京工业学院的一位普通教师在北京结婚。11月，彭德怀离开北京去西南“三线”。彭钢搬出吴家花园，和袁士杰住到北京东郊。

去“三线”给彭家带来的欣喜是短暂的。很快，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出笼，随即全国各大报纷纷转载，人们在迷惑；在猜测，这是否预示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人们的猜测很快就被证实了。“海瑞罢官”，实质上是“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一个政治信号。一场大动乱开始了。

彭德怀被揪回北京批斗，戎马一生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帅，在那个没有真理没有法制的年代，连一个普通人的尊严都维护不住。他像一条破麻袋一样任由狂热的人们拖来拖去，想怎么斗就怎么斗，头发被揪掉了，牙齿被打掉

了，骨头被踢断了，但他不讲一句丧失原则、辱没人格的话，“士可杀、不可辱”、宁折不弯的大将气概一刻也没离开过他。

彭钢和伯父之间，如同一只飘落风筝的线一样，被扯断了。知道伯父人就在北京，却咫尺天涯，不能相见。从小报上、大街小巷的传闻中，伯父受难的消息不断传来，彭钢兄妹心如刀绞，到处打听消息，最后只得到允许，可以到卫戍区给伯父送些必需的生活用品。1973年，彭德怀被确诊患了癌症，直到这时，彭钢兄妹才被获准可以到名为治疗、实为关押伯父的医院探视彭德怀。在一间密不透风、连窗户都被木板钉死报纸糊严的“病房”里，他们见到了伯父。昔日那个即使是被打昏在地也仍虎死雄风在的伯父，已经枯瘦得如同一把干柴。

不久，这位身经百战奇迹般毫发未损、却毁在自己人手里老兵，这位共和国元帅榜上排行第二的“布衣元帅”，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那一天，是1974年11月29日。

元帅临终前曾对彭钢说：“多么希望死后能和我的两个弟弟、你们的父亲葬在一起。但我没有这个资格。我被打成反革命，而他们是烈士。”

痛哉斯言！

又是三年。

彭钢在沉默中又走了三年。

她被彻底放到车间劳动，搬活塞，打油眼，8斤重的活塞从机床搬上搬下，一天活干下来，胳膊疼得抬不起来。她从中学第一次开始写入党申请到这时，已经申请了二十多年，但就是得不到发展，有人甚至说：“彭钢就是表现再好，也不能入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对于全国人民来说，这是久历严冬之后春天的到来；对于彭钢，则是新生命的开始。

1978年12月24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为已故四年的彭德怀元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同志亲致悼词，成千上万的人们含着热泪，向着彭总骨灰鞠躬告别，献上鲜花。彭钢作为遗属，站在伯父灵前，心中百感交集。她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可是伯父，他还能知道这一切吗？

彭钢重新穿上军装，重新踏进军营大门。

1980年，她被调到总后指挥管理自动化研究室，在毕业十五年之后，她终于找回了自己的专业。这时，她已年过不惑。

耽搁过去的时光太多了！彭钢工作起来有一种拼命的精神，不是在干，简直是在抢。研究室请来日本专家安装计算机，彭钢日夜泡在研究室里和日本专家一齐安装、调试，同时向日本专家学习那些在她毕业后十五年大大向前发展了的计算机新知识。往往是白天和专家一齐工作，晚上留在机房里将白天学到的东西进行一番反刍消化。半夜实在困了，就和衣躺在办公室沙发上对付一夜，第二天照样接着干。由于她工作表现突出，成绩显著，不久，就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

1983年底，彭钢被借调到总后整党办公室工作。

整党办主任是当时的总后副政委陈煥。陈副政委在与彭钢的工作接触中，发现彭钢不仅工作热情高，能吃苦，肯动脑子，更重要的是她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敢于讲真话，是做干部工作的合适人选。因此，陈副政委向总后党委提出了推荐彭钢任总后干部部副部长的建议。他有三条理由：一是彭钢为人正直，思想作风好，公道正派，不搞邪门歪道，办事让组织放心；二是

彭钢“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在总后，没有介入总后的派性斗争，比较超脱；三是彭钢是科技干部，科技干部在总后占相当大比重，干部部长懂科技便于做工作。

总后党委对陈副政委的建议进行了认真考察和研究。1985年1月，彭钢被任命为总后勤部干部部副部长。同年5月，被任命为干部部长。

受命于困难之际：消肿四个“八”； 专家组；普升一级。净是难啃的骨头

彭钢出任总后干部部长，正赶上全军干部工作最艰难的时期。1985、1986年，“文革”刚过，百废待兴，干部问题上遗留问题很多。1985年，全军裁军100万，那么多的编余干部怎么安排？同时还要改革开放，大胆提拔干部起用新人，改变干部队伍结构。

太难了！净是难啃的骨头。

“和彭部长在一起工作的那段时间，正是总后干部工作最紧张的一段——裁军、授勋、授衔、改文职，那一段有三个多月我们都没怎么睡觉，没过过星期天。档案报表堆得像山一样。哪一级以上报总政，哪一级报总后，哪一级干部部批，哪些授勋，哪些授衔，哪些改文职，每个干部由原来的职级往军衔和文职级上怎么套，该调的调，该升的升，总后系统近万名干部一个一个地过，不允许有半点差池。你有差池也不行啊，人家立刻找上门来。到了晚上，办公大楼其他部门都黑了，就我们干部部灯火通明，大伙眼睛熬红了，人累病了，现在想想，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跟彭钢在一起工作过的干部们这样回忆。

四个“八”

1985年，全军裁军100万，这在全军，是改革开放、实现军队现代化势在必行的一步，是谁也动摇不了的大局，但具体到干部部门，却是极其棘手的难题。这可不是动动嘴皮子、讲点大道理就能办了的事，它关系着多少万转业干部观念上的嬗变、工作上的变动，关系到多少万个家庭的迁徙和动荡，关系到这些干部和家属的后半生。

在总后，“消肿”问题尤其突出。总后所属单位驻地散，门类多，编制体制杂，多年来干部编配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尤其是，总后科技干部多，专业技术性强，许多部门只吞不吐，干部普遍资历老职务低，单位超编、年龄老化问题相当突出。整编前，干部超编比例曾高达25%，算下来，恰好是8838人。这个令今天多少大款们眼热心跳的吉利数字，当年曾让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伤透了脑筋。

洪学智对彭钢说：“彭钢，你得尽快解决这超编的四个‘八’啊！”

彭钢不是神仙，魔棒一挥，就能把多少年攒下的四个“八”挥到地底下去。

干部工作没什么窍门。可以说，干部工作就是“跑”出来的。你不跑；，不熟悉干部，光看档案，人家长什么样，工作干得怎么样全对不上号，怎么决策？靠想当然草菅人命不行，全都是大活人哪！

干部部的同志这么对我说。

没啥说的，跑。彭钢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几乎跑遍了总后系统40多个师以上大单位，至于师的下属单位，那就数不清了。总后的单位分布很广，

横跨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有的一个大单位像武汉基指，就跨好几个省市。可以这么说，有人住的地方，就有总后的单位；没有人住的地方，也有总后的单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这么多单位，与团以上干部一个个谈话，通过考核了解每个干部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谈何容易。这不仅要有敏锐的眼光和头脑，更要能吃苦。

在嫩江基地，彭钢乘坐的吉普车陷在泥泞里，她跳下车踩着泥水推车。她曾登上昆仑山口，在海拔 4760 米的高度，忍着剧烈的头疼和缺氧，和团职干部们一一谈话。

在青藏线考察，她从格尔木乘 8 个小时的车赶到敦煌教导大队，为了不耽误时间，她连夜同教导大队的干部谈话，第二天下午便返回格尔木，又是 8 个小时的车。半夜到达格尔木，不过稍稍打个盹儿，第二天早七点又登上格尔木开往西宁的汽车。晚 9 点到西宁，第二天一早又坐上从西宁开往兰州的汽车。她和青藏线的干部们一一谈话，干部们为女部长这种拼搏的精神所感动，而她的心，同样被高原兵艰苦卓绝的生活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所感动。回到北京，彭钢向总后党委反映了青藏线的情况，提出为青藏兵站部内调交流晋升以及基层干部调整等一系列建议，得到总后党委大力支持，为青藏线的干部们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实行新军衔，青藏兵站部的两名主官正师职部长、政委由于职务限制只能授大校。彭钢积极向上级反映了青藏线干部的特殊情况，总后党委为兵站部争取到了两名选升少将的名额。这件事在青藏线干部中产生了很大反响。

要消肿，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必须安排好老同志，使老同志能顺利退下来。许多老同志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刚刚平反，又要让人家从工作岗位上下来，这工作实在难做，更难办的是许多老同志退下来待遇问题得不到解决。总后的情况的确特殊，比如某些医院院长、仓库主任，抗战时期入伍的干部，干了一辈子到退下来也只是个正团。由于过去行政级别与职务联系，职务低，级别怎么也上不去。有的 1953 年的正团一干三十年。这种明显的不平衡，使老同志心里有气，当时找上门来的很多，基层单位的党委也强烈要求解决好这些老同志的待遇问题。人总是要老的，自然规律终会到来，老同志的今天，也就是年轻同志的明天，因此，能否合理公正地解决老同志的待遇，关系的不是一时一事，而是有非常宽广久远的影响。这些在精简整编中出现的新情况，干部部门过去没有遇到过，上级机关也没有新政策出台，究竟是坐等上级指示呢？还是不负责任地把老同志们一刀切掉完事？彭钢和干部部的同志们没有简单从事，他们在广泛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很快拿出了符合总后实际情况的方案，经过总后党委讨论决定，很快批准了他们《关于建国前入伍的现仍在工作岗位上的正团职干部和技术七、八级干部提高待遇的问题》和《关于 1953 年底以前入伍的正团职干部按副师职退休的意见》的方案，明确规定：“现为行政 15 级，抗日战争时期入伍（或参加革命工作）的团职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离休前的正团职干部，可提高为副师职待遇。现为行政 16 级，抗日战争时期入伍（或参加革命工作），离休前的正团职干部，可提高为副师职待遇”。“对建国前入伍的现仍在工作岗位上的任正团职三年以上的干部（共计 69 名），以及建国以前入伍的技术 7 级、8 级的技术干部（共计 280 名左右）离休时按副师职待遇”。这些政策，使一度棘手的待遇问题得到了合理公正的解决，使老同志们感到了党的关怀。这不仅使老同志们能心平气顺地退下来，也使在位的同志感到安心，

它的影响力是深远的。

就是这样，彭钢和干部部的同志们一道，凭着两条腿，凭着一股吃苦精神，凭着对军队建设的极大热情和高度的政策水平，一个一个部门、一个问题地解决，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交流、调动、转业、离退休等多种办法，终于消灭了四个“八”。

“消肿”的同时，他们在总后党委的决策下，大胆提拔了一批年轻干部，其中很多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年龄在40岁左右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这些干部年富力强，有能力，有干劲，没有介入总后“文革”派系。经过大胆调整，总后的师级领导班子平均年龄年轻了7岁，终于在既要消肿又要解决年龄老化的两难矛盾中，迈出了总后干部年轻化的步伐，使总后各项工作呈现出一派新的面貌。

专家组

一个人得了疑难病，总希望找个好医生。

分诊护士正好把你分给一个有了把年纪的、看上去非常老练的医生，你心里就踏实许多。万一面对一个嘴上没毛还特假模假式的小伙，心里准琢磨这趟医院算白来了。

医院挂号处，有的窗口门庭冷落，有的窗口却永远排着长队，上前看看，准是专家门诊。专家不专家，就是不一样，哪怕挂号费差20倍。目前，全军各个师以上医院都设有专家组。没有谁不知道专家门诊，却很少有人知道专家门诊与我们主人公的关系。

专家组的设立早在1983年，那时彭钢还在自动化研究室。彭钢任总后干部部长之后，专家组经历了几次风浪，险遭没顶，亏得彭钢据理力争，方才有惊无险。

按照条令规定，科技干部年满60岁即应办理离休手续。但在总后，如果机械地照章执行这项规定，就势必会造成一大批宝贵人才的流失和浪费。

总后系统不同于其他单位，由于科研单位、军医大学、医院多，高级专家相对密集，仅高级职称以上的专家就有近4000名。这些人中，有的是担负国家、军队重大科研课题或攻关项目的负责人；有的是重点学科的带头人，后起之辈尚无胜于蓝者，事业青黄不接；有的担负着中央、军委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特别需要。他们中不乏早年留学国外，学有所成归国，成就斐然，在国内外同行中享有极高声望者；不乏自学成才，在同行中成就佼佼者；也不乏身怀绝技，舍其无人者。如301医院五官科专家姜思长，二医大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都是在国内外享有极高声望，多少人为了找他们治病，坐着火车，甚至飞机千里迢迢求医。像这样的专家，是“国宝”，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价值，是不好计算的。这些专家，许多虽已年逾花甲甚至已过古稀，但医疗技术丰富，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如果把他们也同一般科技人员一样从年龄上一刀切，确实是对人才的一种极大浪费，也不利于军队科技队伍的建设。

为此，总后在1983年制订了《关于编设专家组的特殊政策》，以三总部名义下发各军医大、军事医学科学院和解放军总医院，确定了几条框框，成为各单位设立专家组的依据。现在看这份文件，虽然还很粗糙，但毕竟有了个开头。

1985年、1988年，问题来了。由于军队精简整编任务繁重，每一次提出精简整编裁减编余人员，专家组就作为敏感问题被重新提出来。由于对设立

专家组认识不一致，包括除总后外高层决策机构中，亦有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因此，专家组每每作为裁减对象首当其冲，个别同志甚至对 1983 年编设专家组的决策采取不承认态度。

专家们自然是没有办法的。

干部部门的重要，这时就看出来了。它的重要，不仅仅在于为上级党委当好参谋，不仅仅在于能够正确决策，更在于它的部门领导和每一个成员是否能够敢于坚持正确意见，而不是唯命是从，不负责任，或是其他。

干部部长钢一样的性格上来了。既然专家组的设立是正确的，她决不退让。一次次地跑有关部门，一次次地陈述理由。她举出大量不可辩驳的例证，说明保留专家组的必要和重要。她认为军队编制再紧张，也不能容不下这几百个人。在干部部和总后党委的全力支持和争取下，专家组终于保住了。1987、1990 先后两度下发了总政、民政部、财务部（1987）政干字第 364 号文件《关于军队高级专家离退休若干问题的通知》和总后（1990）后政字第 190 号文件《关于对超龄高级专家的安排意见》等文件，对专家组的设制、选配条件、编设办法、职责范围作了更加详尽的说明和具体规定，使专家组进一步规范、制度化。文件明确规定：凡高教、卫生、科研三大系列编制 30 名以上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师以上教学、医疗、科研单位，经总后批准可编设专家组。专家组不占本单位编制定额；专家组成员享受编内干部待遇；专家组成员的条件：现为专业技术等级 5 级以上的教授；具有较深的学术造诣，在本专业技术领域有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在军内外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声望，能为本专业学科建设和发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年满 60 岁，身体较好，能坚持正常工作。专家组成员的离退休年龄，可以延长到 65 岁，个别情况可继续留任 3 至 5 年，一般不超过 70 周岁。年满 70 岁的专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仍可暂缓离休退休：（一）现任全国人大、政协常委会委员；（二）现任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职务；（三）现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四）现任国家一级学会副理事长以上职务；（五）学术造诣深，成就卓著，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望的科学家；（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或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特殊贡献者……

条分缕析，清清楚楚。凡对国家、科学、人民做出了特殊贡献者，党和人民会根据贡献大小给予他相应的、应得的回报。这样好的政策，怎能令人不心服口服？

截止 1990 年底，总后系统共安排超龄高级技术干部进专家组 172 人，为部队保留了大批优秀专业人才。事实证明，这些老专家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军队建设做出了极大贡献，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后政干部部的同志们说：“保留专家组，彭钢部长功不可没。”

晋升一级

1986 年，彭钢在广州第一军医大学、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搞调研时，发现有不少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老教授自 1965 年以来从未调整过工资级别。她敏感地觉察到，这决不是个别的现象。回京后，干部部很快摸清了全面情况：总后系统 1965 年以来从未调整过工资级别的高级专家共有 150 人，其中一级 13 人，二级 137 人。

这种奇怪现象的存在是有原因的：1965 年部队取消军衔时，科技人员套改地方行政级别，6 级成了个坎。6 级以下套改行政级，6 级以上的高级专家一律不套改行政级。理由是，当时地方高级专家 6 级以上人员套改行政级要

套在行政级别 13 级以上，而 13 级以上是高干。6 级以上专家不能套改 13 级以上级别，换句话说就是，高级专家不能成为高干，不能享受高干待遇。这实质上是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一种极“左”思潮。改革开放后，部队恢复了评定职称，几年一调级，形成了走军队级别线的人级别不断提高，而当时走地方级别线的高级专家级别却始终未动的状况。这实在是太不合理了。可贵的是，我们这些老专家不计名，不计利，忍辱负重惯了，他们长期以来兢兢业业为人民工作，很少有人向组织上反映这一问题。

彭钢在工作上有三条原则：

- 一、不能办的事，找一百遍也不办；
- 二、符合原则该办的事，不找也办；
- 三、可办可不办的事，只要在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办。

关于高级专家待遇二十年未变的问题，没有哪位专家找上门来求彭钢给解决，可彭钢却坐不住了。也许是彭钢经受过的人生苦难和挫折太多，她从心底里同情这些受到冷遇而毫不抱怨的人。党不能因为他们不向党伸手就可把他们丢在一边不管。彭钢下决心要把这事办成。在彭钢力主下，干部部立即作了研究，将这一情况上报总后党委，提出“为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鼓励高级知识分子为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多做贡献，应妥善解决部分高级专家长期未能调整工资级别的不合理状况”，总后领导对这一建议给予很大支持，洪学智部长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感慨万分地说：“这些年来物价涨得那么快，老专家们却 20 冬年没有调过级，我们对不起人家呀！”情况反映到上级有关部门，开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反应，洪部长说：“这事非得这么干，如果说这么干有什么错，需要坐牢我去！”领导的关心莫过于对下属的理解和支持，在总后党委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地，总后系统调整了 144 名高级专家的工资级别，从 1986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这件事在科技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极大地调动了科技干部的积极性，半年之后，“全军高级专家待遇二十年未变”的状况也随后得到了解决。

每个侧面都是她，又不都是全部的她

每一个人，从他参加工作那天起，就面临着几年一度的晋升、调职、调级，而这一切又直接关系到工资、房子的面积、出差坐硬卧还是软卧……一句话，关系到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说政治部中管干部的干部权力最大，这话一点不过分。搞干部工作的人，可以用手中这份权力为干部群众做很多事，但若是想使用这份权力为自己谋点什么也是易如反掌。因此，做干部工作的人，必须公正无私，刚直不阿，不欺下，不畏上，不怕得罪人。而做到这些，谈何容易！

但彭钢做到了。

彭钢手中权力如此之大，对自己却严格得近乎苛刻。她从不收受任何人的礼品和财物。有人送礼，她当面退掉；有人把东西送到家里，她都拿到办公室来，要么寄回，寄不了的比如要烂掉了的东西，她就把钱寄过去，东西则送机关食堂。下部队，临走时有些部队出于礼貌送一些土特产，她从来不收，实在盛情难却，就个人掏腰包，算是花钱买的。

彭钢对自己这样严格，在工作上也决不徇半点私情。

当初，总后党委准备调彭钢搞干部工作时，彭钢是有想法的，从她本心

讲，她更愿意搞她的自动化。一开始在整党办，她在工作之余还总是翻翻英语，有的同志说：“你不要老看英语。”彭钢答：“我不能把英语丢了，我将来还是要搞业务的。”后来调彭钢到干部部，她的顾虑就更大了。她了解自己。廉洁自律、处事公正这都没有问题，最大的担心是自己脾气太直，原则性又强，弄不好会得罪人，因此，彭钢曾对某位领导说：“您总说我正派，敢于直言。要是顶到您头上，您准不高兴。”

彭钢是干部部长，但她十分清楚她首先是一名军人。没有一名军人不知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彭钢当然不例外。只要是党委做了决定的事，她坚决服从。作为干部部长，这就更要求她在许多重要决议形成之前，为党委作好参谋，干部部门参谋意见的正确与否，对党委决策的正确与否，起着很大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彭钢常讲：一个参谋有三次建议权，我用两次，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

到干部部没有多久，彭钢作风正派、办事公道，为了坚持原则什么人都敢顶的名声就在总后传开了。直到今天，人们还记得这位女部长。

有个干部想调自己一个亲戚进总后下属单位，经过考察，这个干部不合适。当事人通过关系往上找，一直游说通了总后相当一级的一位领导，领导亲自出面跟彭钢谈，都没谈成。当然，这事黄了。

不熟的人敢顶，熟人又如何？

某位已故重要领导人的夫人，想把自己的女儿调进总后下属的一所大医院。首先，老太太已有几名子女在京，不符合“身边无子女”政策，再则，干部部门对这名干部进行了了解，考察结果这名干部在原单位业务不是很强，而她想调入的那所医院担负军队高级干部的保健和军委、驻京许多大单位的医疗保健业务，调入这所医院的干部必须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显然，这个干部是不合格的。理所当然，这事被彭钢挡住了。一天晚上，彭钢接到另一位首长夫人、她很熟悉的一位阿姨的电话，说是要来看她，彭钢说，我是晚辈，还是我去看您吧。待彭钢骑着车赶到这位阿姨家，见要调自己女儿的那位阿姨也在。当然，这事谈到后来就谈僵了。彭钢默默地听着长辈“训”了她两个小时。作为晚辈，彭钢不会回嘴，但原则，她决不放弃。最后，这个干部还是没能调成。

这位夫人可能会觉得彭钢不近人情。诚然，一个年已古稀的老太太，想把女儿调到自己身边来，无论怎么讲也是人之常情。这里决没有责怪老太太的意思。只是，把这千千万万个人之常情集中到干部部门来看，原则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对熟悉的、同时又是自己直接上级的领导，彭钢还能这样坚持原则吗？有两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总后勤部某位首长，既是彭钢的直接领导，又是彭钢叔叔一般的长辈。彭钢对于这位首长，既有着下级对于上级的服从和尊重，又有着晚辈对长辈的爱戴。但在工作中，首长一时有判断不准处置失当的时候，彭钢照样坚持原则半点不徇私。

彭钢随这位首长在武汉基指考核班子时，基地一些领导提出某个干部要用。由于干部部门事先已对所有干部进行了考核，彭钢心中有数，于是照实发表了意见，认为这个干部不合适。大概是基地某些人已事先在首长那儿做了工作，首长有些恼火，问：“是你考核的？你说不能用就不能用？”换个胆小点或是唯上是从的干部，见状附和两句，大不了闭上嘴也就完了。可彭

钢不，她立时就把亲自参与考核的干部叫了来，当面向所有人谈了考核的情况和干部部门的意见，最后这位首长不仅同意了干部部门对这个干部不提升的意见，而且提出调整了这个干部的工作岗位。

某军医大学调整班子之际，首长听到某一位学校主要领导反映政治部、训练部两位主官表现不好，有些搞阴谋的行为，首长最不喜欢这种人，听了很生气，认为这样的干部决不能用。可干部部门听到的反映却完全不是这样。彭钢亲自带人去军医大考核调查，考察的结果，这是两位很不错的干部，作风正派，业务能力强，群众反映好，彭钢立即回来向总后党委作了汇报，认为那位校领导反映的情况不属实，这两名干部不但不能不用，而且应当重用。总后党委采纳了干部部门的意见，将其中一名干部调到另一所军医大任训练部部长，被干部群众誉为是建校以来最好的训练部部长，后来提升为校长，也干得非常出色。由于彭钢敢于直言，为干部讲公道话，使这个干部洗去污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也为军队建设保留住了一位人才。事后这位首长说：“彭钢做得是对的。”

必须要说一句，像彭钢这样敢于坚持原则的干部难能可贵，而像这位首长这样大度容人、知偏就纠的领导也同样难能可贵。他可贵就可贵在能够实事求是，不怕承认自己不是全能，也有失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完全不失误，更何况他这样一个统率千军万马日理万机的总后勤部首长呢？可怕的不是失误，而是固执己见或知偏不纠，为了一点点可怜的面子要下级向自己低头，只能俯首称臣唯命是从，否则顺我昌逆我亡。如果这位首长是这样的人的话，不要说一个彭钢，只怕有十个彭钢也完了。

如果以为彭钢只是一个敢讲原则，天不怕地不怕皇帝老子也不怕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彭钢像一个多棱的水晶体，无论我们怎样看，她都是透明的，但我们从各个角度看过去，可以看到她的许多不同侧面。正直、无私、刚强、磊落、善良……每一个侧面都是她，又都不是全部的她。

几次见到彭钢，彭钢嘴上念念不忘的是当初指导她，带她走上干部工作岗位的老领导，老首长，她总是满怀深情地告诉你，谁那么大年龄，还亲自带着她到下面去考核干部，和干部谈话时如何叫她坐在一边看，言传身教、手把手地教她怎样做干部工作；谁谁总是适时地对她提出批评，彭钢你坚持原则是好的，但方式方法要讲究，否则事与愿违，谁谁……你能感到，在她刚强的外表后面，内心深处流动着水一样柔的东西。她其实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也许是彭钢拨乱反正的心情过于迫切，在于部部门为建国前入伍的老正团解决了副师离休待遇之后，彭钢曾提出把18级以上的老同志也提高到副师待遇。对这个意见，干部部一位同志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前一批干部资格老，全军无法攀比。干部工作划框很难，并不是越宽越合理，按这样一动，给全军干部带来的冲击很大，反而会加深矛盾，弊大于利，因此不动为好。彭钢开始并没有采纳这位同志的意见。这位干部感到事关重大，再二再三提意见，直到彭钢火了，说：“这事已经定了，你不要再提了。”这位同志仍没有让步。后来彭钢亲自做了调查并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最后取消了原来的决议。这位同志曾经有顾虑，认为事情虽解决了，但自己多次顶撞彭钢，今后会不会给自己小鞋穿？但他很快发现，彭钢完全没计较他的态度，并多次在大会小会表扬他，说做干部工作的同志就应该这样。

彭钢手下曾有一位老同志，由于资格比彭钢老，职务也曾比彭钢高，对

彭钢在工作上一度不是很配合，周围不少同志都有感觉，彭钢本人当然不会完全不知道。但当上级领导在考察这位同志的德才表现，准备提升他的时候，彭钢出以公心，实事求是地对这位同志作出了正确的评价。这位老同志很快被提升了。这件事也许那位同志本人到现在都不知道，但周围的同志们看到了，并记住了。

面对各种角度，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彭钢。刚直不阿、性烈如火是她，坦诚磊落、心地善良也是她。但无论哪种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秉公、无私，这是她的原则。

从干部部到纪检部。 纪检——一个更冰冷的职业吗？

1990年6月，总政治部正式设立纪检部，纪检部即是军纪委的办事机构，又是总政治部的一个二级部。自此，在总政治部办公大楼每天上下班的人群里多了一名佩带着大校军衔的女干部。她就是刚刚由总后调任总政纪检部任副部长的彭钢。

早在这之前，1988年彭钢已由总后干部部调任总后纪委副书记。从干部部到纪检部，在她又是一次小改行。

尽管同属于政治部门，尽管都是管干部，但是无疑，纪检工作相对于干部工作，需要更少感情色彩，它更理性并且更坚硬。一旦涉及案件，当事人会千方百计托关系找路子，动不动就请“尊神”，就“通天”。在这种情况下，原则公正和无畏，就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以“钢”而出名的干部部长才有了这次改行。

原总后某部部长接受了下级单位赠送的高级家用电器，以他为首，该部6名师级干部分别接受了下级单位送的录像机、音响等各种高档家用电器。其中一名处长收受下级财物后给该单位批了二十多万元，构成贿赂罪。该部部长对自己和这个部的腐败现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为严重的是，这位部长在组织上对此案进行调查时设置障碍，企图阻挠调查，掩盖真相。

对这件案件，总后纪委主张给予主要当事人撤职以上处分，但未获批准。上级党委对案件的事实是认定的，但许多单位的领导往往有这样一种心理：不愿意自己单位出丑。出了事可以批评，可以教育，给个差不多的处分吓唬吓唬也行，就是别闹大了，否则自己脸上也不好看。因此，上级党委决定，按严重警告处分报军纪委。意见上报军纪委后，被打了回来，军纪委认为处分太轻，并派出由军纪委、总政、总后三家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总后，重新审理此案，调查结果，认为事实吻合，但鉴于性质严重，原处分过轻，经过审慎研究，以“留党察看、撤职、降衔”的处理意见再度上报军纪委，得到批准。党的纪律是钢铁，不管违纪者的职务有多高，资格有多老。这位1951年入伍的老干部，终因触犯了党的纪律受到严肃处理，被取下肩上缀着金星的少将肩章。这件事对总后系统以及全军的干部都带来很大震动，为干部们敲响了一次遵纪守法的警钟。事实证明，彭钢的意见是正确的。

由于总政纪检部担负的是全军师、军以上高级干部的纪律检查工作，当事人职位本身就已很高，一旦涉及案件，有些当事人会不惜一切代价，开动全部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为自己或大事化小，或小事化了，这些关系网中不乏当事人的老上级、老领导，没准儿就是个通天人物。彭钢再硬，也不过是

个总政二级部的纪检部长，她能顶得住吗？顶一次两次办得到，顶的次数多了，把人都得罪光了，她不怕打击报复吗？

无论是总后纪委还是总政纪检部的干部，说到这点，众口一辞地佩服。从来没见过彭部长畏于来自上面的压力，改变自己原来正确的意见和主张。

某省军区政委曾借组织同意他到广州疗养的机会，带夫人、孙子和一名工作人员，先后到珠海、深圳、三亚、海口等地游览，共花费差旅、食宿费27,754元，全部由公家报销。经调查审核，按有关规定，扣除本人可享有的正常疗养、食宿费用及工作人员来往差旅费、食宿费之后，其余11,923元属违纪行为，应予处理。

事情暴露后，当事人很紧张，在本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因此一开始本单位报上来的意见是免予处分。总政纪检部经过研究论证，认为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一时间说客如云，纷纷将电话打到彭钢部长办公室，连纪检部下属各局的干部都有些担心，这下子恐怕顶不住了。但不管意见来自何方，彭钢的态度很坚决，她一方面——向说情人讲清政策纪律的严肃性，一方面表明自己的态度，纪检部的意见是正确的，谁说情都不行。这个案子终于由军纪委讨论批准，给予该干部以党内警告处分。

作为在彭钢手下工作的纪检部干部，对彭钢刚直不阿，坚持原则的作风体会尤深。不止一个干部对我说：“纪检干部到下面去，人家都很客气，谁都知道纪检工作重要，有人说你是‘包公’，你要真得罪了准，人家可就没那么客气了，就说你是‘阎王’了。纪检干部最担心的是打击报复。纪检工作本来就得罪人，如果部门领导脊梁骨不硬，顶不住，我们下边工作的同志可就惨了。”

纪检干部们的担心，不是没有来由的。

某军区某部曾出现过“谎报战果案”，案情是该军区部队一个战士反映的，军纪委派了调查组，通过艰苦调查，终于查清了这名战士反映的情况属实，对有关当事人分别给予了严肃处分。当时总政首长曾高度评价这个战士水平高，觉悟高，应给予重用。可事隔若干年之后，许多当年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都分别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一位当时讲了真话的师参谋长先是被调到某山区军分区，后又以副师按副团处理转业，而且所有这些都是以“服从组织分配”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进行的，明明是打击报复，你还不能说是打击报复。这些党内的不正之风，给本来就难的纪检工作更增加了难度。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案子放下去，让下面自己去处理，往往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而我们去查，很快就能查清。有彭部长这样敢于坚持原则的领导替我们主持公道，有总部领导替我们撑腰，干起工作来没有后顾之忧。对比下面的同志，我们的命运好多了！”纪检部的干部如是说。我突然第一次感到，原则这两个冷冰冰的词，有时它居然是温馨的。

如果认为纪检干部的职责就是处理案件、处分干部，像钢铁那样坚硬，像冰雪那样冷，那实在是一种偏见。挽救干部，防微杜渐，还蒙冤受屈的干部一个公道，更是纪检干部经常性的工作之一。纪检干部以一颗正直之心仁爱之心，实事求是，为干部说公道话，为党的肌体保健，并且把这视为同摘除党的肢体上的毒瘤一般重要的工作。

像其他工作一样，纪检工作有自身的特殊性和规律性。例如，往往在三种情况下举报案件多：一是班子不团结；一是干部升迁之前；一是大气候不

好。面对举报案件，纪检部的干部决不是感情用事，不负责任地将令牌一丢就“虎头铡侍候”。

某次党代会前夕，纪检部收到一封检举信，信上称某军区司令员有政治上的反动言论。纪检部派了两个干部奔赴军区，广泛听取了群众意见，又分别奔赴两座城市听取了与这位同志有关的几位在位领导和退休领导的意见，对本人也进行了谈话和考察，短短五天时间里，给这个同志作了结论：该同志不存在信中所反映问题的思想基础，干部、群众普遍反映好，举报情况不属实，为这个同志洗去了不白之冤，使他顺利赴京参加了党代会。事后经过分析，写检举信的人是因为认为该干部既要参加党代会，下一步可能还会提升，因此想来个“8分钱”，叫你半年不得安生，即使裁不下去也提不起来。

纪检部收到一封检举信，检举某军区空军一位干部有问题，纪检部同空军纪检部一位同志经过仔细调查研究，把这个问题澄清了。这个干部当时感动得直掉眼泪，说纪检部的同志救了他一命。

彭钢在某军区做调查研究时，看到某位领导占用公勤人员过多，就及时地给他提个醒。过去曾有人先于彭钢提过这个问题，可这位领导并没往心里去。彭钢诚恳地、像谈心一样地劝这位领导，身为如此负责的干部，必须严以律己才能服人。这位领导干部听从了彭钢的建议，减去了过多的公勤人员，并发自内心地对彭钢说：“我知道，你是设身处地为我着想。”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有不少干部正是在纪检部门的及时提醒下，避免了可能犯的错误。

谁说纪检无情？对党内的蠹虫和腐败现象，它是冰，对正直的人们，它则是驱散严霜的火。

1991年6月27日，在总政治部旗坛寺礼堂，彭钢被授予少将军衔。

成为将军之后

不知彭钢是否想过这个题目？

这些天来倒是我总在想。一个人，究竟干到什么份儿上才算到站？比如一个学生，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地念上去，念到四十多岁小五十，半辈子过去了，爱因斯坦能出几个？大多数人念书的目的难道就是念吗？就算最后写出个篇把论文，这么大的投入产出比究竟有多大意义？再比如那些大款，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地挣钱挣下去，挣到最后又怎么样呢？夜我生活的那个干休所里，每天都可以看到许多老干部，他们系着门球队员标志，十分认真地在打门球，当队员的，吹哨当裁判的，平整场地的，各司其责，个个极其认真，像刚入小学的一群孩子。这里面职务最低的当初也是个师长。邻居D阿姨告诉我，他们中有不少人过去曾经是死对头，要么是“文革”中的两派，要么是原来一个单位的主官，他们常乐呵呵地说：“想开啦！当年那么认真多可笑！斤斤计较谁比谁高一级啦，谁比谁早半年提副师啦，最后退下来还不都是正军？齐步走！”这也算是一种悟，有点庄子的味道。如果他们早在退休之前悟出了这点，会怎么样？现在他们悟出了这点之后，又怎么样？目标即动力。人突然没有了目标，挥汗如雨地赶路还有什么意义？

在学生眼里，博士该算是目标。

在商人眼里，钱该算是目标。

在士兵眼里，将军该算是目标。

可是戴上了博士帽、挣到了大钱、当上了将军之后，目标呢？

成为将军之后的彭钢，仍是一如既往、挥汗如雨地向前赶路。

1993年12月，彭钢与纪检部其他同志一起，从北京军区、南京军区然后到济南军区，一路马不停蹄，由于工作紧张，天气又冷，在济南彭钢终于病倒了，一把一把地吃药全然无效，最后被同行的同志送进济南军区总院，在总院输了一天液，第二天照常登车赶路。

1994年4月，西安政院举办了一个全军军以上单位纪检干部培训班，在延安教学基地上传统课，按照安排，彭钢应赶到延安为学员讲课，彭钢当时在兰州，正赶上兰州气象不好，由于沙暴引起特大降尘，飞机两天之内无法起飞。彭钢改从兰州坐汽车，900公里山路行程两天准时赶到延安，下车就为学员们上课，和学员们一起参观学习。教学基地考虑到彭部长是第一次来，特地加了几个菜，彭钢毫不通融，叫把菜撤下去，坚持和学员们一起用餐。

离开教学基地时已是当天晚上10点多，秘书去结算伙食费没有找到管理员，疲惫之极的秘书就打了一次埋伏，和彭钢一起驱车离开了延安。两小时后，彭钢发现伙食费没有交，毫不客气地叫秘书连夜返回延安，补交了伙食费，伙食费的发票还是几天之后从基地寄回北京的。这件事不仅对秘书，对教学基地和作为学员的纪检干部们都是一次实际生动的廉政教育。

和在干部部一样，彭钢任纪检部长不久，就把七个大军区全跑遍了，每到一处，彭钢便先让一起来的同志对负责接待的同志讲，伙食不要超标准，走时结算伙食费。要说唯一的特殊，就是点一盘虎皮辣椒。

一丝不苟，这就是彭钢。

彭钢并不是那种古板刻薄的人。她反对送礼，决不会因为谁送礼就给谁办事。反之，她也并不因为谁送礼，就认定这个人心术不正。她曾对下边的同志说过：“人家送礼，也是急得没办法了，还不是因为有困难要求你？还不是因为你手里有点权？”还是那句话，不该办的，送礼也不给办；该办的，不送礼也给办。至于礼，不收就是

既讲原则，又通人情，这也是彭钢。

1994年10月2日、3日连续两天，由司法部举办的律师资格考试在全国举行。在北京石景山区古城第二小学考场，有一位50多岁的女干部在一边思索，一边认真答卷。10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时间播出了这位女干部认真答卷的特写镜头。

“彭部长！昨天晚上在新闻联播节目里看到你了！”第二天，纪检部的同志们兴奋地说。

没错。那正是彭钢。

从7月份接到纪检部干部可以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通知到10月2日考试，中间只有不到三个月的复习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考生要掌握《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复习指南》和《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必读法律法规汇编》两大厚本共2600多页教材中的所有重点。

说实话，无须采访，我就可以想象出这场冲刺的艰苦。

这样的冲刺我干过，那是在1979年。我从接到部队考生可以参加地方全国统一高考的通知到参加高考，也是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中学六年所有的书借来，语文、政治、地理、历史、外语、数学公式一通乱背，直背得昏天黑地，分不清白天晚上，有时背着背着不知在说些什么，旁边的人说我在说梦话。那次我是活活蜕了一层皮。可是，那时我不过二十多岁。而她，彭钢，已经年近花甲了。

秘书给我排了排那三个月中彭钢的工作日程和大事表，是这样的：

这三个月中彭钢参加了三个会：中纪委一个会；中央四中全会；中纪委四次全会。三个会，彭钢都吃住在会上，紧张程度不言自明。

身为中纪委会常委、军纪委副书记的彭钢，每星期二下午要参加中纪委中心组学习；

每星期五上午是中纪委常委会；

加上总政办公会、总政党委会……

“这还不算部里所有工作照常进行。”秘书似乎很轻松地对我说。

好一个“这还不算”！

恐怕还得加上几个“这还不算”：这还不算彭钢还有一个家，家里有一个丈夫和两个女儿；这还不算彭钢是一个极其要强的人，即使加进复习考试这样繁重的事，她也务必要使自己所有的工作做得出色。把所有这一切做完，她才能复习。你简直无法想象一天24小时彭钢是怎样分配的。

两天考试共分四个半天进行，分别考基础卷、实题卷（一）（二）、经济法卷和程序卷四部分。

奇迹似的，纪检部参加考试的干部中，居然只有两人通过了考试，其中就有彭钢。阅卷是封闭式的，考生姓名，考号全被封严，不存在任何作弊或照顾一名少将的可能。

五十六岁的彭钢，已经到了正军少将的位置，为什么还要去参加这种连年轻人也视之畏途的竞争呢？难道少将、正军、总政二级部长、中纪委会常委……等等等等这些身外之物还不够，还需要再加上一个律师资格作点缀吗？

毕竟是与彭钢共事多年的老部下，有两个干部以纯粹他们个人的理解去揣摩彭钢：“彭钢是一个极其刚强、不断进取的人，对她来说，重要的不是律师资格，而是取得律师资格这个过程本身能给她带来和强迫她接受大量新观念、新信息，作为纪检干部，她需要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和视野，因此新观念新信息是必需的。这对她是又一次挑战。”

而这场战斗，她又赢了。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倒在血泊中的共产党员，那个受尽摧残宁折不弯，最后尸体腐烂得无法辨认的坚强战士，浮现出在庐山上那个直言上书替人民说话、抱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悲壮情怀的开国元帅。而且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个坐在门坎上的肚子饿得瘪瘪的小姑娘，刚强地冲着她泪水涟涟的母亲喊着，妈，我们不吃！让他拿走！还有那个在炼钢工地一连干了几天几夜磨破了脚，为自己改名叫“钢”的年轻姑娘。

这里面一定有一种东西将他们连缀在一起。我想，这东西是钢。一定是钢。在他们的脉管中，流的一定是同一种血，一种掺有钢的素质的血。钢，在对敌人和一切丑恶的大恨后面，是对人民的——大爱。

好人一生平安

刘静

我们的小姑姑邓先群，是我们家长辈中最小的一个。奶奶说她从小就是一个“野人”，上树掏鸟，下河摸鱼，什么调皮的事都做，从小挨打也多。

——摘自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

此刻，这个从小什么调皮的事都做的小姑姑就坐在我的面前。尽管我的面部表情很平和，但我内心里却紧张得要命。面对着她肩上黄灿灿的少将军衔和那张具有明显家族特征的宽宽的额头，我没有办法不紧张。女人最容易被另一个女人的权势和尊严打倒。尽管已是晚秋，但细细密密的汗水还是接连不断地渗现出来。这汗水令我狼狈，我把双手探进口袋里想借助手帕将这狼狈抹去，但空空荡荡的口袋令我更加狼狈。对面的“小姑姑”也像我一样，急急忙忙地把手伸进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张折叠着的白色的餐巾纸，递给我，说：“喏，给你！”见我迟疑着，她竟很诚恳地对我说：“真的，没有用过的，不脏！”我接过那洁白的餐巾纸，仔仔细细地把额头和两鬓的汗水揩净，同时也把我内心的窘迫擦得一干二净。

女人很容易被另一个女人的朴素和善良打动。虽然她未曾开口谈什么，但我从她的一张餐巾纸和一句话中，已经认定了她的朴素和善良。

女人接触人常常不靠理智靠直感，而女人的直感又往往是惊人的可靠。

我自信我的直感，我认定她的朴素和善良。果然，在我以后的采访中，证实了我的直感，也认识了她的朴素和善良。

母亲教我做人，我懂得了正直和善良是为人之本。大哥供我读书，我有了文化，也有了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

我对我的父亲没有什么印象，父亲在我不到一岁的时候就故去了。我对我的母亲有着很重的情感和很深的敬意，不仅仅是因为她在苦难中把我拉扯成人，更主要的是几乎没有文化的母亲给了我做人、做一个好人所必备的品质：正直和善良。

我母亲是嘉陵江上一个拉船工人的女儿。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母亲，她是跟着成年累月躬着腰躯在江边上拉船卖命的父亲，踩着江边崎岖不平的瓦砾碎石长大的。江边的风浪拍打着她瘦小的身体长高长大，同时也拍打出她刚强不屈的性格来。因为一个女孩子长年跟着父亲在外边跑很不方便，母亲十几岁就不得不嫁人了。不幸的是在她生下一个女娃不久丈夫就病死了。没有了生活来源，拖个小孩子再跟着父亲在江边上奔波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为了生计，她再嫁到了广安，生下了姐姐和我。在我不到一岁，我的父亲也病故了。现在想想，我母亲命真够苦的。

母亲是寡妇再嫁，又没生下儿子，她的处境可想而知。母亲是那种心灵手巧的女性，做得一手好针线活，炒得一手好菜，又有一副天生的热心肠，东邻西舍的，谁家有什么难为事，不用请不用叫，母亲自己找上门去倾心倾

力地帮把手。那时候我家日子过得也难，母亲拿不出钱财帮人家，就用自己的热心和自己的巧手帮人家一把。时间久了，母亲在街坊四邻里竟很有些口碑，谁家有红白喜事打架纠纷，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母亲。

母亲以她的热心善良和吃苦耐劳，善待着前妻遗下的多病的小儿，拉扯着尚在襁褓中的幼女，艰苦度日，从不求人施舍也不强人所难。母亲以她单薄的身子，支撑着这个日渐败落的家道。在我的心目中，母亲是个从不说苦叫难的坚强的女性。

母亲从没有意识地教我什么，母亲没文化，也教不了我什么大道理，但她平日里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却教给了我许多东西。一次，我见邻居的孩子没吃上饭，就把自己的饭给她吃了，自己却饿得肚子咕咕直叫。母亲知道后，不但不怪我，还拍着我的头笑吟吟地夸我：“要得，要得，这个样子要得！”

母亲没有文化却深明大义。那时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在外边都参加了革命，家乡有风言风语说我家是共匪窝。我虽然还小不太懂事，却能感觉到一种压力。

聪明而又敏感的母亲何尝感觉不到这些呢？她主动上门帮忙却被人家冷漠地谢绝。母亲心里难受啊！母亲也开始不大出门了，常常一个人坐在那儿愣神。母亲开始担惊受怕，为在外边提着脑袋干事的儿女们提着心吊着胆。她常常半夜三更吓得从梦里醒来，坐在黑暗里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即便是这样，母亲也从不拖儿女们的后腿。二姐偶而回来，悄悄住上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就悄悄地走，母亲眼里噙满了泪水，不舍得一个女娃子在外边冒这么大的风险。但母亲从不劝阻什么，只是倚门望着初曦下远去的女儿。母亲没文化不懂政治是啥子，但母亲认定自己的儿女都是好人，儿女们参加的共产党也一定是些好人。所以，当二姐把几个遭追捕的华蓥山游击队队员领回家时，母亲虽然吓得脸都变了颜色，还是把游击队队员们藏得严严实实的。母亲也顾不上杀头不杀头了，只朴素地认定：救这些人就是救女儿！女儿是好人，这些跟女儿在一起的人也一定是好人！好人是一定要帮的。帮好人是天经地义菩萨也欢喜的大好事！

1949年底，我姐姐先芙又悄悄回到广安老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喜讯，说我们的大哥邓小平到了重庆。我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以一个农村妇女少有的果断，一把老黑锁把祖传老屋一锁，领着我，提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充饥的干粮，搭乘依然在江边拉船的外公的小木船，风一程浪一程，风尘仆仆到了重庆，找到了大哥邓小平和大嫂卓琳。

我从未见过我的这位同父异母的兄长，但又分明在什么地方见过他，那家族遗传的宽宽大大的额头令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近感。其实，我也有这样一个宽宽大大的额头，跟眼前这位兄长一模一样，这都是从我那没有了印象的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家族特征啊！从今以后，我的一切，都要与眼前这位微笑着凝视我的兄长联系在一起了。不管大哥走到哪，我都要跟他到哪！这是一个从小缺少父爱的女孩子打心里涌出来的渴望和祈盼！

在重庆，我插班就读于女四中。女四中在长江的南岸，离家很远，我住在学校，星期六回家，星期一返校。我的大侄女邓林、大侄儿朴方跟我年龄相距很近，我们很能玩到一块去。我那时最盼望的日子就是星期六。一到星期六，我就跟关了一辈子的鸟儿一样，飞向江北的家，投身到炽热的亲情中。我带着侄儿侄女们，爬树上房，挖土掘坑，什么都敢干。广安乡下那个无拘无束的野丫头把侄儿侄女们带得过大年一样兴奋！

刚刚解放的新中国，有多少事情等着共产党人去振兴！大哥没白没夜地工作着，眼圈经常是黑的，眼睛经常是红的；大嫂在人民小学当校长，放着自己的孩子经常顾不上管教，成天操心着别人家的孩子。那时的大哥大嫂年富力强，他们为了初建的共和国没日没夜苦心劳的样子给十四岁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四岁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关键，在哥嫂的身边，我既长了身体也长了知识。我在亲近我的哥嫂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开始亲近我哥嫂为之奋斗的事业。在亲近的过程中，我知道了一些叫理想、信念、主义的新鲜而有巨大吸引力的名词。

可惜，不谙世事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哥嫂追求的、为之奋斗的这一些叫理想、信念和主义的，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是巨大的；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来说，同样也是巨大的。

问起她的初恋，她微笑着难为情；
问起她的家庭，她真实地眉开眼笑。她
像普普通通的幸福的女性一样，说丈夫、
说儿女、说亲朋好友。她爱他们，像他
们爱她一样。

我瞅准一个她“格格格”开心大笑的机会，冷不丁地请求道：“部长，谈谈您的恋爱史吧！”

她望着我，有点意外的样子。大概没有人会这样冒失这样直接地跟她提出这种要求。中国女人习惯享受爱情但不善于谈论爱情。别看她肩上扛着金灿灿的少将军衔，其实她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女性。她像中国绝大多数她这种年龄的女人一样，对远逝的初恋总是珍藏于心而羞于言表的。

此刻的我，已经很坚决地认准了她的朴素和善良。我认定她会满足我的。她对任何人的任何请求，只要不违犯组织原则，她都会尽量的满足。否则，她会于心不忍，会在心里一个劲地谴责自己。

我简直是在借助和利用她的美德。

她望着我，似乎在说，咱们不谈这个行吗？但我清楚地知道，两个将军的罗曼蒂克，不要说在中国少有，恐怕在世界上也不会是多见的。于是，我用诚恳的目光迎上去，我敢肯定她从不拒绝诚恳。

果然就没有拒绝。

她跟我谈了她跟她的丈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司令员栗前明中将的恋爱史。

“其实，我们俩还真没什么浪漫的。”她用手扶了扶宽边眼镜框，这样开始叙述。

1959年，我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无线电专业。当时与我同班的几个同学是在北京时的熟人，在北京时他们就管我叫小姑姑，我比他们大几岁，在生活上多照顾了他们一些，他们很尊重我。但作为长辈，我又比他们大不了几岁，他们又经常跟我没大没小的。他们认为我到岁数了，该谈恋爱了，就自做主张热心地到处给我物色对象。不知怎么搞的，那些调皮的家伙们认定我跟高我们几届的栗前明有前世姻缘，吵吵嚷嚷地瞎起哄，说要把小姑姑嫁给栗大哥。他们连辈份还搞不明白呢，就敢点鸳鸯谱了。

栗前明的父亲是老红军，但他却没有高干子女那种骄娇二气，人老实本

分得如农家子弟一般。虽然成天不吭不哈的，在哈军工却颇有名气。

他毕业被分配到天津塘沽国防部七院七所，我因为跟他有恋爱关系后来也被分配到这个所。1963年11月，我们买了几斤糖块一斤茶叶，选了一个星期天，在同志们的祝福中简简单单、热热闹闹地把婚事给办了。说来好笑，结婚那天，我们老栗紧张得要命，害怕人家会闹他。他人老实，不会随机应变，怕闹得厉害他下不了台。我见他紧张成那样，觉得好笑，就给他出点子，结婚那天俩人都穿军装，穿军装结婚人家就不好太闹了，否则就太不严肃了。果然军装帮了我们的忙，我们比较顺利地过了关。

我们结婚有三天婚假的，但那时我们俩都积极得很，都在拼命工作，不好意思休那三天婚假。所以，当我们俩星期一按时到办公室上班时，同事们都很惊奇，问我们塘沽离北京这么近，结婚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回趟家？我们笑笑就过去了。直到元旦放假，我们才回北京拜见了双方的家长。

我大嫂给我做了两床红绸子被，给我买了床单、枕头、枕巾等床上用品，算是娘家的陪嫁。请我公公婆婆到家里吃了一顿饭，算给我们补了顿喜酒。大哥说这样简简单单的好，还说以后孩子们的婚事都照这个样子办。我在邓家算开了个头，我的侄子侄女的婚事全都是我这种模式。他们后来开玩笑说，这是邓家模式。

婚后第二年，我怀孕了，那年我二十九周岁了。当时像我这种年龄怀第一胎是很少有的，我是个很喜欢孩子的人，对肚子里的小生命充满了祈盼和喜悦。我那时很要强，生怕别人知道我怀孕了会在工作上给我特殊照顾，因此就瞒着大家不让别人知道。我一个人偷偷地吐，偷偷地难受，工作照样干，什么也不落在别人后边。我们所晚上办了个夜校，组织大家业务学习。一天吃过晚饭我去夜校上课，老师还没到，大家在说说笑笑闹得开心。一个同事见我进来，用脚悄悄地勾住凳子腿儿，等我要坐下时，猛地把凳子向后一拉，我一屁股坐空，摔倒在坚硬的水泥地上。

当时我的肚子就刀绞一般地痛。同志们把我从地上架起来，痛得我腰都直不起来了。到了医院就开始见红流血，我求医生一定要把我的孩子保住，住了一个多星期的院，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那个孩子最终也没能保得住。

“那孩子三个多月了，都成形了。”她叹了口气这样对我说。

五点多钟的办公室里，没有开灯，有点暗，但她脸上的痛惜却清清楚楚地烙在我的眼睛里。作为女性，作为母亲，我最知道儿女对母亲意味着什么！尽管他（或她）未出世，甚至辨不出性别来，但他（她）在母亲心上永远有一席之地，永远有分量！母亲永远觉得那是自己的孩子，是自己的骨肉！

望着她脸上迟迟不散的痛惜，我有意转移她的注意力，我轻声问她：“后来那人呢？怎么处理的？”

她盯住我看，像奇怪我怎么会问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她诧异地反问我：“干吗要处理人家？他又不知道我怀孕，又不是故意的，凭什么处理人家呢？”

于是，我就很惭愧，为我自己狭隘的因果报应的概念惭愧。

我赶紧换话题，把自己从惭愧中解救出来。我问她：“部长，一对将军夫妻，两个干事业的男女，家庭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

看样子这个话题很对她的心思，她马上就眉开眼笑起来。

她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绝对的充满魅力！像她这样做官做到一定位置上的女人，说起家庭生活来，还能这样眉开眼笑，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

做作，一种是纯朴。我知道她属于后一种，属于天然的纯朴。她是个跟粉饰和做作绝缘的人，她甚至连逢场做戏都不会。好在她有不粉饰自己、不做作、不逢场做戏的条件。

“我们老栗”，她在说到她的丈夫时，总是这样一口一个“我们老栗”地叫着，像那些对自己的丈夫充满情感、充满信心的家庭主妇一样。“我们老栗”“我们老栗”地叫得顺口叫得惬意。

我注意到“我们老栗”的“我们”两个字，我认为这是一种口误，丈夫应该是“我的”而不应该是“我们”的。我的一个对家庭结构很有研究的朋友却对“我们”两个字大加赞赏，他认为：把丈夫说成“我们”的而不说“我的”，是一个家庭团结和稳固的象征，说明这个丈夫已经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和公有财产，是丈夫和父亲融为一体的典范，他认定这是个成功的男人。

“我们老栗人很好，人品好，脾气也好，我们俩经常开玩笑，他叫我，我就赶紧答‘到！’，问他‘首长有什么指示？’孩子们也敢跟我们开玩笑，家里的气氛非常好。”

“栗副司令有没有对你发脾气的时候？”我问。

“有哇！怎么没有？”她想都不想脱口就说，毫无城府的样子。“像前些日子我在外头喝酒喝吐了，我们老栗边给我收拾边气得冲我大叫‘你以后再喝成这样就别给我回来！’样子凶着呢！吓得我连声都不敢吭。”

说到了她的一双儿女，她絮絮叨叨的样子像每一个挚爱着自己儿女的普普通通的母亲。她告诉我，她天生地喜欢孩子，见了小孩子就禁不住地想要上去抱一抱。告诉你，别看我人大大咧咧的，可对孩子却细心得不得了。年轻的时候不太会带孩子，孩子一感冒发烧，自己就急得不行，有时候甚至捧着烧得厉害的孩子的滚烫的小手直掉眼泪。那时的工资少，买回一点水果从来舍不得吃，全部留给孩子吃。记得我在怀老二时，我们老栗买回一堆处理的香蕉，我把好的挑出来给女儿吃，自己吃那些有点烂了的。女儿见我吃香蕉，奇怪极了，竟然奶声奶气地问我，哎呀妈妈，你也吃水果呀？

我采访邓先群的女儿时，把她小时候的话当笑话讲给她听。谁知她听了竟敛住了笑容，眼里轻蒙了一层薄雾。许久，她摇着头说自己，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这个叫栗小兵的长得眉清目秀的女孩的模样吓了我一跳。我想，她真是一棵长在温室里的花朵，这样娇嫩。谁知，这是一个极聪明的女孩，她一眼就看穿了我心里的想法，她很严肃地告诉我，虽然父母很宠她，但并不惯她，在生活上对她无微不至，但在为人处事上，却对她一点不含糊。

“我很怕我的爸爸妈妈。”小兵说，“我怕他们到了什么程度，说出来可能你都不会相信。”栗小兵给我讲了一件事。

栗小兵1982年当兵到了二炮一个在深山的基地里，那里到最近的城市洛阳坐汽车还要走7个小时。“那里可真偏僻呀。”小兵说。我说：“你干吗要到那地方当兵？”栗小兵说：“我们那批兵就是那个基地招的。”我本来想说，你父亲是二炮的首长，到你父亲的手下当兵，何致于跑到大山沟里去？但我没说出来。

栗小兵接着说。“有一次，我们连队吃包子，我在吃第二个包子时，刚咬了一口，‘噗’的一声，喷了我一脸白面。坐地旁边饭桌上的男兵笑得前仰后合，原来是他们捣的鬼：他们把包包里包上了白面。当时我又气又羞，随手把那包子扔进了身后的泔水桶里。晚上，我们队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

批评我不该浪费粮食。我小着声音申辩说，那包子根本不能吃。队长说把里边的白面倒了，皮照样能吃。我低着头无话可说了。我们队长让我抬起头来，指着桌子上的一个包子说，包子我从泔水桶里捞出来了，现在有两条路供你选择，一是你吃下这个包子，一是给你处分，听了队长的话，我呆了，愣愣地望着队长不敢相信这两条。但队长板着脸好像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了。我想了想，心一横，飞快地抓起那个被泔水泡过的包子，一口塞进嘴里，几下就咽进了肚子里。吃完那个被泔水泡过的包子，我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说到这儿，栗小兵下意识地把手卡在自己脖子上，像那个十几年前的包子依然残留在她的咽喉深处。我有些吃惊地望着她，想象不出她怎么把那个包子吞咽下去的！我在女兵连队带过兵，我知道任何一个连队干部都不会因为一个包子处分一个人，更会让一个战士吃从泔水桶里捞出来的包子。我想，那个队长大概是想吓唬她，教育她爱惜节约每一粒粮食。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栗小兵，她一听就笑了，说，可不是！我们队长后来就是这样跟我说的。可我当时却吓坏了，怕受了处分没法向爸妈交待。如果我受了处分，不管什么原因，父母肯定会大发脾气的，肯定要狠狠训我的！我就倒了大霉了，又受处分又挨骂，我的日子要难过了，所以，我宁愿吃泔水桶里的包子。

我问：“当时你吃下那包子你们队长说什么了？”栗小兵答：“他也吓坏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他一怕我想不开有什么三长两短，二怕我给家里说。”我问：“你给家里说了吗？”栗小兵答：“藏还怕藏不住哩，怎么会自己去找着挨骂？”我笑了，又问：“你恨那队长吗？”栗小兵笑着答：“不恨，他本来只是想吓吓我，谁让我自己胆小当了真呢！”

望着眼前这个宽容的女孩子，我想，原来基因可以遗传，品质也是可以遗传的呀！

文革十年，窒息了她 34 岁到 44 岁
人生金子般的岁月。她是最有资格控
诉那十年的人，许多人都在控诉，她
却不堪回首的缄默着，脸上是黯然神
伤。

说到文革，快人快语的她缄默了。她把双手插在紧紧拼拢的两腿之间，坐在那儿缄默，脸上是黯然神伤。

我知道这是她不堪回首的一段记忆，回忆本身就是一种伤痛。但我知道我这篇文章实在躲不过去这段岁月，整整十年啊！她又有那样一个家庭背景，绕开这十年，她的生活经历就会出现长长的一段空白，反而不好。我只有硬着头皮问下去。

问：“那十年您一定吃了不少的苦吧？”

答：“其实也没什么，整个国家都在吃苦，我个人想躲怎么能躲得掉呢？”

问：“您挨过斗吗？”

答：“挨过。”

问：“厉害吗？”

答：“挺厉害的。”

我不知道该再问些什么了。我见过许多说起文化大革命，就义愤填膺、就控制不住自己的人，他们对挨斗挨批判的情景历历在目，对斗过他们打过他们的人的名字记得清清楚楚。我认为这很正常，一个人是不太容易忘记屈

辱和苦难的。我就纳闷：她难道是一个例外？

她是最最不该例外的人。起码我这样认为。

我只好换一种问法。

我这样问她：“十年中，你得到过什么帮助和保护吗？”

她镜片后的眼睛亮了。把夹紧的双手抽了出来，掰着手指头给我讲了起来。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大哥还没有被打倒，我知道大哥的处境已经不好了，就格外地小心自己的言行，生怕有什么闪失让人家抓住把柄攻击大哥。有一次，我到外单位抄大字报，慌慌张张不小心抄掉了一个“反革命”的“反”字，把“反革命”抄成了“革命”。这下坏了，所里的造反派追查这张大字报是谁抄的，我吓得够呛，正想站出来承认，我们室一个叫吴国柱的老翻译站出来，说那张大字报是他抄的，他人老眼花抄错了。老吴家祖祖辈辈是贫农，造反派奈何不了他，当场把他批了一通，喊了一顿口号就算过去了。这件事后，吓得我好长时间不敢拿笔写字了。

1969年，我跟我们老栗被下放到湖北当阳一个农场劳动改造。那是个方圆几十里没有人家的荒山野岭，我们这些人被赶到那里开荒种地。在那里，我累得得了肾炎，尿血，浑身浮肿。当时缺医少药，我的病被耽误成了慢性的。我脚肿得老高，穿不进鞋子，就拖拉着鞋下地，跳到没过膝的刺骨的水田里插秧。我在水田里一站就是大半天，腰痛得像有一把刀在割我。本来就浮肿的脚被水一泡很快就溃烂了。那段日子可真苦啊，我得了这个病，不能吃盐，不吃盐又没有力气干活，我们老栗就用休息时间，跑几十里的山路，给我买回点红糖和猪大油，我用来泡水喝，有了力气才能下水田干活。

后来我病得实在下不了田了，就让我在家里为几十人挑水烧水洗脚。不知哪个难友听说清水炖乌龟能治我这个病，大家就在劳动的空隙满水田里给我抓乌龟。他们劳动回来，总有几个人能提回几只来，他们不吭不声地把乌龟丢进水桶里，从不稀罕我一声谢谢。我照那偏方吃了，还真是管用，我身上的浮肿消了，病也得到了控制。

1975年，我们俩双双调到第二炮兵工作，还没过上两天安生日子，我们又受到株连被内控起来，限制了自由。天安门广场事件后，我们上了“四人帮”抓人的黑名单，那阵子风声很紧，局势也很严峻。我们做了最坏的打算，我给女儿贴身衣服缝了个小口袋，里头放了十斤粮票十块钱。我把儿子的小手塞进女儿的小手里，告诉她，一旦爸爸妈妈不见了，你就领着弟弟去找你的叔叔，千万要带好弟弟。女儿懂事地对我说，妈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带好弟弟的。

那年，女儿11岁，儿子不到4岁。

她有两次哽咽他说不出话来，一次是说到大侄子朴方在清河福利院的惨状，一次是说到把4岁的儿子托付给11岁的女儿……

她说不下去的时候，就停住不说，死劲抿着嘴角不让满眶的泪水滚落下来。我看见那清清的泪水在她眼睛里打着转，她强忍着，坚决不让它们流出来。

我问她：“文革十年，难道您没记住一个整您、迫害您的人的名字吗？”

她深叹出一口气，摇着头说：“没记，我不记这些。他们大部分还都年轻，许多人还是孩子，本身就是些受害者，我不记他们，也不怨恨他们。”

我望着她，她也望着我，目光都很真诚。有泪水慢慢从我眼里溢出，流

得很慢，流了一脸。

我淌着的眼泪突然一下子就把她隐忍了许久的眼泪引了下来，那泪水流得又急又凶。她摘下眼镜，用手掌抹了把脸上的泪水，哑着声音对我说：“我不会恨人，我是个没有深仇大恨的人。”

人在人说你好你可能不是真好，
人走人还说你好你确实是真好。特殊
身分办特殊事，看你给谁办事；特殊
经历干特殊的事，看你干的什么事。

一个平常的工作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的工作人员发现院办公室里新来了一位笑容可掬的女同志。他们看着她眼熟，又想不起在哪见过她，私下里一打听，知道了她的特殊的身分，他们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已经开始对她敬而远之了。

有人到办公室送呈批件，一看院办只她一个人在，脚步先开始踌躇：这是一份要送总政首长批阅的急件，是要从一楼送到五楼的，先不说她什么身分，单就她这一把年纪和胖胖的身子，让她跑上跑下于心何忍？

正要退出，被她抬头看见，她忙站起身来走上前去，问道：“有急件要送吧？”那人说：“算了吧，还是我自己跑一趟吧。”她笑着大着嗓门说：“那可不行！你把我的活抢着干了，想让我失业啊？”接过文件，转身就走。望着她爬楼梯的背影，那人怎么可能不心有所动呢？

邓先群调到解放军法院工作，一报到上班，她就诚恳地对院领导表示：“法院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单位，我现学恐怕不行了，那我就给同志们打打下手，为你们好好服务，多解决你们点后顾之忧吧！”她怕领导对她有顾虑，放不开手脚，就很爽快地说：“我这个人，呆几天你们就了解我了，我是个直性子，喜欢痛快，希望你们做领导的对我领导得痛快一点，该说就说，该批就批，我保证不会闹情绪，不会影响工作。”

开始，大家对她敬而远之但又异乎寻常地关注她，这种心态很正常。中国人习惯这种接人待物的方式，这几乎是一种定式。不管邓先群到哪里工作，她开始的处境都会是这个样子的。

邓先群不刻意做什么，她一如既往按照她的原则为人处事。像普通机关干部那样坐着班车按时上下班；排着队在机关大食堂买份饭，吃完饭盘里碗里干干净净从不浪费粮食蔬菜；到各处通知事情，抱着文件夹楼上楼下跑；该出差出差，该加班加班，不比任何人多沾任何便宜少干任何工作。她像一个普普通通的机关干部，甚至比一般的机关干部工作更认真，姿态更高。人心都是肉长的，谁能对一个实实在在本本分分的好同志长久地敬而远之下去呢？

支部改选时，大家选举邓先群为法院党支部的副书记。支委分工她抓组织建设，抓党员队伍的思想建设。

邓先群说：“在总部这样一个大机关里，同志们的思想觉悟是应该肯定的，我要做的就是给大家经常提个醒。大部分同志拖家带口生活负担很重，工作又这么忙，我能帮把手就帮把手。我理论水平不高，说不出更多的大道理来，但我能干，勤勤快快地多干点，弥补我理论上的不足吧。”

有个同志到山东出差，买了些花生米回来，拿到办公室给大家分。拿了

个手提秤一份一份分开，再一份一份收钱，邓先群见了觉着很不合适，找到那位同志不客气地批评：“出差为大伙买点土特产本不是什么坏事，但把东西带到办公室里，又是秤又是钱的，显然就不太合适了。”

有的同志家里遇上难办的事，人家不找她，她去找人家，说：“有什么事说出来，别自己憋着，我看看我能帮什么忙。”

邓先群帮人家忙从来不虚的，不能帮的，她就痛痛快快地告诉人家她办不了，不让人家空抱希望空等待；能帮的，她是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帮忙的。

当然，她的特殊身分，给她提供了不少方便，但邓先群帮人排忧解难不单靠她特殊的身分，更多的是靠她自身人格的魅力。

一个农村籍的志愿兵到了服役年限，跑回去联系了几次工作都不成，三十几岁的人急得直掉眼泪。邓先群听说他们县的武装部政委来北京开会，提着自家的东西上招待所看人家，介绍志愿兵的情况，希望政委帮帮忙。武装部政委原以为邓先群跟这个志愿兵有什么亲戚关系，一问，什么关系没有，就是一个单位的同志关系。政委感动了，当场拍了胸脯，邓先群高兴得什么似的。第二天政委打来电后，说当了二十多年兵，没进过国防部大院，想进去看看。邓先群说，没问题，来吧！约好了几点钟到大门口接他。邓先群按着钟点在大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也不见武装部政委的影子，那天正好刚下过大雪，门口哨兵见这位上了年纪的女军官冻得在雪地里又跺脚又哈气的，劝她到警卫室等，她却认真地对哨兵说：“那怎么行，万一人家来了找不见我怎么办？”

农村籍的志愿兵工作安排得非常满意，临走前，他提着东西到邓先群家谢她，却被她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了出来。

解放军法院的张副院长告诉我，邓先群在解放军法院工作的两年四个月的时间里，为全军的军法工作干了两件大好事。

第一件是要了五十万经费。

我军大部分基层法院恢复不久或刚刚组建，经费很缺，别说装备侦察器材了，有的法院连购买办案子的纸和墨水钱也没有多少。

邓先群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自告奋勇要争取一部分经费，缓解基层法院经费紧张之急。

现在到处都在等钱用，要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便她有这种特殊身分，那也是件很麻烦的事。邓先群从没干过跟钱打交道的事，要钱连钱柜子的门都摸不着，别人告诉她要先写报告，她就先写报告；别人又告诉她。有了报告还不行，报告上要有鲜红的公章才行，而且只有一个两个公章还不行，要有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的公章才行。别人还告诉她，这些公章不是集中在一个部门，而是分散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角落里，要把这些公章收集起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邓先群终于把那大大小小的公章全部收集在她的报告上了。她除了用她的身分，还用了她的真诚。每到公章处，她都要给人家讲基层法院同志的苦衷，讲办案同志的辛苦，人家还没感动呢，她自己先难过地掉着眼泪，事后有人开玩笑，说那五十万是邓先群哭出来的。

五十万块钱，全部拨给基层法院，一刻都没耽误！

第二件，要了十辆警车。

法院办案子，没有车是万万不可以的。但前些年基层法院里，有的是案子，就是没有车！

邓先群早忘了要那五十万经费时吃的那个苦受的那个罪，这次又自告奋勇了。

这次她学聪明了，把对好多人说的话集中起来说给一个人听。她推开总部首长办公室的门，把报告直接放到了首长宽大的办公桌上，陈述着法院的困难，讲得慷慨激昂。最后，反过来问：首长您看怎么办吧？首长被她诚恳为基层办事的行为感动了，大笔一挥，在她的报告上批了几个字，风趣地问她，你看这个样子行不行啊？

十辆崭新的挂着警灯的标致车直接从广州开到各大军区法院，军区法院的同志一片叫好声！

邓先群以自己人品踏踏实实地走进了法院同志们的心里。在这里，她荣立了三等功。

法院的一个老同志很动感情地跟我说了这样一些话。他说：“人在人说你好你可能不是真好，人走人还说你好你确实是真好。邓先群是个好人，是个难得的好人。”

他还说：“特殊身分的人办特殊的事，看你给谁办事；特殊经历干特殊的事，看你干的是什么事。邓先群不为个人谋私利，这种特殊让我们特别佩服！”

这是个有思想、有深度的人，他的话，令我深恩，也令我折服。

邓先群当群工部长当得尽心尽力
责任：邓先群做为群工部长广交天下朋友，不为自己交，不图自己方便，为整个军队交朋友，为整个军队图方便。

1994年7月2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按照新的双拥模范城（县）命名管理办法第一次命名表彰大会开幕前。工作人员向大会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邓先群少将报告：准备工作基本完毕。

邓先群一听“基本”两个字，很不满意。她沉下脸来用嘶哑了的声音反问：“基本？什么叫基本？完毕就是完毕，基本完毕是什么意思？”

那个工作人员年纪已经不轻了，职务也挺高，肩上扛的是大校军衔。他尴尬地站在女将军面前，解释不出“基本”的意思。

邓先群不管他年龄多大，职务多高，不留情面地批评道：“这么重要的会议，这么大的场面，中央常委同志全部参加，我们的工作要做到认真、认真、再认真，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遗漏和差错。基本是什么概念？我说过多少次了，汇报工作不许有可能、大概、大体、也许这样含含糊糊的词！”

大会开得隆重、热烈、务实，非常圆满。

邓先群却躺倒了。她开始尿血，肾炎复发。

由党中央倡导的创建双拥模范城（县）活动今年已是第四次了。这项活动，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关怀下，在全国成了深入人心的一件事。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已经成了全国双拥工作的基本准则。江总书记把加强军政军民团结提到了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全国双拥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群工部长的邓先群没有陶醉在成绩中，她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全国性的表彰已经搞过三次了，第一次在福州表彰了 10

个城市；第二次在北京表彰了 39 个城市；第三次在延安表彰了 56 个城市；第四次如果还是这样搞，再表彰几十个，那第五次、第六次，都这么搞，再搞若干次，全国的城市都会是双拥模范城市了。都是就又都不是了，这项活动就失去了典型意义。我们的评比就会走进死胡同里，失去这项活动的意义，不利于调动广大军民的积极性。

邓先群提出建议：双拥模范城（县）的评比活动要打破终身制，搞动态管理。双拥工作搞得好的就上，搞得不好或者不如以前好的就下，不管是省会城市还是原来的老牌双拥城市，不够条件坚决下来！不搞照顾，不搞平衡！她的建议与国家机关和总政领导的想法不谋而合。

通过各省选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考察，初评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世上不透风的墙是没有的。有的原来榜上有名的城市听说这次没有自己，急了，党、政、军三方联合起来进京游说做工作，自己给自己说情。他们到了北京，找过去在自己城市工作过的老领导，联合在北京的本地老乡，迂回进攻有关部门，希望能高抬贵手，给他们城市放绿灯。

有个城市的市长在拜会邓先群时实话实说，大实话连篇。他说，如果这次评不上双拥模范城，对上不好向退下来的老领导交差，对下不好向全市的老百姓交待。人家会说，怎么双拥城在你们手里给弄丢了？这个关不好过啊。另外，对我们那里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也不利，你别看那些外国的资产阶级，他们懂得咱们无产阶级的政治哩！他看你这是双拥模范城，他就知道你这里社会安定，治安条件好，他就往你这猛砸钱，否则，他就跟你拜拜。这些外国人精着哩……

那阵子，会议室没有闲的时候，这拨没走，那拨就往外边等上了。那些日子邓先群的嗓子嘶哑得厉害。同志们出于对她的关心，建议听听省里汇报就行了，市县汇报让别人去听就可以了。邓先群眼一瞪，批评道：你这种思想不对头啊，双拥工作是件整体工作，越是中小城市，越是没希望评上的城市，他们的积极性越要保护，中小城市是双拥工作的重点、基础。听汇报，不仅要听省里的，小城市的也要听，这是送上门来的工作，也是我们向基层学习的好机会，怎么能白放过呢？

她对地方的同志总是很热情，亲自倒茶点烟，像个好客的家庭主妇。唯有一次，她给了地方的同志冷脸看。

一个中原城市，为了评上双拥模范城，把他们那儿一个全国闻名的拥军老妈妈带来当说客。邓先群一看七十多岁的老妈妈脸色不好，一问是坐了一夜火车早晨刚到。邓先群当场质问带队领导：“如果这是你母亲，你肯让她老人家受这个累吃这个苦吗？！”一切免谈，先送老太太上宾馆休息去！

邓先群为“打破终身制，实行动态管理”的新举措，得罪了不少人，而且都是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

一个沿海开放城市，是有拥军历史的模范城市。今年年初，他们搞开发区建设，占了海军一块军事基地，军方几次交涉不成。这次评比双拥模范城，省里也报了，邓先群在初评讨论时就表示不同意。省里领导亲自打电话说情，说这个城市双拥工作一直搞得很好，有些工作还走在全国的前列。邓先群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反问道：“搞开发不顾国家利益，外商建厂建进了海军要塞军事重地，这是原则大问题，在原则的问题上我们决不让步！”

第四次全国双拥模范城（县）的评比活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些落选城市在差距面前也心服口服，表示这次落选了，下次再努力！跟邓先群

约定下次双拥表彰会上见。邓先群笑得格格格的，打着趣说：“下次你们一定来，到时候我请你们喝庆功酒！”

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罗干同志对这次评比评价相当高：这种评比形式好，既表彰了先进，又调动了积极性，这是一条经验，一条好经验。

几年前，邓先群奉命调到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工作，先当群众工作处处长，又当副部长，到今天的部长。几年来，她对群众工作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和心血。她经常对部属们说：“群众工作是人民军队对人民群众的一个窗口，我们这些站窗口的人，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军政军民团结。我们群工部门的工作，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官兵拥护政府，热爱人民，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就是要发动全社会关心、支持部队建设，为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我们是桥梁和纽带，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认识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工作要有自豪感和责任感。”

有的时候，部里的同志跟地方打交道时，碰了钉子受了气，回到部里发牢骚，邓先群就做思想工作，教工作方法：“人家不主动，咱们主动，人家不热心，咱们热心，人家敷衍咱们，咱们不敷衍人家，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三次四次不行就来他个五次六次，人心还有是石头长的吗？我不信！”

邓先群嘴上给部属们言传，行动上给部属们身教。快六十岁的人了，又有要命的肾盂肾炎，但干起工作来什么也顾不上了，天南海北到处跑。她出去可不是游山玩水，她一般是去了就办事，完事就打道回府，从不留出时间逛名胜游古迹。部里年轻的干事跟她出差回来私下里说：“跟老太太出去甭想玩！跟在北京坐班车上下班似的。”

她对人热情，待人谦虚，性格爽快，又是天生的热心肠，很容易交朋友，而且一交就是些掏心掏肝的铁的瓷的。上到中央领导省长市长，下到拥军模范子弟兵的妈妈们，尤其是那些菩萨般心肠的老太太们，见了她的面，拉着她的手，不叫她邓部长，而是一口一个先群地叫着。来北京在大宾馆住着，大鱼大肉的几天就吃伤了胃口，上邓先群家，自己和面，自己剁馅，自己包素馅饺子，自己给自己换口味。

邓先群从不给人送礼。唯一一次，是给珠海市长梁广大。

梁广大在珠海乃至广东地区的驻军中是个有大人缘的人。驻穗官兵提起梁广大，没有不伸大拇指头的，亲切地称他是拥军市长。珠海市出资上千万为驻珠海所有海防前哨一线连队建设起了公寓式的营房；为飞行部队的飞行员免费安装了室内空调；每年拨出几百万的专款补助当地驻军干部战士的生活，使部队的生活水平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仍有提高。

邓先群要到广州开会，听说梁广大生病住院，特意从北京带去了一筐又大又鲜的桃子，在广州开了两天会，哪也没去，专程跑到医院看望了病中的拥军市长。

有人说，邓先群交朋友，不为自己交，不图自己方便，而是为了整个军队交朋友，为整个军队图方便！这样的群工部长，你打着灯笼上哪去找？

邓先群的朋友能不能说是遍天下，我不敢肯定，但她的朋友确实多，这是我用一个下午就感觉到了的。

我在她办公室采访，电话铃声就没闲过。我被那持续不断的铃声搞得心烦意乱，采访本上满篇的错别字。邓先群看这样会影响我的采访，就略带歉意地说：“唉，没办法，每天都是这样，回到家也是这样，我不接了，让它

响着去吧！”

我问她：“成天这样你不烦呀？”我以为她会正色地告诉我，为了工作需要，她不会烦。谁知她脱口就说：“哎呀，怎么不烦？有时烦得我电话都不敢碰哩！”我格格地笑出声来，她也跟着笑，笑得也出声，也是格格的。

说实话，我真喜欢她这个样子。女人到了她这个岁数，尚能如此率真，真是难得！更难得的是，她有如此将军身份，还能保持此等率真，真是难得中的难得！

铃声不断，像那些敬她爱她的朋友们跟她打着亲切的招呼。慢慢的，我习惯了那脉冲电铃清脆轻柔的响声。最后我竟浪漫地把这铃声想象成她的朋友们对我采访她的一种声援，一种鼓励。

邓先群容易激动，容易动感情，容易掉眼泪，这在群工部已不是什么秘密。有人搞不懂她，说如此大的干部如此不知道控制自己。通过采访我深悟：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军队对人民怀有深厚情感的人，眼泪是不由自主的……

说到军地纠纷的情况，邓先群双眸中透着忧郁，她轻叹一声，说：“难哪！有些事真难！”

和平时期，尤其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以赴发展经济的今天，如何搞好军政、军民团结，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毛主席早就对军民团结问题有过论述：“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口号，而是中国革命几十年奋斗历史的最好的总结。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今天，军民团结的意义同样巨大。军政、军民团结一致，对地方的生产力和部队的战斗力的提高意义非同小可。一个国家只要这两种力量强大无比，走在世界前列，立于世界不败之林的愿望就不是一句空话！

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容易使人们的国防意识淡化，对“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古训理解不深。现在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对军队的感情，不能跟解放初期比了，那个时候地方大部分干部都是从枪林弹雨中爬过来的，是有过生死体验的军队转业干部，他们对部队有感情，知道军队是怎么回事，对军队的难处有着切身的体会，真把部队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也真给部队解决实际问题。现在部队有些实际问题很难办，有些政策有明文规定的事也解决不了，对军心的稳定影响很大。有时一个战士的实际问题解决不好，能影响他身边的一大群战士的情绪。所以，现在有些干部战士发牢骚说：“平时管我们叫傻大兵，不理解不尊重我们，有灾有难了，遇火遇水遇险了，又想起我们了，一口一个子弟兵地叫着，我们又成了最可爱的人了。”这虽然是气话牢骚话，但说明一种情绪，一种现象。

现在有少数干部，不顾全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严重，只考虑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对当地驻军的建设考虑少，有的甚至不理解，不支持。现在涉及军队房地产和军事设施的矛盾纠纷多了起来，问题就出在地方保护主义这个毛病身上。

有的地方要在军事禁区内搞风景区建设，开发当地旅游业；有的地方在

部队的机场、新式武器试验场附近盖高层民用住宅，搞房地产开发，致使机场试验场报废不能使用；有的地方，部队拉出去搞军事演练，坦克、炮车上公路要收养路费，停下来要收停车费，不小心碰坏禾苗，要一棵一棵地算损失费！这费那费的，搞得部队很头疼。还有个城市，要在军区大院上空搞高架桥，那样的话，军区大院将被一览无余，无密可保！

说一件事你可能都不会相信：我们一个野战部队帮助地方抢险救灾，由于通信设备跟不上，用了地方几条线路，救完灾，部队回到营房还没休整过来，地方有关部门就上门要那几条线路的钱，说是收租用费！部队没有这笔军费开支，他们就跑到银行封了部队的帐号，那是战士们的伙食费啊！

邓先群说到这里，眼睛里已经是泪光闪闪了。

我发现，我面前这位女将军太爱动感情了，采访中，她几次潸然泪下，不能自己。望着她泪流满面的样子，我脑子里突然闪出句成语来：不动声色。这是经常用来形容有一定身分和地位的人的词语，表示着一种理智和成熟。

邓先群不够理智吗？不够成熟吗？她泪光粼粼的样子把我给搞糊涂了。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听到不止一个人说到她的眼泪，我发现她的部属们在说自己的女长官的眼泪时，几乎都是只说眼泪而不加任何词汇的渲染。

这令我我觉得奇怪，同时也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可做。

我请教一个朋友，巧的是这位朋友是群工部的干部，是邓先群的部属；更巧的是，他是党小组的组长，是邓先群的党小组长。他听了我的疑问，马上正色地告诫我：“你这种猎奇的心态是写不好邓先群这个人的。”

邓先群的党小组长告诉我，邓先群同志的党性是很强的。她领到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交党费，而且从不让秘书代交，碰上党小组长不在，她也不让跟党小组长一个办公室的人转交，她一定要把党费亲自交到党小组长手里。“这是一种态度，是她对党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说明了她的忠诚。”党小组长这样认真地对我说。然后又补充道：“她的党费一般都是我收到的党费的头一份，只要她没出差，”只要她在部里。”这也是一种态度，这也是一种忠诚。这不是党小组长说的，这是我自己体会到的。

党小组长继续介绍邓先群的党性：

她不但坚持第一个交党费，坚持参加党小组活动，坚持像普通党员一样过组织生活，除了这些，她还比普通党员更自觉地坚持一条组织原则，那就是向党组织汇报思想。

“她汇报思想？她真的汇报思想？”我非常地吃惊。

“当然！我骗你干吗？部长又不在这儿，我说的话她又听不见！”党小组长不太满意我的不太相信。

“她跟谁汇报？”我大感兴趣。

“当然是跟我喽，我是党小组长，她是按组织程序来向我汇报。”党小组长一副习以为常、见惯不怪的样子。

我简直不能相信！一个将军、一个部长竟能坚持向自己的部属一个普通干事汇报思想！

党小组长显然很了解自己的小组成员，解释说：“她那时已不把自己当部长了，而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她也不把我当成她的部属了，而是她党内的领导。”

“她都跟你汇报些什么思想？”一感兴趣，我也就顾不得哪些该问哪些不该问了，随口就问。

“什么都说。”可能因为是朋友，党小组长也就忘了保密了，脱口就答：“她从不隐瞒自己什么，什么都说，工作啦，学习啦，连家里孩子惹她生气她也说。当然说的最多的是她工作上的不顺心。”

我更不能相信了！不能相信一个上级跟自己的下级谈自己工作上的不顺心！这简直是为官从政的一个大忌嘛！这个官当的！

“她经常找到我，很激动地问我‘你看这事我做得不对吗？’她是个心里藏不住事的人，但她认为跟别人谈这些工作上的矛盾和不愉快是犯自由主义。跟党小组长谈谈，一是符合组织原则，二是心里痛快，三是想听听旁观者的意见。她不是个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人，我们开小组生活会时，有时同志们对她的批评很不客气，她总能接受，并做诚恳的自我批评。”

“邓先群掉眼泪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工作遇上麻烦了，一时半时地解决不了，急得掉眼泪；一种是工作中不被人理解，受到误解，委屈得掉眼泪。不管哪种哭，我从未见过她为自己的事哭，她的眼泪都是为公家的事流，是流于公心的，我不认为她掉眼泪有失她部长的身分，反而认为这与她一贯的为人很协调也很一致。她从不让自己被粉饰，也从不让自己被冷漠，我们部长是个很真实、很透明的人。”

在群工部采访过程中，我听到了邓先群泪洒 A 省，感动上帝，解决了一起十多年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件事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赞扬，说，像这么大难度的问题都解决了，军地还有什么更大的疙瘩解不开？！很快，一批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挂号有影响的军地纠纷，军地双方本着顾全大局、互谅互让的原则，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A 省有两处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很有影响的旅游观光圣地，由于交通不便，影响了游客的数量。他们决定，建一条海边大道，将两处旅游点连接起来，同时，这条绵延数百公里的海边大道也将成为新的观光景点，对 A 省旅游事业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矛盾出在这条海边大道上。一个部队备用飞机场横亘在这条规划中的海边大道上，方圆数百里，绕不开，躲不过。军地双方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1993 年 3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借全国双拥活动的东风，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还是总政群工部副部长的邓先群受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她没讲任何条件没叫任何苦，带领由国务院和军队有关部门组成的军地双方联合工作组，肩负重托，乘飞机飞往 A 省。

到了 A 省，省里的同志很热情，衣食住行安排得周到细致，还派了一个分管经济的领导干部全程陪同。这位领导是个有着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才子，思路敏捷，谈吐锋利，干练异常。

当天，联合工作组听军地双方汇报。汇报会上，军方说军方的理，地方说地方的理，说得都有理，把工作组的人说得听谁的觉得谁的有理，听到最后，头都听大了。

第二天，看现场。联合工作组坐着越野吉普沿着规划中的海边大道急驰，有着博士学位的当地领导坐在邓先群身边介绍情况，介绍这条路开通后 A 省旅游业的前景和对 A 省经济腾飞的巨大作用，介绍 A 省山区还有多少没有脱贫连温饱都没有解决的农民兄弟，介绍失学的孩子，介绍做地方父母官的难处和苦衷。不愧是有博士学位的大文化人，走一路讲一路，讲得有理有据有

情有义，把联合工作组的组长给说得心动了。

回到住地，邓先群找来作战部门的同志问：那军用机场真有那么重要吗？看现场怎么荒草遍地，有的地方野草长得比人还高？这位同志听了组长的问话，忙从公文包里取出作战地形地貌图，在几百万分之一的图纸上给她讲保留这个备用机场的战略意义。邓先群听着那硬邦邦的军事术语，真真地为起难来。

到底是搞作战的军人，通晓谋略，熟谙计策。第三天，一架军用飞机将联合工作组的全体和A省参加协商的全体一古脑拉到祖国最前哨的一个小小的岛屿上。

登上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没有淡水水源、吃水吃菜吃粮全靠给养船运送的艰苦异常的小岛，听守岛战士说，一次刮台风，给养船上不来，他们没有了淡水喝，竟喝自己的尿解渴生存时，邓先群落泪了。她拉着这些见了这么多大首长连话都不会说了的质朴的战士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但保住那部队备用机场的决心却坚定了下来。

第五天，从早晨一睁眼，邓先群就开始做工作。她先做A省陪同工作组的博士领导的工作。博士领导以说理见长，邓先群以说情拿手，有的时候，理在情的面前是不堪重负的，更何况这个情是国家的情，是民族的情。他看得出来，眼前这个穿军装的工作组组长，不是单纯的从维护军队利益出发，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不可能不被面前这位女将军的拳拳之心深深地打动！但他代表不了A省，表不了态，把个大博士先生难为得干脆称病不见了。

整整一个白天，A省不见人影，把个工作组晾了起来。邓先群急得嘴上的泡都起来了。在宾馆里团团转，最后发脾气拍了桌。

群工部的陪同人员发现她的脸明显地发“胖”了，知道情况不好，边打电话找医生边劝她：“何必这么大动肝火，疙瘩又不是一年两年结下的，解开它也不在这一天两天。”邓先群却说：“我不管这个疙瘩结多久，既然组织上派我来，我就不能干耗在这浪费时间，这个时间我浪费不起！”

第五天的会从晚上七点一直开到第六天凌晨三点多，邓先群看到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依然解决不了问题，又急又气又累，她站起身来，一字一句地对在座的各位说：“请同志们别争了，也别吵了。咱们谁也别摆自己的理由了，咱们只是想一想，想想那个岛上的士兵们，想想那些年轻的生命，一旦战争爆发，没有了那个备用机场，后援上不来，我们那些守岛战士可怎么了得啊！”

邓先群又一次落泪了。她当着她的工作组的全体成员，当着A省的全体成员，落泪了。她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只好挥挥手让大家散了去。

部队的备用机场终于保留下来了，但顾及到地方和群众利益，还是把群众种上庄稼和地方政府准备盖学校的土地划了出来。A省为了国防建设的需要，也放弃了自己修建海边大道的计划。A省的主要领导同志，在为工作组送行的宴会上，端着酒杯敬邓先群酒，一口一个大姐。这大姐叫的，绝没有官场上的客套，而是一种出自内心的敬慕和尊重。

我把邓先群泪洒A省的事讲给朋友们听，朋友们唏嘘一片，唯有一个小子轻飘飘地冒出句：“女人爱哭，这是天性。”我听了异常地气愤，忘记了斯文，破口骂他，“放你妈的屁！你让你妈去哭试试，你妈能为她钱包里少了十块钱掉眼泪，你妈肯为这种事掉眼泪吗？！”

部长说：你们工作放开手脚干，出了问题我负责。

部属说：部长越是放权，我们越是负责。

部长说：生活上有困难你们找我，你们别客气；工作上出问题我找你们，我不客气！

部属说：有好事告诉老太太，让她高兴高兴，有难事去找老太太，请她想想办法。

在群工部，我采访了12个人，超过了全部人员的三分之一。上到部长副部长，下到一般的干事和普普通通的司机志愿兵，他们的谈吐和修养，他们的彬彬和有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采访过程中，他们放下手中的工作，给我仔细地回忆，放开地谈。有的人还事先在工作手册上列好纲目，有条有理按时间顺序谈，事情清清楚楚，感情真真挚挚。我对采访工作不陌生，看够了有的人为了应付差事或出于某种私心杂念，或敷衍了事或夸大其词，让我感到一种屈辱和不真实。但在群工部，他们在谈他们的部长时，讲部长的事情，谈自己的感受，很真诚也很实在。我三十好几的人了，下级在谈上级时，说好话和说实话凭直感我还是能分辨出来的。

男同志一般比较沉稳，谈的时候条理清晰明白，态度诚恳理智。女同志比较爱激动，谈着谈着思路就乱了，部长的事情和自己的感受搅和在一起，越说越说不清楚。但她面色发红，眼圈发潮的样子告诉我，她谈吐乱了，但情感一点没乱，这情感很真挚很浓烈也很朴素。我在这些真实的人面前，不可能不被打动！

在整个采访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好集体，是一个团结、奋进、有责任感、有事业心的好集体。

有人深有感触地说：“人的一生，在关键的时候，能摊上个好领导，是自己的福分和造化。”

有人无限感慨地说：“一个领导干部，让人感动不太容易，让这么多人感动更是不容易！”

我听了邓先群这么多的好话，感动之余，心里又冒出了中国一句老话，说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想，老话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了，对任何人都适用，对她邓先群也不该有例外。

我有些像西方国家不怀好意的记者们一样了，问：“难道你们部长一点问题没有？”

“有哇！”他们回答得很痛快也很坦然。他们告诉我，之所以没有谈到他们部长的事情，并不是有意替部长隐瞒什么，只是一种心理习惯。他们认为，采访嘛，一般都是采访事迹，宣扬事迹。我解释说，我准备全面的立体的写邓部长，优缺点都写，实事求是地写，不搞高大全式的宣传。

说到邓先群的问题，他们几乎是众口一词地提到了她发脾气。

我问部办的女秘书：“邓部长发脾气是个什么样子？”

女秘书快人快语，性格十分地爽快。她推开椅子站起身来，从桌子上抓

过一本书，笑着给我学邓先群发脾气火冒三丈的样子。她把书“咣”地一声摔在桌子上，虽然是表演，也吓了我一跳。她拍着桌子，学着部长吼：“你看看！你看看！这事是怎么搞的嘛！搞的什么名堂！”

学完，她先抚着拍疼了的手掌笑得弯下了腰。

一个年轻干事告诉我：“我们部长从不冲我们一般的干事发脾气。她的火一般都冲着我们局里的头头们发。我们局长副局长可倒霉了，活是我们干的，没干好捅了漏子由他们去挨部长的训。所以我们工作一般都十分小心谨慎，尽量不出差子，少给局长们添麻烦，找难堪。”

我问一个副局长：“您挨过部长的训吗？”

这个文质彬彬一肚子学问戴着个眼镜的南方人微笑着慢条斯理：“挨过，但不多。”

“怎么样，挨训的滋味很不好受吧？”

“那是自然的。”他笑着，笑得很深刻，他把身子很舒服地埋在沙发里，说：“挨训的滋味怎么能好受？但挨她的训我们一般没有思想负担。我们知道她就是这么个急脾气，训过就训过了，她从来是对事不对人，批你训你没有任何恶意。当然了，挨她训的时候，你有错误要赶紧承认，一是一二是二，你千万别遮遮掩掩的，越遮越掩在她那儿越过不了关，她就越不放过你，批你批得越厉害。”

邓先群的党小组长给我透露，今年上半年的一次党内生活会上，大家对她工作中的急躁情绪专门进行了批评。有的局长对她的批评一点不讲客气，说她：“你这样不分地点不顾场合地大着嗓门批评我们这些当局长的，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些局长副局长的也有部属有下级啊，我们也有个面子问题啊，你这样不给我们留面子，让我们怎么在部属面前工作呢？”

邓先群老老实实虚心地听着，一点没有坐不住的样子，她不太不好意思地对大家检讨说：“我这个人哪，脾气不好，是个急性子。我也知道自己这个毛病，也想控制也想改，可一遇问题就急，就控制不住自己，就改不了这个毛病。希望大家今后多给我提个醒，遇到我控制不住自己发脾气时，谁在场，谁就拉拉我的袖子，给我降温，提个醒。”

“你们有人给她拉袖子吗？”我笑着问党小组长。党小组长是个厚道人，他敦厚地笑了，说：“还真没人敢在她发脾气的时候上去拉她的袖子，有时候事后劝劝她，让她别动那么大的肝火，那么大岁数了，发那么大的火对自己身体不好。”党小组长又说：“不过，她发脾气从来都是为工作上的事，没有自己的事。大家都是懂道理的人，能理解邓部长的脾气，所以，我们大家不怪她。”

岂止不怪她！群工部的干部战士有事都爱找她帮忙。他们私下里管她叫“老太太”，像说自己家的老太太一样。不管大事小事，他们习惯说：“找老太太！”好像老太太该他们似的。找的人多了，她烦，劈头盖脸说人家一顿：“怎么什么事都找我？你以为我是神哪？”有事不找她，让她知道了，她又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人家：“怎么不找我？什么时候学得这么虚情假道的！”

好些事简直就是她自己找上门去帮人家的忙。

来部里帮忙的干部供给关系没过来，她就把自己发的鸡蛋、食油、苹果等吃的用的给人家留下，不要是不行的！每个季度发的补助她一般都用在别人身上，这个志愿兵的老婆孩子来了，生活紧张，她的补助就给这个志愿兵；

那个农村战士家里日子紧，她就又是米又是面整袋整袋地买，有顺便的车让人家拉回去家去，有新调来的干部没房子住，她亲自跑到管理处处长办公室坐下磨房子；老婆孩子随军进了北京，老婆的工作，孩子的入学，她全管。一个原来在老家的银行工作的家属进京后还想进银行工作，可谈何容易？邓先群找到银行的一个熟人推荐这个干部的家属。人家嘴上答应了，但迟迟不给办，她把远南运动会发给她这个组委会成员的开幕式票让那个干部送去，说：“咱们不催他，让票催他。”一个干部家刚搬来，没有吃饭的桌子。她听说了，让司机把自己家一张多余的桌子送了过来，同时还拉过去一个橱柜。

部里的秘书掰着手给我数，几个新调来的干部，有一个算一个，老婆孩子房子哪一件邓部长没操心过？难怪群工部的干部说，摊上邓部长是自己的福分和造化！

她对自己的部属好，对自己部属的爱人孩子一样也好。群工部跟地方打交道多，地方上大事小事只要是跟军队有关系的事，不知道找哪个部门一律找群工部。因此，群工部大事小事多，杂事也多，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她经常叮嘱部属：“你们回家晚了，别忘了跟自己的爱人道声辛苦！女同志忙里忙外顾老的顾小的，那种辛苦我最有体会。大家代我问她们好，谢谢她们对群工部的支持和帮助。”

邓先群在部属中有人缘，在部属的家里同样有人缘。有人加班几天不回家，家里的大事小事指望不上他，回到家里见夫人的脸色比较难看，忙推出邓先群当挡箭牌，对夫人说：“邓部长问你好，说我这几天加班顾不上家，你在家很辛苦，让我代表她谢谢你对我们群工部工作的支持。”说得跟真的一样。夫人听了，马上阴转晴，说：“看在邓部长的面上，不跟你计较！”

1991年华东地区水灾，群工部一名副师职干部奉命到抗洪抢险第一线做协调工作。前脚刚走，这名干部的爱人哭哭啼啼打电话到部里，说小孩的胳膊上发现一个肿块，门诊部医生说情况不太好。邓先群听了，当天晚上打电话到解放军总医院找熟人联系专家，第二天上午亲自带孩子去检查。一个星期后切片结果出来了，肿块是良性的，没有问题，大家心上一块石头落地。邓先群这才亲自打电话告诉在抗洪第一线的这名干部，让他放心，家里的事情组织上会安排照顾好。

群工局常干事一向以自己曾经是北京市优秀家长自豪。他对儿子管教有方，儿子也一直很乖很听话。谁知上了初中后的儿子跟变了个人似的，你说你的大道理，他有他的小九九，表面上答应得挺好，但仍然是我行我素，把常干事气得没脾气，跑到办公室里生闷气。邓先群看出常干事有心事，一问是这档子事，就拉开椅子坐下来，跟他一起分析这么大男孩子的发育过程和心理活动，建议常干事改变一下管教方式，跟儿子多交心，交朋友。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常干事家刚吃完午饭，桌子还没收拾，邓部长突然登门，说是来看看儿子，跟儿子聊聊天。可巧那天中午儿子不在家，邓部长等了半个多小时没等来，就给那男孩子留了张字条，条子上这样写道：

常征：

你好。我来看你未见，希望你回来后给我打个电话。想跟你聊聊。

邓先群 8月20日

儿子回来看了纸条，当即就要给邓奶奶回电话，常干事让他看看几点了，现在正是午休的时候，别影响奶奶休息。这小子根本就不听，抓过电话坚持要打，常干事没有办法，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大中午的给邓部长打电话。电

话通了，等了一会儿，有人接了，正是邓先群本人接的。市内电话很清楚，站在一边的常干事听电话里邓部长高兴地喊着儿子的名字，一颗心落到了原处。

儿子抱着电话说一会听一会占了一个多小时的线，常干事和爱人惊奇地发现儿子竟掉下眼泪，奇怪邓部长在电话上说了些什么，竟能把这个犟儿子说得掉眼泪……

以后，儿子经常主动地给邓奶奶打电话，把自己点点滴滴的得意都告诉官很大但又很和气的奶奶。小孩子的心理奇怪得很，对给他衣食管他温饱的父母的话不好好听，反而对这星那星的奉若神明。这个叫常征的男孩子很有福气，他追的这个肩上扛着金灿灿肩牌的将军之星比他的同学们追的那些星神气得多也气派得多！孩子由开始单纯的虚荣心的满足，不知不觉地被这个女将军吸引、陶冶。邓先群少将对这个叫常征的男孩子今后的一生恐怕都会有影响。

事还没完。邓先群又让自己上大学的儿子跟常干事谈他跟常征这么大时，心里想些什么，希望父母是什么样子……

我在记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仍然像听说这件事情时一样激动。我也有一个儿子，虽然他现在年龄尚小，但他会长到常征那样大的，会出现常征那样的生理和心理的反应的。那时，如果能遇上邓先群这样的长辈，不但是儿子的福分，也是我这个做母亲的福分。

**认认真真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是邓先群非常非常在意的事情。
她说，认认真真地做好官，清清白白地做好人，比什么都重要……**

我在跟邓先群接触当中，发现她是个相当自尊自爱自重的人，她把自己的人格和品质看得很重很重，时时受到约束和压力。她为此所累，并为此所荣。

如果她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她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和钦佩，但她作为一个负有相当责任的领导干部，这种高尚的品质和有力量的人格，留给人们的就不仅仅是尊重和钦佩了。

邓先群顶讨厌部下“大概、可能、也许”这样含糊其辞的汇报。所以，在群工部这样模棱两可的词汇像地雷和炸药包一样，没有人敢去碰的。偶而有人大意了，让这样的词从嘴里漏出来，坏了，硬着头皮看邓老太太摔本子拍桌子吧！以后想起这类的词心里就打鼓，老大不小的人了，谁还能老没个记性？

邓先群不准群工部轻易就往基层转批群众来信。她说，基层本来事就多，怪紧张的，我们自己能搞清楚的事就尽量自己去搞清楚，少给基层添乱找麻烦，增加基层的负担。

一次，群工部收到地方一家工厂的来信，称空军一个仓库盖围墙把他们工厂大门都快堵死了，搞得工人上下班走路都困难。邓先群阅了这封群众来信，心想，不会吧？别说部队一个团级单位，就是一个普通人家也轻易干不了这么没谱的事。星期天，她穿着便服来了个微服私访。星期一上班她就对具体经办这件事的干事说：“这封信反映的问题不属实，那个围墙离工厂

大门口八丈远，汽车开进开出都没问题。你马上给工厂答复，同时也要给那个仓库领导打电话，给他们提个醒，怎么搞的嘛，跟自己家门口的邻居都搞不好，让邻居偷着告自己的状，这个样子还谈什么军民团结！”

部里一个干部因工作需要买了辆自行车，顺便又买个自行车车筐，到邓部长那儿开发票签字时，邓先群指着那张车筐发票问：“这是怎么回事？”那干部吭吭哧哧地说：“顺便买的，图个方便。”邓先群不客气地把那张发票一把扯下来撕掉，不客气地说：“图方便你自己出钱方便，公家买车是为你解决工作交通的，不是为你个人方便！”

有人私下里说，这个老太太也真是的，哪有一个部长亲自一张一张扒拉发票看的？真是个女人家，婆婆妈妈的！

邓先群听了，理直气壮地说，我这个部长就是要这样，一张一张地扒拉！公家的事我不嫌麻烦！公家的钱不是自来水，谁想拧一把谁就拧一把，得有人守着这自来水龙头。我们不是人民的公仆吗？公仆不为人民把关让谁来把关？我告诉你们，你们别以为我这样婆婆妈妈不大方，我这是为你们好！小便宜占惯了，就要占大便宜，你以为公家的便宜就那么好占？总有一天占便宜要占出毛病的，到那时，不光害了你们自己，也要毁你们老婆孩子的！

群工部虽然对外联系多，但按季度配发的汽油票基本够用，他们很少自己化钱买油票。原因之一，是群工部对用车控制得很严，外出开会，参加活动，只要能挤一辆车坐下，就决不宽宽松松坐两辆车去。群工部的干部们用趟私车是不太容易的，除非有接站、上医院看病这样堂而皇之的理由，否则，要私车比较麻烦。连邓先群的女儿都知道她妈妈的专车不好坐，用她女儿的话说，有跟她磨牙的时间，我坐地铁公共汽车早到了。

一个副局长出去办公事，回来顺路拐到一个招待所看外地来的熟人，不想车子停在外边被别人的车倒车时给撞了一下。她出差回来，在路上听司机讲了这件事，非常生气。第二天上班，直接到司机班，找当班的司机了解情况。那个司机还没起床，一见部长来了，吓得忙要爬起来，被邓先群一把按下，说：“你别动，我知道你昨天出车回来晚了，你就躺着给我说说那天撞车的事”

对部属这样，对顶头上司她也是一点不含糊。那时她还是副部长，部长的司机拿来一张发票让她签字报销，她一看是部长的车上换了录音机，就问为什么要换？司机回答说坏了，不响了。她二话不说，抬腿就去找部长，见了部长劈头就问，部长，你车上的录音机坏了吗？部长让她搞了一头雾水，说，没有啊，早上来的路上还听得好好的哩！邓先群回到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司机，没坏，为什么要换？部长司机只好老老实实回答，那音响不好，经常卡带。邓先群说，哪坏修哪，换新的干吗？你马上去，从哪换的你再到哪换回来！

1994年7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大会，其中有一项活动是组织代表参观世界公园。一个在会议上开车的司机的老婆孩子小舅子正好来北京游玩，这个司机就找到会务组的秘书，问能不能让他爱人和小舅子也顺便参观。会务组的秘书认为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就答应了，谁想，给邓部长一提，部长不同意。她把手一挥，说：“这不行！这是组织全国的双拥模范代表参观，是一种荣誉，无关的人不能去！再说，拖儿带女的像什么话！让他们另找时间去，门票钱我出！”秘书挺为难，觉得已经答应人家了，再反悔，不太好开口。就跟司机商量：如果老婆孩子去，在代表里太扎眼，影

响不好，就不要去了，小舅子可以用我的票去。司机的小舅子高高兴兴地去了世界公园，回来的时候坐大轿子车一起回到宾馆，正坐在会务组屋里兴奋着，被邓先群碰上。邓先群见一个生人，就随口问他是谁，司机的小舅子不明就里，就说了他是谁谁的小舅子。邓先群一听就火了，在办公室碰头会上点这件事狠批，说：“这是一件无组织无纪律的事，同时也是一件损公肥私的事！”批得经办秘书坐不住了，赶紧站起来认错，作了自我批评。

邓先群对清清白白做人很在意。虽然她没用“清白”这个词语，但她是这个意思，她的原话是“老实正派的做人”。

她对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她对秘书说：“要扭转这个风气首先得从咱自己做起。”

她对那些上窜下跳跑官要官的人非常反感。她认为，越是这种人，越是坚决地不能重用。有人闻听群工部里缺人，找到她想进群工部进总政机关，她一口回绝。她对来说：“你别找我，找我也没用，我不管这么多。人家局里缺什么样的人人家局领导们心里有数，调谁不调谁首先要听他们的意见，我们只是最后拍个板。”

她对给她送礼的人从来不客气。有一次她到沈阳开会，有关部门送给她一些东北特产，她坚决不要。上火车时，她发现送行的人手里提着那些东西，就堵在车门口丧着脸说：“你别给我提上去啊。你给我提上去了，我就从车窗给你扔下去，到时候，大家的面子都不好看！”

她对部属们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哎，我说你们可别给我送东西，送了我也记不住是谁送的，送了也是白送！”

她外出开会参加活动，组织者发的纪念品，她很少留下，而是送司机班的战士或来队探亲的家属们。

河南一个合资公司送给群工部两箱除汗味香水，有人提议每人分几瓶，邓先群不答应，批评道：“你们坐机关的哪来的汗味哪来的臭味！”让这些东西一份不留地全部送给站岗值勤的警卫战士们。她告诫大家：“你们不要心里不平衡，不要认为东西送到群工部就是给群工部的，这是地方同志想拥军不知该往哪送才送到我们群工部的，我们只是个‘邮局’，你们谁听说过邮电局可以拆人家的东西取人家的东西？！”

邓先群从不为个人的事麻烦别人。一次她病了，新调到群工部工作的副部长让部办秘书带路，想到部长家里看看她，部办秘书们竟不知部长家门朝哪开，副部长诧异得很，奇怪秘书竟不知道自己直接领导家住哪里！秘书还有一肚子委屈，解释说：“不是我们工作不主动，而是部长太犟了，她从不让我们替她办私事，上班时间不行，下班时间更不行，她说她自己不老不小的，有事可以自己干，就连跟她一起到外地出差回来，她也是叫司机先送我们然后才送她！”那次邓先群星期天搬家，她请了几个战士搭把手，完事后非要留战士们在家吃饭不可，战士们一是不大敢在两个将军家吃饭，二是看搬家本来就够乱的，坚决不吃。邓先群堵着门不让战士们走，说：“你们少给我客气，大小伙子啦，干了一上午活，哪有不饿的道理？”自己系围裙亲自下厨房。她不是随便对付对付，而是早有准备地又煎又煮又烹又炸。由于新搬了家，地方不熟，东西又乱，手忙脚乱地不小心把炸春圈的油浇到了脚上，好几天走不了路。

她有专车，但她对自己的专用车用得非常仔细。星期天节假日，她很少用车，有事就自己去挤地铁和公共汽车。她想的是，星期天，自己休息，人家

司机也得休息休息。她到京西宾馆开会，回她在南礼士路的家，常常是花上四毛钱坐1路4路57路公共汽车。她讲话，这么近的路，花四毛钱就解决问题了，何必动汽车呢？这汽车一动，可就不是几个四毛钱的事啦！她的司机小马告诉我，只要是部长坐在车上，他从不超车，尤其不敢超公共汽车。部长经常跟他说：“我上班，老百姓也上班，我下班回家，老百姓也是下班往家赶，我一个人坐专车，人家那么多人挤一辆车，再跟人家抢道，怎么说得过去！”

今年开远南运动会，作为解放军群工部部长的她参加了组委会的组织工作。大会结束后，组委会发了四百五十元的误餐补助费。按她的惯例，这笔钱是要上交部里的。这次她却跟秘书商量说：“我这次就不交了吧？张局长的爱人有病，他爱人的厂子又不景气，医疗费又报不了多少，她做一次CT就要上千块钱，我看他们的经济够呛！如果用部里的福利费补助，最多只能补五十块钱，够干什么的？我看就把这钱给他吧，算组织上的一点心意。”说着，她又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元，让凑个整数。

清白，是一种品德，能感动人，也能影响人。邓先群清清白白的人格里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虽然无形，但这种力量却有力量。这种清白的人格力量潜移默化着一批人。群工部里邓部长的部下不止一个人对我这样说：“在我们部里，结帮拉派的小团体主义和背地里不负责任地传播议论的自由主义根本没有市场。在这样的集体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不单单是心情舒畅的问题，对我们个人而言，也是一种促进和提高。”

采访中，许多人说到邓先群是个好人，而且是个大好人。我把原话传给她听，她开心地笑了起来，笑过后，她顶顶认真地对我说：我这么把岁数了，又是个女同志，还有这么个家庭背景，是同志们对我的要求标准不高

……

果真是要求不高吗？我好好想了一下，我觉得，也是，也不是。

是。我们容易被有这样家庭背景的人感动，对他们的义举义理善德善行容易接受也容易感慨，我们经常这样赞叹他们说：有那样的家庭，能做到这点，实在是怎么样怎么样……

不是。我们下意识地对有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关注，对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盯在眼里，品在心中，一旦发现不是，哪怕有这种不是的人比比皆是，我们也愿意见论，并且是纷纷议论！我们经常这样指点着他们说：也就是他们，有这种家庭背景，换了别人，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要承认这点，他们比我们普通人活得要累一些，起码在心理上，在精神上。

邓先群似乎不是这样，她很注意自己的身分，她又从不在意自己的身分。

经常有人拐了九十九道弯找到她，托她找她大哥，哪怕是转递一封信，她也一口回绝。她会说：“你是有组织的人，他也是有组织的人，你最好按组织程序办。我跟他只是兄妹关系，我无权也没有资格干这些事！”

她经常中午回去看望母亲，骑着她那辆破自行车。有人说她，说你这样的身分，骑这么破的车子满世界跑，有碍观瞻。她奇怪道：“咦，大街上骑

破车子的人多的是，人家骑都没事，怎么就我骑有碍观瞻啦？”一次她那辆破车子半路放了炮，下午她还有个会要参加，正急得设法，见机关食堂的给养员骑着平板车买菜回来，她一看高兴得什么似的，跳上去，双腿吊在半空，身子跟着那破板车晃啊晃啊，一直晃到了办公大楼。

我在整理采访笔记时，发现有两个字出现的频率最高：好人。被采访者特别强调这两个字，并为这两个字发出深深的慨叹。开始的时候，我对“好人”的提法不太以为然，我总觉得，像她这种经历和身份的人，用“好人”这个词似乎过于平民化，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的这个关于“好人平民化”的观点开始动摇了。现在，我很固执地认定：“好人”不应该有界定，不管她是将军还是普通人，也不管她出身如何经历如何，好人就是好人！好人是对一个普通人最实在的评价，对一个女将军，又何尝不是一个最实在最朴素的评价呢？

一次，邓先群参加全军英模座谈会，细心的她发现其中一个很有影响的英模竟在短时间里几次起身离开会场。她意识到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问题，就向工作人员打听，得知这位英模此次来京后添了个毛病，上厕所解小便很频繁。散会后，邓先群主动找到这位英模，详细询问情况。开始英模很难为情，红着脸不好意思开口，邓先群诚恳地对他说：“按年龄我可以做你的长辈，有病治病有什么可难为情的！”邓先群亲自找解放军总医院的熟人，介绍了最好的专家给这位来自基层的英模会诊，检查结果需要住院治疗，邓先群又亲自联系住院事项，亲自打电话给英模请假。通过住院治疗，困扰英模的疾病有了明显的好转。

一年以后，那位英模又一次进京，特地到邓先群家看望她，表达内心深处的感激。邓先群很热情地接待他，坐在他的身边问长问短。聊天中，邓先群得知英模的爱人从农村随军了，因为发扬风格，几次推让了爱人就业的机会，爱人至今闲在家中。邓先群一听很着急，掰着指头给他算了一笔帐：他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三口之家，生活一定困难。邓先群拿出五百元钱，递给英模，让他贴补家用，英模窘迫地摇着黑壮的大手不收，邓先群沉下脸来说，看看，看看，说是一家人，其实你根本没把我当一家人！这钱算我借给你的，你爱人有了工作，生活好了再还我。

这件事我是听邓先群的司机无意中说的，当我去找她核实时，邓先群摆着手坚决不让写这件事，说，英雄模范人物有他们自己的苦衷，我们不能光学习他们，还要理解他们，帮助他们。他们给了我们这个社会许多温暖，我们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要尽量给他们以温暖。英雄模范人物境界高，奉献多，索取少，可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不能冷了他们那一颗颗火热的心啊！

群工部的秘书在接受采访时，若有所思地对我说：“现在想想，想出什么好事，准跟部长有关！”接着，他跟我探讨起关于做好人和做好事之间的关系来。

我们一致认为：好人做好事是一种必然，做好事是好人们的一种习惯，或者说是一种天生的习惯。好人是一种品德，好事是一种行为，好的品德一贯地跟好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好人做好事不足以为奇，好人做一辈子好事也不足以为奇。因此，对邓先群那么多的好事迹也用不着大惊小怪。

邓先群人好得踏实。好事做得也格外的好。

群工部一个年轻干事，正当干事业的年龄，不幸却得了癌症。年轻干事

的心情可想而知。他的女上司的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从找专家确诊，到手术方案的确定，女上司亲自出面，亲自过问。手术后，女上司上街买了大补的甲鱼炖给他补术后的身体。第二次上医院探望时，女上司想起那个病房还有一个病号，为了这个她不认识的、跟她毫不相干的病号不致于有冷落孤寂感，她竟提上两份东西，一份放到她生了病的下级床上，一份放到了那个连名字也叫不上的病号床上！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好事了。这件好事的本身已经超越了一件上级关心下级的好事的本来意义，表现了一种人格和人品。这是一种多么多么美好的人格和人品啊！

秘书说到机关组织的几次募捐活动，他肯定地说：“我敢保证，几次募捐，我们部长在机关是捐的东西最多，捐的东西最好的人。”

安徽那次，她捐了75件，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能捐的东西全捐了。皮大衣、皮夹克、羽绒服，简直就是新的。有人翻着她捐的东西直可惜直心疼，说：“这么高级的东西，捐了多可惜！”她听了眼一瞪，生气道：“什么话？！捐给自己的同胞怎么是可惜？”大伙儿劝她，没必要捐这么多，皮大衣、皮夹克留下自己穿。她很实在地说：“我们当兵的冬天发的马裤尼军装、军大衣，够遮寒的了，北京冬天又不太冷，屋子里又有暖气，灾区的人比我更需要这些东西。”

青海这次，她家里已经没什么可捐的了，她就花钱买了3床棉被、8件毛衣，和自己一件只穿过一次的呢子大衣一起捐了。

她参加了希望工程一加一的活动，捐了一千块钱，救助那些失学的孩子们。

虽然她家里一个中将一个少将两个高工资，两个儿女也早已参加工作自食其力了，但她家的花销大。家里迎来送往的事情多，开销也不小。按理说，她去拜访工作关系的朋友，探望部里生病的同志，买东西应该报销的，但她却从不这样，从来都是花自己的钱买东西。今年年初，她得知一个哈军工的老同学得了癌症，就跟女儿凑了一千多块钱送到医院接济生病的同学。

她对自己却抠得很，有时候误了开饭时间在办公室泡方便面吃，又是碗又是筷子的。别人劝她买康师傅方便面，说碗面方便，一拆一冲吃完扔掉省事省力省麻烦。她幽着默说：“可不，碗面的价钱比袋面的价钱也麻烦得很哟！”她批评家里炊事员用洗涤灵用得太多，让炊事员不必炒一个菜用洗涤灵洗一次锅，说炒完几个菜一起刷就行了，这样可以省水省洗涤灵。在持家理财上，邓先群一点不比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们差。

部办范秘书老家的表妹来北京检查病，需要做CT，医院说要等半个月，可表妹单位只准了一个星期的假。范秘书跟邓部长说了。邓先群马上抄起电话，跟在医院工作的女儿求援：“兵兵，我们范秘书的表妹要做CT，你先替他挂号，把检查费先交上，明天一上班他们就去CT室找你碰头。”第二天一大早，邓先群就把自己的专车打发到范秘书家，接上范秘书和他表妹上了医院。检查完后范秘书知道司机一大早往这边赶肯定没吃上饭，就要请他到外边店里吃早点，司机忙说：“不用不用！部长已经给我准备好饭了，不信你看。”范秘书顺着司机手指一看，果然见车后边放着塑料袋装着的面包香肠。司机告诉他，这是部长昨天晚上就买好了的。

大年三十，作为群工部部长的邓先群自然是最忙碌的。她在忙完公务往家赶年夜饭时，已是晚上六点多钟了。在车上，她随口问司机过节吃几顿饭，

司机告诉她吃两顿，她一听马上说，这哪行？都是大小伙子，正是能吃的时候，两顿饭怎么能顶得住！她也顾不上回家吃团圆饭了，让把车开到副食商店买给司机们加餐的东西。大年三十商店关门早，跑了几个店都碰了门板子。最后只好在一家大酒店里花高价买了面包香肠送回到司机班。邓先群这才放心回家过年去。

有个退伍战士是个集邮爱好者，他在一张首日封上想征集到所有女将军的亲笔签名。这张首日封到了邓先群这儿，已经有点破了，邓先群一看就说，别让他费这个事了，剩下的我帮他找那些人签了算了。她一个一个地打电话，一个一个地找人签，直到首日封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女将军们的大名。

做好事虽然麻烦烦的，但做好事后的心情是愉快的。在这一点上，常做好事的和偶尔做好事的心情是一样的。但有时做了好事不一定能得到愉快的好心情，在这一点上，常做好事的和偶尔做好事的承受能力有所不同。常做好事的人心情会不好，但一般不会灰心，不会泯灭了继续做好人做好事的心；偶尔做好事的人就很容易想起中国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老话并被那老话打动：好心不得好报。

邓先群就做过这种好心不得好报的好事。

群工部一个刚转了志愿兵的司机，马上写信回去要用农村老家定了几年亲的未婚妻。那未婚妻气不过，在她母亲的陪同下，找到了群工部。

这样的事邓先群自然是要管的，而且在管的过程中完全抛开部长的身分。对那未婚妻和她的母亲，是以一个女性的身分，同情她们，替她们愤慨这种喜新厌旧的不道德的作法，尽心尽力地帮助她们。对那个志愿兵司机，则是以一个母亲的身分，跟他讲大道理小道理，苦口婆心。但那个志愿兵是铁了心，油盐不进。邓先群甚至都说出了这样的话：“你要是我的儿子，我非揍你不可！”

在教育帮助这个志愿兵的过程当中，回老家等消息的未婚妻沉不住气了，她给邓先群写来一封信。别看这个农村姑娘没什么文化，满纸错别字，但讽刺挖苦邓先群的话却都写明白了。她在信上说邓先群是这个当代陈世美的总后台，说这个陈世美之所以猖狂，都是因为邓先群这样的大官当他的后台大老板，等等。

部办的秘书们看了，都气坏了。说没见过这么没心没肝没轻没重的人。说怪不得那个志愿兵吹了她，吹得好！邓先群看了信却不生气，说：一个农村姑娘，没什么文化，也不会说话，但她说的都是她心里想的话，说心里话没什么可怪罪的。

那个志愿兵铁了心要跟她吹，宁愿不当志愿兵按战士退伍处理。在临走前，这个被撤了志愿兵的战士找到邓先群，真心实意地说：“部长，你这样处理我，我一点不怪你，也一点不恨你，你是个好人的，我心里有数。”

后来，那个被吹掉的未婚妻又给邓先群写信，一个劲地后悔上封信，给邓部长道歉，信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邓部长，这么时间长了，我一直都在内疚中，我曾对你产生的误解和程见我感到很不安，对不起部长，我错了，我不该对您说那些话，伤了您的心，不该不相信党，党领导下的军队，我希望您能原谅我……部长，我虽在千里之外，也不会忘记您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希望您能明白我的心，我向说的一切……（原文照抄，错字在内）

邓先群看了这封信，非常高兴，说：“对嘛，这就对嘛！她应该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军队。”

邓先群似乎很在意别人说她所在的政党，她不愿意听到她的组织的“不”字，她似乎是想通过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向人们证实什么，让人们信仰和追求什么……

邓先群是个真真实实透明的人。

真实地做人，其实是一种幸福。但不幸的是，世俗的人们很容易被社会这支巨大的彩笔涂抹得失去原本自我，变得令人真假难辨，交往困难。有人呼唤真诚，我想，其实人们是在呼唤原本那个真实的自我。

跟邓先群交往很轻松，这是每个愿意走近她、公平地不带任何偏见的人都能体会得到的。以我的感觉，她是一个真实得近乎于透明的人。跟她交往有一种轻松感和信任感。有时候，我竟奇怪地感觉到，跟她交往像跟我自己交往一样，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是那种完全不必设防的轻松感。我认为，这是基于人类对真实的放心，或者说是基于人类怕吃亏怕上当的自私的本性。明白地讲，跟她交往你既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她做人的原则，是不会让任何人吃亏，不会让任何人上当的！这一点，她真有古代大君子们那种谦谦之遗风哩，真的！

邓先群是那种“我就是我，我不是别人”的很有个性的人。自然她不会说出“我就是我，我不是别人”这样很学究气的话。但在她身上洋溢的那种真实的自我、自我的真实强烈地突出并说明了这句话。

邓先群节假日休息的时候，很爱打扮自己。她穿着大红的毛衣在大街上走的时候，神态自若，气质好极了。她甚至可以跟她的女儿换着穿衣服，只要她认为顺眼得体，她就大大方方、自自然然地穿出来。她鼓励群工部的女干部们大大方方地打扮美化自己。女干部们说：“哎呀，穿得太花哨了怕人家笑话。”邓先群把手一摆，不以为然地说：“不要听别人的，我怎么不怕别人说？我这么大年纪了都敢穿，你们怕什么！”又说：“女军人也是女人，女人爱美天经地义！”

群工部办公室的秘书们一般是下班就走的，尤其是女秘书。邓先群到了下班时间就赶她回家。但部长没走秘书怎么可以先走？这是常识性的东西。但邓先群不理睬这种常识，她挥着手一定要赶女秘书回家：“你别管我，我孩子都大了没有负担了，你比不了我，你别跟我耗！”其他部的人见了都稀奇，问：“你们部长没下班秘书先下班了，这是哪家的规矩。”女秘书大声笑着答：“这是我们群工部的规矩！”

她每年年初都让秘书提前征询大家休假的时间，组织安排好。有的干部工作太忙排不开，休不了假，邓先群也不表扬也不提倡。她说：“工作是干不完的，该休息你就休息，别多休了，也别少休了，按规定来！”但她每次都把自己的假期安排在年底，到了年底，又是年终总结，又是走访地方有关部门，作为群众工作部的部长想在这个时候休假，那是决不可能的。可她每年都这么报，因此她每年的休假计划都是落空的。她说：“过两年我就退了，到那时候有的是时间休假，天天休息，天天都是假期。”

群工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部领导外出不准迎来送往。这条规矩是邓先群兴起来的。她非常反感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多次说过：“大家一个部门工作，出几天差，送来送去的有这个必要吗？又浪费汽油又耽误工作，我们群工部不准搞这些没意思的事！”

开始几次，秘书认为送就算了，接接部长还是应该也是必要的，但接了两次，每次都把邓先群的火给接了出来，慢慢的，就放弃了这个多年沿续下来的老习惯。

一次，群工部在外地召开一个大型会议，北京去的首长比较多。回来那天，秘书考虑人多车多，怕乱了秩序乱了套就麻烦了，就跑到机场协助调度。邓先群下飞机，看见了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一点不客气地批评道：“说了多少次不让接送不让接送！怎么就是记不住呢？”秘书忙解释原因，邓先群这才把手伸过来跟他握手。回来的路上，邓先群拿出会议上发的小纪念品，给秘书，让他转交给夫人。秘书知道，这是邓部长在向自己道歉。道在机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批评错了的歉！

邓先群不提倡接送，也不提倡过年过节各家串门拜年。她在年前全部人员的会上，对大家说：“今天在这里，大家互相拜个年，过节就不要再跑了。累了一年了，好不容易有几天假，难得家里人都放假，大家好好跟家人团聚，高高兴兴过个年吧。自己部里就别那么客气了。不跑了，谁也不用跑了！”这是最好不过的！大家对历年过节东拜西拜的烦得要命，但又觉得不走不拜心里不踏实。这下好了，大家都不拜，就都踏实了，踏踏实实过个好年吧。

但部长邓先群却是要拜的。她说她不拜她的下级而是拜下级的老婆孩子，向她们道声辛苦。感谢她们一年来对群工部工作的大力支持。希望新的一年继续努力，继续支持。邓先群笑着说，她这不是拜年，她这是给群工部的家属们鼓劲打气哩！越是有老人的家，越是有病号的家，越是有闲难的家。邓先群越是要走到拜到。

邓先群的肾不好，是个慢性肾病患者。这是全部同志们都挂在心上的事。谁陪她到外地出差，谁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替邓部长挡驾，不让她喝酒。大家虽然不懂医，但起码的医学常识是人人都有一点的。酒对有毛病的肾是致命的。这一点，邓先群比任何一个都清楚。别人是了解，她却是体会！

她的爱人栗前明中将深知并深虑这一点。他知道酒对老伴的身体会有什么伤害。但他更知道老伴的品性和脾气。所以他经常把电话打到群工部：“麻烦大家替老邓挡一挡，多关照她一点。”

邓先群何尝就不想关照自己有病身体呢？但在某种场合，某种氛围下，她又实在张不开这个口。邓先群吃亏就吃在不会、也不好意思说“不”上。

有人跟我提到邓先群的两次醉酒。

一次是在内蒙。那次是她带着中央“心连心”艺术团到内蒙古大草原上慰问演出。看到少数民族兄弟端着银碗盛着满满一碗白酒，听着他们用本民族的语言唱着真挚的劝酒歌，邓先群就什么话也不会说了，只会恭恭敬敬双手接过那银色的酒碗，一口气把它喝干。少数民族兄弟看见这位女将军如此豪爽干脆，高兴得又唱又跳。唱着跳着变戏法似地又端上满满一碗酒。邓完群又喝……回到招待所，邓先群难受得掉眼泪。陪同的干事见她难受成这个样子，又心痛又生气，问她：“你就不能不喝吗？”她却为难地说：“少数民族同志这么盛情，不喝怎么行？那会伤了他们的心啊！”“唉、你怕伤了人家的心，你就不怕伤了你自己的身子？”陪同的干事气不过，顶撞了她。

一次是在一个海滨城市。原来这个城市的驻军跟地方政府一直疙疙瘩瘩的不怎么团结，在全国双拥工作的热潮中，军地双方领导高姿态地配合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时间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邓先群听到这个消息自然是非常

高兴。那次她到这个城市参加一个双拥工作理论研讨会，地方政府尽地主之谊请她吃饭。席间，地方的同志频频举杯敬邓先群的酒。那阵子她尿里带血，医生很严肃地告诉她，这次出差别人说破天也不能沾酒了，酒会要你的命的。她却把医生的话忘到了脑后，端起酒杯说：“别的地方的酒我可以不喝，这里的酒我是一定要喝的！”一口干了。地方的同志见状，知道她有酒量，但不知道她有肾病，就热情地一劝再劝，邓先群没办法只好一喝再喝。最后把自己喝得第二天开始浮肿。

那次栗前明中将真是火透了。他打电话把群工部的秘书好一通批评：“老邓在那个场合喝酒喝得命都不要了，你们当秘书的怎么就不劝她！”秘书听着副司令员的批评并不解释什么，只是在心里说：在那种场合下，哪容我们插话做主？邓部长一听人家保证这个保证那个，就高兴，一高兴命就给忘到脑后边了。

地方的同志到底给邓先群许了什么愿，让邓先群如此忘情，如此忘命？我问一同去的秘书，对方叹了口气，说：“嗨，还不是保证解决部队困难，保证把双拥工作搞好！”

我问我自己：如果我的肾有毛病，如果有人跟我许那些愿，我会跟邓先群那样不要命地喝酒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不！而且是决不！

那天，邓先群的司机，那个叫马新兵的胖乎乎的上士，突然打电话给我，说给我写了一封信，让人转交给我。我觉得奇怪，我采访过这个老实厚道的陕西农村兵，他在采访中显得很紧张，说话一直结结巴巴地不流畅。我知道那是由于他没接受过采访，不适应这种颇为拘束的谈话方式。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从下午二点多跟我谈到将近五点，我觉得该说的似乎都说了，尽管说得结结巴巴的，但我能听出他对他首长的敬佩和感情。我想不出他还会有什么事需要采取这种郑重其事的方式。我收到信，拆开看完，不禁深深被这个质朴的士兵打动了。

他认为他的首长实在太好了。实在应该好好地宣扬宣扬。他实在怕那天他的紧张令他说的不够全面不够彻底，影响我对他首长的宣传。他在信上一笔一划认认真真地给我回忆了几件事。像“只要我出车误了饭，都得让到家里去吃，而且和家里人一起吃。不分你我。”像“1992年5月，我得病住院，是她坐公共汽车从家里带着水果和用的东西，留钱给我用。”像“她对拥军模范刘金鱼、庄印芳，英雄模范徐洪刚等，几次来北京开会，参加春节晚会，都要自己抽时间去住地看望。有时把车留给他们用。”等等。

我认为这封战士的信中最精彩的部分不是按我采访中重点强调的“说事情，说越详细越好的事情”，而是他最后的一段话——

总的说来，这几年为邓阿姨服务，感到非常愉快，是我从她那里学到了不少为人处世和工作方法、生活等等，许多好的东西。是我的思想觉悟也有了提高，我觉得她是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这样的东西，我在连队带兵时看得多了。战士们交上来的心得体会，思想汇报之类的东西几乎千篇一律，连同用词和错别字。他们的东西是一种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学来的八股，一种比八股文章更规范的连队八股。但这个叫马新兵的上士，他写的这些东西，是流自他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因而，这封信显得格外可爱，连同他写的错别字和不通顺……

这篇文章脱稿的时候，群工部办公室送给我一封表扬信，是表扬邓先群部长的。我想不出，这么大的干部还能收到表扬信！我按照信中的地址打电

话去采访，我又被感动了一次，深深的。我不想形容那个老干部的遗孀在电话上泣不成声的哭声，那哽咽苍老的泣声至今令我心中涟漪不止。我只需要把她的信公开，我想，这个孤寂无助的老夫人的笔比我的笔厉害得多，可信程度也强得多，我只需公开就行了。

敬爱的邓部长：您好！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您致以衷心的问候和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我和您素不相识，也无任何私人关系，只知道您是我们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为了我的孙女叶思思升入初中上学问题遇到了困难，本月十二日上午我冒雨去国防部长楼找您，经门卫传达室允许只能先和您的秘书通电话，没想到通了话之后，我报了自己的身分，说明了来意，您马上说我就是邓部长，有什么事尽管说……

我向您简要说明了要求解决的问题等情况，您非常亲切而果断地说，这个问题你仍然去找于干事，我也给他打电话，您又问了我的电话。没想到短短两三分钟通话，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就给我解决了问题。本月十五日我的孙女就按时办了入学手续。

通过这件事情，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感慨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用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对您的感激之情……尤其是后来听于干事说，邓部长给他电话指示精神：“孤儿寡母，尽可能予以关照等……”我听之后，几个夜晚难以入睡，泪流不止。我理会这不是一个寻常领导人的指示，不是一般领导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感情及水平……我虽未能亲自看到您的身影，可我脑海里立即出现了一位像邓颖超老大姐的形象。您也是那样一位精明、果断、热诚、慈祥、和蔼可亲而可敬的老大姐、老八路首长的形象。您关心群众疾苦，急群众之所急，您对老同志有浓厚感情，您真诚关心同情老干部的遗属、遗孀，给了我们以厚爱；把党的温暖及时送到了我们的心坎上。这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万余元的上学问题，这不仅仅是用金钱和数字能够估价的意义！这是邓部长发扬了党和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我们全家三代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传统教育，从我们心底里万分感谢，对邓部长肃然起敬！

为此事，我对子女还专门进行了教育。要不忘邓部长对我们的关怀照顾，不忘党的恩情。并教育第三代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好本领，报效祖国！我们一定要继承革命先辈的遗志，认真学习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更加努力奋斗！

也感谢直工部管理处的于殿民干事，他认真执行邓部长指示，积极认真地工作，及时圆满落实问题的解决。

在此我代表全家三代人再次深深地、真诚地感谢邓部长对我们的热诚关怀和厚爱！并向您致以崇高的敬礼！并祝愿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总政黄寺干休所军职干部叶绍圣遗孀

陈勇敢上

1994年7月15日

我要给这篇文章划句号了。

从动笔到现在，五六天的时间，我跟少将邓先群似乎一起度过了大半辈子。我沿着她岁月的足迹跋涉了一遍，竭尽全力追赶着那炽热而真挚的心灵。夜深人静的时候，一盏台灯照亮一方天地和我笔下的邓先群，那双真诚而坦荡的眼睛就在我的稿纸上静静地凝视着我，耳边慢慢地竟有了她那爽朗的笑声，笑得痛快，笑得舒畅。那“格格”的笑声在很深的夜中，捣得我的耳膜

痒痒的，心渐渐地随着这笑声温暖起来。

我想叫一声你的名字，像神交已久的朋友那样叫你一声邓先群！此时的我，对你已全然没有了初见你时的拘束和窘迫。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那些家庭、地位、年龄、军阶等等，已在我的脚下像烟雾般地散去，无影无踪的像原来根本就不存在这些东西一样！其实，只要走近你，就会发现，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谢谢您，邓先群。也许你认为你自己很平凡，但我却从你的平凡中感悟到许多东西，一些人生的很深很深的东西！

祝愿您，邓先群。祝您一生平安。您应该一生平安，好人应该一生平安！

将星下的康乃馨

冯抗胜

很难把她与“将军”这个极富力度的称谓连在一起。即使年届花甲，她依然美丽，而且天生弱质，使她更具有一种连女人都无法抗拒的魅力。只有当她震怒，威威然面呈雷霆之颜时，你才会猛然意识到，她毕竟是那位曾叱咤风云的贺龙元帅的女儿。她的骨子里，有着龙的血脉！而这种态势较为罕见，平时的她总是笑眯眯地听你讲述什么，或是慢声细气地向你陈述什么。

人们通常以为，能碰巧出生在一个元帅之家是幸运的，尤其是在当今中国，这种概率连亿分之一都不到。但她却天生不幸。

1935年11月1日，湖南桑植县冯家坳的一户农民家里，传出了一声婴儿的啼哭。

“一朵花哟！”

房东大嫂高兴地把刚刚诞生的孩子包裹好，递给年轻的母亲。红军女战士蹇先任此刻却全然没有喜色。她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和忧虑攫住了。她惧怕，惧怕怀中这孱弱的女婴，会像她在游击区诞生的姐姐红红一样，倏忽间便撒手而去，只留给母亲一个惨痛的梦！她忧心如焚。她知道，部队很快就要北上，她无法预测她将带着这个刚刚出世的婴儿爬多高的雪山，趟多深的草潭。潜意识里，她还有一丝不安。她知道，丈夫多么希望得到一个能同他一样骑马打仗的儿子！房东家的大嫂，一个月前刚刚生了一个儿子，她好生羡慕。

“祝贺副主席得了一门迫击炮！”

译电员拿着这封刚刚译出的王震拍来的电报，兴冲冲地往贺龙住处跑来。

贺龙刚打了个胜仗，正牵挂着后方待产的妻子，见有后方消息，便迫不及待地问：“生了没有？”

待看完电报，他乐了，周围的人全乐了。

“快，你给起个名字，你是红军里的文化人！”

贺龙将电报递给了肖克。这位后来成了他的连襟的肖克，笑呵呵地说：“既是打胜仗时生的，就叫捷生吧！”

“好，就叫捷生！”一致通过。

贺龙赶回后方，到了家便抱过小捷生笑着摇着。他好生奇怪，她怎么这么轻，轻得比不抱什么还轻。这小小的人儿，小眼睛，小鼻子，小耳朵，小嘴儿，长得还挺全乎，只是太小了，太小了，小得那么好玩，那么有趣，他情不自禁地逗着她：

“好一个小捷生，好一门迫击炮，你长大了，可要帮老子打胜仗噢！”

房东大嫂在一边笑嘻嘻地开玩笑：

“跟您把孩子换了吧，我那可是个男娃娃，”

“那不行，孩子还是自己的好！对不对，我的蹇先生？”

蹇先任也笑了，潜意识里那一丝不安，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拂去。看到

贺龙那么高兴，她也受到了感染和鼓舞，恢复了她以往的坚强与自信。

蹇先任出生于湘西北兹利县，父亲蹇承晏挑靠勤俭持家，开起了一个小杂货店，兼设煮酒、熬糖、染布作坊。蹇承晏先生深明大义，关心国家安危，支持儿女读书求学，追求真理。

1926年，蹇先任经弟弟蹇先为介绍加入共青团，第二年，在长沙读书时，从事学生运动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姐弟二人均遭反动当局通缉。先为辗转至桑鹤边界贺龙红军部队工作，先后担任红二军团士兵委员会主席、湘鄂边红军第一梯队参谋长、湘鄂边特委巡视员，1932年被敌人杀害，为革命献出了年仅21岁的生命。

蹇先任也于1929年参加了红军，在贺龙部队担任文化教员。她的到来，使众多将士眼睛猛一明亮。正值豆年华的“洋学生”蹇先任天生丽质，敏慧干练，犹如一只凤凰飞到了贺龙的身边。她教贺龙文化，也讲政治，讲时事。贺龙大为惊讶，女人里，尤其是这么年轻漂亮的女人里，竟还有这般有学问，有见识的，他被深深地吸引了。这条硬汉，见了蹇先任便有点紧张，总是恭恭敬敬地称呼一声“蹇先生”。而贺龙，在蹇先任这般年轻姑娘的心目中，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啊。不久，两人便结了婚。

蹇先任、蹇先为姐弟二人的投身革命，使蹇承晏先生成了反动当局手里的一张牌，搓过来，揉过去，先是威逼利诱，要他把儿女找回，或登启事与儿女断绝关系，见蹇老先生软硬不吃，便将他关进大牢，掳抢了他的店铺。放出来后，他的三女儿蹇先佛，次子蹇先超也向他要求出去参加抗日工作。他说，要抗战就到你哥哥、姐姐那里去。国民党是不抗日的。还说，我们家搞共产党了，就搞共产党，再不搞其它什么党了。1934年12月，红军解放慈利县城后，贺龙到蹇家拜望岳父岳母时感慨地说：

“先任、先为在红军里，连累你们跟着受苦、真难为你们了！”

蹇老先生不仅不发一声怨言，不向女婿伸手要一点支援，反而把家里的一头猪杀了慰劳红军，并毅然将17岁的先佛和14岁的先超送去当红军。然后，他自己便远走他乡躲避起来。先超后来牺牲在长征路上，蹇先佛则与红军秀才肖克将军结为伉俪。

1935年11月19日，红二方面军从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出生不到20天的贺捷生，成为这支出征大军中最小的成员。

无数的作家艺术家曾调动一切文学的、艺术的手法，试图描绘和再现那次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壮举。她实在是太诱人了，太值得去探讨、去研究、去讴歌、去赞叹了！与这么宏伟的战略大转移相比，贺捷生就显得太微小了，微小到几乎被大人们一不小心给抹掉。

还没坐满月子的蹇先任，把小捷生成在一个箩筐里，背在身上，便踏上了茫茫征途。有一次过敌人的封锁线，蹇先任怕孩子的哭声会暴露部队行军的目标，便用衣服紧紧地捂住小捷生的头，等打开衣服时，捷生的小脸已给憋紫了，几乎被憋死。还有一次是突围。贺龙把小捷生裹在怀里，像当年赵子龙裹阿斗似的，跃马扬枪，一路冲杀。待到突出重围，他感到一身轻松，轻松得有点不对，一愣神，忽然想起了捷生，低头一看，怀里的孩子没有了。贺龙着了急，掉转马头，沿来路回去寻找。原来捷生已经被颠到路边去了。幸亏一位老乡路过，拣到了她，才交还给贺龙。算捷生命大，她居然活过了长征。到陕北时，一岁的小捷生又黄又瘦，佝偻着小小的身子，可怜得像只

蜷缩的猫，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主席的林伯渠，好生心疼，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只奶羊送给蹇先任，才使这母女二人的脸上，逐渐有了点血色。

接着是伟大的抗日战争。伟大的背后，总有巨大的艰辛。

贺龙担任了八路军 120 师的师长，整日在前方作战，戎马倥偬于枪林弹雨之中，无暇顾及小女儿的生存。蹇先任在军委总政治部当宣传干事，经常下部队。她要强，不愿意因孩子影响工作，便把小捷生寄放在边区的老乡家中。

一次贺龙回边区开会，顺便来看小捷生，只见他心爱的小女儿被一根小绳拴着，小脸脏兮兮的，还得了大肚子病。刚会讲话不久的小女孩，见了穿军装的男人便喊爸爸，见了穿军装的女人便喊妈妈。贺龙这个铮铮铁汉心里难受极了，抱着孩子不知如何是好。王震、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等同志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把这个从长征路上活过来的小女孩送到前方来，由他们安排照看。毛泽东心细，让贺子珍征求一下蹇先任同志的意见。蹇先任正为无法照料女儿而揪心，听到这个意见，非常高兴，立即同意。毛泽东让廖汉生同志找的车，将她们母女二人搭乘到陕西阜平的庄里镇。

“这是我小时候跟父亲在一起最长的时间，大约有十个月左右。白天，我就在司令部的院子里自己玩，晚上，由被服厂的女工带我去睡觉。父亲打完仗回来，就爱逗我玩。有时来了客人，他会把我挟在胳膊底下，给客人倒水。后来，就把我放在一个老乡家里。父亲有空就来看我。有时，他会带我去骑马。他总爱拿胡子蹭我的脸，我痒得格格笑，父亲就高兴地哈哈大笑。”

这种快乐的日子不久便结束了。战局越来越紧张，贺龙也越来越繁忙。经过一番筹划，贺龙决定把小捷生托付给两个跟随他一起参加南昌起义的老部下，也是他的把兄弟，带回湘西老家抚养。他对这两个把兄弟说：

“我只有两个要求，你们一定要做到：第一，不要给孩子改名字。孩子住在谁家，就跟谁姓，但不要改名字。第二，一定要让孩子受教育，学文化。”

“走的那天，父亲到老乡家里来接我。我以为父亲又来带我骑马，高兴地扑进他的怀里。父亲像往常那样，用胡子蹭蹭我的脸，痒得我格格直笑。但是父亲没有笑。他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骑在马上，慢慢地兜圈子。天，突然下起小雨。父亲一直没有说话，好像全然不知。我有点害怕，似乎意识到了一些什么，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贺炳炎叔叔不知从哪里听到了消息，跑来一把抓住父亲哭喊：‘你要让孩子去送死啊？！’父亲说不出话来，猛地将他甩开，策马狂奔……”

寄人篱下的生活，使这个聪明的小姑娘从懂事起便明了自己在家庭里的地位和与其他孩子的不同。她小心翼翼地生活着。家务事她抢着干，吃饭时，她却从不与养父母家的孩子争，一个人默默地站在门后，等大人喊她才上桌。读书时，她比其他孩子都用心。乡间私塾，学生大抵没有书，只先生有。先生在讲台上教一句，学生们便背一句。满课堂的孩子，晃着小脑袋望着天，唧唧呀呀地背着，犹如一片雏鸟的啾啾。这就叫背望天书。也算是中国文化传播和继承的一种特有方式。

从读书时，她便从养父母处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这使她幼小心灵里那种淡淡的自卑感中，又生长出一种冷冷的自傲。她听养父母说过父亲的两点嘱托。她牢记着自己的名字，她更认真地读书，将来背给爸爸听，让爸爸高兴。

她憧憬着未来，在心里编织着美丽的故事。

湘西的山区，贫穷而潮湿，再加上逃荒逃难，使捷生的童年浸透了苦寒。没有足够的营养，没有充分的阳光，先天就不足的小捷生，后天又得不到良好的调养，她小小的身体，总也发育不起来，像一棵长不大的小树，瘦瘦矮矮、病病怏怏。直到解放后，贺龙和蹇先任才把她从湘西找回来，带到一直关心她命运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面前。那时，她已经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的少女了。

蹇先任把女儿送到北京医院治病。回到父母身边的一切憧憬和喜悦，很快被得知父母离异的消息荡涤尽净。这个本来就不爱说话的少女更加沉默寡言。在北京医院某一侧的四间相邻的病房里，分别住着史良、齐燕铭、廖沫沙和贺捷生。三个大人都疼爱这个美丽忧郁的坐在轮椅里的姑娘。他们在一起商议，如何能使她快乐。史良提议，给她找点书来读。于是，他们部分头去找。很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绞刑架下的报告》以及《雷雨》、《复活》、《怎么办》、《安娜·卡列尼娜》、《牛虻》、《红楼梦》等大部头的中外名著源源不断地送到捷生的床头。她顷刻被淹没了，在文学的海洋里快乐地游弋。她酷爱文学和历史，19岁那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她选择了青海。她向往着那里的
原始洪荒。她想去过一种属于自己的
生活。在那里，她寻找到了自己的人生
价值。

她多么热爱北京大学。倘徉在燕园的未名湖畔，贺捷生的心情恬淡而安详。她多么喜欢自己的专业，历史给人多少深邃的思考，又赋予人类多少机敏和智慧。但是，她没有读完便离开了。她是主动报名支边去青海的。社会对她的这一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把此举看作是思想觉悟高的表现。只是，她离开北京时，依然是一个忧郁的姑娘，似乎比从前更加忧郁。人们总是在该重视她的时候忽略她，而在该忽略她的时候，又过分地重视她。她决心离开了。她选择了青海。她向往着那里的原始洪荒，她知道那里有一片平静的湖，湖面上飞翔着自由的鸟。她想去过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她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

高原的枪声，顷刻间便粉碎了女大学生浪漫的梦。贺捷生和他们那一批支边的知识分子坐着一辆长途车开进青海。开车不久，北师大的青年讲师孙昌令晕车，捷生便主动与他调换了座位。那人尚未坐稳：一发冷枪打来，打碎了他的眼镜，打伤了他的额头，鲜血和着碎玻璃碴流满一脸。车上人大呼：“快停车，打伤人！”

司机理都没理，反而加大油门快速飞驰，一直开到西宁车站才停下来，边擦汗边告诉大家，这是解放前马匪（马步芳、马步青）的残渣余孽至今仍在不时骚扰。司机是从朝鲜战场转业的军人，有经验，如果当时停了车，后果不堪设想。假设若捷生当时没有与那位讲师调换座位，还会有我们今天的故事吗？

支边大军来到西宁。当时的西宁，简直像是农村的集镇，野狗满街乱窜，四周十分荒凉。捷生住的那面黄土高坡，只有孤零零的三棵树。一切从零开

始，他们必须品尝创业的艰辛。

在青海生活，对于北京来的青年人，首先遇到的是高原反应。捷生先天就发育不良，高原反应也就比别人来得严重。她常年浮肿，鼻子出血，周身不适。紧接着，是每个月只有15斤的口粮标准带给人们的饥馑。捷生饭量倒不大，每天半斤粮食和着菜和树叶也凑合了，但她依然与大家一起背起粪筐，到处去拣粪，用拣回来的粪和着削成一块块的土豆拌合在一起埋入地下，晚上还要派人轮流看守，否则，搅拌了大粪的土豆块也会不翼而飞的。贺捷生终于累得吐了血，多少人来看她，他们只知道，她是来支边的最年轻、柔弱的一个女孩子。人们怜爱她，关心她，给她送来湟鱼——当时叫救命鱼，还送来三颗北京带来的奶糖，捷生含着甜甜的糖，却流出了苦涩的泪。

最艰难的初创阶段过去了，贺捷生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屋。中午，她须踏冰履雪，去几里外给自己的小家挑水吃。中午水好，也暖和些。晚上，她须在摇曳的煤油灯下备课，去教那些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民族学院的学生。她是学历史的专门人材，她还要参与编纂西北地区及青海省的地方志与民族史。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她过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一个比内地的普通人艰难得多的边地的普通人的生活。青海省委书记袁任远同志终于得知贺龙元帅的女儿在青海，立即派人将她寻到家中，送给她一些鸡蛋和奶粉让她补养身体。她很感激，但临走时，又悄悄地把这些东西留在袁任远家。她知道，那时已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省委书记也跟大家一样日子不好过，她不愿意去享受别人的那一份营养品。

六年转瞬即逝。在青海的六年，虽然生活艰难一如童年的湘西，但捷生感受到一种充实。她有自己事业，有精神上的追求。她在青海入了党，成了业务骨干，得到了人们的承认和尊重。她还交了一大批朋友，其中许多人至今与她保持友好的情谊。她终于在这里寻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还有什么能比主宰自己命运的生活更美好、更丰富、更富有质量呢？1985年，她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西部采风重新踏上这片土地时，竟然感受到一种重返家园的喜悦。她挥笔写下了散文《假如我还年轻》，文中，她深情地把青海称做是自己的第二故乡。青海和青海人在她心中永远占据着一席重要的、不可迁移的位置。

那场“大革命”夺去了她父亲、
丈夫、女儿的生命，留给她的，只是
医生用手术刀在她脖子上刻下的一条
永远摘不掉的“项链”。

如果说，在青海的六年，贺捷生周围的人几乎都不知道她有什么特殊的身分，那么，到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她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没人不知道她是贺龙的女儿了。这不是出于她个人的张扬，她不是那种爱张扬的人，这是一场无法逃遁的劫难。

当一个民族的灾难降临时，首先遭到扑杀的，必定是这个民族的精英。贺龙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林彪一直把他当做自己势均力敌的对手，在林彪心目中的黑名册上，贺龙名列前茅！尽管毛主席在跟贺龙谈话时，当面宽慰过他：“我对你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讲过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尽管周恩来总理亲自把贺龙接到他家中保护起

来，贺龙还是被林彪四人帮用“大土匪”、“大叛徒”“二月兵变的黑干将”等莫须有的罪名逐出了中南海！在西山脚下的一间平房里，贺龙一家完全落入了林彪四人帮的魔掌。他们食不果腹，衣衫破旧。贺龙用的一块毛巾只剩下了四个边。有一段时间，在北京郊区泉水淙淙的西山，贺龙居然没有水喝，渴极了只能用茶缸和脸盆接屋檐上滴下来的雨水……这是共和国的缔造者，打江山的一代天骄啊！

贺龙元帅终于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他们给这位患有严重糖尿病的73岁高龄的老元帅拼命强行注射葡萄糖液，一夜之间竟输入了2000毫升，老元帅在临终前清醒地意识到“他们要害死我”！

在西山时，贺龙面对层层山峦，曾经那么强烈地思念自己的儿女，而此时的贺捷生，已经在劫难逃。她被关押在一处不知名的地方罚苦役劳改。本来就无比柔弱的贺捷生，在这里受尽了磨难，身体慢慢地垮掉了，白血球减少，全身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为了对付严重的甲状腺瘤，医生用手术刀在她脖子上刻下了一条永远摘不掉的“项链”！

而心灵上的伤痛更为惨烈：继父亲之后，与她相濡以沫的丈夫因受她牵连而被迫害致死，秀丽聪慧的二女儿因无大人照料，被冷酷的现实生活逼上了绝路……所有的不幸劈头盖脸地砸向这个无助的女子。她的心，已经被血浸泡的仇恨燃成了一团烈焰！

大仇恨，必然孕育出大反抗。1975年4月，贺捷生刚一解放，便上书毛主席，要求寻找贺龙元帅的遗骸，为父亲平反昭雪，补行葬仪。不久，她便得到通知，贺龙的骨灰安葬仪式将秘密举行，施行“五不”，即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组织治丧委员会、不公开报道、不进行宣传。很明显，这是四人帮从中作梗！贺捷生大怒，拍案而起，她决不善罢甘休，再次上书毛主席，并请邓颖超同志转呈父亲的生前好友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看到信，气得手都颤抖了。他亲自给毛主席写了信，将贺捷生的信附在后面，并抱病参加了贺龙元帅的追悼会，亲自为贺龙同志致悼词，字字千钧，掷地有声！贺捷生胜利了，她抱着总理的残臂，热泪滂沱……

在那个夏天，北京的文艺界活跃 着一个秘密的“小集团”、这个“小 集团”的首领，是一个带火的女人

父亲的平反，使贺捷生恢复了与中央某些领导同志的联系。她当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看到的，是被“四人帮”篡改的历史。开国元勋，革命前辈被说成是“反动路线”、“三反分子”，而一小撮野心家，则被描绘成“旗手”、“正确路线的代表”，她是学历史的，决不能容忍这种歪曲和颠倒。她开始为一些老干部的平反昭雪四处奔走。

人们不会忘记，十年动乱的起始，便是从江青对文艺界的发难作引信，“文化大革命”恰恰是革了文化的命。除了八个样板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音乐，没有舞蹈，没有曲艺，没有电影，堂堂五千年文明古国，呈现出一个断带，一片荒芜！直到1975年，天边才出现了一丝曙光。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人们几近枯竭的心，开始了生的期盼。

向“四人帮”开战，需要炮弹；中央领导同志要向毛主席反映真实的情况，需要有人提供材料。他们对贺捷生这个经过了大风浪考验的老战友的爱

女，给予了极大的信任，知道她有一批文艺界的朋友，便请她联络几个可靠又不扎眼的人，帮助整理文艺界的材料。应当感谢中年作家杨匡满，他用他的如椽之笔，为我们记下了发生在那个夏季的事情：

贺捷生找到了范曾。范曾当时是革命历史博物馆一个普通的美术工作者，没有多大的知名度，但功底深厚，才华出众，是一个热血青年。对时局的共同看法，使他们两人很接近。

贺捷生没有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

“我需要了解一些文艺界的情况。江青作恶多端，国务院的领导同志需要掌握实际材料，以便在会上提出问题，同那些人摊牌。”

“太好了，是该收拾他们了！只是，材料能够直接反映上去吗？”

“可以，但必须准确，详细，决不能陷国务院负责同志于被动。”

“那好，我可以提供美术界的情况，其它情况，我可以找几个朋友一起凑。”

“你这些朋友可靠吗？”

“没问题！我要找的人，都是‘风云级’的朋友。”

贺捷生笑了，她知道，何为“风云级”。有的朋友只能谈风光，有的朋友只能谈风味，有的朋友可以谈风格，而最高级的朋友可以谈风云、政治风云！

新源里范曾的家，就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场所。这是一个两间一套的小单元，老人、孩子三代同住，十分拥挤。这一天，张锲和韩瀚先到，贺捷生和白桦后来。张锲和韩瀚对贺捷生是“久仰”而未曾谋面，而贺捷生已从范曾那里了解了张锲和韩瀚的一些情况。

张锲人高马大，看模样就是一个憨厚老实的人，可是1957年反右时，竟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右派，工资一下降了七级。以后的日子便可想而知了。他拉过粪车，种过菜，扛过二百多斤的麻袋包，还当过兽医。最困难的时候，曾住在一间废弃不用的厕所里，以马料充饥。亲身的遭遇，使他对极左路线深恶痛绝。他平反后，因创作上的才能，被破例提到省文化局搞剧本创作，当时正借调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改本子。

韩瀚是五短身材，架着一副眼镜，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现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当记者。文革初期，他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革命”洪流，对江青崇拜得很，以为是毛主席的化身，他曾撰文歌颂《红灯记》。应当说，对江青是有功之臣。但他毕竟是党培养出来的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不光有热情，还有头脑。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由不理解到不满意直至破口大骂。他与范曾曾神交良久，见面之后，又因政治观点的一致，很快成为密友。

捷生与张锲、韩瀚交谈之后，甚为满意，便很快将话锋转向正题：

“中央负责同志指示，要站在全党的角度检查一下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要搞‘百花齐放’，不要搞‘一花独放’。我们要提供的这个材料，不要加主观分析和马列语录，只要把事实原原本本地写下来就行。事实部分也不能只是你们几个人知道，知道的人要比较多。事实越具体越好。比如，拍了几部电影？效果如何？让事实本身说话。反映情况的同志，政治上要可靠，要熟悉文艺界的事，但不要找知名度太高的人。知名度太高了，容易引人注目，行动起来不方便。”

部署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捷生的语气是沉着而低缓的，目光里凝聚着父辈的坚毅，也闪烁着父辈的智慧。那四个人，有的比她年长，有的比她年

轻，此时，却怀着一种虔诚和敬佩注视着她，这是前进的指令，冲锋的号角，他们知道，他们将从事的，是一项神圣的工作，当然，也危机四伏。

“从现在起，你们的行动就不自由了，整理材料的过程和送材料的路上，什么意外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每个人都对这个战斗的集体负责。如果有人不想干，不要勉强，但希望你们一定要保密。”

这是一份至高无上的信任，又是一种生死之托。四个人都是从磨难中走过来的，为了事业，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他们豁出去了！

他们不知道，贺捷生在布置任务的同时，已经把最大的危险留给了自己。所有要上送的材料，都由她和她的大女儿贺来毅重新抄过，如果一旦被查抄，那么，按照笔迹，抓的只会是她们母女二人。那一段时间，贺捷生的身上总带着一只打火机，当然不是为了吸烟，而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焚毁随身携带的材料。她成了一个带火的女人。

有一次因材料要得急，来不及重抄了，只好把张锲写的一份关于《海霞》的材料直接上报，不慎落入了江青之手。贺捷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女儿和一位老战友的儿子一起去找韩瀚，让他通知张锲迅速转移。她自己则抱着电话，打了一下午，到处找张锲。待韩瀚找到张锲时，已是午夜一点。当夜，韩瀚让张锲住到他家来，两人一直谈到天明，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韩瀚是诗人，构想了一幅壮丽的场景：

“我希望是枪杀。地点就选在天安门广场。我可以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万岁！’从容就义。”

张锲比他深沉：

“为什么要我们死？我们要迎接胜利，让他们完蛋！看不到胜利就死也太亏了！”

为了安全，贺捷生建议让张锲离开北京一段时间避避风头。送行的时候，他们被一种沉重的情绪压抑着，说不出话来。只有14岁的小来毅天真地说：

“张叔叔，放心吧，如果你们被抓走，我会在外边救你们！”

这个像她妈妈一样秀丽、纤细的小姑娘，也像她妈妈一样过早地成熟了。“文革”中，她把大人给她起的“向阳”这个名字，改成了贺来毅。她把外公最尊敬的领导和战友周恩来、陈毅的名字揉在一起，重新为自己命名，表示了一种反思，一种“自有后来人”的意志。她走到张锲的面前，递给他一张纸：“张叔叔，送你一首诗做纪念吧！”

张锲打开一看，是小来毅抄录的恽代英烈士的那首有名的《狱中诗》：

浪迹江湖忆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拚忧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

张锲顿时湿了眼眶，咽了喉咙。

1975年的7月26日，是贺捷生最高兴的一天。她让范曾把“小集团”的几个人都找到东风饭庄二楼，她要请他们喝酒，吃北京风味烤鸭。他们几个都猜出了有喜事，一个劲儿地追问，贺捷生只是笑眯眯地说：

“不吃光喝光，我是不会说的。”

几个大小伙子便傻呵呵地快乐起来，不一会儿，满桌的酒菜一扫而光。

“出去走走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他们沿着东华门的护城河漫步。贺捷生乘周围没人时，压低了声音告诉

他们：

“毛主席昨天在张天民的申诉信上做了重要批示。”“真的？！”

他们高兴地跳起来。他们知道，这正是贺捷生通过白桦，找到张天民，动员他给毛主席写的申诉信。此信写好后，又由贺捷生通过胡乔木转呈邓小平，并通过另一渠道直送毛主席。毛主席对《创业》的重要批示，无疑是对江青把持的文艺界的一个有力打击，也是对这些勇敢、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褒奖！

“中国有希望了！”

“江青要完蛋了！”

周围的行人诧异地注视着这群欣喜若狂的中青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啊。在那个阴霾雾瘴的岁月，正直的中国人几乎都不会笑了。

继《创业》之后，他们找了著名导演谢铁骊，整理了《海霞》的全部材料，找了美术界的李苦禅、黄胄、黄永玉等著名画家了解了所谓的“黑画展”；他们还了解了曲艺界“陶钝事件”的真象；音乐界的“无标题音乐”……一份份重要的报告，通过贺捷生之手重新誊抄上报，为中央领导同志对“四人帮”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文艺界的复苏，又使大家感受到了丝丝暖暖的春意。贺捷生和她领导的“小集团”正是那报春的雁阵，她们把大写的“人”字，排在长空！

当年那个“小集团”的主要成员，如今都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张锲以他的剧本《祖国之恋》和长篇报告文学《热流》，奠定了在文坛的地位，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白桦的《曙光》和《今夜星光灿烂》等作品使他作为作家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当年。提起韩瀚，人们便会想起他那首讴歌颂张志新烈士获了大奖的小诗：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使所有的苟活者，
失去了重量。

范曾经过了大起大落，去国归国，弯弯曲曲地走到今天，在他亲手创办的某大学东方艺术系落脚当了教授。

还有我们的小姑娘贺来毅，北京大学毕业后，只身一人跑到美国去读书，六年时间，拿到了一个硕士一个博士学位，还有很好的工作。她有自己的洋房、汽车，有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环境，可是她学成之后毫不犹豫地回国了，现在军队的一家公司里当上了“贺小总”。最有趣的是，她嫁给了一个我从小就认识的管我叫姐姐的小老弟。而来毅一向是叫我阿姨的。两人见了我谁也不愿改变称谓，便“姐姐”“阿姨”地叫起来，真是乱了套，把我们都快笑死了。

而贺捷生，则重返军营，重操旧业，成为共和国人民军队中的巾帼儒将。

贺捷生重返军营的第一站，是我
供职的一家军队报社。于是，我可以
从近距离来了解她了。

我认识贺捷生，是在她重返军营之后。

说她重返军营，是因为她早在1950年就参了军，应当算个老兵了。有朋友开玩笑，说她的军龄是不是应当从长征时算起。因考取北大她才离开部队。十年动乱结束后，她因工作需要回到军队，到一家军队报社当编辑。我当时正在这家报社供职。她的到来，使报社有了两名女编辑，领导便将我们俩放在一起，她负责政工报道，我仍管我的文艺、文化副刊，同属一科。我们俩办公桌相对，中午就在一间宿舍里午休。

说实话，如何同她相处，我是认真想了想的。按职业习惯，我愿意接近她，了解她。她肯定有故事。作为同事，我又必须维护住自己的尊严。可能是偏见，我总认为，像她这种身分特殊又生得美丽的女人，一般都骄横。那时，我对她实在一无所知。

从外表看，她绝不骄横，而且恰恰相反，体态纤细柔弱，面目秀美端庄，尤其是那弯弯的眉眼和微微上翘的嘴角，组合成一幅总在微笑的模样。那一年她已年近半百，光润的黑发和白皙的肤色，使她看上去像是三十刚出头。她举止文雅，待人和气，说起话来，慢声细气，总像是底气不足似的。很快，她便同大家混熟了。

一天中午休息时，她从包里取出一条白底素花很淡雅的裙子递给我：

“试试看，合不合适。”

“是给我买的？”我很惊讶。

“是给你做的。”

“谁做的？”

“我做的呀，看你，那么热的天，总穿一身军装，你还年轻，应当穿得漂亮一点。”

我接过裙子试了试，天哪，就像是量过尺寸似的，正合适！她满意地打量着我说：

“我眼力不差吧？”

“你居然会做？！”

我真是觉得不可思议，内心里生出一片感动。

不久，她带我去采访黄苗子。那时的记者不像现在那么神气，车接车送，最不济也能给点车马费打个面的。我们两个中年妇女，挤了半天公共汽车，又穿过好几条胡同，待找到黄苗子家，他又临时有事出去了。捷生建议到附近的北京饭店去看看范曾，范曾当时正住在那里。我略一踌躇，便同意了。我们安步当车，到了北京饭店，范曾又不在。那天天气闷热，辛苦了这半天，我比捷生年轻，身体也好，已感到呼吸不匀，腿肚子发酸，捷生的气色更显得疲惫。我建议：“去喝点冷饮吧，我请客！”那时还不敢轻言请吃饭，尤在北京饭店。

“不，还是我请。”

我们向冷饮处走去。我看那里的人手里端着的冷饮，都很好看，想必也好喝，但我一样也叫不出名字。其中有个外国人，端着一只细而高的玻璃杯，下半截是棕色液体，不知是咖啡、可可还是红茶，上半截是淡黄色的奶油冰激凌，在杯口处凸出一个椭圆，煞是诱人。我问捷生：

“这是什么？”

“不知道。”她摇摇头。

“那些呢？”

“也不知道。”

“咱们太老土了，叫不出名字可怎么要？”

“我有办法。”

她趋步向前，微笑着指着那位外宾的杯子对侍者说：“请给我们来两杯这样的，”

又指着另外一种饮品说：

“再请来两杯那样的。”

侍者看着我们这一对傻乎乎的中年妇女，一时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会儿才转身取来我们要的那两种饮品。我们坐到对面厅里的沙发上哈哈大笑。

“我还以为你这见过大世面的人什么都知道呢！”我指着捷生嘲笑她。

“咳，都是老土，彼此彼此。”

我忽然觉得，她不一定不认识这些饮品，这个地方她应当是常来的。她那么说，也许是一种细心，或者说，是一种用心。这又一次使我感动。我们愉快地啜吸着。

“现在，干点什么呢？”待缓过劲儿来，她问我。

“咱们去逛逛王府井吧！好几年没来了。”

“想买点什么呢，有目标吗？”

“给我老爸买双布鞋吧，他就爱穿布底鞋。”

“我爸也是。”她脸上的笑容倏然褪去，“我带你去前门吧，那里有一家鞋店，专卖手纳的千层底老式布鞋，穿着很舒服，我爸爸在的时候，我陪他去买过。”

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她那样细心友善地侍我，我却毫不经意地伤害了她的感情。我愧疚极了，一把揽住捷生的肩膀，连连摇头

“我不买了，我不去……”

“去吧，能为老人做一点儿事情，让他们高兴，是一种幸福。能做而不做，将来想起来会后悔的。”

见我依然没有反应，她又说：

“我也好多年没去了，不知那个师傅还在不在，真想去看看他。你陪我去。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们终于成了好朋友，渐渐地无话不谈。她关心着社里的每一个人。她认识人多，经常帮大家解决点老大难的问题。她成了大家的“贺大姐”。有一次我得了一种怪病，自己浑然不觉，她发现后，拉着我去门诊，又亲自去找车送我上医院。也许是青少年时期的孤独，使她对朋友的情谊十分珍重。每年的元旦或春节，她会寄出去上百张贺年卡，问候那些不能经常联络的老朋友。

1982年，部队精简整编，我调到了总政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半年后，她也调到了总政干部部的军事百科研究室。她的办公室恰恰就在我楼上的一层。这真是缘分。我们中午又在一起午休了。记得她来上班的那天中午，我们把简单的卧具打开，铺在一间朝北的会议室的大桌子上。会议室正好有一扇窗户的玻璃破了，北风呼呼地吹进来。我们却很高兴，躺在被窝里说话，还开玩笑说，将来我们中的哪一位成了著名人物，一定要写写这扇破窗户。

调到总部来之后，我们都比在报社工作时轻松了一些。我在办文学刊物《昆仑》，她在工作之余，也搞起了创作。她对我说，她不愿意只做文艺界的朋友，她希望能成为他们同一战壕的战友。我十分赞赏她这一想法，又怕她只是谈谈而已。谁料想，没多久，她便拿来了中篇报告文学《共青畅想曲》，

在《昆仑》上发表后受到好评，胡乔木同志还在《人民日报》头版撰文向读者介绍，这对捷生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于是，便又有《击毙二王的报告》问世。听说她去首都机场生活了几天后，写出了《祝您一路平安》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从美国访问回来，又在《解放军报》上读到了她的散文《哦，五角大楼》。还有《通向世界的窗口》、《潇洒身清闯江湖》、《世纪同龄人何长工》。接连几年，几乎年年都有新作问世。有一次，居然拿给我一本电影剧本《柳浪闻莺》征求意见。她的作品大都是写给青年人的，充满了向上的美好思想，全无阅尽人间沧桑的愤世嫉俗。我问她为什么没有写伤痕文学，她说：“我自己尝透了痛苦的滋味，我知道苦难会令人心碎，我不愿意让人们都沉浸在痛苦之中。中国人的恶梦不会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应当生活得更美好。所以我爱描写光明，写写青年人的奋斗与希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不会写痛苦，写深刻的社会命题。她夫妇二人曾专门邀请我和爱人去看了她的影片《残月》。影片自始至终有一种几近窒息的压抑直逼人的心灵深处。我感到了捷生创作上的成熟。有人把《残月》看成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悲剧，有人说这是一部老年题材的社会问题片。我却知道，捷生是在这部影片中呼唤一种对人性的尊重，呼唤人对人思想的理解，心灵的沟通。是生活给了她这种感悟。

她的婚姻始终不尽美满。年轻时，多少人追求她，她也爱过几个人，有着十分动人的初恋。然而，她爱的人，她得不到，她不爱的人别人又要强加于她。她结过婚，又离了婚。她有过钟爱的丈夫，却又偏偏在“文革”中因受她牵连而被迫害致死。为了不把丈夫的遗骨孤零零地抛在外地，她殚精竭虑，八方求告，将丈夫的骨灰迁回北京。她告诉我：死人的户口进京，比活人的还难。年过半百，她才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她现在的丈夫李振军，是我国武装警察部队的第一任政委，也是一名军中儒将，善诗词歌赋，又有一笔好书法。他们结婚时，邓颖超同志特地作为女方家的代表，出席了婚礼。贺捷生深受感动。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对她的关怀和爱护，是她心中一盏明亮而温暖的灯。

贺捷生和李振军志同道合，情趣相投，组成了一个融洽而温馨的家庭。可是，由于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使这个美满之家有时会跳出一些不和谐的音符。贺捷生为此而深感苦恼。

问斌同志的《心祭》，在贺捷生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她决心把《心祭》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引起全社会的思考。将散文改编成电影，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再创作。她要重新塑造人物，编织故事，构筑框架，还有什么蒙太奇大闪回等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法。她将自己的全部心血，人生体味，情感积累和知识储备都调动起来，一起揉了进去。主题的深刻和情感的真挚，使这部影片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影片获得了成功，捷生在创作上也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她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被选为全军优秀的中青年作家代表，出席了第四届中国作家代表大会。

1992年7月22日，军委主席签署
命令：军事科学院百科部部长贺捷生
晋升为少将。

进入九十年代后，贺捷生的文学创作活动突然中断。我们正期盼着她写

父亲、写母亲、写她自己的传奇经历的文学作品面世，她却从热热闹闹的文坛退出，沉入到《中国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的冷板凳上，以至于陈荒煤同志批评她疏懒、落后，问她你的书什么时候出来？她只能苦笑一笑。她无法告诉他，她正在编一本大书，她正在修筑一条怎样的长城。

这是两部煌煌巨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综合性军事百科全书。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则是我国第一部专业性的军事百科全书，是代表我国、我军军事科学水平的经典性著作。只一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就有57个知识门类，58个学科，共收条目11384个，释文1200多万条，近8000幅图表，涵盖了军事思想、军事学术、军事地理、军事历史、军事技术、军事后勤等军事科学的全部知识领域。还有军事人物。需要组织军内外5000多名专家学者来撰写。而每一个条目都需要高度概括，千锤百炼，犹如一条浓缩的巨流。

贺捷生是学历史的，她曾参加过民族的、文化的各种史料的编纂工作。从业务上讲，她参与和领导《全书》的编纂工作应当是轻车熟路。但一投入进去，她却像游进了一个无边的大海。每一条千把字的条目，都要查阅几万字乃至十几万字、几十万字的资料。为了选择一个准确的表述词汇。要反复推敲。而为了查证一些有关的史料，又需要飞机、火车、轮船、汽车的满中国去跑，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时候，只能安步当车。真是磨破了嘴皮儿跑细了腿儿的苦差事啊！

可是贺捷生却干得很有兴味，一干就是12年。也许因为贺龙一家都是行伍出身的缘故，贺捷生对军事理论有一种天然的兴趣。她想，既然古战场上有过穆桂英、梁红玉这些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那么，现代军事理论、军事科学这个领域对女性就不应当成为禁区，即使是禁区，她也要闯一闯！她果然闯了进去，而且闯出了成绩。她被提升为编研室的主任，继而又当了我军最高军事科学殿堂军事科学院百科部的部长。

从她当上主任，我就很少到楼上她的办公室去了。后来她调到军科，我们来往更少。我看她很忙，我怕打扰她。她在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幅大图表，标示着全书编纂工作的进度，那每一个长方形的小格，都像是万里长城的一块砖。我把这种感觉告诉她，她说：

“我是在搬砖呢！”

1992年7月20日，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的一道命令下达到位于西山脚下的军事科学院，内容是：贺捷生同志晋升为少将军衔。我在总部也看到了这个命令，立即给她拨了个电话：

“祝贺你啊贺将军，我太高兴了，我现在有了一个当女将军的朋友。”

“唉，我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她的冷调子使我大惑不解。

“太难了，你不知道，太难了……”

是啊，这是当将军，要领导中国军事科学的一个方面军去冲锋陷阵，决不会像我们当年在北京饭店买冰激凌那么容易。

“你会干好的，你想干的事情不是都干成了吗？而且都干得很漂亮。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悠着点儿干，别累坏了……”

此后，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少了，有时会相互拨个电话聊几句，有时好几个月都不通音讯。

记得是在 1992 年底的一个傍晚，我刚下班回来，贺捷生突然来到我家，很兴奋地告诉我：

“你知道吗？赵南起上将到我们院当院长了，今天下午发表了‘就职演说’，很有个性，很大胆，也很实在。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么精彩的讲话了，掌声好热烈啊！告诉你，我有一种预感，军科会有大的变化，军科有希望了！”

她像一个年轻人那样激动着，柔弱的身体里，膨胀着一种青春的活力。像她这种年龄，这种经历的女人，还能拥有这样真诚的冲动，保持一种生命的张力，实在不容易，我都很羡慕。她几乎把赵院长的讲话背了下来，难得她有这么好的记忆力，说完了便要走。我留她吃饭，她说她还没回家，是下了班直接来的，家里人不知道，饭嘛，以后再吃，边说着边匆匆忙忙地走掉了。

不久，她又给我来了个电话，语气中依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

“喂，告诉你，赵院长今天发表了他的‘施政纲领’，他提出，军科今后科研工作的重点，要从对以往战争经验的总结，转移到对未来战争问题的研究上。我认为，这是方向性的转化，意义重大，你说呢？”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我的情绪也被她点燃起来。

“赵院长这个人我也有过接触，在总后工作时，就很有一些大思路，很有魄力！你今后大概会更忙了吧？”

“我不怕忙，就怕扯皮。你是不知道，这些年，我让那些扯皮儿的事弄得烦透了。许多时间和精力都被那些与业务无关的事情占有了，又不能不管。只有‘全书’，只有‘全书’的进度才是大事儿。你还年轻，体会不到，我是常常有一种紧迫感……”

我想起了她办公室墙上的那张大图表，那些像长城砖似的小格子。是的，我们都是中华民族这座宏伟大厦，人民军队这座钢铁长城的修筑者。无论是她，还是我，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事业，只有神圣的事业，才是对每一个奉献者最强有力的感召。

有一天我去文采阁开会，遇到了张锲，谈起贺捷生，都说好久没有见到她了。张锲叹曰：

“捷生这个人，当将军当得太投入了，干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她已经是身不由己了。听说军科调班子时，军委首长专门有批示，百科部要保留业务骨干，不要临阵换将，看来，她这个将一时半会儿还退不下来呢！”

终于有一天，我又见到了她，是在那天晚上的新闻联播节目里，儿子指着屏幕上一位神采奕奕的女将军说：

“妈，快看，贺阿姨！”

真是她，好像在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有许多军内外的专家，还有不少外宾，正在凝神听贺捷生发言。只见她一身戎装，潇洒中透着坚毅，脸上的棱角，不知在哪一点上，酷似她的父亲，肩章上那颗将星，金光灿灿，分外眩目。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把她与“将军”这个坚硬的、极富力度的称谓连在一起。

结稿后的补遗

结稿后，编辑部希望能配发几幅照片，与捷生联系了一个多星期，才算是挤出了半天时间给我找照片。那天上午我去她家时，她正埋头在她和李振军合用的一间不大的书房里，翻箱倒柜地忙着。我立即掺和进去。照片真不少，许多照片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我选出了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几幅照片，觉得差不多了，可她还在一个劲儿地翻着，一边自言自语：

“放到哪里去了呢？这张照片要是丢了，我妈要打我了！”

终于，在书柜旮旯里的一册照相簿里，她翻出了一张像是被水浸泡过又晾干了的旧的发黄的照片，照片上的人已经模糊，只能大体上看出是穿着红军服装的年轻的蹇先任和刚刚能站立得住的、也穿着红军服装的小小的女孩，这肯定是贺捷生了。母女俩的前面，放着一只可以背在身上的背篓，我想，这大约就是捷生在长征途中的摇篮。从照片推测，这是在长征后到达陕北时拍的。照片上的捷生，俨然是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小的红军。捷生把照片翻过来，让我看后面的字，字迹尚清晰可辨：

捷生：为了环境所迫，把你长期的寄养别人家中，我在这极长的十二年内，怀念你的心情实难诉之于笔墨之间，捷儿，盼你早日归来，我的近况，可问你的舅舅。
你的妈妈于端午节 1949

这幅小小的年代久远的照片，一下子把我带到了半个世纪之前的风风雨雨之中。我也曾坐过这样的背篓，我的父母也曾几次商议要把我送给老乡，可是，我比捷生幸运，一直没有离开亲爱的爸爸妈妈。而蹇妈妈在漫长的岁月里，难以平复的对独生女儿刻骨铭心的思念，是怎样巨大的沉重的精神煎熬啊！我想起了珂勒惠支夫人的木刻《牺牲》，那是一个用双手奉献出自己的孩子的悲哀的母亲。在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中，多少父母献出了自己的子女，又有多少子女从小便失去了父母的疼爱。在书柜上层的一个角落里，摆放着一张放大的女孩子的照片，这是捷生在“文革”中辞世的女儿，这孩子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短短的头发，甜甜地笑着。这本该是一个多么完美、幸福的人生，可是，却成了“四人帮”淫威下的牺牲品！面对着这两幅照片，我仿佛面对着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如今那些吃着巧克力，倚偎着在妈妈怀里的孩子，坐在游乐园的飞行车上开心地大笑着的儿童，你们可知道这幸福的背后，有着几代人的奉献和牺牲。但愿你们长大后，能读懂历史，但愿你们永生永世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蹇妈妈解放后，曾担任中共常德地委委员、慈利县委书记兼县长，武汉市政府秘书厅主任，市纪委副书记，轻工业部审干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干部学校校长兼总支书记。1978年，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同志起用“靠边站”的干部时，蹇先任任中央组织部副秘书长，参加接待来访工作，为执行中央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政治路线，顶住了各方来的阻力和压力，坚决为党内一批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此后，她又当选力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届、第二届中纪委委员。她的妹妹蹇先佛后来也担任水电部的副部长和中纪委委员。这一对当年红军里有名的“姊妹花”成了中纪委令人尊敬的两位老妈妈。

在翻阅照片时，我发现了捷生的一本资料集里，有一篇白桦同志写的散文《悲情之旅》。记叙了1975年深秋，随捷生去湘西老区搜集史料的所见所

闻所感，文中的一段记载令我震怵。

“我们祭扫了贺龙所有亲属的坟莹，他的三位姐妹贺英、贺五姐、贺么姑都在第二次国内战争中被敌人杀害。她们死得都很惨。贺英死于枪击，贺五姐被梟首，尸身抬到家，她的女儿一针一针把娘的头颅缝在颈上，缝一针昏死一次。贺么姑死于城外小河边，敌人使用的是中古时代最残酷的极刑——凌迟。”

这就是贺捷生的三位姑姑！

读到这里，这间原本十分温馨的小书房，顿时充溢着一片肃杀之气。我难以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我骇然于人对人的残酷。在一场时代的大变革中，在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实在没有什么共同的所谓“人性”和“人类之爱”好讲。凶残的敌人对革命者的迫害，从来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鲁迅先生那时讲过“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这位先哲看人看事入骨三分。世界上的事，从来是有原则、有界定的，我们共产党人，什么时候都不可太天真了！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经验和启迪！

我们渐渐地摆脱了沉重的历史氛围回到了现实当中，在那个女孩甜甜地笑着的照片底下，我们喝着茶，聊着天。捷生三句话不离本行，又说起了她的军事大百科全书。

“再有两三年，就可以完工了，不知道我能不能干到底！”

“你现在身体和精神都不错，再坚持个两三年没问题吧？”

“这就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的事情啦。我们部里有不少老同志都是在默默地奉献之后，默默地收拾好办公室的东西，悄悄地离开了，他们是流着眼泪离开的。这些同志有经验，有能力，也有精力，但年龄一到，不能不退。我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你还没到年龄吧？”

“我还有一年的时间。眼看着我为之奋斗了十几年的这项大工程就要竣工了，我却不能为它填上最后一块砖，真是有些不甘心。我并不是为了什么名分，我只是想亲手做完一件事，做成一件事，也不枉过此生！”

我十分理解她的心情，但我却无法言对。我不敢妄评我们的干部制度，也决不赞成终身制。但有一个问题，确实使我思索过。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领域，需要的是经验的丰富和知识的渊博。而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却是需要时间的。人到五十而知天命，五六十岁的人，思想、情感都已成熟，但却要离开工作岗位了，这是不是对事业的一种损害呢？我常在各地的干休所看到一些红光满面、精力充沛的老干部，提着菜篮子去买菜，或拿着棍子打门球，还有些不算老的老干部在老年大学里写字作画，他们声称要“活到老学到老”了，这算不算是人材的一种浪费？我很难想象捷生退下来会是什么样子，她大约不会去提篮买菜的，也不会去“老年大学”了却残生。她还会去做许多文化方面的工作，还会做的热热闹闹。但我多么愿意她能实现自己的夙愿，把军事大百科全书的浩繁工程完成到底，她的名字，会与这部传世巨著共存。

一个将军的侧影

白玲玲

引言

1993年，对大多数人来说的一个普通年份，对某些人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就个体而言，可能是里程碑似的；就家族而言，可能是划时代的。这一年，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他亲自批复的委任状中，将总参某学院女教授钟玉征，由大校军衔晋升为少将。

少将，将军尔。将军，横刀立马，兵戈铁甲，运筹帷幄，逐鹿天下大丈夫伟人也。“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天才诗人一句充满理想主义的诗话，便道出一个民族对成年男子的殷殷期盼。此种情怀与女人无关。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花木兰梁红玉更多的还是一种对浪漫之梦的遇想，是浩瀚历史中偶然发生的个别事件，象征性的点缀，与真正的中国历史几乎没有太多的关联。因此，总参谋部的提名，军委主席的批准，便显得尤为不同寻常。

我们总是对行进中的历史难以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过，这并不妨碍心智不间断地努力体察，尽可能看清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切，于是，一个人人可知、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浮雕般地凸现了。

钟玉征（尊重她的个人爱好，我们权且还是把她称作教授吧。），见过战争，不过仅仅穿越了战争的印影。没有领过一兵一卒，没有出任过一官半职，没有亲临过任何一场大大小小、局部非局部的战争，甚至连图上推演一并算在内。何以称作将军？男士们在谈及此话题时，表情暧昧多有躲闪，其实大可不必。阅尽沧桑的教授难道会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

教授是睿智的。

可是这一回，连教授都有些惶惑不安，心里感觉总有那么一点点不到位。

每逢一项重大的、突破性的、无历史版本可以利用抄袭借鉴的、甚至侵袭威胁改变着几千年来人们固有思维定势的决定出台，势必造成理解距离的增大。距离的两端，伟大与平庸，智慧与愚蠢，明智与混沌各执一首，互不相让。

现在，只能让事实来说话了。只能让事实告诉我们，教授和她的将军军衔究竟含有何种意味。

—

1991年3月1日，有那么一刻，北京首都机场候机厅纷纷坛坛的过客中，闪过一位女性纤小瘦弱的身影。没有人关心她从哪里来。无疑，她是这个人口众多的东方帝国的虔诚子民。她衣着朴素。出国前才匆忙间去首都那家叫“四联”的名店烫就的头发，此刻还在支支棱棱地硬着。她神情安静，谦恭有礼，不肆张扬，于温和文气的气质中透出被她保持的很纯粹的东方女性的品味。可是，她实在太平凡了，谁会去注意一滴淡淡的、瞬间即会被人的体能挟裹化散的水珠呢？

她就是钟玉征，某学院四级教授，全国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享受政府津贴的有突出贡献者，八届人大代表，一等功荣立者。

但是，这一切外在的荣誉好像仍然不能透彻地向我们展现教授的心理世界。我从来没有把她想象成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性格最有意思的人。尽管我

个人对化学世界、对各种元素间奇妙不可解的化合分解怀有无法释怀的兴趣，但我很少奢望，这一次也同样。我小心翼翼地坐到了教授对面，把她让在八月末尾清晨清丽透明的光线里。她是女将军，我是文职军官；她付一生心血倾心研究军事化学研究毒剂，我至今仍在跋涉中选择，选择中跋涉，无法定位；她从困顿中走来历经种种磨难，我的外表从来写不上苦难二字……我发现，只有一点我们尚且有些相似：我们都有一个单纯没有遭受多少污染的童年，这对一个人的一生无疑起着重要作用，那么是悬殊的差异引发了我的兴趣？不仅仅是。我几乎在与她对视的最初一刹那就敬佩她了。生活虽然使我被迫舍弃了许多东西，但我却不能失掉衷心崇敬科学的虔诚，不能失掉对为了科学而虔诚一辈子的人们的崇敬。

今天，我终于触摸到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心灵。

教授结束了悬浮在空中的万里跋涉，唯独一颗悬浮的心依然忐忑不安地悬浮着。教授坐进了瑞士国防研究院的会议室。严格地说，这只是一间简朴的大教室。几十位来自美俄法英十五个国家十七个实验室军事化学领域卓有成效的专家学者，一批世界级顶尖人物，汇聚于此。大凡属于知识学问范畴的，无一例外地具有真挚单纯朴实的特征。知识，教室，学者，三位一体，就这般不施奢靡，不见浮华地融汇成一个整体，营造出严谨的氛围。这里是做大学问的地方。这里的每个人都不可轻视。不单单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站立着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一个雄厚的国防力量。他们本身就是力量与魅力的综合体，经历了严格的磨练，而后，才得以走进这座殿堂。

不错，他们是来开会的。一方面，他们在为国际裁军委员会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关于如何禁止使用、生产、贮存化学武器公约的诞生，为建立一整套监督核查标准，提供科学的技术依据。总不能凭空断定某某国有化学武器吧。也不会有一个国家自愿打开武器库，允许你去窥视挑剔，下种种命令。那么，通过精密科学的检测方法，强制性的手段，从蛛丝马迹中侦破实情，就显得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要想参与这一项维持世界和平具体说来就是参与禁止化学武器的使用、贮存、生产的巨大工程，必须具有相应的水准。哪些国家实验室有能力，哪些国家不胜此任，就成为关键中的关键。也是此次和尔后数次国际实验室比较测试的目的所在。

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科学家不单单是来开会的，他们更是来接受考试，来参加军事化学奥林匹克大赛的。这些高傲矜持不大容易相处的科学家，管他们情愿不情愿，实际已经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角斗士的职责。

日内瓦，国际会议名城。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卢梭的出生地。这里风光旖旎，数百年的和平，整个城市的生命被历史上无数重大事件抱绕浸透，使得它的魅力大大超出了“最有特色”之类的字样。这里距离国际奥委会总部和奥林匹克博物馆所在地洛桑咫尺之遥。仅仅把这一切看成巧合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倒不如去感受一点讪语似的断言来得更有味道。上苍别别用心地把它们安排在一起，难道不是为了更有力地突出和平与顽强不屈的主题，使科学家们原本就不大安宁的心灵越发不得平静吗？

教授有些紧张，大家都一样，都急切地渴望了解测试结果。

有人说，大会主席是个颇富戏剧色彩的人物。其实，整个联试都浸泡在浓郁的戏剧氛围里，章节有序，一幕一幕地上演着大戏。幕早已拉开了，联试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场，规定的时间收尾，又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公约组织技术秘书处——就是我们通常习惯称呼的大会组委会——提交实验报告。现在，各

国的报告均已公开亮相，张榜公布人手一册，只是同时又做演员又做观众的代表们谁也不认识谁。公约组织技术秘书处给每个实验室都编了个代号，为整个会议设置了一个大大的悬念。

既然大会主席还没有人出来宣读名次的意思，她还要组织大家讨论给联军委员会的报告；既然已经等了四十多年，最后的几个小时还有什么等不得的？钟玉征反倒不着急了。她很用心地听着用英语宣读的报告。偶尔，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分出一根旁枝。进门大厅里两个标志触目惊心：一个圆圈禁止吸烟，一个圆圈禁止照相，都是红色标记，好像用鲜血在人们脆弱的心灵上打了一个大大的斜叉。

1915年4月22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和奥地利联军在比利时西部与法国边境毗邻的小镇伊普尔向法英联军阵地施放了大量毒气，这是继元月德军向波兰境内的俄军施放氯气首开使用化学武器先例以来，世界和平史上又一个应该牢牢记取的殉难日。战场被称作“化学战的广岛”，它使整个世界恐怖地颤栗了。人们瞪起茫然无知的眼睛，双臂紧紧地搂住肩膀，不得不接受这一可怕的事实。大片大片的士兵倒下了，大片大片的士兵死在混沌的恐怖中，死无清醒。

那一天是德军对伊普尔持续轰作的第三天。德国人从十六英寸口径榴弹炮发射的高爆炸弹，一枚足有一吨重，企图把小镇彻底摧毁。可是，英法联军构筑的地下工事太坚固了，德军很难向前推进，这将意味着德军预定在西线发动的伊普尔战役未出襁褓即死于摇篮。

黄昏显得十分可怕。炮击完全停止了。死一般的寂静充斥着天空。根据以往的经验，肯定要发生什么事。可是究竟能发生什么事情，没人能预计得到。等待使人忧心重重，坐卧不安，直到可怕的死神终于来临。

德军阵地出现一团团黄绿色的烟雾。它们贴着地面，组成一米多高的烟阵，舒缓有序地向法英阵地滚动而来。德国人在干什么？这是什么气味？一个士兵刚刚来得及发出疑问，便胸腔痉挛，大口大口地喘不上气，很快便倒地抽搐着死掉。同一时刻，所有的士兵都感觉眼睛鼻子喉咙被酸性物质灼痛了，紧接着便是一连串的死亡。

一个清醒的反应极快的军官高声喊了一句：“毒气！注意……”

死亡比反应更快。军官倒下了。毒气防不胜防。阵地大乱。

德军在六公里长的战线上建适150个毒气台，置放了6000个毒气罐，5分钟内释放180吨氯气，15000人中中毒，其中5000人死亡。

疯子的行径一直延续到战争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德军发射的炮弹，百分之五十装有毒气。大约一百万以上的士兵中毒，其中十分之一死亡。欧洲变成了毒气库。

还没有人出来制止使用化学武器。国际公愤还没有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此时，离我们的主人公钟玉征教授的出生还有十五

重新坐进教室等候宣判，已经是会议第二的天下午了。

财大气粗的美国人，一如他们一贯的风格，只要是参加世界级的活动，必派出强大的代表团，无论在人数还是在实力上都保持着绝对优势的地位。这一次，一个著名大学的实验室和一个军事科研中心代表同时列席会议，他们依旧采取着统领世界俯视世界的姿态，自觉不自觉地表演起科学大国的角色。

美国人是高傲的。美国人身上带有强烈的枭雄色彩。以至他们连笑容都

懒得为你动一动，只能象征性地地点头，可是就连这个点头也显得用意糊涂，模棱两可。罗曼·罗兰曾经说过，美国人的一切似乎是为了亵渎一个日本人的优美的感情而产生的。此意不妨再扩大一下地理范围。

教授怎么可能觉察不到？她为人处事一贯不露锋芒。她喜欢静静地坐在一边，默默地睁大她那非常年轻的眼睛，把一切的一切统统看在眼里，再用心去想明白。当然，就眼睛的质感而言，她的视神经水晶体不可避免的进入了老化，看书戴眼镜，不看的时候还要不厌其烦地摘下来。但这仅仅只是事物的一个侧面。你再看下去，当教授对一个论点，一个她过去不大关心的问题，一个突然引发她注意的话题感到兴趣的时候，她就会大大地睁开眼睛，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像一个渴望揭开人类之谜、求知欲极强的小学生，在那里用心地汲取着，吸收着。六十岁的女人，还有一份孩童的目光，孩童的心境，求知的欲望丝毫没有减弱，你很难不去琢磨其中的缘由。她那聪慧的头脑究竟在追求什么呢？

捷克人对教授很友好，他们不时地用英语交谈，语言没有障碍。苏联人回过头来。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回头——

这一回头我们中国人足足等了三十年。“我们把头发都等白了！”

时光倒退三十年，回头的就该是我们了。可能仅仅是回头还不行，我们还要主动走到老大哥的面前，去微笑，去问好，去表示我们的谦恭。

不懂英语的苏联人带了个女翻译。

钟教授客气地向他打听苏联实验室的编号。

“5号。”苏联人伸出手指。

钟玉征使出强力去抑制内心的振奋。超过苏联人了！我们的实验结果比苏联要好得多！她彬彬有礼地点头向苏联人笑了笑。不过此时，如果有个独属教授个人支配的空间，她一定会泪流满面。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开始了自己历史上零的突破。突破的第一步是从寻找校长开始的。有校长才能有学校，有学校才能有学员，有学员才有懂技术了解现代化学武器及防护设备的部队。干部部门简直把全军干部履历表翻了个稀巴烂，好不容易才筛出一行娟秀细小的字迹。一位华北军区某部政委就读过燕京大学化学系，防化学校校长非他莫属。当年能读燕京的决非等闲之辈。这位校长果然不负众望。他接手后的第一项决策，就是果断地将那些从复旦、同济、交大、震旦、圣·约翰、金陵女大等名牌大学自愿入伍参加抗美援朝的学生，四年级以上的留在防化学校任教，中学生就地当学员，没毕业的送回大学。入伍前读大二的钟玉征因此走进北大校门。而这时，苏联人来了。

防化学校的校址是苏联人选的。教材是苏联人编的。教员自然由苏联人担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他军兵种均由苏军模式起步。

在当时，无疑这是一条捷径，而且历史给人的选择实在是少得可怜。所以，几乎所有现代化军兵种的自身发展过程，都埋伏着一些痛苦的经验。所以，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必须是、也只能是创立中国自己的模式。

四十年的光阴，历史仅仅漫不经心地翻动了半页。中国人情感深处保留的，渴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颇具浪漫主义的情怀，不断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折磨困扰着这个民族的领袖和精英们的神经。以至于连最普通的中

国百姓，对“扬眉吐气”之类的词汇都具有超常的敏感。

钟玉征领导的实验室，正是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大会主席调子平平，经常头都不抬。

她开始宣布优秀实验室编号。

当她念到“6号，中国”的时候，会场出现了那么一小会儿集体无意识的愕然，好像大家的理解力出了毛病，脑子里是一片无法思索的空白。

认识和理解的确需要时间。而中国特色的“不是不鸣，一鸣惊人”却没有给人们的认识心理提供丁点过渡的余地。中国的军事化学从来没有走出国门。第一次在世界公开亮相，便金榜有名，荣获头奖，给世界来了一个“没想到”。会场热烈起来。祝贺和微笑同开始的冷淡和矜持同样真诚。科学家到底还是科学家，他们可以嫌贫爱富，在知识和事实面前却表现的非常恭顺，他们极有分寸地表达了赞美。

东道主实验室的博士诚恳地说：“钟教授，你所领导的实验室的工作非常出色，希望今后加强我们两国的合作。”这正是钟玉征此行的希望。她希望和世界第一流的组织、第一流的实验室联手合作，为彻底销毁化学武器作出贡献。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次的考核方式实在太苛刻，形貌也实在太狰狞了。正如日后钟玉征不无诙谐地说的那样，“没想到中国的军事化学是以这种方式走向世界的。”

没有改革，没有开放，没有交流，没有考察。一上来就先考你个真枪实弹，刺刀见红！

你能说这个领域没有战场吗？你能说这个领域没有叱咤风云的将军吗？

二

钟玉征天生是为和平降生的。

她的父亲出生于广东顺德一户商家，在上海同济读了两年书，被祖父强行拖回去接下祖业管理商号，并与番禺一家大地主的小姐完婚。此时，明清两代徽商“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的人文品格早已被大多数商家认同并接受下来，甚至已经化作许多人家光宗耀族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钟家人也许并没有听说那些徽商见识极其精明深厚、令人感怀不已的治家格言：“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钟玉征的父亲无论生意做得多么成功，都丝毫不足以抚平中断学业带来的终身遗恨，这大概算得上他一生中头一桩也是最大的一桩遗恨了。

母亲当然更不反对子女们读书。她自己便是个读书种子。她父亲的理论简单明了实用：女人不识字太不方便，丈夫在外做事，写信回来读都不会读，请人读成何体统。老爷子开明的连脚都不让女孩子们缠。

钟父因此屡屡对子女们立下保证，无论男孩女孩一律平等，都送去读书，有条件还要送大家去美国读书。

快快乐乐地读书，高高兴兴地回家是钟玉征童年生活的主要内容。衣食无需操心，境况好的人家的孩子，大多数比较单纯简单。

她是一个非常懂事，谦让，白净净水灵灵的小姑娘。上面有一个活泼漂亮，舞跳得极好，学习也很棒的姐姐。她排行第二。大多数人家的二姑娘脾气都有些温温的，一副不显山不露水的样子。姐姐又是这么强，对弟妹妹管得很严。下面的弟弟又是这么受宠，家里人公开信奉男尊女卑。小姑娘把自己的脾气训练得真是好极了，对姐姐退三分，对弟弟让三分。

像许多旧式家庭一样，这一大家子人的精神支柱是祖母。表面上老太太

说一不二，做儿子的唯命是从。实际上这不过是大户人家维系面子的一种无所选择的选择——内底怎样不说，表面总要和和睦睦。“忍一息气，保百年身”，“家和万事兴，家衰口不停”是老太太的座右铭。老太太每日真正用心抓的大事，并且百折不挠、百抓不厌的只有一件：从善，求神拜佛。“……理佛者，取佛之德；念佛者，感佛之恩；看经者，明佛之理……”不知老太太取的是哪一道。反正老太太说，赶走日本人她要磕一百个响头，果真磕了，磕的满头满脸鲜血直流，把个站在一边的小姑娘看得呆呆的。祖母成了她的第一位虔诚的宗教老师。

对钟玉征一生影响颇大的还有一位女性，她就是钟玉证的姑姑。

当年也是因为威风凛凛的祖父一句话：你不要结婚了，你去帮帮你弟弟理家。姑姑便终身未嫁，帮弟弟一家人一直帮到九十高龄为止。

她是虔诚的基督徒。1983年从美国回广州过生日，还提出要给在大陆的姐弟俩做早祷。吓得弟弟连连对钟玉征说这可怎么是好？我俩都是共产党员。钟玉征笑笑，说我们坐在旁边听着就是了，也别伤害了老人家的感情。

姑姑唱的圣诗钟玉证句句记得清楚。

……我会虔诚地奉献我的双手，为主工作永不停。

……我会虔诚地奉献我的双脚，为主工作永不停。

……我会虔诚地奉献我的金钱，为主工作永不停。

姑姑为他们做起了祷告：

……我们在天的父，我非常感谢，你使我见到了我的侄子们。他们受到磨难，我主赦免了他们的罪过，使他们得到平安。阿门。

钟玉征坐在一侧，心静如水，默默地重温着童年的梦境。宁静显得那么美好，纤尘不落的境地是那么诱人。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出宗教在我们的女将军、女教授心目中的位置。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钟玉征没有皈依宗教，倒是非常坚决地加入了共产党。多少年以后，对宗教知之有限，兴趣浓厚且强烈的九十年代的北大学生坐在讲台下，受了十四年教会学校基督教教义教育，现在仍然能够流利背诵《旧约》的教授站在讲台上。她能对这些年轻脆弱，碰一碰都可能出血的孩子们说什么呢？她说，宗教是美好的，是教人从善的……她不知道这些孩子们听懂了没有，宗教可以凝聚人类的精神，尤其对世界上大多数弱小无助、离不开依靠、必须找一个依托物的人们，宗教给人慰藉和温暖。但宗教是一个成熟的世界，是不可更改的世界，是一个必须以你的低伏来烘托的世界。和任何的世界没有二致，也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人难道不可以向往构造更美好的世界？人类的历史难道不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更改通向完美世界的路线？作为女人，她善良的天性距离宗教非常近，所以她入党的动机就显得更清朗。有意思的是，教会学校的小姐成了新中国的女将军。她以一个女性纤弱的躯体，加入到阻止战争的和平盾牌的行列。在中国。这并不多见。

如果当年的这个小姑娘跟在父母身边，住在香港而不是南京或者上海，下面的故事就必须全部重写了。

父母给了小姑娘最大的自由。父母把女孩子往教会学校一扔就万事大吉了。除了按时交纳学费，按时等候女儿们放假回家，你都想不出他们还有什么事情好干。

先是就读于澳门培正小学（即广州培正，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迁移澳门），而后协和女中、金陵女子大学，一路的“名重点”，一路的教会学校。所有

教会学校的布局、规格、生活习惯都是一样的。连每餐前必须背的那段圣经“我父在天，愿尔名圣，尔国临格，儿子得成，在地着天……我免人负，人免我负，阿门”也都一样。她一生都无法忘记的那些个生活细节。比如金陵女大的那一身白色中式的校服衣裙，那些终身未嫁、名门闺秀出身的女校长，甚至连管理宿舍脾气古怪的老太太都活灵活现地附着在记忆里……许许多多女人，仿佛伴她走了一辈子，什么时候也丢不下了。她在这里被培养起来的最重要的品质还是对美的不屈不挠的向往，对安宁平静生活追求时所必须具备的善良心境的准备。这辈子不可能更改的意志力也是这时候建立的。在最最恐怖没有安全感的那几年，她赖以支持精神的元素有一半来源于青春期的十四年。此外，使钟玉征得益非浅的还有十四年来严格正规的教育，可能是当时中国所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她下功夫狠狠地训练了大脑，直到它们轻盈、灵活，附着力极强，敏感而又清晰，她可以任意使用它们，向它们索取。大脑从来没有背叛过主人。1985年，防化学院派人出访北欧，过硬的英语在众多业务骨干中便成了选拔的唯一条件。挑上钟玉征，不得不感谢教会学校日积月累的栽培和熏陶。

和教授谈话是享受。她是教授，好口才似乎不足为奇，其实中国目前的教授没有口才的并不比有口才的少，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钟教授打开话题一泻千里，思维缜密，极赋弹性，一个话题跳跃到另一个话题，像高质量的高速公路的衔接部，平滑的让人没有感觉。她的博学也不断地引发我的感慨，尽管我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你面对的是一个教授而不是一个走红的歌星舞星或者刚刚发达的小老板，我还是控制不了由衷的赞叹。

这大概是因为越来越多品性卓越才华横溢的人悄悄地潜向幕后，而越来越多的暴发户登上前台的缘故。

同有知识的人面对面地交谈，日常繁琐的往事淡淡化散，劳心劳命的人事往来得以忘却，而点点滴滴的对知识的汲取和交换，竟有了秋后金黄浓艳的色泽。它给心灵带来的喜悦，是山川式铺天盖地般的，也是花香似有似无样的。

能采访这样优秀的女人，是我的造化，也是我的幸运。

在教会学校高墙草坪花园的环拥，即使战争走的很近，感情也会把它排斥得很远。审视钟玉征，唯一让人感到遗憾，感到不安的，是她的心灵之湖过于清澈过于透明。社会没有能力为这样的心境提供一个栖息的场所，她的磨难还在后面。她是注定要经历一番流血流泪的岁月。倒下去的就倒下去了，站起来的各个都是英雄。

可是，一个普通的生命和英雄的业绩之间路途遥远的根本见不到首尾。

钟玉征九岁了，她渐渐地学会了读书，但还没有接触到这九年的中国历史。

1931年，小姑娘一岁。9月18日，日本人攻占了沈阳。

1932年1月28日，日本人攻打上海。

1933年，日本人占领了热河。

1935年，日本人向华北扩张侵略。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

与日后有关的是，很早以前，1899年7月，国际上第一次全面编纂战争法规的海牙公约规定“禁止有毒武器”，日本人公然违背这一古老的国际惯

例，于1937年4月23日这一天，对八路军使用了化学武器。

1939年5月1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卫立煌在发给蒋介石的特急密电里提到：……经我贺师长（贺龙）亲督350旅（此时已改编为120师第一、二旅）主力迎战，敌利用大量毒气顽强抵抗……我鏖战于毒气迷雾中，中毒贺师长（经解救现尚不能言语）以下官兵五百余，死亡营、连长及族政治部副主任以下七百余。

还是这个时代。

不幸的波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杀人工厂——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德国最大最黑暗的集中营灭绝营。估计战争期间，死亡人数在一百万到两百万五十万之间，也有人说已经达到四百万。

人们熟悉集中营的一切。那些建筑在绿草和鲜花中的“浴室”。那个一次塞2000人，人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的淋浴间。那个屋顶砌成蘑菇型神秘的通气孔。和从通气孔倒下来的紫蓝色的毒药。

毒气飘下来了。无意识无生命的物质成了创造美丽轻盈舒缓飘曼的姿态的能手，像你看到的那些白云，那些流水，那些轻风，那些炊烟。被剥去衣服剥去尊严，形体及精神同时被剥得精光的人们，突然发现了来自头顶的残酷优美的飘曼，恐惧和痛苦一起袭来。他们疯了，绝望了，逃避死亡的本能驱使他们不顾一切地扑向大门。

死亡等同封闭。

坚不可摧的大铁门加锁，密封，一个氧原子也休想渗透进去。

人们互相抓着，掐着，推着；互相踏着，踩着，攀着，借人的身体向外，向上，去爬，去爬——

三十分钟以后，声音凝固下来，一切都停顿了。惨遭毒害的人，变成了一具具青紫的、皮肤被抓的血迹斑斑的尸体。更为惨烈的是，他们扭曲的人体，狰狞的面孔在铁门前堆出一个高高的惨烈的“金字塔”。

难怪一直到了九十年代，美国的武器装备已经接近领导人们创造思维新潮流的水准，他们的军官仍然对化学武器谈虎变色。

二战期间，我们的小姑娘与毒气还是两条互不相干的平行线。他们谁也没有发现谁，谁也没有想到会成为裁决对手生命的，而且早晚是要相遇的。不过目前我们还要耐心地等着小姑娘去长大。

三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国际裁军委员会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组织的第一轮联试，没有向中国发出邀请。

1990年，特设委员会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向中国发出了参加第二轮联试的邀请。

中国，参不参加呢？

外交部问总参谋部。总参谋部的决策者自然听专家们的意见。于是，防化部责成有关专家拿出看法。

作为专家的代表，钟玉征来到防化部，小心翼翼揣紧心里那份与她年龄非常不相适宜的激动，尽量去表现平静如常。究竟是参加合适，还是委婉推辞更理智稳妥？从得到信息那一刻起，两个念头就成了一对纠缠不清、势均力敌的对手。

在得知钟玉征的最后选择之前，有一个问题实在无法回避。那就是，同时做着女人、军人、知识分子的钟玉征，身体里哪种要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她的选择标准究竟是什么？

要素不少，选择很多，要理出头绪并不容易。首先是选择来得似乎太迟了。提前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哪怕就十年，很多问题自然而然就不是问题了，你有热血，有力气，有信心，还有可爱的盲目和单纯的糊涂，不需要太多的思索。一咬牙一跺脚，瞬间的横心也就把难题解决了。再说，你的时间富裕充足得令人嫉妒，这意味着即使摔倒了也爬得起，有的是时间从新开始，伤口复元的也特别快，几乎感觉不到太大的痛苦。澎湃的热血和青春的无畏，无疑有助于下定决心冲上去。钟玉征已经不具备这些条件了。其次，就算她信心十足，也多少有些高空浮萍的不踏实。对世界化学学科及军事化学的了解，不可谓少，但也决称不上多吧。按兵家之言，知己知彼，这首要的知彼就让人心里没底。她倒是很知己。钟玉征是我军第一代化学工作者，军事化学的老前辈，以后一批一批的后继人，可以说是她亲眼看着长起来的，她了解他们。她也了解他们使用的仪器——七八十年代的产品。现在的十年差不多要等于以前的一百年。谁都知道，化学有两种研究手段，一是理论的，一是实验的，它们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而在实验手段中，许多分离方法、观测方法以及所有测量都必须依靠仪器。在得不到准确的“敌情”分析，我军装备明显弱于对手的前提下，打还是不打，就取决于指挥官的胆识和魄力了。这是人人尽知的常识。再露骨一点说，成功是大家的成功，失败是决策者的失败。一个很快就要隐退的女人，一生可以画一个很圆的句号，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吗？

她是个女人。女人有许多为男人所不屑的品行，几千年累计起来的糟蹋足以汇集出一条新黄河。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泛论女人种种。我们现在只说钟玉征。

坚韧不拔。

钟玉征柔弱的外表下潜藏着非同一般的坚韧。从她一入伍，她的嘴巴就紧紧地闭了起来。因为她出身不好，射向她的许多目光警觉，凝重，欠友好。别人干错了可以得到谅解，她的过失就是别有用心。她必须付出几十倍的努力，来替自己的父母恕罪。虽然以后她时不时地被想喊出来的愿望折磨得很苦，她的忍耐几次进入绝望的境地。但她毕竟走过来了，一口气用一副默默忍让的姿态走过来了。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开始她的确谈不上坚强，她是在行走的过程逐渐磨练出了独立和坚强。我们曾经在大量的女人身上发现过一种奇异顽强非常持久的力量，尤其在困顿苦难绝望面前。她们的肉体好像是硅橡胶做的，柔韧，极不容易老化。她们的坚韧表现在她们忍受苦难的方式简单恒定，令人吃惊，好像不把人世间的苦难吃尽，她们就活得不够份儿。有些学者把其中的部分原因归结为X染色体的多寡，长期失血对身体及神经的锻炼。可能吧。反正钟玉征一旦决定要干，就不会罢休了。她对其他事物的忠诚首先是从忠诚于自己的选择开始的。她尊重自己的人品，所以她才会那么在意一个人的人品，很多时候甚至超过了对外包装的重视，超过了对头衔级别荣誉的追求。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很难理解她为什么会三次对防化部首长提出不记功，把功让给其他人的举动。甚至把教授晋级的机会也转让了。她不是在争虚荣，她只是自信，没有级别等级也可以理直气壮，她自信而骄傲。

不事张扬。

因为无需。因为有力量。因为在国防绿的集体里生活了四十年的她，思

想的红艳和绿色的沉稳已经被搅拌粘合得分不出彼此。入活一生，总要给自己找一个终极目标。而军营告诉她的最重要的人生经验，就是必须以一项大事业作为一个人活下去的终极支撑。

我在临时抱佛脚地突击化学常识的时候，发现了一段很基础很普通的话：

在现代化学中，碳的同位素 ^{12}C 被当作实验测定一切元素质量的基准点，因此它是化学中一切关系的基础。

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借 ^{12}C 之说，依靠数不尽的人生元素分解化合的生命过程，实在太该有自己的 ^{12}C 、自己的基准点，它应该是调节全部关系的中枢核心，不论你是做女人，做军人，做知识分子。

这个 ^{12}C 是什么呢？应该是你的祖国吧？只能是你的祖国！

没有祖国的人是可怜的。能为祖国服务的人是幸福的。

一个为祖国争光的机会就在眼前，钟玉征的选择突然间简单了，她根本没有退却的理由。

那就上吧！

专家组迅速成立起来。由钟玉征教授出任专家组组长。

就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而言，一位专家的头脑等同于一个场面阔大的战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具有统帅指挥的能力，都可以把战斗导演得绘声绘色，捷报频传。

给智慧的头脑当指挥官，融分散的智慧为智慧的金字塔，钟教授在她还没有晋升为将军的时候，就扛起了帅旗。

让我们先来听一听各路英雄对统帅的评价。

“……统帅就是航向已定，但布满浅滩，只有一个坚强的船长才能引导我们从中通过的人。”（无名氏）

……统帅就是“思天下事，未尝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后行，惟恐不当，致生奸弊，以殃吾威。”的人。（朱元璋）

……统帅就是“骑上老虎背就必须一直骑上去，不然就会被老虎吞掉”的人。（杜鲁门）

……统帅就是“取得了首脑职位就是取得了一个必须着力对付、有种种弊端，缺陷的世界”的人。

也许，忽然的一个瞬间，我们的女将军女教授曾经有过一丝丝胆怯。万一兵败，成为防化兵历史上的第一个马其诺防线怎么办？怎么向党和人民交待呢？

四

联试是这样开始的。

首先是一场国际间的交接。1990年11月，澳大利亚防护实验室将配比好的毒剂样品交给我驻澳大使馆，由信使传递到我外交部，再一层层地传递到钟教授手里。各国实验室在11月14日这一天，同时开启试管开始实验。12月14日报告实验结果，逾期未报者，“红牌”罚出场外。两个星期后，书面报告未上交者，同样红牌。

取样品的时候，教授考虑样品一定很大，起码是一桶水吧，所以才有的后面的找水的笑话，所以才特意申请了一辆面包车。面包车摇摇晃晃地开出去

又开回来，车上空空如也。传到教授手里，仅是比扑克牌大不了多少的金属盒，内装 29 根香烟大小、密封的玻璃试管。每个试管里或有一根火柴棍大小的棉签，或是几滴水，几粒活性炭。

钟玉征脑子嗡地一震，这种考试的形式实在来的太苛刻、太严厉，不过倒是合乎国际间激烈残酷的竞争规律。

化学领域有一个普通又常见的术语：痕量分析，被专家们的口语简称为“痕量”，它所指的意义是：物质中被测成分在百万分之一以下的化学分析方法。常用于生物体、纯金属及各种超纯物质中的杂质及环境保护工作中有害物质的测定。现在我们起码可以明白一个道理，试管棉签上的看不见的物质属于百万分之一。而且是茫茫物质世界中的未知数。要大海捞针似地把它们捞出来。

操作的第一步当然是把“痕量”从样品上“拿下来”。怎么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具体实验我们无意参与也着实参不进去。我们只能从一些侧面目睹教授的风采，看看实验的艰辛。

他们在一个只装了 0.8 毫升水的试管里发现了一滴比小米粒还要小的油珠。轻轻地倾斜试管，用进样针——一个非常小的注射器，小心翼翼地将油珠取出来，做了个小小的分离。这个小东西有点神秘，可以轻易地处理掉，也可以作为普通现象走个一般性的过场，简单测试一下，而后将它放弃。当然更可以给它以不同寻常的待遇——抓住转折的机遇——具有这种才气的人为实不多。

这个小油珠究竟是不是打开闸门的开关？解决问题的关键？疏导堵塞的绿灯？它深藏不露的形貌在有意制造烟幕迷惑还是误导？到底凭的是感觉，还是知识、经验？教授立刻敏锐地把重心倾移到了这个小东西身上，把它作为整个联试的突破点。她要求具体操作的同志，盯准这个小油珠，每一步实验都要和她商量，每一个图谱都要经她过目。

身为总指挥的教授要承担实验项目，要制订整体作战方案，要协调各小组的关系把握实验进程，要了解实验细节，要对模棱两可、犹豫不决拍板定案，要及时发现纠正失误……谁也说不清碰到多少困难。这些专家们也不大习惯诉苦，不大会表白功绩。他们克服困难的方式安静，沉默，没有轰鸣，也不见硝烟，只是一遍又一遍的实验实验还是实验，时间在走动，白昼不分。

钟玉征不断告诉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有任何顾虑，做好了成绩是大家的，出了问题我来挨板子。

教授的冷静明智，使她和她的小组一下子就切近到了实质的核心。他们终于在水里、油珠里各找到一个辛基沙林降解产物。在违禁清单上，它属于第一类绝对禁止的、速杀性致死剂。成功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月，29 个样品中的物质全部查出来了。

1925 年，在日内瓦签订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它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与会国 38 个。到了 1989 年，缔约国已发展到 121 个国家和地区。121 个国家和地区敢参加联试的不过尔尔。有能力参加的不过尔尔。金傍有名的更是尔尔。难度可想而知。

每当我想到这次联试的成功，都不由地为教授的辛苦深深感动。按说，一次大仗结束，诸多纷乱琐碎的杂事，将军们是无需过问的。可是各小组的报告，一大摞一大摞地堆在教授桌上，等人来综合归纳整理，集成一部新的报告。工程量太大了，教授愣了愣。不知道她是没工夫想，还是想不到。

这一愣，就把所有疲劳辛苦跃了过去，她又干了起来。

教授有一个专家组，但，缺兵少卒。她有一颗智慧的头脑，却分身无术。她很需要一些一呼百应，年轻力壮，尽心尽职，跑跑颠颠，分担她一些杂事的姑娘小伙子们。她还需要几个英文过硬，熟悉全面业务，具有综合能力的人来帮她“分担忧愁”。“几个”没有，一个也行。挑来推去，她唯一忍心调动，也能调动得起，还比较合适的入选只有一个——钟玉征——她自己。

“智慧表现在下一次该怎么做，美德则表现在行动本身。”

钟玉征搬出打字机摊开资料。1980年，父亲和继母相继在香港去世，处理遗物的姐姐对家里这台给谁谁不要，一台老式的德国手提英文打字机非常头疼。如果不是见物生情，此物与父母之间还有一线情感维系，最好的办法还是送它去垃圾站。姐姐好生动了动脑筋，也就是大陆过着清贫生活的钟玉征有可能接受。要。干吗不要？好歹是台打字机，钟玉征斩钉截铁地说。打字机千里迢迢地带来，毕竟太原始太老了，打出来的字既不规范也不好看。不要说拿它去国际舞台露脸，在国内各大小机关公司也会遭人取笑。笑就笑吧，没办法，就这条件。钟玉征嘀嘀哒哒打起来，两个星期，经常弄到夜里两三点。教授幽默地对我说，有个作者说他靠方便面解饥，那是他自己爱吃方便面，我才不爱吃呢，我吃的是饼干。

我被她的孩子气逗得哈哈大笑。你得允许作者在文章里流露一点个人喜好。籍贯河南的人，对“面”的偏爱已经爱出了一个文化特色。教授很认真，她理解，但不接受。

206页英文报告是教授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敲成的“砖头”。实验无路可以借鉴，报告也无样本可以参考，说教授在走路倒不如说在闯路子确切。上百页的报告里有24页由连缀的方块叠成塔形的图表。德国打字机不负重任，打死它也制不出表格了，教授不得已只好手工操作。事情并不难，但繁琐复杂。

你一定不愿意听一道道工序繁杂琐细的过程。人们的兴趣几乎都集中于胜利的成果，辉煌而富有刺激性的场面。可是，在表述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成功的时候，正是这个乏味，无人能够跨越。

先在一张二分之一平方米左右的大白纸上排出空格，位置上下左右必须经过计算不偏不斜比例合理。然后，用精细到以假乱真的手法将空格连缀成“塔”，根根线条不多一厘不缺一口，你得弄得跟真书一样，让老外看不出有手工操作的痕迹。然后再用打字机对准空格，一个个地将英文打进去。还因为这么大的“书”中国人没见过，老外更没见过，历史无先例现在也还没时髦，总不能让老外趴在地图上读书，所以又要拿到复印机上再去缩小，缩至国际通用的大16K、就是A4复印纸的大小。

还没完呢。还有事情在后面等着专家们呢。

你知道报告上的页号是怎么弄上去的吗？你注意到了吗？哪怕是上厕所都嫌脏的“书”，全书页号也是整齐划一，全在一个位置。为了这个“全在一个位置”，可就苦坏了专家们。教授的“书”的页号，先用米尺铅笔轻轻地在书角打出框角，再将打印好的长长长长一串页号数码剪贴下来粘在框角里。然后拿到复印机上复印，抹去手工操作的痕迹。

教授和专家们一起动手粘标点符号，直到报告大功告成。不要说外国人，就连中国人也会觉得不可想象。而且他们的全部辛劳，一台286就可以全部解决，连386、486都用不着。

教授为我带来了他们参加第二、第三、第四次联试的报告，和芬兰外交部责成赫尔辛基大学编辑的第三次“联试技术报告”。差异鲜明，极富刺激。教授说，我们的报告越来越好，越来越像样子。中国进步了。我们的设备进步了。人也进步了。没错，好多了。可是仍不能和外国人的比。他们的那叫书。我们的叫打印材料。时隔不满四年，第一次出征留下的文字资料便有了历史的沧桑感。发黄的纸张，看起来奇怪的字符，勉强的手工装订……翻动书页。我像在浏览一卷很久以前的黑白照片。

现在你再回过头细细地想一想那些说过的话。

“你们的仪器不是最好的，但你们的结果最好。”科学家终归是科学家，他们的评价显得那么中肯，那么容易温暖人心。

“我们的报告下大好看，可我们的实验很漂亮。”钟教授的自信荡漾出浓浓的自美感。没法不承认，自信，自美，没钱也要为祖国增光的胆魄蕴生的大气，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慰藉中国人心灵的一剂良药。

五

钟教授有苦难感。因为她长期遭到放逐。

中国著名女作家张洁有一句名言：我的苦难就是我的财富。

世界级的大作家茨威格对放逐及苦难的阐述尤为精彩。

他说：放逐具有创造命运的威力，能使一个落难的人变得崇高，并且在孤独的严酷的煎熬下，使灵魂的摇摇欲坠的各种力量得到恢复，重新结合。

说的何等精辟透彻。不过，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是，除了极伟大极个别的人物，几乎找不到哪一桩放逐来自自觉自愿。

钟玉征从一开始就闭紧了嘴巴。她走向社会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她和别人不一样。一道不甚明亮、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的界限，轻轻一刀，她的胸前就出现了一个“红字”，她的肩背就扛起了一座搬不动的山。你和别人不一样，她反复告诫自己。你出身不好，和别人不一样，她还不能完整地理解其中全部含义，她不过是刚刚站到了苦难的起跑线。

可是她觉得非常非常不好受。昨天，她还兴高采烈离开金陵女大参军抗美援朝，姐姐哭得泪人似的。钟玉征说姐姐你干嘛哭，我还不能死呢。也是金陵女大幼稚天真的女学生的姐姐，哭得更起劲了，她说你去了就要准备死……钟玉征几乎立刻就说，姐姐你也革命吧。这话连起来好像是说我知道会死人，姐姐你也来死你也来革命吧。前天，她还记得，他们这些新入伍的被火车拉到江津。四川土匪多，每天河滩都有枪毙土匪的，枪顶着后脑勺，一次四五个，把她吓坏了。也帮她把过去的仙女、烛台、圣歌……美妙的、不切实际的，都打碎了，她现实多了，不爱幻想了。大前天，她还在看《白毛女》的时候，饱饱地流了一通眼泪，为从不知道有人过着这样的生活怨恨自己呢。她实在不懂，像她这样傻乎乎的小姑娘，连个坏心眼都没有，怎么会被打入另册。

一张嘴悄悄地闭上了，一扇纯情的门慢慢地合拢了。

可是，这一段日子出奇苍白出奇漫长。她苦苦努力，不见效果。至于到底受了多少苦多少不公正，教授不喜欢回忆，也不愿意提及。我们只能简单地知道，她和她的丈夫挨过斗，曾经被人用军用皮带抽打的只能趴着睡。她每天出去，都要给儿子准备一些饼和咸菜，叮嘱儿子，爸爸妈妈回不来去找谁帮助。她和丈夫认真商量会不会进监狱，会不会永远回不来了。她终于还是被逐出北京、逐到了偏远的乡下，一待就是六年。我们现在很难从她眼神

里看到怨怼。余秋雨先生说过，“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个人痛苦已很难唤起群体的回应和反响。除了当事人的记忆，没有人对此有兴趣。那个边远的乡下，究竟使教授记住了什么？星星异常明亮，尤其夜里三点多钟的星星。有星星在陪伴，有诗在陪伴：……三个牧羊人去伯利恒，他们带着黄金乳香没药，长途跋涉，路上唱着一首圣歌，“崎岖道路请歇片时，静听天使歌声。”“对大的苦难要有勇气，对小的事情要有耐心。”有一条叫花丽的狗在陪伴。它天天迎候在桥头，和教授便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教授本来就很拥挤的心灵，从此更是增添了一份永难割舍的惦记。有一本书在陪伴。英文原版的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还有，一种思想也在陪伴。

放逐似乎永远也看不到头。希望，便显得异常珍贵。它很像孤独的跋涉者在黑夜与黎明交界时分看到的那一线破土的曙色。也很像跋涉者踉跄奔去的那一个海市蜃楼。教授经常向自己发出沉重的质问：你选择的事业究竟是对是错？你究竟有没有能力继续走下去？

我在教授的经历里发现了一个有些奇怪的事。人人都知道，按她的出身，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她是很难入党的，她却在“自然灾害”的六十年代入了党。按她所遭受的排挤歧视怠慢，这简直有“天方夜谭”的味道。对此我疑团丛生。

有人在注意她。这当然是一些比之一般人更大气更优秀的共产党员。有人欣赏她，相信她。有人懂得从一个人的人品里去挖掘那些金子般的元素。她默默的姿态顽强持久，她喜欢学习，对学习工作的态度极其认真，特别出色。她算得上是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希望都投入进工作的那一类人了。她的好日子到了。这是她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助教，为筹建某学院做准备的日子。也是生活最苦的一段日子，饥饿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生命。有无数个寒冷的中午，人躺在床上越发觉得饥饿难耐。她饿的不敢睡午觉，只好跑到新华书店看开架书聊以解饥。也就是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党认识了她，向她伸出了双手。她也认识了党，认识了真正的共产党员，认识了自己生活的信念。

这一年，一个信息远远地从广州传来，陈毅元帅向知识分子脱帽敬礼了。不是一个两个知识分子激动的不知如何是好，所有听到了消息的知识分子，都久久地不能平静。还有比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得到公认更令人欣慰的吗？元帅的一个举动，使绝望的心亮起了光点。因为这个杰出的共产党员是党的具体代表，是党的形象的化身，是在传递着党的声音。

哈军工的老布尔什维克们也在用自己的行动树立共产党的高大形象。

人的头脑该记住的和能记住的大相径庭。历史往往忽视最富于感情色彩的细节。而细节恰恰又是反映历史真实的重要依据。

教授牢牢地记住了一次全院大会。

刘居英副院长在会上郑重宣布，今后，院里杀猪，肉归学生，下水归幼儿园，猪头归教员，干部就别吃了。谢有法政委解释说，这是有道理的。学生正在长身体，身体完了将来怎么做接班人？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教员没劲儿怎么上课？至于干部，我们是工作人员，是为学员教员服务的，吃饭的事，我们要走在后面。

钟玉征观察过，他们果然说到做到——人们总是信服杰出的人物。榜样的力量也总是影响着一代人。

一位系主任有八个儿子，“半大小子饿死老子”，主任实在招架不住，只好把粮票分到每个儿子手里，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口粮。食堂大师傅发现这家的小四子，一顿买了一堆，大大超量了，就反映给经常来食堂转悠的这位系主任。爸爸把孩子叫到门外，掰着手指教孩子算，一天能吃几两，一顿能吃几两，早早吃完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系主任平平的话语，却把教授眼泪都引出来了。

真挚。为人民。富于牺牲。钟玉征信服了，她当然想做他们这种人，为了一个大事业完完全全献出自己的人。

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苦的，钟玉征应该明白这一点，但也是很了不起，很伟大，很光荣的。他们能把千千万万人救出苦海就是明证。和基督精神很相像是吧？或音说有一脉相通之处。也许是女人天生的富于牺牲同党要求的牺牲精神一拍即合，也许是潜留在意识里的基督教义和某种美好的理想影像重叠，也许是对壮志未酬的极不甘心，对才华无处施展的愤愤不平，也许是痛苦和磨练钝化了她的情调，坚硬了她的筋骨，钟玉征成熟了。她明白了一个最简朴的、却是很多人倾其一生也弄不懂的道理。放弃自己的选择，更改走过的路线，失掉的只能是自己。因为，你丢掉了生命中最富于理想的那段路，你也因此丢掉了生命的精华。

所以，她才能对要她退党的人厉声说，不退！除非开除。她在组织生活被停掉的时候，一月不拉地往抽屉里放五毛钱党费。恢复党的生活那一天，小组长让她算算补交党费。不用算，一分钱不少，都在。她怀疑过“河清有日”，她终于还是相信了“河清有日”。

钟玉征仍处于紧紧收缩的阶段，她离真正的好日子已经不太远了。而她的一切忍耐，一切负重，都像冲刺前的准备，大战前的酝酿。“唯有先把冲击力往回收，人才能爆发进攻的力量”，我们再次借用茨威格先生的一句话。唯有经受磨蚀没有倒下的肉体，才能等来生命发射出的最灿烂的光彩。

六

钟玉征又出征了。她连续担任 ROUNDROBIN3，ROUNDROBIN4——第三次、第四次循环实验（简称联试）中国专家组组长。如果第一次是临危受命，这第二次，该算是“临阵逃脱”吧。

逃有逃的理由。第一次钟玉征担任专家组组长是责无旁贷。她必须为年轻人趟路子，探浑水，打头阵，因为她是新中国第一代防化兵。其次，四十年的磨砺，技术经验都处于最佳状态。不能说她一定比大家高明，但她承受苦难解决困难的能力却是出色的，她的阅历使她在处理难题的时候显得才气横溢。再者，她不是为她一个人出任总指挥，她是为他们那一代人。这一代人，纯情的像孩子，路走的坎坎坷坷跌跌滚滚，奇形怪状的包袱伤透了他们的脑筋和才智，青春和才华像一条义无反顾的大河，滔滔而下，现如今早已流的不知去向。他们回首历史的眼光茫然的令人惨不忍睹。他们退下去了，还有人知道他们吗？有。钟玉征。她要为这些壮志未酬的老朋友们的一生画圆一个漂亮的句号。因为她时刻都牢牢地记住了，她是中国第一代防化兵。

第二次不同了，年轻人成熟了，她可不想横在年轻人的路上当什么老太爷，所以她才拒绝出任专家组组长。1950年参军以后，她再也没有看到母亲，母亲在香港病逝。1980年可以回香港，忙工作没回去，三十年没见的父亲也在香港故去。1990年丈夫去日本工作，生活条件极其优厚，她想去，联试又没去成。那么多的亲戚在国外，她想趁走得动的时候多走走。她非常老实地

告诉我，她欠丈夫的情。作为一个女人，她非但没关心好丈夫，反倒老是让丈夫照顾自己。她欠儿子的情。儿子从小跟着出身不好的母亲受罪，没条件接受正常的教育，连母亲应该给予儿女的那份关心都得不到。现在，到了由她来还债的时候了。再说，她也真想过轻松有味道的好日子，听听音乐，旅旅游，散散心，当当好祖母；她还告诉我，她“From somebody to nobody”，翻译过来大意是她不喜欢当名人，她喜欢做个普通人，贫民百姓。她对我说这句英文的神态，坦率，敞怀。她再也不需要小心翼翼的做人，连话都不敢说，生怕被人抓了辫子横遭厄运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日子。还会更好，更有味道。

这也是钟玉征一生最好的日子。不过活到现在，有两件事恐怕她一辈子都无法拒绝。一呢，命令，她不能不服从。她一生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当兵，服从命令。二呢，工作，她没法控制热血澎湃，当个不思不想的闲人。她终身的职业说白了还是一个战士。那么这一次，做战士的她，服从便是唯一选择。

很难。样品附着在橡胶、油漆片、混凝土上。芬兰人肯定动了不少脑筋，橡胶上有很多油，和要拿下来的化学物质极其相近。图谱做的不漂亮，好图谱一定清晰干净漂亮。教授手下有一位叫顾惠芬的强将，刚刚从加拿大大学成归来，分离技术特别好。教授和顾惠芬同另外一位女性连续干了一个通宵，锲而不舍，找到了芥子气和同系物，连放进去的杂质都找出来了，一个没剩。美国实验室主任说，你们找到了所有的东西。面对无可挑剔的完美，他的语调说赞美也好，说无奈也罢，总之听上去有些绝望的味道。这大概是向往高山，但此次已无希望攀上顶峰的人特殊心境的流露吧。

这一次，中国拿了个第一。

第四次联试由美国人配样。从毒剂储备量和化学弹品种来衡量，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海湾战争，美国曾派出专家在前线待了两个多月。明摆着，他们有第一流的设备、第一流的专家，当然也有第一流的配样方案，和第一流的财政支持，第一流的大国姿态。很多的习惯心理喜欢以美国的标准作为世界的标准。美国的直接登台往往会首先造出一些心理冲击波，就有人在摇撼摆动中毫无道理地败下阵来。

美国的配样是环境样品，废水，泥土（腐植土、粘土、沙土）。

现在，美国像一只肥油油、蹦来蹦去、一刻也不得安生的小蚂蚱，与一个庞大的、行动缓慢、有的是时间供他思索权衡，有的是历史供他品琢玩味的老书生遭遇了。肥蚂蚱善于运动，老书生善于用脑。肥蚂蚱世界各地频频露脸，老书生足不出户闭门思过。只是最近两者都在变换形象，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教授他们已经找到了失能剂的一个降解产物。谁想到，一进仪器它自己又分解起来，按说不该再分解的。那到底是降解产物还是分解产物呢？教授说他们干的很苦。正常情况，在酸性物质中，降解产物是不会再分解的，只有出现碱，一切才变得乱七八糟。很可能是碱。可是碱在哪里呢？在样品里，还是隐藏在曾经受到“碱”污染的仪器的记忆里呢？

工作量突然增大。教授规定，必须立刻改变原来的质量系统，不能进十次样品，清一次仪器。她要求进一个样品，清一次仪器。也就是说，重新建立质量系统，确保仪器“干净”，消除仪器不良记忆。工作量大了近十倍。

美国人说：“中国同行把我们的样品做得非常漂亮。”英国人说：“中

国人能做出这样好的样品？！报告也非常详细，没有误报。”中国又做了一次名列前茅。

说到这，教授和她的专家组好像有天神相助，天下事无所不能，常胜不败似的。

科学的道路没有神化可言。钟玉征是人，不是神。专家组也一样。中国有句戏词儿唱道：“用集体的智慧战胜顽敌”。教授领导的专家组是这么做的。如果说她个人有什么感触的话，头脑的清晰的确给她带来了甜头。第一次的联试不免存有盲目，第二第三次，他们几乎还在进入初期就基本上是“心明眼亮”了。只要是考核，总离不开一个明确的考核目的考核方向，所有题目都将紧紧环绕着核心来进行。作为专家组组长，研究透对方到底在考什么，把握了总体方向，才可能在宏观上组织整个实验，向每位专家提出必须拿出什么样的结果。

第三轮（即中国第二次参加）联试，钟玉征冥思苦想，而后肯定地说，他考我们分离。对了。他们拿到一个满堂红。第四轮（中国第三次参加）联试，教授又说，他考我们的质量系统。又对了。只有五个国家向联试秘书处提供了“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系统报告”。

面对外国同行写来的彬彬有礼、热情真挚的回信，面对满纸的谢意，教授很轻地笑了笑。

和平与世界各地不断爆发的局部战争极其矛盾，极不协调。化学战的阴影像一片看不清的毒剂，似有似无地在威胁着众多生命。海湾战争前，伊拉克多次叫嚣，如果伊遭受攻击，他们将使用化学武器。而美国则毫不示弱地回击道，如果伊对多国部队使用化学武器，美国也将以牙还牙，用同样武器进行报复。伊拉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宣称将使用化学武器的国家。以往，被历史秘密守护的遮羞布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多国部队因此延长了海湾战争的准备时间，进攻也因此推迟，并大量地增加了军费开支。

一场没有拉开的化学战被遏制了。但威胁依然存在，哪怕是为了和平的目的，在和平环境下的正常运作。

1964年，美国万吨巨轮“自由”号将在德国缴获的5000吨化学弹药运抵美国军港。卸货时，由于钢绳断裂，起重机重臂与芥子气炮弹重重地砸在了轮船上，大量芥子气泄露，船上船下顿时变成了化学战场，轮船造成严重污染。美军出动了几百名士兵，用了几十吨漂白粉清理了两个月。后果却是，未加防护的人一上船就出现中毒症状。不得以，只有将船沉入海底了事。

化学战带给人们的巨大心理压力，以及就“毒气”本身字样引发的毛发耸然的恐惧，都将导致有一定化工基础的国家在制止化学战的同时，发展化学武器，以期达到足以抗衡的能力，但也同时引发了化学武器在一定范围的扩散。

世界的主流永远是和平。越来越多的国家投入到了全面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斗争。

一位海军大校在与我谈到战争的话题时说，军人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制止战争。

中国，站到了反化学战的前列。

在这一队由优秀战士组成的排头兵里，钟玉征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她开始想一些其他事。记忆依然和从前一样，奇特而又迷人。想记住的忘记了，以为淡忘的又重新出现了。

……好像是从一份报纸看到的。抗战胜利后的北京，现在的103公共汽车终点站，西直门动物园一带还是荒郊野地，到处树木野草，日本侨民搭起帐篷支起炉灶等待遣返。很多中学生听说以后，忍不住好奇跑去观看，那儿大多数是妇女孩子老人，营地干净，井井有条。最使教授感到震动的是，孩子们一圈一圈围坐在一起，小孩子在学日语，高年级的在学数学。这就是一个战败国震撼人心的选择。关于这一时期日本教育情况，报纸还刊登了另一则消息。某都道府的知府，因战后经济困难，筹措不到小学免费教育所需经费，自杀以谢国人。——教授由于震悚而想到了失学的女童，想到发展教育漫长艰苦的道路。然而，当“希望工程”使无数孩子重返课堂，各种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欣欣兴起，在人民大会堂教授和代表们一道举手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她相信，祖国的富强已经有了最坚实的基础了。

……教授谈到香港的社区服务。去社区福利机构登记的人，定时会接到通知。比如他们通知一位很有钱的太太，几点去为一个孤寡老人洗澡。这位太太就会摘下满手的戒指，按时上门服务。香港人解释这种行为时说，不在帮助一个老人，而在于提高自己的思想。我们的罪过上帝都赦免了，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应该为他们做点事。是的，没有一种宗教是教人学坏的。然而，当雷锋、苏宁、徐洪刚已成为千百万人学习的榜样，人民用不着“上帝”来赦免自己的“罪过”，他们心中所建立的信念，将使中华民族紧密团结无坚不摧。

……原副总参谋长徐信上将，接到群众关于北京站治安管理差的反映，联系了几位军队高级干部，亲自到北京站视察，提出意见和建议——老将军老干部的精神使教授非常感动。由此她想到，我们的国家太大，人民还太穷，国家还很不富裕，大量不计名利不计报酬的工作需要有人来做。这个国家在迫切地需要钱的同时，同样迫切的需要一种伟大高尚的精神，祖国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这个纯洁的不知有多少代为之奋斗的信念，是不会被丢弃的。这个世界总有“一见到黄金，身上所有的尊严都不见了，而是像一群挣脱了锁链的狗似地互相争斗”的人。也总会有在更大的事业——为全人类的和平幸福不畏艰险顽强跋涉的人。

就看你的选择了。

我们的女将军想得很远。总有那么一天，她不再是教授，她会从教授的位置退下来，她也不再是将军。一个人的事业早晚会有中断的一天，这是做人无法拒绝的悲哀。育谁能在死后继续从事原先心爱的事业呢？事业得以继承，其实已经和本人失去了直接的联系。只有一种东西保持着环环相扣的连续性，既不脱节，也不因连缀影响延绵的速度。这就是精神。虽然，再也没有比它更脆弱的了，但也不会有比它更富有生命力的。回顾历史，轻易地就可以发现，贯穿整个中华文明的，其实不过是一根精神史的红线。

把你美好的精神留下来吧。那才是真正的生命。

尾

在即将结束本文的时候，路透社布加勒斯特9月5日发布了一条消息：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今天在这里举行的一次仪式上，将国家足球队教练安格尔·约尔德内斯路的军衔晋升为陆军少将。

这绝不不是一个划时代的决定，却称得上是一次很有新闻价值的宣言，它明正言顺地将将军的内涵扩展了。人们自然会拿率领足球队的将军同阻止化学战的将军作一比较。人们会看到，他们的职业千差万别，但在显示军人崇

高美德的时候，却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他们审慎，干练，顽强，甘愿吃苦，有责任心，敢于决战的勇气和姿态，都在各自岗位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永远受到世界人民的敬重。

钟玉征目前努力实现的心愿，充分显示出她的性格特点：她一头扎进了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义无反顾。她依然像她的中年时期——学院恢复初期，为了编写教材，乘着摇摇摆摆破旧的公共汽车从郊区启程，奔波在市内各图书馆资料室情报中心之间，奔波在海一样的资料文件中间，直到编出 25 万字、公开出版的教材。

可是现在，她已经六十岁了。这个一生都靠不懈的工作精神支持自己人生的女人，挺直腰板，又踏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一回，她奔波在“人大”，北京市安置办，民政部安置司，部队负责老干部的有关单位……关于老干部“进点”的所有文件，所有环节她都了如指掌，决不亚于专业工作者。她在为工作了一辈子、还没有解决住房问题的老同志奔走。她相信“……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将会在华厦大地实现，她的脚印将汇同千百万中华儿女的足迹走向祖国灿烂的未来。她在认真行使人大代表的权力和义务。这是一个普通的女将军，女教授，母亲，妻子。

当然，更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为世界和平勤勤恳恳工作的女人。

比传说更美丽……

卢晓渤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65 年风风雨雨前赴后继的历程中，走出来 14 位女将军，14 位女将军中，战斗在电影战线上的只有一位。

在世界电影史 100 年风起云涌斗转星移的岁月里，涌现出多如繁星的女艺术家。众多的女艺术家中，最终成为肩佩金星之将军者只有一位。

现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王晓棠，便是这唯一。

关于昨天

昨天，好像真的过去了，成了封存的历史，谁要是提起那一段，她总会手一挥“别奉承我啦！”对于那些还崇拜她的观众提出的合影要求，她总是很随和地答应着，微笑着往那儿一站……但是事后，她会像个顽皮的少女，玩笑着说：“我又当了一回熊猫。”即便是对“奉命”前来采访的我，她也并不特别关照：“都是过去的事。而且过去了那么久远，不想再提。我的心不在那儿。”她说。

王晓棠曾经是个电影演员，一个被专家和观众公认的优秀演员。1962 年国务院文化部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向全国颁布了 22 名中国电影明星的名单和照片。其中有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活跃在我国银幕上的老艺术家赵丹、白杨、上官云珠等，也有共和国培养起来的新一代明星。王晓棠榜上有名。

明星们的照片被放大了，一张张排列着挂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电影院里，也被洗印成各种各样的“版本”，被喜爱她们的观众夹进了自己的笔记本、像册，摆在了自己的床头、桌案，成了那个年代许多人天天见面的朋友。照片上的王晓棠笑脸微侧，一方纱中衬着温柔美丽，目光中闪动着青春的魅力，着实叫人望而心动。

可是，王晓棠却不肯提起这些极为风光的往事。三十多年后，我这个当年的小影迷对她提起这个话题时，她以自己特有的、十分简短的快言直语一下就关闭了通向回忆的大门。她说：“我这个人喜欢讲将来，提到以后还要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就兴奋，不喜欢讲过去，又是那么久远的过去。心不在那儿。”

不迷醉于灿烂的去，而是痴心憧憬未来，说明了一个人的自信。然而对于作者来讲，要向读者介绍王晓棠，如若不谈她做演员的那一段生活，便像给历史留下了空白，还真没法儿交待，不得已，我只好借助资料。

走进北京图书馆，填好查阅书单交给图书员，你便要近乎麻木的耐心做几十分钟乃至一小时有余的等待。在这种实在让人痛惜时间白白流失的无奈中，突然想起了一件小事。就是在前些日子，一位朋友知道我要采访王晓棠，表示出极大的赞同。“真该好好写写她，我对她的印象特好。”问她何故，她倒反问我：“你听说过关于王晓棠生活上的绯闻吗？”我想了想，摇摇头。朋友颇有几分得意地说，“就是嘛！那么有名气那么漂亮的明星能做到这一点就不简单！”我猜这位朋友一定是王晓棠的影迷，她为自己崇敬的艺术家严肃的生活态度而骄傲。这倒让我想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人们对于演员、明星的关注向来是超热情的。就连报纸杂志上也时不时会发表些“花边儿”，谁与谁好了，谁与谁掰了，谁养了什么样的狗，谁爱吃什么味儿的菜……在普通人生活中最普通不过的习性，以及连普通大杂院居民都极不愿意曝光的隐私秘闻，只要与演员明星沾边儿，都可能做成大文章，被某些人津津乐

道。在这些传闻中，闲言多、流语多、非议多、斥责多、猎奇的也多，像这样带有褒扬色彩的却少得珍贵，虽说王晓棠不是被夸的唯一，但至少也说明了她在观众眼中的形象。

忍耐了漫长的等待和图书员极差的服务态度之后，我终于把几本很陈旧的杂志摆到了眼前。那又黑又黄的纸页似乎是历史被风尘一层层涂抹出的颜色，提示我这里面记载的确实是“那么久远的过去”发生的事。而那粗糙的纸张则让人想起那些还挺艰苦的年代，那些年代里，人们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的奢求，却对文化生活有挺多的热望。显然是“历经沧桑”，这些珍藏在全国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图书馆里的图书，也是破烂零碎了，有些地方补贴着肯定是属于后来年代的白纸。于是，我只能用也同样支离零乱的一知半解与这残缺的资料拼凑着，努力为读者展开一幅起始于40年前的画卷。

1955年春节，一部《神秘的旅伴》在热热闹闹的鞭炮声中与观众见面了。那时候，中国的大街上没有酒吧、没有“迪”厅，中国的家庭里没有卡拉OK，也没有电视机，人们在业余时间最多的娱乐是进剧场和电影院。也是在查阅资料时，我发现这样一个统计：1956年全国电影观众达13亿9千7百万人次，超过了我国今年刚刚公布的全国总人数。而当时我国的总人数是多少，还记得吗？没错，6亿5千万，我们讲了多少年，不也就是现在的一半多一点吗？13.97亿：6.5亿，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包括还不会起床的襁褓婴儿和已经起不了床的耄耋老者）平均一人两次走进电影院。

所以，《神秘的旅伴》上映于春节，正如知时节的好雨，一下便被热情的观众们接受了。它的故事介绍出现在各种电影报刊上，海报贴满了街头，它的插曲在人群中流传。剧中的女主角，彝族少女小黎英则以其纯洁、热情、美丽的形象，一下子就吸引了亿万观众。这是王晓棠塑造的第一个银幕形象，当时，她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的演员。

时隔不久，还把小黎英挂在嘴上的人们发现在新片《边寨烽火》中又出现了王晓棠的身影。同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作品，同是反映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的影片，但是这次王晓棠扮演的是一个景颇族少妇。从“少女”到“少妇”，角色的年龄在变化，从小黎英到玛诺，王晓棠的演技也在长进。如果说第一次走上银幕，水银灯下的她还带着京剧味儿和舞台表演的些许痕迹，那么到了玛诺，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则是活脱脱一个少数民族年轻妇女善良、贤惠、柔弱又正义的形象。王晓棠的表演自然大方贴近生活，以至许多人一度认为她就是少数民族姑娘。人们不知道这是个从小生长在大城市优越生活环境中的学生妹。若不是为了扮演好角色，她还从未到过云南边疆的深山老林，也不会走进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中，过了一段点松明、打野物、刀耕火种的艰苦日子。那段认认真真的生活体验，为王晓棠提供了创造角色的依据，也奠定了她的成功之路。

《边寨烽火》上映一年后的一天，已经调入八一厂成为正式电影演员的王晓棠，在厂区的一条小路上遇见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孙道临。孙道临是借来八一厂拍摄《永不消失的电波》的。见到王晓棠，孙道临那因连日拍摄而挂着疲惫的脸上，立刻呈现出了真挚的笑意。他向这位年轻的同行伸出了热情的手：“祝贺你，晓棠同志，祝贺你获奖。”祝贺？获奖？王晓棠一下子懵了，她迟疑地伸出手，莫名其妙地望着孙道临。后来，她才知道，在刚刚举行的第十一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她因《边寨烽火》中玛诺的出色表演而获得了“优秀青年艺术家”奖，这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举

办的大型国际电影节。王晓棠因此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工作者中在国际性电影节中获得个人奖的第一人。

当然值得祝贺：因为此一奖的获得说明了二十三岁的青年演员王晓棠在艺术之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她的表演水平达到了一个高层次，她为艺术付出的心血不仅得到了国内广大观众的承认，而且赢得了世界上同行和专家们的首肯。甚至可以往大处想，因为她的努力，中国的电影事业又增添一分光辉。不值得庆贺吗？要是放到现在，一个国际奖的获得，随你想去吧，鲜花、掌声、赞扬、报道，拍照、接见……还有那些谁也说不准实数的奖金，以及骤然巨增的片约和片酬……倒也无可非议。但是在当时——

“到现在，我都没见过奖杯是什么样。真的，那奖杯和证书是获奖的唯一收获，当然还有观众和同行们真诚的祝贺。”当采访中，我和王晓棠谈起那次获奖，她笑着对我这样说。笑声话语都平静到淡泊的地步。她告诉我，就是在当年获奖时，自己的心情也是很平静的，只不过比现在多了一点意外和欣喜。

在接受孙道临祝贺的几天后，组织上正式将获奖的消息通知了王晓棠，此事到此便告一段落了（或许当时新闻媒介也向社会宣传了这一喜讯，可惜她不记得，我在有限的资料里也没查到）。王晓棠没有因此而获得更多的荣誉，更没有一分奖金。我说这叫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她说在当时却很正常，因为那个年代整个社会风气就是如此。人们都在努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都希望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奇迹。然而，真正创造了荣誉，人们又是那样心甘情愿自觉而自然地把它归于集体、归于祖国、归于党，至于这荣誉会带给人什么实惠，人们不会去想，甚至整个社会都不会去想。在那个年代的思维中，似乎就没有这种概念。要是有人把自己的工作成果与个人出大名挣大钱联系起来，要是有人把自己的贡献转换为索取的砝码，就有可能被整个社会视为格格不入的怪物，与纯朴的世风和纯朴的人们难以相融。

正因如此，国际电影节获奖这样的殊荣，似乎并没有在这个刚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生活中掀起什么波澜。王晓棠甚至没顾上细想，她正一门心思地沉浸在新角色的创作中——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革命英雄主义的新影片《英雄虎胆》中，王晓棠将一反她的温柔纯真，饰演女特务阿兰。

许多人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不能想象，那么美丽纯洁的小黎英，那么善良温顺的玛诺，怎么能摇身一变为人憎恶的反派人物。好心的观众和同行担心因为出演这个角色而损害了王晓棠自身的形象。有人找上家门，拦在路口，苦口婆心地劝导王晓棠，试图说服她放弃这个不讨好的角色。

王晓棠自己怎么想？她认为一个演员的职责不是要用摄影镜头美比自己的个人形象，而是要将各类不同的人物通过自己的表演塑造出来交给观众。越是与本人本色不同的形象，越能锤炼和展现演员的功力，越富于挑战性。她喜欢接受生活和事业中的挑战。

谢绝了人们的好意，打消了人们的顾虑，对“阿兰”情有独钟的王晓棠把这个反面角色演得活灵活现，育血有肉。既有特务们凶狠、狡诈、歹毒、反动的共性，又有作为“这一个”女特务独有的妩媚、冷漠、欺下惧上的特性。给观众们带来了再一次的惊讶，不少老演员也禁不住点头称是：“想不到晓棠反面人物也演得这样好。”值得一提的是片中她表演的一段伦巴，颇有韵味，绝对专业水平。有人开玩笑说，若不是当年大家都十分革命，立场坚定爱憎分明，阿兰的伦巴就真要风靡一阵啦！

《英雄虎胆》拍摄于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多快好省”的口号响遍各条战线，王晓棠在同一年里，参加了四部故事片的拍摄，无论是村姑，是护士，还是跃进时代的年轻人，她都尽力表现出她们各自的特色。可惜那个年代的产物不少可能是“多快省”了，却未必能好，那三部影片都没给观众留下太深的印象。1958年，人们记住的还是《英雄虎胆》，还是阿兰。不知读者朋友是否同意我的看法，尽管阿兰可算我国银幕上较早期出现的女性反派人物。时隔已久，尽管自阿兰以后，中国电影中又出现过许多形形色色的女特务。然而，恕我直言，还没有几个能超过王晓棠塑造的“这一个”。像阿兰这样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女特务并不多见。

当然，作为一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受党教育的中国新一代人，我不会对阿兰产生什么感情。相比起来，我更喜欢的是王晓棠在影片《海鹰》中扮演的女民兵连长玉芬。她那火辣辣利索索的性格，着实能点燃众人心中的热情。听不少人讲到过，当《海鹰》作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影片公映后，许多年轻姑娘把玉芬当做榜样，学她的性格，学她的举止，学她的笑声，甚至在不少姑娘扬起头往后一甩发梢的动作中，都能找到这个渔家女的影子。直到现在，我都会觉得自己性格的后天形成，有很大一个外在因素是小时候太爱看电影。

《海鹰》大部分外景是在青岛拍的，其中不少场景又是在我们常去玩耍的海边。那时候，我还很小，电影对于我来讲充满了神秘，亲眼看拍电影简直比过年放鞭炮穿新衣还有吸引力。我和一帮小伙伴总像是“跟屁虫”一样，追随着剧组跑来跑去，常常忘记了吃饭，忘记了日落海平线。但是看着看着也会乏味，有时候一句话一个动作是反复来过，“重来”、“重来”的，让我们这些孩子都好生厌烦。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都好像会了一样，念着那句台词打起吨，或者做着那个动作在一旁嬉闹起来，可演员们还在一遍又一遍地“重来”，“重来”。

多少年过去了，我和王晓棠坐在了一起，没有了银幕的间隔，面对面地笑谈这些往事，体会着一种亲切。她这才多少讲了一点过去。说是要比起拍摄现场的“重来”，塑造一个角色在体验生活时的反复可就更是没法儿说了。

在王晓棠的眼里，演员不光是个职业，还是一种事业，要以自己的心去一点一滴地体会研究角色，要认真到虔诚的地步。“现在叫‘投入’，那时候不兴这个词儿。就知道要认真真，不得有一丝一毫马虎地对待哪怕是一个最短暂的镜头。艺术就是这样，你付出千倍万倍的努力都未必成功，何况根本不努力？”

拍《海鹰》的时候，王晓棠曾背着行李到东海渔村住过好久。当时正值隆冬渔闲，他们说服渔民把已经搁晒在沙滩上的渔船重新推进大海，学练摇橹划船。至今，她对当时的情景依旧记忆犹新。那船倒扣在沙滩上时，看上去好大好长，像座能住家过日子遮雨挡风的房子。可推到海里，怎么就变成了一叶小舟，任风浪摆布着，上下颠簸左右摇晃，一片橹板要使出浑身气力才能抱起来，好不容易把橹钉对准小小的钉眼装进去，没等摇动，橹钉又滑落出来，沉重的橹钉差点砸伤了脚。再抱、再装、再摇、再掉……一而再、再而三，花了多长的时间，费了多大的气力，流了多少的汗水，终于学会了摇橹划船，实拍出的镜头却只有两秒钟！

也是拍《海鹰》，剧本中有一句提示：“玉芬飞快地接通电线”，就为这“飞快”，一时间王晓棠的家里布满了天罗地网，所有的桌椅床凳腿儿上

都拉起了电线，一会儿解开，一会儿结起，直练到实拍时，摄影师提了“抗议”：“太快了，像是卡通片……”

我在采访本上飞快地记者这些又有故事性又有说服力的细节，录音机里转动着的磁带留下了王晓棠带有几分兴奋的话音。她似乎也沉浸在自己的讲述中了，本来就很是明亮的目光中闪出飞扬的神采。我突然有一种感觉，过去的岁月并没有离开她的记忆远去。也许她不愿总提起的是那已有的功成名就，那些早已被历史记录在案的辉煌。但是，对于曾经从事过的演员工作，她会怀有一种永难割舍的眷恋。因为那毕竟曾是她呕心沥血的事业，她毕竟全身心地投入过，那一次次的创作中，倾注了她的心血、汗水和情感……

“一个角色的成功，尤其是一个银幕上的角色的成功，是会有它的偶然性的。碰上个好剧本，碰上个好导演、好摄影，一个水平较高的创作集体，又赶上是与演员本人性格经历都近似的本色人物，就很有可能成功，一鸣惊人。然而，这样的机遇可能会有一次、两次、再多到三次，却不可能次次都遇到。要想成为每一个角色都演出光彩的好演员，就不能存在侥幸心理，而应该脚踏实地提高自身修养，具备塑造各类不同人物的功力。艺术应该是生活的积累、升华，而不是重复。我当演员的时候就要求自己演出每个角色的不同，要让自己塑造的这个角色比上一个有更大的成功，而有信心使下一个更好。我给自己订的标准是走一条箭头向上的道路。”——王晓棠如是说。

1963年，一部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敌后的斗争生活的故事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再次使王晓棠成为亿万观众关注的焦点人物。这是一部由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当初小说面市就已经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人们争相传阅。可当影片上映之后，还是有不少观众把片名叫成了《金环银环斗古城》。不言而喻，由王晓棠一人塑造的这对双生姐妹，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

影片中的金环，是一位老练成熟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她正直、善良、泼辣、直爽，疾恶如仇，古道热肠。有较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是位有胆有识的女中豪杰。同胞妹妹银环，同样善良正直，却单纯柔淑，心善面慈，是位在严酷的斗争现实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这两个角色对于王晓棠来讲，都有与她本人气质相近的方面，也都有与她个人性格相去较远的差距，要同时靠近两个不同的角色，要同时塑造两个既相似又不同的角色，就像站在中间的王晓棠要同时缩短与相反两个方向的距离，她唯有使出浑身解数去拉扯双方。

用不着从资料中去苦苦查索，用不着千方百计去套出王晓棠的回忆，只要张开自己的想象，就不难猜到同时担任这两个角色的难度。小到一个动作，一个语调、一个眼神，都是不容忽略的课题。那阵子，王晓棠除去跟随剧组访问故事背景地河北一带的烈士亲属和当年的老地下工作者，按照以往创作角色的惯例去查阅有关的史料之外，便是一头扎进原著，反反复复地阅读，直读的仿佛置身书中，每个细节每个故事都熟悉如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忽而金环忽而银环的去言谈举止思想行事。那段时间她像是神经质的祥林嫂，逢人就问“你说金环是什么样？”“你对银环有什么样的印象？”直到集思广益，构画出自己认准了的金环和银环的形象。

平心而论，对于金环和银环这两个在小说中就已经被人们熟识了的人物，每一个观众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每一个观众都会将书中多侧面的

描写加上个人的经历、性格、喜好、文化层次，把她们塑造成这样或那样的模式。面对银幕上的形象，人们会用自己的这个模式去希望去挑剔。然而，王晓棠一人塑造的这两个角色，则都被人们接受了。随着《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放映，王晓棠再一次征服了亿万观众的心。

一位当年的少先队员讲起“那个时候”：看过了《野火春风斗古城》，在清明节为烈士扫墓敬献的花圈上，孩子们崇敬地写下了金环阿姨的名字。

一位快做外公的老同志讲起“那个时候”：他是个年轻的军官，晚上熄灯后，几个战友谈起找对象的标准，异口同声喊出了“银环”。

更有的年轻人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了这样的话：希望能像银环那样，在党的培养下不断成长；希望能像金环那样，为党的事业毫无畏惧，贡献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

这便是艺术的魅力，这便是艺术家的成功。

观众热情的来信像雪花般地飞向王晓棠，充满赞扬之辞的评论也纷纷对准了王晓棠，而成为焦点人物的王晓棠此刻却十分冷静。在影片拍完后不久，她即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金环和银环》的表演札记。

三十年后，我在北京图书馆查到了这篇洋洋一万多字的“总结”。在细细读过之后，不由地发出一阵感慨。满耳赞声不绝的王晓棠竟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她以流畅、诚恳而冷静的语言既谈了自己对角色的认识、体会、把握，也谈了自己创作中的不足和遗憾，阐述了原因和可以提供今后借鉴的思考。正如她文章中所讲，她做到了“以非常大的热情——对角色，非常大的冷静——对自己。”

这篇文章显示了王晓棠的文学修养。她在对两个人物的性格进行分析时，把姐姐金环比作“写意泼墨画”，气魄大、线条粗，引用了苏轼的绝句“大江东去”，说明其性格的磅礴气势。她又把妹妹银环比作“工笔画”，细腻、熨帖，则用了柳咏一句词“杨柳岸晓风残月”，表现其纤巧。

这篇文章也展现了王晓棠对艺术近乎苛刻的追求。比如银环与杨晓冬之母相见的一场戏，本来已经通过。但她总觉得不太对劲，反复考虑，发现是银环的“笑”多了，使之此时的表现更像现代女性的自己而离银环远了，尽管影片中的银环和现实生活中的王晓棠同样随和、善解人意。王晓棠在这篇表演札记中为此而写道：“只有演员内心十分充沛，对角色理解十分正确，且又寻求到了恰如其分的表现手段，人物才能活起来。”

而当我看到王晓棠在文章中关于表演技巧的另一段论述时，似乎又听到了弦外之音。王晓棠回忆到自己在做京剧演员时，开始唱《贵妃醉酒》中的一段高腔总拔不上去，偶尔唱出来却又干涩涩的没水音。教员启发她说，高不上去不能走低腔吗？一个好演员要明白自己的短处，扬长避短，这叫“藏拙”，几年后，她把这一技巧运用到了金环银环的创作中。但是她又说，“藏拙”只是权宜之计，还有一些困难和弱点是必须克服的，是需要拿出信心和勇气去硬攻的。要成为强者，更需化短为长。

在与王晓棠有了初步的接触，在对她的经历有了一定了解的时候，读到她写于三十年前的这篇文章。有一种感觉，那文章不光是说艺，也是在论人，在向人们表述她处世为人的信念。

一直有一个误会，直到今天面对王晓棠才得以释解。在我的印象里，王晓棠因为成功地扮演了金环和银环，而获得了中国电影艺术的最高奖——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的桂冠。我的印象里甚至在当年授奖大会上，一

身戎装的王晓棠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奖状的场景，那时的她真年轻……

其实，这仅仅是一个幻觉般的假想。我在查阅资料时，仅在 1964 年 6 月的《大众电影》上见到一则很短的消息，称“第三届国产影片‘百花奖’原定的揭晓和发奖活动延期举行”。再没查到有关这届“百花奖”评选的报道了。事实上，第三届“百花奖”的评奖结果确实揭晓，但在当时一种极左思潮的干预下，没有将评奖结果公诸于众，授奖大会也夭折了。

王晓棠在讲述这段往事时，没有灌注更多的感情色彩，倒是讲起了自己父母的言传身教从小影响着她对艺术重品位而淡虚名的追求；也讲到小时候读历史学古人精忠报国的志向教育了她把国家利益视为最高尚；她还讲到部队对自己的培养。她说一个人若是觉得艺术的追求无止境，一个人若把国家利益视为最高尚，一个人若总是感恩于部队和人民的养育，还会把一个奖项看得那么重吗？

然而，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的得主确实是王晓棠。

那一届的评选中，解放军战士第一次获准参加投票，部队十万张有效选票中，几乎全部填写着王晓棠的名字。

——这是真的。尽管没有公布，但是历史记下了。

王晓棠却从来没有把这次获奖当成真事，多年来，她填写的各种表格档案履历中，从来没有记下这一笔。

——这也是真的，尽管她不肯当回事，但是观众们记下了。

而叫历史遗憾、叫观众们遗憾的，还不仅仅是这次评奖的夭折。极左思想不仅断送了王晓棠的一次获奖机会，而且很快便更残忍地扼杀了她风华正茂的艺术生命。

从 1955 年初上银幕，到 1963 年饰演金环、银环，短短不到 10 年里，王晓棠在 11 部影片中担任了角色，为观众们创造了一个个颇具特色的艺术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正在走着一条如自己所说，“箭头向上的道路”。正在越来越受到专家、同行的关注，越来越受到观众喜爱。成为银幕上一颗愈发光彩闪烁的明星。

完成《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拍摄后，王晓棠以一个革命军人普通战士的身分参加了“四清工作队”，来到了贵州农村，一干就是八个月。她是个认真、热情、积极、忠诚的工作队员，在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的同时，还自觉刻苦地锻炼着自己，为了便于接近群众，她用当地方言与老乡们交谈。对于一个演员来说，王晓棠把参加“四清工作队”既当成一次必要的政治锻炼，又看成是难得的生活体验，她希望当“四清”工作结束后，重返银幕的她能有更成熟更扎实思想和演技，能为爱戴她同时也被她所钟情的观众们塑造出更多更好的艺术形象，更好地为人民、为工农兵服务。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对于王晓棠来讲，对于中国的电影事业来讲，对于整个中国来讲，那是一场噩梦，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尽管如此，中国电影史上王晓棠仍然留下了绚丽辉煌的一笔，观众门的心里仍然为王晓棠留下了不可替代的一席。人民记住了她。

当演员的时候，王晓棠的确是颗明星，她自己却并没有出人头地之心，甚而希望走到哪儿都平平常常不引人注目才好。无论是去拍戏、体验生活，还是日常外出，她总是尽量避免抛头露面。在车站等车，她会转过身去，一遍又一遍盯着张旧宣传画看；在路上行走，她会跟在行人身后，埋下头来脚

步匆匆。即便是必须参加的什么活动，她也总是面带微笑，默默坐到不起眼的一隅。她总觉得一个演员也是普通人，也该有颗平常心，即使是明星，不也该像工农战线上那些劳模一样朴实、谦和吗？没理由去抢镜头，夺目光，不应该影响旁人的生活和活动。

但是，人们当然不会忘记和忽略为自己带来欢乐和艺术享受的好演员。每当观众在自己的身边突然发现了她，在人群中突然认出了她的时候，总会表示出发自内心抑制不住的热情和兴奋，总会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爱戴和谢意。每每这样的时刻，王晓棠也会像重逢的朋友一样，回以同样的热情和诚恳，为影迷们签名、留影……

多少年过去了，人们没有忘记王晓棠，即使是在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压在她的头上时，善良、正直的观众们也以自己的方式，给予了自己钟爱的好演员尽可能的关心和爱护。下放到了林场，工人们对她说道：这里天高皇帝远，北京的“大人物”够不着，你权且在这里避难吧。委身屈栖的小屋门口，常常有不知姓名的人们送来的米面菜蔬和钱，人们不希求明星来日的回报，只愿落难的朋友能感受到一分温暖。一位不曾相识的杭州老工人，捎来一块大理石镇纸，上刻八个大字赠于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对北京的年轻夫妇硬是要从自己微薄的工资和粮食定量中挤出一半，接济当时扣发了薪金和口粮的王晓棠，并且表示要一直做到王晓棠恢复了正常待遇的那一天……善良的人们原本与王晓棠素昧平生，只因为他们看过王晓棠的电影，喜欢她的表演、钦佩她的为人……

多少年过去了，人们没有忘记王晓棠。1986年作为影片《老乡》的编剧、导演，王晓棠带着摄制组来到江苏渔村。没想到一下就被当年的老观众们认了出来，人们互相招呼着“金环来啦”，放下手中的活儿，抱着娃娃，兴致勃勃地聚了过来。当时正值捕鱼旺季，别说来了剧组拍戏，就是上级来人明令组织活动，都很难把“橹桨一摇，举家搬迁”的渔民们召集上岸。谁都会算这笔帐，耽搁一天出海，就等于放弃了上千元的收入。可是也怪，王晓棠就有这样的感召力，只要她登上哪条渔船，人们准能看到那条船按要求停靠在岸边，船的主人总会扯起大嗓门，喊得满世界都能听见：“没办法啊，谁让王导演找到咱呢！”一副“好大面子”的神气。晚上，月高星疏，人们又像欢迎远道而归的亲人，拥向摄制组驻地，兜来莲子，捧来嫩藕，送来当地的土特产，带来多年的思念和挂牵……

多少年过去了，人们没有忘记王晓棠。每当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组织学员参观八一厂的时候，总要提出与王晓棠会面合影的要求。这些已经担任了市、县级领导和师团指挥员甚至更高职位的当年的小观众，恭恭敬敬地向王晓棠敬礼，欢欢喜喜地与她合影，握着她的手，诚诚恳恳地说：“我们都是看着您的影片长大的”……

多少年过去了，人们没有忘记王晓棠。每当新春来临，王晓棠收到的贺卡总是又多又好。这些贺卡来自全国甚至世界的四面八方。有老朋友的心愿，更多的是那些王晓棠没有见过面也叫不出名字的新老观众的问候和祝福，有人一寄就是数载多年。平日里，也会有许多的观众来信涌来，人们像记挂自己的多年老友一般询问她的近况，吐述以往银幕内外结下的友情。几位山东的教育工作者联名来信，盛情邀请王晓棠到她们工作的中学去做客。她们总是忘不了和自己一起走过少年、青年时代的“金环、银环、玉芬、玛诺”，电希望今天迷着各种“大腕”的孩子们能知道当年中国的银幕上曾经也是“星

光灿烂”。

对寄来书信和贺卡的朋友，王晓棠总是抽出时间，尽量争取一一回复。实在应接不暇，她就请身边的同志们帮忙，她不愿辜负了那些厚爱自己的观众。有时候，王晓棠会把珍藏的贺卡摆出来，办个“展览”，约上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们一起欣赏，一起体会广大观众对电影事业的支持和关怀。一张张的贺卡像一朵朵的小花，眼前是五彩缤纷的春色满园；一张张的贺卡像一枚枚烛光，点燃了心中的光明和温暖……

如今的王晓棠不再上镜头了，然而观众们发自内心的热情却将永远陪伴她的人生。

一个好演员，努力在事业中探索进取，努力把更多更好的艺术形象奉献给观众，不计个人得失，不谋私利，是应该的。一个好演员，为祖国的艺术事业做出了贡献，为广大观众付出了心血，人们爱戴她、关心她，人们记住了她，也是应该的。一个演员做到这个份儿上，当欣慰平生，当无悔无怨。昨天，王晓棠就曾经是这样一个好演员。

至于今天

今天，她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也是该厂的党委书记，是我军直至世界屈指可数的女将军。风风火火，神采奕奕，她对自己的今天也没有太多的谈兴。她的观点是：“工作天天都得干，还能天天都讲？要讲太容易了，可要干就得从一点一滴入手，一下一下去花气力，一步一步去争取。”

“你做演员的时候，想过当明星吗？”

“没有。”——但是你确实成了一个明星，光彩灼人。

“你参军入伍的时候，想过能成为将军吗？”

“没有。根本想不到。”——但是你确实佩戴上了将军的金星，世人刮目。

人们都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然而，当了明星又当了将军的王晓棠却说自己对这些从来没有想过。不过，她有她对自己的要求，有着自己制定的标准——无论干什么，都要竭尽全力去干好，干出自己的水平。哪怕是最普通平凡的工作也要做出自己对这世界的一份贡献。

1952年，王晓棠穿上了军装。最初她是总政京剧团的演员。唱念做打，刀枪棍棒。无论是压腿下腰，翻跟斗，跑圆场，还是吊嗓子，练身段，西皮二簧昆曲，王晓棠样样练得汗流浃背。她没用这分辛苦换个功成名就，只希望站到舞台上听到的是掌声而非倒彩。父母的爱好熏陶了她，刻苦的求索充实了她。本来也许真能圆一个京剧梦。王晓棠哪里想过从舞台上走到水银灯下，做了电影演员，而且当了一个相当受欢迎、相当被赞赏、相当有功力、相当够水平、正经不错的明星。

八十年代初，脱离了灾难、重返八一厂的王晓棠感到的是来之不易的再生，是时不再来的机遇，她全身心地投入了艺术创作。自编自导自演，加上自己作词、谱曲、演唱，为久违了的观众们奉献了复出后的第一部影片《翔》。创作的初衷只是要把自己对人民的一腔感激之情，把自己在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中获得的大彻大悟，对亲人般的观众们倾述。就像她时那种种非难和误解不屑一顾，她对自己因此能获得什么也毫无兴趣。然而，这部影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六个“自任”创下了中国电影界的纪录，一部《翔》

唤起了多少心灵的共鸣。人们给予王晓棠的称道已经不再限于她娴熟的演技、较高的艺术品位和美貌的外在形象。一位老科学家在谈到人生和追求时，慷慨疾书：“羞为甘草剂，敢做王晓棠。”

199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上任了自己的第一位女厂长。王晓棠结束了自己的银幕生涯，开始塑造人生中另一个崭新的角色，这又是她自己不曾想到的。

时隔不到一年。1993年7月，组织上找王晓棠谈话，告知数日后她将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时，“还轮不到我啊！”的意外脱口而出。无疑，这副多少人日思梦想，金光闪闪的肩牌，对于王晓棠来讲，又像是从天而降。按有的人讲话：王晓棠以前可是连党小组长都没干过的啊！当副厂长之前，组织上进行“摸底谈话”。说了半天，王晓棠却仍然是那个态度：“让我当文职干导演吧。”而现在她不仅当了厂长，而且还要当将军！真是有点出人意料。

然而，命运往往拗着劲儿，你不刻意追求的却会不期而至。而你不论是否做好思想准备都必须正视它的到来。必须十倍百倍地努力，必须在心中树立更高的目标，才能使荣誉和责任变成扎实的、可靠的，让这世界承认。

不可否认被授予将军军衔，王晓棠是幸运的。同样不可否认王晓棠被授予将军军衔是无可非议的，而且今后的日日夜夜将证明她做一个将军，当之无愧。

几天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庄严的授衔大会上，当王晓棠从总政最高领导手中接过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亲自签发的授衔命令时，她的表情既庄重又平静。她默默地、有条不紊地按照大会议程安排，退下了旧肩牌，换上将军的金星，重新走进人们的视线。她的心里若说有一种冲动，那就是一时间，她觉得肩上担起了更重的责任和使命。

采访中，王晓棠对我讲，从感觉上，当将军和没当将军不存在什么两样。我却对她说，还是不一样。比如她现在外出，要经过上级批准，有关部门采取必要措施是在保卫一位将军。而她现在要接受采访或是会见什么外国客人，也要经过上级批准，不管她以什么身分出现，都不能不令人联想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采访中，我对王晓棠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将军和当演员是一样的，都要尽心尽力，争取高水平。她却对我说：“当将军和当演员也有着截然不同。那时候，是众人造就我，各方面的努力促成了我的成功。现在，是我要全力去造就别人，造就我的电影厂，造就我们的电影事业。”

王晓棠被授予将军之衔，八一厂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由电影艺术家成长起来的女将军。厂里的同志们把这当成一件大喜事，当成自己也有份的集体光荣。他们真想好好庆贺一番。来一次朋友式的聚会，为工厂长干一杯！开一个全厂大会，让大家都振奋一把！送一束勃勃朝气的鲜花，表达美好的祝愿！但是，就连最简单的形式都没有。同志们了解王晓棠。于是，在一阵激奋的议论之后，大家共同认为，只有更努力地工作，才是对王将军的祝贺和支持。

采访中，我也问过八一厂的人们，感觉中王晓棠当将军前后有什么不同？他们几乎都是一样认真地想了想，一样摇了摇头。不过，平日在工作中与王厂长接触最多的办公室的同志们讲了这样一句话：当看到她身着将军的那种气质和精神，好像对她以往的工作精神和态度找到了一个较准确的形象。她还真有一种将军的魄力和干劲，她还真有将军的胸襟和风度，她还真就是位

将军。

1992年底，一个刮着寒风的冬日。北京丰台区王佐乡一片旷野中，走来了一伙军人。好像是不知冷一般，站在大风里指指划划了半天。八一电影厂的有关人员，看中了王佐乡的这片地上的几间旧房，想买下来放道具车用。这是需要让厂领导拍板的事，于是他们请来了王晓棠，约来了王佐乡的主人们。此时，准备买地的、准备卖地的，都把等待的目光盯住了王晓棠。

一向办事果断的王晓棠并没急于表态，似乎没注意人们的注视，她把自己的目光从脚下伸向旷野，这里有一片矮小的树林。冰天寒地里，树上光秃秃的，没有生气也没有色彩。

“怎么样？这是4亩地，要不……再加点儿？5亩？”有人憋不住了，试探着问。

王晓棠头都没回，淡淡一笑，把眼光又放得远了些，扫过一片树林，向前看去。谁也猜不透这位女厂长从这片土地上看到了什么，谁也没听见她低哼了一句：5亩，真不值得一买。

“你这片地一共有多少？”王晓棠终于开口了。她伸出手，顺着目光所及的树林划了一圈。

“大约200多，300来亩吧？”

“要全部买下来还差不多。”王晓棠说。平平静静的，轻轻淡淡的，却有一种一语既出，驷马难追的坚定、自信。呼啸的寒风顿失威力。

无言，在场的所有人都只剩下了惊呆了的目光。

也是同一个冬季。刚刚结束的“十四大”，在八一厂引起了有关“深化改革”的学习和讨论。讨论是热烈的，人人心里都像燃着把火，说法也是各样的，对于改革谁都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作为八一厂厂长的王晓棠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和党委一班人引导着讨论的深入。他们来到各个部门，和大家一起领会中央精神，联系本厂实际，研讨关系到每一个八一厂人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

在一片深化改革的讨论和呼吁声中，八一厂的这个春节过得格外热闹。

也是助阵呢。在此期间，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出了文件，对故事片的发行工作进行了改革。

按照以往的做法，电影厂把片子拍完，交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一收购，先拿一百万的预付金，影片上映一年后结帐，多退少补，就算完了事儿。现在则不同，直接与各省市公司见面，由着人家挑三拣四，择优弃劣，差了赔，好了赚，社会需求和电影厂的经济效益明打明地挂起钩来，一句话，把电影直接推上了市场。此乃电影界改革的一大举动。作为电影生产厂家，谁还能按部就班坐得住，谁还不急选良策以求适应。兄弟制片厂纷纷采取措施，争取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在竞争中占据主动。深化改革成了电影界的必然趋势和电影人的急迫心情。用八一厂不少人在讨论中讲到的八个字，就是：“势在必行，不改不行。”

1993年2月，春节刚过，八一厂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厂里的改革从讨论认识转向了具体的设想和实施。

王晓棠厂长并没有担任改革小组的领导工作。但是厂里人们都说八一厂的改革始终没有离开厂长的关心和指导。只要她抽得出时间，就总会走进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参加那里的讨论和研究。有时候，她从厂领导的角度谈论自己的设想和提供参考意见；有时候，她像厂里一个普通的老职工，在办公

室的走廊上、在上班的路上，甚而在餐厅的饭桌旁拦住领导小组的同志，“反映”自己几十年工作实践中最具体的体会。她会以自己许多独到的见解引深人们的思考，也会为一个意见分歧和同志们争执不休、各行己见。工作太多，她就利用会议和办事的间隙走过来问一问、谈一谈；白天没有工夫，她就在晚上、在下班后的时间里去关心、去参与。她常常和改革小组的同志们一起开会到深夜，这时候，她会站起来，伸展一下身体，然后自掏腰包，请同志们吃一顿夜宵。

改革方案第一稿即将出台的那段紧张日子，王晓棠正值身体不适，医生在她的办公桌边放了一只氧气瓶。同志们心疼她，劝说再三，不让她再参加晚上的加班。王晓棠则一笑了之。劝说多了，她做出了让步：我不讲话，也不动脑子，就坐在一边听你们讲。可哪一次她会当旁观者？又有什么事，这个厂长能不动脑子去思考呢？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但是做为一厂之长，王晓棠责无旁贷地尽着自己的“有限能力”，并愿将其融于集体的智慧和努力之中。

今天，八一厂的改革方案经过无数次地修改充实，已经基本完善，应该说这里面凝聚了八一厂党委每一个成员的心血，也集汇了八一厂每一个工作人员的热忱和责任心。而这其中有多少内容出自王晓棠厂长的思考，有多少款项是由王厂长最初提出的方案演变，连改革级领导小组的成员们也说不清了。但是，说到八一厂的改革，人们会深情而明了地告诉我：一步步都有厂长的心血，她总是站在自己独特的角度，以极大的热情和周密的思考，看得更远。

人们拥护改革、人们呼唤改革、人们期盼改革，然而动真格的了，涉及到具体措施了，有人又会因为种种原因而产生出不理解的想法，毕竟是头一遭，毕竟是要对几十年“约定俗成”走惯了的老路、依照惯了的老章法进行变革，毕竟要改一改长期形成的一些意识和观念，毕竟八一厂是全国唯一的军队制片厂，也是全国唯一的综合性、多片种，集故事片、新闻纪录片、军事科教片为一体的大电影厂家。它有着许多与兄弟厂家相近似的地方，也有着更多与其它电影厂从体制、管理到生产流程等各方面的不同。它的改革要与整个电影界、与全社会接轨，又不能照搬其它厂的经验。要使人们的思想顺应改革的深入，要走出自己切实可行的路子，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刚刚领受了军委交付的一系列影片《大转折》、《大进军》的八一电影制片厂面临着双重意义的“大进军”。

厂长王晓棠面对这样重大的举措，面对这并不太轻松的局面，并不想以命令的形式快刀斩乱麻，尽管她的意见在八一厂颇具权威性。但是，站在领导者的高层次，她和党委一班人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引导了这场改革。她在各种场合为之鼓吹呐喊，各种会议上、工作安排中，她都提醒着人们要有新的思考角度，要强化改革意识。八一厂的领导们把改革大张旗鼓地摆进了党委和厂里工作的议事日程。

1993年夏改革方案雏形即成，领导小组需要向王晓棠汇报，征求她的意见。可偏偏她的工作也忙得不分昼夜。忙中生智，王晓棠把汇报安排在了车上——那天她去电影局汇报工作，拉着改革领导小组的同志一起上了车，利用行车的时间，和他们坐在车上讨论起了改革方案，车到站，话没完，王晓棠又拉着他们一起走进了电影局长的办公室。在她自己的工作汇报结束后，王晓棠提出，请局里的领导也听一下八一厂的改革设想，希望能得到局里的

支持和指导。

汇报是简明扼要的，简明扼要的汇报中却包含了十分丰富扎实的内涵，整体改革的大构想，意义所在，乃至各个具体部门、具体岗位的措施方法，应有尽有，既有大局上的统一要求和规划，亦有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拟订的不同条款。甚至连文学部这样量化管理难以明确又和经济指标不易挂钩的单位，也做出了较周密、切实可行的设想，将其纳入改革的管理轨道。

这个汇报听的局领导们直点头，精彩处忍不住拍响巴掌。最后，电影局领导十分恳切地说：我们还一直在议论八一厂的改革该怎样动作，会怎样动作。没想到，你们动得这么快，而且一鸣惊人。对于八一厂在改革方案中提出厂长也要参与风险抵押一事，电影局的领导表示高度赞扬，这一步迈得很大。

这被电影局领导誉为“迈得很大”的一步，正是王晓棠自己提出来的。

进行改革，是为了影片生产力，提高厂里的双效益，是为了提高人们的工作责任感和积极性，要以鼓励为主，这点不假。然而，是改革，是做前人未做过的事情，就难免有风险，有挫折，甚至失败。如果实行责任制，承包了，不仅没赚反而赔了怎么办？如果立了军令状，任务非但没完成，“伤亡”还挺大，怎么办？罚！王晓棠说出了人们从理智上认可，从感情上又难张口的办法。他说这道理很简单，赏罚不分明就难以出高效，罚和奖手段不一样，目的却统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王晓棠进一步提出了厂长也要进行风险抵押的建议。她说这道理也很简单。作为八一厂的法人，厂长对整个厂承担着责无旁贷的责任。如果厂里的工作出现了什么失误，效益出现了什么亏损，厂长应该首先站出来接受惩罚。

写到这里，我想起另一位将军的故事，那是一位海军将领，一位从战争风火中走来的白发人。几十年里，下部队检查工作，他总喜欢走水路，坐自己的军舰。风浪大的日子如此，年事已高也如此。他的名言是：“海军指挥员怕风浪还行？”颇见将军气度，颇有感召力。凡随他下部队的人员无不上船，凡他登上的舰艇，水兵们无一不在风浪中坚守岗位，凡听其一言的军人们无一不为之感动振奋而增军人之威。

王晓棠虽不出海登舰，但在改革大潮的前沿，亦显出一个将军的威风。

八一厂的领导们就此达成共识。大家纷纷表态，也要求参加风险抵押，以此举动再次表达了自己对于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后来，这一项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八一厂的改革方案中。

两年之后，1995年春节刚过，八一电影制片厂召开了全厂中基层领导干部大会，由厂方和三个部门率先签订了承包协议。这一步的迈出迅速而慎重，按厂党委和王晓棠厂长提出的要求是：各部门不能一刀切，成熟一个签一个。这次大会上，本来还有一个部门是在计划之中的，但因部门主要领导外出，考虑到这样郑重的大事当以主要领导在场为妥，所以该部门的签约推迟进行。

签订承包协议的大会进行的庄严、热烈，签了的部门人人磨拳擦掌，如吹响进军号的大军；待签的部门人人跃跃欲试，像请战待命的队伍。人们说：改革对于有着40多年历史的八一厂，如同第二次建厂，人们期盼着八一厂更加兴旺的新形势早日到来。

如果说，在学习“十四大”文件的讨论时，王晓棠作为一厂之长已经预感到八一厂改革之势即将形成，那么，当她站在那一片小树林边，用手一圈，

大开其口时，她又想到了什么？

走马上任当厂长的时候，王晓棠就曾认真地分析过八一厂的形势。要让这个唯一的军队电影制片厂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既保持特点，又取得优势，王晓棠认为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对外加强与各兄弟厂、各省市电影发行公司以及各有关部门的协作、互助互利，携手共进。二是对内强化自身。所谓强化包括体制改革，包括加强管理，而电影制片厂归其一点，还是要拍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影片。至于买地，则是王晓棠心中时时活跃的种种筹划之一，她在这片土地上勾勒着一幅大略宏图——建一个军事影片拍摄基地，搭一座包融各个时期各种战场在内的军事影片城。

八一电影制片厂自然要以拍摄军事题材的影片为主。再现人民军队数十载纵横千万里的战斗历程，讴歌中华民族百余年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史诗，需要大量的外景地和历史遗迹。有时候一部片子、几个镜头，就得大江南北地跑来跑去，庞大的摄制组，漫长的战线，耗时耗力耗财，往往还会因为条件限制而不尽人意。有时候人困马乏，还找不到与原剧本构想相吻合的外景地，凑合拍出来的又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有时候花耗巨大搭起的场景无法保存，拍完一部片子就只能放弃。要是建立一个军事影片拍摄基地，不仅这些问题能够得到相应的解决，而且还可以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想法固然好，立意也挺深远，可办起来呢？在可谓寸土寸金的北京市要块地，别说300亩，就是30亩，试试看！据说同样是驻京部队一个大单位只要几十亩地，报告打了好几年，硬是还没批下来，据说市里领导特别“护地”。别的问题都好商量，他们可以走进平常百姓家去嘘寒问暖，也可以亲赴企业、工地现场办公。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领导们都处理得果断、迅速，唯独一提买地，那些和蔼可亲的头头们情不自禁眉头就要皱上一皱，300亩，天方夜谭！而且，这个数儿还是王晓棠最初的动议，待她真拉开架势要买的时候，我们的女将军下的决心是拿下600亩！

600亩，意味着什么？眼下最现成的例子，现有的八一厂从东到西，由南至北，方圆大约390亩， $600 \div 390 \approx 1.5$ ，王晓棠开口要买的地，等于现在的八一厂一倍半还要大！

那天，厂里有关同志去市里申报买地计划，白纸黑字的报告摸在手里，心里却像无底洞，空得没谱。眼见着排在前面的单位报了几十亩的数都碰了壁，他几乎都没了开口的勇气。人家点了几次名，他才硬着头皮应声报出计划，600亩地啊！连他自己都觉得那数字太大、太渺茫，高不可及。

回来了，去申报的同志带着失望回到了厂里，又带着一线希望找到王厂长。平日的了解使他认定，只要王厂长下决心要办的事，就一定有办成的可能。

这不是一个人的感觉，日常工作中，同志们好像养成了一种习惯，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就得全心全意去完成，毫不含糊，王厂长在工作上要求很严。但是，遇到了困难，实在难以解决了，就去找王厂长，她会做你的后盾。不管是导演、摄影，还是服装、道具，也不论是行政干部还是业务人员，在在职的、退位的，有了难题，都会去找王厂长。

也别说，王晓棠当过演员，做过导演，兼过制片。直到现在，摄制组拉不开栓，她还能亲自动笔为剧本分镜头；坐上剪辑台，参加影片的后制作。做一个电影厂的厂长，她熟谙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掌握厂里各个部门的情况，布置工作，她从不讲外行话，出谋划策她总是从实际出发。厂里上上下下

下许多人把王晓棠看做推心置腹的朋友，又看成懂行在行的领导，喜欢把自己的苦恼和困难向她述说，相信从她那里能得到安慰和鼓励，也能找到信心和办法。此时的工厂长真还没叫她的部下失望过。

让我把话题岔开。

在采访王晓棠的日子里，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太忙，忙得根本排不上采访，有时候好不容易接上了头，却又因为突然情况而临时变更。对于这个“忙”，开始我很不以为然。全国那么些电影厂呢，个个厂长都如此忙得顾不上接受采访？就说这书涉及到的十几位女将军，谁没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谁不肩负重任？怎么就单单她一人忙到了别的稿子部送厂排版了，我这儿采访还没进行完的地步？然而，当我走近她，坐到了她的办公室里，面对面地看着她，我才似乎对这“忙”有了些许的认识。

别说一个社会名人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其中又有多少与她个人有关的座谈、会见、报告、仪式等都被她一一谢绝了），也别讲一个厂长对上对下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其中又要有多少会议、汇报、讨论、调研和决策），这些繁忙都是可以想见的。若是在这些例行的繁忙之外，再加上那么多的下级朋友们来找她排忧解难，这种忙，便是难以量化和估算的了。何况，面对厂长的办公桌，王晓棠还给自己加了不少码。比如，按常规，一部故事片投产后，厂长和主管影片生产的副厂长审片只看第一批样片的镜头，王晓棠却每批都看；比如重大题材影片的外景地，她要挤出时间亲自与导演们一起商定。而一天24个小时，1小时60分钟的时间对谁都没有任何优惠。阶谓“挤”出来的时间，不过是挤掉了休息，挤掉了吃饭，挤掉了她认为比较起八一厂命运的大事来，可以推迟，可以暂缓甚或辞谢的那些事情——也包括各种各方的采访。

至于我的采访，十分荣幸被八一厂的同志称做是“特权”，因为是总政有关部门组织的，是献给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礼物，是十四位女将军缺一不可。要是换做别的采访，怕是连这一再推迟的机会都没有。而就这所谓的“特权”采访中，真正和王晓棠坐下来进入情况的仅有一次，说是从下午2：30到7：30，我和她都视时如命般不肯去食堂吃饭，请人代劳买来凉面，一人一盒端在手中，边嚼边还进行着问答。尽管如此，我的录音机也只留下了一盘磁带的素材——不断地有人走进来，有电话打进来。从政委到秘书，到摄制组的导演、制片；从本厂的工作人员到兄弟厂来访的同行；从上级部门的通知到外地长途电话……

望着一个个比我还急切的人，一件件比采访还重要的事，看着王晓棠干脆利落又热情认真地一次次站起来，一次次握手，一次次抓起话筒，一次次答复，再一次次回到我的近前，思路不断地继续我们的交谈，我在佩服她的敏捷清晰的思路和运筹能力的同时，只能感慨她的忙碌。实在是太忙了。

说到这儿，不妨录下两个数字和两段评语。两个数字：八一厂在编人员是1000有余，在八一厂院内生活的是7000多口人；两句评语，一是广播电影电视部有关领导说过：八一厂的片子可以放心；一是部下讲他们的厂长“非常非常有责任心”，讲这话时，他们强调，只说一个“非常”是远远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好了，再把话题拉回来，拉回买地，拉回到买地遇到了困难。

总政一位首长说：晓棠同志，地买下来了，我给你立功！

给将军立功！可见这件事意义之重大，无异于取得一场决定性大战役的

胜利；可见这件事之艰难，无异于一场背水一搏的攻坚战。

功，王晓棠并没想要，事，她却分分秒秒在惦记着，一定要干，一定要干成！

不是说具体办事的同志遇到了阻力，举步维艰吗？王晓棠一边安抚鼓励，运筹帷幄为他们做后盾，一边积极主动，披挂上阵，亲自出马。

不是说主管城市规划的张百发副市长一听买地躲都躲不及吗？王晓棠亲自书信一封，字里行间表达了人民军队与地方政府和人民的鱼水深情，行间字里阐述着此次买地实为大业大计的深远意义。行文走笔溢满真诚，尤其是信中提到建立电影城对再现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战斗历程和表现老一辈革命家光辉形象的紧密关系及迫切需要，更让北京市领导深感意义非凡。直看得百发市长于理于情都点头称是，在信上签署极具权威至关重要的意见，二十分钟，这一关通过了。

终于，搏到了这一天。八一电影制片厂拟在丰台购买 600 亩地的议项，摆进了北京市政府 1995 年第一次市长办公会的议程里，并且一次获得了通过。

就在我写下这几行字的日子，我接到八一厂办公室刘金柱科长的电话。话筒里传来了掩不住的喜悦和兴奋。刘科长告诉我，那片由 4 亩变 300 亩最终拿下了 600 亩的土地上，已经开进推土机了，建立军事影片拍摄基地的构想已经在一个个木桩的竖立、一块块基石的砌垒中矗立于现实。

在北京市一下购买 600 亩地，而且在实际签订合同时还又捎带了 100 亩的“边缘地带”。这简直像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梦”。而这梦想成真，许多人说非王晓棠莫属。有人说名人效益不可轻视，有人说将才帅风不可低估。我则同意这样的说法：名人效益也罢，将才帅风也好，都属于王晓棠。此事她办成了，因为她想办，她去办，她有信心去办，她努力去办。对于我们的电影事业来讲，王晓棠办成了一件大事，而对于她自己来讲，不过是又一次展现自己能力和才华的机会，只是实现了她心中许多构想里的一件而已。可是王晓棠对我说：这件事可不是我的功劳。她历数了许多人名，赞扬他们如何吃苦耐劳，身先士卒，令她感动。

还需记下一笔：在 1995 年年初召开的全国影视工作会议上，当李铁映同志听取了王晓棠同志的工作汇报，并给予支持时，我们的女将军提出了一个要求，她恳请李铁映同志能代她、代八一厂向北京市政府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地方政府，感谢首都人民对我们的军队、我们的电影事业做出的又一次支持和贡献。

厂里进行改革，厂外购买土地，两件大事几乎同时进行，又几乎同样收到可喜的成果。当然王晓棠不会把它们记在自己的帐上。到现在她还在重复着五十年代我们接受的一种思想教育：工作自己去做，荣誉归于集体。但是，在这两件事情实施过程中，她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也真真切切地显示出这位女将军“运筹帷幄，决战千里”的大将气势。采访中，我情不自禁要为这些颇具战略眼光的大举措拍案喝彩。怎料到，随着采访深入，王晓棠以她的大手笔为我画出了另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1994 年夏，我接受了采访王晓棠的任务。当我做好案头准备，联系采访时，被告知“王厂长出国考察设备去了”。当时我就好生纳闷，怎么厂里进个设备还要厂长亲自考察？这设备一定了得！不知是个什么宝贝家伙呢！不幸言中，后来我终于弄明白了，王晓棠亲自出国考察、并且亲自提议、亲自

向上级汇报、亲自制定引进方案、并且亲自参与实施的，是电影制作的尖端科学——数字电影，亦称电影高科技设备。

在我纳闷不解的那个夏天，地球的另一方也有一些人为着同一件事露出了不解的神情，那是些外国人。

1994年7月29日早上，还在喝着咖啡吃早点的柯达公司高科技公司伦敦工作站的人们，发现两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正在向他们走来。中国客人要考察的数字电影，是当今世界电影制作的一次革命，它使电影技术的性质、功能都进行了变革。

还是讲点通俗易懂的吧。

观众们大多都会有这样的记忆：有些影片明明表现的是百十来年前，甚至更早时期的故事，银幕上却出现了宽阔的柏油马路，密布的高压线以及一座座高楼大厦，还有的旧影片艺术价值很高却划痕累累无法观赏。至于拍摄者们碰到的困难就更多了，需要雪景，却连续晴天，需要阳光，却久阴不晴。拍战士过冰河，下去一趟棉袄棉裤湿个净透，若是重拍，不光战士受罪，还得连夜赶着烤干衣服。都在抱怨中国的战争片场面太小器，近两年场面倒是大起来了，可有多大的场面就得有多少人马撑起来，整师整团的部队调来调去，就是不算经济帐，部队的训练耽搁了，谁来补？

如果用了高科技设备，影片中不需要的背景可以抹去，将现实场景拉回到旧年代的模样；老片子的划痕可以消除，使之完好如初；也能用一二百人做出千军万马的效果。至于晴天拍成雪天，阴雨绵绵拍出阳光灿烂的效果更是“小菜一碟”。在好莱坞拍摄的影片中，运用高科技就可以按照剧情需要将纪录片中的布什真实形象抹掉，换以演员替代，保留原来真实的车队和卫队，将这样加工过的场景衔接到故事片中去。把史泰隆从悬崖跳下去时系着的保险绳消除，只留下史泰隆只身跳崖的逼真惊险，有人说了句话，一语概之：电影拍摄中凡是人可能想到的，高科技设备就可能做出来。

目前，拥有此项高科技专利的柯达公司在世界上只建了两个工作站，一个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影城，另一个便在英国伦敦，在王晓棠和八一厂总工程师前来考察时，这里刚建点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柯达人打量中国客人的目光中充满意外。当中国客人问到是否有计划把第三个工作站设在亚洲时，他们坦言相答：没有，柯达人。实在想不到中国人自己找上门来，而且还有一位女士。当然他们更想不到这位女士是中国的一位电影制片厂厂长，一位佩带金星的女将军。面对千里而来的中国人，就足以让他们钦佩的了。

历来以办事严谨、循规蹈矩之称的英国人请中国客人走进了机房，破例不限时地任由他们随意参观随意提问。不仅看了高科技制作的节目，而且对仪器进行了详尽的现场说明。

这个主件只有150立升冰箱大小，加上所需附件，也仅仅只要5间约14平方米的房间即可装置的高科技设备吸引了王晓棠，那天，王晓棠高兴极了。要论专业技术，她在这方面并不能称力行家，然而从最初获悉有关数字电影的信息之时，王晓棠就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以一个电影艺术家的实践经验和一个将军的战略眼光，预见到高科技将对中国电影事业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影响。了解和引进高科技的念头常常使她兴奋不已，也促成了她此次出国考察之行。而今天，在异国它乡的亲眼所见，证实了她对高科技的认识，坚定了她的设想，一个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决定在王晓棠的思考中趋于完善。

在详细咨询、认真斟酌之后，王晓棠给了外国人更大的惊奇——“我们要买！”

显然，中国人的这一要求比他们的到来更叫柯达公司感到吃惊，要知道世界上许多更先进、更富有的国家还没有迈出这一步呢。主人们考虑再三，向中国客人提出租用的建议。

但是——

“我们要买。”——王晓棠的决心很坚定。动议是显而易见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要拍好片子，就要拥有能拍好片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不光是一部片子，不光是一个制片厂。八一厂如果引进了这套高科技设备，就等于全国的电影制片厂拥有了它，中国拥有了它。王晓棠要的绝不是依赖别人来制作一两部好片子，她要的是中国人掌握这门领先世界的技术，要的是中国人能拍出更多更好的影片，走向世界，攀上世界电影之巅。

从另一个方面讲，中国如果引进高科技设备，便是亚洲的唯一，与美洲的洛杉矶、欧洲的伦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电影业的高科技加工服务点，其丰厚的经济效益可想而知。

事情当然远不是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就“OK”了那么简单，昂贵的经费不能伸手向国家要，陈旧的观念意识也不容忽视。也是的，有几个人见过那高科技的模样？太神了的就难以让人以平常思维认可。花那么多钱，又不容易掌握，也许就不如自己使惯了的老设备老手法那么顺手、踏实。

然而，王晓棠就是王晓棠。她自己都说：没想好的事她不会轻易开口，一旦考虑成熟，说出了口，她就一定要做到。她还就是愿意做那些困难多、风险大的事，她认为这样的事即便要历经艰辛，千折百回，但做成了就见大效果。那些小本小利、四平八稳、顺顺当当的，她还没兴趣呢！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观念更新。社会在前进，电影事业在发展，变化极迅速。要跟上这形势抑或还想领先，我们就得不断更新。更新我们的思想、观念、技术、设备……若是老满足现状，拘泥于“习惯”，就必将落后，就必将被淘汰。落后不属于王晓棠，也不属于她尽心致力的事业，她要走箭头向上的路，她是个站在潮头的将军。

从英国考察回来不到两个月后，1994年8月22日，在于永波主任亲自主持的总政首长办公会上，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王晓棠和该厂总工向领导机关和首长们做了“关于引进电影高科技设备”的专题汇报。本来预计一小时的汇报时间，由于王晓棠事先的充分准备，结果言简意赅的汇报只用了半个小时。在王晓棠亲自执笔的这份汇报提纲里，不仅写明了引进的意义、考察的情况，而且写进了引进的具体措施、方法、步骤。也就是说，王晓棠已经开始着手积极而见成效的前期准备了。大胆、超前、富于现代意识且意义非凡的设想，赢得了我军高级决策层的关注和支持。

至于如何转变人们的观念，至于怎样克服实际困难，至于怎样筹措，王晓棠不肯向对面坐着的我透露，是不是牵扯到“军事机密”我不得而知。不过，这种做法倒挺符合王晓棠的性格。她不愿面对困难怨声载道，也不愿对取得的成就津津乐道，唯愿在那一步步的前进中，在那一个个的战役中尽展锲而不舍的顽强和举重若轻的心境。唯有在克服了困难、解决了问题、占领了一片阵地之后，她会将那随之而来的欣喜与共同作战的同志们分享，会将更远的目标纳入自己的视线，会将更多的自信化成淡淡的微笑，面对明天。

可以告诉读者的是，到这篇稿子落笔时，引进高科技设备已成大局，各

项协议基本谈妥，款已到位，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至少越来越多的人在更为积极地看待这件新生事物了。为了尽快引进，尽快将高科技运用到实际拍摄工作中去，八一厂特意请来了柯达公司的专家和美国 20 世纪福克斯公司总裁的技术顾问与本厂的专业人员进行学术交流。得以中科院的支援，具体操作高科技的专业人员已经选定，不日将赴外进行培训。

1995 年广播电影电视部何栋才副部长在全国影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以八一厂引进高科技设备为契机，使中国的电影技术上一个新台阶。”

1995 年 1 月 9 日，八一电影制片厂召开了誓师动员大会。以恢宏的气势真实再现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胜利揭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序幕的斗争历程的影片《大转折》，反映三大战役后，我军各路大军胜利渡江，分别向中南、西南、西北进军，解放全中国的历史壮举的《大进军》，将先后投入拍摄。

五部十集影片，兵分十路，同一时期呈梯形相继开机，慢说一个八一厂，在全国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本身就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大兵团作战，一次波澜壮阔的大进军。三总部首长、广电部领导到会表示支持和鼓励。电影局长滕进贤两句赠言“已筑昆仑成伟业，再向高峰大进军”道出了各级领导以及全国亿万观众对八一厂寄予的深情和厚望。

王晓棠一身戎装，代表八一电影制片厂党委和全体工作人员向到会首长作了简要汇报并表示了决心。她以众所周知的语言魅力，将火般的热情山般的信心，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她说接受这样的拍摄任务。使八一厂和全厂同志有幸获得一次最大限度地展示才华的机会，也是一次对人民和军队养育之恩的回报。八一厂的同志们将甲一个个艰苦奋斗的白昼和夜晚，迎来《大转折》、《大进军》的胜利曙光。

那天谈到引进高科技，我对这样颇具战略眼光的大手笔和如此神速的办事效率有感而发。王晓棠则说还不能讲大功告成，只要机器没最后到手，就得有迎战新困难的准备。就算机器运进来了，安装上了，开始运作了，还要制作出好的片子来，才能算我们真正的拥有。

尽管如此，王晓棠也还有一种兴奋，那是对前程的展望充满了信心。她告诉我，如果进展速度再快一点，军事影片拍摄基地和高科技设备都将运用到《大转折》和《大进军》的拍摄中，使我们的工作如虎添翼。我们有可能也有信心拍出精品之作，传世之作。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创作出让全世界的人们争先一睹，声震环球的一流影片。

王晓棠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会想到自己是一厂之长，是个将军，因为那使她有一种历史的使命感。

后来的一天，结束了对其他同志的采访，已是晚上十点钟了。走出八一厂新建的办公大楼，回头望去，王晓棠厂长办公室的灯光在夜幕中亮得醒目耀眼。八一厂在夜幕下显得更大了，看不到边。这使我想起王晓棠说过的一段话：作为一厂之长，就要肩负起整个厂的命运，历任厂长都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接力棒传到我的手中，我的任务是要做前人未做过的事，营造新的业绩。我还要考虑为后来者打下什么样的基础，不能只想眼前。

不知道该对将军下个什么样的定义，翻遍手头的各种词典，发现“将军”二字不光是名词，还是动词。一种挺有气势的形象，继而想到“将军”对于王晓棠来讲，不光是让人敬服的称誉，还是一种证实，证实了她具有高级指挥员的魄力、眼光和才干，证实了她的的确确能在属于她的战场上叱咤风云，

指点江山，一展将军的风采。

我曾经问过，当演员和当一个将军厂长有什么不一样？王晓棠答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被人造就与造就他人、造就事业的不同。

要我说，对于王晓棠来讲，当将军，是历史为她提供了另一个舞台，使她能够有机会展示自己做演员时无法展现，甚或没被发觉的另一种才干。应该说，将军这个角色，王晓棠照样塑造得得心应手，精彩！

再回首，王晓棠办公室的灯光仍旧亮着，真的，挺亮、挺亮的……

那么，明天呢……

那么，明天呢？当地不再是演员，也脱下了将军的戎装，不再当厂长的明天。

她说：“那我就自由啦！要做的事可太多太多了……”说着，她笑了，那笑声朗朗的、爽爽的。

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其最辉煌的一段时光，或者是在青年，或者在中年，或者少年得志，或者梅开二度老来俏。即或无法与他人相比，也可以找到与自己其它时期相对而言的亮点。

当过将军也做过明星的王晓棠人生中似乎有着更多于他人的光辉，那么，就她自己而言，当数哪一段时光更为绚丽呢？她说过，要走一条箭头向上的路。那路至今一直在她脚下延伸；她说过，总相信明天比今天会更好。那么，明天，她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当她不再做明星，也脱下了将军的戎装不再是厂长的明天，王晓棠会是什么样？她会做些什么？

问题一提出，立刻引出她一阵很轻松的笑声。似乎没有片刻思考和犹豫地爽声回答道：“可以干的事多啦，因为那时候我就完全自由啦！”

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八一厂办公室的同志都讲我有“特权”，说“王厂长不愿意让别人报道，不知回绝了多少记者。”还听说有的老朋友凭着这多年对王晓棠的了解，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晓棠传，也被她三求四劝地压下了。连王晓棠自己都承认“真得罪了不少记者、作家朋友。”“过去的不想讲，没做的没的讲，正在做的又不到讲的时候，而且没有时间，只有等将来，我什么职务都不担任了，一身轻了，就可以坐下来，有时间也有心情和朋友们好好聊聊，讲讲我这一生走的路，讲讲做人一世的感受和反思。说点想说的话，干点想干的事情。现在不行，我当这个厂长，人就是八一厂的，干什么都得想着从八一厂出发。穿着这身军装，人就属于这个军队，干什么都得想着自己是个战士。”

要说王晓棠也是敢说敢想、敢做敢为、颇有英雄气概的人了。可在采访中，我也会时时感到她的顾虑，她总是不肯多讲自己。许多事明明是她做的，许多想法明明出自她的思考，她却不愿说，更不肯让我写，似乎在担心有悖自己长年来接受的思想教育，也担心引起误会而影响工作。就连我利用从别的渠道得来的资料相当客观、相当有分寸地写出的稿子，她也叮咛再三，要求我把关于集体、领导和群众的笔墨加重些，把有关她个人作为的部分淡化些。坦白讲，这叫我很难。我产生了一个念头，也许有一天，王晓棠不当演员、也不是厂长、将军了，她会活得更轻松一些，我的稿子也就能写得更轻松一些了。

其实，在王晓棠的人生经历中，不当演员也不是厂长不穿将军服的日子是有过的。

王晓棠有过值得回味的童年和少年，天真烂漫，无忧无虑，舒适的生活条件，良好的学习环境。书香人家重义轻利，重才淡财的传统教育加之地下

党爱国救国的思想影响，以及正规扎实的课堂学习，凝结成她思想意识和文化素养的奠基石。王晓棠在童年的梦里是没有看过自己在银幕上和穿将军服的身影的，然而，童年的一切却与后来的处世为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曾经剥夺王晓棠当演员穿军装的权力的是文化大革命，那场众所周知、众所经历的灾难，把风华正茂的王晓棠从高雅神圣的艺术殿堂拽出来，抛向人生的低谷。乘风破浪的艺术追求之路被卡断了，荆棘四布、冰冻雪封的现实摆在面前。一个曾经受到大众爱戴和尊重的电影明星，一时间竟连凡人俗子最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

不知道那个不可一世的江青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还是仅仅因为女人狭隘的嫉妒，竟凶凶恶恶亲自把矛头指向了从未与她有过哪怕一面之视的交往的王晓棠。一夜之间，王晓棠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精神上受尽了“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的凌辱，肉体上吃足了棍棒交加的折磨。带着满心满身的伤害和屈辱，王晓棠被强制做“特殊复员”处理，下放到京郊一个偏远的林场，落户6年。开始1个月还有40元生活费，后来，连这难以维持生活的一点点钱都停发了。

王晓棠曾经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无论在外的拍摄演出多么繁忙劳累，回到家，她都能得以放松和宽慰。每当看到艺术天赋很高的儿子，她都会感到后继有人的自豪。可是，就是这唯一的儿子，寄托着无限期望的孩子，却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因为妈妈挨整而受牵连，贻误了治疗，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那年，孩子刚刚该过18岁的生日……

得知我要采访王晓棠，有人提醒我有三个话题是禁区，需小心从事：她的身体、她的家庭和她的孩子。

身体可以不提。以前曾从一篇报道中见到文革中王晓棠的腰被打断过，很长一个时期里她不仅要坚持服中药，而且身边总有一只硕大的枕头，用以支撑腰部。可现在我所见到的王晓棠却总是神采奕奕，脚步蹬蹬，笑声朗朗。天天连轴转地工作十几个小时，那心身状态令人折服。家也不提了，自从丈夫病逝，王晓棠出出进进总是只身孤影。在那重新恢复正常待遇的住房里，再也听不到往日的欢歌笑语，王晓棠每天都忙到很晚才回去休息。被冷落了住房，只有逢年过节，王晓棠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约来聚会时，才充满了“家”的温馨。

但是孩子，却让我这同样为人母亲的女人忍不住要说两句。因为如果你了解一个女人是以怎样的希盼和忘我，又以怎样的承受力克服了种种很难用文字描述的苦难来孕育一条生命的，就不难想象当失去了自己用血肉用心身换来的孩子时，一个母亲的悲伤。

王晓棠没有给我讲述当时的情景，我也不忍心去触动这很久以前的伤疤。然而，我知道，儿子给她留下了一幅油画，那是孩子在知道自己不久人世的时候，亲笔为亲爱的妈妈画的。画上那无力低垂的向日葵，犹如孩子那过早中止的年轻生命，让人触目心碎。

王晓棠一直把儿子这幅题名《早秋》的作品挂在家中最醒目的地方。每年儿子的生卒日，她就是再忙，也一定要抽出时间，亲手做一顿儿子生前爱吃的菜，摆在画下。不管她白天在忙什么，也不管这一天里发生了什么喜悦和烦恼，当一天即将过去，她从繁忙的工作中抽身回到家，王晓棠总要在画下静静地坐一会儿，冥冥之中，总有一双纯真的目光，带着忧伤，带着期盼，在追随着她。

那场灾难过去了，被灾难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绝对无意为灾难唱赞歌。然而，王晓棠却说文革是一次极深刻极难得的人生体验。如果说以往当演员时的生活体验是为了把角色塑造的更真实更丰满，那么，文革中被迫接受的经历，则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磨练。一段苦行僧跋涉，一次生死场的炼狱，造就了更成熟更坚毅的王晓棠。她说自己的人格都得以升华。正是在那难以想象难以忍受的磨难里，她发现了自身一些潜在的能力和气质。这种换位的思考，也许就是革命乐观者的“因祸得福”。

那场灾难过去了，不会再现，不能再现。王晓棠当然会有从现在的岗位上退下来的一天，然而，退下来的日子绝不会是灾难的重复，而将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在新的生活中，也许王晓棠会成为一位作家，专事写作。

她从小就喜欢文学，还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就借助字典，开始阅读“大部头”《红楼梦》、《镜花缘》、《水浒》、《三国演义》……有许多古典名著中的神来之笔，古人留下的精彩诗赋散文，至今她仍能背诵得朗朗上口。博览群书、广采众长，古今中外的精华瑰宝使王晓棠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品位。

当演员的时候，靠这素养和品位，王晓棠能较准确地理解角色，演出深度。她自己写的那些演札记、创作心得，虽说是带有学术探讨，总结性质的论文，却写得生动形象，颇有几分文采。重返影坛，她当导演、做编剧，写出了《翔》、《老乡》、《开心果》等剧本，一一展现了她的文学功底。做了将军，当了厂长，她的许多独到见解和创意，不能说与其文化素养没有关联。无论是参加社会活动时的即兴表演还是各种会议上的正规发言，王晓棠从不要别人代笔拟稿，往往即兴而就，出口成章，就连本当枯燥乏味的动员辞、总结稿，她也能绘声绘色讲出不少亮点。

许多人也许还记的，在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晚会上，王晓棠自写自咏的一首长诗被作为压轴戏。要说这压轴戏总该有点吸引观众的热闹劲儿，否则坐了一两个小时的观众就会“抽签”，提前“拜拜”了。用长诗朗诵压轴实属少见。然而这次一连数十天的演出中，没有人提前退场，没有人随意走动，甚至没有人交头接耳。王晓棠用她流淌在精美诗篇中的炽热情感，唤起了观众的共鸣。那首诗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广为流传。

在王晓棠的人生经历中，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生活体验；在王晓棠的感情世界里，积累了多少可书可写的悲欢离合。如果有一天，她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来潜心写作，谁又能怀疑她将会有很多很好的作品问世？做过好演员、好厂长、好将军的王晓棠，也一定会成为一位好作家的。

卸任后的王晓棠也许不会重返银幕，但会重归舞台？像那些至今仍活跃在观众面前的老艺术家们一样，到厂矿去，到田野去，到练兵场上去，到大学校园去，到欢迎他们、敬爱他们、需要他们的新老观众朋友中去，让艺术的生命闪耀夕阳的光辉。当她带着那依旧迷人依旧亲切的微笑，容光焕发地站在朋友们面前的时候，当她那依旧精彩依旧出色的表演再次吸引着人们，激起潮水般掌声的时候，往日的观众朋友会因此多一分亲切，多一分对沧桑岁月的沉思。忘却那些烦恼，淡漠那些恩怨，抚平那些痛楚，珍存那些美好，生活就会多一分温暖，多一分信心和希望。新一代的观众朋友会因此与父母兄长的心更贴近，会有更多的理解在不同时代的人们心中流通。人们会从这位不再年轻却依旧光彩照人的艺术家身上领悟艺术明星的真正魅力，

而今日的“星星”们，是否也能从她的气质和演技中，领悟敬业、立业的真谛？

在王晓棠的艺术生涯中，曾经留下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创作成果，在她当将军的日月里，又为培养新的艺术人才，营造新的艺术事业做出过呕心沥血的努力。那么，谁又能怀疑，有一天，她若重返舞台将仍旧风韵犹存，光彩夺目？谁又能怀疑，她一定会创造出更加绚丽的艺术形象，再立新功？

也许，不再当演员，不再穿将军制服的王晓棠会成为一位十分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她的名气、她的身分、她的丰富阅历、她的独特魅力都将为她今后的社会活动提供优势，她会为全社会的文明，为我中华全民素质的提高，做出自己的贡献的，她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份热情和爱心。

在当厂长的日子里，每逢过年过节，百忙中的王晓棠总要抽出时间，带上花自己钱买的礼物亲自登门看望已经离职卸任的者同志。问问生活上的要求、听听工作中的意见、叙叙当年在共同的艺术创作中结下的友情。

在这些老同志中，有一位年逾七十的朱老太太，每次见到王晓棠，总是拉着她的手久久不放。只要时间允许，王晓棠也总会一口一个“大姐”地叫着，与老太太拉拉家常。每一次老人都会感动得热泪盈眶。

平日里，王晓棠自己忙得顾不上登门探望，就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时时去关照这些老人，把他们的冷暖需求挂在心上。有次采访，办公室的姚秘书正在电话上吩咐通信员，一定要把当晚的电影票亲自送到一位退休老人的手里。姚秘书对我说：王厂长很重视这些“小事”，她不允许在对老同志的关心上打半点折扣。也是这位姚秘书对我讲，好几次上班，他都能碰到专门等在路口的朱老太太。当问她有什么事需要办的时候，老人总是颤颤微微地说：替我照顾好晓棠。我是真心疼她啊！可什么忙也帮不上，倒叫她老挂心……

有一回，厂里来了位河南姑娘，一个十分漂亮又十分年轻的姑娘，口口声声要认王晓棠做干娘，侍候她，跟她学艺。几次劝说无效，办公室的同志报告了王厂长。王晓棠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把姑娘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膀挨膀地坐在一起，如亲似友地进行了一番交谈。真像是一位母亲在劝说自己的女儿，苦口婆心，为她点拨一时的迷蒙，使姑娘终于明白了自己这个年纪刻苦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和人生之路应当怎样扎实脚下、放眼未来。姑娘走了，没有实现初衷却带回了更多的收获。不久，她从家乡给将军阿姨写来了热情的信，在表示了真诚的谢意之后，也表示了认认真真学习、认认真真做人的决心……

还是工作在王晓棠身边的同志们，对她的爱心有更多更深的感受。他们说，王厂长就像自己的老妈妈，如果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她会狠狠地批评，有时甚至会发火，真有妈妈对孩子恨铁不成钢的急恼，可她又是那样体贴入微地疼爱这些比自己小得多的同志们。她会在你无意间皱起的眉头上扑捉住你心中的烦闷，一定要抽出时间为你排忧解难；她会拿出自己的药来为你的亲人治病，而这病情什么时候被她探听到的，连你自己也说不清。从外景地返回厂里，已近深夜，她会叫司机把车先开到她的家，亲自下厨房做一碗又香又热的面条送到司机的手中，自己却连口水都顾不上喝，又匆匆忙忙赶到办公室。就是你有了错误挨她的严厉批评，她也会在事后再找机会，心平气和地与你交换意见。不仅要你知错认错改错，一辈子都接受教训，还能使你心服口服，没有怨言。

王晓棠是那伴善良、热情，充满爱心，又是那样正直、纯真。

1983年的一个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报道了王晓棠去沈阳演出坚决不收演出费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轰动。那时候，一部分人走穴风正盛，要价声正高，王晓棠此举真谓“逆行”。

王晓棠自己倒觉得这事太平常，不值得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影响。她认为人各有志。有人演出要钱，只要别太黑，我不反对，劳有所酬嘛，但是，我不要钱，你也别说三道四。

对于这件事，王晓棠谈的很深情，她说这钱我不能要。我是党和军队培养起来的，我的艺术才能和表现机会是人民给的。王晓棠说：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是广大的观众朋友、人民群众给我安慰、给我鼓励、给我支持和信心。今天，当我重新获得权利站到舞台上，站在人民面前，向人民要钱，这手我伸不出去。

十多年过去了，1994年，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直播节目中，王晓棠将军作为嘉宾主持，给节目增添了不少光彩。演出结束后，许多现场观众涌向王晓棠，像当年一样热情地请她签字合影、询问她的近况。节目制作的工作人员也找到了王晓棠，提出来要给劳务费。王晓棠笑了，幽默地说了句：你还真给啊！我若是真要，你就给不起喽！

王晓棠知道艺术的价值，知道自身的分量，更知道做人的价值，做人的准则。王晓棠那颗正直的心可真是金钱无法估量的。

当年在王晓棠饰演金环的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里，有一段相当精彩的对话，不仅当时脍炙人口，至今还被许多人记忆犹新，并赋予了新的意义。影片中，当国民党军官关敬陶被我军抓捕，他见走进门来的金环一副农村妇女模样，便动了心思，于是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关：大姐，能救我吗？

金：我是要救你。

关：救了我，3天之内，准给你家送2千块钱来。

金：钱，我不稀罕。

关：只要放了我，要什么都行。

金：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

后面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金环以自己的义举和生命，真正搭救了关敬陶，使他获得心灵和人格的复苏，成为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同盟者。

金环是王晓棠成功地塑造的一个艺术形象。她以自己深刻的理解，演活了这个角色，将英雄的形象留在了亿万观众的心里。而金环这段金子般闪亮的话语和她那高风亮节的英雄气概，似乎能在王晓棠的处事为人中找到共同点。还是用王晓棠自己常说的话来更生动、更感人——中国古训“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总认为人民对于我王晓棠的恩情，是涌泉之恩，我就是竭尽心力，也只能滴水为报。怎敢怠慢，怎敢向人民伸手？

心比钱更重要，献比取更踏实。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这是共产党人的气节。是不是正因为如此，王晓棠才这样努力地工作，这样轻淡钱财，这样洁身自好。

做演员，王晓棠曾以自己的热情、善良、纯真和正直去体会塑造每一个角色；当将军，她也在气吞山河的大将风度中注入了自己的热情、善良、纯真和正直。要是有一天，王晓棠真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谁又能怀疑，这份热情、善良、纯真和正直，还有这份爱心，会使她成为大众的朋友和贴心人；

谁又能怀疑，这社会一定会因为她的努力而变得更温暖、更清洁、更亲切、更多一份向上的力量！

我曾经问过王晓棠，她担任着多少社会职务？她想了想，摇了摇头。于是，我去间办公室的同志，他们数出了几种，中共“十四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全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国制片人协会副会长……是不是还有遗漏？他们说得查查，才能全说清楚。

王晓棠担任着众多社会职务，自然是因了她的名气、因了工作的需要，然而，似乎也因为她们所具有的出众才华和独特的魅力。

第14届电影金鸡奖评委会主任的入选几易其人，最后落在王晓棠的名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她在13届评委会里只是个普通评委，比起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她的年龄和资历都差了一截。而电影评奖又是件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主任评委的名儿好听，工作可并不好做，王晓棠却干得漂亮，评委第一次开会，做为主持人，王晓棠既没有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说，亦没有盛名难有的谦虚客套，平平淡淡一句“现在我们开会啦！”干脆利落直插正题。以后的评议虽然激烈紧张，却又和谐舒畅，二十几位评委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却又达到共识，结果圆满。此次评奖，不仅获得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较满意的成果，也使不少人对王晓棠其人有了新的了解，用西安厂评委许还山的话说：想不到她是个帅才。

1994年元旦，国际名人陈香梅来京，特意约见王晓棠。那次在国际饭店总统套间的会面，王晓棠淡妆素裹，一袭雪白羊绒衣裙，头上一顶同色小帽，胸前一枝淡粉小花，庄重大方又透着清秀典雅。使遍游全球的女强人暗自称道。饭店的服务员私下议论说：嘿，咱中国的艺术家也够盖了帽了！

王晓棠并不是个好出风头的人，可无论什么场合，她只要一出现，总会吸引众人的注意。更让人折服的是她那即兴发挥的能力，会议发言也罢，联欢会出节目也罢，即使事先来不及做准备，她也能当场出口成章，而且相当精彩。头一回参加全国政协会，妇女组的告别联欢会上，王晓棠临时抓过一张纸，挥笔而就的诗叫多少姐妹热泪盈眶。“再见，就是再次相见；再见，就说还会有像此刻一样欢乐的明天”，女委员们重吟着这激情的诗句，相约来年。此后的联欢活动，王晓棠非出节目不能下场，全国妇联副主席刘海蓉的秘书鼓动着大伙说：抓住王晓棠准没错，她一鸣就惊人！

这些事是我听来的，用不着去核实，我相信是真的，因为符合我印象中的王晓棠，因为我每每坐在她的面前和她交谈，总能感到她有一种魅力在吸引着我。那魅力绝不是单单用热情、美丽、爽快等字眼所能概括，更不是年龄和相貌所能局限。那是一种气质，不会为时间所消减，不会因职务、衣着而改变的修养和内涵。

也许从岗位上退下来的王晓棠，也不再去担任什么具体的社会职务。经历了太多的风云沧桑，当了多年的社会焦点人物之后，就做一个普通的退休干部，过一过静心淡欲的清静生活。那时候，她就能腾出时间来做几顿可口的饭菜，织几件漂亮的毛衣；晨曦中，晚霞里，去沿着绿荫遮蔽的马路散散步，享受一下生活的逍遥；坐在柔和的灯光下，敞开了话题地给远方的朋友们回了信，细细品味人间友情。王晓棠有很多的朋友，以前往往忙得见不着面。说不上话，连回信的时间都没有。只能把祝愿和牵挂放在心里，“君子之交淡如水”，聊以自慰。

王晓棠烧得一手好菜。以前当演员，拍戏空隙，她会抽空让丈夫儿子饱口福。有空，她也会为朋友们亮亮手艺，往往让人“吃了上顿惦记下顿”。当了厂长，平日忙得自己都是快餐当家，可逢年过节，她还是会做东，把身边的工作人员请到家里来聚聚。每逢此时，将军服一脱，围裙一扎，王晓棠事事亲自动手。吃什么吧，包饺子，她来擀皮，拌馅儿，个个饺子皮薄肚圆；涮羊肉，她来调佐料，那味道让同志们大叫“这居那居全不换”；要吃菜，她先列出菜单；请别人帮忙照单采购，然后就全交给她啦！蒸煮煎炸，烧烩溜炒，一桌荤素，色香味俱全，最拿手的川菜更是一绝，吃过的人都说够上大饭店主厨的水平。

凡是见过王晓棠办事说话那股子麻利、果断劲儿的人，就能猜想到她在家务活儿上也一准是把好手。当厂长，一天十几个小时忙在班儿上，可她衣眼自己洗，房间自己收拾，有空还自己做饭，从不肯让别人在生活上照顾自己。我没去过她的家，听去过的人讲，“收拾得特别漂亮”，没有时髦的家具，没有高档的电器，却是干净、整洁，有一种典雅大方的情调。

当演员当得出色，做将军干得漂亮。就是真的卸任回家，过一般人的生活，谁又能怀疑，王晓棠会把那普通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充满情趣？谁又能怀疑，王晓棠会让那淡淡的岁月充实、丰富、美好得如诗如画。

也许、也许……可以设想的也许太多太多。一位年轻的女记者曾经问过王晓棠：“你老是这么忙工作，又是一个人生活，会感到寂寞吗？”王晓棠以她那特有的幽默笑答：“我要是知道什么是寂寞就好啦！”是啊，不会寂寞的王晓棠，即使不再忙于拍戏，不再忙于领导工作，也一定会有很多的事可做，我说不清到底有多少种“也许”将她的明天组合，但肯定不会有孤独和寂寞。

也许，也许……也许对于明天干什么，王晓棠自己都无暇考虑过。有一回，电视台的女主持人面对镜头向她提问：“是不是也有烦恼？”这位从不肯对困难低头的女将军直言快语地肯定说：她和大家一样，也有烦恼。她有很多想做的事没时间去做，为之而烦恼。比如，好朋友的信来不及回，所敬重的老师总不能去探望……将军说：“等退下来吧，我一定会还愿的。”是啊，有着“烦恼”的王晓棠，总是有那么多事要做，昨天，今天，她都在忙，明天，她想好了吗？明天意味着还要做多少事情，也许她真说不清。

在采访王晓棠的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其实，我面对的她，已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者，就按晚婚晚育的标准推算，也是理直气壮当奶奶的人了。可就是不知为什么，我总意识不到这一点。当我整理采访笔记的时候，眼前晃动的身影仍旧那么充满朝气的年轻；当我和其他同志谈论她的时候，那感觉是在讲一个同龄的朋友，除去敬重，还有一种相通，有一种甚或更加充沛的青春力量在感染着我们。即使是和她面对面地交谈，近在咫尺地看着她，那思路、那谈吐、那眼神和笑声也都无法与“老年”联想，敏捷、清晰、果断、朝气，属于年轻人的词用来形容她倒是恰如其分。是她那年轻时的形象给人太深的记忆，挥之不去，还是今天的她依旧充满活力，充满不老的精神？我说不清，却强烈地感受到了。那么，明天呢？明天的王晓棠是否依旧年轻？她的生命里是否永远有一种不褪的青春？

对于明天，也许谁都不能肯定，尤其是王晓棠其人，因为她总是做出别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和她都很明白。明天，无论人生对于她有没有具体的头衔，无论社会对于她有没有明确的使命，也不管将来

有一天，她会真的衰老，王晓棠绝不会虚度光阴。她会一如既往地去生活、去工作，去为人民继续做一点事，竭尽全力。她说过，要尽自己毕生，回报人民的涌泉之恩。

后记：在完成了第一、二部分时，其实，对王晓棠的介绍也该说是差不多了，因为她的这几十年基本可以用这两大部分切割：演员和将军。也有人劝我别写这第三部分——像个多余的尾巴。

然而，我却执拗地写下了独立的第三部分，甚至有些偏爱。我觉得人们想了解王晓棠，知道她如何当演员、如何当将军，其实就是想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人来到世上走一遭，他可以有各种社会身分，这各种社会身分都是人为的，可以改变，也揉合着诸如机遇等客观成分。唯独“人”这个身分是与生俱来，伴随终生的。演员也罢、将军也罢、工人、教授、农民、个体户……不过是“人”的载体。

我对王晓棠作为“这一个人”是怎样的更感兴趣，想必读者也是一样，于是，就有了第三部分，塞进了采访中许多似乎既不属于“明星王晓棠”也不属于“将军王晓棠”的素材和感觉……

还要向读者们坦白的一点：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我借来的。本来的题目是叫《银屏金星》，倒也贴切，却少着一点写女将军当有的韵味儿。后来在采访中，听说著名作家张弦前辈也有意写王晓棠将军，文章虽还未动笔，题目却已做出，叫做《比传说更美丽……》真棒！到底技高一筹，我等自叹弗如，于是斗胆冒昧借来先用。特此坦白，以避“剽窃”之嫌。将来一天，张弦前辈文章问世，自然是正宗的《比传说更美丽……》，相信那时的王将军一定会有更惊人之举，前辈的文章，自然也会比拙作更精彩、更美丽……

将星的魅力

尚方

一见她就有种很熟悉很亲切的感觉。她说话的声音很轻，语速偏慢，给人一种平静安适的感觉。但是那种熟悉和亲切甚至喜欢还不仅仅由于她那种很熨帖人的声音和学者风度，我总觉得除此之外还有点什么。我看着她和她交谈，希望脑子里能出现对她比较准确的判断，结果我真找到了那种和她一见面就产生亲切感的原因——长得像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演员春妮儿。

春妮儿一身材姑打扮还让人觉得可爱，如果再穿上合体的将校服还不更让来访者忍不住多看几眼？我想，学者风度加春妮儿容貌加女将军气质，她是挺完美的一个采访对象。

我接过她递过来的名片，把她的名字记在采访本上——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晁福寰。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办公楼是建国初期的那种老式建筑，房高墙厚。晁福寰坐在那间不算大的办公室里显得挺清秀，她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有一幅字，上书“高洁”，她说那是前任院领导留下来的，她搬进来时没有动。她任副院长的命令是1993年5月17日下的。军事医学科学院1951年建院，至今已有43年的历史。她是第一个担任院领导职务的女性，是共和国建军史上第14位女将军，也是现在任职的女将军中最年轻的一位。

年轻总是好事，有谁不喜欢年轻？但她却因此有些顾忌。她对我反复说，“真的，不要写我，我没什么特别的。”

我对她说：“我也是真的要写你，出一本女将军的书总不能少一个。”

她仍然要求：“我还是希望不曝光。”

我说，“又不是什么坏事怕什么？”

她把防线向后移：“那你少写一点，比别人篇幅少一点。”

我说：“出版社对字数有要求。你不给我谈够，我还得来找你。”

我发现我有点太难为她了，谁还能没有点顾忌？尽管是女将军。但军事医学科学院是全军顶尖科研机构，全院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就200多人。藏龙卧虎，有耄耋老者，也有可畏后生。她任院领导职务才一年多，正是熟悉情况，想踏踏实实地做点事儿的时候，我硬逼着她谈，若引起别人的误解，以为她张扬、不谨慎，似乎不太好。所以我也表态，尽量少写。

晁福寰很不情愿地被我刨根问底，我因此知道，她5岁半就上了小学。

晁福寰原籍河北，在天津出生长大，我猜想她5岁半上学也许因为长得个大，因为从现在一米七几的身高看，她小时候不会是个小个子。从小她就是个挺懂事的孩子，年级越高心劲越足学习成绩也越好。由于身体不够健壮，就有意识地参加体育锻炼，结果进了业余体校练田径，在高中二年级时作为体育苗子被集中到天津市第60中学。但高中毕业时她没有走向冠军之路，而是考取了天津医科大学。她说：“我喜欢学医。”由于成绩好，她成了所在中学唯一一个被医学院录取的学生。晁福寰踏上了实现理想的第一个台阶。

晁福寰想过这辈子当个医生，却没想到能参军当兵。在大学她是用功刻苦的学生，学习成绩总是优异，担任着班长职务，是各科教师熟悉和欣赏的学生。在毕业实习中，她被推荐参加了卫生部组织的考察活动。那一年为检验各医学院的教学水平，几个医学院的学生被抽调到一起实习答辩，晁福寰

又为母校争了光，取得了好成绩。毕业临近，有老师建议她考研究生，而晁福寰却决定毕业去干临床。

晁福寰难忘毕业实习时的那段时间，她和所有医学系的学生一样，在医院的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等主要科室轮流实习。各科的学习考试，基本都是看病人，一个病人来了，从听病情到下判断再开出治疗方案，晁福寰做得得心应手，在和病人的接触中，她感到了医生为病人解除病痛的愉快，她希望自己早日成为有处方权的、能直接为病人服务的医生。

毕业表很快发下来了，晁福寰虽然非常喜欢临床，但在志愿一栏里，和那个年代的许多青年一样，她只写了“服从分配”四个字。她是学生干部，理所当然地要在这方面带头。

志愿表交上去了，晁福寰在等待组织上的安排。不久，学生中在悄悄传着，部队来选人了。当不断有同学被通知查体时，她忍不住半开玩笑地问了老师一句，“怎么不让我去查体？”老师似是而非地说了一句“你不用查就行。”她反复琢磨这句话的意思，这时她才发现，原来自己是这么想当一个女兵。终于，她等来了令她兴奋异常的好消息。那天的每一个细节，晁福寰至今都记忆犹新。

那天她正在洗头，宿舍的门被老师推开，老师对她说：“部队来看了你的档案，你要没意见她们就拿走了。是国防科委来要四个毕业生，从事国防医学工作，也可能参军，也可能不参军，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你考虑一下去不去。”

晁福寰托着还在滴水的头发，向老师表态：“我服从分配。”从这一点看，还没穿上军装的晁福寰，已经很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了。

晁福寰没想到几句简单的对话，将她送上了军事医学研究之路，也改变了她做临床医生的志愿。

1965年，大学毕业的晁福寰走上了军旅之路。到部队报到的当年，她和其他女军人一起到北京丰台果园大队和江西四清下放锻炼一年。

1966年8月，晁福寰正式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报到，成为我军一名女医学科技工作者。

对于晁福寰来说，也许最理想的是成为穿着军衣的某部队医院的临床医生，她的同学见她参军后没能当医生表示叹惜，他们相信她若做了医生，一定是出色的。而现在晁福寰每天面对的是各种试管和试验台，她收起了做医生的梦，习惯地想：不论做什么，我都要做好，而且要尽最大努力做得最好，这是晁福寰从学生时代起养成的习惯。

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一普及到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的运动，照样卷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晁福寰所在的地处天津的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简称四所）的工作人员也分帮分派，每个人都凭感觉加入了自己认为最革命的一个组织。晁福寰也参加了一个群众组织，一心想在业务技术上尽快成长的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抱一个随大流的态度。她不太喜欢这种闹闹轰轰的事，她希望早日在研究室里接受任务，在试验台上积累知识和智慧。但是科研工作不能正常进行，晁福寰便开始自学英语。她在大学学的俄语，而搞医学研究，英语是一项很重要的工具，她决定用这个空档把英语拿下来。

看她总是在自己床上或坐或躺地看书，有人就忍不住盘问：“晁福寰你说真心话，你是不是想将来成名成家。”晁福寰也说真心话：“我只是想找点事儿干，我觉得这样浪费时间太可惜了。”

晁福寰承认自己是看事业很重的那类人，如果事业方面无事可干，她会受不了。许多女性把购物美容、穿衣戴帽当成生活中的必须，从逛商场和美容美发中得到无限乐趣。而晁福寰却不同，她像许多在科研上出成绩的人一样，把进试验室当成乐趣，当成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中国知识分子中，有晁福寰这种品性的人不少，他们不会热烈响应“停产闹革命”这样的口号，却会对“抓革命促生产”举双手赞成。医科院的各种正常工作，很快恢复。所里给了她一些机会，让她先后到北京地方上的医科院病毒所、医科院医学生物研究所和本院的五所学习病毒学操作技术。她抓住各种机会尽量多学多做，努力提高专业技术水平，业务上很快适应了研究所的工作并开始冒尖。

晁福寰上大学时喜欢心血管专业，曾希望自己成为治疗心血管病的临床医生。到四所后分配做军队卫生，主要是给水卫生的研究工作，她的志趣很快转到了水卫生研究上。

水是生命之源，部队的给水卫生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在战场上，洁净的水如同弹药一样重要，是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战争使人动尽脑筋，人们发明了原子弹，但却没有完全制服能致水污染的细菌和病毒。即使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部队在正常驻守和拉练演习，巡逻开拔中都需要解决给水卫生问题，战争中没有清凉洁净的水补给部队，打胜仗就是一句空话。历史上上甘岭战斗对水的呼唤；云南前线数不清的军工和士兵为背水牺牲；两伊战争中美国出动空军专门为前线的士兵运矿泉水和冰块。美国军事研究专家把水称为战术武器。各国的军事医学研究机构，都把部队给水卫生研究当成重要的研究课题。

女性主水、近水、亲水，而且常常被喻为水。也许是天然的缘分，晁福寰在军队给水卫生的研究中如鱼得水，在前辈们的指点带领下，她参加了水中微生物检验、饮水消毒、苦咸水处理、水质分析等方面的工作。她开始忙了，忙得白昼不分。做菌试验需要滤膜，为做滤膜她白天晚上泡在试验室，天冷天热她不觉得，却把做滤膜的温湿度牢牢地记着，紧紧地盯着。

晁福寰说她和所里的一些老技术人员的感情很深，因为从试验室涮瓶子到标准洗液的配置、标准试剂的配制，培养基的配制，老同志们不仅自己做，而且手把手地教。在他们的教、带下，晁福寰洗出的瓶子不带任何污迹，不挂一点水珠，她养成了一丝不苟的科研态度。那些日子她和同事们泡在试验室里，她参加了我军第一代饮水细菌检验箱的研究试制，参加了饮水病毒消毒剂的试制，这种消毒剂后来配发到中越边境部队。

晁福寰不断承担临时任务，执行任务的地点大都在外地，她出差很多，即使在怀孕期间也没有停下来。按常规，女同志怀孕期间接触病毒是不好的，现在的孕妇怀孕忌吃许多药，而晁福寰却带着她未出生的儿子到了病毒研究所。她虽然担心却停不下。以后孩子出生，她看到儿子健康没缺陷就放心了，但是孩子出生两个月后就被她放到了父母家，因为她又接受了新的任务，要出发了。

那个年代备战备荒的口号使许多工厂纷纷迁往三线，迁到大山里工作的人们发现饮水与水源存在许多问题，便向部队求援。部队承担了三线重点地区的卫生调查工作。晁福寰顾不上孩子尚在嘤嘤待哺，报名参加河北怀来县饮水除氟的现场研究工作。

那时调研队里只有她一个女同志，由地质队员领路，每天爬山涉水。山里的河水遇雨便涨，又没有桥，只能涉水而过。一次在涉过一条齐腰深的河

水时，晁福寰突然晕水，身体随着水面晃动，站都站不稳，停了一会才恢复过来，事后回到驻地越想越窝囊，一个人还偷偷流了眼泪。可是，第二天她仍然坚持上路，终于闯过了晕水过河这一关。并且圆满完成了一次次调查任务。

以后四所的科研工作逐步展开，恢复了细菌组，科室的老同志积极推荐这个有事业心的年轻人当组长，使她得到更多的锻炼。

强烈的事业心使她在工作中勤奋努力，成了所里在微生物研究方面的技术骨干。她的科研思维很活跃，她不仅希望自己出成绩，还希望自己所在的科室和研究所，在微生物研究方面名列前茅。

七十年代，根据工作需要决定在所里建立病毒实验设施。因为水中病毒的研究在我国还相对薄弱，但是部队又需要这方面的经验。晁福寰选定了这个主攻方向，负责完成 f2 噬菌体作为水中病毒消毒效果评价指标及其浓集方法的研究。这种研究通俗地讲，就是现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用水中，仅仅完成水里的细菌消毒是不够的，还需要杀灭水中病毒。但是水病毒的检测条件和消毒条件要求高，一般的卫生学试验室无法完成。而晁福寰的工作，则为水里病毒的检测提供了简便易行的方法，使一些实验条件不是很高的试验室，也能完成水病毒的检测。目前该方法已在军内外饮水消毒研究中广为应用，受到同行的称赞。

晁福寰是一名身穿军装的医学科研工作者，她对军事医学研究的本职工作力求精细，对部队基层力求了如指掌。

1986年3月以她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四所军队卫生调查组成立。调查组以了解部队卫生状况和存在问题，更好为部队服务，做好七五期间军队卫生与环境医学方面的科研工作为目标，以中年科技骨干为主要参调人员，以基层座谈和实地考察的方式，分别对沈阳军区、兰州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及三个军医大学和众多对口单位进行调查了解，用了近半年的时间，了解了步兵、工兵、炮兵、通信兵、装甲兵的日常生活卫生状况。摸清了寒区、热区、海岛、沙漠戈壁、热带丛林地区和广西前线的卫生保障情况。对部队卫生工作的现状和有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

晁福寰和调研人员一起走进战士工作的潮湿坑道，了解坦克部队车内柴油废气污染的程度。细致了解战场上官兵遇到的卫生学问题；了解小分队和单兵的给水卫生问题……。他们马不停蹄地奔波，并在考察结束后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总结报告中归纳了部队在空气卫生与噪声防护、基层给水卫生、营养与食品卫生、高寒高热地区卫生保障、军事劳动卫生与疲劳以及训练中的身体损伤，沙漠地区行军中的检水检毒装备、海岛部队晕船问题、潮湿地区皮肤病问题、热带丛林的蚊虫叮咬等问题，调查深入细致，对部队的卫生工作做了较全面的总结和归纳。报告还对军内卫生学研究工作动向及现状进行了分析。分析了全军及四所在卫生学研究上在国内所处的水平，找出了长处和薄弱之处，提出了对部队卫生学研究的组织与管理方面的建议。这些建议从新兵入伍教育应增加卫生知识的了解学习，到部队卫生装备的普及和合理使用，做了深入具体的阐述；提供了可行性方案。特别是在对于全军卫生学研究纵深配置的设想中，大胆提出了分层次分任务的梯次研究体系，以明确全军各不同层次的卫生学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避免造成选题重复，科研课题撞车，造成军费浪费的现象。

这次调查，使晁福寰对全军的卫生工作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对基层的

实际问题有了深切的体会，也更明确了四所在全军卫生与环境医学方面所处的位置和所负的责任。她在考虑不仅要把科研目标定在较高的学术价值上，还要争取为解决部队基层的实际问题而出成果。

身为部队的科研工作者，晁福寰对基层部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基层的广泛接触，使她对自己熟悉的水检验在部队基层中存在的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部队拉练行军野外驻训，需要一种简便的水检测装置。晁福寰决心从最直接的问题着手，尽快研制出一种能在部队推广使用的水质细菌学检验设备。

她带着科室人员，把研究目标定在简易、轻便，既适用于实验室，又能在野外使用上。经过努力，由检验箱和轻便培养箱组成的部队基层水细菌检验装备制成，两个箱体的大小分别只有一般抽屉的 1/2 大小，检验箱体积为 29 × 18 × 14cm，可肩背，重 4.5kg，打开后便是一个小操作台，箱内有水中细菌学检查所必需的培养基和器材。培养箱则是一个小型手提式直交流电两用的恒温箱，体积为 29 × 19 × 19cm，重 5kg。没交流电时，箱内的蓄电池可以供电使用。两箱在野外使用，可获得与试验室条件下标准方法同样的结果。水质细菌学检验箱为部队基层水质细菌学检验提供了便利手段，解决了边远部队水质细菌学检查极为困难的问题。作为我军目前唯一的水质细菌学检验装备，在试用及试装过程中深受部队欢迎。老专家对检验箱的评价是设计合理、科学性强，具有国内先进水平。该箱很快用于全军的改水工作，并得到推广应用。1990 年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1991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勤奋刻苦的晁福寰，在长期从事的部队给水卫生的研究工作中，已成为学科带头人，成为军内外有一定影响的环境微生物学学者。她带硕士研究生，还在国内外学术组织中兼职，是中华预防医学会理事、卫生检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环境微生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预防医学会和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总后卫生部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及军队卫生专业组组长、全军预防医学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军卫生标准委员会委员等。

晁福寰不仅科研工作成绩突出，在日常工作中还崭露了组织才华和很强的领导能力。1985 年被任命为研究室副主任，1986 年初晁福寰被任命为四所的所长助理，年底被任命为副所长，在下达晁福寰任职命令的那天，晁福寰很诚恳地告诉上级派来谈话的人：我本没想当领导，既然上级和同志们信任我，我就做做看，我若做不好，可以马上换掉我，我下来之后准备……

晁福寰说，那次谈话。她把上去和下来的话同时谈了，她觉得自己还是喜欢搞业务。对群众的信任和领导的安排，应该不负众望。但是如果不适合做这项工作，马上下来也不是什么损失。

晁福寰以一个学者的风度看待职务的晋升，以一个学者的智慧思索四所的建设，她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走马上任。人们很快发现，她好像对副所长的工作很熟悉。她进入角色的过程很短。称职地做着副所长工作，同时也没扔掉科研工作，她仍参加课题组的研究。在任所长助理期间她参加了前面提到过的军队卫生调查组的工作，在历时 5 个月中，足迹遍及数十个省市，深入四个大军区和全军主要的医学院和科研机构，执笔写出了很有分量的调查汇报。

1986 年 12 月，晁福寰随军事医学科学院陈宁庆副院长一行五人，应美

方邀请，赴美访问了美国陆军医学研究与发展部，美三军军医大学和迈阿密大学医学院。晁福寰很重视这次出访机会，她详细考察了美国陆军医学研究与发展部，从编制体制到该部的研究范围，进行了详细了解。

在美国陆军环境医学研究所，晁福寰对其下属的八个研究室，即高原病研究室、炎热实验室，寒冷研究室、运动生理学研究室、健康与作战效率研究室、军事营养研究室、军事人体工效学研究室、科研辅助室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对每个室所担负的研究方向、研究课题、小组分工等均详细探询；并和本所做了横向比较。

短期的交流访问很快结束了，晁福寰通过这次访问，感到美国军事医学与一般医学研究有些明显的特点，即科研目标比较明确；其中直接为士兵的健康与安全而开展的科研项目较多。她发现美国的科研人员经常深入部队训练现场，有时甚至成了训练教官，比如为解决急性高山病人快速撤离现场问题，他们在基层制定战士的爬山计划；为解决战场疲劳问题，他们就在现场教战士如何睡眠；除此之外，其科研手段先进，科研效率较高等都是其明显的特点。在国内属于由专人掌管的一些仪器，在美国的试验室可以随便使用，而且 24 小时开放，这无疑给科研人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身为副所长，晁福寰对美国军队科研经费的拨放这个问题很敏感，特别询问。在美的访问使她了解到，美国的研究机构是靠研究人员的课题水平争取经费，谁提出的课题有实用价值和新颖性，就容易争取到研究拨款。而在职称晋升中的淘汰制也使科研人员的竞争意识很强烈，研究工作显得比较紧张，晁福寰他们此次参观科研机构，有时安排在星期天，在科研机构里，星期天的试验室里也有许多人在忙碌。访问使晁福寰对美国科研人员的竞争意识有了更为直接的体会，而这种竞争直接导致的高效率的科研工作，快速而实用的科研成果。这些都使晁福寰深受启发。

这次出访使晁福寰有了一次与发达国家军事卫生学研究工作比较的机会。她感到在军队卫生与环境医学的研究方面、在研究方向、课题设置等方面，我们与美国的水平大体相当，我们与美国的差距是在科研管理、某些领域的技术水平和创新精神方面。晁福寰感到，要改变差距，就要加强科研管理，在科研管理上进行一些改革，充分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率，鼓励和支持新技术的应用，浓厚学术空气，向管理要人材、要效率、要成果。

参观访问，与外界的交流，使晁福寰更真切地意识到，军队建设的现代化、正规化，不仅仅体现在先进武器的装备，也在于先进的军队后勤卫生工作的保障。而军队医学科学的发展，对提高部队战斗力，减少部队非战斗减员和非战斗损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晁福寰希望为此尽自己的努力。

也许是命运对晁福寰格外偏爱，任所长助理和副所长不久的晁福寰，在 1988 年 8 月，被任命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所长。

此时的晁福寰不仅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声望，还具备了一个科研管理人员所应具备的眼光和能力。她像寻找水里的病毒和细菌那样，认真地审视四所，寻找激发四所科研活力、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改善四所科研的软硬环境的症结和通路。她希望四所不仅在全军水卫生科研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且自身也成为活水，充满活力。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是为适应部队卫生防病工作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建所 30 多年来，主要以军队卫生学方向，以应用研究为主，针对平时部队需要研究相应的卫生保障措施。该所虽然在人体营养

学、环境生理学、环境卫生学方面在军内外有一定的优势和实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晁福寰上任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四所如何在发扬过去的优势的同时，弥补自身的不足，开创科研新局面，这是晁福寰任职后反复思考的。

晁福寰是科技干部出身，长年的科技工作实践，使她养成了严谨扎实的作风。她知道，如果要使科研课题早出成果，就必须要有明确的国标和科学的试验方法。而要做好所长，同样需要明确的目标和为实现目标而制定的具体步骤。晁福寰此生一贯奉行的是：做什么就一定要做好，而且要争取做得最好。这个最好不仅仅是自我感觉，还包括四所所有的同志的评价。

根据上级要求，她组织制定了自己的“四所任期目标”，她要搞一个有广大群众基础、切实可行、能符合当前改革开放的特点，又能切实成为全所共同的奋斗目标的四年任期计划。

晁福寰打算认真真地在任期中为四所做点实事儿，她为此做了广泛的调查了解工作。为做到心中有数，她深入到科室，和科室的同志保持密切的联系，她把群众意见综合汇总，又结合四所的实际，反复思考，四所今后几年的努力目标逐渐明确。主要内容由三部分组成：一、形式分析；二、奋斗目标；三、措施。在形式分析中，晁福寰从四所的性质和方向，四所的主要特点和优势，四所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等方面，对四所的现状进行了详细分析。

四所从建所以来就有着很明确的为部队服务的目标，在深入部队为部队服务的职能上应该说是尽职尽责的，并因此受过总后勤部的通令嘉奖。四所在一些研究课题方面，比如人体营养学、环境生理学、环境卫生学等方面在军内外有一定的优势。在人才优势上，在学科内比较著名的顾景范教授是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吕永达教授是中华预防医学会高原医学副主任委员。《营养学报》、《应用生理学报》和《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两报一刊在四所按期出版，也证实了四所在科研人员方面的实力。近几年四所主持的全军性协作课题和全军性学术会议不断增多，四所在军内卫生学研究中的地位是军内外公认的。其科研设备的配置有力地保证了科研工作的开展，建所以来已有130项成果，并有部分成果走向市场。

这些优点和长处晁福寰心里十分清楚，她感到自己当所长的主要任务不是守成，而应该在克服四所现存弱点并使之成为长处上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在任期中有所为有所建，为四所的发展尽力。

晁福寰长期生活在四所，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她已对本所的情况非常熟悉。为印证自己平时的感觉和印象，她又与许多同志聊，征求意见，找出四所的薄弱环节，针对四所地处天津市中心，占地狭小，生活及工作用房紧张，对专业实验室建设和人才引进都带来一定困难等薄弱环节，她仔细思考着对策，思考着在任期内经过努力使之改变的措施。她在任期目标报告中点出了科研协作问题、忙闲不均问题、还特别提到了“自由主义”的问题。她认为一个好的、充满竞争力和科研思维活跃、科研成果丰硕的研究所，必须有好的风气。

晁福寰深知自己能走上所长的岗位，是大家信任的结果，那么她的任期报告就必须反映四所群众关心改革的心愿。常期在基层工作，使她清楚同志们的所思所想，她知道群众喜欢干实事解决实际问题的干部。所以，她也把自己想到的“任期目标”明明白白地公布给四所的全体成员。她把任期目标

分为：成果目标、人才目标、学科建设目标、科研条件保障目标、技术开发目标、基建和生活保证目标、政治工作目标。

晁福寰的目标实在而明确，四所的科研人员通过任期目标计划，感受到晁福寰真心为四所的建设尽力的内心愿望。那些目标明确具体，每一条都是大家长期以来就关心而又无力解决的。晁福寰却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她要去做了。她的人才目标是这样定的：“1988年至1992年培养硕士研究生20名左右，争取博士生导师资格1—2名”。

“培养一批40岁左右的课题负责人，使课题负责人平均年龄不高于50岁。学科梯队配备完好率达80%，50岁左右的学科带头人占20%—30%，争取每年有近1/3的中青年科技骨干参加全国或全军性学术会议……”

晁福寰不是军事家，也没当过政治家，但她不缺少知识，她深知人才是一个所发展建设不可缺少的战略目标，她的当务之急，是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晁福寰的实于家气魄，还在于她的大胆和敢想敢为上。谁都知道基建生活保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她却将自己这方面的所思所想明白地公布于众。

她的基建和生活保障目标中这样规划：

(1) 完成双电源工程，改善科研条件。

(2) 完成芥园购地、过户手续，着手改造厂房，使之尽快产生效益；

(3) 科研、生活用房尚缺9000m²，因此，要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完成基建三年滚动计划，改善全所工作和生活条件。其中：

宿舍 3000m²

动物饲养场 1600m²

图书馆改建 1500m²

专业试验室 2500m²

二马路危楼改造 688m²

战士宿舍 450m²

……

晁福寰当所长当得不聪明，她把自己要做的事一件一件地摆在全所人员面前，其详尽和全面是前所未有的。她把自己放在一个透明的办公室里，她要做什么，她去做什么，全所上上下下看得清清楚楚。这些事情一件件做下来，一件件做好做完整，将会耗费她许多心血，做好了是完成了预期目标，做不好，别人会以为她讲大话，哗众取宠。

现在许多领导不像晁福寰这么干。不这么干，可以享受当领导所享受的住房、用车等诸多便利而不把自己放在群众的监督之下，群众会知道领导“很忙”，然而忙什么，忙自己还是忙公家却不得而知。

晁福寰不是想偷懒的那类领导，不是明时务，在位小心翼翼、于多干少用称称着来，做得好坏只重领导评价而不管群众意见的那种领导混混。她把目标交给大家，把套套在自己身上。让四所上下都了解自己为四所尽力的心愿。能把任期目标具体明确地交给群众，让群众监督，让群众评议的领导，起码不会让群众嘀咕：“她行吗？”从这点说，晁福寰又是聪明的。她给大家一个信号，她举起了信号枪，指着前方具体明确的那条终点红线，发出了“预备”的口令。四所人在这个口令中感到为之一震，感到一种竞赛和冲刺的激情。

晁福寰为实现任期目标竞赛的冲刺，还在报告书中拟出了更为详细的“措

施”。从如何缩短科研战线，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到如何改变科研层次，避免和军区及医大的研究机构的研究课题重复撞车；从如何支持中青年承担课题，争取基金，到支持中青年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和在学术组织中任职，并对培养中青年成绩显著的老同志给予奖励；从对哪一类选题优先支持，寻找专利转让，到健全生产经营实体，形成拳头产品，为四所多赚钱，为科研提供资金保证等等……一条条措施林林总总细致周全。

在我们交谈之中，晁福寰曾说自己是业务型的干部，但是我却发现，晁福寰政治工作水平也不低。她在措施中特别谈到了“改革政治教育、加强思想工作”、“加强法制教育、增强纪律观念”、“加强开发工作的政策观念和政策研究”等专门措施，其中像“通过各种形式的群众性文体活动的开展，陶冶精神，增强凝聚力”都包括在内。我翻看晁福寰所写的“四所任期目标”时，感到这份报告书的实在、完整。我试想如果我是四所的工作人员，在听了或看了这份报告书之后，会感到所长是值得信赖的，是讲求实际要做事的人。

晁福寰是那种做事才觉得充实，不愿“浪费”一点时间的人。她好像没什么时间多考虑个人的事，她的居家和生活都很简单，然而在工作上的考虑上，她却充分地显示出女性周到、细致、一丝不苟的明显特点。就像织一件漂亮的毛衣，要有好的设计，还要耐心地、认真地编织，环环相扣，不能掉线，掉线就会出现破洞，毛衣就出现瑕点。

晁福寰费了一番心血写成任期目标，又为该目标的实现花费着更多的心血。我在一份材料中看到对晁福寰这样的评价：晁福寰同志积极拥护改革开放，而且立足本职，积极带领全所同志在科研和开发工作中努力进取，均取得明显的成绩和进步。工作作风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敢于负责，敢于创新，勇于承担重担，勇于献身事业，办事认真，讲究效率……

除了一些老教授的上述评价，在采访中我还了解到，晁福寰之所以能制定出受到四所群众欢迎的任期目标报告，还和她的虚心好学分不开。晁福寰知道四所不是她一个人的，集体的智慧总要比个人的智慧更完善，集体的力量也总比个人的力量大。她善于到群众中去收集情况、收集意见、收集建议、收集智慧。晁福寰因此克服了她科技干部出身、管理经验不够丰富的弱点，由她拍板出台的某些举措，显示出某种大将风度和领导者的聪明智慧。

四所和全军许多研究所一样，面临着科研经费不足的问题，晁福寰在深入部队的调研中，曾看到士兵在日常生活中，在卫生和营养保障上还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些条件艰苦的部队驻地，士兵们生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买了奶粉又没有热水冲。晁福寰面对这些和她儿子差不多年龄的战士，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对得起军队科技工作者的良心，要多为部队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使研究所更好地为战士服务。但是回到天津，晁福寰又深切感到了经济后盾的重要，没有足够的科研经费，巧妇是无法做无米之炊的。如何解决科研经费不足的问题，她决定集中群众智慧，在所里开展擂台赛。从中精选出一批懂科研，又有经营头脑，勇于开拓、奉公守法的人从事技术开发生产经营工作。

擂台赛在四所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响。人们关注着这件事，议论着这件事，也感到擂台赛带给所里的新鲜话题。跃跃欲试的人做着充分的准备，人们的才华因子被激活，平日对所里的科技开发就有所思所想或不满意的人，在思忖自己的实力，在揣摩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面对的其他擂主。这场比赛，

实际上是在赛谁对四所科技开发工作更熟悉，对市场更熟悉，对改变四所科技开发工作现状的愿望更强烈，对自己和四所拥有的实力更有信心。晁福寰知道，不论谁当上擂主，争取到四所科技开发实体的领导权，他都将比任何时候的受命者都更胸有成竹和更加倍地发挥主观努力。事实证明，这次擂台赛在四所获得了成功。不论在擂台赛中是否登上擂台，人们都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对四所科技开发工作的战略思考和实际对策的思考，人们的科技开发意识普遍加深。这对于长期工作在科研室、试验台的科技人员，无疑是进行了一次实际的研究与应用的讲座，这对科技人员构成主要成分的四所来说是重要的。四所科研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服务军队造福人民，让科技人员在头脑里建立起必要的实用价值观念，对所从事的课题既有学术头脑又有社会实用方面的明确认识，无疑会促进四所的有关实用性科研成果的推广和转化。

改革的确使四所受益，四所经济效益明显上升。1988年时全所技术开发收益目标为80万，而以后每年都有所递增：1992年达到160万；1993年实现260万，到了1994年已有望突破300万。这些收益除了支持本所各种建设外，有60%投入科研发展基金。为四所步入良性循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晁福寰在四所的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她的工作能力和实干精神得到普遍肯定。1993年，上级领导经过考核和征求意见，决定把晁福寰调任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职务。晁福寰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

一个女科技工作者，从一个军内普通的科技人员，成为一名女将军；晁福寰走过的路已属不平凡。曾有人根据惯例猜测晁福寰有什么背景，而翻遍晁福寰以及晁福寰爱人的家谱，都没有人曾经显赫过。晁福寰的母亲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父亲是天津轻工业进出口公司的干部，已经去世。而与她在同一个所工作的丈夫更是“劳动人民”出身，晁福寰不可能借谁的余荫。相反，她的父母和家庭，都给了她全力的支持。支持她从事自己喜爱的科研工作，支持她要做就做好的想法。晁福寰的独生儿子生下来两个月后就放到父母家，孩子在两三岁时常对出差归来的爸爸妈妈以叔叔阿姨相称。晁福寰和她丈夫对儿子都有一份内疚，他们平常对他照顾得很少，晁福寰说：“我还真没怎么管他，全靠他自觉努力。”

晁福寰的脚步是扎实的，她做得大家心服口服，曾有朋友根据晁福寰的工作实绩对她开玩笑：“晁福寰你还能升。”晁福寰却说：“升什么？当个所长已经顶天了，我如果不称职，都不用别人撤，自己先下来。”晁福寰对自己所做的工作尽力追求“称职”。她认为当所长做好所里的工作是应该的，不然当所长干什么？她认为她做的都是她应该做的，她一再说她没有什么特别的。

晁福寰很谦虚，谦虚使人进步，她当上女将军的背景大概就是这句话。

我曾接触过十几位女将军，与她们的交谈的大体印象几乎相同，就是她们所付出的努力的确值得人称赞。

晁福寰曾讲到自己的家庭生活。她说她和爱人都属于事业型的人，家庭生活要求不高，衣食住行都从简，从不为此浪费时间，也不为此觉得委屈。在天津时晁福寰和丈夫从相恋到结婚都没改变泡试验室的习惯，有时候星期天晁福寰夫妇留在家里休息，晁福寰观察到丈夫常有魂不守舍的时候，她便让丈夫：“没什么事，你愿到试验室就去吧。”而她自己则更是试验工作来了顾不上家的人。采访晁福寰的时候，晁福寰已调到医科院一年多了，夫妻俩一个在天津一个在北京。后来丈夫虽然办了调往北京的手续，但由于手里

的试验没完，又不忍半截丢下，便依然留在天津。我去了晁福寰在北京的家，四壁空空，除了简单一床一桌外没什么东西，新买的冰箱很碍眼地摆在门厅里，大概是匆匆忙忙搬进来就没动过，位置放得很不对头，冰箱里边空空如也。晁福寰说：“我基本不做饭。”她说这话时在那套师职房子里发出空空的回声。

“不做饭”是晁福寰这种夫妻顾此失彼的最好注脚，而晁福寰说夫妻俩对此默契，并没有谁对谁表示不满意。

我曾通过电话与仍在天津的晁福寰的丈夫徐其寿聊了几句，他也印证：“我们这个家庭简单，我们要求都不高，只是欠了孩子很多。”徐其寿向我解释，不怎么做饭不是因为不会做或晁福寰不顾家，而是因为楼下就是食堂，打饭方便，全家就一起吃从食堂打回来的饭。后来儿子有了女朋友，有时星期天未来的儿媳来了，他们为了有所表示，就中午吃一顿从食堂打的，晚上再自己做一顿饭，夫妻两个一起进厨房。

我觉得晁福寰夫妻这样生活也是一种幸福，双方都觉得有比吃饭更香更诱人的事儿，不会因为一日三餐做得咸了淡了扯皮伤感，不会因为家务你多做了我少做了达不到绝对平衡而心理不平衡，少了许多家庭矛盾。

我曾戏问徐其寿，当丈夫的可曾记得妻子的生日？知道妻子喜欢吃什么？喜欢什么颜色？徐其寿将晁福寰的生日年份答对了，月份答错了。喜欢的颜色答为红与黑。他还坦率承认不善于为妻子生日买礼物。而晁福寰也大概差不多，只是比丈夫答问题的准确率提高了。但是他们彼此双方都没觉得对方有什么不好，晁福寰没因为没收到生日礼物而怨丈夫不体贴，丈夫也没有因为床单脏了，衣服没及时洗而有怨言。我觉得他们这种保护和支持对方的事业心，在家庭生活中达到一种从简的和谐并一直如此，三十年如一日，对现在的许多人来说实在是不太容易的。

当了副院长的晁福寰现在心里的内疚比丈夫多一些，对儿子则是老的内疚还没弥补，新的内疚又添上了。她讲到最近一次周末回天津看望那爷儿俩。全家人一起上街，走在路上晁福寰对儿子说：“还是只生你一个孩子好，了不少麻烦，不然像现在这样一家人分着过，又要多些惦念。”儿子回答说，生两个好，你可以带走一个，我能留下来。

晁福寰的儿子工作不久，工作表现很好，父母都办了进京手续，他也面临进京的问题，但儿子毕竟是天津长大的……

晁福寰心里明白，她的这次荣升，使丈夫和儿子都跟着作出了一些牺牲。

当然，晁福寰自己也不是没有“牺牲”的感觉，她感兴趣的许多课题正在进行中，当了所领导以后，有人劝她仍兼顾课题，兼任组长，但她还是辞掉了，她说组长应该让给能每天盯着科研进度的人，我不能占着那些位置。

晁福寰曾想当一阵所长后仍去搞业务，谁都知道干业务比当领导稳定而且越老越有价值，但院里的任命是先公布后谈话，领导和群众的信任，把她又推向了新的岗位。她还是那句话：“我现在只能努力于，大胆干，争取干就干好；如果不尽职，我就回去干业务。我希望自己日日夜夜地付出，一心一意地工作，能够不辜负组织和大家的信任。”

晁福寰是熟悉水的，熟悉水的滴水百穿的韧性和奔流不息的恒心。她自己也似一般清澈而充满活力的清泉，在改革的洪流中向前流淌着。

